河南考古探索

杨育彬　孙广清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新平
封面设计　韩　青



河南考古探索

HENAN KAOGU TANSUO

K872.61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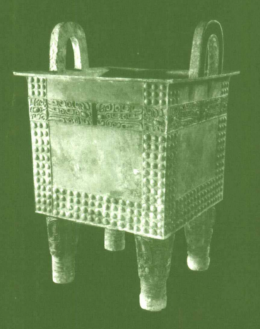


ISBN 7-5348-1910-5/K · 745
定价：168.00 元

HENAN KAOGU TANSUO

河南考古探索

杨育彬　孙广清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南考古探索 / 杨育彬　孙广清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5
ISBN 7-5348-1910-5

Ⅰ.河…　Ⅱ.①杨…②孙…　Ⅲ.考古-研究-河南省　Ⅳ.K87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449 号

责任编辑:杨新平
责任校对:明　歌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承印单位:安阳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9.5
字数:70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1910-5/K·745　　定价:1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多年来,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文物考古研究。既是生活中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事业上合籍双修的战友。我们共同或分别编写的或与他人合写的有《河南考古》、《郑州商城初探》、《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卷》、《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等13部专著,有《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河南新石器时代与河洛文明》、《关于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商代王都考古研究综论》、《河南汉代画像石分布与区域类型》、《河南佛教史迹摭拾》等160余篇文章。在上述成果中,获省社科优秀论著一等奖者有之,获省优秀图书一等奖者有之,获省五个一工程奖者有之。这表明了我们在工作中并没有荒废日月。

这本集子选辑了有关河南考古研究的40篇文章,其中有一些是探索性的论述,因此取名为《河南考古探索》。按内容大致分为五个部分。

综论篇共收录了10篇文章。其中《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河南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近年来河南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的河南文物概述和专题文物简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有关河南古遗址和古城址及古墓葬的一批辞条,综合论述了文物大省河南的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不少成果,在全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建国50年来河南文物考古的总结,而河南考古也可以说是中国考古的一个缩影。《从考古发现谈南阳在华夏古文明中的历史地位》论述了南阳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开始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较深层次的考古研究,展示了南阳地区在华夏古文明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地位。《黄河小浪底水库区古遗址古墓葬概述》是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进行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在班村、荒坡、盐东、妯娌等遗址和留庄、长泉等墓地的发掘中,不乏重要的考古发现。1988年是中国的龙年,《从出土文物看古代的龙》,介绍了从仰韶文化到隋唐时期一些有关龙的文物。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素来对龙独有情钟。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把龙当作太平盛世和吉祥的象征。所以关于龙的神话、龙的传说、龙的造型和龙的纹饰,数千年来久盛不衰,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古钱币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历来受人关注。在河南全省和各个地市甚至个别县都有钱币学会,看来很有一些群众

基础。河南出土的古钱币数量很多,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生产、科学技术、商品经济、书法和造型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建国以来河南古代钱币的发现和研究》,勾画出中国古代货币文化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全过程,反映了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和王朝兴衰的梗概。

史前篇收录5篇文章。涉及到河南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裴李岗文化因20世纪70年代首先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而得名。《河南裴李岗文化的分布与地域类型》一文。囊括了1977~1992年河南发现105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或遗存的考古资料,并探讨了裴李岗文化的类型和来龙去脉。河南又是仰韶文化的故乡,《关于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一文,记述了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下王岗类型的内涵和特征,还对河南地区仰韶文化与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源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源于湖北的屈家岭文化分别从豫东和豫西南深入到内地并在驻马店地区交汇,这是全国其他省市所未见。《试论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是为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写的。文章的主要篇幅论述了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分期、特征和文化性质,以及它们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关系。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1964年苏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座上提出的论断"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前期在与周围原始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仰韶文化后期,除对西方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则对中原地区有强烈影响。这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关系的重大变化。"是多么正确。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是重要的考古研究课题之一。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考古学观察》和《中国史前城址与古代文明》,是运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其所用资料则越出了河南的范围,体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先秦篇包括9篇文章,大多是关于夏商文化的研究,这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课题。《^{14}C年代框架与三代考古学文化分期》是运用测年技术得出的^{14}C年代框架与夏商考古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这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关系密切。《郑州商城的考古学研究》,则是作者参加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的重要收获。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对郑州商城获得了更多更新的信息。再与历史文献和测年技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郑州商城由一个聚落址建成为防御东方的重镇,再进而成为一座王都。这与作为汤都西亳的偃师商城和探讨夏文化息息相关。《夏文化探索者的足迹(笔谈录)》,是《寻根》杂志特约的一篇文章,依次回答了六个问题,涵盖了作者的学习经历和考古生涯,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学术界探索和研究夏商文化的回顾与前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夏和商早中期青铜器概论》、《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概述》的主题是研究夏商时代青铜器,这也是先秦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刚刚出齐的包括夏商卷在内的16卷本《中国青铜器全集》,已经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瞩目。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夏商青铜器继承了龙山文化的造型和艺术特点,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体系。夏商青铜器的产生和发展,

展示了我国古代铸铜技术的成就,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同时作为中国艺术传统的精华而永垂不朽。1999 年是甲骨文发现 100 周年,王懿荣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华夏古代文明的丰碑——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阐述了由于甲骨文的发现,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发展成为一门新学科——甲骨学。在弄清甲骨文出土地点之后,又推动了殷墟的考古发掘,发展成为殷墟考古学,前贤们功不可没。玉器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炙热课题。在博大精深的中华古文明中,玉器以其特有的品位和属性,融入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的古代玉器,历经了新石器时代、殷商和春秋战国三个大的繁荣时期。而西周玉器则横跨两大玉器高潮之间,以其品类丰富多彩,形制奇诡华饰,图案神异符合,构图细密繁缛,碾琢流畅婉绵,而远胜商玉一筹,并为春秋战国玉器的新发展构筑了观念的、艺术的坚实基础。《试论近年来河南出土的西周玉器及相关问题》介绍了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鹿邑长子口大墓出土的大量西周玉器,从其学术价值、工艺水平、在礼制中的重要作用等 6 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展示了中国古玉文化的特殊魅力,历经数千年而不朽,也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永恒的篇章。《从考古发现谈河南境内楚文化问题》论述了楚在先秦诸国中有着非常辉煌的史迹。从楚始都丹阳、争霸中原、饮马黄河、问鼎于周,直到楚兵败迁都于陈,这一系列重大军事政治活动都在河南。也就是说,楚国的兴衰荣辱都与河南有关。楚国独特的文化影响尤为深远。楚文化的研究是湘鄂皖豫四省多年联手攻关的学术课题,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确实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河南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谈及西周初年叔虞封于唐,其子燮改号为晋,疆域辽阔,横跨黄河中游广大地区,以晋南为中心,孕育了灿烂的晋文化。与北方的燕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东方的齐鲁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及西方的秦文化交相辉映。晋文公春秋争霸在前,韩赵魏战国称雄于后,在先秦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山西侯马晋国都城和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在晋文化中独领风骚。河南的北部也属晋国范围,三家分晋后的韩、魏两国的版图均在河南,新郑和大梁还曾作过韩国和魏国的都城。而赵国的影响也波及到豫北。晋文化,特别是后来的三晋文化,在河南屡有发现,也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其他篇中有 6 篇文章。《从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国陵墓看汉梁文化》介绍了当地西汉梁国陵墓的发掘。规模宏大的山崖洞室墓和墓前的大型寝园建筑,反映了西汉诸侯王国的陵寝制度和礼制建筑。墓内大型近似于四神的彩色壁画和大量的石刻文字为全国所仅见。出土的金缕玉衣和大批精美玉器,也堪称弥足珍贵。这反映了高度发展的西汉梁国文化。在汉文化向东和东南传播的过程中,梁国也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河南汉代画像石分布与区域类型》一文,论证了河南是全国四个汉代画像石集中分布的区域之一。主要在豫西南的南阳地区,而在河南中部、豫东和豫北亦有发现。在雕刻技法和画像内容上也各有特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又可分为 6 期。向人们展示了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建筑造型、衣冠服饰、社会生活、舞乐百戏、镌刻艺术的面面观。《河南古代陶瓷综

论》是1997年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举办《河南古陶瓷展》而写的。结合发掘出土的瓷器展品叙述了相州窑与北朝青瓷，唐代白瓷、花瓷及三彩，宋汝窑和民间青瓷，宋元钧窑与磁州窑系等内容，这表明河南古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浙江、江西等著名瓷区相比，各有千秋，并不逊色。河南是北宋国都与皇陵所在之地，多年来发掘了不少宋代墓葬。《河南宋墓综述》一文，从宋墓形制、建筑艺术和雕砖壁画、葬具与随葬品及墓志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从中描绘出当时的社会面貌。《中原文物》和《华夏考古》是河南出版的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文物考古专刊。《中原文物》由河南博物院主办，实际上也是该院院刊，这与1936～1938年的《河南博物馆馆刊》一脉相承。在河南博物馆建馆60周年时，也适逢《中原文物》创刊10周年。《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一文，对此作了很好的回顾，颇有一些史料和学术价值。同样，在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华夏考古》创刊10周年时所写的《十年耕耘 十年收获》也是一篇很好的纪念文章。

书序篇中收录了作者为10部涉及河南文物考古研究专著而写的序言，按其出版的先后顺序为《郑州商城初探》、《河南考古》、《殷墟考古史》、《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史前彩陶》、《河南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文献举要》、《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商代铜器窖藏》、《郑州大河村》。这些学术专著大多出自中青年业务骨干之手，也有我们自己的成果。有些书为综合性研究，有的是断代考古，有的是考古报告专集，而世后都曾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书序为这些专著作了简单的概括、分析和评论，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我们的挚友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介钧先生，1996年10月在其所著《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曾写过："考古学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是新的资料不断涌现，因而其研究不容许也不可能长期停留在原先的水平上，后一代学者整体说来定然超过前一代学者，考古学这个学科比起其它学科来，这一规律更是铁定的，而且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但是，前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其它学科更明显地成为后一代学者所建造的殿堂的基石，更明显地是为后一代学者指明和开辟道路。我的研究，之所以能有所开拓，离不开前一代考古学者奠定的基础。而我最大的愿望，也就是为年轻一代的考古学者们提供一个继续前进的新起点。"这完完全全代表了我们的心声。我们虽然成绩平平，但还是愿为年轻人的前进当一块铺路石。

今年是2001年，已经跨入新的世纪。人类的希望和祝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在于斯。仅以此书献给我们至亲至爱的祖国和伟大的21世纪！

杨育彬　孙广清

辛巳年春节

目　录

其他篇

书序篇

后记

综论篇

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

河南地处中原，北依河北、山西，南靠湖北，东面与山东、安徽为邻，西边与陕西接壤，扼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境内群山起伏，大河纵横，平原辽阔，深得天时地利之便。河南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方神奇的热土上。日月交替，沧桑更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由于战争的频仍，王朝的兴衰，人民的迁徙，河南又成为各民族交融汇合的熔炉。漫长的历史岁月过去了，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

作为文物大省的河南，20世纪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现，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展现了华夏先民的光辉创造，描绘出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随着21世纪的到来，让我们回眸世纪考古的辉煌，展望未来更加美好的考古蓝图。

一

早在1921年，受聘为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经批准后会同地质所的工作人员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确定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此外，又调查或试掘了渑池不召寨、杨河、西庄和荥阳秦王寨、牛口峪、池沟寨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梁思永等人，主持了安阳殷墟15次的考古发掘；与此同时，河南古迹研究会于1932年～1933年在浚县辛村由郭宝钧主持发掘了卫国墓地；1932年由刘燿主持在浚县大赉店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1933年～1934年又发掘了浚县刘庄、巩县塌坡和马峪沟、广武青台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1935年郭宝钧发掘了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的东周墓地；1936年李景聃在商丘、永城进行考古调查，并试掘了造律台、黑堌堆、曹桥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述考古发掘，勾画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考古学发端和成长的轮廓。尤其是长达10年的殷墟发掘，不但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宫殿、作坊、王陵大墓和无与伦比的青铜器、玉器、甲骨文，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把中国的信史提早到3300多年以前，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发掘和研究人才，使中国现代考古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

新中国成立之后，配合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河南各地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和

多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为了解决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也进行了一些主动发掘。50年来,有了很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在河南西部、西南部、南部及中部和北部,包括灵宝、三门峡、陕县、卢氏、渑池、洛阳、巩义、荥阳、汝州、伊川、确山、南召、镇平、西峡、内乡、舞阳、许昌、安阳、新蔡等县市,发现旧石器地点和古人类化石地点50余处。其中灵宝营里、三门峡水磨沟和会兴沟、渑池青山和任村、洛阳北窑[1]、南召杏花山和小空山[2]、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舞阳大岗,都是名满全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构成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完整的发展序列。尤其是在南召杏花山原始洞穴内,发现1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其地层堆积时代为更新世中期,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南召猿人化石是河南经过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地层关系的首次发现。此前,淅川药材公司曾收购与此相近的13枚古人类牙齿化石,这些和陕西蓝田猿人、湖北郧县和郧西猿人一样,证明古人类在豫、鄂、陕三省邻接的广大地区长期生活着。

河南先后发现10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了中原地区在原始社会晚期的繁荣景象。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全省已发现120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多分布于豫西山地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以及豫中、豫南黄淮平原地区。此外,在豫北太行山东麓和豫南大别山北麓也有少量发现。主要集中在新郑、新密、长葛、许昌、汝州、巩义、鄢陵、舞阳等县市。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新郑裴李岗[3]、新密莪沟、巩义铁生沟和瓦窑嘴、长葛石固、汝州中山寨、舞阳贾湖[4]、郏县水泉、方城大张庄、淇县花窝等。其中裴李岗遗址和莪沟遗址的氏族墓地,贾湖遗址的七孔骨笛和龟甲、骨器、石器上近似文字的契刻符号,以及人工栽培稻等考古发现,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河南又是仰韶文化的故乡,距今7000～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像繁星一样布满中原大地,有不少遗址都进行了发掘。其中郑州大河村遗址保存墙体高达1米的房基,有多达30多种纹饰的彩绘陶器;汝州阎村遗址陶缸上罕见的鹳鸟石斧图;汝州洪山庙遗址由136件以上的陶缸构成的大型瓮棺葬,陶缸外壁多绘有人形、动物、植物、日月或几何形纹饰,个别还塑有壁虎形象[5];濮阳西水坡遗址墓地内,出土有3组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其中一条龙身长1.78米,昂首拱背,动感很强;淅川下王岗遗址和邓州八里岗遗址由数十间房基组成的大型连间长屋[6];郑州西山遗址的城墙、城门、城濠、道路、房基、窖穴和墓葬等,都是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

距今约50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由发展到解体的阶段,也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即将产生或刚刚产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在全省的发现与分布,比仰韶文化更多、更广泛。在汤阴白营发掘出由40多座房基组成的聚落址,同时还发现有井字形木构框架的水井,这对人们定居和农业生产至关重要。永城王油坊遗址发现的多座房基中,都采用了夯筑地坪和土坯砌墙的建筑技术,并出有精美的白陶和磨光的蛋壳黑陶。汝州煤山遗址发掘出房基、陶窑、水井、窖穴和墓葬,出土有附着铜液的坩埚残片,说明当时已经冶铸青铜器。登封王城岗发现有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古城址,城内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和奠基坑,还出土有青铜器残片[7]。在淮阳平粮台也发现了一座同样古老的

城址，平面呈方形，周长约740米，现存城墙高3米多，城内有高台建筑，并出有铜渣等冶铜遗存，还发现有用陶水管道套接的排水设施[8]。郾城郝家台龙山文化城址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64米，城内发掘出成排的房基，有的还铺有木地板。辉县孟庄古城面积约16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城墙、城濠、城门、房基、窖穴等遗迹，同时还发掘出相重叠的二里头文化城垣和殷商文化城垣，说明这里自龙山文化以来长期较为繁荣。最近在新密古城寨村又发现了一座面积近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城墙、城门、护城河保存较好，城内东北部清理出大面积的夯土高台建筑基址，当为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9]。

距今6000～4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在豫东、豫南、豫中和豫西也有发现，主要集中在颍河、涡河流域的周口和商丘一带，先后调查或试掘大汶口文化遗存近60处，其中包括郸城段寨、鹿邑栾台[10]、周口水灌台、商水章华台、禹州谷水河、平顶山寺岗等遗址。

距今5000多年的屈家岭文化，在河南境内发现140多处遗址，主要集中在豫西南的南阳地区和豫南的信阳地区，在豫南的驻马店以及许昌和郑州一带也有少量发现。这样其分布范围由湖北到豫西南，再扩大到颍河、汝河和洪河上游，甚至到达黄河南岸。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淅川黄楝树[11]和下王岗、南阳黄山、邓州八里岗等。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同一个省分布甚至交汇，为全国所仅见。

夏王朝是我国最早的奴隶制王朝，约在公元前21～前16世纪。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记载，主要在河南伊洛平原和登封、禹州一带，其次是晋南汾水中下游地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探索夏文化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除登封王城岗等多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与早期夏文化有密切关系之外，还找到了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一种新型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因最先发现于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得名，曾发掘出宫殿基址、手工作坊、窖穴、墓葬等，出土有一大批青铜器、玉器、陶器，显示出王者气派。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广阔，西起华山之东，东到豫东平原，北自汾水之滨，南抵淮河汉水之间。从其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看，二里头文化由河南龙山文化传承而来，下推发展为郑州二里岗文化，联系紧密，似无缺环。

商代考古历来是河南的强项。80年代初发现的偃师商城，城墙保存基本完整，已找到了城门、宫殿区、府库和纵横的大道。最近在偃师商城中部和南部，新发现一座时代更早些的小城，虽称其小，但面积超过81万平方米。而偃师商城正是在小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大城。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推断，小城和部分宫殿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这里与二里头遗址近在咫尺，在夏都旁边矗立一座商初都城。无疑昭示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更迭，遂成为夏商时代分界的界标[12]。不少专家认为偃师商城是商灭夏后所建最早的王都西亳。5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城，始建于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是继偃师商城之后又一座重要的商代王都。拥有7公里长的城墙，还有多座宫殿基址、手工作坊、青铜器窖藏和墓葬，出土许多青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及习刻字骨和陶文符号等遗物。近年，在郑州商城西北近20公里处的小双桥，发掘出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建筑构件、朱书陶文、石磬和一批牛头（角）祭祀坑等遗迹遗物，这当属商王室的祭祀遗址[13]。安阳殷墟早已闻名遐尔，建国后发掘有宫殿建筑、武官大墓、妇好墓、后岗祭祀坑，还有小屯南地和花园庄东地的甲骨文[14]。近年在洹河以北的三家庄和花园庄一带，发现大面积商代遗址，包括夯

土、墓葬和青铜器窖藏。其时代早于武丁时期,可能是盘庚最早迁殷的所在。除上述商代王都之外,罗山商代息国贵族墓地是重大的考古收获。

河南的两周考古同样占有重要地位。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周初大批青铜器、玉器和其化珍贵文物[15]。洛阳北窑发掘出370多座西周贵族墓葬和马坑,出土一批青铜器,其铭文涉及的贵族就有太保、毛伯、丰伯等。在与墓地相距不远处,发现面积约28万平方米的西周铸铜遗址,发掘出不少房基、烘范窑、窖穴、路土、地下水管道等遗迹,出有大量红烧土块、木炭、陶范、泥范、熔炉残壁、铜渣、卜骨、卜甲等遗物。洛阳是西周的陪都,该遗址应是周初营建洛邑时迁殷的百工奴隶所建。此外,平顶山应国墓地的发掘,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铜器铭文中有应伯、应侯字样,并有应国与申、邓等国联姻的媵器。这对研究西周至春秋的礼制和建立应国考古学编年有重要意义。50年代在三门峡上村岭发掘虢国贵族墓地,出有虢太子铜戈和用鸡血石、玉石制作的项链及串饰。90年代又发掘出虢季、虢仲等国君大墓,出有玉茎铜柄铁剑、缀玉面罩、墨书玉片、金腰带饰等瑰宝[16]。这里是文献记载中的北虢,公元前655年为晋所灭,年代下限明确,对研究两周之际的虢国文化有重大价值。

东周时期列国分立。作为防御的城郭日益增多,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愈加扩大,各国都邑更是如此。新郑郑韩故城,1923年出土"新郑彝器"曾轰动一时。新中国成立之后,宫殿区、作坊区、墓葬区和兵器、礼器、乐器窖藏坑的发掘[17],更是引人注目。登封东周阳城遗址,现存城垣还高达8米左右,城内发现砖铺地面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贮水设施和输水管道系统,并出有多件印有"阳城"戳记的陶器[18]。此外,在洛阳东周王城、上蔡蔡国故城、潢川黄国故城、淮滨期思故城、固始北山口故城、淇县朝歌故城、偃师滑国故城、宜阳故城、鄢陵故城、辉县共城、濮阳戚城、信阳楚王城、商水扶苏城等,都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与此同时,在河南发掘了大量的东周墓葬,诸如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济源留庄檀国墓、淅川下寺[19]及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信阳长台关楚墓[20]、淮阳马鞍冢和平粮台楚墓、新蔡葛陵楚墓、固始侯古堆大墓、光山宝相寺黄国墓、桐柏月河养国墓[21]等,出土遗物丰富,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阶级关系、埋葬习俗、经济发展和文化艺术的面面观。

两汉是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洛阳曾是帝都,南阳为皇室故里,河南汉代考古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在巩义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温县招贤村都发现了汉代大型冶铁遗址,发掘出炼铁炉、炒钢炉、烘范窑,出土了耐火砖、鼓风管、坩埚片、各种陶范、铁矿石、铁器和煤块,表明早在汉代,我国冶铁规模和工艺水平都位居当时世界的前列。汉魏洛阳故城保存较好,城墙、城门、宫殿、永宁寺塔基、灵台、明堂、辟雍、太学等遗迹历历在目,并发掘了刑徒墓地。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调查了新安八里胡同峡2公里长的黄河栈道,发现道面、地孔、壁孔、牛鼻孔、扣手和造像、题记等遗迹。还发掘了新安盐东汉函谷关仓储建筑遗迹,出有大量板瓦、筒瓦和正面模印篆体"关"字瓦当[22]。墓葬发掘是两汉考古的重要收获。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国陵墓,"斩山为郭,穿山为藏",气势恢宏。梁孝王墓前寝园,建筑复杂,在全国也很少发现[23]。洛阳、偃师、新安、荥阳发现的壁画墓,南阳各县市、襄阳、永城、新密、浚县发现的画像石墓,题材广泛,技艺精湛,各有千秋。洛

阳烧沟发掘了225座汉墓,完成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墓葬的断代、分期和编年。

魏晋南北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南下,形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孟津官庄北魏孝文帝长陵和文昭皇太后陵的调查,洛阳冢头北魏宣武帝景陵的发掘,都是重要的考古收获。洛阳北魏江阳王元乂墓内的星象图有重大科学价值。孟州斗鸡台北魏司马悦墓,墓志内容丰富,有重要史料价值,其书法也是魏体中的上品。邓州学庄南朝彩色画像砖墓,反映当时无名工匠高水平的造型艺术。安阳北齐范粹墓和濮阳北齐李云墓随葬的一批北朝白瓷和青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定地位[24]。位于新安西沃黄河峭壁的北魏石窟,为并列面向黄河的两个洞窟,包括坐佛、立佛、弟子、菩萨、莲花、飞天,分别开凿于北魏孝昌元年和普泰元年。窟外还有4座楼阁式浮雕石塔[25]。由于石窟处于黄河小浪底水库蓄水线之下,1997年将石窟整体搬迁到新安铁门千唐志斋博物馆内,实为文物保护工作中惊世之举。

唐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隋唐东都洛阳城规模巨大,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内城里坊和市、外郭城等,布局井然有序,先后发掘了含嘉仓、含元殿、九洲池、应天门、履道坊白居易故居等,收获甚丰。开封宋城是北宋的国都,多年来已基本搞清了宫城、内城、郭城的布局,调查钻探或试掘了御街、州桥、朱雀门、大庆殿、金明池等遗址。此外,还调查了偃师唐孝敬陵、巩义北宋皇陵[26],发掘了宋太宗赵光义元德李后陵。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出有精美三彩器和1枚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金币。洛阳南郊花园村发掘有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27]。偃师杏园村清理一大批唐墓,不但出有镶嵌紫水晶金戒指、鎏金银盒、银箔平脱方漆盒、金银平脱鸿雁衔花镜等高超工艺品,还出有不少墓志,记载这里是"西亳"、"亳邑乡",说明唐代仍沿袭古人旧称。这为一路之隔的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又提供一条佐证。而三门峡唐代漕运遗迹[28]、荥阳大海寺唐代石刻造像[29]、登封嵩山武则天金简、郑州开元寺塔基地宫石刻、新密法海寺塔基地宫三彩琉璃、邓州福胜寺塔基地宫金棺银椁、鹤壁和禹州的宋代煤矿遗址、鹿邑太清宫老子故里发现唐宋建筑基址[30]、洛阳老城宋代衙署庭院遗址[31]等考古发掘,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瓷窑址的发掘是唐宋考古的重要内容。新密西关窑、巩义黄冶窑、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汝州严和店窑、内乡邓州窑、禹州钧台窑、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32]等诸窑口,可谓五彩纷呈,名传千古。

上述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以其珍贵的科学资料,写就了一部形象的社会发展史。教育和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成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振兴中华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

二

20世纪的河南考古,不仅以重大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考古发掘实践中创造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诸多考古研究课题领域内取得的突出成就,也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一定影响。

远在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后岗发掘时,不是像当时常用按深度划分地层,而是

采用了科学的方法以土色区分地层。在整理时,清除晚期地层中的早期遗物,恢复了各时期遗存的原来面貌。这样,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早晚地层叠压关系,即著名的“三叠层”。这应是考古地层学已在我国确立的标志。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对考古地层学的认识和运用,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50年代洛阳中州路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则是考古类型学的一次重大实践。苏秉琦先生把洛阳中州路一大批东周墓按陶器的组合分为鬲盒罐组、鼎豆罐组、鼎豆壶组、鼎盒壶组四大类;再按各组不同式别,细分为七期;又按墓葬的形制,分为大中小三型。同时还按照与陶器的共存关系,把不易看出演变规律的和已订其年代的玉器、铜剑、镞、带钩和铁刀等互相参照,推断其年代,分出相应的期别。再通过各期之间变化的比较,发现在三、四期之间,亦即春秋与战国之间,是发生重大变革的阶段。这样,就把年代学考察上升到分析社会变化的高度,成为考古类型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样在以后的考古发掘和整理中,对考古类型学的认识和运用,也更加完善和提高。

20世纪河南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硕果累累,确立了河南文物大省的学术地位。河南旧石器时代的诸多发现,扩大了我国旧石器分布的地域,填补了中原地区的一项空白。其中洛阳北窑旧石器遗址发掘出石制品近800件,并有一些动物化石及人类用火的痕迹。这里在黄土地层中发现层位确定且分布连续的石制品,国内外都是十分罕见的。它不但把旧石器考古与黄土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对研究全球气候变迁及人类生存环境也有重要意义。舞阳大岗遗址是河南惟一一处经过正式发掘的细石器地点,出土各种细石器327件,还发现1件磨刃石片。大岗遗址与灵井遗址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很相似,且与华北地区细石器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使我们有更多理由相信,黄河流域可能是产生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文化的摇篮。在大岗遗址细石器文化层之上,还叠压有裴李岗文化层。这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被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叠压的地层关系,在国内也不多见。大岗文化可能就是裴李岗文化的源头之一。

河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全国居有特殊地位。张森水先生在1986年说过:“河南地处我国中部,是旧石器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区,南来北往,东播西传,都难以越过中原沃野。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是由南向北传播的。难以想象,猿人历尽艰险,越秦岭而北传,而可能是通过南阳通道而北来,这是一条有利于人类文化扩散的‘坦途’。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有向西发展的趋势,豫西和八百里秦川无疑是这个时期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地区,由此不难看出,河南省旧石器文化研究,在我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中,特别是时空相互关系的研究,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1998年5月,吕遵谔教授在北京香山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考古学组发言时也曾指出:“河南居全国之中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旧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中国旧石器南北文化交流与传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多多。首先是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段的裴李岗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石器以磨制为主,也有少量打制细石器,鞋状附四足石磨盘和圆柱形石磨棒是识别裴李岗文化最明显的标志,舌形双刃石铲和锯齿石镰也是其特有的工具。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褐陶。三足钵、小口双耳壶、篦点纹夹砂红褐

陶鼎、深腹罐等是其典型器物。房址均为半地穴式，以圆形为最多，个别为方形，周边有柱洞，中间或靠后壁有灶。墓葬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墓，排列密集有序，并有分区、分片埋葬现象，这为研究当时的家族、氏族、部落等社会组织提供了重要线索。发现的陶窑结构比较简单，却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陶窑。出土较多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陶纺轮、骨针和骨锥，各种兽骨，少量的石、陶弹丸和骨镞，以及麻栎、枣核、核桃、榛子等籽实，还有陶塑的猪头和羊头等。说明裴李岗文化的氏族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还有一些家畜饲养、狩猎和采集。联系到前面已经提到的骨笛、契刻符号和人工栽培稻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原始文化的认识。这些为研究我国农业、陶器、纺织、建筑、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对古代音乐史、原始数学、原始宗教习俗的研究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裴李岗文化遗址由于所处地理自然环境不同以及相对年代的先后，除共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面貌之外，也表现一定的差异。依据目前调查和发掘的资料，结合考古研究的成果，大致又可以分为裴李岗、贾湖和中山寨三种不同的类型，由于有的类型延续时间较长，大致又可分为早中晚不同时期或阶段。裴李岗类型以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的浅山丘陵区，集中在新郑、登封、新密、巩义等县市，相对年代早一些。贾湖类型以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河南中南部平原地带，集中在舞阳、漯河、叶县、长葛、许昌、鄢陵等县市，相对年代稍晚一些。中山寨类型以汝州中山寨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豫西丘陵地区，集中在汝州的汝河及其以北的黄涧河、洗耳河两岸较高的台地上，相对年代最晚。值得注意的是，在长葛石固、郏县水泉、汝州中山寨、舞阳湖南郭和阿岗寺、方城大张庄等遗址，均发现仰韶文化层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叠压关系，这就缩短了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年代上的距离。从出土的遗物和遗迹情况看，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和石器，以及房基的结构和造型，有一些为仰韶文化所承袭，这表明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当溯源于裴李岗文化。仅此一点，就表明裴李岗文化在中华古代文明发展史所占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此外，裴李岗文化与相邻的冀南磁山文化及关中地区老官台文化关系密切，这三种文化时代相近，文化内涵和文化面貌既有一定的共性，又有较大的差别，它们均拥有代表各自文化特征的器物群，既相互影响，又各自发展，北中西交相辉映，共同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原远古文化。

仰韶文化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和当时不同族属文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解体甚至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门槛的漫长历史时期，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仰韶文化先民们定居的聚落遗址有一定的布局形式。房子以半地穴式最为流行，另有长方形和方形地面建筑。在庙底沟、王湾等遗址中，发现居住面底层用红烧土和砾石铺垫，上层涂抹草泥土，有的使用白灰涂墙。大河村遗址中更发现经过长时间用火烘烤成红色砖质地坪和墙壁的连间式建筑，即由 4 间大小不一的房基东西并连，分别面南和朝北各开门户，是一种相当进步的地上建筑。仰韶文化的陶窑以横穴窑较为常见，它的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有一定的原始性。偃师汤泉沟遗址发现一座竖穴窑，火膛中有土柱支撑上部窑箅，窑箅上排列有 7 个火孔。这比横穴窑有了很大改进。仰韶文化墓葬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在部分遗址也发现有少量合葬墓。小儿则盛行瓮棺葬，多以小口尖底瓶为葬具。在鲁山邱公城、伊川土门、汝州城关和洪山庙等

处,均发现以缸为葬具的成人瓮棺葬。农业生产在仰韶文化时期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在洛阳王湾和孙旗屯、郑州大河村及林山寨、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均发现有炭化的粮食遗存。大量用于开垦、耕作和收割的斧、锄、铲、刀等石制生产工具的出土,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由于仰韶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分布地域又广,在河南构成了多种既相近又有区别,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分离的文化面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其中有洛阳以西的庙底沟类型,洛阳与郑州之间的大河村类型,豫北的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等。它们各自都拥有以红陶为主,包括彩陶在内具有不同特色的陶器群。

在河南诸多仰韶文化遗址中,有两处近年发现的遗址最为人们所关注。一是1989年发现的汝州洪山庙遗址,二是1993年发现的郑州西山遗址。洪山庙遗址出土有我国目前所见最大的一座瓮棺合葬墓,墓坑为长方形,东西长6.3米,南北宽3.5米,东南部遭破坏,其余三个角均为圆弧状。墓坑内置有136具瓮棺,若加上被破坏部分,可能近200具,这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一座普通村落公共墓地的数量。它所代表的氏族或村落的规模,可能与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或横阵墓地相当。这些瓮棺排列的顺序对研究史前墓地墓葬的排列布局有一定启迪意义。瓮棺内的人骨都是二次检骨葬,然后再统一合葬在一个大型墓坑内。由于这些死者并不是同时死亡,所以作为葬具的陶缸也不会是同时制作的。这对考古学研究中如何灵活应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在出土的陶缸上一般都饰有彩绘图案,其中4幅男性生殖崇拜图案是仰韶文化彩陶中的首次发现,这对探讨仰韶文化晚期的社会性质很有意义。有研究者认为,W39陶缸上绘有铲类工具和裸体男性人像,这与所葬死者有密切关系,其生前可能是举行生殖崇拜活动的巫师,也可能是当时该氏族或村落内既管生育活动又管生产活动的男性首领。据此,也可对晚于仰韶文化的良渚文化中出现蹲踞人像纹饰作出合理解释。在郑州西山遗址的中南部,发现一座仰韶文化城址。其南部被破坏,现存半圆形城墙长约265米,采用少见的方块版筑法分段逐层逐块修建而成,城外有濠沟环绕。在城西北部和东北部各有一座城门,东北城门有南北向道路通过,至城门外侧有一道护门墙,形成道路分走两侧偏门的结构。西山城址已清理出房基120座,窖穴、灰坑1600多个,墓葬155座,幼儿瓮棺葬151座,出土数千件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在10多座坑内扔弃有完整或散乱的人骨,一些人骨明显呈挣扎状,或可说明当时氏族间掠夺性战争的情况。在20多座灰坑中有完整或零乱的兽骨,在不少房基的底部,多埋有一至数件的罐,间有鼎等陶器,部分陶器内埋有残缺的婴儿骨骼。这当为原始祭祀、奠基等宗教活动的遗存。墓葬中已经出现父子合葬或夫妻合葬墓,表明当时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结构,发生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氏族之间的激烈战争,原始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家庭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正是西山仰韶文化古城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郑州西山城址不但把我国发现古城年代又提早了一千年,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进程和中原地区在我国早期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都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价值。

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不仅年代早,延续时间长,而且还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并对周围产生强烈影响。从纵向看,向前与裴李岗文化密切,向后又成为河南龙山文化的

源头。从横向看，在仰韶文化早中期，曾对马家窑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以扩大其影响为主；而在仰韶文化后期则是以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向中原地区影响为主。

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在30年代初首次发现于安阳后岗，以后在全省各地迭有发现，至今已达千处之多。其文化面貌以饰绳纹、篮纹、方格纹的灰陶器为显著特征，与山东地区发现的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龙山文化相区别。到了50年代，考古学界将其称为河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发现的房基既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大量地面房基，其中包括长方形连间式建筑，以及建筑在夯土台基上的排房。室内地坪涂以白灰面，置有烧灶，墙壁除采用草拌泥叠筑外，还有不少木骨泥墙。在安阳后岗和八里庄、汤阴白营、永城王油坊、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都发现有用土坯砌筑的墙壁，揭开了我国古代建筑史的新一页。各地龙山文化遗址多有窖穴、陶窑、水井、乱葬坑等遗迹，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河南龙山文化的文化内涵较为复杂，学术界根据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将其划分为王湾、三里桥、后岗、王油坊、下王岗等几个不同的类型。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特色的陶器群，各有不同的文化来源，发展去向也不相同。王湾类型以洛阳王湾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以洛阳平原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和嵩山周围的汝、颍河上游；三里桥类型以陕县三里桥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豫西崤山北麓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区；后岗类型以安阳后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黄河以北地区；王油坊类型以永城王油坊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豫东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区；下王岗类型以淅川下王岗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豫西南伏牛山麓丹江白河流域丘陵平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的上述若干种类型，惟王湾类型自身从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再发展为二里头文化的上承和下延的序列比较清楚。王湾类型的分布区域正与文献记载中夏族活动的区域相吻合，应属于夏文化范畴。而后岗类型和王油坊类型的分布区域，正是文献记载中商族的活动地域，应与相当于夏代的先商文化有一定关系。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畜牧业和各种手工业均较前有了很大发展，并出现了青铜冶铸。联系到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等古城的出现，以及使用文字和礼制遗存的发现，表明至迟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级和国家已经产生，中国进入了文明社会。这样把它们与夏王朝早期联系起来也不会有大差。

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周口水灉台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物为代表。其陶器组合和形制特点与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期相似。晚期以鹿邑栾台遗址一期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物为代表，其陶器组合和形制特点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相似。经过对比研究获知，山东大汶口文化早期时，无论彩陶器的形制和纹饰，还是墓葬内随葬器物的组合，都受到仰韶文化早期的影响，吸收了不少仰韶文化的因素来充实自身的发展。到了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时，山东大汶口文化向西和西南扩展，至少已到达颍河流域，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形成了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仰韶文化，某些陶器特征又被仰韶文化所吸收。郑州大河村、禹州谷水河等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正是这种影响的结果。河南境内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存的遗址内，又往往有仰韶文化堆积在其下，龙山文化堆积在其上。这为仰韶文化、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三者之间相对年代的发展序列找到佐证,也为研究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豫西南的南阳一带,是河南境内屈家岭文化遗址分布最多的地区。根据考古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这里的屈家岭文化大致可以分作两期。第一期以淅川黄楝树、下集、下王岗屈家岭文化一期为代表,相当于湖北屈家岭文化晚期。第二期以淅川下王岗屈家岭文化二期为代表,承袭了豫西南第一期屈家岭文化,是屈家岭文化向当地龙山文化过渡的文化,其年代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相当。而豫南地区诸多屈家岭文化遗存的陶器可分为三组。一组与屈家岭文化相同,有一定数量;一组与仰韶文化相类,数量较多;一组尽显当地土著文化特点,数量较少。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大河村、荥阳青台、禹州谷水河、汝州北刘庄等遗址的仰韶文化晚期文化层中,出土一些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但与屈家岭文化典型陶器已有较大的差别。由此可以推断,豫西南是屈家文化分布的北部地域,或可说是湖北屈家岭文化向北扩张的结果。而豫南地区较多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和河南中部的屈家岭文化因素,也是受到湖北和豫西南地区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亦即那里的仰韶文化,利用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吸收屈家岭文化的精华,不断补充和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正如苏秉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邻境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也表现为自南而北的影响更多于自北而南的影响"。在不少屈家岭文化遗址内,还包括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反映了这一系列文化的消长、取代和变迁。河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遗址,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文化。

夏商以降,河南考古研究成果斐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夏王朝的起始,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都的确定,二里头文化早中期经历了夏王朝的发展和衰落,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偃师商城的崛起,成为夏商分界的界标。夏代时空的定位,对深人阐发中华文明的源流,展现中华文明的成就有重要作用。成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中一个光耀夺目的亮点。

商代考古中,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这一系列王都的发现和研究,大致涵盖了商王朝500年的历史。其城市布局、宫殿建筑、青铜冶铸、陶瓷烧造、玉石磨制、习刻字骨和甲骨文字,显示了我国古代灿烂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的鼎盛面貌,也反映了中原地区在商代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成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又一个璀璨的亮点。

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室东迁洛阳,河南又成为京畿地区。除周王室之外,遍及华夏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国,矛盾尖锐,战争迭起,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在中原尤为惨烈。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王都与各国都邑,高墙深池,突出了防御色彩。虢国墓地、应国墓地、楚国墓地、曾国墓地、黄国墓地、养国墓地……葬俗繁缛,礼制森严。再加上温县晋国盟书和新郑郑国青铜器窖藏,充分印证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可信性。这些又都是以生产力大提高和经济大发展为前提的。除了文献记载之外,洛阳北窑铸铜遗址、新郑郑韩故城的冶铁和铸铜遗址、登封阳城冶铁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虢国墓地出土的铁剑和全省诸多周代贵族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都反映了当时金属冶铸水平的提高。洛阳、宜阳、伊川、新安、汝州、新郑、孟津、登封、郑州等地出土的东周空首布、平首布和圜钱的钱币窖

藏,还有扶沟、信阳、固始发现的楚国金币或银币,都说明了当时经济发展、商业繁盛。

在长达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战争、开放、发展、融合的进程中,最终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制的大帝国——秦王朝。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三门峡、泌阳发掘的大批秦墓和禹州传世的秦诏版,记录了秦王朝短暂的岁月。

汉代在周秦的基础上继续大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冶铁技术的提高和广泛使用。诸如高炉炉型和熔炉技术的改进,铁范、叠铸、韧性铸铁的推广使用,尤其是生铁炒炼成钢这一高效率先进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加快了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对我国古代社会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建筑、军事、文化和日常生活都有巨大作用。从考古发掘得知,当时已出现有效容积约50立方米的炼铁炉,日产量可达1吨左右。并且已使用煤块来冶铁,还掌握了一范多器和多范套铸的技术。林林总总,表明远在约两千年前,我国生铁冶炼和加工工艺,已大致达到西方17世纪的水平。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国陵墓都是在山岩中开凿的大型石洞墓,墓道及甬道等均封堵有数以千计的巨型塞石,塞石多是凿制规整的长方体,每块重1吨左右。塞石上还有序号、尺度、放置部位、干支记时、崖工名字的刻字。这些只能是使用铁器的杰作。河南发现的大批汉墓,犹如一座座地下宫殿。出土的盘龙砚、透光境、陶风车、桃都树、绿釉建筑明器,都是一件件稀世珍宝。还有那一通通汉碑、一处处汉阙,也都凝聚着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对北魏洛阳城的研究表明,当时已经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在新增加的外郭城内划分成许多方形的坊,每边长1里,四周筑墙。工商业的市也设在外郭城。这种划时代的变革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唐东都洛阳城就继承了这种里坊制度,在外郭城划分有109坊和3市。在封闭的方形里坊内,多设有十字街。这种作法又影响了整个唐代地方州县的布局。而开封北宋东京城,除了沿用宫城、内城、郭城的布局外,在外郭城内已不见里坊的坊墙,而采用了开放式的街市,这更便于交通和贸易,反映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面对钻探或试掘的宋城遗址,联系到《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所描绘宋都之壮丽,市肆之繁华,真令人心驰神往。

唐宋考古中瓷器是重要的内容,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和洛阳西周墓内出土的原始瓷器到唐宋时期的青瓷和白瓷,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达到极高的水平。考古发现表明,至迟从9世纪下半叶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丝绸之路所到的西亚以及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到之处,都发现有唐瓷碎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瓷器之路"。它记录了古代中外劳动人民友好往来踪迹,对世界文明也产生很大影响。

三

20世纪河南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取得了足以令人骄傲的成就,使人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从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解放出来,发生了几乎是根本性的转变。面对21世

纪的到来,我们感到尤为任重道远,有许多考古研究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一)要大力加强考古课题研究

无论是配合基本建设,或者是主动发掘,都必须与考古课题紧密结合起来。这是考古学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首先要加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过去的工作只是起步。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提供的线索,未来在豫西黄土区寻找旧石器文化非常重要。豫西和豫南有许多洞穴和岩厦,很有可能找到较完整的古人类遗址。具体说在豫北的太行山东麓,从安阳向南再西折向中条山东段的济源山丘内;在豫西的黄河两岸,从孟津向西直到灵宝境内;在豫西南的南阳盆地边缘山麓,从方城向西沿伏牛山脉到西峡顺丹江而入淅川。从方城而南沿桐柏山直到淮水之源;豫南的大别山北麓,从信阳向东到豫皖交界处。在上述广大地域内最有希望的地区就是豫西秦晋豫交界处和豫西南秦豫鄂相邻地带。即使在豫东和豫东南,更新世地层虽埋藏在地下,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是会有新发现的。我们期望今后河南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能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其次要加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农业起源的研究。河南曾发现许昌灵井和舞阳大岗等细石器遗址,这已是旧石器文化的尾声。还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偏晚阶段的裴李岗文化。但是缺少二者之间的遗存,即距今1~1.2万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偏早阶段的遗存。希望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能够补上河南地区文化谱系框架中这一缺环。这将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形态的研究很有意义。农业起源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鉴于在舞阳贾湖等地发现裴李岗文化的水稻,因此除了加强对粟、稷之类旱地农作物起源研究之外,也要加强对稻作起源的研究。

三是加强夏文化的研究,加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这是两个相得益彰的考古研究课题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夏文化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努力去解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家要继续开展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要把我国自黄帝以来五千年的文明史,明明白白地摆在世界面前。河南考古工作在这方面应该大有作为。

四是加强古代城市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河南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过去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址,还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形态,对于农村聚落而言,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城的出现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密不可分,它是统治阶级防御外敌入侵和治理人民的设施。在筑城过程中所反映人力和物力的集中,以及行政控制与管理之强有力,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城址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能够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礼制等诸多方面最大的信息量。在河南还发现了更多的夏商周及汉唐宋等各个时期的城址,其中不少还是统治全国的王都。其城市的布局和建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功能,以及城市的沿革变化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的规律。对国内甚至周边国家的古代城市都有影响。

五是加强古代陵墓制度和一般墓葬习俗的研究。河南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宋金时期的大量墓葬,其中包括商周汉和魏晋唐宋时期的王陵、皇陵和诸侯国的陵墓,以及各个等级和不同阶层人物的墓葬。资料极为丰富,是考古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过去对

殷墟王陵及平民墓、两周诸侯国国君和贵族墓地、永城西汉梁国墓地、洛阳烧沟汉墓、巩义北宋皇陵等,都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今后更要加大研究力度,特别要注意陵园和墓地布局的探索。

六是加强商代方国和周代封国的研究。这是河南的一大优势和重要课题。过去对罗山商代息国的研究,对周代三门峡虢国的研究,对平顶山应国的研究,对新郑郑国和韩国的研究,对潢川黄国的研究,对温县盟书和三晋文化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深入研究已有的考古资料,努力取得新的资料,包括古城调查及青铜器铭文和其他出土文物的研究,使课题研究成果再上新台阶。

七是加强楚文化的研究。楚在先秦诸国中,曾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号称"地方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泱泱大国。据记载,楚早期都城丹阳可能在豫西南一带,其后南迁到湖北而逐渐强大起来。春秋战国时期,楚灭诸国,争霸中原,饮马黄河,问鼎于周,最后兵败迁都于陈。这些重大的军事政治活动都在河南,楚之荣辱兴衰均与河南密切相关。河南信阳、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发现大量与楚有关的城址和墓葬,出土许多带铭文青铜器及玉器、竹简和漆木器,为研究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期望在西峡和淅川的丹水沿岸找到丹阳故都,在楚文化研究上来个突破。

八是加强古冶金古陶瓷的研究。商周至汉代冶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是河南多年来重要的考古收获。今后要加强对西平、舞阳一带战国早期冶铁遗址群、桐柏唐宋银矿群、灵宝明代金矿群的调查和研究。河南古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喜人。要加强对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和鲁山段店窑唐代花瓷的研究;鹤壁和巩义发现有唐代青花瓷的线索,这为古陶瓷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寻找文献记载中郑州的五代柴窑,以及开封的北宋官窑,是考古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愿望,希望在新世纪内能有所收获。

(二)要大力加强运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进行考古研究

把科技手段引入考古学研究中去,就能取得仅用传统手段无法得到的成果。如1996年4月,国家文物局同德国鸿鲁尔大学合作在河南洛阳进行航空摄影考古试验,历时17天,累计飞行44小时,利用三种型号的飞机对邙山古墓群、汉魏故城遗址、隋唐东都里坊遗址、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进行航拍,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遗迹,开辟了考古学的新领域。

1996~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对登封和禹州颍河上游两岸长约100公里范围内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聚落遗址进行考古调查,采用了GPS(全球卫星定位仪)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准确测定各遗址的地理位置、经纬度和海拔高度,再利用GIS电脑软件综合处理各遗址的调查资料,绘制精确的遗址位置和地形图,建立所调查25个遗址的数据库,探讨当时遗址空间分布的规律。

关于古代人骨的研究。历来都是采用传统的体质人类学方法。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合作,尝试运用遗传基因技术对古代人骨进行研究。通过对安阳殷墟家族墓地人骨古DNA提取和研究,然后扩大对豫北冀南或鲁西南豫东先商文化区域人骨古DNA提取和研究,有可能探索先商文化的起源和商族的起源。其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利用物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出土文物的保护,一直是考古研究中的重要项

目。河南过去已经作过长台关楚国漆木器脱水定型研究,龙门石窟裂缝灌浆加固研究,青铜器除锈治理和铁器防锈研究等,均取得佳绩。今后还要进行诸如关于低火候陶器和泥质文物的加固与复原研究等项工作。

(三)努力开展省内外携手攻关,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促进河南考古学研究的发展。

50年代,华东文物工作队曾派一批业务人员来河南帮助发掘郑州商代遗址。6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多次派人到山西侯马参加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考古大会战,集中发掘晋国都城新田的铸铜遗址。近些年来,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考古或文博专业学生在河南进行联合发掘考古实习,都取得较好成绩。

过去,河南与湖南、湖北、安徽联手进行楚文化研究,轮流在各省举办楚文化学术研究会,先后出版了4部《楚文化研究论集》,把楚文化研究推向高潮。近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陕西东部和豫西相邻广大地区仰韶文化的研究;与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小浪底水库工程分别在黄河南北两岸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秦晋豫三省文物局的牵头下,三省文博单位交流合作,共同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考古学的权威机构,在河南就设有河南一队(偃师商城队)、二队、安阳队、偃师二里头队、洛阳汉魏故城队、洛阳唐城队等工作队和洛阳工作站。此外,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也在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着很好的合作经历。

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秉琦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将是世界性的中国考古学"。"21世纪的世界告别了20世纪,使我们看到人类真正文明的曙光。中国古史从人类文明起步,民族到国家,国家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考古学—反映的中国古史对全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将会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共同财富"。严文明先生也说:"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不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中国,那么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中国历史怎样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又受到世界历史的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就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人们常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因此,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河南考古,也必须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加强与国外学术单位的交流与合作。

过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共同对河南颍河上游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进行调查;与韩国忠北大学博物馆合作,进行旧石器文化与古稻作起源的研究,并分别在中国河南郑州和韩国清州及丹阳举行学术研讨会;与日本滋贺医科大学骨科合作,进行新石器时代人类骨病研究;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合作,进行商文化研究。与此同时,我们还接待许多国家的考古学者来参观访问、作学术报告;我们也多次派专家出访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借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我们要立足河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考古队伍中培养一批精通外语的人才,在完成自己考古工作的同时,还要对国外考古有一定的了解。把与国外学术交流工作做得更好。

注 释

[1]安亚伟等:《洛阳北窑发现旧石器遗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7日。

[2]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7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3]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6]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郑州市八里岗遗址1992年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7年第12期。

[7][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9]张惠明:《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发掘又有新收获——新密发现一处龙山文化城址》,《河南文物工作》1999年第3期。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3期。

[12]①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河南二队:《偃师商城考古再获新突破》,《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1日。

②新华社北京1998年7月16日晚报专电:《偃师商城的新发现——解开夏商分界的疑团》,《大河报》1998年7月17日。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4]①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

②《殷墟花园庄发现早期甲骨坑》,《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22日。

[15]张志清等:《鹿邑太清宫遗址考古发掘又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3日。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7]蔡全法等:《郑韩故城考古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3日。

[1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21]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22]朱亮等:《黄河小浪底盐东汉代建筑遗址发现及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6日。

[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24]①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②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第9期。

[25]①温玉成:《河南省新安县西沃石窟》,《考古》1986年第2期。

②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新安西沃窟勘测报告》,《文物》1997年第10期。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2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2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

[29]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第3期。

[30]张志清等:《鹿邑发掘老子故里太清宫遗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0日。

[3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6期。

[3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古代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8期。

(原载《考古》2000年第2期)

河南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

河南形胜居天下之中，八方辐辏而史称中原，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旧石器时代遗存，迭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层出不穷。自夏商周以来，迄宋代为止，河南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漫长的历史岁月，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被掩埋在地下，散落于荒烟野蔓之间。

1949年新中国建立，劳动人民作了主人；1979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打开了富裕之门；1997年香港回归，百年屈辱一朝雪洗。作为文物大省的河南，五十年的经济建设为文物考古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发掘出来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已经为人民所享有和应用，以极其珍贵的科学资料，组成了一部形象的河南社会发展史。教育和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成为提高民族自信心、振兴中华无可替代的精神和物质力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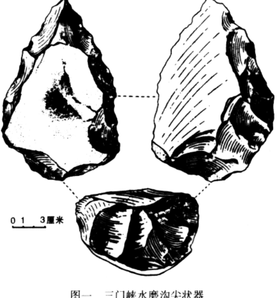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产生之后用勤劳的双手和大自然进行搏斗的时代，是一个包括几万年、几十万年以至上百万年缓慢发展而又惊心动魄的时代。在那时，我们祖先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他们手中只有非常粗糙的打制石器和竹木棍棒，以此来捕获猎物，刨取植物的根茎；他们用火驱赶野兽，烧烤食物；他们围树叶，着树皮，住山洞，千方百计维持自身的生存。解放前，旧石器时代考古在河南是一片白纸。现在，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在这片白纸上绘出了有声有色的雄伟画卷。

1978年9月，在南召县云阳镇附近的杏花山下，发现了一颗猿人右下第二前臼齿化石。根据伴生的动物化石及地层等综合分析，云阳猿人化石的地层时代为更新世中期，大致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这是我国继在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云南元谋、湖北郧县和郧西等地发现猿人化石之后，又一重要发现[1]。

1973年秋，在淅川县收购13枚猿人牙齿化石。这又一次证明古人类长期生活在豫、鄂、陕三省邻接的广大地区内。我们有理由期望今后在这里发现更多的猿人化石[2]。50年代，地质工作者在三门峡附近作地质考察时，曾采集到1枚古人类的臼齿化石[3]，显示豫西一带确有古人类化石的存在。1979年，在豫西卢氏县横涧乡的锄钩峪，发现更新世晚期的智人化石，其中包括4块头骨残片和2枚牙齿，距今约10万年。这又是河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发现[4]。

此外，在灵宝朱阳、朱阳东坡、营里，陕县侯家坡、张家湾、赵家湾、仙沟、三岔沟，三门

峡水磨沟、会兴沟，渑池青山、任村，汝州张湾，伊川穆店，西峡赵营、莲花寺岗、冢岗、土门、小沟岭、西沟岗、龙头湾、大沟口，镇平叶湾、石羊岗，南召杏花山，确山打石山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5]。在灵宝孟村、函谷关，三门峡王官沟，洛阳凯旋路、北窑，渑池南村，卢氏段家窑，内乡马山口，镇平八里庙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6]。在南召小空山，灵宝邢家庄，巩义南河渡，荥阳织机洞、蝙蝠洞，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舞阳大岗，新蔡诸神庙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7]。在上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中，出土有各类石器、石核、石片和动物化石(图一)，扩大了我国旧石器分布的地域，连接了北方与南方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图一 三门峡水磨沟尖状器

其中 1998 年 6 月发掘的洛阳北窑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在连续的黄土地层中出有石器，这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它为研究全球气候变迁及人类生存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该遗址的石器制作技术具有明显的南方旧石器文化的某些特征，而石制品的形态属于北方旧石器文化传统，这将为研究南北旧石器文化交流提供重要线索。北窑遗址堆积的上部属更新世晚期向全新世时期过渡地层，该层中也发现了石制品。这对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而近年发现的舞阳大岗遗址是河南惟一一处经过正式发掘的细石器地点，与许昌灵井细石器遗址相距很近，文化面貌也很相似，和华北地区细石器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使我们有更多理由相信，黄河流域可能是产生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文化的摇篮。在大岗遗址细石器文化层之上，还叠压有裴李岗文化层，在该层内也包含了一些细石器。这种细石器文化层被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相叠压的地层关系，在国内尚不多见。大岗文化可能就是裴李岗文化的源头之一。

综上所述，河南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建国以后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考古发现。展望未来，更是前途无量。我们期望今后河南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能有更大更新的突破。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大约在距今 1 万多年前，人类发明了磨制石器，用来代替原始的打制石器；发明了生产性经济——农业和畜牧业，代替了往往靠不住的采集和狩猎，但后者也并未放弃；发明了烧制陶器和其它手工工艺；开始从山洞走出来，居住在较为平坦的河流两岸。这时候人类的生活和过去相比，已有了一定的保障，人们盖起茅屋，以避风雨；刀耕火种，收割庄稼；修筑围栏，饲养家畜；烧制陶器，煮饭盛物；用弓箭狩猎，用鱼网捕鱼；后来甚至还有夯土建筑和水井的发明……这样，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在河南调查或发掘的上千处各类新石器时代遗址，展示了中原地区在原始社会晚期的繁荣景象。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1958年春，在漯河翟庄曾发现石磨棒、锯齿镰、红陶三足钵，这是首次发现的中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物。1959年，在偃师马涧沟发现有石磨盘和石磨棒。到了六七十年代，在新郑和密县等地发现更多的石磨盘及石磨棒。直到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才弄清了裴李岗文化的特殊面貌。

1977年春以来，在新郑县裴李岗村西的双洎河湾高台地上，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发掘出一批窖穴、墓葬和陶窑；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多是火候较低而又质松易碎的红陶，形制也较特殊，包括附有弯月形耳的球形壶、筒形罐、高足钵形鼎等；石器磨制精致，具有固定造型，如四足鞋底形石磨盘、圆柱形石磨棒、两端均磨有圆弧刃的石铲、锯齿状石镰、断面呈椭圆形的石斧等，也有少量的打制细石器；此外，遗址内还出有猪、羊骨骼和陶猪、陶羊等原始艺术品[8]。

密县莪沟北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又一重要发现。除了发掘出房基、窖穴、墓葬和陶器、石器之外，还出土有麻栎、枣、核桃等果核，以及猫骨、鹿角和其他一些兽骨。其中最难得的是一件陶塑老人的头像，扁头方脸，前额较平，粗状的眉脊左右相连，宽鼻深目，下颏前突，口和眼是剔出来的，形象生动，是珍贵的艺术品[9]。

长葛石固遗址的发掘，找到了仰韶文化层和裴李岗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从出土陶器上看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从而可以推断仰韶文化溯源于裴李岗文化[10]。

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一批契刻符号，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其中有的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还出土一批7孔骨笛，已具备七声音阶结构，现仍可吹奏出旋律。这里还发现有当时人工栽培稻，显示了中原地区稻作的历史是多么悠久。这些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1]。

到目前为止，在河南中部的新郑、郑州、荥阳、新密、巩义、登封、中牟、杞县、尉氏、汝州、郏县、许昌、禹州、长葛、鄢陵、扶沟、西华，在河南南部的叶县、舞阳、方城、漯河、郾城、驻马店、上蔡、正阳、新蔡、项城、信阳、潢川，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偃师、孟津、渑池、嵩县、卢氏，在河南北部的新乡、孟州、辉县、济源、淇县、浚县、安阳、汤阴、林州等县市，调查发现120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其中以新郑、新密、长葛、许昌、汝州、鄢陵和舞阳等地较为集中。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以及豫中、豫南的黄淮平原地区。此外，在豫北太行山东麓和豫南大别山北麓也有少量发现[12]。从出土的细石器看，尽管还有某些缺环，裴李岗文化可能来源于大岗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它大大丰富了对我国原始文化的认识，为研究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陶器的起源和发展，纺织的起源和发展，建筑的起源和发展，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是在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上一次重要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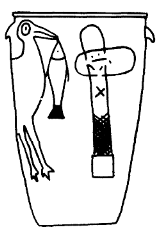
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的研究是我国考古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仰韶文化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发展和当时不同族属文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解体甚至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门槛的时期。建国以来，河南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约800余处[13]，分布地域遍及

全省,尤以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最为集中。这些仰韶文化遗址,主体面貌相同,但又有时间先后和地域差异,考古学者把它们大致划分为豫西的庙底沟类型、豫中的大河村类型或秦王寨类型、豫北的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14]。其中不少都有重要的考古发现。

著名的渑池仰韶村遗址,除1921年进行过发掘之外,在1951年和80年代初期,又两次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早中期的四层叠压,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其中包括精美的彩陶[15]。被人们称为考古圣地的仰韶村遗址,现已建立了遗址博物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2年春,在郑州市北郊大河村,发现了一处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一组4座相连的房基,部分墙壁还高达1米左右。房基内还出土有20多件陶器,其中以白衣彩陶钵和双连彩陶壶最为精致。大河村遗址还出土2000多件彩陶,纹饰达30多种,尤以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和日晕纹最引人注目,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非常珍贵的[16]。

在汝州阎村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陶器中有一件夹砂红陶缸,腹部一侧绘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彩陶画——"鹳鱼石斧图"(图二)。在淡橙色的陶缸外壁上,用深浅不同的棕色和白色,绘出一只鹳鸟口衔一条大鱼,其旁立着一件带柄石斧,画面显得十分明快。这是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活画,也可能是一幅古老氏族的图腾图。又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画面最大、内容最丰富、技法最精湛的彩陶画,是迄今所发现同时代的其它绘画所不能比拟的。这不但给我国美术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而且也为研究原始社会的生活,探索当时氏族部落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新资料[17]。



图二　汝州阎村彩陶缸"鹳鱼石斧图"

在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龙身长达1.78米,昂首拱背,身子弯曲,前爪扒,后爪蹬,尾尖摇摆,动感很强。这不但要比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陶盘上彩绘龙的时代早,而且形制巨大,活龙活现,形象生动。这罕见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华夏第一龙[18]。

近年在汝州洪山庙发掘出目前我国最大的一座仰韶文化瓮棺葬。墓坑东西长6.3米,南北宽3.5米,坑内置有136件瓮棺。除少量幼儿瓮棺外,绝多为成年人的大型瓮棺。作为瓮棺的陶缸,不少有彩绘图案,包括人形纹和鹿、龟、鸟等动物形纹,勾叶等植物形纹,太阳、月亮等天象纹,各种几何纹,个别陶缸外壁还堆塑有壁虎的形象。这些均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9]。

1992年~1995年,在郑州西山发掘出一座仰韶文化城址。包括夯土城墙、城门、道路、房基、墓葬,出土3000多件各类文物。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左右,这把我国已发现古城的年代提早了一千年,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中原地区在我国早期文明发展史

的地位，都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价值[20]。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龙山文化以1928年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21]，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及其解体阶段，也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即将产生或刚刚产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在30年代初首次发现于安阳后岗，迄今，河南各地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约近千处之多[22]，可以说遍布全省。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地域辽阔，内涵有差别。主要可以划分为豫西伊洛地区的王湾类型，豫北的后岗类型，豫东的王油坊类型[23]。其中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

龙山文化的分布比仰韶文化更为广泛，而且往往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在安阳后岗、汤阴白营、濮阳马庄、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24]、灵宝城东寨、洛阳王湾[25]、偃师灰嘴[26]、汝州煤山、禹州瓦店、荥阳河王、郑州旭旮王[27]、牛寨和二里岗、永城王油坊等不少地方，都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和瓦解，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76～1977年，在汤阴白营发掘了一座龙山文化的村落遗址，发现房基40多座，纵横排列成行，大致有序。房基形状多为圆形，供人居住用的白灰面地坪上下叠压有九层之多。在白灰面下的房基底部，还发现有许多清晰的夯印，说明在建筑房基过程中使用了夯打技术。这种在一处居住遗址内密布着许多小型房基的现象，可能是与当时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逐步确立相适应的。同时发现有井字形木框架的水井，这对当时人们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28]

1977年，在永城王油坊发掘出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中10多座房基的地坪也采用了夯打技术，并有烧灶和用褐硬土或碎陶片筑成的巢状柱础；墙基大部分保存完好，有些墙的里侧部分，用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的褐色草泥土坯砌成。每层土坯都是相间压缝，缝间用黄泥粘合，这和现在用砖砌墙的方法相似。夯筑地坪和土坯砌墙都是建筑上出现的新技术，对我国后世的建筑，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遗址内还出土有精美的白陶器和黑色磨光蛋壳陶，反映了当时较高水平的制陶工艺[29]。

70年代和90年代，先后三次在汝州煤山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出数十座房基，多为2间或多间的连间房子，有些还成排分布。其附近还有一些陶窑、水井和窖穴。同时还发现墓葬20多座，有的墓内随葬10多件陶器。出土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附有铜液的坩埚残片，说明当时已经冶铸青铜器[30]。

1977年，在登封告成镇的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城址。西城保存较好，其东墙亦即东城的西墙，东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水冲毁。在城内发现有夯土建筑遗存和填埋2～7具人骨架的多处夯筑奠基坑，还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城址的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属于夏代积年之内；城址的地望处于"禹居阳城"、"禹都阳城"、"夏都阳城"的范围。因此，王城岗城址的考古发现，对探索夏王朝统治中心区域的文化，可算是一次突破[31]。

豫东偏南的淮阳县，是传说中的"太昊之墟"。近年来在淮阳东南的平粮台，发现了一处和登封王城岗同样古老的城址。古城呈方形，周长约740米，现存城墙高3米多。南北

城墙的正中各有一座城门，城内有 10 多座高台建筑，并出土有铜渣等冶铜遗物。更令人惊叹的是发现有多处陶排水管道，每节管道均为直筒形，细端有榫口，可以进行套接。管道城内部分较高，宜于向城外排水。在 4000 年前就能出现初具规模的城市排水系统，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平粮台古城位于夏王朝所控制的东部边陲地区，这里也是商部族活动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发掘，对探索夏文化和先商文化是相当重要的[32]。

近年来，在郾城县郝家台又发现一座距今 4000 多年前的古城址。南北长 220 米，东西宽 164 米，四个城角保存较好。在城内发掘出成排的房基，有的还铺有木地板。这又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朵浪花[33]。

1992～1994 年，在辉县孟庄发掘出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城墙、护城河、城门、房基、窖穴等遗迹，同时还发掘出相重叠的二里头文化城垣和殷商文化城垣，反映了龙山文化以来这里长期的繁荣。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历程有重要意义[34]。被评为 1994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上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的演变，显示了二者的承袭关系，即河南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过渡发展而来的，是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成果之一。

大汶口文化是以 1959 年在山东泰安发掘大汶口遗址而得名[35]。这是一种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 6000 多年到 4000 多年之间。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可追溯到 50 年代荥阳点军台、郑州林山寨、信阳阳山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而首次发现成组的大汶口文化器物，则是 1962 年在偃师滑城遗址清理的 1 号墓。此后，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分别在永城洪福，虞城营廓，夏邑三里堌堆，鹿邑栾台[36]，郸城段寨[37]、展庄户、丁寨、汲冢，沈邱黄花城、东冢，项城高寺，淮阳平粮台、范丹寺、蒋台寺、三里堂、磨旗店，太康方城、槐寺，扶沟梅桥，商水章华台[38]、大郃、宋王，周口水灌台、烟草公司仓库[39]，西华陆城、小白庄、瓦屋赵、前柳城，禹州谷水河、瓦店，鄢陵古城，新郑唐户，郑州大河村，平顶山寺岗[40]，汝州大张、北刘庄，洛阳矬李，偃师二里头、南寨，孟津寺河南，上蔡十里铺、段寨、钓鱼台、蟾虎寺、晒书台[41]，固始刘楼，潢川霸王台，淮滨沙冢，唐河湖阳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存。在上述遗存中，发掘出大汶口文化的窖穴和墓葬，出土有白陶鬶、褐陶鬶、高柄镂孔杯、高柄杯、觚形杯、长颈壶、宽肩壶、背壶等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典型器物。其分布范围已达豫东、豫西、豫南地区，涵盖黄河以南的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郑州、洛阳、南阳、信阳、驻马店等九个市、地，其中心地区则是颍、涡河流域的周口和商丘。在有些遗址内，除大汶口文化遗存之外，还发现相当数量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堆积。河南大汶口文化遗物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期，这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三者之间相对年代的发展序列找到证据，也为研究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影响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屈家岭文化是以 1955 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发掘而得名[42]。这是一种分布在长江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 5000 多年到 4000 多年之间，从地层叠压关

系看,屈家岭文化的相对年代要晚于仰韶文化而早于龙山文化。河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遗存是自5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的,至今已发现近140处之多。重要的有淅川黄楝树[43]、下王岗[44]、下集[45]、双河镇、李家庄,西峡杨岗,内乡茶庵、朱岗,邓州太子岗、八里岗,新野凤凰山,镇平赵湾、冢上寺,唐河寨茨岗[46],社旗谭岗、茅草寺,方城平高台,南阳黄山,南召竹园,遂平杨台寺,正阳王家冢,桐柏陡坡嘴,泌阳三所楼,信阳阳山,光山徐畈,息县秦楼,上蔡十里铺,禹州谷水河,郑州大河村等。主要集中在南阳地区,在豫南和豫中也有发现。其分布范围由湖北到豫西南,并扩大到颍河、汝河和洪河上游,甚至到达黄河南岸。

不少遗址经过发掘,在著名的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出25座屈家岭文化的房基,都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地上建筑,有些为单间房子,也有些为双间房子,均有木骨泥墙和白灰面地坪。还发掘出许多各种形制的灰坑和多座土坑墓及瓮棺葬。出土了一大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装饰品等遗物。其中以折腹镂孔高足陶杯、蛋壳黑陶塔式高足杯、彩绘陶壶最为精美。而总数达263个的陶纺轮,有角边的、弧边的、折边的,有平面的、鼓面的,有红色的、灰色的、黑色的,不少还彩绘有各种图案,这在同类遗址中是罕见的。石杵和石臼是加工稻谷的工具,显然要比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石盘棒进了一步。在其他遗址中如淅川下王岗遗址、南阳黄山遗址等也都有许多重要发现。河南境内诸多的屈家岭文化遗址,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文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邓州八里岗遗址的发掘,自1991~1997年在这里发掘出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包括有一批小型圆形房子和大型长方形连间长屋,以及灰坑和许多墓葬。其上层还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反映了这一系列文化在这里的消长、取代和变迁[47]。被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以山东为主体的大汶口文化和以湖北为主体的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在同一个省发现,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分布都深入到河南境内,并在河南中部地区交汇,对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等地区的文化面貌日趋一致,有着更多的相互联系和共同特征,这就充分说明我国统一的民族文化正在形成。四面八方汇集到中原地区,无疑促进了中原地区古代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在华夏大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周围各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使中国古代文明以其连绵不断和博大精深而在全世界大放异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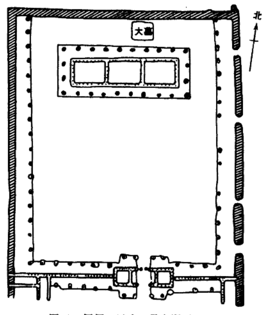
二

原始社会崩溃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夏代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奴隶制国家,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之间。从考古学角度去寻找夏文化,是建国后学术界提出的新课题之一。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记载,一是在河南的伊洛平原和登封、禹州一带;二是在山西的西南部汾水中下游地区。根据上述线索,从1956年开始,陆续在郑州、巩义、偃师、洛阳、三门峡、汝州、登封和禹州等地,进行了广

泛的调查和重点发掘，对探索夏文化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除了上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等地发掘的龙山文化城址，以及30年代在安阳后岗[48]所发现的龙山文化古城与夏代早期有关之外，同时还找到了早于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一种新型文化——二里头文化，这是探索夏文化所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二里头文化源于1959年发掘的偃师二里头遗址[49]。整个遗址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寨后和辛庄5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曾发掘出宫殿基址（图三）、灰坑、墓葬，出土有一批青铜器和玉器。在豫西、豫东、豫南、陕西东部、晋南、湖北等地也有二里头文化发现。河南境内著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登封玉村、郑州洛达庙[50]、偃师灰嘴[51]、陕县七里铺[52]、渑池鹿寺[53]和郑窑[54]、洛阳矬李[55]及东干沟[56]、巩义稍柴[57]和小芝田、汝州煤山[58]、密县新寨[59]、济源庙街等。二里头文化延续较长，可分为一、二、三、四期。从其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形制变化看，上溯由河南龙山文化传承而来，下推发展为郑州二里岗文化，联系紧密，中间没有缺环。学术界对于夏文化上限和下限看法不一，但对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这一点上，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二里头文化对探索夏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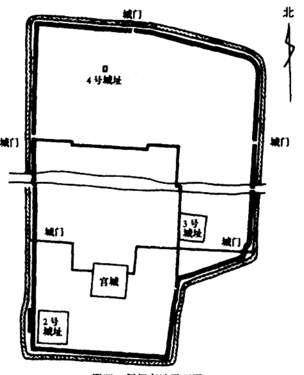


图三　偃师二里头2号宫殿平面图

商代考古的发现，历来是河南考古的重头戏。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的发掘，代表了建国前中国考古的辉煌。如今河南商代考古的发现，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80年代初，在偃师县城西1公里处的尸乡沟一带，找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700米，东西宽约1200米，四面城墙尚基本完整，城墙外侧还有城壕。目前已找到了5座城门，其中北门1座，东门和西门各2座，南墙压在今塔庄村下，尚未找到城门。在城内发现有东西向大道5条，南北向大道6条。城内南半部有3座小城，宫城居中，平面近方形，四周围以厚3米的夯土墙，周长800余米。宫城内经探查或发掘共发现8座宫殿，分三个时期陆续修建或扩建而成，另外2座小城分别位于宫城的东北和西南，均为长方形，内有排房建筑，可能是武库、粮仓或屯兵防卫的小城堡。1997年夏，在偃师商城中部和南部，新发现了一座时代更早一点的内城（又称小城）。其平面呈南北纵长方形，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40米，城墙体宽约6～7米。其南墙、西墙南段和东墙南段均与外城墙重合，外城城墙是在内城城墙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图四）。这样，宫城就正位于内城南部的中轴线上。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夏商时代文化分界的界标，也很可能是

汤都"西亳"。这大大开阔了夏商考古的视野，对我国古代文明和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60]。



图四 偃师商城平面图

1950年秋，在郑州东南郊二里岗发现商代文化遗存[61]，经过多次调查，证明商代遗址遍布整个郑州市区，面积达25平方公里。在多年的发掘中，发现有商代的房基、窖穴、壕沟、水井、墓葬和祭祀坑等遗迹，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原始瓷器、刁刻字骨和陶文符号等遗物[62]。1955年在遗址中部，又发现一座周长近7公里的商代城垣。在郑州商城南北城墙外，各发现一处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63]；西城墙外发现有一处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64]；在北墙外还发现了一处制作骨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65]。在西城墙北段外侧近6米深处，出土了2件大型铜方鼎[66]；在东南城角外侧，出土了13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包括2件大型铜方鼎和1件大型铜圆鼎。造型浑厚，纹饰华美，气势磅礴，实为商代奴隶们的不朽杰作[67]。在西城墙南段外侧，出土了12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包括4件大型铜方鼎。上述三处青铜器窖藏坑可能是祭祀的遗存[68]。在城内北部和东北部，还发掘出三座大型宫殿遗址[69]。在宫殿区东部，还发掘出蓄水池和石砌输水管道等贮水设施。郑州商城很可能是"帝仲丁迁于隞"的隞都。1959年7月，郭沫若同志曾亲笔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题《颂郑州》一诗，诗中就写郑州商城可能是隞都[70]。

近年在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处的小双桥，发现有属于郑州商城晚期的王室祭祀遗址。出土有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建筑构件、多座牛头(角)祭祀坑等[71]；在郑州商城南墙外700～900米处，发现残断夯土墙约5000米，这是郑州商城的外城墙，反映了郑州商城的规模是多么巨大[72]。郑州小双桥商代祭祀遗址的发掘，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安阳殷墟是闻名中外的商代晚期都城，建国后进行了多次发掘和研究。1950年春，在殷墟武官村发掘了一座大墓[73]，墓内出土有贝、玉、绿松石、骨器、虎纹石磬和大量的青铜器，墓内还殉葬79个奴隶。大墓南侧还有一大批祭祀坑[74]，1976年发掘了191个坑，清理出杀祭的人牲不下1200人。经鉴定多为青年男性，还有少量的女性遗骨，甚至还有一

些未成年的幼儿。1976年夏天，在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了一座大墓。墓内殉葬有16个奴隶。出土青铜礼器有210件，大多成对成套。不少铜器上铸有“妇好”或“司母辛”的铭文。据甲骨文记载，妇好是武丁时的一员女将，武丁的配偶中有谥号“妣辛”的，墓主就可能是妇好本人。这是目前惟一能与文献联系推定墓主的一座王室墓葬。对探讨商代奴隶主阶级的礼制、订证殷墟大墓及青铜器的年代、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75]。安阳殷墟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甲骨文了。这些刻在龟甲牛骨上的比较成熟的文字，记载了殷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1971年在殷墟发掘出3组21片作占卜用的完整牛胛骨，其中10片有刻辞，最多的1片达60个字，是关于殷代王室祭祀的记载；1973年在小屯村南又发掘出4800多片甲骨文，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等。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1991年9月，在殷墟花园庄东100米处，发掘了一个甲骨坑，已经清理出甲骨856片，其中完整卜甲有300多版，上刻卜辞的整甲有90多版，上刻1～2字或数十字或200余字，内容涉及祭祀和田猎等，对研究甲骨文分期及殷商历史都有重大价值[76].值得一提的是，在殷墟郭家庄发掘160号商代墓，出土青铜礼器40件，方形器数量较多，器表均有精美的纹饰和族徽文字，还有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兵器和900多枚铜镞，以及一批陶、玉、石、骨、牙、竹器。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武将。该墓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77]。1989年，在殷墟宫殿东南，又发掘出一座平面呈凹字形有缺口向东的大型宫殿基址，由三排房基组成，其建筑结构十分罕见。这对殷墟建筑群的再认识和商代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这次发现也扩大了殷墟宫殿宗庙的范围。与郭家庄160号商墓一起，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78]。

1979年和1980年，在罗山县后李村，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出土200多件青铜器，大多保存完好，甚至很少锈蚀，熠熠闪光。有些铜器上还铸有“息”字的族徽，这很可能是商代息国贵族的墓地。息国是商朝偏南的方国之一，而且与商王室通婚，与长江流域的方国部落又有一定联系。从研究商文化的地域类型来说，后李商墓的发现无疑是十分难得的[79]。

1997年11月，在鹿邑太清宫镇发掘一座商末周初之际的中字型大墓，包括墓道在内南北通长47.5米，东西宽7.5米。墓内有重棺单椁，清理出殉人13具，狗骨架1具，出土各类遗物千余件。其中青铜容器68件，青铜兵器、工具20余件，各种礼玉、佩饰、玉雕80多件，一批精致的尊、罐、豆等原始瓷器，还有石磬、铜铙、骨排箫等乐器。一些青铜器上铸有“长子”、“长子口”、“戈丁”等铭文，说明墓主应是“长子口”。长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甲骨卜辞中记载长氏曾向商王贡龟。以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又证实长氏在周时又归附于周。太清宫一带商周时属厉，长子口可能是派往厉地驻扎的高级贵族。鹿邑位于豫东，是商末伐人(夷)方的必经之地，商周时期大墓还是首次发现。这对研究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关系及豫东古文化发展序列有重要价值[80]。

解放前，河南西周考古工作，只在浚县辛村搞过一点。建国之后，在洛阳北郊、郑州董寨、信阳出山店和浉河港[81]、鲁山仓头[82]、上蔡田庄[83]、鹤壁庞村[84]、淮阳泥河湾[85]、南阳北郊[86]、泌阳前梁河[87]、新郑端湾[88]、襄县霍庄[89]和平顶山滍阳[90]等地，发掘过西周的墓

葬和遗址,出土了很多铜器和其他文物。

1964年,在洛阳北窑一带发掘了300多座西周墓葬,出土一批青铜器、瓷器和陶器。在401号墓内一件陶豆下面有嵌蚌泡漆器托,把我国漆器镶嵌工艺提前到西周早中期,要比信阳长台关2号楚墓所出的嵌玉木漆凭几还要早3~5世纪。1976年,在洛阳北窑附近,又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西周前期青铜器铸造遗址,面积约为28万平方米。已经发掘出多座房基、3座烘范窑、窖穴、地下水管道、路土等遗迹;还有大量的红烧土块、木炭灰烬、陶泥范块、熔炉残壁、铜渣等遗物。在出土的范块中,有爵、鼎、簋、罍、尊、卣、觚等,还有一些车马器范和兵器范。从出土的熔炉残块中可以计算出熔炉的最大径为1.8米。在遗址中还出土数十块卜骨和卜甲,在不少大型窖穴中几乎都发现有乱葬在灰层中的奴隶尸骨。有的双手捆束在胸前,有的作跪状。这种现象表明,在浇铸青铜器过程中可能还要占卜和祭祀。洛阳是西周的陪都,周成王曾派召公和周公营造洛邑。这处遗址应是营造洛邑时迁殷代的"百工"奴隶所建的。从汉代以来,我国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很多,解放后又不断有重要器物出土。但像这样大型的西周青铜器铸造遗址却还是首次发现[91]。

平顶山发掘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应国墓群,时代由早及晚、自南向北分布在一条土岭上[92]。如偏南的84号墓,为西周中期的长方竖穴土坑墓,出土铜、陶、瓷、玉各类随葬器物100多件。其中青铜礼器有鼎、甗、盨、卣、爵、觯等,都铸有5~28字的铭文,均有"应侯"字样。这当是西周中期应国某一代应侯之墓。位于土岭中段的38号墓,出有多件青铜器和多套青铜乐器,以及青铜铠甲、车马器、玉器和陶器等。铜器上有"应姚"作器字样。应姚所作之器,过去多有发现。表明这位姚姓妇人在西周晚期应国政治舞台上较为活跃。位于偏北的45号墓是春秋早期的应国贵族墓。出土有一大批青铜礼器,不少铸有铭文。如鼎铭为"应申姜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可知墓主人为嫁到应国的申国女子。过去这里出土有两件表明邓国女嫁于应国的铜簋。说明西周春秋之时,比较弱小的应国和与之相邻的申国、邓国由于唇齿相依的关系,为共同防御南面强大的楚国,用联姻的方式而结盟。这些发现对建立应国考古学编年有重要意义。平顶山应国墓地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56年~1957年,在三门峡上村岭发掘了一处虢国贵族墓地。共发现有200多座墓和3座车马坑、1座马坑。出土了一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乐器和杂器,以及陶器、玉器等。1052号墓规模最大,出土各种文物近千件。其中有两件戈铸有"虢大子元徒戈"的铭文。证明墓主人是虢国太子。在几座大墓内均发现有用鸡血石和玉石制作的串饰和项链。精美异常,鲜艳夺目[93]。近年来再次发掘的三门峡虢国王室贵族墓地,又是中国两周考古的重要收获。2001号大墓,出土各类珍贵文物3200多件,其中玉茎铜芯柄铁剑、金腰带饰、缀玉面罩和成组玉佩饰等,尤为弥足珍贵。铜器铭文中均有"虢季"字样,当为一代虢国国君之墓[94],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9号大墓,随葬遗物更为丰富,仅青铜礼器就有200多件,铭文多有"虢仲"字样。玉器有800多件(套),除缀玉面罩、成组玉佩外,还有罕见的墨书玉片,及一批玉象、虎、豹、鹿、龟、牛、鱼、鼠、蜻蜓和蜘蛛等。这也是一座虢国国君之墓[95],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三门峡当为北虢所在。公元前655年,晋灭北虢。因此,三门峡虢国墓地有明确的年代下限,这对研究两周之际的虢国文化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也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期。当时列国分立,而作为防御工事的城郭也就日益普遍,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愈加扩大,各国的都邑更是如此。

新郑县境内的郑韩故城分为东西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1923年,城内李家楼发掘春秋大墓,出土一大批"新郑彝器",其中包括著名的莲鹤方壶。建国后,多次在这里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和试掘,初步弄清了东城和西城的范围、城墙的建筑结构、宫殿区、墓葬区以及铸造铁器、冶铸铜器、烧制陶器、磨制玉器、制作骨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情况,并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96]。应该提及的是,在东城白庙范村发现了一个战国兵器窖藏坑。出土戈、矛、剑等青铜兵器180多件,其中不少还有铭文,内容有地名、官名和纪年等,对研究战国时期韩国的地理、文字、冶铸官职、兵器形制和铸造工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97]。近年来,在郑韩故城连续发掘出一批青铜礼器窖藏坑和乐器窖藏坑,出土属于春秋时期郑国各种青铜器达348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98]。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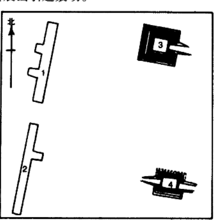
1977~1978年,在登封告成北面的漫平高地上调查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城垣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700米,北墙保存完好,高达8米左右。城内发现有砖铺地面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贮水设施和输水管道。还有大量的板瓦、筒瓦、陶豆、陶盆、陶盂等,在一些陶器上印有"阳城"的戳记和其他陶文,这对确定古阳城的位置,提供了可靠的文字资料[99]。在阳城南墙外,发掘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铸铁遗址。出土了一些印有"阳城"戳记的陶量,还有残铁器、残炉壁以及大量的陶范。根据这些遗物可以复原五种类型的熔铁炉。在陶范中有一种卧式层叠铸范(带钩范),一合可铸20个,两合为一套,可铸40件。这就找到了汉代层叠铸造的渊源[100]。

1957~1958年,在信阳长台关先后发掘了两座楚国大墓[101]。以1号墓为例,这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大型木椁墓。全墓共分主室、前室、北侧室、南侧室、后中室、后北室、后南室等七部分,都是用方木扣合而成,是研究我国古代木构建筑难得的实物例证。该墓出土了800多件文物,其中有一套13枚完整的铜编钟,经测定音律相当准确。1957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送了用这套2000多年前古老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乐器中还有瑟和鼓。木漆器也很精致,数量多达200多种。还出有墨书竹简,一组置北侧室,有28根,共约1000余字,是记载随葬品的种类、名称和数量的"遣策";另一组放在前室,已成残简断片,仅存500多字,可能是记载死者生平的竹书。这对研究我国历史和古文字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1976~1979年,在淅川下寺发掘出一处春秋楚国贵族墓群,包括26座墓葬和5座车马坑。出土大量的青铜礼器,不少还带有铭文[102]。其中有一件铜禁,长1.07米,宽0.47米,高0.28米。禁面的四边和禁的四个侧面饰多层透雕云纹,并攀附有12个虎状怪兽,器下有10个昂首前行的虎形足,为青铜器中之上品。其铸造使用了失蜡法溶模工艺,我

国以前发现最早的失蜡法铸件为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淅川下寺的考古发现，又把我国使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的历史提早了一个多世纪。还出土有一批精美的乐器，包括铜甬钟、编钟、镈钟和石磬、石排箫等，其中铜甬钟一套26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最大的一件通高1.22米，重160.5公斤。有铭108字，最小的一件通高0.24米，重3.21公斤。1985年3月送到日本筑波国际博览会展出引起轰动。

1991～1992年，在淅川丹江库区发掘出多座大型楚国贵族墓葬，出土有许多青铜礼器。其中有一对近似于夔的铜神兽，通高0.48米，为龙首、虎颈、虎尾、龟足。龙张口吐舌，头上有六条蛇形龙。神兽背上有座，座上又有另一奔驰状怪兽，为龙首并有双角，口中又衔一条蛇形龙。神兽通身镶嵌绿松石，组成龙、凤、涡纹等纹饰。从外观上看，可能是一对悬鼓用的鼓架。还出有一批玉器，也是精妙无双的珍品[103]。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图五　淮阳马鞍冢楚墓及车马坑平面图
1.一号车马坑　2.二号车马坑　3.北冢　4.南冢

1978年在固始侯古堆发掘一座春秋晚期的大墓，墓主人系一女性，据墓内铜器铭文看，当为宋景公之妹季子(勾敔夫人)。墓内殉葬17人，亦多为女性。除常见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之外，还出土了3乘肩舆(即抬桥)，制作极为精致。是东周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104]。

近年在淮阳马鞍冢，发掘出两座南北并列的楚国晚期大墓，早年虽被盗窃一空，但其西的两座车马坑却保存完好(图五)。靠南的一座，南北长40米，东西宽3.7米。埋有23辆车，20多匹泥马。车的位置不乱，铜、铁构件也很齐全，有的车箱上还镶有许多方形铜片，可谓最早的装甲车。还发现6面旌旗，其中一面用大量海贝镶成朵朵梅花装饰，非常罕见[105]。

1983年4月，在光山宝相寺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墓为双椁并列，出土文物丰富。一些青铜器上铭文，有“黄君孟”、“黄夫人孟姬”字样。说明墓主人是黄君孟和他的夫人孟姬。不少玉器也很精美。墓内随葬的竹排箫和绢类丝织品，在河南还是首次发现。这座黄国国君墓葬年代明确，为研究春秋早期江淮地区小国君主埋葬的棺椁制度、服饰和随葬物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88年6月，在光山城关镇砖瓦厂发掘春秋时期黄季佗父墓，这是一座黄国的贵族墓葬。出土一批比较精致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铜戈上有铭“黄季佗父之戈”。还出有罕见的金属弹簧形器，这应是目前国内最早的发现[106]。

1950～1952年，在辉县琉璃阁、赵固和固围村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铜器。其中有宴乐射猎纹铜鉴、云雷纹铜壶和马头形的错金车辕饰。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一件包金镶玉银带钩了，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首，两侧蟠绕着两条夔龙，倒向钩端，合为一首，口中衔一雕琢细致状若鸭头的白玉弯钩。与两侧夔龙相反方向，还饰有两只鹦鹉，脊背正中，嵌入三块白玉块。

前后两块的中心，还各嵌一个色调复杂的料珠。这种纹饰繁缛、透剔玲珑、包金镶玉、五色相宜的带钩，确实可以代表当时工艺技巧的最高水平[107]。

1982年，在汤阴五里岗发现4000多座战国墓。死者多为男性青年，有的尸骨上穿有铜镞，有的带明显的刀砍痕迹，好像是一批战死者。公元前259年，魏相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这场战争激烈，延续时间较长，双方伤亡惨重。推测这很可能是当时阵亡军士墓[108]。

1980年～1982年，在温县西张计村发掘了一处东周盟书遗址。出土书写盟辞石圭片和石简片达万余件。盟书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或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约束文书，温县盟书大致属于后者。盟书中不少有“十五年十二日乙未朔，辛酉”的纪年，据考证是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元前497年1月16日）。盟书的主盟者可能是韩简子。温县盟书的发现，为研究东周时代的历史、盟誓制度、古文字和书法艺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109]。

扶沟古城村发现一处楚国金银币窖藏。其中银币18件，形如长方铲状，均为形制较大的布币；金饼197块，金版195块。金版上钤印有“郢爰”、“陈爰”和“鄗爰”等文字，均属楚国货币。银布币在全国是首次发现，也是现存最早的银币；“鄗爰”金版也是第一次所见。这对研究中国古代货币史，研究楚国货币制度是很有价值的[110]。

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虽然只存在短短的15年，但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其存在时间太短，所以在河南留下的遗迹遗物就相当少。近年来，在三门峡[111]、泌阳[112]发掘出一批秦墓，出土了很多秦代的铜器、陶器和漆器。在泌阳秦墓出土的铜器上有“平安邦”、“平安君”等铭文，漆器上有褐漆书写的“平安侯”三字，还分别有“廿八年”、“卅三年”、“卅五年”、“卅七年”等纪年，很可能是秦末的遗物。这在河南还是不可多得的发现[113]。

汉代是一个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它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又融合了春秋战国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浑厚的基础上加以提高。

1958年，在巩县铁生沟发掘了一处西汉冶铁作坊遗址，出土了耐火砖、陶鼓风管、铁矿石、煤块、铸各种铁器的陶范和大量的铁器。这处冶铁作坊与原料产地相结合，冶炼工序集中，从开采矿石到锻打铁器已全部使用铁工具，还使用了鼓风装置，掌握了高温冶炼技术。这对西汉的农业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14]。出土铁铲上有“河三”铭文，应是河南郡铁官所辖第三冶铸作坊。

南阳是我国汉代重要冶铁中心之一。1959年在南阳北关外瓦房庄即汉宛城中部，发现一处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汉代冶铁遗址[115]。发现有一批炼炉、炒钢炉，熔铁炉，从陶鼓风管表层受热情况看，熔铁时可能已使用换热式热风装置。还出土许多耐火砖、坩埚

片、磨石、泥范模、铁范，以及不少铁农具。铧模上有“阳一”铭文，应是南阳郡铁官所辖第一冶铸作坊。

1975年，在郑州古荥镇发掘了一处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时期的冶铁遗址。出土有炼铁炉、矿石堆、重达20余吨的大积铁块、炼铁用的煤、耐火砖、铸造铁范用的陶模和300多件铁器。这里的炼铁炉是迄今已知汉代炼铁炉中最大的，炼炉采用了椭圆形炉腔。这样更便于鼓风，在熔铸过程中也可能使用了热风技术。这说明早在汉代，我国的冶铁工艺，已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116]。出土铁器有“河一”铭文，就是河南郡铁官的第一冶铸作坊。

1974年5月，在温县招贤发掘出一座汉代烘范窑，窑内出土500多套陶范，其中包括各种轴承范、车马器范等。陶范用淘洗过的细砂土制成，同类型的若干块（箱）叠垒起来，上面加一个浇口杯，下面置一块平板范，然后在外面敷一层掺合糠壳粘土，形成圆柱状的套范。经过入窑焙烘，陶器表面呈红色。采用这种一箱多器、多箱叠垒的套范，一次可以铸造几十个铸件。陶范结构合理，造型整齐，反映了我国汉代劳动人民在壳型铸造工艺上的卓越成就[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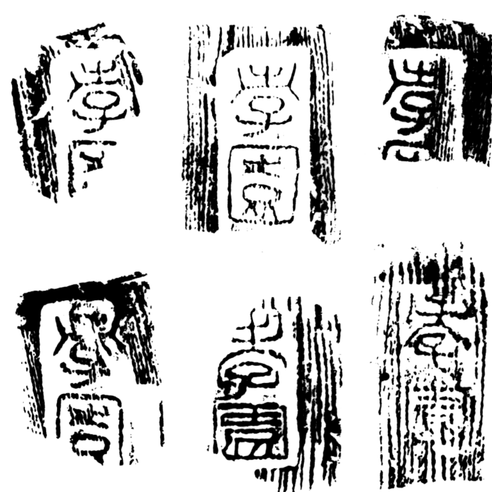
墓葬的发掘是两汉考古的重要收获。河南永城芒砀山，是西汉梁国王室陵墓区。每座陵墓均为“斩山为郭，穿石为藏”，亦即是在山岩中开凿的大型石洞墓。曾在这里发掘出金缕玉衣、大型彩色壁画以及其他珍贵文物。近年在著名的梁孝王墓东侧，发掘出寝园建筑遗址。南北长110米，东西宽60米。包括围墙、寝殿、堂、回廊、院落、石台阶和排水道等，并出有带“孝园”字样的筒瓦（图六）。前呼后应，左右对称，是重要的汉代礼制建筑。其北发掘出保安山2号墓，由东西2个墓道、3个甬道、前庭、前室、后室、34个侧室，以及回廊、隧道、灯龛和排水设施等组成。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容积达6500多立方米，全部开山凿成。工程艰巨，气势恢宏，令人惊叹。这是目前发现西汉诸侯国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陵墓。其墓道、甬道、前庭及各侧室门道，均用巨型塞石封堵，总计6000块左右，每块重约1吨，上面多有刻字，包括塞石的尺度、干支记时、崖工姓名、宫室方位等。既有史料价值，又是罕见的文字宝库[118]。其中芒砀山柿园西汉壁画墓，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芒砀山梁孝王墓前的寝园建筑，被评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整个芒砀山西汉陵墓的发掘，又被评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建国后在洛阳发掘过两座汉代壁画墓[119]，在偃师和新安发掘多座汉代壁画墓。画面上有天汉图象、墓主升仙图、车骑出行或历史故事；在宜阳发掘一座汉代彩色空心线刻画像砖墓，内容有骏马、猛虎和扶桑树等。这些壁画雄健浑厚，奔放有力，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120]。

近年在荥阳苌村发现一座多室汉代壁画墓，甬道两侧和前室四壁及顶部满绘彩色壁画，总面积达300平方米。内容有楼阙庭院、车骑出行、人物故事、舞乐百戏、珍禽异兽及莲花藻井等。壁画多有隶书题榜，如“功曹”、“骑吏”、“主薄”、“郎中时车”、“长水校尉时车”、“巴郡太守时车”、“济阴太守时车”、“齐相时车”等。构图巧妙，色彩鲜艳，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21]。

1972年，在灵宝张湾发掘了一批东汉时期弘农杨氏豪强地主的墓葬。墓内出土有十分罕见的陶桌和六博俑；还出有永元六年（公元94年）的铜弩机，铭文长达36字，这也是

很少见的。过去所见的汉代陶楼，多是各层形体大小相近，上下基本垂直的形制。而这里出土的一座绿釉陶楼却是在一端起楼，亦颇不多见。墓内出土的建筑模型中，有四阿、悬山、硬山和盝顶等我国传统的部分木构建筑形式。这些建筑模型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同时在多层建筑中已使用了平座的结构和一斗三升的承托技术，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杰出的创造[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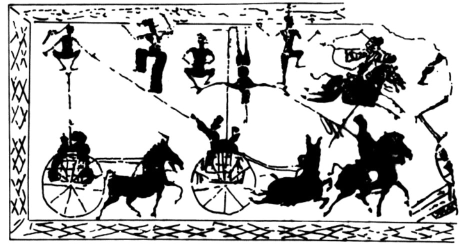


图六　永城西汉梁孝王寝园"孝园"筒瓦文字拓片

1969年12月，在济源轵城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在一座西汉墓内。出土了一个陶风车和舂碓模型，为我国研究农业机械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在另一座汉墓中，发现一株通体施釉的陶树，即古代传说中的桃都树。树顶立一天鸡，日出则鸣。酱黄色的树干上有九枝，枝端有绿叶，枝上有猴子，叶上有鸟和蝉。树座呈三角锥体，座上有人物、奔獐、飞蝉、山峦、花木等。是不知名的汉代艺术家富有浪漫主义的创造[123]。

1978年冬，在南乐宋耿洛村汉墓中，出土两件珍贵文物。一是通体金片、金丝、银片、银丝镶嵌的龙首形铜带钩；另一是高浮雕盘龙石砚，雕工精湛，独具匠心，砚面边沿阴刻一

周隶书"延熹三年(公元160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君寿如金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二千"的题记。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珍品[124]。



图七 新野出土汉代"戏车画像砖"

1970年,在郑州新通桥附近发掘出一座用130多块各种不同形制的空心砖砌成的汉代墓葬。空心砖上有40多种模印图案,除常见的一些几何花纹外,还有建筑、人物、乐舞、骑射、出行、狩猎、械斗、驯牛、斗鸡、乘龙、刺虎、熊虎和神话故事等。构图简练,栩栩如生,反映了这种独特艺术形式的成就[125]。

1981年,在新野发现一块反映汉代杂技艺术的戏车画像砖,这应该是当时的墓砖。画面上两辆马车前后飞奔,车内的高大木竿上,各有几个伎人进行表演。还有一个伎人在两辆飞车斜向的联索上向上举步(图七)。其难度远远超过平地上的走钢丝。这种无与伦比的杂技艺术,惊心动魄,令人拍案叫绝[126]。另外,在新野樊集还出有相当精美的拱桥杂技画像砖和"泗水捞鼎"画像砖。

闻名中外的汉代画像石,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豫南的南阳地区,其次较多的是豫中地区,再次是豫东地区,在豫北也有少量发现[127]。建国以来,发现的汉画像石数以千计,不少都出自墓葬。如南阳七里园[128]、赵寨[129]、杨官寺[130]、石桥[131]、军帐营[132]王寨[133]、李相公庄[134]、英庄[135]、王庄[136],唐河石灰窑村[137]、新店[138]、针织厂[139]、电厂[140],邓州长冢店[141],方城东关[142]和襄县茨沟[143]等地,都有重要发现。南阳汉画像石是衬地浅浮雕,题材广泛,有日蚀、月蚀、太阳黑子、牛郎星、织女星和北斗星等天文图像;有舞乐百戏等艺术画面;有豪强地主的生活写照;有祥瑞和辟邪的图像;还有远古神话和历史故事等。这些丰富多彩的画像内容,对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俗和天文观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形象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唐河新店汉画像石墓有"天凤五年"(公元18年)的题记;襄县茨沟汉画像石墓有"永建七年"(公元132年)的题记;南阳李相公庄画像石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的题记,都有明确的纪年,这对南阳汉画像石的断代分期,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在密县打虎亭发掘两座相连的东汉晚期大墓,形制和结构基本相同,均有墓道、墓门、

甬道、前室、后室、南耳室、东耳室和北耳室。西侧1号墓以画像石为主,各个墓室的门上和墓顶均刻有云纹、瑞禽神兽和其它装饰,甬道和前室是迎宾送客图,南耳室是车马牛羊和收租图,东耳室是庖厨图,北耳室是宴饮图;东侧2号墓以彩色壁画为主,甬道和前室绘有迎宾图,南耳室是家畜饲养图,东耳室是庖厨图,中室南壁是长7米多的墓主人车骑出行图,北壁是长7米多的宴饮百戏图,后者画面上能看清的人物达78个之多,表演跳丸、盘舞、奏乐等场面,维妙维肖。两座墓壁画场面巨大。画像石为减地平面线刻,刀法娴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144]。

1958年,在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新发现1通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张景造土牛碑》。碑身已残,顶部尚存碑穿痕迹。现高1.25米,宽0.54米,厚0.12米。该碑现存字11行,满行23字,全文可识者225字。记述当时为举行立春仪式就需"调发十四乡正"进行准备,弄得"吏正患苦";张景"愿以家钱"包作为举行立春仪式所需一切用具,要求以此免除劳役,可见东汉徭役苛重。碑中所记"右丞"官名及官名统称为"列长"一词,汉书不见记载,由此可补其不足。此外,张景碑还是书法艺术珍品,碑文字体宽扁,点、画、波、尾显明,端正工细,秀丽多姿,代表成熟汉隶书体的一个流派[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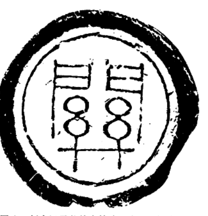
1973年,在偃师缑氏镇南家村,发现一块东汉建初二年(公元77年)《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石券略呈长方形,高1.54米,宽0.8米,厚0.12米。全石为未经打磨的不很平整的自然石面,正面镌刻隶书12行,每行14~27字不等,总计213字。券文对研究东汉时期"僤"这种民间组织的性质、成员和作用,对研究当时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买卖的地价都提供了新的史料。石券字形方正,气势雄伟,风格古朴苍劲,笔画肥瘦也富变化,亦为汉代书法艺术中的瑰宝。由于汉代碑刻所剩无几,新发现者更是寥若晨星,石券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146]。

1961年5月,在正阳县东关外,发现当地群众称之为"望像台"的古代石砌建筑是一座汉代石阙。石阙仅存东阙,用青石条砌筑而成,有子阙。阙通高4.75米,宽2.1米,厚0.75米。阙基3层筑成梯形,子阙阙身筑石8层,母阙阙身筑石11层,其上为雕有瓦垅的四阿式顶。阙身南侧和东侧可看出镌刻的人物、龙、牛、铺首及斜线、环形纹饰等。这些图像和纹饰与南阳汉画像石上的图像,以及河南常见东汉时期小砖侧面的几何纹饰基本相同。其石阙的建筑方法、形式和大小,均与登封中岳汉三阙非常近似。据此推断,这也应建于东汉时期。对全国仅存20余处汉阙来说,正阳汉阙的发现无疑是很重要的[147]。

1998年3月,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发现了新安汉函谷关仓储建筑遗址。遗址位于新安县仓头乡盐东村,北距黄河约600米。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79米,东西宽29米,四周有宽6米左右的夯土墙,墙内密布整齐有序的柱础石。通过出土的大量板瓦、筒瓦和饰"关"字的瓦当(图八),以及其独具特点的建筑形制,可以认定这是西汉中期构筑的一处属函谷关体系并与黄河漕运密切相关的国家仓储遗址。函谷关是我国古代著名关隘,秦时初建于河南灵宝,汉武帝时移至新安。迁至新安县的汉函谷关,决不仅限于县城附近的一处关口,而是一组横跨洛水,北至黄河,绵延数十公里,除关塞外,还包含城垣、仓储等设施在内的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148]。

汉魏洛阳城在洛阳市东15公里处,北靠邙山,南临洛水,地势险要,自周、汉、魏、晋至

北魏诸朝，先后在这里建都。它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1962年起，在这里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工作。初步探明了城垣、门阙、街道、护城河、西北隅金墉城、宫殿区、衙署与仓厩的范围和布局[149]。在城内发掘出著名的永宁寺塔基。在南郊还探出了汉魏时期的"三雍"遗址范围和一些殿台遗存[150]。1964年，发现了城南的东汉刑徒墓地，共发掘刑徒墓500多座。出土刑徒砖800多块，砖上的铭刻记录了刑徒的狱所名称、姓名、刑名和死亡日期等。他们从全国各地的狱所被押送到司隶校尉、将作大匠等管辖的工地，负担了修建陵墓、营造宫苑、筑城挖河、修路架桥、冶铁铸铜、开凿栈道和漕运等繁重体力劳动。他们名义上服刑期满后就可以获得自由，实际上一旦沦为刑徒，往往任意延长刑期，许多刑徒在刑期未满之前就被折磨而死，刑徒们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埋葬在这个墓地的刑徒不过是几十万刑徒中的极少数而已，绝大多数的刑徒都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据记载，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在洛阳兴建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范围极广。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了北魏洛阳城的内城。近年来依据航测影像图，进行北魏洛阳外郭城和水道的勘查，找到了外郭城北、西、东城垣的部分遗迹，西垣和东垣的3座城门，城内外的大道和若干水道。并在外郭城发掘出一批"西人"丛葬墓，其身份要高于刑徒。还发掘出土一批北魏青瓷器和釉陶器[151]。



图八　新安汉函谷关仓储遗址出土"关"字瓦当

魏晋南北朝时期，原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南下，造成各民族的大融合，前后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样漫长的年代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较为曲折地发展了汉魏时期的封建制，共同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后世，尤其是对隋唐两代，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关于洛阳北魏墓葬的研究工作中，对拓跋宏(孝文帝)的长陵和其后高氏的文昭皇太后陵位置的确定，是一项重要的收获(图九)。根据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考证，证明孟津官庄附近的两个土冢就是这两座陵墓。1991年6月，发掘洛阳北郊邙山乡冢头村东的北魏宣武帝景陵。墓冢直径105～110米，高24米。墓葬由墓道(土壁、砖壁各一段)、第一道封门砖墙、前甬道、第二道封门砖墙、后甬道、石门、方形四角攒尖顶墓室组成，气势恢宏。墓道西南侧有石武士像1尊，头部已失，尚存残高(连座)2.89米。墓室东部摆放随葬品，墓室西部有石棺床。墓葬早年被盗，随葬品仅存少量瓷器、釉陶器、陶器、石器、铁器等。有些青瓷器具有浓郁的南方青瓷风格。该墓的发掘对北魏陵墓制度的研究很有意义[152]。

洛阳北郊北魏江阳王元乂墓，早年被盗，墓室四壁彩绘壁画亦遭破坏，但墓室穹窿顶部所绘一幅"星象图"保存比较完整。图中星辰约有300余颗，银河纵贯南北，经有关专家考证，画面反映的是正月晚上或七月凌晨前的星空，一些星宿的名称也已经辨认出来。这幅北魏星象图，幅度较大，星数较多，要比过去发现的《敦煌星图》、北宋《新仪象法要星图》、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等要早得多。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



图九 孟津官庄出土北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

实物资料[153]。

1979年,在孟州发现有北魏持节督豫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渔阳开国子豫州刺史司马悦墓,出有一批陶瓷器和墓志。其父琅琊王司马金龙的墓葬1965年发现于大同。司马悦墓虽出土文物不多,但其墓志内容丰富,为研究北魏的历史,提供了很有用的资料。墓志书法潇洒稳健,字形朴实大方,是魏体书法中的上品[154]。

在邓州学庄,发掘出一座南朝时期的彩色画像砖墓。画像内容有墓主出行、历史故事和一些神禽怪兽。它们虽然出自无名工匠之手,但其造型艺术的高超水平,比起当时的名家来也毫不逊色[155]。

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156],濮阳北齐武平七年(公元576年)李云墓[157],都出有一批十分珍贵的北朝青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登封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0~524年),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密檐式砖塔。1988年在维修嵩岳寺塔过程中,清理了地宫。地宫位于塔基中,由甬道、宫门、宫室三部分组成,宫室在塔基中部稍偏西,平面近方形,边长为2.04~2.08米,残高

1.3～1.5米。四壁绘有壁画，上部为云纹，下部有仿木结构建筑的柱枋斗拱及人物。地宫清理出造像、建筑构件、生活用品等遗物70余件。其中释迦像的背光后面刻有发愿文“大魏正光四年岁……四日丁未佛弟子向□□释迦像一躯愿名……养长生任官日□□……从心”等内容，所记年款正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恰为嵩岳寺塔创建之时，这无异是研究该塔创建年代最珍贵的实物资料[158]。

1984年，在新安县西沃乡东南约1公里的黄河岸边峭壁上，发现1座北魏石窟。石窟窟顶上距公路路面7米，下距黄河水面7米左右。窟门面向黄河，为并排两个洞窟。1号窟靠东，形制较大，平面呈长方形，窟高1.5米，宽1.74米，进深1.56米。窟内三面环绕较低的宝坛，正面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东西两壁各为一立佛、二菩萨，东壁立佛身光上部还有小千佛龛。窟顶为穹窿状，雕饰成一个宝盖，中心是莲花，外绕4身飞天，飞天之外是云朵、莲瓣和流苏。窟内有4段造像题记，邑主王进达合二百人发愿造窟，开凿于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完工于建义元年(公元528年)。2号窟靠西，形制较小，高0.94米，宽0.95米，进深0.54米。正壁为一坐佛、二弟子、四菩萨，窟顶并刻两朵莲花。从窟内造像题记可知，该洞窟是邑老韩法胜、杨众兴等人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建成的。窟外东壁还有1座三层、1座五层、2座七层楼阁式浮雕石塔，每层为大房檐。最上有相轮和宝瓶。塔高2米左右，底宽0.33米，为北魏晚期作品。这是黄河中下游岸边惟一的1处北魏石窟，与龙门石窟有相似之处。因其位于绝壁之上，才得以保全至今。鉴于石窟处于黄河小浪底水库蓄水线以下，1997年将石窟整体搬迁到新安铁门“千唐志斋”博物馆院内，实为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一次壮举[159]。

1974年夏，在安阳殷墟西区的孝民屯，发掘了一批晋墓[160]。出土了一套123件的鎏金铜马具，排列有序，尚可据以复原。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实物资料。而其中单马镫的发现尤为珍贵。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骑兵的发展和军事史，也具有一定价值。

1974年4月，在渑池县火车站附近发现一座铁器窖藏[161]。出土有从汉魏到北朝时期4000多件铁器，包括60多种器形，在一批铁器上还铸有铭文。经化验这些铁器包括了除合金铸铁以外的今天所有生产品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低硅灰口铁、铸铁脱碳钢以及类似现代球墨组织。这对总结古代冶金技术经验是很重要的。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留下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

洛阳含嘉仓城的发掘，是隋唐考古的重大收获。仓城位于隋唐东都宫城的东北，创建于隋大业年间，面积达42万平方米。已钻探出排列整齐的圆形粮窖200多座，口径8～18米，深6～12米。在发掘过的几座粮窖内，出土有刻字或墨书的铭砖，记载着粮窖在仓城内的位置、储粮的来源、粮食的品种、数量、入窖的年月以及管理人员的官职和姓名。在160号粮窖中，还保留着大半窖炭化的谷子，约合当年的谷子50万斤左右。含嘉仓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1000多年前我国大型粮仓的实例，反映了当时储粮的特殊措施、各种记录和管理制度。这种地下粮窖的作法，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作用。近些年来，洛阳隋唐东都城的考古发掘收获甚丰。1982～1986年以来，发掘著名的含元殿——明堂遗址，发掘九洲池范围内的亭台楼阁建筑，并勘察宫城、隔城、城垣及诸城门址。1988年10月，发掘宫

城内的乾元门遗址。1989年11月,在宫城应天门内的房基中,发掘出土唐哀帝玉册多枚。更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10月,发掘洛阳唐东都履道坊(今洛阳南郊安乐乡狮子桥村)的白居易故居。发现有道路、渠道、宅院等遗迹,出土有一批陶器、瓷器、石经幢等遗物。一件经幢上刻“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铭,另一件刻“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等内容,均与白居易有关[162]。

1974年2月,在安阳北郊发现隋代相州窑址。发掘出瓷窑、各类窑具和大批青釉瓷器[163]。这与安阳发现的隋代卜仁墓[164]、张盛墓[165]和宋循墓[166]内出土的青瓷器相同;也和北齐时期安阳范粹墓和濮阳李云墓出土的青瓷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使我们可以推知豫北的制瓷手工业,在继承汉晋青瓷工艺技术之后,到北齐时期发展到新水平,到了隋代更上一层楼,成为北方青瓷的典型代表。

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征虏将军张盛墓是1959年5月在安阳发掘的,随葬近200件陶瓷器,包括瓷侍吏俑、瓷镇墓兽、陶仪仗俑、陶伎乐俑、陶仆侍俑、陶家禽俑,还有瓷生活用具模型,如瓷壶、坛、瓶、罐、三足炉、三足带环盘、博山炉、围棋盘、柜、枕等,陶生活模型如井、灶、碓、磨、屋等,其中瓷围棋盘值得一书。围棋源于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流行,并在唐以前传到日本等地。最初围棋盘为纵横各17道,至迟到隋唐时期改为纵横各19道,一直沿用至今。张盛墓所出瓷围棋盘应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19道棋盘。

三门峡一带自秦汉以来就是通向关中地区的漕运要道,东汉时候就修建了栈道,隋唐时期仍然使用,但运输还相当困难。在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又在人门北侧岩石中开凿了一条全长280米的运河,称为开元新河。在开元新河和栈道的两壁上,还保留了许多唐代题记。在考古调查中又找到了唐代的集津仓、盐仓和唐宋时期的禹庙、开化寺等遗址。这些题记和遗迹,对研究我国漕运史是很重要的[167]。

1992年,在洛阳市南郊花园村,发掘出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该墓规模较大,墓冢封土南北长22.3米,东西宽22米,高6.50米。封土下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过洞、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内多有壁画。其中甬道顶部壁画脱落,两壁壁画保存尚好,内容为建筑和仕女、男仆等人物;墓室顶部和四壁的壁画多为人物、云气、花卉。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前后甬道之间的墓门,由门楣、门额、门框、门坎、门墩和门扉等构件组成,全为青石磨制,并分别线刻文武官员、猛兽、凤鸟、鸳鸯和牡丹等图案,工艺精美。该墓虽遭盗掘,但仍出土了粉彩陶锁、铜钱和石墓志等随葬品,墓志盖篆书“唐故贵妃豆卢氏墓志铭”,志文为楷书,首题“唐睿宗大圣真皇帝故贵妃豆卢氏墓志铭并序”。这是河南少见的唐代皇室墓葬,具有很高学术价值[168]。

1981年4月,在洛阳龙门发掘出唐安菩夫妇墓。从墓志中可知,安菩原为西城“昭武九姓”国之一的安国大首领,归唐后封为定远将军。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其中三彩和单色釉器100多件,又有陶器、瓷器、铜钱和铜镜等。引人注目的还出有一枚东罗马皇帝福克斯(公元602年~610年)的金币。它和1955年在洛阳北郊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一样,同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遗物。结合墓内三彩器中各种胡人形象,以及身负囊橐、肉食、水壶和丝绸的骆驼俑,可以看出唐代洛阳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69]。一些学者认为

洛阳应是古代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

1983～1992年，在偃师杏园村即偃师商城西北郊一带，清理了一批唐代墓葬。几乎涵盖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墓内出土了不少诸如镶嵌紫水晶金戒指、鎏金银盒、银箔平脱方漆盒、金银平脱鸿雁衔花镜、雕镂精致的动物造型和生活器皿的玉石器以及一批精美的唐三彩器等，展示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尤其是不少墓内出有墓志，记录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墓志内提到这里为“西亳”、“亳邑乡”、“尸乡”等，这说明唐代仍沿袭汉人旧称，将偃师商城这一带地方视为西亳故地[170]。



图一〇 孟津西山头村唐墓出土女舞俑

1991年配合国家公路建设，在孟津西山头村发掘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的1座唐墓，出土一批非常珍贵的彩绘陶俑。其中有女乐俑6件，均跽坐在长方形底板上，通高19.5厘米。手中所持乐器模型虽已无存，但从其手势可以看出，有的弹琵琶、古筝、笙，有的吹奏排箫、筚篥或竖笛，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和西域的文化交流，这应是坐部伎乐队。女舞俑2件，形制相同，通高28.5厘米，头绾双高髻，广袖曳裙，舞姿优美(图一〇)。这8件女乐舞俑表演的是汉族传统的清乐乐舞。还出有男伎乐俑2件，通高32.4～34厘米，属于杂戏或俳优。这为研究盛唐时期的服饰、化妆、音乐、舞蹈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171]。



图一一 荥阳大海寺唐代石造像

1.十一面观音 2.弥勒菩萨 3.天王菩萨 4.佚名菩萨

1976年3月,在荥阳东郊唐代大海寺遗址,发掘出一大批石刻造像,除1通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造像碑和1尊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释迦牟尼佛之外,其余均是唐代的各种坐佛和菩萨像(图一一)。其中坐佛8尊,为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在1尊阿弥陀佛的束腰莲花座下,还有"显圣二年(公元762年)八月十六日……敬造阿弥陀佛像一躯"的题记。菩萨像18尊,多为唐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的圆雕立像,高2米以上。其中十一面观音造型最佳,天王菩萨精美异常。还有一些菩萨头像,面部表情各异,有的庄重严肃,有的和蔼可亲,有的沉静思维,有的笑逐颜开,真可谓栩栩如生。这些都是唐代少见的艺术珍品[172]。

1982年5月,在登封嵩山峻极峰北侧石缝中,发现唐武则天金简一通[173]。为竖长方形,长36.3厘米,宽8.2厘米,重200多克。其上镌刻双钩铭文:"上言:大周国主武曌(照),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拜谨奏"。"武曌"即武则天;"三官"指道家所称的天、地、水;"九府"则泛指各方神仙洞府;"太岁庚子"为武则天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这是武则天在久视元年七月到嵩山祈福,用小使臣胡超(宫庭太监)的名义向三官九府之神传达武则天的来意,进山门时投金简一通,相当于后世的名刺(名片),以显示至高无上的女皇身份。金简上有一些武则天新造的字,不久就被历史所淘汰。

唐宋考古中瓷器是常见的遗物。在汝州、巩义、宝丰、禹州、登封、新密、辉县、鹤壁、修武、新安、内乡、宜阳和其他一些地方,都调查或发掘了唐宋甚至元代的瓷窑遗址。发现大量的瓷窑、窑具和各种各样的瓷器。其中如新密西关窑珍珠地刻花瓷[174],巩义黄冶窑的三彩器[175],釉色青绿莹润如堆脂的汝瓷[176],灿如晚霞釉色窑变的钧瓷[177],群众喜闻乐见的豫北诸窑的白地杂花器[178],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人们惊叹和倾倒。这些精美的瓷器,和全国各地其他名瓷在一起,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运往世界各地。这雄辩地说明我们的国家是"瓷的祖国"。

特别要提及的是宋代汝官窑的发现。1962年在调查中发现了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只认作是一般的汝窑址,1987~1989年经过连续三次的发掘,找到了窑址、作坊、灰坑和水渠,出土了300多件瓷器,其中有20多件瓶、洗、盘、器盖为宫廷御用瓷器,还有一批白地黑花瓷和天目瓷,以及少量的钧瓷和三彩瓷。附近还发现有玛瑙矿,有白色、黑色、红色、绿色和棕色,这是汝官窑产品的重要原料之一,发掘表明,这里是宋、金、元窑址,若不是官窑场,至少也烧造官瓷[179]。过去传世的汝官窑产品仅70余件,且来源不明,这次新发现20多件,又有明确的烧造地点,可以说解决了一个千古之谜。宝丰清凉寺汝官窑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巩义宋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著名陵区之一,位于山青水秀的嵩山北麓和伊洛河以南的漫坡平原上,北宋的大部分皇帝皇后都葬在这里。每座帝陵、后陵都是坐北朝南,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神道石刻、陵园、陵台、下宫等。陵园四周有神墙,每边神墙正中有门阙,四角有角阙。近年来,对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进行调查与发掘,先后发掘出陵前最南端的鹊台基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长13.4米,南北宽12.15米;乳台基址,呈长方形,底部东西长19.7米,南北宽9.9米;门阙阙台也呈长方形,东西长19.3米,南北宽9.85米。

这些台基均为夯土筑周边用青砖包砌，其长边外侧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三折棱内收的小曲尺线，反映了宋代皇陵的建筑特点。在陵园北侧，发掘出下宫的1号殿基，平面两侧用砖包砌，东西有护栏。在陵园南神门门阙前，发掘出东西对称、平面呈曲尺形的阙庭基址，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在陵区发掘中，出土有大量的龙纹瓦当、龙首脊饰、万字护栏、莲纹方砖和带陵名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为研究和复原宋代陵寝制度，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资料[180]。

1984年在陵园范围内发掘了元德李后陵。地面上现存有陵台、石刻和阙台。地宫位于陵台之下，系单室砖砌，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石墓门上线刻高大武士立像，墓室北半部有石砌棺床，墓壁有砖砌门窗桌椅，其上部至墓顶绘有空中楼阁和银河天象图。出土有玉哀册和玉谥册，随葬有精美的越窑龙纹青瓷盘和定窑"官"字款白瓷盘、碗[181]。此外还发掘了魏王赵頵墓[182]和燕王赵颢墓[183]。并收集到一些宗室公主的墓志[184]。

此外，在全省各地还发掘了许多宋墓[185]。如密县宋枢密副使冯京墓[186]，伊川彰德军节度使王拱辰墓[187]，郏县"三苏坟"苏适墓[188]，郑州南关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胡进墓[189]，安阳天禧镇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王用墓[190]，上蔡雕砖壁画墓[191]，禹县白沙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赵大翁壁画墓[192]，新安李村宋宣和八年（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四郎壁画墓和宋村北宋雕砖壁画墓[193]，温县北宋雕砖墓[194]，三门峡土壁浮雕墓[195]，方城盐店附近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和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两座石俑墓[196]，以及洛阳、南阳、滑县北宋晚期官办的"漏泽园"墓地等[197]。其中1958年在偃师酒流沟的水库的一座宋墓里，曾发现三块杂剧雕砖。杂剧是当时北方流行的剧种，每块砖上表现一个演出场面[198]。第一块叫"艳断"，即杂剧的开场，刻划一个演员手拿一幅卷轴画，上身微俯，面向群众表演；第二块叫"正杂剧"，一人持笏，在和另一个捧包袱的演员对话；第三块叫"杂扮"，即杂剧的结尾，描绘一个小丑敞怀露腹，托一鸟笼，另一个小丑软巾诨裹，吹口哨逗鸟叫。这类杂剧雕砖，与洛宁介村杂剧雕砖墓[199]，禹县白沙宋墓杂剧雕砖[200]，温县杂剧雕砖和散乐图[201]，以及焦作金墓戏剧壁画[202]，同为研究我国古代戏剧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1993年在登封王上村发掘1座八角形宋代砖室壁画墓，除南壁为墓门之外，其余各壁均绘一幅壁画，高1.2米，宽1.05米，内容相当丰富。东北壁为翠竹三鹤图，三只鹤立在竹前，悠然自得；西北壁亦为三鹤图，其中一只腾空展翅，引颈舞风；东壁为两人论道图，高山飞瀑，树木巨石，一牵牛白衣人与另一蹲坐黄衣人对语；西壁为升仙图，白衣人踏云飞升，黄衣人拱手相送；西南壁为三侍女图。人物均面向左，分别托果盘、执杯、捧瓶；东南壁亦为三侍女图，，人物均面向右，分别托盏盘、执长柄团扇、捧铜镜，还有一小童，手执玩偶，颇有情趣。此外，甬道东西壁各绘一男侍，墓顶绘祥云白鹤。壁画采用工笔与写意结合的手法，线条细腻流畅，色彩浓淡分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203]。

1996年，在禹州电厂发掘一座北宋墓葬，墓室平面呈六角形，墓壁除砖雕有仿木结构的门窗、桌椅、灯檠之外，还有60多个砖雕俑，有武士、力士、飞仙、侍者、伎乐等，制作精湛，形象逼真，为研究北宋时期的人物服饰、砖雕艺术和杂剧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204]。

1981年以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对北

宋的都城进行调查、钻探和试掘,外城周长近30公里,一般埋在距今地面约4米深处,四个城角也已找到,其中位于高屯村和三间房村之间的西南城角保存最好,高出地面尚有1米左右。外城有14座城门和7座水门,已探明15座,其中包括著名的南熏门(南墙正门)、新郑门(西墙正门)、新曹门(东门)、汴河下水门等。在外城的城门处有5处瓮城,有的瓮圈可达1.3万平方米,面积之大,为历代都城所少见。在内城找到了南端正中的朱雀门和南北中轴线的御街,并发掘出御街上横跨汴河的州桥,这是明初在宋代基础上重修的,桥面东西宽30米,南北长约16米多,为砖石结构的拱形桥。在宫城找到了南门和北门,还钻探出皇宫的正殿——大庆殿,面积约5000平方米,台基残高6米多,四周还有廊庑。在宫城东半部(即今潘家湖底)发掘出在宫城基础上所建明代周王府的宫墙、殿基和庭院[205]。最近又勘探出著名的金明池[206]。印证《东京梦华录》、《水浒》和《清明上河图》、《金明池夺标图》所描绘的北宋东京城的壮丽和市肆的繁华。上述发现和现存的相国寺旧址、开宝寺"铁塔"和天清寺"繁塔",勾画出北宋东京城址的轮廓。

1991年10月至1992年5月,在洛阳老城中州路南侧,发掘出一座宋代衙署庭院遗址。遗址规模很大,南北长76米,东西宽33米。发现有东西并列的殿亭2座,东廊庑和西廊庑各一排,通向衙署西大门的大道1条,还有过厅、花砖路、花榭、水池等。出土建筑构件如砖、瓦、瓦当、套兽和垂兽等。其南部发掘出宋代门址,同属衙署和官邸之所在。对研究和复原宋代官府建筑有重大价值[207]。

1997年4月,在鹿邑太清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里是老子故里,东汉桓帝时就在此建老子庙,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名太清宫,又称前宫,是祭祀老子的地方。其北500米有后宫,又称洞霄宫,是祭祀老子母亲的地方。在后宫发掘出回廊、偏殿和院墙等。回廊东西长103米,南北宽76米,回廊北60米内仍有大面积建筑群。从建筑布局看,后宫为东西并列3个院落,南北至少有两进。中部偏南为主殿,两侧院落有配殿,从发掘中获知,在整个建筑群中的殿、堂、回廊等均用砖铺地面,墙体基础全部用砖砌,墙角、开间处及檐、廊排列有规整的石柱础,遗址中分布有唐、宋、金等时代的建筑。前宫尚立有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御书镌刻《道德经注碑》,后宫也立有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宋真宗亲谒太清宫,御撰御书并篆额《先天太后赞碑》,在后宫遗址中还发掘出金太和元年(公元1201年)《太清宫庙产碑》。这些表明,唐宋时期一些皇帝都曾亲临太清宫祭祀老子,一直把这里当作老子的诞生地[208]。

1966年,在新密法海寺旧址,发掘了一座北宋塔基[209],塔基内置上下重叠的两个方形石函,内有3座三彩琉璃方塔和一个三彩琉璃舍利匣,还有一些其他遗物。三彩琉璃塔上有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题记,匣上有"咸平元年"的题记。这是目前我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琉璃制品。均用高岭土作胎,施褐、黄、绿三彩釉,比唐三彩更加细致多变,富丽清新,表明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和提高。这几座琉璃密檐方塔和方形琉璃舍利匣,显然是依据当时的砖、石塔建筑结构塑造出来的,很富有我国民族建筑形式的特征。其制作是建筑、绘画、雕塑、陶瓷、彩釉等多种工艺美术的结合,实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1977年,清理了郑州开元寺塔基,其地宫为石砌仿木结构,内置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石棺,棺身两侧浮雕释迦牟尼涅槃十弟子送葬图,各具神态,形象生动。石棺下连

雕的须弥座上，浮雕有伎乐和力士，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210]。

1988年，发掘邓州福胜寺塔基，地宫位于塔心室之下，地宫内有石质须弥座，上刻《地宫记》，署时"天圣十年"（公元1030年）。座上置方形石函，内有金棺、银椁、玻璃舍利瓶和鎏金双龙银壶等。这些遗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对古代科技史、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十分重要[211]。

1959年，在鹤壁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煤矿遗址。发掘出较大的采煤区域和巷道、井口、灯龛、排水井、生产工具和运输工具等。从而说明煤城鹤壁已有近千年的采煤历史了。1985年夏，在禹县神垕镇翟村，也发现一处北宋煤矿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发现十多处井口，井下有古巷道，出有宋代铁镢和瓷器等。今天的梨园煤矿仍在附近开采[212]。

近年来在荥阳楚村，发掘出一处元代铸造作坊遗址。出土炼渣、煤块、残炉壁、坩埚和一批铜模。铜模包括犁镜、犁铧、耧铧、犁底、耙齿等。这些铜模都是铸制而成的，均可以直接用来制范。铜模表面光滑而耐磨，远比泥模和木模更为经久耐用；用时，青铜熔点低，流动性好，易于浇注，且化学性能稳定，不易生锈，也比铁模优越。这种永久性模型，在铸造工艺技术上使产品规格化，简化制范工艺，在我国铸造工艺史上是较大的改进和创造[213]。

1982年2月，在宁陵县华岗村东面的黄河故道（张弓河）西侧，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船身倾斜，南高北低，横卧于黄沙层和黑色淤泥层内。全船长约16米，最宽处为4.8米。共分成九个船舱，包括一个首舱、一个尾舱、一个桅舱、四个货舱、两个卧舱。船底、舱梁、甲板、舷板、船桅和船舵尚存。船内遗物甚多，有陶器、铁器、木器、青花瓷器、中药材、象棋盘、腰刀、竹子和黄草纸等。从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这是一艘载重约22吨的内河航船。竹子和黄草纸多为南方产品，可能是从南向北行驶的商船，在华岗村附近的张弓河内遇大风浪而沉没。据明史记载，张弓河源于兰阳，流经赴皮寨、仪封、野鸡岗、地丘店、宁陵、张弓、柘城，由亳入淮。此河从元到明代前期是黄河干流之一，可以南北通航。宁陵明代沉船的发现，对研究豫东古河道的变迁、交通航运和造船工艺均有参考价值[214]。

50年来河南如此众多的考古发现，通过国家、省和各市地博物馆的文物陈列，通过到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的对外文物展览，通过一篇篇发表的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通过一部部出版的考古学术专著，介绍给了海内外炎黄子孙，介绍给了世界各国人民。在20世纪末叶的今天，使人们在看到一个经济腾飞现代化河南的同时，又看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河南。

河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正在努力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积极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文物保护、调查和发掘工作，深入开展考古研究，并在诸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国家重点课题项目中，积极发挥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进入第二个50年之后，河南的文物考古工作将再创辉煌。

注　释

[1]①未化：《南召县发现猿人化石》，《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

②邱中郎等：《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1卷2期。

[2]吴汝康等：《河南淅川的人类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20卷1期。

[3]王兵翔:《展望中原地区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河南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1980年,未刊稿)。
[4]季楠等:《河南省卢氏县发现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3年2卷4期。
[5]①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
②黄慰文:《豫西三门峡地区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8卷2期。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④张维华:《河南省新发现的旧石器和人类化石》,《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6]①同[5]①、②、④。
②梁久淮等:《洛河岸边首次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
③张森水等:《洛阳首次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2年1卷2期。
④安亚伟等:《洛阳北窑发现旧石器遗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7日。
[7]①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7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②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③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第2期。
[8]①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②开封地区文管会等:《裴李岗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1979年第3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9]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12]孙广清:《河南裴李岗文化的分布和地域类型》,《华夏考古》1992年第4期。
[1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34页,地图出版社1991年。
[14][23]孙广清:《试论河南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区域类型》,《中原文物》1995年第1期。
[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仰韶村1980年~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16]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7]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18]濮阳市文管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20]①张玉石等:《郑州西山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
②《华夏最早城址重见天日》,《光明日报》1995年5月14日。
[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年。
[22]同[13]35页。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6年。
[25]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2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旭旮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28]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管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
[30][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3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 1992 年。
[3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3 期。
[3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 年第 3 期。
[34]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2 月 6 日。
[35]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 1974 年。
[3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 年第 1 期。
[37]①郸城县文化馆:《河南郸城段寨出土大汶口遗物》,《考古》1981 年第 2 期。
②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 年第 3 期。
[38]商水县文化馆:《河南商水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考古》1981 年第 1 期。
[39]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 年第 1 期。
[40]张脱:《河南平顶山市发现一座大汶口类型墓葬》,《考古》1977 年第 5 期。
[41]尚景熙:《上蔡发现五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河南文博通讯》1979 年第 3 期。
[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 1965 年。
[4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
[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45]长办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9 年第 1 期。
[4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 年第 12 期。
[47]①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华夏考古》1994 年第 2 期。
②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邓州市八里岗遗址 1992 年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7 年第 12 期。
[48]①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
②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
[4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
[5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 年第 4 期。
[5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刘胡兰小队:《河南偃师灰嘴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61 年第 2 期。
[52]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 年第 1 期。
[5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渑池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 年第 9 期。
[5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第 2 期。
[55]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 年第 1 期。
[5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 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10 期。
[5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 年第 2 期。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寨遗址试掘》,《考古》1981 年第 5 期。
[60]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偃师商城初步勘探与发掘》,《考古》1984 年第 6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3 年秋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10 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 年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4 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第 2 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偃师商城考古再获新突破》,《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1日1版。
⑦新华社北京(1998年)7月16日晚报专电:《偃师商城的新发现——解开夏商分界的疑团》,《大河报》1998年7月17日。
[6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
[62]①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②安金槐:《一年来郑州市的文物调查发掘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6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64]安金槐:《郑州地区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6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66]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6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3期。
[68]宋国定等:《商代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1日。
[6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内宫殿遗址地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年第4期。
[70]郭沫若:《豫秦晋访古十八首》,《文物》1959年第8期。
[7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7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73]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等:《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76]①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
③《殷墟花园庄发现早期甲骨坑》,《中国文物报》1991年12月22日。
[77]《殷墟发掘一座商代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0日。
[78]王立早:《殷墟发掘一处大型宫殿基址》,《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22日。
[79]①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②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③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80]张志清等:《鹿邑太清宫遗址考古发掘又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3日。
[81]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的新发现》,《文物》1960年第5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③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信阳县浉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考古》1989年第1期。
[82]裴琪:《鲁山县发现一批重要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8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上蔡出土一批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84]周到等:《河南鹤壁庞村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1980年。
[85]刘东亚:《河南淮阳出土的西周铜器和陶器》,《考古》1964年第3期。
[86]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87]河南省博物馆:《泌阳县出土的两件西周铜壶》,《文物》1966年第1期。
[88]杨宝顺:《新郑出土西周铜方壶》,《文物》1972年第10期。

[89]河南省博物馆:《河南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8期。
[90]①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发现西周铜簋》,《考古》1981年第4期。
②张肇武:《河南平顶山市又出土了一件邓公簋》,《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91]①《洛阳发现西周前期青铜铸造遗址》,《文物特刊》(35)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8期。
②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③洛阳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④贺官保:《洛阳市北窑庞家沟出土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9期。
⑤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第10期。
[92]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平顶山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③王龙正等:《平顶山应国墓地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1日。
[9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9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9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2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96]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1980年。
[97]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掘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
[98]蔡全法等:《郑韩故城考古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3日。
[99]①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告成遗址的调查试掘》,《河南文博通讯》1977年第2期。
②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一九七七年下半年登封告成遗址的调查试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③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12期。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工作站:《登封战国阳城贮水输水设施的发掘》,《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
[100]同[99]③。
[10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10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03]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的发掘记》,《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②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发掘》,《文物天地》1992年第4期。
[104]①赵青云:《固始侯古堆发掘一座大型陪葬坑》,《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3期。
②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10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
[106]①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②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10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108]河南省文物局:《汤阴发现战国阵亡军士墓》,《河南日报》1982年6月16日。
[10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10]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111]黄士斌:《上村岭秦墓和汉墓》,《中原文物》特刊1981年。

[112]驻马店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 年第 9 期。
[113]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 年第 9 期。
[11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 1962 年。
[1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 年第 1 期。
[116]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2 期。
[117]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省温县汉代烘范窑发掘简报》,《文物》1976 年第 9 期。
[118]①商博:《永城芒砀山发现汉代梁国王室墓葬》,《中国文物报》1986 年 10 月 31 日。
②阎道衡:《芒砀山又发现一座西汉梁王墓》,《光明日报》1988 年 11 月 13 日。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119]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
②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6 期。
[120]洛阳地区文管会:《宜阳县牌窑西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 年第 4 期。
[12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 年第 3 期。
[122]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 年第 11 期。
[123]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 年第 2 期。
[124]安阳地区文管会等:《南乐宋耿洛一号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 年第 2 期。
[125]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1972 年第 10 期。
[126]魏忠策:《罕见的汉代戏车画像砖》,《中原文物》1981 年第 3 期。
[127]孙广清:《河南汉代画像石的分布与区域类型》,《华夏考古》1991 年第 3 期。
[12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南阳汉代石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10 期。
[129]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
[1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3 年第 1 期。
[131]南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石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1 期。
[132]南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军帐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1 期。
[133]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
[134]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 年第 8 期。
[135]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 年第 3 期。
[136]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 年第 3 期。
[137]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文物》1982 年第 5 期。
[138]南阳地区文物队等:《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 年第 2 期。
[139]周到等:《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 年第 6 期。
[140]《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
[141]《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
[142]南阳市博物馆等:《河南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文物》1980 年第 3 期。
[14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4 年第 1 期。
[1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 1993 年。
[145]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 年第 11 期。
[146]黄士斌:《河南偃师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 年第 12 期。
[147]王润杰:《正阳县汉代石阙调查》,《文物》1962 年第 1 期。
[148]朱亮等:《黄河小浪底盐东汉代建筑遗址发现及初步认识》,《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 月 6 日。

[149]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
[1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
[151]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郭城和水道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外郭城内丛葬墓发掘》,《考古》1992年第1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12期。
[152]①郭建邦:《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第3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153]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第12期。
[154]孟县文化馆:《河南省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年第3期。
[15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156]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157]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第9期。
[158]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登封嵩岳寺塔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期。
[159]①温玉成:《河南省新安县西沃石窟》,《考古》1986年第2期。
②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新安西沃石窟勘测报告》,《文物》1997年第10期。
③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54~64页,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
[1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
[161]河南省博物馆等:《渑池县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期。
[162]①河南省博物馆等:《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3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隋唐东都城1982~1986年考古研究所工作纪要》,《考古》1989年第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1987年隋唐东都城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乾元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洛阳宫城内出土哀帝玉册》,《考古》1990年第12期。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163]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2期。
[164]宋伯胤:《卜仁墓中的隋代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
[16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166]安阳文教局:《河南安阳隋墓清理记》,《考古》1973年第4期。
[16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
[16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16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70]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考古》1984年第10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③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县四座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2期。
[171]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文物》1992年第3期。
[172]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第3期。
[173]吕树芝:《武则天金简》,《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
[174]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密县、登封唐宋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64年第2期。
②冯先铭:《河南密县、登封唐宋古窑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3期。
[175]①刘建洲:《巩县唐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②傅永魁:《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176]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汝窑址的调查与严和店的发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
②冯先铭:《河南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177]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
[178]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古代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8期。
②陈万里:《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179]①赵青云等:《宝丰青凉寺汝窑址的钻探与试掘》,《文物》1989年第11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80]①孙新民等:《巩义宋陵考古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14日。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18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182]周到:《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
[183]傅永魁等:《巩县石窟寺·包拯墓·北宋皇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4]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学集刊》第2集1982年。
[185]孙广清:《河南宋墓综述》,《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18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187]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北宋王拱辰墓及墓志》,《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188]李绍连:《宋苏适墓及其他》,《文物》1973年第7期。
[18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南关外北宋砖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190]《河南省文化局调查安阳天禧镇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
[191]杨育彬:《上蔡宋墓》,《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4期。
[192]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193]①赵跟喜:《新安县发现宋代壁画墓》,《洛阳日报》1984年1月4日。
②叶万松等:《新安县石寺李村的两座宋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
[194]张思青等:《温县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195]金仪:《三门峡发现土壁浮雕宋墓》,《文物报》1987年8月21日。
[196]①刘玉生:《河南省方城县出土宋代石俑》,《文物》1983年第8期。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村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197]①贺官保:《西京洛阳漏泽园墓砖》,《文物资料丛刊》第7集1983年。
②魏仁华:《河南南阳发现宋墓》,《考古》1966年第1期。
③宋采义等:《谈河南滑县发现的北宋漏泽园》,《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198]董祥:《偃师酒流沟水库宋墓》,《文物》1959年第9期。
[199]李献奇等:《洛宁县宋代杂剧雕砖试析》,《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200]徐苹芳:《白沙宋墓中的杂剧雕砖》,《考古》1960年第9期。
[201]①同[194]。
②廖奔:《温县宋墓杂剧雕砖考》,《文物》1984年第8期。
③张新斌等:《温县宋代人物雕砖考》,《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
[20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203]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登封王上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20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7年4月《工作通报》。
[205]①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第12期。
②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206]丘刚等:《开封宋城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29日。
[207]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6期。
②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现宋代门址》,《文物》1992年第3期。
[208]张志清等:《鹿邑发掘老子故里太清宫遗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0日。
[209]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
[210]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211]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等:《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文物》1991年第6期。
[212]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②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现》,《考古》1989年第8期。
[213]①于晓兴等:《郑州荥阳楚村元代铜模》,《文物》1982年第11期。
②郑州市博物馆等:《荥阳楚村元代铸造遗址的试掘与研究》,《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214]商丘地区文化局、文管会:《宁陵县华岗出土的明代木船》,《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原载《新中国考古工作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近年来河南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河南则是摇篮里的一颗明珠。建国后,以多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而闻名于世。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又有许多考古新发现,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

1992年配合基本建设,在辉县市孟庄镇东的坡地上,发现一处龙山文化城址。

城址平面近似正方形,东墙、北墙保存较好,东墙长约380米,北墙长约300米。西墙、南墙破坏严重。城墙系用黄生土或杂以灰土夯筑而成,尚未发现基槽。城墙现存残高为1~2米,宽20余米,圆形圜底夯窝径1.5~3.5厘米。城墙外侧9.5米处有护城河。城墙下面为生土,也有的压着龙山中期文化层。城墙夯土内包含遗物不多,有一些篮纹、方格纹、绳纹或附加堆纹等龙山文化陶片。发现有龙山晚期文化层或二里头文化的灰坑叠压或打破城墙夯土。在东墙正中,发掘出宽约2米余的缺口,缺口一侧有木板痕迹,应是东城门遗存。南墙正中外侧发现有宽约4米的路土,可能与南城门有关。

城内文化层堆积较厚,有些地方厚2~5米。最早为仰韶文化层,依次为龙山文化层、二里头文化层、商代二里岗期文化层、东周文化层等。

近年来,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成了热门话题。城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息息相关。孟庄龙山文化城址,在河南是继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等地的龙山文化城址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城的起源、探索夏商的历史提供新的重要资料。

二

郑州商城是著名的商代前期都城,近年来在郑州商城南墙外900多米处和西城墙南段外700多米处,发现一大段外城墙。可与50年代在二里岗北部一带发现的夯土墙相连接。即从凤凰台向西偏南经水利厅仓库、商业仓库、市粮一库、市木材公司、市二轻仓库、继续向西稍偏北,再经郑州五中、新民村、东豆腐寨、臧家门、乔家门,再折向北稍偏西,又经振兴商场、群众剧院、中原大厦、郑州长途汽车站到东方红影剧院,断续发现夯土墙约

5000米，自郑州商城东南、南、西南的外侧环绕。其中1992年在郑州布厂街的花园新村，发现并清理出郑州商城外城墙的西南城角。这里距郑州商城西南城角约700余米。该段夯土墙长约100余米，地面上已无存，地面下保存较好。夯土顶部距地表1.10米左右，高1.95米，宽20.40米，城墙下挖有基槽，分段夯筑而成。夯层厚8~15厘米，夯层面上布满密集的圆形圜底夯窝痕。土质坚硬，结构紧密。夯土内包含少量破碎的灰褐色绳纹陶片。从其建筑结构和出土遗物看，与郑州商城城墙相同，应建于二里岗期下层晚段时期。这大大扩展了郑州商城的范围，为研究郑州商城的军事防御设施、外城墙本身的范围、形制、结构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也为研究郑州商城和偃师尸乡沟商城早晚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在郑州东里路东段南侧配合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基建工程中，发掘出多座夯土台基，其中F1、F2保存较好。F1平面呈长方形，东西残长26米，南北宽13米。在南部和西部发现排列有序的柱础槽21个，柱础槽中心相距2.30米左右，槽为圆角方形，系在夯土台基上挖就，然后在槽底置柱础石，石上立柱，再填土夯实。柱础石多系天然石块稍作加工而成。夯土台基有些地方厚达4米余，估计是处理地基时平整低洼地形成的夯土堆积。夯土分层明显，质地坚硬，夯窝为圆形圜底。从夯土内包含的最晚陶片看，应属商代二里岗上层早段时期。F2位于F1西侧，相距3米，与F1近乎垂直。从平面关系看，二者应为同组建筑。F2南北残长20米，东西宽8米，石柱础呈南北向排列，东西三排，共发现12个。时代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早段时期。这些重要发现，补充了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布局和建筑结构等资料。

在郑州顺河路东段南侧配合黄河中心医院基建工程发掘中，发现宫殿区内一处商代石板砌筑的蓄水设施。平面为长方形，呈西北/东南方向，长约100米左右，宽约20米，初步推断为一个长方形蓄水池。断面呈倒梯形，从结构看，蓄水池是在当时地面下挖2米左右，底部和两侧护坡先用料礓土夯实，然后用卵石砌护坡，在底部铺一层石板。这些青石板上下两面都经过粗略加工，平面基本呈长方形，长度为0.50~0.80米之间，宽度为0.30~0.50米，厚0.10米左右。由于后期人为的破坏，护坡石多数已滚落到水池的底部，护坡保留的高度也相应降低。整个遗迹除被战国文化层或战国夯土层打破一部分外，还有部分被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文化堆积所叠压。通过遗迹本身出土文物和该遗迹打破的灰土层中出土物的比较，水池的时代应相当于商代二里岗上层偏早阶段。在宫殿区的中心区域附近，人工修筑这样大型的蓄水设施是很了不起的。这对研究古代宫殿区供水乃至整个城市供水、排水和水利设施的布设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0年，在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石佛乡小双桥村发现一处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发现有二里岗期上层晚段时期的夯筑基址和石柱础，出土一批陶器及原始青瓷尊片，还有能反映商代礼乐制度的大石磬和长方形石圭。遗物中最重要的是一件青铜建筑饰件，整体近方形，平面为“凹”字形，高18.5厘米，正面宽18.8厘米，侧面宽16.5厘米，两侧面各有一个6厘米×4.2厘米的长方孔，壁厚0.6厘米，重6公斤。饰件正面饰单线阴纹饕餮面，侧面在长方孔的四周为一组龙虎斗象图，龙虎形象生动，象为艺术变形。这应是装在宫殿正门枕木前端的装饰性构件，由其形体推测该建筑规模很大，非商王莫属。这

种青铜建筑饰件为国内首次发现，其造型独特，纹饰繁缛，实为商前期文化中少见的精品。这对研究商代的青铜冶铸技术、青铜器的花纹装饰图案、青铜器的使用及商代建筑的发展水平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遗迹和遗物推测，这里很有可能是郑州商城晚期时王室祭祀的场所，也可能是一处离宫别馆。这个重要考古发现，更加展示了郑州商城这座王都的恢宏。

三

平顶山滍阳岭应国墓地，是1986年开始陆续发掘的。1991~1992年又发掘了一批两周墓葬，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84号墓是一座较大的长方竖穴土圹墓，出土随葬品100余件。包括鼎、盨、甗、卣、盘、觯等一批青铜礼器，还有车马器和兵器，以及陶鬲、瓷簋、玉钺、玉柄形饰和红玛瑙项链等。青铜礼器中7件铸有铭文，部分为应侯作器、如甗铭"应侯作旅彝"，盨铭内容类似，长达28字。该墓可能是西周中期应国的某一代应侯之墓。

38号墓是西周晚期一座应国贵族墓葬，墓的北端有斜坡墓道。出土一批青铜礼器，包括鼎、簋、鬲、盘、盉、甬钟等多套多件。还出有铜铠甲、车马器、玉器和陶器。铜鬲上铸有铭文"应姚作叀公尊鬲，其万年永宝"。据墓主人的牙齿和下颌骨推断，是一位年仅20多岁的男性青年。或即鬲铭所谓的叀公。应姚所做的器物，过去已发现不少。表明这位姚姓妇人是一位活跃在西周晚期应国政治舞台上重要人物。

45号墓是春秋早期的应国贵族墓葬。北端有斜坡状墓道。出土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和陶器、玉器等各类大小文物近千件。其中青铜礼器有鼎5、簋4、鬲4、壶2、甗1、盘1、尊1、爵1、觯1、方彝1。有的礼器上铸有铭文，如鼎铭为"应申姜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可知墓主人是嫁于应国的申国女子。1979年和1980年，这里出土有两件形制相同的西周铜簋，器铭为"邓公作应嫚毗簋其永宝用"。说的是邓国女嫁到应国的事情。这表明在两周之际，应国和它的邻邦申国、邓国大约由于唇齿相依的关系，为共同防御强大的楚国而结成某种政治联盟，用联姻的方式体现出来。这在春秋时期颇为常见。

33号墓和55号墓均为春秋晚期墓葬。前者出土有鼎、浴缶、敦、壶、盘、勺等一批青铜礼器，还有车马器、陶器、玉器；后者出土有鼎、浴缶、敦、簠、盘、匜等青铜器，还出有由10多枚精美玉片组成的玉腰带及一批陶器。这些青铜器和陶器已带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表明这时应国已不复存在，为楚所灭有一段时间了。

此外，今年4月又发掘西周时期的242号墓，出土一批青铜礼器和车马器。其中一件簋，造型别致，有铭74字，涉及到柞伯、南宫、师酉父等人。李学勤先生称这是近三十年来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另一件铜鼎上也有20多字的铭文。还发掘一座春秋时期的275号墓，出有一批青铜礼器、玉器和串饰，十分精美。

上述考古发现为研究应国的地望、历史、葬制及春秋中期应国已为楚所灭的史实提供了佐证。

四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至1957年，配合黄河水库工程曾在这里发掘出234座墓葬、3座车马坑和1座马坑。出土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串饰。在一些铜器上发现有“虢”氏的铭文，证明这里是包括虢国太子墓在内的虢国墓地。

进入90年代以来，配合农田工程建设，又发掘一批墓葬和车马坑。其中2001号大墓出土各类文物3200多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玉器、金饰、象牙器等。其中30多件铜器铭文中均有“虢季”字样，还有罕见的玉茎铜芯铁剑、金腰带饰、缀玉面罩和玉组佩饰等。当为一代虢国国君之墓。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近年，又在这里发掘4座大墓和一个大型车马坑。其中以2009号墓为最大。出土青铜礼器200多件，还有铁刃铜戈及其他铁工具4件。出土玉器有800多件(套)，除缀玉面罩、成组玉佩之外，还有十分罕见的墨书玉遣策，由数十枚玉片组成，其上为墨书，内容涉及送葬者的姓名和所送的物品清单，放置在外棺盖上。其中有名“南仲”者，为周宣王时期的名臣，就为该墓入葬年代提供佐证。玉遣策的出土，有着很高学术价值和书法价值。玉器中还有一批玉象、虎、豹、鹿、兔、龟、牛、羊、鼠、鱼、蜻蜓和蜘蛛等，可谓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玉器中还有个别玉璧上刻“小臣”等字样，应为商晚期遗物，这在周墓中十分难得。墓内还出有整件毛织衣物、皮马甲及盾牌，堪称弥足珍贵。在不少铜器上有“虢仲作器”的铸铭。2009号大墓也应是一座虢国国君之墓。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从上述考古发现表明，2001号和2009号墓及其附近，应是虢国国君兆域所在。置于头部的缀玉面罩和放在身上的玉组佩饰，应是汉代高级贵族殓服“玉衣”的雏形。墓内出土的铁制品，是人工冶铁的实物，把我国冶铁工艺又提前到西周晚期，其科学价值不可低估。从墓地的方位和墓内铜器铭文并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断这里属于北虢，建于西周时期。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北虢在东周畿内，为周室西面的一个屏藩，其后不久，在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为晋所灭。虢国墓地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并有明确的年代下限，是研究两周之际特别是虢国文化面貌的一批重要资料。

五

丹江是汉水的主要支流，为古代江汉流域通往关中地区的交通要道，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河南淅川丹江口水库西岸仓房乡龙山脚下的下寺、和尚岭及徐家岭，均有楚国墓地。1976~1979年下寺春秋楚墓的发掘，曾经因出土过铜禁、大型甬钟和一大批青铜礼器、精

美玉器而引起轰动。近两年在和尚岭发掘出多座大型楚墓。1号墓平面近方形，虽早年多次被盗，仍出土一批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及石编磬、海贝等。青铜鼎上铸铭"克黄之鼾鼎"。据《左传》记载，克黄是楚令尹子文的孙子，楚庄王时任箴尹，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克黄出使齐国，其家族若敖氏因发动叛乱被诛灭。楚庄王念其祖父子文治楚有功，宽赦克黄改其名为生。说明该鼎铸造年代应在克黄改名之前，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鼾鼎，是标准的断代器。在徐家岭也发掘出多座春秋晚期楚墓，其中9号墓平面近方形，出土青铜器100多件，其中有一对近似于夔的铜神兽尤为精美。高0.48米，为龙首、虎颈、虎尾、龟足。龙张口吐舌，头上有六条蛇形龙。神兽背上有座，座上又有一奔驰状怪兽，为龙首并有双角，口内又衔一条蛇形龙，神兽通身镶嵌绿松石，组成龙、凤鸟、涡纹等纹饰。从外观上看，可能是一对悬鼓用的鼓架，造型古朴、奇特，可谓稀世的珍宝。

上述考古发现，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2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探索丹江流域的埋葬习俗、楚都丹阳的地望以及楚文化的发展等，均有重要意义。

六

汉代是一个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它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又在春秋战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近年的考古发现，显示了两汉文明的博大精深。

河南永城芒砀山有西汉梁国王室陵墓群，分布在芒砀山范围内的保安山、僖山、黄土山、铁角山、夫子山等几个山头上，面积约20平方公里。这些陵墓均为"斩山作郭，穿山为藏。"其中著名的梁孝王墓，依山开凿，进深60米，宽30米，高4米，由墓道、墓门、前耳室、甬道、车马室、回廊、角室、主室、侧室、祭台和排水设施组成，结构复杂，气势恢宏，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地下宫殿。过去曾发掘僖山墓和保安山墓，出有金镂玉衣、鎏金铜饰和精美玉器等珍贵文物。近年，在这里柿园村的大型崖墓内，发现墓顶及两侧壁绘有青龙、白虎、朱雀和云气缭绕的早期四灵大幅壁画，线条流畅，色彩鲜艳，形象生动，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较早、保存较好的壁画；被《中国文物报》评为1990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2年，在梁孝王墓前，发掘出大型建筑基址。南北长110米，东西宽60米。由三组建筑组成，包括石墙基、石台、排列规整的方形柱础及大量的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其中1件筒瓦上刻印有"孝园"二字，说明这可能是梁孝王的寝园建筑。汉代陵园地面建筑，除西安一些西汉帝陵外，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

这些梁国王室陵墓群，集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于一体，对于研究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研究建筑、石刻、绘画及埋葬制度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1992年在洛阳市郊区浅井头村配合建设工程，发掘一座西汉壁画墓。坐北朝南，由墓道、墓门、墓室、耳室组成，用长方形空心砖砌筑。墓内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100余件，但最重要的还是墓室的彩绘壁画。绘于用特制空心砖平铺而就的墓顶上，内容有女娲、日(中有金乌)、二龙穿璧、蟾蜍、女娲、月(中有蟾蜍和玉兔)、伏羲及云气图。每块砖的右下侧分别编有隶书一至一四的数字编号，构成一幅数米长卷的升仙图。此外，墓室

靠近墓门的东西两脊上绘有云气图。引人注目的是墓室后壁空心砖上模印猫头鹰立于枝头的图案,比较罕见。该墓在营造结构上非常严谨,各种预制带榫空心砖筑砌巧妙,再现了西汉时期的建筑结构。墓内壁画是绘制完成后再按编号安装,别具匠心。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可与洛阳1959年发现的西汉壁画墓和1976年发现的卜千秋壁画墓相媲美。在艺术史、文化史方面,都有一定研究价值。

1991年7月,在偃师县高龙乡辛村发现一座新莽时期的壁画墓,由竖井墓道、墓门、墓室、耳室组成。出土随葬的罐、仓、灶等13件陶器,均为烧沟汉墓三期器物。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用特制的空心砖砌壁、铺底和建成四坡平脊式墓顶。墓室以空心砖隔成前厅、中室、后室三部分,前厅与中室之间在地面紧靠东西两壁置以窗棂式隔栏,中间留出过道,窗棂之上各置一立柱承托横额,形成一个构栏建筑,立柱上饰以白色流云纹,横额上绘有虎头方相氏彩色壁画。中室东西两壁对称各绘两幅壁画,东壁两幅为杂技对舞图和生活起居图,西壁两幅为庖厨图和宴饮六博图。这些壁画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特别是男女对舞的画面十分罕见。后室门楣下半部砌有特制的龙、虎图案及"富贵宜子孙"的空心砖,与门额上部彩绘的月宫图、朱雀图交相辉映。

1991年8月,在洛阳东北郊朱村发现一座东汉壁画墓,由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及耳室组成。墓早年被盗掘,随葬品所剩无几,仅存耳杯、盒、勺等陶器。墓内最有价值的是在主室南壁和北壁西半部及东壁耳室券门以上均发现有彩绘壁画。壁画覆底简单,但画法细腻。先在砖壁上施以一薄层白灰泥皮,再在其上先以细笔勾勒出轮廓,然后填以红、黄、黑等色。主室北壁西半部为墓主夫妇宴饮图,画面很大,东西长2.5米,上下宽1.46米,紫色帷幔下墓主夫妇居中端坐榻床之上,面前案几上置十余件钵形食器,右侧侍立二男仆,左侧侍立二女婢。主室南壁绘有车马出行图,整幅画长4.76米,宽0.33米。东侧一男躬身双手执板形器,另一男双膝跪地,迎接车队。车队有马车6辆,均为一车一马,在第三辆马车的右侧,一人骑一白马,手执兵器,进行护卫。形象相当生动。

七

310国道是横穿河南的高等级公路,其中孟津段经过邙山。1991年7~10月,配合修路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两汉、西晋、北魏、唐、宋等历代墓葬65座。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其中尤以两座唐墓最为精彩。

69号墓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出土有彩绘镇墓兽、天王俑、马及牵马俑、骆驼及牵驼俑、男女侍俑和伎乐俑40多件,以及瓷器、陶器、铁器和墓志等。这些俑皆以高岭土为胎,低温素烧后,先涂一层白粉,再施以红、黑、绿、紫等色彩描绘而成。其中6件女乐俑和2件女舞俑制作最精。女乐俑皆跽坐,手的姿式和服饰颜色各不相同:女舞俑头绾双高髻,粉面朱唇,外穿大翻领半臂,下着曳地长裙,足登绿色尖头履,体态轻盈,婀娜多姿,栩栩如生。据墓志可知,墓主岑氏,入葬于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其曾祖、祖父、父及子均见于史书。

64号墓,单室土洞墓,平面呈直背刀形。出土随葬品42件,有墓志、三彩文武俑、骑马俑、马及牵马俑、骆驼及牵驼俑、镇墓兽、绿彩和彩绘男女俑以及鸭、鸡、猪、狗、羊、灶、井、碓、磨等陶质模型明器。其中三彩文武俑和镇墓兽,高达0.8米,釉色鲜艳,是近年河南唐墓中少见的三彩珍品。根据墓志记载,墓主屈突季札葬于武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志文记述屈突季札及其父屈突诠、祖父屈突通的一些情况,均可与两唐书中有关记载相印证。和69号墓一样,都有明确纪年,为唐墓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标尺。还值得一书的是,在孟津西山头村西南处,发掘出不知何时埋入地下的《大唐故荆府长史孙府君之碑》。碑身通高3.08米,宽1米,厚0.3米。碑首雕刻二龙戏珠图案。碑文楷书26行,满行54字,总计1240余字。碑主人系唐高宗的宰相孙处约之子、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孙俊。碑文详细记述其生平和家世,为确定孙处约的祖籍和任职,为研究唐开元年间的社会生活和灾荒情况提供可靠资料。

八

巩县(今巩义市)宋陵,是我国封建社会著名陵区之一,分布在嵩山北麓和伊洛河以南的漫坡平原上。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太祖赵匡胤用帝陵制度葬其父赵弘殷于巩县,称永安陵,是宋陵建筑的开始。其后,除徽宗、钦宗外,北宋七个皇帝都葬在巩县,还陪葬有许多后陵、宗亲皇室和大臣墓。宋陵的布局、地面建筑和石刻造像,对研究北宋历史有着重要价值。

1961年,在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北,发掘魏王赵頵夫妇合葬墓,出土有长篇墓志。1984年在宋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东北发掘元德李后陵,出土有玉谥册、玉哀册和一批越窑龙纹盘等精美瓷器。石墓门扉上线刻有高大武士像,墓室壁面皆有砖雕门、窗、桌、椅、衣架、梳妆台,墓室上部彩绘有烟云缭绕的楼阁图,墓顶上绘有银河和群星图。使我们第一次窥见了北宋皇陵地宫的全貌,对探索帝陵的建筑形制和宋代陵寝制度有重要意义。

为了做好宋陵的文物保护工作,1992年对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园、祔葬的皇后陵园和下宫遗址进行文物普探和试掘。从试掘情况看,陵前的鹊台呈正方形,底部每边长13.2米;乳台呈长方形,东西长19.7米,南北宽9.9米;门阙阙台呈长方形,东西长19.3米,南北宽9.85米。这些台基均为夯土建筑,周边还用青砖包砌。下宫1号殿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7.5米,南北宽16米,南北两侧包砖,东西两侧连以廊房。在殿基南面设有两个踏步,踏步间围以护栏。在试掘中还发现大量的龙纹瓦当、龙首脊饰、万字护栏、莲纹方砖和带有陵名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为研究和复原宋代陵寝制度,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正经历着跨世纪(20~21世纪)期间一个重大转折"。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将是"世界性的中国考古学"。作为文物大省的河南考古工作者,将努力为此作出贡献。

(原载《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河南文物概述

一

河南北依河北、山西，南靠湖北，东面与山东、安徽为邻，西边与陕西接壤，位居中原。全省面积16万多平方公里。北、西、南三面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环抱，东部为大平原。黄河自陕晋边境折向东流，横贯河南北部，在中条山和崤山之间穿过三门峡，形势险要，出峡后至孟津以东流入华北平原。淮河发源于桐柏山，流经河南南部。全省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河南简称豫，夏代属"九州"中的"豫州"，夏都阳城、斟鄩、帝丘、原、老丘等都在河南。商代为京畿地区，商的建都和几次迁都，如汤居亳、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盘庚迁殷等，大多在河南。西周时在洛阳建立王都成周，管、蔡、卫、陈、宋等大批封国皆在河南。春秋时政治中心由陕迁豫，北有晋，南有楚，郑、宋、卫在其中。到了战国，韩、魏、楚在河南形成鼎立之势。秦时于河南置三川郡、颍川郡、陈郡、河内郡，还占有南阳郡、砀郡的大部，以及东郡、邯郸郡、衡山郡、九江郡的一小部分。西汉时河南占有司隶、豫州、兖州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以及冀州、扬州、荆州的一小部分。东汉时期这一带的州、郡之治基本未变，只是都城由长安迁到了洛阳。三国魏和西晋、北魏的都城亦在洛阳。隋在洛阳建东都。唐因之在河南置都畿道，并占有河南道、河北道、山南东道、淮南道的一部分。北宋时都城在开封，于河南置京畿路、京西北路，还占有京西南路、永兴军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京东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的一部分，元代置河南江北行省，豫北地区属中书省。明、清至今均为河南省。

河南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早在1921年，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业顾问瑞典学者安特生，经批准后会同地质调查所五位工作人员在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开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工作。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梁思永等人主持了安阳殷墟的15次考古发掘，逐步建立了一套在我国进行科学发掘的方法，使中国现代考古学成为一门新兴科学。1927年7月，冯玉祥主政期间建立了河南博物馆，征集文物和其他标本，开展陈列，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建立了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职掌全省文物之保护、征集、抢救、收购、整理等工作"，并恢复了河南省博物馆。不久又建立了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同时

在安阳殷墟、洛阳龙门和辉县的百泉设立三个文物保管所，配备了各地区的文物专职干部。在其后，全省又陆续成立了省文物研究所、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中原石刻艺术馆、省文物商店、文物报社；许多地、市、县也建立了一批文管会、博物馆、文保所。除省文物局和市（地）文物园林局、文管处、文物科之外，至今全省各级文物博物馆机构共有 141 个，其中文管会 45 个、博物馆 45 个、文物工作队 11 个、文保所 34 个、文物商店 3 个、文物研究所和古建研究所 3 个。文物博物馆队伍 1950 多人。

1956 年 8 月，河南省公布一批全省古迹保护单位。1956～1957 年，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1961 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文物普查；1962 年则进行了一次全省古代碑刻、墓志和石刻的调查登记。在此基础上，1963 年 6 月公布了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253 处。1984～1986 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和复查各类文物遗存 28168 处，征集和登记流散文物 76544 件。1986 年公布了河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274 处。1961 年、1982 年和 1988 年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河南 30 处，其中近现代文物有确山县竹沟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等 2 处，石窟造像有洛阳龙门石窟等 2 处，古代建筑有登封县少室阙、嵩岳寺塔等 11 处，古遗址有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安阳殷墟等 11 处，古墓葬有密县打虎亭汉墓、巩县宋陵等 4 处。1982 年和 1987 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有河南的 5 座，即洛阳、开封、安阳、南阳和商丘县。1989 年河南公布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5 座。1982 年和 1988 年国务院公布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有河南的 3 处，即信阳鸡公山、洛阳龙门、登封嵩山，其中也都有大量的文物。此外，河南全省还有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614 处。地上地下文物之丰富，是河南的极大特点。

四十年来，河南省和各地、市的文物考古单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考古系或考古专业，为配合国家工农业各项基本建设工程，进行了大面积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为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搞了一定的主动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揭示出的许多重要遗迹现象，向人们展示了河南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与此同时，还对一批古代建筑、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和革命旧址进行修葺，使之得到很好的保护。

建国以来，在中央和省级刊物上发表的河南省文物考古发现的发掘报告、简报和论文总计在二千万言以上。同时，还编写出版了《庙底沟与三里桥》、《淅川下王岗》、《郑州二里岗》、《辉县发掘报告》、《殷墟妇好墓》、《殷墟发掘报告》、《上村岭虢国墓地》、《洛阳中州路》、《洛阳发掘报告》、《信阳楚墓》、《巩县铁生沟》、《三门峡漕运遗迹》和《白沙宋墓》等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专集，以及《河南信阳楚墓文物图录》、《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巩县石窟寺》、《洛阳龙门》、《洛阳唐三彩》、《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安阳修定寺塔》、《河南省博物馆》、《千唐志斋藏志》、《河南汉代画像石》等大型资料性图片集，还有《中原远古文化》、《郑州商城初探》、《河南考古》、《龙门石窟艺术》等研究专著。此外，又创办了《中原文物》、《华夏考古》等专业刊物，并曾发行了面向全国的《文物报》，成为显示各种考古文物工作信息的屏幕，开展文物研究的园地和宣传文物保护的喉舌。这些成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尤其是充实和提高我国历史学研究，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二

河南地下文物非常丰富。自1957年以来，首先在豫西的陕县、三门峡、渑池、灵宝等地发现了旧石器;60年代至70年代，又相继在安阳、许昌、洛阳和南召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或人类化石;80年代时则在汝州、西峡、镇平、内乡、确山等地，新发现一批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其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有汝州张湾，渑池青山、任村，陕县侯家坡、张家湾、赵家湾，三门峡水磨沟、会兴沟，灵宝朱阳、朱阳东坡，西峡赵营、莲花寺岗、冢岗、土门、小沟岭、西沟岗、龙头湾、大沟口，镇平叶湾、石羊岗，内乡马山口，南召杏花山，确山打石山等遗址。属于旧石器中期的有灵宝孟村、函谷关，三门陕王官沟，卢氏横涧，洛阳凯旋路，镇平八里庙等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南召小空山，灵宝邢家庄，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等遗址。在建国前，河南的旧石器考古还是一张白纸，上述发现就开始在这张白纸上绘出了色彩缤纷的画面，扩大了我国旧石器分布的地域。其中，尤以在南召杏花山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具有重要意义。这连同陕西蓝田人、湖北郧县人、郧西人一道，表明古人类在鄂、豫、陕三省邻接的广大地域内长期生活着。这正位于北京人化石地点和云南元谋人化石地点的中间位置，显示了我国从北到南都可能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这是认识我国南方和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河南调查或发掘的上千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展示了中原地区在原始社会晚期的繁荣景象。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全省发现此类遗址已有70余处之多。以新郑、郑州、长葛、密县、登封、汝州、鄢陵和舞阳一带较为集中，安阳、林县、潢川、信阳、卢氏、灵宝、项城等地也有发现，其中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长葛石固、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等处都经过发掘，发现了一批房基、墓葬、陶窑、窖穴等遗迹，以及石磨盘和石磨棒、双刃石铲、锯齿石镰、石弹丸、打制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陶鼎、陶钵、小口双耳壶、陶缸、陶勺、陶杯、陶盆、陶器座、陶纺轮、陶人头、陶猪、陶羊、骨簪、鹿角、兽骨、麻栎、枣核、核桃等遗物。从地层叠压关系和一些器物比较来看，仰韶文化溯源于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它丰富了对我国原始文化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得到一批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的契刻符号，还有一批七孔骨笛。这些惊人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河南境内有许许多多仰韶文化遗址，如渑池仰韶村，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洛阳王湾，汝州大张和阎村，安阳后岗，郑州大河村，荥阳秦王寨、青台和点军台，淅川下王岗，濮阳西水坡等，都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郑州大河村遗址曾发现不少房基，出土了一批描绘日、月、星辰等天文图象的彩陶片。汝州阎村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上，有用深浅不同的棕色和白色绘出的高0.37米、宽0.44米的大画面的《鹳鱼石斧图》，为我国美术史增添了重要篇章，也为研究原始氏族——部落的信仰提供了新资料。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用蚌

壳摆塑的大型龙、虎图案，更是研究原始信仰的罕见材料。这些遗存，主体面貌相同，但又有时间先后和地域差异，考古学者把它们大致划分为豫西的庙底沟类型，豫中的大河村类型或秦王寨类型，豫北的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

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龙山文化遗址遍布全省。在安阳后岗，汤阴白营，濮阳马庄，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灵宝城东寨，洛阳王湾，偃师灰嘴，汝州煤山，禹州瓦店，荥阳河王，郑州旭旮王、牛寨和二里岗，永城王油坊等许多地方，都发掘过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其中，豫东永城王油坊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在3米左右，发掘出一些方形房基和圆形房基，地坪夯打得十分坚实，其上有烧灶或烧土面，还有用褐硬土或碎陶片筑成的巢状柱础，墙基大部分保存较好，有的用褐色草泥土坯砌筑。使用夯土技术和土坯砌墙是建筑史上了不起的发明。豫北汤阴白营遗址，文化堆积层厚达5米，其遗迹、遗物之丰富是同类遗址中少见的。发现的房基有40多座，纵横排列成行有序，地基同样经过夯打，也用草拌泥土坯砌墙。还发掘出一座水井，用46层井字形木框架叠筑成井构。井的产生，其意义非同小可，对古人的定居和农业生产都有很大的作用。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地域辽阔，内涵有差别。主要可以划分为豫西伊洛地区的王湾类型，豫北的后岗类型，豫东的王油坊类型。

屈家岭文化是主要分布的湖北境内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河南的淅川、内乡、邓州、镇平、新野、南阳、南召、社旗、方城、正阳、光山、息县、遂平、上蔡、平顶山、禹州等地，也发现一批屈家岭文化的遗存。这表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可扩大到豫西南、豫南、豫中地区，也反映了黄河流域和江汉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影响。

大汶口文化是主要分布在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豫东商丘和周口地区，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畴；甚至在许昌、郑州、洛阳、平顶山、驻马店和信阳等地、市的个别地方，也发现过此类文化遗存。这反映了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发生了更多的文化交流。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奴隶制国家。文献中反映夏人在河南活动的区域是伊洛平原和登封、禹州一带。根据上述记载，从1956年开始，陆续在郑州、巩县、偃师、洛阳、陕县、三门峡、渑池、汝州、登封、禹州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对偃师二里头、灰嘴，郑州洛达庙、上街，陕县七里铺，汝州煤山，渑池鹿寺，洛阳东干沟，登封王城岗等遗址进行重点发掘，探索夏文化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小型城址，发掘出城墙基槽、夯土建筑基址和多处埋人骨架的夯筑奠基坑，还出土有青铜器残片。这里位于"禹居阳城"、"禹都阳城"和"夏都阳城"的范围，其时代在夏初积年左右。城址虽小，城墙基槽夯筑的方法也很原始，但至少已见到了城市出现的端倪。豫东偏南的淮阳县是传说中的"太昊之墟"。近年来在淮阳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又发现一处和登封王城岗同样古老的城址。城址呈方形，周长约740米，现存城墙高3米多。找到了南北2座城门，并已经发掘出来。城内有十几处高台建筑，并出有铜渣等炼铜的遗物，还发现多处由城内向城外的陶排水管道，每节管道均为直筒形，细端有榫口，可以进行套接。在4000多年前就出现这样初具规模的城市排水系统，真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平粮台古城

位于夏王朝所控制的东部边陲地区,也是商族活动的范围。在近期文物普查中,又发现了郾城县郝家台龙山文化古城址。南北长 220 米,东西宽 164 米,在城内发掘出成排的房基。闻名中外的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县城西偏南约 8 公里处的洛河故道(在今洛河南)以北,整个遗址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寨后村和辛庄五个自然村,面积约 375 万平方米。在这里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可分为一、二、三、四期,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之间的一种古代文化,以其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使探索夏文化取得新的进展。关于夏文化,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另一种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均为夏文化,还有些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而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属于商代早期文化。无论哪一种看法都表明二里头文化至少有一部分是属于夏文化。此外,通过一些考古发掘,还可知与二里头文化同时存在的山东岳石文化,已进入豫东地区的一些地方。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王朝,是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的阶段,也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安阳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 273 年的商代晚期都城,但对盘庚迁殷以前的商文化,在建国前几乎一无所知。建国后郑州商城的发现和尸乡沟商城的发掘,使人们对商文化的认识耳目一新。

尸乡沟商城在偃师县城西一带,北依邙山,南临洛河,略作南北长方形,东城墙南段内收。已探出东、北、西三面城墙,并找到 5 座城门,城内一些大道纵横相交,城内南部发现有宫城。通过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多数学者认为这里可能是商代的汤都"西亳";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太甲所放处桐宫或是商初为巩固西部边防并镇压夏人复辟而设立的一个重镇,可认为是商王朝的别都。

郑州商城是建国后的一大考古发现。周长近 7 公里,城内发掘出多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城外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磨制骨器的各类作坊遗址,出土有一批青铜重器,造型浑厚,气势磅礴,当为王室所用之物。这里很可能是商代仲丁所在的"隞都",也有学者认为是汤所居的"亳都"。

建国后对安阳殷墟又多次进行发掘和研究。已基本搞清了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布局。那规模巨大的武官村墓,惨绝人寰的人祭坑,随葬品精美绝伦的妇好墓,大量普普通通的平民墓,小屯南地的甲骨文,以及铸铜遗址、制骨作坊、建筑壁画和精美的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等等,都为研究商代晚期的情况,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此外,还有罗山后李商代晚期的息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器、陶器和木漆器。其中青铜器大多保存完好,有的甚至很少锈蚀,熠熠闪光,不少铸有"息"字铭文。息国是商王朝偏南的方国之一,其遗物兼有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特点,是商文化重要的地域类型。

西周考古建国前在河南几乎是个空白,近四十年来在洛阳北郊、郑州董寨、信阳出山店、鲁山仓头、上蔡田庄、襄县霍庄、鹤壁庞村、淮阳泥河、泌阳前梁河等地,发掘过西周的墓葬和遗址,出土了不少铜器和其它文物。尤其是在洛阳北窑大型西周前期铸铜作坊遗址中,发掘出了许多房基、地下水管道、路土面、窖穴和烘范窑,出土遗物除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外,还有不少坩埚残片和数以万计的陶范。这对研究当时的青铜铸造工艺

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春秋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在河南已发现了洛阳东周城、新郑郑韩故城、登封阳城、偃师滑城、上蔡故城、新蔡故城、黄国故城、濮阳戚城等几十座城址。新郑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目前已初步弄清了东城和西城的范围，城墙的建筑结构，宫城和墓葬区，以及冶铁、铸铜、烧陶、磨玉、制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登封阳城发现有砖铺地面的大型建筑基址，由陶水管道、三通管、四通管、贮水池和阀门坑组成的大型地下贮水和输水设施。在不少陶器上印有"阳城"戳记，解决了多年来对阳城地理位置的争论。

墓葬发掘同样是东周考古的重要收获。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信阳长台关楚墓、固始侯古堆大墓，淅川下寺楚墓、光山宝相寺黄国墓、淮阳马鞍冢大墓和车马坑等，都随葬着大批青铜器、乐器、车马器，还有木漆器、玉器和陶器，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手工工艺和经济发展水平。此外，新野出土的曾国铜器、郏县和淅川出土的江国铜器，罗山、信阳、潢川出土的黄国铜器，潢川和信阳出土的潘国铜器，潢川出土的蔡国铜器，信阳出土的樊国铜器，新郑出土的韩国兵器，温县出土的晋国盟书，洛阳出土的东周货币，扶沟出土的楚金银币等，都具有重大历史价值。

汉代是一个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河南是其中心地区之一。尤其在东汉时期，洛阳为繁华帝都，南阳是皇室故里，更成为最主要的中心。遗留下来的文物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温县西招贤村等四处大型冶铁遗址，发现有各种炼炉、烘范窑、鼓风管、耐火砖、陶范、积铁块、煤饼，其冶炼规模和铸造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郑州古荥镇的一座炼铁炉，有效容积达 50 立方米左右，可日产生铁 1 吨，这在两千年前是一个奇迹。汉魏洛阳故城保存得相当完好，城墙、城门、街道、宫殿、永宁寺塔基、灵台、明堂、辟雍、太学、刑徒墓地，历历在目。它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北魏洛阳城的形制，对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和东都洛阳的形制都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洛阳壁画墓、郑州画像空心砖墓、密县打虎亭和后士郭汉墓、南阳汉画像石墓、陕县刘家渠和灵宝张湾汉墓、永城梁孝王墓等，出土的彩陶壶、盘龙砚、透光镜、陶风车、桃都树、六博俑、戏车画像砖等等，凝聚着汉代文明深厚博大的精神。

魏晋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前前后后达三个世纪之久。洛阳有许多北魏的陵墓，在孟津官庄村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长陵和文昭皇太后陵，是一项重要收获。洛阳北魏元乂墓顶所绘的星象图，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新资料。邓州学庄南朝彩色画像砖墓，画像内容有墓主出行、历史故事和一些神禽怪兽，虽出自无名工匠之手，其艺术水平比起当时的名家可能逊色不多。渑池县火车站附近发现一座铁器窖藏，出土了从汉魏到北朝时期的 4000 多件铁器，有 60 多种器形，其中 400 多件还铸有铭文。经分析、鉴定，这些铁器包括了除合金铸铁之外的今天所有的生铁品种，其中低硅灰口铁、铸铁脱碳钢和球墨铸铁，显示了极高的水平。此外，安阳范粹墓和濮阳李云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安阳晋墓出土的鎏金铜马具，淇县高村出土的晋泰始九年(公元 273 年)神禽纹镜，对说明当时工艺技术进步、生活方式的变化、艺术风格的转变，都是难得的资料。

隋唐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隋唐东都洛阳城是当时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已经勘

察出外郭城、宫城、皇城、含嘉仓城等遗迹。在宫城内还发掘出明堂(含元殿)的大型石柱础;在含嘉仓城探出287座仓窖,已经发掘了12座。出土有刀刻或墨书的铭砖,记载着粮窖在仓城内的位置、储粮的来源、粮食的品种和数量、入窖年月、管理人员的官职姓名等。这种在地下窖穴储粮的方法,还可给今人以启示。偃师孝敬陵是唐太子李宏之墓,规模很大,冢、阙俱全,陵前石刻也较完整,是河南现存惟一的一处唐代陵墓。三门峡一带留有开元新河和栈道摩崖题记,以及集津仓和盐仓遗址,是研究我国漕运史的重要资料。安阳相州窑、密县西关窑、巩县黄冶窑等处烧造青瓷、白瓷或三彩器窑址的调查和发掘,揭示了陶瓷史发展序列中的重要一环。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洛阳唐安菩墓出土的三彩器、登封嵩山峻极峰发现的武则天金简、洛阳唐墓出土人物花草螺钿镜和金银平脱镜、遂平出土的唐代宝相花"透光镜"等,都是罕见的瑰宝。

宋金元明时代留在河南的遗迹和遗物也很多。开封是北宋都城的所在地,但因明清水患,把古都掩埋在现今地面9米以下,地面上只留有大相国寺旧址、开宝寺"铁塔"和天清寺"繁塔"等。近年来经过钻探和试掘,找到了外郭城的范围,以及6个城门和9个可能是门的缺口,其中包括著名的南薰门、新郑门、新曹门和汴河下水门,弄清了宫殿的范围和发掘了在此基础上修建的明周王府宫殿庭院建筑,发掘了在宋代州桥基础上重修的明初州桥,由此拉开了开封宋都的帏幕。巩县宋陵占地30平方公里,是我国封建社会几个著名的陵区之一,墓前成行的石刻雕像,保存相当完好。建国以来,发掘了宋陵范围内的魏王赵頵墓和宋太宗赵光义的李后陵,前者出土的墓志,后者出土的瓷器、墓门上的线刻武士和墓室顶部彩绘的天象图,都是重要的发现。此外,郏县苏辙次子苏仲南墓出土的墓志,禹州和新安宋墓的壁画,偃师酒流沟宋墓的杂剧雕砖,方城宋墓的石俑,焦作金墓的画像石或壁画或雕砖或棺板画或陶俑,郏县明墓的陶院落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新乡明潞简王墓和次妃赵氏墓,是全省最大的明墓。墓前的石雕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墓内是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宽阔的拱形顶殿堂连接而成的地下宫殿,十分壮观。宋瓷誉满天下,五大名窑中的官窑、汝窑、钧窑都在河南。经考古调查和发掘,汝州汝窑、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禹州钧台窑、鹤壁集窑、登封曲河窑、内乡邓州窑等,都有不少遗迹和遗物。

三

河南现存地上古代建筑品类齐全,包括石阙、寺庙、衙署、会馆、书院、民居、园林、砖塔、石塔、牌坊、桥梁、石窟、观星台、陵园以及华表、石柱等。

石阙是仿照木构建筑建造起来的石门观。分宫阙、庙阙、城阙、墓阙等。汉画像石中还有不少民居门阙,有些院中筑有可以观望的单阙。全国现有东汉至西晋时代的石阙有25处半,其中四川19处,山东2处,均为墓阙,在河南3处均为庙阙,即登封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而正阳东关外的半处汉阙则为墓阙,是非常难得的汉代建筑实物资料。

砖石古塔河南有530余座,约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登封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距今1400多年,十五层,高达37.045米,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密檐式砖塔。全塔各层

砖檐叠出部分，自下而上逐层递减，形成柔和的抛物线外形，使密檐与塔身浑然一体，更显得雄伟壮丽，实为千古杰作。安阳修定寺唐塔，四壁镶嵌罕见的浮雕砖，为塔中珍品。开封开宝寺塔（铁塔）高55.08米，为我国现存最大的琉璃砖塔。900多年来，虽历经43次地震，19次暴风，6次洪水，17次大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炮击、轰炸，仍巍然屹立，可谓一大奇迹。登封少林寺的塔林，闻名中外，共有古塔227座，自唐开始，宋、金、元、明、清各代均有；其形式则有单层单檐、单层多檐，方形、圆形、多边形，经幢式塔、窣堵波塔、喇嘛塔等各式俱全，堪称我国最大的古塔博物馆。

登封初祖庵大殿、济源济渎庙寝宫是著名的宋代建筑。济源的奉仙观三清殿、汝州风穴寺中佛殿、宜阳灵山寺毗卢殿和大雄殿、登封清凉寺大殿等，都是很有价值的金代建筑。温县慈胜寺大雄殿和天王殿、济源大明寺中佛殿、博爱汤帝庙大殿等均为元代建筑；其中，温县慈胜寺天王殿内还保留有元代壁画。至于明、清建筑就更多了，象登封中岳庙、少林寺，武陟嘉应观，社旗山陕会馆，浚县碧霞宫，汤阴岳庙，淮阳太昊陵等，都是保存很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其中的中岳庙大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为河南最大的单体木构建筑。还有登封观星台、安阳永和桥、开封州桥、南阳府衙、内乡县衙、浚县恩荣石牌坊、新乡七世同居坊、商丘归德府和开封城墙，又是别具一格的珍贵建筑。

洛阳龙门石窟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莫高窟齐名的我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胜地之一，从北魏孝文帝迁洛前后开始，历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隋、唐、五代和北宋诸王朝，前后营建达七百年之久。窟龛、造像、石塔、题记，无不弥足珍贵。巩县石窟寺北靠邙山，南临洛水，是北魏晚期雕琢而成的。现有五个洞窟、三尊摩崖大像、一个千佛龛和一大批小龛。规模虽然小一些，但雕刻内容丰富，技法精美，尤其是帝后礼佛图，堪与龙门宾阳洞中已被盗凿的帝后礼佛图相媲美。另如平棊、藻井上雕刻的飞天、莲花、化生等图案，壁角、中心塔柱上雕刻的伎乐供养人、神王、怪兽等，都是研究北魏雕刻艺术，以及服饰、乐器、神话故事的重要资料。巩县石窟上承云冈、龙门，下开唐代雕刻艺术的先河，是我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灿的明珠。安阳灵泉寺石窟，从东魏起，历经隋唐和北宋各代，延续达六个多世纪。在东西1000米、南北500米的范围内，有不少石窟、石塔和摩崖造像，其中在山崖壁上的浮雕石塔有200余座，还多有纪年塔铭，并刻有大量仿古结构的房屋建筑形象，被誉为“宝山塔林”。是研究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历史、佛教、建筑和艺术的珍贵资料。此外，宜阳虎头寺石窟（北魏）、新安西沃石窟（北魏）、淇县前嘴石窟（北魏）、偃师水泉石窟（北魏至唐）、渑池鸿庆寺石窟（北魏至唐）、安阳小南海石窟（北齐）、嵩县铺沟石窟（北朝）、林县千佛洞石窟（北齐）、鹤壁五岩寺石窟（东魏）、方城佛沟摩崖造像（北朝至唐）、博爱石佛滩摩崖造像（唐）、沁阳窄涧谷太平寺摩崖（隋唐和五代）、陕县温塘摩崖造像（唐宋）、浚县浮丘山千佛寺石窟（唐至明）、淇县青岩石窟（北宋）等，也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河南现存碑刻较多，其中包括难得的汉碑十余通。在南阳存有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的《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孟初神祠之碑》和东汉时期的《赵倬残碑》，鲁山县有东汉中平年间的《都乡正卫弹碑》，桐柏县有东汉延熹六年（公元163年）的《淮源庙碑》，荥阳县有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循吏故闻憙长韩仁铭》，鄢陵县有东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的《尹宙碑》，偃师县有东汉《袁安碑》和《汉故甘陵相尚书□府君之碑》，延津

县有东汉时期的《刘熊残碑》,安阳有东汉《刘君残碑》、《子游残碑》、《元孙残碑》和《正直残碑》。这些均多次被著录。1958年时在南阳市又找到了一通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的《张景造土牛碑》,是一大收获。三国时期碑刻不多,临颍县的《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与《受禅表碑》传为大书法家钟繇所写,碑文记载了汉代末年魏公卿劝进及献帝禅位于魏王的历史事件,是曹魏时期的碑刻珍品。晋碑中的佼佼者是偃师县东大郊村西晋太学遗址中出土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记述司马炎立辟雍置学官并三巡太学及皇太子再莅辟雍事。碑阴列太学生384人的郡籍姓名,其中有来自辽东和西域的。1969年又发现其碑座使之成为完碑。著名的"龙门二十品"是魏碑的杰作。卫辉北魏《吊比干文》刻石(宋代重刻),是孝文帝太和年间巡幸路过比干墓时所立。碑文字形开拓强健,峻整雄奇。登封中岳庙北魏《嵩高灵庙碑》,不仅书法高超,且对研究道教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洛阳龙门《伊阙佛龛之碑》,出自名家褚遂良之手,是几个初唐楷书典范之一。登封嵩阳书院《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气魄宏大,蔚为壮观,为嵩岳第一大碑。登封少林寺《唐太宗赐少林寺教碑》中的"世民"二字乃秦王李世民亲书草字,偃师《升仙太子碑》系武则天撰文并书写。商丘《八关斋会报德记》、鲁山《元次山碑》是颜真卿的真迹,书法浑厚雄健,气势磅礴。济源唐《奉先观老君像碑》为李审几撰文,沮渠智烈书,当为道家碑碣之冠。林县唐《三尊铭真容支提龛碑》为研究哲学、佛教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浚县大伾山后周《准敕不停废碑记》是十分难得的反映中国历史上灭佛事件的重要碑刻。安阳宋代《昼锦堂记碑》,为欧阳修撰文,蔡襄书,邵必题额,皆为名家。安阳宋《西门豹大夫祠碑》,记述了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业绩,字体工整疏朗,秀劲挺拔。濮阳《契丹出境碑》,又名《回銮碑》,是现存北宋真宗年间重要历史事件"澶渊之盟"的惟一实物见证。新乡市《大观圣作之碑》,是宋徽宗赵佶所创的"瘦金体"书体,为书法艺术中的珍品。开封市《开封府题名记碑》,刊刻了北宋历任开封长官的题名,尤以包拯令人注目。济源金代《创建石桥记》,所刻隶书犹有魏晋遗矩,为我省仅见的金代隶书刻石。虞城元代《孝烈将军祠像辨证碑记》俗称《花木兰碑》,歌颂了中华女儿的卫国壮举,被称为巾帼丰碑。登封少林寺有《息庵禅师道行之碑》,是元代日本高僧邵元撰文,还有《显教圆通大禅师照公和尚塔铭并叙》碑,碑文为邵元撰并书。这是两件记述元代中日两国僧人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碑石。1973年,在日本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画像石、碑刻拓片展览》中,曾展出上述两碑的拓片,引起轰动。在郑州市博物馆石刻长廊墙壁上,镶嵌有我国宋代文学家和书法家苏轼书写的欧阳修的散文杰作《醉翁亭记》石刻(清代重刻),可称作翰墨奇珍。内黄《荒年志碑》、灵宝《荒年实录碑》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天灾人祸,饥饿灾荒。商丘《四府水利图碑》是研究清代治水的重要资料。新野清《重修关帝庙记碑》、修武《捻军过境碑》均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此外,河南还存有历史地震碑刻、题记60余品,或简或繁地记述了十次地震的震兆、前震、余震和震害等情况,是研究河南地震历史的重要资料。

四

近现代历史的风暴也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足迹。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半个中国。太平天国三年(公元 1853 年)林凤祥、李开芳率五万太平军北伐,连克安徽亳州、河南朱仙镇,经汜水围攻怀庆府(今沁阳)。三破城池,三败清援军,全歼河北总督云占元的三千骑兵,清廷为之震动。当年北伐之军的指挥部旧址,即今沁阳县北关汤帝庙,还保存完好。英王陈玉成英勇就义于延津县城西校场,现立有纪念碑,建有纪念亭。清末白朗起义震惊中外,其在宝丰的故里和墓地犹存。开封市禹王台内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安阳市北有袁世凯墓,变革与复辟对照,泾渭分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而奋斗。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二七大罢工。当年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普乐园旧址,在 1971 年修建了二七纪念堂。在郑州工会负责人司文德、汪胜友英勇就义的长春桥,则修建了二七纪念塔。1925 年,李大钊及王若飞来河南领导工作,肖楚女在河南创办《中州评论》,同年 10 月建立了中共豫陕区委。开封市西大街 3 号的一幢临街二层小楼,就是区委的旧址。1928 年至 1934 年,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二十五军,在豫南进行革命斗争,其司令部旧址分别在新县水口寺(今三堡村)、黄谷畈村和方湾村,都很好地保护了下来。在方湾村还有郑位三亲笔写的两条标语:"为保障秋收秋耕坚决扩大二十五军,打破敌人新进攻"和"十月革命指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条出路。"当年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列宁高级学校、航空局、兵工厂等革命旧址也都保存了下来。有的还进行了维修,征集了大量革命文物,建立了革命博物馆。

吉鸿昌烈士是杰出的抗日将领,1934 年惨遭蒋介石杀害。扶沟县吕潭镇有他的故居,其墓地由扶沟县西吉庄迁到郑州市烈士陵园内。杨靖宇烈士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早在大革命时期就领导了"五万农民围攻确山"的武装起义;1940 年在东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壮烈殉国。其故居在确山县李湾村,是一座四合院,院内有他少年时亲手植的一棵槐树。故居内建有纪念馆。彭雪枫烈士是中共优秀党员,著名的军事家,功垂祖国,1944 年在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牺牲。在其牺牲地立有纪念碑,在烈士故乡镇平县建有纪念馆。此外,民权李馆地道战旧址,巩县上庄村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旧址,渑池八路军兵站、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永城马家集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旧址、确山竹沟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等,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南进行的可歌可泣英勇斗争的纪念物。漯河的受降路、受降亭则是抗日胜利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解放战争这段两种命运决战的纪念物主要有以下几处。1947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在台前、范县一带胜利渡过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的序幕。台前县的孙口是几处渡河地点中的一个,现立有渡河纪念碑。商丘县北关和菜园村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和中共中

央中原局扩大会议旧址，是很有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之一。

这些近现代革命斗争的丰碑，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垂不朽。

丰富的历史文物和近现代文物，象繁星一样遍布在中州大地上。这是我们祖先和革命前辈留下的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建国以来为历史、考古、建筑、艺术、体育、卫生、农业、水利、气象、地震、采矿、冶金、交通、纺织等许多部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并为发展旅游事业、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无可替代的条件。我们为了要研究利用文物，就需要加强保护文物，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的出版，标志着河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共收录不可移动的文物点 11387 处，其中古遗址 3653 处，古墓葬 2618 处，古建筑 2118 处，古石刻 1976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 894 处，近现代典型建筑 34 处，其它文物点 94 处。

（原载《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 年）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河南专题文物简论

一、河南省全国重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迄今,河南省共有全国重点文保护单位3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27处。

在河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1961年3月国务院首批公布的有13处,1982年2月第二批公布的有3处,1988年1月第三批公布的有14处。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1963年6月首批公布了253处,1986年11月第二批公布了274处。这代表了河南现存文物的精华,也反映了建国后河南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

上述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类252处。其中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和南召杏花山与小空山遗址是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新郑裴李岗、长葛石固、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掘,标志着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端。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等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永城王油坊、洛阳王湾、汝州煤山、汤阴白营等遗址,均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对其出土文物研究的成果,多已成为中原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标尺。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和郾城郝家台遗址都发现有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遗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推动了夏文化探索的深入开展。郑州商代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整个商代考古研究中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安阳殷墟的发掘已历时60余年,它丰富的考古学内涵为我国奴隶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实物资料。古遗址类中的一批重要城址如新郑郑韩故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等,象耸立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记载着中原悠久历史文明的发展道路。著名的瓷窑址有禹州钧台钧窑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鹤壁集瓷窑址、修武当阳峪瓷窑址等。巩县黄冶窑遗址则作为独树一帜的唐三彩的故乡而驰名。而巩县铁生沟冶铁遗址,林县正阳集冶铁遗址等,展示着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

古墓葬类计36处。其中南阳的张衡墓和张仲景墓,是我国汉代两位杰出的科学家的长眠之地。巩县宋陵规模宏大,石像生粗犷豪放,展示了宋代帝王陵寝规制和雕刻艺术水平。历代封建帝王陵墓还有孟津东汉光武帝陵、禹州后汉高祖刘知远睿陵、新郑后周太祖郭威嵩陵、世宗柴荣庆陵等;其它封建社会历代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科学家的墓葬有:郾城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墓,偃师唐代大诗人杜甫墓,孟县唐代文学家韩愈墓,郏县北宋文

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坟,伊川北宋理学家邵雍墓、二程(程颐、程颢)墓、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墓,沁阳明代律历学家朱载堉墓,固始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墓等。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墓坐落在永城芒山南麓。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淅川下寺墓群均有大批精美文物出土。

古建筑类153处。登封汉三阙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嵩岳寺塔、开宝寺塔(铁塔)挺拔秀丽,历千年而不倾。洛阳白马寺以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而知名。登封观星台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社旗山陕会馆建筑风格独具。河南现存的古代建筑精华,时代自汉迄于清末,包括衙署、宫殿、寺院宫观、园林塔桥、名人故居、民宅坊阙等,构成了一部中原地区上下两千年的形象的古代建筑史。

石窟寺及石刻、造像类73处。洛阳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早已闻名遐迩。巩县石窟寺中的"帝后礼佛图"场面恢宏,人物刻画细腻传神,为中国现存同类雕刻中最完整和精美者。其它小型石窟12处,多开凿于北魏、北齐至隋唐时期,是佛教艺术的珍贵史料。著名的石刻造像有温塘摩崖造像、田迈造像碑,寺沟造像碑等。曹魏、西晋时期的《受禅表碑》及《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和《辟雍碑》,当属不可多得的珍品。唐代《元次山碑》、《升仙太子碑》、《石淙河摩崖题记》等均有重要的史料和书法价值。《大唐嵩阳观记圣德感应颂碑》为国内罕见巨碑,宋金元碑刻中《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昼锦堂记碑》、《回銮碑》堪称碑刻之上品,《唐兀公碑》是蒙汉两族融合的实证。数量较多的明清碑刻,从农业、水利、地震、灾荒、农民起义等不同侧面反映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

近现代史迹43处。沁阳县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围攻怀庆府指挥部旧址"犹存。英王陈玉成慷慨就义于延津县城西校场,旧址现立有纪念碑。宝丰县大刘村,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农民起义领袖白朗的故居和安息之地。新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旧址保存有丰富的土地革命遗迹,忠实地记录了大别山区根据地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确山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旧址、永城的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旧址、民权李馆地道战旧址等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遗迹。台前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渡黄河纪念地,商丘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等是解放战争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彭雪枫等烈士的纪念建筑物,表达了中原人民对烈士的永久怀念!

二、河南省已发掘的重要遗址、墓葬

河南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首次发掘了渑池仰韶村遗址,出土一批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物,后经考古学界命名为仰韶文化;1928~1937年,对安阳殷墟先后进行的15次发掘,奠定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

建国以来,旧石器时代遗址重点发掘了安阳小南海和南召小空山,均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全省目前共发现70余处。重点发掘了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长葛石固、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等遗址,从而确立了中原地区一种新石器

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遗址先后发掘了安阳后岗和大司空村、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处。确立了仰韶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年代序列，推动了对整个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研究。

河南龙山文化遗址重点发掘了安阳后岗、洛阳王湾、陕县三里桥、郑州旭旮王、汤阴白营、永城王油坊、汝州煤山等处，在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均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堡遗迹，为研究我国城市的起源并进而研究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河南也是我国古代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之地。在禹州谷水河、孟津寺河南、偃师滑城、郸城段寨、淮阳平粮台、商水章华台、周口水灌台等遗址中均出土有大汶口文化的遗迹和遗物。淅川下王岗和黄楝树、社旗茅草寺、平顶山寺岗等遗址中均发掘出屈家岭文化的遗迹和遗物，便是这种交流和融合的实证。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揭开了探索河南境内夏文化遗存的新篇章，并由此确定了二里头文化。在此前后发掘的郑州洛达庙、巩县稍柴、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等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此类遗存。

商代遗址发掘及其成果引人瞩目。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掘，确立了商代前期两种文化堆积——二里岗上层和下层。继之发现的郑州商城，发掘了宫殿区、作坊址、墓葬等。基本搞清了布局。80年代初，又发现了偃师尸乡沟商城，其地望正与文献记载中的商汤所居之西亳吻合。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有许多重要收获。武官村大墓、一大批祭祀坑、妇好墓的发掘，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都极大丰富了"殷墟学"的文化宝库而为海内外注目。此外，罗山后李商代晚期息国贵族墓地的发掘，丰富了人们对商代晚期方国文化面貌的认识。

两周时代考古重点发掘了一批城址和墓葬。其中有洛阳东周王城、登封阳城、新郑郑韩故城等。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温县盟誓遗址的发掘，都有许多重要的新发现。两周时期墓葬主要发掘有洛阳庞家沟西周墓，中州路东周墓。后者的发掘及对这批墓葬随葬品的七期划分，奠定了中原地区东周考学研究的标尺。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光山黄君孟夫妇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墓葬、信阳长台关楚墓、淅川下寺楚墓、固始侯古堆大墓、淮阳马鞍冢楚墓及车马坑，均有大批精美文物出土。

三门峡和泌阳秦墓的发掘，是河南秦代考古的重要发现。汉魏洛阳城经过近30年的勘察试掘，已基本了解城址内外布局。并重点发掘了南郊明堂、辟雍、灵台及太学等礼制建筑。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温县西招贤村等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展示了汉代我国在钢铁冶铸、加工技术方面的高度成就。洛阳烧沟汉墓的发掘及研究成果，建立了中原汉墓编年的标尺。密县打虎亭汉墓、后士郭汉墓均为大型东汉壁画、画像石墓，南阳地区发掘的大批汉画像石墓，形象地再现了汉代达官显贵们的奢侈腐化的生活，并显示了汉代画像石粗犷豪放的独特艺术魅力。豫东永城僖山汉墓出土两套金缕玉衣和一批精美玉器，是河南近年来汉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魏晋南北朝遗存主要发掘了一批墓葬，如：洛阳北魏元邵墓、元乂墓，孟县北魏司马悦墓，邓州南朝彩色画像砖墓。北齐时期的安阳范粹墓和濮阳李云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北朝青瓷。

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的发掘,基本弄清了它们的形制、布局。北宋东京城勘探试掘,其面貌已初步揭示。隋、唐、宋、元瓷窑遗址的发掘硕果累累。安阳相州窑、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汝州严和店窑等均发掘出大批色彩纷呈、风格独具的瓷器和烧瓷器的作坊遗迹。这一时期墓葬的发掘有洛阳唐安菩夫妇墓,出土了一批三彩器;陕县姚懿墓、偃师杏园一批唐墓的发掘,均有重要史料价值。巩县宋陵李后陵墓室顶部的天象图,墓门巨幅线刻画像可谓重要的考古收获;50年代初发掘的禹州白沙宋墓,其墓葬建筑形制及壁画内容可称中原地区宋代墓葬的代表;焦作金墓中的画像石、壁画、雕砖、陶俑等为研究金代的建筑、雕刻、绘画、舞蹈、戏曲、杂剧等艺术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荥阳明代原武温穆王墓中发现内容丰富的精美壁画。郏县明墓中出土的两套完整的陶院落,为研究明代封建地主的家庭生活及明代民间建筑增添了新资料。

三、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河南省境内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处,即洛阳、开封、安阳、南阳和商丘;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15处,包括有郑州、许昌、禹州、济源、浚县、淮阳、淇县、汝南、沁阳、新县、竹沟、社旗、荆紫关镇、朱仙镇,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有些是历代的都城,有些是名胜古迹、历史文物荟萃之地,有些是古代的商埠市肆繁华之处,有些是近现代革命斗争的根据地,还有的集都城、名胜古迹、革命斗争史迹于一身。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河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

曾作为都城的有:洛阳、开封、安阳、郑州、新郑、商丘、淮阳、许昌。洛阳,自周以降,历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先后建都于此,素有"九朝故都"之称。有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故城等遗址,还有龙门、白马寺、关林、潞泽会馆等石窟和古建筑群。开封古称大梁,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魏国迁都于此。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代晚期均建都在这里,被誉为"七代京城"。现有北宋东京城遗址,还有铁塔、繁塔、禹王台、大相国寺、延庆观、山陕甘会馆等宋、元、明、清建筑。又有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安阳为商代晚期都城,以著名安阳殷墟的宫殿区、妇好墓、甲骨文、青铜器称著于世。还有天宁寺塔、小白塔、高阁寺等古代建筑,以及袁世凯墓等。郑州为商代前期都城,发现有周长近7公里的城垣,还有宫殿区、铸铜、烧陶及制骨等手工作坊遗址。市北有大河村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市内还有城隍庙、文庙、清真寺等古建筑。这里又是二七大罢工纪念地。新郑为郑韩故都,城墙部分保存完好,宫殿区、墓葬区及冶铁、铸铜、烧陶、制玉等作坊均已发现。还有后周皇陵、欧阳修墓、凤台寺塔、卧佛寺塔等,商丘为商汤发轫之地,周为宋都,汉属梁国。现存有明归德府旧城,城墙、城门和棋盘式街道保存较好。阏伯台、壮悔堂、梁园遗址尚存。还有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纪念地。淮阳为陈国都城,楚顷襄王亦迁都于此,陈胜、吴广由此立业。现存有平粮台古城址,太昊陵古建群,还有弦歌台,记述了孔夫子周游列国的足迹。许昌为魏都旧地,春秋楼、灞陵桥千古传颂。

名胜古迹较多的有:南阳、济源,浚县、淇县、沁阳、汝南。南阳为古宛城,东汉时称南都,其城垣遗址尚存。汉代画像石刻博大精深,别具一格。汉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大医学家张仲景都长眠在这里,其墓地保存完好。医圣祠、武侯祠等古建群错落有致。王府山,以石叠山,下有洞,上有亭,匠心独运。济源西有王屋山,因愚公移山而名扬天下。现有奉仙观,济渎庙、阳台宫等古建群。浚县有大伾山、浮丘山,山上有天宁寺、碧霞宫等古建群和千佛洞等石窟,还有摩崖题记和历代碑刻300余品,淇县为古朝歌所在地,现今保存有纣王墓、摘心台、鹿台等遗存。沁阳为著名的怀庆府,有金代天宁寺三圣塔,还有雄冠全省的清代清真寺。太平天国北伐军围攻沁阳,达两个月之久,当年的指挥部旧址汤帝庙保存较好。汝南历代建州设府,保存有悟颖塔、石拱桥、天中山、开元寺、小南海等古代建筑。

古代的商埠有禹州、社旗、荆紫关镇、朱仙镇。禹州为古阳翟,又是钧瓷的发祥地和药材集散地,会馆、店铺、民居等古代建筑比比皆是。县东北还有明代周藩王的墓地。社旗是古老的商业集镇,保存有规模宏大的山陕会馆。会馆周围还有瓷器街、铜器街、山货街等,板门店铺林立。淅川荆紫关镇被称为"北通秦晋、南接吴楚的水旱码头",南北5里长街有八大帮会、十三家骡马店、二十四家商行。还有平浪宫、万寿宫、禹王庙、清真寺、法海寺等古建筑群,鳞次栉比,古色古香。开封朱仙镇曾因岳飞大破金兵于此而载入史册,也是著名的商业集镇,历史上曾与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齐名,称为北宋全国四大名镇。现存岳飞庙、关帝庙、清真寺等古建筑群。镇内旧有木版年画作坊已经恢复。

新县是大别山中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镇,是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全县保留有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军委、中共鄂豫皖边区省委、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列宁高级学校、军委航空局等革命旧址80余处。确山竹沟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处重要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均曾设于此。刘少奇、彭雪枫、李先念等旧居都已修复。

四、河南省旧石器时代遗存

自1957年以来,在豫西的灵宝、陕县、三门峡、渑池等地相继发现了旧石器。以后60年代和70年代,又先后在安阳小南海、许昌灵井、南召杏花山等地发现一批旧石器和人类化石。迄今,河南境内旧石器主要出土点,见诸报导的发现,共约30多处。

河南旧石器遗存的分布,大都集中在伏牛山——秦岭一线的豫西及豫西南地带,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是太行山东麓的惟一发现。京广线以东的辽阔地区,除新蔡一地发现一件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人工切割的鹿角化石以外,仍是大片空白区域。

目前河南境内共发现21件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这批资料,除南召杏花山1枚猿人牙齿出土地点清楚,有可靠的层位外,其它皆从淅川、洛阳、三门峡、卢氏等地拣选或采集而得。其中包括人牙齿16枚,残枕骨4块。据对这些人类化石的研究结果,他们分属于早期和较晚期的直立人,晚期的智人类型,可以分别代表河南境内古人类发展的三个不

同阶段。

河南目前已在34个地点发现出土一大批旧石器。其中以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的发现和试掘的资料最为重要。小南海遗址共出土各种石器7078件,多数是石片石器。石片长而薄,常见呈长方形、圭形,一般长约为2~4厘米。大量的以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而生产的石片石器的存在,是小南海文化的重要特点。此外,许昌灵井出土石器达1353件,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绝大多数都是细石器。还出土有相当多的动物化石,其时代比安阳小南海遗址稍晚而又相衔接。灵井遗址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有更多理由相信,黄河流域可能是产生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文化的摇蓝。

对河南发现的旧石器的综合研究表明,这批旧石器的制作技术,广泛使用锤击法,偶用砸砧法,而安阳小南海遗址则远承中国猿人北京人文化传统,主要使用砸击法。旧石器工具以刮削器为主,另包括大小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和石球等几种,河南旧石器从生产工具类型和生产方式等多方面考察,证实它大致属于华北以小石器为主体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河南地处中原,正是旧石器文化南北交汇的重要中间地带。然而目前旧石器资料的发现却显得不够丰富,与这种地位很不适应。根据河南境内旧石器遗存发现的线索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河南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有希望发现的地方有四处:一是豫北地区的太行山东麓,从安阳直南,可向西折向中条山东段的济源山丘间;二是豫西地区的黄河两岸,从孟津而西直到灵宝境内;三是豫西南地区的南阳盆地边缘山麓,此处可分为方城而西,顺伏牛山脉到西峡沿丹江而入淅川,又可从方城而南,沿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相连绵的山带直到淮水之源;四是豫南地区的桐柏山麓,从信阳向东到豫皖交界处。其中,最有希望的地区,在豫西的豫、晋、陕交接地带和豫西南的豫、鄂、陕交接地带(南召、方城包括在内)。我们期望今后河南省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能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五、河南省裴李岗文化遗址

裴李岗文化以最早发掘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而得名,是分布在黄河流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约8000年左右。

全省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70余处,多分布在郑州、洛阳、汝州、漯河四地之间的范围之内。经发掘有10余处,以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北岗、长葛石固、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等遗址最为重要。发掘出房基、窖穴、陶窑、墓葬等遗迹;出土有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还有猪、羊、人头等陶塑艺术品。而舞阳贾湖出土有契刻符号,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有的契刻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还出有一批七孔骨笛,至今仍可吹奏,令人惊叹不已!

裴李岗文化有着独特的文化面貌。石器以磨制为主,也有少量打制细石器,鞋状附四足石磨盘和圆柱形石磨棒为裴李岗文化的标志,舌形双刃石铲和锯齿石镰也是特有的工

具。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褐陶。钵形鼎、小口双耳壶、篦点纹夹砂红褐陶鼎、罐等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物。房址均为半地穴式,以圆形最多,个别为方形,周围有柱洞,中间或靠后壁有灶;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多随葬有石器、陶器,有些墓室还挖有壁龛。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各种兽骨,以及少量的石陶弹丸、骨镞,还有麻栎、枣核、核桃等。说明裴李岗文化的氏族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还有一些家畜饲养、狩猎和采集。

裴李岗文化按其地域、文化内涵和相对年代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分布在偏北部丘陵地区,相对年代稍早的裴李岗类型;另一种是分布在偏南部平原地带,相对年代稍晚的贾湖类型。

裴李岗类型遗址面积较小,灰层较薄;石磨盘数量多,为鞋底形,四足较高;陶器中红陶较多,火候较低;以小口双耳球形壶、钵形鼎较多,还有直沿钵;纹饰中有篦点纹、篦划纹。

贾湖类型遗址面积一般较大,灰层较厚;石磨盘数量少,且出现有尖顶矮足磨盘;陶器中灰陶增多,火候稍高;出现斜肩壶、圈足壶、小口折腹壶和敛口钵;纹饰中有细绳纹。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和石器,以及房基的结构和造型,有一些为仰韶文化所承袭。在长葛石固、汝州中山寨等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层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叠压关系。裴李岗文化的细石器和许昌灵井地区的细石器有些相似。由此可说:裴李岗文化填补了灵井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的一段空白。

六、河南省仰韶文化遗址

仰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河南西部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是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大约经历了2000多年漫长的发展历程。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首次发掘渑池仰韶村遗址,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端。其后我国学者还发掘了安阳后岗、浚县大赉店等仰韶文化遗址。尤其1931年梁思永对后岗遗址的发掘,依据商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的地层关系,第一次判明了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

建国以来,河南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约800处,分布地域遍及全省,尤以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最为集中,其中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渑池仰韶村,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孙旗屯,偃师汤泉沟、高崖、宫家窑,汝州大张,禹州谷水河,安阳后岗、大司空村,濮阳西水坡,郑州大河村、林山寨,荥阳青台、点军台,以及南召二郎岗,镇平赵湾,鲁山邱公城,淅川下王岗等。

仰韶文化的基本概念是: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畜牧业,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以各种磨制石器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烧制陶器以红陶为主,有一组具有特色的陶器群,其中以彩陶最富特征,人们定居的村落有着一定的布局形式,具有

集中的葬地和一定的埋葬方式,大致反映了中国母系氏族社会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面貌。

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中,房子以半地穴式最为流行。另有长方形和方形地面建筑。在庙底沟、王湾等遗址中发现,居住面底层用红烧土和砾石铺垫,上层涂抹草泥土,有的使用白灰涂墙。大河村遗址中还发现地面连间式建筑由 4 座大小不一的房间东西并列,分别面南和朝北各开门户,代表了一种比较进步的建筑形式。

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陶窑以横穴窑较为常见,它的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形式;偃师汤泉沟遗址中发现一座竖穴窑,火膛中有土柱支撑上部窑箅,窑箅上排列 7 个火孔。

仰韶文化的墓葬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在部分遗址也发现有少量的合葬墓,小儿则盛行瓮棺葬,多以小口尖底瓶为葬具,在鲁山邱公城、伊川土门、汝州城关等处均发现有成人瓮棺葬,以缸作为葬具。

农业生产在仰韶文化时期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在洛阳王湾、孙旗屯,郑州林山寨,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均发现有炭化的粮食遗存。大量的用于开垦、耕作、收割用的斧、锄、铲、刀等石器的出土,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仰韶文化遗址中的出土文物以彩陶最富特色。如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绘有 30 多种图案,除有动物、植物、几何图案外,还有太阳、月亮、星座、日晕、旋风等自然现象纹饰,有的简单数笔,但形象生动,十分传神。而汝州阎村出土的大型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由于仰韶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分布地域又广,构成了多种既相近又有区别,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分离的文化面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其中有洛阳以西的庙底沟类型,洛阳到郑州之间的大河村类型,豫北的后岗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等。

庙底沟类型,陶器以泥质红陶最多,典型器物有双唇小口尖底瓶、敛口曲腹钵、敛口鼓腹罐、盆形灶等;彩陶纹饰以花瓣纹最为突出,多饰在彩陶盆上。

大河村类型出土灰陶和褐陶较多,典型器物有折腹鼎、釜形鼎、敛口深腹罐、大口束腰尖底瓶、曲腹彩陶钵、双连壶等。彩陶纹饰丰富,包括有太阳纹、月亮纹等。

后岗类型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彩陶类量不多,典型器物有盆形鼎、罐形鼎、敛口鼓腹圜底钵、锥刺纹盆等,其中以红顶碗、红顶钵最为典型。

大司空村类型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较多,红陶较少。除素面外,还有彩陶,一定数量的篮纹和少量的弦纹、线纹、方格纹、锥刺纹等。典型器物有敛口钵、折腹盆、斜腹碗、高领罐等。

下王岗类型以红陶和棕陶为主,器形有锥状足罐形鼎、深腹罐、平底盆、圈足碗、小口长颈壶、器座、圈足杯等。彩陶以黑彩较多,也有红色和橙黄彩,多绘以几何图案。

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不仅年代早,延续时间长,而且还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纵向看,向前上溯与裴李岗文化关系密切,向后延伸发展为龙山文化;从横向来看,向东与山东大汶口文化相互交流,向南与湖北屈家岭文化息息相通,即使远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也可以找到仰韶文化的影响。

七、河南省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存

大汶口文化是以1959年山东泰安发掘大汶口遗址而得名。这是一种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大约6300~4500年。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河南东部也有大汶口文化遗存分布,主要在商丘和周口地区。如夏邑三里堌堆、睢县周龙岗、民权吴岗、鹿邑栾台和武庄、郸城段寨、商水章华台、西华陆城、淮阳平粮台等。此外,在许昌、郑州、洛阳、平顶山、驻马店和信阳等地市也有大汶口文化遗存发现。如郑州大河村、禹州谷水河、鄢陵古城、孟津寺河南、偃师滑城、汝州大张、平顶山寺岗及上蔡十里铺、段寨、钓鱼台、蝻虎寺、晒书台、信阳阳山等,表明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已到达豫西、豫中和豫南地区。

在上述遗存中,发掘出大汶口文化的窖穴和墓葬,出土有白陶鬶、褐陶鬶、高柄镂孔豆、高柄豆、高柄镂孔杯、高柄杯、觚形杯,长颈壶、宽肩壶、背壶等大汶口文化遗物。在有些遗址内,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堆积。河南大汶口文化遗物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中期。河南地区这些考古发现,不但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三者之间相对年代的发展序列找到证据,也为研究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影响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屈家岭文化是以1955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发掘而得名。这是一种分布在长江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河南的考古发现看,距今约5000多年。屈家岭文化的相对年代从地层叠压关系看,要早于龙山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在河南境内发现近140处之多,比较重要的遗址有淅川下王岗和黄楝树、内乡茶庵和朱岗、邓州太子岗、镇平冢上寺、新野凤凰山、南阳黄山、南召竹园、社旗谭岗和茅草寺、唐河寨茨岗、方城平高台、遂平杨台寺、正阳王家冢、光山徐畈、息县秦楼、上蔡十里铺,禹州谷水河、郑州大河村等,主要集中在南阳地区,豫南和豫中也有发现。其分布范围由湖北到豫西南,并扩大到颍河、汝河和洪河上游,甚至到达黄河南岸。

不少遗址经过发掘。著名的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出25座屈家岭文化的房基,都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地上建筑,有些为单间房子,有些为双间房子,均有木骨泥墙和白灰面地坪。还发掘出各种类型的灰坑、土圹墓、瓮棺葬。出土陶器有鼎、甑、瓮、澄滤器、罐、缸、壶、尖底器、钵、盆、杯、器盖、纺轮等,石器有斧、锛、铲、凿、镰、刀、网坠、镞、砺石、杵和臼等,还有骨器、蚌器、装饰品等。其中以折腹镂孔高足陶杯、蛋壳黑陶塔式高足杯、彩绘陶壶最为精美。而陶纺轮有角边的、弧边的、折边的、平面的、鼓面的,造型各异,有红色的、灰色的、黑色的,有些还彩绘有各种图案,这在同类遗址中是罕见的。石杵和石臼是加工稻谷的工具,显然要比裴李岗文化石磨盘、石磨棒进了一步。还发现有稻壳、稻秆,说明当时已种植水稻。在其他遗址也有许多重要发现。河南境内为数众多的屈家岭文化遗址,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文化。

以山东为主体的大汶口文化和以湖北为主体的屈家岭文化,其分布都深入到河南境

内,并在河南中部地区交汇。在一些遗址内同时发现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物和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遗物,只是由于是调查采集或遗物太少,一时还难以搞清二者的关系。但四面八方的文化汇集中原地区,无疑促进了中原地区古代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使周围各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使中国古代文明以其连绵不断、博大精深而在全世界大放光彩。

八、河南省龙山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是以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河南的龙山文化遗址在30年代初首次发现于安阳后岗,以后在其它地方迭有发现。其文化面貌以饰绳纹、篮纹、方格纹的灰陶器为显著特征,与山东地区发现的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大约在50年代中晚期,考古学界称之为"河南龙山文化",以资与其它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相区别。

迄今,河南各地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约近千处之多。其中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豫北地区的安阳后岗、汤阴白营,豫东地区的永城王油坊、淮阳平粮台、鹿邑栾台,豫中地区的郑州旭旮王、后庄王、郾城郝家台,豫西地区的洛阳王湾、矬李、孟津小潘沟、汝州煤山、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陕县庙底沟、三里桥,豫南地区的淅川下王岗等处。据放射性碳素测定,河南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当公元前2800~2000年之间。

河南龙山文化的聚落遗址,发现的房子既有半地穴地的方形、长方形、圆形房基,也有大量的地面建筑,室内居住面加工成白灰层,置有烧灶,多用草拌泥叠筑土墙。长方形连间式地面建筑的房子,各地均有发现。汤阴白营遗址的房子,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墙壁除直接采用草拌泥垒筑外,更有相当数量的木骨泥墙。在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晚期城堡遗址中,均有建筑在夯土台基上面的分布有序的排房。在安阳后岗、八里庄,汤阴白营,永城王油坊,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都发现有用土坯砌筑的墙壁,揭开了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新的一页。各地龙山文化遗址中多有水井发现。汤阴白营遗址的一眼水井,平面呈圆角方形,井壁以木棍穿榫交叉叠合成井字形木架支护四壁,结构比较复杂。遗址中还普遍发现窖穴、陶窑、乱葬坑等遗迹,多方面反映出当时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

河南龙山文化的内涵十分复杂。大约从70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学者根据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将它划分为王湾类型、后岗类型、王油坊类型等几个不同的类型,它们各有不同的文化来源,发展去向也不相同。

王湾类型主要分布在以洛阳平原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和嵩山周围的汝、颍河上游。这一类型的陶器多饰方格纹,次为篮纹和绳纹,常见器形为圜底鼓腹罐形鼎、小平底深鼓腹罐、盆式斝和甑、空足或实足鬶,另有折腹盆、敞口碗、筒形杯及澄滤器等。极少见鬲、高圈足盘及敞口平底盆。

后岗类型在河南境内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黄河以北地区。这一类型的陶器以饰

绳纹为主，次为篮纹及方格纹，常见器形有鬲、盆式或罐式斝、罐形鼎、深腹罐、敞口平底或折腹盆及带桥状双耳或握手的器盖。这一类型少见平沿鬶、澄滤器等。

王油坊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淮之间的豫东地区，为广阔的黄河沉积平原。这一类型的陶器器表以饰方格纹为主，次为篮纹和绳纹。常见器形有罐形扁三角状足鼎、袋足甗、甑、深腹罐、高圈足盘、敞口平底盆、尊形器、斜壁碗、杯及澄滤器等，缺少鬲、斝等。

应该指出：豫中地区的龙山文化、陕晋豫交界处的三里桥龙山文化和陕豫鄂交界处的下王岗龙山文化遗存，也有人主张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类型；也有人主张上述三种文化，只是不同程度地受到邻境诸文化的影响，或可归入相近的文化系统。

河南龙山文化的上述若干种类型，惟王湾类型自身从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再发展为二里头文化的上承和下延的序列比较清楚。这一类型的分布区域正与历史文献记载中夏族活动的区域吻合。一般认为属于夏（族）文化范畴。而后岗类型和王油坊类型的分布区域，是文献记载中商族先公的活动地域，一般认为它与相当于夏代的先商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青铜冶炼业，而制陶业、建筑业及石器、骨器、蚌器、玉器制造业，也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较高水平。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等城堡的出现表明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这一切，表明至少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序幕已经揭开，而踏上文明社会的门槛了。

九、河南省古城址

经过调查，目前河南保存历代古城址计有 320 余座。它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的轮廓。

河南古代城址专题图，收录自新石器时代至宋代古城址 269 座，它们是河南现存古城址的主体。

早在距今约 4000 余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城堡，它可以称之为城市发展史上的胚胎期。目前，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都经过大面积科学发掘。本世纪 30 年代初，还在豫北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中发现过应该也属于城堡的夯土墙基。

这一时期的城堡，大略呈正方形，面积约在 1 万至 4 万平方米左右，城内布局主要是排列有序的排房建筑，城垣的夯筑技术还比较原始，淮阳平粮台古城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南门的门卫房，南门路土下敷设的陶排水管道，说明当时的城市建设，已经具有一定的规划。

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分别是商代前后期的都城遗址，它们也都经过长期的大面积科学发掘。

这一时期的城址规模扩大。偃师尸乡沟商城面积为 190 万平方米，郑州商城更达约

300万余平方米，安阳殷墟的范围约30平方公里。城垣用版筑法分层分段夯筑（安阳殷墟迄今未发现城垣），宫殿区集中在城内某一特定区域，其中偃师尸乡沟商城内大型宫殿基址另有围墙环绕，从而形成了城市建设中大城垣套小城垣的双重城垣的封闭式格局。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区环绕城垣分布在城外围，墓葬区也多分布在城外。

东周时期，城市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河南经过调查发掘的东周列国都城和重要城邑有新郑郑韩故城、上蔡蔡国故城、潢川黄国故城、濮阳戚城、偃师滑城、辉县城关共城、淮阳陈楚故城、淇县卫国故城、洛阳东周王城、登封阳城、商水扶苏城、淮滨期思古城等30多座。

列国都城面积悬殊很大，郑韩故城达20余平方公里，蔡国故城约7平方公里，黄国故城仅约3平方公里，列国一般城邑约在1平方公里左右。

列国都城一般分为郭城、宫城两大部分，各以城垣环卫，宫殿区一般建在高大的夯土台基上，郭城内置市，有民居分布其中。宫城、郭城内均有如冶铁、铸铜、制陶、铸钱等手工业作坊分布，城垣外深池环绕。陵墓区城内外皆有分布。为解决当时密集的城市人口和手工业生产用水问题，都城建置多选在河流的旁边。

汉魏洛阳城标志着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成熟。迄今在现存的东西北三面城垣（南垣因洛河北移而冲毁）共探出10座城门，四周城垣故作曲折，一些城门外筑造双阙，大城及西北隅金墉城垣外侧设墩台，护城河宽达40米，说明洛阳城的一套防御设施更趋完备。城内主要建筑如宫城、衙署，寺院、里坊等以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为准依次规划，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和灵台、太学设于南郊。其布局大致体现了帝王之居建中立极，官府外置，左祖右社的都城建筑原则。这对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和洛阳东都城，都有显著的影响。北魏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又增修了面积很大的外郭城。号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范围极广。有320个坊，及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工商业区。今仅发现其南郭城少量夯土墙残迹。

隋唐东都洛阳城由郭城、皇城、宫城和其它小城等部分组成，皇城位于郭城西北隅，宫城又位于皇城之北，宫城北面曜仪城、圆璧城前后交叠，东西二隔城左右分列，皇城东置东城，东北隅有含嘉仓城，郭城东北部和洛水南岸为居民里坊区。城市建筑中皇城宫城戒备严密，里坊规制严格，商市设置便利，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顶峰期的真实反映。

北宋东京城经近7年的钻探试掘，面貌已初步揭示。它由皇城、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已探明外城15处城门，其中5处发现瓮城遗迹。内城又称阙城，是当时衙署、寺观和商业集中之地。皇城即大内，也称宫城，据阙城之西北。横跨于汴河之上的州桥遗迹，也已经被重新发现。地面上城垣虽然无存，但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可以看出来宋城不愧为当时“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世界大都市。

十、河南省古瓷窑址

我国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河南地处中原，瓷土蕴藏丰富。从很早的古代

起,居于河南境内的先民们,在烧造陶器的基础上,就采用瓷土作原料烧造出瓷器。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已选用瓷土作彩陶的白色涂料;夏代和早商时期,人们用瓷土作胎烧制出素瓷;从商代前期开始,就有了带釉的原始青瓷;汉代以后,瓷器烧制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直至盛唐、北宋时达到顶峰。

河南目前发现的瓷窑遗址有200多处,集中分布在豫北的安阳、鹤壁、林县一带,焦作、博爱、修武一带;豫西的新安、宜阳一带;豫中的汝州、宝丰、郏县、禹州一带。密县、登封分布也较多,其他鲁山、内乡等地也有一些发现。

安阳隋相州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南岸,1974年曾予试掘。窑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发现内径1米左右的圆形耐火土窑体,窑具中支烧具的数量多,形制复杂,表明烧瓷技术较为先进。瓷器为青釉碗、高足盘、四系罐、瓶、钵及俑、动物瓷塑、装饰品等。施釉薄而均匀,釉面光亮透明,安阳窑址是河南发现的一处时代较早的窑址,其创烧可溯源于北齐,而盛于隋,终于唐,它为研究我国北方青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密县瓷窑是著名的唐代瓷窑址,发现有窑炉,还有匣钵、三角形垫饼等窑具,以及碗、壶、碟、罐、灯、盒、豆、盂、高足杯等。瓷器以白釉为主,黑黄釉次之,间有青釉,尤以珍珠地刻花瓷碗、枕为一大特色,对以后宋代北方各窑装饰均有很大影响。巩县黄冶窑则以烧制三彩器而著称,这里发现的窑具有三角形支烧。三彩釉色以黄绿白最为常见,器物有罐、瓶、盆、尊、壶、豆、炉、枕及雕塑类的各种俑、玩具等。曾出土一批素烧坯,表明了唐三彩采用两次烧成法烧制,鲁山段店窑主要烧造"鲁山花瓷"。这种花瓷又称黑釉花斑器,属段店窑首创,其品种以腰鼓最多,另有注子、缸、罐、盆、碗、钵、炉、枕等,其创烧可能始自初唐,历经五代、宋、元,达数百年之久。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一个鼎盛时期,在河南境内发现许多瓷窑遗址,如汝州的汝窑、鹤壁集窑、禹州钧台窑、登封曲河窑、内乡邓州窑等,其风格各异,色彩纷呈,反映了宋代北方烧瓷业官民并举,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

汝州境内发现瓷窑址30余处,其中严和店汝窑址1956年、1983年曾两次发掘。在窑址西北部,圆形窑炉排列有序,多以残匣钵垒筑,由窑室、火膛、火道、烟道几部分组成,发现窑具有匣钵、垫饼,瓷器品种有碗、器盖、双系罐等,纹饰以印花缠枝、折枝花卉为主,釉色青绿莹润如堆脂,是一处规模较大,烧造工艺精良的民间汝窑址,近年在宝丰清凉寺发掘出22件瓶、洗、盘、器盖等宫廷御用瓷器,瓷胎内含有极细的玛瑙粉。无独有偶,附近还发现有玛瑙矿。过去传世的汝官窑产品仅65件,且来源不明,这次新发现22件,并有明确的烧造地点,其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禹州钧台窑是一处北宋晚期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面积约36万平方米。发掘出的窑炉或作一线排列,或则3窑鼎立,作坊居中,烧瓷各道工序可同时进行。其窑炉呈圆形或马蹄形,窑室内发现筒形或漏斗形匣钵,其窑炉结构宜于控制火候,使氧化焰还原,从而达到钧釉色彩变幻的效果。钧台窑的产品,器形复杂,种类繁多,仅花盆就有葵花形、莲花形、海棠形、六角形、方形和长方形等。还有各式各样的盆托、碗、盘、炉、钵、尊、洗等;且釉色多变,晶莹细润,有天蓝、紫红、月白、豆青,更引人注目的是玫瑰紫、鸡血红等窑变,灿如晚霞。这种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的铜红釉,为我国的陶瓷工艺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鹤壁集窑规模宏大,面积达84万平方米,这是宋元时期我国北方以烧造白地杂花器为主的大型民间瓷窑址。1978年发掘的5座窑炉,均圆形,为就地挖筑的半地穴式土壁窑,其结构可分为窑门、火膛、窑床、火道、烟囱等几部分。出土各种窑具、瓷器3700多件。其中窑具有匣钵、管状窑柱、垫饼等。器物有盆、碗、瓶、壶、灯、器盖、炉、枕和玩具等。所出的器物上多施白地黑花、白地褐花,也有施白釉绿彩、褐黄釉的。其手法有刻花、剔花、绘花和印花,其题材有花卉、鸟、鱼、人物、风景等,属于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窑址。代表了我国烧瓷工艺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尤其是在一些瓷器上还书有"杨"、"赵"、"褚"、"张"、"刘"、"李"、"宋"等姓氏,以及"赵一盘"等商品标记,说明当时的瓷业生产中还存在着商品竞争。

此外,登封曲河窑、郏县黄道窑、禹州扒村窑、修武当阳峪窑、内乡邓州窑等,都是宋代重要的窑址,有些一直延续烧制到元明时代。

十一、河南省汉画像石墓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墓葬建筑的石构件,上面浮雕或线刻出各种画像和图案,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以深沉雄大的艺术成就而誉满中外。全省共发现汉代画像石墓近百座,并收集一大批汉代画像石,总计约两千余块。主要分布地有四处:一是豫南地区,集中于南阳、唐河、邓州、方城、襄县等地,而在内乡、镇平、新野、社旗、南召、驻马店、确山、遂平、鲁山、舞阳、叶县、郏县也有发现;二是豫中地区,集中于密县、禹州、许昌一带,在鄢陵、新郑、巩县、登封也有发现;三是豫东地区,集中于永城、夏邑等地,商丘、淮阳也有少量发现;四是豫北地区,以浚县较多,林县、南乐、汤阴、滑县、孟县也有发现。除上述地区之外,在豫西洛阳也有零星发现。

南阳一带汉画像石最为突出、出土数量占全省大半,画像大多反映豪门世族的生活,内容丰富多采。如:出行、田猎、宴乐、丧葬、讲经、加冠、执笏、持节、佩剑、执盾、执斧钺、拥彗、奴婢、武库、门阙楼阁建筑等;还有远古神话和历史故事,如:伏羲女娲、东王公和西王母、羿射十日、嫦娥奔月、黄帝战蚩尤、神荼和郁垒、雷公、河伯,以及晏子见齐景公、二桃杀三士、狗咬赵盾、赵氏孤儿、伯乐相马、聂政刺侠累、范睢受袍、鸿门宴等;也有祥瑞和辟邪,如:羽人、应龙、鹿车、飞廉、麒麟、大螺、神龟、朱雀、铺首衔环等;又有舞乐百戏,如:建鼓舞、踏鼓舞、盘舞、飞剑跳丸、弄壶、吐火、蹴鞠、角抵戏和铙、埙、竽、排箫、瑟等各种乐器;此外,天文图象也占一定数量,如:日月、日蚀、太阳黑子、苍龙星座、白虎星、牵牛星和织女星、北斗星、彗星、太白金星等。如此广泛多样的题材,用平面阴线刻、减地凹面阴线刻、减地浅浮雕、以及浅浮雕兼阴线刻等多种镌刻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形象十分生动。

豫中地区以密县汉画像石墓为代表。墓室门额多刻有象征吉祥的鹿;门的正面镌刻辟邪铺首衔环;门扉、门柱和栌斗上多刻有云纹、人物、龙、飞廉、朱雀、神龟、大螺、蟾蜍、玉兔、共命鸟、麒麟、熊和方相氏等辟邪的瑞禽神兽。这些是用高浮雕、浅浮雕和减地阴线刻等手法加工而成的。墓内更多的画像石却是反映墓主人在人世间的生活。其中有迎宾送

客图,车马牛羊和收租图,庖厨图,宴饮图等。采用减地阴线刻手法,线条纤细,组成大幅的画面,为汉画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豫东地区以永城境内的发现最为典型。汉画像石边框上均有连弧纹、半圆连续、菱形连续、十字连环四方连续、平行直线、曲线等装饰图案;边框内多为双龙穿璧、双凤穿璧、铺首衔环、飞廉、青龙、白虎、朱雀等祥瑞辟邪和珍禽异兽,也有少量的伏羲女娲、三足乌、蟾蜍玉兔等神话传说、以及伯乐相马、带剑门吏、车骑出行、放牧渔猎、舞乐百戏等人物故事和生活场面。其雕刻技法以剔地浅浮雕为主,还有少量的阴线或凸面线刻。

豫北地区画像石雕刻内容主要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交龙穿璧、双鲤、鹳鸟衔鱼、麒麟、凤鸟、奔兔、铺首衔环等祥瑞辟邪。使用剔地浅浮雕和阴线刻的镌刻手法,前者形象朴拙,后者生动活泼。

全省众多的汉代画像石墓中有几座珍贵的纪年墓。唐河新店汉画象石墓内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题记,表明是新莽天凤五年(公元 18 年)即西汉末期的墓葬;襄县茨沟汉画像石墓内有"永建七年正月十四日造砖工张伯和□石工褚置"题铭,表明是东汉顺帝永建七年(公元 132 年)即东汉中晚期的墓葬;浚县姚厂汉画像石墓内有"惟汉永平兮,延熹三年十二月六日丙申上旬……"题记,表明是东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 160 年)即东汉晚期的墓葬;南阳李相公庄画像石墓,为三国时期砖石混合结构墓;平盖墓顶五块石条中,有一块为许阿瞿墓志画像石,墓志铭文有"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表明为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 170 年)即东汉晚期画像石。这些纪年铭的墓葬为汉画像石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汉代画像石以丰富的内容,精湛的艺术,向人们展示了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面貌,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十二、河南省石窟寺、石刻造像

河南是我国石窟寺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自北魏以降,包括东魏、北齐、隋、唐以及宋、明各代的石窟,约有 20 余处,主要分布在豫北和豫西。豫北有安阳、林县、鹤壁、浚县、淇县、卫辉、博爱、沁阳等地;豫西自巩县以西,偃师、洛阳、新安、义马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一线,并包括宜阳和嵩县。此外,在豫南的方城、泌阳等县,也有零星发现。

河南诸石窟中最重要的首推洛阳龙门石窟。分布在洛阳南郊伊水东西岸峭壁上,现存窟龛 2100 多个,佛像约 10 万尊,题记 3680 品,佛塔 40 多座,大多为北魏和唐代遗存。代表作有古阳洞、宾阳洞、潜溪寺、惠简洞、万佛洞、大万五佛洞和龙门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

另一座著名的石窟是巩县石窟寺。洞窟内多设中心塔柱,造像题材多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引人注目的是在三个洞窟内雕有 18 幅帝后礼佛图,较龙门宾阳洞中的礼佛图,增加了帝后随从的行列;各窟中心塔柱基座上刻有伎乐,所用的乐器有琵琶、箜篌、横笛、洞箫、排箫、筝、竽、阮咸、法螺、磬、羯鼓等。洞窟内藻井上的飞天和莲花、化生等图像

纹饰雕刻,极为精美。北魏一代,帝室所营造的石窟雕刻。起自云岗,继之龙门,终至巩县石窟寺,年代蝉联,一脉相承。

近年发现的新安西沃石窟,位于黄河南岸峭壁上,窟顶上距公路路面 7 米,下距黄河水面 7 米,为并排两个洞窟。东为 1 号窟,开凿于北魏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正面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东西两壁各为一立佛、二菩萨,上为宝盖形藻井,中心雕莲花,外绕四身飞天;西为 2 号窟,正壁帷幕龛下有释迦佛,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二胁侍,窟顶并刻二朵莲,造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 531 年)。窟外东壁还有 4 座楼阁式石塔,高 2 米左右。

安阳灵泉寺石窟,位于县城西南的宝山、岚峰山、马鞍山一带。有一批石窟造像和高僧墓塔。始建于东魏武定四年(公元 546 年),一直延续到隋唐和北宋: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雕造在各山崖壁上的 200 多座石塔,多有塔铭和纪年,其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

义马鸿庆寺石窟现存 4 个洞窟,内凿佛龛 46 个,大小佛像 120 余尊,以及 4 幅佛传故事浮雕。其中第一窟的大型浮雕"降魔变",为石窟的艺术精华。整个画面显现出运动和力量的气势美。在魔鬼形象的刻划上,凶猛而不丑陋,夸张而不怪诞,外来的佛教艺术中融合了中国的民族色彩。洞窟内还浮雕有宫城,包括城垣、城门、门楼阙等,描绘了一组规模宏大的古代高层建筑群。鸿庆寺石窟以其完整的布局,娴熟的雕刻技法,代表了北魏晚期中原地区小型石窟的艺术成就。

河南还有一批价值较高的造像碑。如洛阳刘根造像碑、卫辉孝文皇帝造九级一驱碑、辉县北魏造像碑、偃师寺沟造像碑、镇平中兴寺造像碑、登封刘碑寺造像碑、淇县田迈造像碑、浚县石佛寺造像碑、洛宁千佛碑等,均为北朝时期重要佛教石刻。有的书法工整严谨、疏朗秀劲,有的字体结构致密、绵柔茂美,造像刻工精细、刀法纯熟。滑县邴法敬造像碑,造像碑首作成歇山式顶,四壁一些建筑雕刻,资料珍贵。而新乡临清驿长孙氏造像碑等,均是研究隋唐时期佛教石刻艺术的重要资料。

十三、河南省碑刻(汉一元)

我国的石刻文字,起始于商代,而碑刻的产生,约在秦汉。时至今日,河南省历代碑刻约万数之多,其中一部分属于元代以前珍贵碑刻。最早的镌刻于东汉,分置于南阳、桐柏、鲁山、荥阳、鄢陵、偃师、延津、安阳等地。其中包括《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孟初神祠之碑》、《淮源庙碑》、《汉循吏故闻憙长韩仁铭》、《尹宙碑》、《汉故甘陵相尚书□府君之碑》,以及一些残碑和建国后新发现的《张景造土牛碑》、失而复得的《袁安碑》。汉碑数量之多,在全国名列于前。

三国时期的碑刻较少。临颍县繁城《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与《受禅表碑》,传为书法大家钟繇所书,前者为公卿将军呈给魏王曹丕的奏章,劝其取代汉献帝而立为魏国皇帝;后者记述了曹丕受禅称帝的情况。不仅纠正了《汉书·献帝纪》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个别失误,且隶书遒古,如斩钉截铁,备受书家推崇。

魏晋碑刻多出自洛阳、新乡、安阳、许昌等地区。除著名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

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外,汲县北魏孝文帝《吊比干文》刻石(宋代重刻)、《晋太公吕望表》也很重要;登封中岳庙北魏《嵩高灵庙碑》为少见的道教碑刻,滑县北魏《乐陵太守刘君之碑》则以螭首称罕;至于洛阳“龙门二十品”更是魏碑之精萃。

唐代碑刻散存较多。洛阳龙门《伊阙佛龛之碑》是大书法家褚遂良的真迹;登封《大唐嵩阳观圣德感应之颂碑》,雄踞中岳嵩阳书院,通高9米,宽2.04米,厚1.05米,国内罕见;登封唐《少林寺碑》、《唐太宗赐少林寺教碑》、《大周封祀坛碑》、《唐灵运禅师功德塔碑》、《少林寺戒坛碑》、《大征禅师碑》,偃师《圣教序碑》、《升仙太子碑》,济源《奉仙观老君像碑》,鲁山《元次山碑》,商丘《八关斋会报德记》,洛阳《管元惠神道碑》,陕县《大唐嶲州都督赠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之碑》等均有重要的史料和书法价值。

五代、宋、金时期也留下一些珍贵碑刻。浚县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准敕不停废记碑》,是关于灭佛事件的重要记载;安阳宋《昼锦堂记碑》,世称三绝;《西门大夫庙记》,称颂千古;濮阳宋《契丹出境碑》(《回銮碑》),新乡文庙宋《大观圣作之碑》,开封宋《开封府题名记碑》,济源宋《延庆舍利塔记》等都是有名的宋碑;济源金《创建石桥碑记》为河南罕见的金代隶书刻石;开封金《女真进士题名碑》是国内现存稀有的女真文碑刻,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元代也有不少碑刻。登封少林寺的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息庵禅师道行之碑》和元(后)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显教圆通大禅师照公和尚塔铭并叙》,前者为日本国和尚邵元撰文,后者是其撰文又书丹,意义非常;登封少林寺的《裕公和尚碑》及安阳出土的《渔庄记》碑石,均出自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之手笔;宝丰《塔里赤墓碑》是元代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佐证;虞城《孝烈将军祠像辨证碑记》歌颂了中华女儿花木兰的卫国壮举,脍炙人口。

十四、河南省古塔

河南现存砖石古塔530余座,占全国六分之一左右。其中北魏砖塔1座,北齐石塔2座,唐塔30余座,五代塔2座,宋塔32座,金塔16座,元塔86座,明、清塔360座。

其分布以登封少林寺塔林最多,达227座,其次为汝州风穴寺塔林73座;其它还有安阳灵泉寺、博爱月山寺、辉县白云寺、宜阳灵山寺、南召丹霞寺、淅川香严寺等地塔林。

登封北魏嵩岳寺塔,平面呈十二角形,十五层密檐式砖塔,高37.045米,建于北魏正光年间,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安阳灵泉寺北齐双石塔,在全国也颇为少见;登封净藏禅师塔,建于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八角形塔;登封肖光师塔为唐代稀有的六角形塔;登封法王寺塔、永泰寺塔、二祖庵塔、同光禅师塔、法如禅师塔,汝州法行寺塔,林县洪谷寺塔等,都是唐代砖塔中的佼佼者;汝州风穴寺七祖塔,塔身修长,叠涩出檐柔和匀称,为同类密檐式方塔之冠;安阳修定寺唐塔,单层亭阁式,残高9.5米,塔身四壁由不同类型模制浮雕砖镶嵌而成,有人物、动物、花卉等图像72种,为唐代砖雕艺术的奇珍;唐代石塔有林县阳台寺双石塔、内黄复兴庵双塔和里固石塔、安阳灵泉寺双塔、浚

县福胜寺双石塔和陇西尹公浮图、淇县陈婆造心经浮图、延津王法明造七级浮图等，均为方形密檐式，下有基座，上有塔刹或盝顶，塔身上有的刻佛经和发愿文，有的则刻佛像和伎乐人，精彩纷呈。武陟妙乐寺塔，建于后周，平面方形，十三层叠涩密檐式，高30米，为河南现存最高的五代砖塔。登封少林寺东行钧禅师塔，建于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平面方形，单层单檐式，石雕塔刹，保留唐代风格。

河南宋塔数量较多，有六角形，八角形和方形，外部多为楼阁式。开封开宝寺塔(铁塔)，整体用雕有飞天、坐佛、麒麟、狮子等50多种图像的褐色琉璃砖嵌砌而成，高达55.08米，为我国现存最高大的琉璃砖塔。重要的宋塔还有汝南悟颖塔、西平宝严寺塔、滑县明福寺塔、济源延庆寺舍利塔、开封繁塔、原阳玲珑塔、唐河泗洲寺塔、邓州福胜寺塔、南阳鄂城寺塔、永城崇法寺塔、荥阳千尺塔、商水寿圣寺塔、睢县圣寿寺塔、新郑凤台寺塔、宜阳五花寺塔、鄢陵乾明寺塔和兴国寺塔、修武胜果寺塔、尉氏兴国寺塔、宝丰香山寺塔、登封少林寺西塔院弥勒塔和释迦塔、少林寺塔林中的普通塔和智浩塔，以及浚县巨桥迎福寺双石塔等。

金代塔为数不多，但保存较好。洛阳白马寺齐云塔、沁阳天宁寺三圣舍利塔、三门峡宝轮寺塔等，在造型上融合了唐宋密檐式塔和楼阁式塔的艺术与结构特点。修武百家岩寺塔，平面八角形，九级楼阁式砖塔，檐下施斜拱，非常华丽，为一座文物价值很高的金代塔。此外，在登封少林寺塔林还有形制较小的西堂老师和尚塔、端禅师塔、海公禅师塔、崇公禅师塔、衍公禅师塔、铸公禅师塔、无名塔、裕公和尚塔、乳峰和尚塔、悟公和尚塔、□□之塔等。其中西堂老师和尚塔造型优美、雕刻精致、砌工考究，为金代和尚墓塔中的代表作；□□之塔是河南现存最早的一座小型石雕喇嘛塔。

河南现存元代砖石塔86座，除登封少林寺塔林中的一批元塔外，较重要的还有辉县天王寺善济塔，体形较大，为仿宋的楼阁式砖塔；安阳天宁寺塔，平面八角形，上大下小，塔檐下施斜拱，顶部建有10米高的喇嘛塔，此类塔型河南仅此一例；安阳小白塔，用白色石块砌筑而成，塔体雕有二龙戏珠、力士、观音、花卉等，为体型较大的喇嘛塔。

明清以来，寺院中多建造一些小型和尚墓塔，故存留下来的大型明清佛塔较少。河南现存大型明塔有许昌文明寺塔、新郑卧佛寺塔、卫辉千佛寺塔、延津万寿寺塔、太康寿圣寺塔、林县惠明寺塔、镇平宝林寺石塔、鹤壁玄天洞石塔等；大型清塔有光山紫水塔等。而民权白云寺石塔、南召丹霞寺石塔虽然形体较小，但其石雕艺术却是清代的佳作。

(原载《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与张玉石先生合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河南古遗址古墓葬辞条

仰韶村遗址（Yangshaocun Site）

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仰韶文化命名地。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城北7.5公里仰韶村南的台地上。遗址长约900米，宽约300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1920年秋发现，1921年瑞典学者J.G.安特生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科学的地层学方法，因而把遗址中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混为一谈。1937年，河南省博物馆曾派人到仰韶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采集了石器、骨器和彩陶片。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仰韶村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发现仰韶村遗址存在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因素。1980年和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仰韶村遗址主要包括有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四层互相叠压的文化堆积，其中仰韶文化晚期包含了两个层次的不同年代的遗存。其上还有东周文化的遗存。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仰韶文化层中发现有圆形和椭圆形的窖穴。出土石器有斧、铲、刀、凿、镞、网坠、弹丸、犁形器以及刮削器、砍砸器等。陶器数量很多，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器形有鼎、灶、釜、甑、钵、盆、碗、壶、罐、瓮、尖底瓶等。纹饰有线纹、绳纹、篮纹、弦纹、划纹、附加堆纹等。还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彩陶以黑彩最多，图案有圆点纹、弧线纹、带状纹、直边或弧边三角纹、月牙纹、网状纹等。在龙山文化层中发现4座房基和30多个窖穴，出土一批石器和相当数量的陶器。陶器以灰陶最多，器形有鬲、鼎、罐、盆、缸、豆、碗、斝、杯、器盖等。

1961年8月，成立了仰韶村文物保护小组，并收集文物，建立了文物陈列室。1966年4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仰韶村遗址进行测量和全面钻探，划出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1973年渑池县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检查仰韶村遗址文物保护情况，整顿保护小组，指定取土场地。1980年树立保护标志碑。1986年，由上级拨款和群众集资，在仰韶村建立了文物陈列室和纪念性碑亭。

平粮台古城遗址 (Ancient City Site at Ping liangtai)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侧。1979年发现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此多次进行考古发掘。据碳14测定,城址距今4100~4300年左右。对研究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和探索夏商文化都有重要意义。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址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185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西南城角保存最为完整,外角略呈弧形,内角较直。城墙顶部宽8~10米,下部宽约13米,残高3米多。城墙采用版筑和堆筑法建成,即先用小版夯筑宽0.8~0.85米的土墙,然后在其外侧逐层呈斜坡状堆土,夯实,加高到超过墙的高度后,再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夯层厚0.15~0.2米。夯印清晰,有单个的、也有四个一组的圜底圆夯、椭圆形夯。北城门和南城门已经发掘。北城门缺口宽2.25米,位于北城墙正中稍偏西处。南城门位于南城墙正中,门道路土宽1.7米,两侧有门卫房的遗存。门道下铺排水管道,结构是在门道下挖出上宽下窄的沟,口宽和深均为0.74米,沟底铺一条套接的陶水管道,其上再并列铺两条陶水管道。北端稍高,宜于向城外排水。管道周围填土并杂以礓石块,其上再铺厚0.30米以上的土,作为路面。这种排水管道在古城其他地方也有发现。

城址内已发掘出10多座房基,多为长方形排房,有3间一组和4间一组的。房基无论是平地起建的,或是夯土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砌墙。在城内还发现有灰坑、陶窑和墓葬。出土遗物有陶质的鼎、罐、瓮、甗、豆、盆、鬶、纺轮,石质的凿、铲、斧、锛、镞、纺轮和骨凿、骨镞、蚌刀、蚌镰等。此外还发现铜渣。

平粮台古城遗址发现后,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198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设立了淮阳工作站,具体负责对城址的发掘和保护工作。1982年政府拨款,购买了古城遗址所占的全部耕地,并修筑了围墙。

二里头遗址 (Erlitou Site)

具有都邑规模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约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并发掘,工作持续至今。遗址以二里头文化堆积为主。已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和墓葬等,并出土了大批遗物。

二里头遗址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最繁荣。根据出土物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它的文化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另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早期(一、二期)属夏文化,晚期(三、四期)属早商文化。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宫殿建筑基址 已发掘两座。1号宫殿基址位于二里头遗址中部，为整体略呈方形的夯土基址。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基址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四阿重屋式的大型殿堂建筑。殿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夯土台基正南边缘中部是大门。其东北约150米，为2号宫殿基址，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8米。殿堂同样建筑在基址北部的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回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

这种由殿堂、庭院、廊庑和大门组成的宫殿建筑格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对后世很有影响。

墓葬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批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大型墓1座，位于2号宫殿基址中心殿堂与北墙之间。墓口东西长5.35米，南北宽4.25米，深6.1米。墓内填土经夯筑，遗物被盗，仅剩一些朱砂、漆皮、蚌饰片和涂朱陶龙头等。中型墓葬有6座，墓口长2米多，宽1米多。有的有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朱砂，还有漆棺残皮。随葬有铜爵、戈、戚，玉璋、钺、圭，绿松石饰及各种陶器、骨珠、海贝等。小型墓葬有20多座，墓口长不及2米，宽仅0.6～0.7米。随葬品只有少量陶器。此外在灰坑或灰层中，还散见30多具人骨架，有的捆绑双手，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和兽骨埋在一起，可能是被杀害的，或与祭祀有关。

遗物 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角器和蚌器等。青铜器中生产工具有刀、凿、锥、锛、鱼钩等；兵器有戈、戚、镞等；容器有爵、斝，已发现近10件，薄胎束腰、平底，皆为多范合铸；乐器有铃；装饰品有镶嵌绿松石的圆铜牌和盾形铜牌饰，制作十分精美。玉器有刀、璋、戈、钺、铲、柄形器、版、琮、筒、玦等，加工技术精湛。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一般陶胎较厚，相当一部分表面磨光。其中炊器以夹砂罐为主，其次为鼎、鬲，其他有盆、豆、簋、三足盘、大口尊、瓮、缸、圜底盆等容器和壶、盉、觚、爵、杯等酒器以及陶埙、铃等乐器。陶器纹饰有篮纹、绳纹、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等，个别陶器刻划兽面纹和龙形纹。一些大口尊的口、肩部有20多种刻划符号和陶文。石器有斧、锛、凿、铲、刀、镰、镞等。骨器有凿、铲、刀、匕、镞、针、笄等。此外还有漆器、麻布、卜骨和海贝等。

遗址保护 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文物保护区，建立文物保护小组。1989年重新核定保护范围，并建立石质保护标志碑，以确保遗址不受损害。

参考书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尸乡沟商城遗址 (Shang City Site at Shixianggou)

中国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1公里处,北靠邙山,南临洛水。城址覆盖在地面下1~4米。1983年春在配合基建工程中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多次发掘。该遗址的发现,为探讨夏文化和确认汤都西亳城址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址 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余米,北部宽1215米,中部宽约1120米,南部宽740米。城墙夯筑。南城墙已被洛河冲毁。西城墙现长1710米,宽17~24米,高1.5~3米;北城墙总长1240米,宽16~19米,高2~3米;东城墙现长1640米,宽20~25米,高为1.5~2.5米。已发现城门5座,其中北面1座,东西面各2座。

在城内发现有东西向大路5条,南北向大路6条,路面宽6~10米,其中一些道路与城门方位基本对应。城内南半部有3座小城,宫城居中,为正方形,内有成组的大型宫殿基址;另外两座小城位于宫城的东北和西南,均为长方形,内有成排建筑,可能是武库、粮仓或屯兵防卫的城堡。

城门 北门位于北墙正中,探出路土宽约9米,厚约0.3米。1983年发掘了西墙中间的门。门道长16.5米,宽2.4米。路土厚0.4~0.5米。门道两侧各有一条紧贴城墙的夯土窄墙,墙内各有排列密集的16~18个木柱洞,洞底埋有柱础石。从城门内侧向南4米处,有一条东西向呈缓坡形的夯土"马道",上宽3米,下宽4米,东端与城内一条东西向的大路相连,西端升高与城墙顶部接。1984年发掘了东墙中间的门,门道长19.4米,宽2.4~3米,两壁紧贴城墙的木骨泥墙内残留有16个洞痕迹。在门道路土下深0.4米处,有一条地下排水沟,宽约1.2米,深约1.3米,上盖木板,两壁以石块砌成石柱,柱间夹立木柱,承托木盖板,沟底用石块叠砌呈鱼鳞状。该沟西通宫城,全长800多米。

宫城 平面近方形,四周为厚3米的夯土墙,周长约855米。南墙正中一大门,有一条大道通向城南。宫城中部有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其左右两侧还有几座宫殿基址。东部偏北的四号宫殿基址,东西长51米,南北宽32米,包括正殿、庭院、东庑、西庑、南庑、南门和西侧门等7部分,是一处"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正殿在基址北部,平面长方形,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建于高出当时地面0.4米的夯土台基上。台基南侧有间距相等的4个长方形夯土台阶。台基四周有排列有序的圆形或椭圆形夯土柱础残迹。此外,还发掘出1口水井和3处石块砌成的排水沟。宫城东西隅的5号宫殿基址在4号宫殿南约10米,包括上、下两层基址。上层建筑基址的正殿在北部,平面长方形,东西长约54米,南北宽约14.6米。此外还发掘出北庑、东庑和西庑的基址,10个殉狗坑和一处石筑排水沟。下层宫殿建筑基址平面为回字形,中间为方形庭院。北面基址有柱基槽和殉狗坑,庭院内有2口水井。

偃师商城既有大型宫殿建筑,又有军事防御设施,具有早期都城的规模和特点。有些学者认为这里应是汤都西亳。也有专家认为这里是太甲所放处的桐宫。

遗物 偃师商城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等。青铜器有尊、斝、镬、戈、刀等容器和生产工具、兵器，玉器有璜、刀和玉饰，陶器有鬲、斝、大口尊、豆、罐、盆、三足器等。大多为商代前期(二里岗期)遗物，也有少量二里头文化陶片。

遗址的保护 尸乡沟商城发现之后，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保护。1984 年，河南省文物局规定在城内和城墙外 250 米之内，不准搞大型或永久性建筑，其他建筑也要进行控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拨款征购了宫殿基址的土地，并修建围墙加以保护。1986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偃师商城博物馆建成开馆，1989 年正式划定城址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 年第 6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3 年秋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第 10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 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4 期。

郑州商代遗址(Shang Site at Zhengzhou)

中国商代前期都城遗址。在河南省郑州市城内及郊外，总面积为 25 平方公里。遗址发现于 1950 年。1952 年 10 月至 1953 年，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和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岗一带先后两次发掘，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商代遗迹和遗物，命名为商代二里岗期文化。1955 年秋在商代遗址中部的白家庄，发现商代夯土层。经沿着夯土的走向钻探调查，在今郑州老城及北关一带，发现了长方形的商代城垣，一般称为郑州商城。此后，河南省文物部门多次进行发掘。经考古发掘证明，该城早于安阳殷墟。据碳 14 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 3225 ± 90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 3570 ± 135 年)。有人认为是仲丁所迁的隞都，属商代前期；也有人认为是成汤所居的亳都，属商代早期。196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墙的营建和布局 城垣剖面为梯形，下面挖有基槽，两侧有护坡，全部用土分段分层夯筑。每层面上有密集的圆形尖底或圆形圜底的夯杵印痕，城墙还留有版筑的痕迹。周长近 7 公里，其中北墙长约 1690 米，西墙长约 1870 米，南墙和东墙均长为 1700 米。墙基宽 20 ~ 32 米，地面残存最高为 5 米左右。城墙四周共发现 11 个缺口，有些是城墙废弃后损毁的，有些可能是城门。

城内为宫殿区和一般居住区。城郊有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宫殿区在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一带，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20 多处，面积 100 ~ 2000 平方米不等。已发掘 3 处，其中最大的东西长 65 多米，南北宽 13.6 米，房基用黄土夯筑，现存厚度为 1 ~ 1.5 米，房基面上存在两排长方形柱础槽，大体可以复原为一座九室重檐顶并带有回廊的大型寝殿。其余两处较小，破坏严重。

铸造铜器作坊发现2处,一处在南城墙外,一处在北城墙外。作坊发现有操作的硬土面,面上有炼渣和可能是放置坩埚的圆锥形坑窝。还发现大量的坩埚器和碎片、红烧土块、炼渣、木炭和数以千块的铸造各种青铜器的陶范。陶范中有镬、铲、斧、刀、凿、锥等工具范,有方鼎、圆鼎、鬲、斝、爵、觚、尊、罍等容器范以及少量的镞、戈等兵器范。南城墙外一处的镬范、镞范较多,北城墙外一处的刀范、戈范较多。西城墙外发现一处烧制陶器的作坊,发掘出14座陶窑和一批小型房基。陶窑大多为圆形,个别为椭圆形。窑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窑室,下边是火膛和火门,中间以带圆孔的窑箅相隔,箅下有长方形土柱支撑。出土大量陶片、烧坏变形的废品和制陶用的陶拍子、陶印模等。陶器多为泥质盆和甑,也有少量夹砂器类,反映了当时的陶器作坊是有分工的。磨制骨器的作坊一处,在北城墙外,出土大量的骨器成品、半成品以及带有锯痕的骨料和废料,还有一批磨制骨器用的砺石和加工骨器的小型铜刀。

墓葬区分布在城东北、城东南、城南和城西等处。已发掘100多座墓。大部分是小型墓,随葬有鬲、盆、豆、爵等陶器。一部分稍大的墓葬,随葬有鼎、鬲、斝、爵、觚、尊、盘等青铜器以及玉器、象牙器、原始瓷器等。在白家庄一座中型墓中,出土10余件铜器,墓内二层台上,还殉葬有一个奴隶。

在城西的杜岭和东南城角外,各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共出铜器16件。有大型方鼎、圆鼎和鬲、觚、牛首尊、羊首罍、提梁卣、盂、盘等。

出土遗物 陶器数量最多。陶质以泥质和夹砂的灰陶为主,红陶、黑陶和白陶较少。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弦纹、篮纹、方格纹、圆圈纹、附加堆纹、云雷纹、饕餮纹等。种类有鬲、鼎、甗、甑、罐、斝、爵、觚、杯、豆、簋、盆、壶、大口尊、澄滤器、瓮、缸以及纺轮、弹丸、拍子、埙、雕塑艺术品等。原始瓷器用高岭土制成,火候高、质地硬。器形多为尊,也有少量的罍和罐。胎多为灰白色或黄白色,多施青绿釉。

青铜器数量较多,有鼎、鬲、斝、罍、尊、盘、卣、盂、觚、爵、盉、镬、铲、刀、戈、钻、凿、镞、鱼钩等。杜岭出土的一对大型铜方鼎,一件高1米,重86.4千克;另一件高0.87米,重64.25千克,均饰有饕餮纹和乳钉纹。城东南角外出土的一件大型铜圆鼎,饰一周饕餮纹,高0.773米,口径0.52米,重33千克。这些青铜器造型浑厚,气势磅礴,当是商代王室所用之物。

此外,郑州商城还出有一些石器和玉器,石器有刀、镰、斧、锯、锛、凿等。在南城墙外的一座商代窖穴中,出土有19件石镰,长20~26.5厘米,弯背直刃,刃部较锋利。玉器有簪、璜、玑、戈、璋、铲、柄形器和装饰品等。其中有一件大型玉璋,长0.66米,宽0.13米,后端雕刻兽形纹饰。卜骨出土数量较多,但刻字者仅有2片。

遗址的保护 1956年8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古迹保护单位。1961~1966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进行勘察,初步划定了保护范围,树立了保护标志,建立了群众保护小组。1975年以后,河南省、郑州市文物部门重新划定郑州商代遗址的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树立了永久性标志,建立了文物保护组织,多次发布有关保护文物的通知、布告。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建立郑州工作站,专职配合郑州商代遗址范围内基建发掘工作。1985年郑州市成立了郑州商城文物保管所,负责郑州商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

参考书目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 1 辑,文物出版社 1977 年。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殷墟 (Yin Ruins)

中国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商后期叫北蒙,又称殷,公元前 14 世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亡国,共传 8 代 12 王,前后达 273 年。周灭殷后,曾封纣之子武庚于此,后因武庚叛乱被杀,殷民迁走,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史记》、《括地志》均有关于殷墟的记载。自宋以来,这时被误认为"河亶甲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甲骨文),其后有学者考证出这些甲骨文出土于小屯一带,并从中释出商代的先公和商王名谥,从而证实这里就是古文献中记载的殷墟。1928 年开始发掘。196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掘概况 1928 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开始殷墟的发掘工作,主要参加者有李济、梁思永等人。从 1928 年 10 月到 1937 年 6 月,共进行了 15 次发掘。发掘面积共约 4.5 万平方米,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在后岗首次发现了晚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 3 个地层的叠压关系;在西北岗西区和东区发掘了 13 座大墓和大批祭祀坑,证明这里是王陵区,在小屯发掘出一批宫殿和宗庙遗址。出土遗物中最重要的是甲骨文,共发掘出土 24794 片,其中包括著名的"大龟四版"、"大龟七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殷墟的发掘工作继续进行。1950 年春,发掘了武官村大墓。其后,在小屯西勘探出一条南北长 1100 米,折向东西长 650 米的濠沟,环绕宫殿区西侧和南侧,与洹河共同构成宫殿区的防御设施;在苗圃北地发掘出一处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的铸铜作坊遗址;在后岗发掘出圆形祭祀坑。1971 年冬,在小屯西地发现 21 片牛胛骨,其中 10 片有刻辞。1973 年在小屯南地一次发掘出 4829 片有字甲骨和一批无字卜骨。1976 年发掘妇好墓,在武官村大墓南侧,发掘出一批祭祀坑。1969 ~ 1977 年,在殷墟西区发掘出 900 多座平民墓。1978 年春,在殷墟王陵区 1217 号大墓东墓道之北,发掘甲字形大墓 1 座,是这一带新发现的殷墟早期墓葬之一。其后,又发掘了相传曾出司母戊鼎的大墓,墓道内发现不少殉葬的奴隶头骨。1989 年,在小屯北侧发掘出一处大型宫殿基址。三排房呈凹字形连成一体,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布局和遗迹 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基本搞清。宫殿区在小屯村东北,已发掘的建筑基址 53 座,分为甲、乙、丙 3 组。乙组面积最大,甲组次之,丙组最小。甲组基址有 15 座,分布在遗址的北部,靠近洹河,多东西向,年代最早;乙组基址 21 座,分布在遗址中部,门多向南,年代晚于甲组;丙组基址 17 座,分布在遗址南部稍偏西,门多向南,还有一些向东

或向西,年代最晚。这些建筑基址平面多为长方形,也有近正方形,还有凸字形、凹字形等。修建时,有的先挖基槽后填土夯筑。也有的仅把原来的文化层堆积挖掉,再回填净土夯筑。皆用石柱础,有的在石础上还垫有铜础。在基址下或门侧处,经常用人"奠基"。乙八基址规模最大,南北长约 85 米,东西宽约 14.5 米。其西与乙七基址相接。在乙七正南,发现 3 组排葬坑。坑内少者 1~3 人,多者 10~13 人,有俯身、仰身、跪式葬以及砍头葬,出土有青铜礼器、兵器和车马。此外,还有葬兽坑。这些大规模人祭遗存,说明乙七、乙八基址可能是用于祭祀的宗庙类建筑。1989 年发掘的大型宫殿基址,使殷墟宫殿宗庙建筑向南延伸了 130 多米,向东扩展了 50 多米。

此外,在大司空村、高楼庄、花园庄、王裕口、四盘磨、白家坟、梅园庄等地都发现了居住遗址。

王陵区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岗、前小营和武官村之间。已经发掘出 13 座大墓和 1400 多个祭祀坑,可分为东西两区。西区有 8 座大墓(其中 1567 号墓为未竣工使用的"假墓")。这些大墓分别有 4 个、2 个或 1 个墓道,平面呈十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墓葬规模很大,如西区的 1001 号墓,墓口呈亚字形,南北长 18.9 米,东西宽 13.75 米,深 10.5 米。墓葬总面积为 712.75 平方米。西区的 1217 号墓更大,总面积达 1200 平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掘的西北岗东区 217 座祭祀坑皆为长方形竖穴,每坑掩埋人骨 8~10 具,多为青壮年男性,也有少数女性和儿童,总数达 1387 具。处置方法有砍头、肢解、腰斩、活埋。这是多次人祭的遗存。

著名的妇好墓在小屯西北约 100 米。妇好为武丁配偶,是目前惟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年代与墓主的商王室墓葬。此外,后岗、大司空村南和孝民屯东还有 3 处贵族墓地。

平民墓葬多分布在遗址边缘,其中以孝民屯南的殷墟西区和大司空村北两地最为集中,已发掘约 3000 座。殷墟西区 900 多座墓较有规律地分布在 8 个墓区内。各个墓区之间有一定的界限,在埋葬习俗、随葬陶器组合以及铜器铭文等方面各具特征。一个墓区往往有数件青铜器上带有同样的族徽,表明一个墓区应是一个族的墓地。这批小型墓中,除部分青铜器外,还有随葬陶觚、爵等礼器,有的还有生产工具和兵器。

在殷墟还发现一批手工业作坊遗址。如苗圃北地发现一处面积约 1 万平方米的铸铜遗址,发掘出房基和工棚的遗迹,出土有大型坩埚和炼炉以及大批铸造青铜礼器的陶范;在小屯东南 0.5 公里的薛家庄以及孝民屯西地也发现铸铜遗址;北辛庄南地和大司空村南地则发现有制骨作坊遗址,出土有铜刀、锯、钻和砺石等工具和大批骨器、骨料,还发现贮存骨料的窖穴和与制骨有关的地穴式房屋等;此外,在小屯村北还发现有制作石器和玉器的作坊遗址,发掘出房基,出土大批砺石、石器半成品以及少量玉料、石料和雕琢精致的艺术品,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

遗物 殷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以陶器数量最多,还有较多的铜器和玉器以及石器、骨器、角器、蚌器、象牙器等。

陶器,主要为夹砂灰陶、红陶和泥质灰陶、红陶的日用器皿。纹饰有绳纹、环络纹、弦纹、三角划纹等。器形有鬲、簋、盆、豆、圜底罐、大口尊、瓮、罍等。还出土有刻纹白陶、硬

陶和原始瓷器。白陶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腻、洁白、坚硬,器形有罍、簋、豆、壶、瓿、斝、觯、大口尊等,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雷纹、蕉叶纹、乳钉纹、弦纹等,形制及纹饰多仿自铜器。随葬用的陶明器仿铜器和实用陶器,火候较低,制作简陋。

青铜器,礼器有鼎、鬲、斝、爵、盉、觚、罍、尊、甗、觯、盘、簋、壶、卣、瓿、觥、彝、豆等。纹饰较复杂多样,多采用主纹高出地纹,并配用扉棱和兽头的复层花纹。兵器有戈、矛、戟、刀、钺、镞等及用于防护的胄。工具有斧、镬、锛、铲、削等。还有车马器、弓形器和铜铃等。其中最著名的有司母戊鼎、妇好三联甗、妇好偶方彝、妇好鸮尊、司母辛四足觥等。

玉器,礼器有琮、璧、环、瑗、玦、璜、圭、璋、簋、盘。兵器和工具有矛、戈、戚、钺、镞、刀、斧、凿、锛、锯、铲、锥、镰、纺轮。此外,还有装饰品、艺术品等。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除礼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品之外,还有玉人、龙、凤和27种玉雕动物,显示出商代晚期琢玉工艺和抛光技术的极高水平。

甲骨,主要为王室占卜记事用的龟甲和兽骨。自1899年发现以来国内外搜集收藏的达15万片以上,其中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几批甲骨文内容丰富,地层关系明确,价值很高。这些甲骨对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有极重要的意义。

此外,妇好墓出土的3件象牙杯,通体有繁缛的纹饰,雕刻精细。武官村大墓出土虎纹大石磬长84厘米,小屯北地出土的龙纹大石磬长88厘米,音调悠扬清越,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大型乐器。

遗址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加强了对殷墟的保护与研究。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派出发掘团,发掘武官村大墓。其后建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负责殷墟的调查发掘工作。1953年,安阳市成立殷墟文物保管所,划定了遗址的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开展保护工作。1984年9月,在小营附近的祭祀坑修建了保护房。1987年建立了殷墟博物苑,在原址复原或仿建了4座商代宫殿和妇好墓上的祭祀建筑。

参考书目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第10期。

王立早:《殷墟发掘一处大型宫殿基址》,《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22日。

汉魏洛阳故城(Site of the Han—Wei Period Capital Luoyang)

中国周、汉、曹魏、西晋、北魏都城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15公里偃师、孟津相邻处。西周初营建洛邑,在此筑城,称成周。因城在洛水之北,战国时称洛阳。秦为三川郡。西汉刘邦初都于此,后迁长安。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在此定都,改洛阳为雒阳。其后曹魏定都时复改为洛阳。西晋亦以此为都。北魏孝文帝十八年(公元494年)自平城迁都于此。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在今洛阳市区处建东都,故城遂沦为废墟。因该地在汉魏两代最为繁盛,故史称汉魏洛阳故城。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4年,北京大学阎文儒对汉魏洛阳故城进行调查。1962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长期的勘探和发掘,基本探明了城墙、城门、主要街道、宫城的范围和部分殿台基址以及城西北隅金墉城的范围和布局,发掘了城内永宁寺遗址、城南灵台、辟雍、明堂等礼制建筑和太学遗址及刑徒墓地。

沿革 汉魏洛阳故城的形制自东汉到北魏变化不大。东汉雒阳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共有城门12座。其中西门3座,南门4座,东门3座,北门2座。城内主要宫殿为南宫、北宫,东北隅有太仓、武库,中部西侧为金市。城外东郊有马市,南郊有南市。曹魏和西晋的洛阳城,依照前制,只是在魏明帝时在洛阳城西北角增修了金墉城。北魏时仍利用东汉、魏晋的城墙和城门,只是把西城墙中间的雍门向北移了约500米并改称西阳门;在西城墙北端靠近金墉城处又开一门,称承明门。在城内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街道也有些变更。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增修外郭城,号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有320个坊及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工商业区,范围极广,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为北魏洛阳的内城。

范围与布局 现存平面为长方形,南城墙因洛河北移被水冲毁。北、东、西3面城墙保存较好。部分地段高出地面5~7米左右。包括西北隅金墉城在内,北墙全长约3700米,宽约25~30米;西城墙残长约4290米,宽约20米;东城墙残长约3895米,宽14米。全城周长14公里。城墙夯土版筑,版筑夹棍眼的痕迹犹存。在部分城墙上还发现有向城外突出的墩台,西墙北段有4座,北墙东段有3座。墩台间距为110~120米,类似后世城墙所筑的"马面"。在城墙外侧均发现有护城河遗迹。北魏外郭城破坏殆尽,现存南郭城少量夯土垣墙残段。

西城墙探出5座城门,除北起第二门为一门二洞外,皆为一门一洞。最北一门是北魏的承明门,向南是北魏的阊阖门,即东汉的上西门,再南是北魏的西阳门,再南是东汉的雍门,北魏时废,最南是北魏的西明门,即东汉的广阳门。北城墙探出2座城门,西面的一门三洞,是北魏的大夏门,即东汉的夏门,东面的门洞已破坏,有一条路土通过,应是北魏的广莫门,即东汉的谷门。东城墙探出3座城门,皆为一门一洞。北起第一门是北魏的建春门,即东汉的上东门,与阊阖门相对。第二门是北魏的东阳门,即东汉的中东门,与西阳门相对。第三门是北魏青阳门,即东汉的旄门(又称望京门),与西明门相对。文献中所载南城墙的4座门,自西向东为北魏时的津阳门(东汉津门)、宣阳门(东汉小苑门)、平昌门(东汉平城门)、开阳门(东汉同名),没于洛水已无迹可寻。

城内共钻探出东西横街4条,南北纵街3条,基本上都与城门相连。其中由东城墙的建春门向西直通西城墙的阊阖门的横街,全长2510米,宽35~51米,是一条横穿宫城的主干大道;其南由东城墙东阳门向西直通西城墙西阳门的横街,全长2630米,宽约41米,从宫城南侧通过,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半;还有北从宫城南门起,向南一条纵街直达洛河边,应是通过南城墙宣阳门的铜驼街。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残长1650米,宽约40~42米。街道两旁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应是文献上记载的左卫府、右卫府、太尉府、司徒府等衙署和太庙、太社的遗存。

东汉时期，城内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曹魏、西晋变化不大。北魏时建立了单独的宫城。北魏的宫城位于城内北中部，南北长1398米，东西宽660米，占全城总面积十分之一左右，是最重要的中心建筑区。宫城的南、东、西三面城门已找到，南门也称阊阖门，门洞阙口宽约46米，门两侧有厚大的夯筑土阙，形制雄伟；东门云龙门与西门神虎门相对。宫城内西部有一座大型夯土台基，东西长100米，南北宽60米，高出地面4米左右，应是北魏太极殿遗址。在宫城其他地方还发现夯土台基20余处，亦为宫殿遗存。

城的西北隅有曹魏时期修建的金墉城，由3个南北相连的小城组成，平面呈"目"字形，南北长约1048米，东西宽为255米。3城之间有门道相通，城墙宽约12～13米，残高6米左右。城内也发现有20多处夯土台基。金墉城北靠邙山，可俯瞰洛阳全城，是进攻和防守的制高点，在城墙的外壁上，每隔60～70米也有一座向外突出的墩台，可见这里应是一座军事要塞。

其他重要遗迹　有永宁寺、白马寺、灵台、明堂、辟雍、太学、刑徒墓地等。永宁寺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所佛教寺院，位于宫城西南1公里处。寺院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周围有夯土墙，总长1040米。已发现南门、东门、西门和西南角的角楼。寺院正中的方形塔基高4.7米，多为夯土版筑而成。塔基上有5圈方形柱础，正中有一座用土坯垒砌的方台，台的南、东、西三面壁上各保存5座弧形壁龛，供奉泥塑佛像。永宁寺塔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时被雷电所击起火焚毁，1963年发掘时塔基表面及其周围尚有很多灰烬、烧土块和木炭等遗存。

灵台位于南城墙东汉平城门外大道西侧，是汉晋皇室用来占星云、卜凶吉的地方，也是研究天文、气象的专门机构。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220米。经发掘中心建筑为一座方形台基，台基有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与今农田地面同高，四周环筑回廊，回廊外用卵石铺成散水，散水外有砖砌的排水沟。北面正中有坡道可通上层平台，四面各有五开间的建筑。中心台顶现存残高8米多，平面略呈南北长11.7米、东西宽8.5米的椭圆形。灵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一座最早的天文观测台遗址，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曾在此设计制造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为我国古代天文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明堂为"天子太庙"，是皇帝祭祀祖先接受臣下朝觐的地方，位于灵台之东。围墙平面近方形，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86米，围墙内正中有一座大型正方形夯土台基，是明堂的主体建筑。辟雍是封建统治阶级"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位于明堂之东。围墙平面方形，每边长约170米。围墙内偏南处有一座大型长方形夯土台基，应是辟雍的主要建筑。遗址出有西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所立《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即晋辟雍碑），碑文记载了晋武帝司马炎及皇太子司马衷亲临辟雍视察的事迹。

太学创建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是中国最早的大学。遗址位于辟雍的东北，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是一组长方形夯土建筑群，其范围东西长约104米，南北宽90余米；东部为一组密集成排的夯筑房基，围以3米宽的夯土墙，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50米。著名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就先后镌刻在这里。

在灵台西南1.5公里处，发现有一处东汉刑徒墓地，其范围东西长250米，南北宽200

米,已发掘出522座刑徒墓。经鉴定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出土刑徒墓砖820多块,都是利用各种残缺废弃的砖来写刻的,铭文为隶书,有的草率,有的规整,是除碑刻、简牍之外,数量最大的一批汉代书法资料。刑徒墓砖上一般均刻有狱名或郡县名、刑名、姓名、死亡日期等。这些刑徒是从全国各地的狱所押送到司隶校尉、将作大匠等管辖的工地,替封建统治者修砌陵墓、建造宫苑、筑城、挖河、开凿栈道、漕运、伐木、采矿等重体力劳动的。许多刑徒在刑期未满之前就被折磨致死。刑徒墓地的发现和墓砖的出土,是研究汉代刑狱制度和阶级关系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遗址保护 195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列为保护古迹之一。1961年在城址树立一批保护标志。1964年在故城涉及的4个公社各设一名专职文物保护员。1972年,以村为单位建立了文物保护小组。1974年,划定10处重点文物保护区。1976年,洛阳市成立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专职保护白马寺和城址。1989年划定了城址保护范围。

参考书目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初步勘察》,《考古》1973年第4期。

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魏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

打虎亭汉墓 (Han Tombs at Dahuting)

中国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壁画墓。在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村西。两墓东西相距30米,地面上有夯土冢。西部1号墓高15米,底部周长220米;东部2号墓高7.5米,底部周长113米。1960~1961年由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有人根据《水经注》记载,推定1号墓墓主为东汉弘农太守张伯雅。两墓早年多次被盗,但珍贵的画像石和壁画幸得保存。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两墓的形制和结构基本相同。墓门前均有长而宽的斜坡形墓道。墓门之后为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耳室、东耳室和北耳室。1号墓墓室长26.46米,宽20.68米,券顶最高处高6.32米;2号墓室长19.8米,最宽处18.4米,券顶最高处6.72米。两座墓的墓室全用石材和大砖混合砌筑。

1号墓以减地平面线刻的画像石为主。在各个墓室的石门上刻有铺首衔环和瑞禽神兽。墓顶刻莲花和菱形图案组成的藻井,外侧刻云气和瑞禽神兽。甬道和前室壁上为迎宾图。东南北3个耳室刻有庖厨、车马、家居、宴饮等图像。

2号墓以彩绘壁画为主。甬道和前室绘迎宾图。东南两耳室绘庖厨图和饲养图。中室墓顶绘芙蕖、卷草和方格图案组成的藻井。南壁绘车骑出行图,画面长7.42米,宽0.64米。北壁绘宴饮百戏图,画面长7.34米,宽0.70米,人物可辨的有78个,表演跳丸、盘舞、奏乐等百戏场面。

1961年发掘结束后,整修了两墓的墓门,建立了保护小组。1976年建立密县打虎亭汉墓保管所。

张衡墓 (Tomb of Zhang Heng)

在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小石桥村西侧。现墓区占地5000平方米。张衡(公元78~139年)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字平子,东汉南阳郡西鄂县(今南阳县石桥镇)人,曾两次担任太史令,发明了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和测候地震的候风地动仪,作有天文学著作《灵宪》。所著《两京赋》在汉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有半圆形土冢,高8米,周长79米。冢边环以砖砌甬道,并有围墙。墓前有《汉征尚书张公平子墓》碑2通,一为明嘉靖年间所立,一为清光绪年间重刻。还有1956年10月郭沫若题词的墓碑。墓北500米处传为读书台故址,长宽各6.5米,高1.3米。

1956年,政府拨款重建陵园,新立墓碑,修建碑楼和读书台。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还修建陈列室,展出有关张衡的史迹资料,并设有专人负责保护。

张仲景墓及祠 (Tomb and Memorial Temple of Zhang Zhongjing)

在河南省南阳市东关温凉河西岸。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名机,东汉南阳郡涅阳(今河南邓县穰东镇)人,中国古代著名医学家。著有《伤寒杂病论》16卷,是一部理、法、方、药皆备的经典医著。该书后经人多次搜集整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而且对东亚一些国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张仲景墓营造年代无考。清《南阳县志》已有明洪武初年墓碑被毁的记载。祠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清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及光绪年间屡有重修。民国年间墓冢荒芜,建筑残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多次修葺,设立纪念馆。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祠宇坐北向南,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包括正院和偏院。正院有山门,拱券式,门额书"医圣祠"。中殿和正殿,均面阔三间,硬山灰瓦顶。偏院有医圣井、医圣桥、素问亭、内经楼等。大门、门前仿汉双阙和前院两侧碑廊均为新建。廊内陈列张仲景生平画像、名人题词和历代名医画像石刻数十方。

墓冢在祠南,圆形,高约3米,周长10余米,上冠歇山式挑檐高亭。墓前立有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碑,高2.6米。墓旁有1981年发现的另一通"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碑,通高1.1米,碑座刻有隶书"咸和五年(公元330年)"4字。有人认为碑身、碑座制造粗细不一,字体不一,不是原配,碑身为明代所刻。墓前还有新建六角形碑亭,内竖新刻碑石2通。

隋唐洛阳城遗址 (Site of the Sui —Tang period Capital Luoyang)

中国隋唐两代的东都城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区及近郊,南望龙门,北依邙山,东逾瀍水,西至涧河,洛水横贯其间。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隋唐洛阳城进行勘查;1959年调查了宫城、皇城及周围诸小城的平面布局,确定一些门址的位置,并发掘了皇城南墙的右掖门;1960~1965年继续调查了街道、里坊及市场的位置,同时发掘了宫城。1969年,河南省博物馆与洛阳市博物馆联合调查、钻探和发掘了含嘉仓城;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市博物馆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多次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内进行发掘。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洛阳城营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规模仅次于都城大兴城。唐代略有增建。隋唐洛阳城包括宫城、皇城、圆璧城、曜仪城、东城、含嘉仓城和外郭城。

外郭城 南宽北窄,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址宽约15~20米,南墙长约7290米,东墙长约7312米,北墙长约6138米,西墙南端长约6776米。西墙稍呈弧形。东西两墙下面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

外郭城有8个城门,西墙无门。南墙3门,自东向西为长夏门、定鼎门(隋名建国门)、厚载门(隋名白虎门)。东墙3门,自南向北为永通门、建春门(隋名建阳门)、上东门(隋名上春门)。北墙2门,东为安喜门(隋名喜宁门),西为徽安门。勘查清楚的南墙3门和建春门等都是一门三道。城内街道横竖相交,形成棋盘式的布局。在洛河以南探出南北竖街12条,东西横街6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竖街4条,东西横街3条。其中最著名的是定鼎门大街,又称天门街、天津街或天街,是南北主干道,现存长约3公里,宽约90~121米,路土厚达0.6米。城内街道组成里坊,据《唐六典》及《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钻探的实际情况可知,总数为109坊3市,即洛河南为81坊2市(西市、南市),洛河北为28坊1市(北市)。已勘查出洛河南的55个坊和洛河以北的9个坊,其余各坊市为今城所压或被洛河冲毁。

宫城 位于外郭城的西北部,平面略呈长方形。北墙长1400米,西墙长1270米,南墙长1710米,东墙长1275米。城墙宽约15~20米,中为夯筑,内外砌砖。已经勘查出南墙正中的应天门(隋名则天门)、东边的明德门(隋名兴教门)、西边的长乐门(隋名光政门)和北墙的玄武门、西墙的嘉豫门。在宫城中轴线上,发现多处大片夯土殿址,西部已经发掘出多处长方形基址和一处石砌圆形基址。应天门内右侧发现了为营建宫室而设置的窑场,出土大批注明官、匠或官工的印字砖瓦。勘查探明了宫城东南侧自成一体的东宫以及北部的陶光园、中部偏北的徽猷殿、西北部的九洲池,特别是宫城内武则天时的明堂遗址的发掘,是迄今洛阳隋唐东都城考古最重要的发现。遗址的方位、形制、建筑特点,与文献记载的明堂[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改称含元殿]颇相符合。在夯土殿基正中,有由4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柱础外圈直径4.17米,内圈直径3.87米,它的发现为进一步弄清宫城内宫殿的布局,逐步复原宫城、皇城内的建筑,确立了准确标志。

皇城 围绕在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其东西两侧与宫城之间形成夹城。由于洛河北移,皇城东南部被冲毁,南墙仅存西段,长约540米,东墙现存长约1115米,西墙长约1670米。已勘查出东墙的宣耀门、西墙的宣辉门和南墙西部的右掖门。右掖门已发掘,残高2.15米,进深17.5米,为一门三道,每个门道宽6米,左右门道外侧各有13根立柱,采用上架过梁的形式,其上盖筑门楼,内有宽1.25米的车辙。皇城内发掘了隋代的子罗仓。

其他诸小城 曜仪城在宫城之北,为狭长形,东西长约2100米,南北宽约120米。曜仪城以北是圆璧城,东西长2110米,南北宽为460(西端)~590米(东端)。圆璧城的北墙即外郭城北墙西段。已勘查出这两座小城的断续城垣以及两城中部相通之门道和圆璧城北墙正中的龙光门。在皇城东侧发现有东城,城址为纵长方形,南北长约1270米,东西宽约620米。在宫城东北角和西北角外,还有面积较小的东西隔城。

从考古发现看,诸小城中最重要的是东城北面的含嘉仓城。城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25米,东西宽615米。有城门4座,即仓东门(东门)、仓中门或圆璧门(西门)、德猷门(北门)、含嘉门(南门)。德猷门经发掘为单门道,宽4.9米,进深17米,门道留有车辙。东北部和南半部,已探出粮窖287座,东西成排,南北成行。先后发掘了12座粮窖,其中9座出有铭砖,有唐代调露、长寿、天授、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记载着粮窖在仓城中的方位,储粮的品种、数量、粮食来源、入窖年月、运输和管理人员的官职和姓名。第160号窖还保存着约25万千克的炭化谷物。含嘉仓城的发掘,为研究隋唐时期大型官仓的仓储和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遗址的保护 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建立文物保护小组。1982年以后,洛阳市政府规定在保护区进行建设,要履行报批手续,并由文物部门进行钻探和发掘,重点文物保护区一般不许进行基建。对发掘出土的重要遗迹,如石砌圆形建筑基址、大型石柱础等,修建了保护房或围栏加以保护。1989年又重新明确保护范围,并建立多处石质保护标志碑。

参考书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北宋东京城遗址(Site of Dongjing City, the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中国北宋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开封市区及其周围。东京城又称汴京。始建于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北宋定都于此后,多次修筑。历史上曾多次遭受战乱破坏。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率起义军第3次围攻开封时,周王朱恭枵串通官军掘开黄河堤,全城尽为泽国,自此故城大部被泥沙深埋地下,仅余外城残基址。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决口,外城残基复被淤没。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开封宋城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东京城遗址的面貌。

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京城平面呈东西略短的长方形，由内向外依次筑有皇城、内城、外城，并筑有护城壕沟。

外城又名新城、郭城、罗城。周长近 30 公里，其中西墙长约 7.5 公里，东墙长近 8 公里，南墙和北墙长约 7 公里。城墙一般埋在今地面下约 4 米深，底宽 30 米左右，高 6～9 米，顶部残宽近 4 米。城墙夯筑，夯层厚 8～14 厘米，夯面上面有较密的圆形夯印，位于高屯村和三间房村之间的西南城角保存最好，尚高出地面 1 米左右。据文献记载，外城有 12 座城门和 9 座水门，现已探明 10 处，包括著名的南熏门（南墙正门）、新郑门（西墙正门）、新曹门（东门）、汴河下水门等。其中 5 处有瓮城，有的瓮圈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为历代都城所少见。外城四周有护城河，宽约 40 米，距今地面深 11 米左右。

内城又称阙城，是衙署、寺观和商业集中的地方。周长 9 公里，城墙宽 8～15 米，南墙位于现存明清城南墙北约 300 米处，北墙位于今龙亭大殿北约 500 米处，已探出朱雀门（内城正门）。内城朱雀门直通外城南熏门的大道是御街，为南北中轴线，向北与皇城相连，与今中山路基本重合。御街与汴水交汇处有著名的州桥，明初曾重修，1984 年已发掘，为砖石结构的拱桥，桥面宽约 30 米，长约 16.05 米。

皇城即大内，又称宫城，位于内城北部稍偏西处，即今龙亭大殿北侧到午朝门一带，周长近 2.5 公里，南门和北门已发现。宫城东半部（即今潘家湖底）已发掘出在宋宫城基础上所建的明代周王府的宫墙、殿基和庭院。在宫城南半部中轴线上，发现一处平面呈凸字形的夯土建筑台基，应是北宋皇宫内的正殿——大庆殿。基址东西面阔约 80 米，南北进深 60 多米，残高 6 米左右。台基四壁均用青砖包砌，四周环有宽约 10 米，长近千米的包砖夯土廊庑基址，各面有门。

北宋东京城遗址发现之后，当地政府对重要遗迹附近的建设工程严加控制。1989 年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并建立石质保护标志牌。

钧台钧窑遗址 （Site of the Jun Yao at Juntai）

中国古代北方青瓷窑址。在河南省禹县城关钧台。遗址东西长 1100 多米，南北宽约 350 米，文化堆积层厚达 1～2 米以上。1974 年河南省博物馆进行了全面钻探和重点发掘。钧窑初创于唐，盛于北宋末年，衰落于元，明代停烧，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的技艺成就对各地瓷窑产生了影响，成为中国一大瓷窑系统，即钧窑系。钧台窑址是北宋后期的官办瓷窑之一，所烧制瓷器均集贮宫中，被历代皇室所珍藏。该遗址 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迹 已发现 11 座由陶窑发展而来的半倒焰式窑炉，皆为就地挖筑，全系土壁，有的在窑门或烟囱口部砌筑少量小砖。窑门多数向北，个别向西，可能是利用自然风加强火力。窑多为圆形或马蹄形，是单火膛窑，长方形的双火膛窑只发现 1 座，窑室后壁中间和两角设计 3 个扇面形烟囱。窑室内燃烧温度达 1200℃以上，可利用氧化焰转还原焰，使复

杂的钧釉产生特殊的窑变。这些窑炉分布比较集中,有的排成一线,有的三窑鼎立,中间设有作坊。

遗物 窑区内出土很多窑具,其中有筒状匣钵、漏斗形匣钵和锯齿状圆形支烧具等;另有修理瓷坯用的铜刀、鹿角抿子等工具和瓷土、釉药、彩料等原料。出土的钧瓷釉色多变,有天蓝、紫红、月白、豆青、米黄等色。器形有各式花盆、奁、尊、碗、盘、炉、钵、洗等,胎质坚硬致密,造型端庄大方。盆、奁的底部,按照器形大小排列刻有从一到十的汉字编号。还发现有用钧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

遗址内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汝瓷、影青瓷、白地黑花器和天目瓷,器形有碗、盘、钵、罐、盆、盒、瓶、枕、灯台、炉、高足碗、壶、器盖和各种人物、动物等小玩具。

宋代钧瓷以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铜红釉,对后世的陶瓷工艺有深刻的影响。元代的釉里红、明清时期的宝石红、霁红、郎窑红和桃花片等,都是在钧瓷的影响下发展的。

遗址保护 钧台钧窑遗址发掘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1986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同时拨款为 1 号和 7 号窑炉修建了民族形式的保护房和围墙。

参考书目

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 年第 6 期。

宋陵 (Mausoleums of the Song Dynasty)

中国北宋皇陵。位于河南省巩县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地上。总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北宋 9 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7 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赵匡胤之父)均葬于此。世称七帝八陵。祔葬有皇后陵 21 座,陪葬宗室子孙和名将勋臣等共百余人,构成庞大的陵墓群。

巩县宋陵可分 4 个陵区。西村陵区位于西村乡北的常封村和滹沱村之间,包括宣祖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蔡庄陵区位于蔡庄北,有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孝义陵区位于县城西南侧,包括仁宗赵祯的永昭陵、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八陵陵区位于八陵村南,包括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哲宗赵煦的永泰陵。

1956 年河南省对巩县宋陵进行了调查登记;1959 年以后,中国建筑科学院研究院、南京工学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又多次派人调查;1961 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了永厚陵祔葬的魏王赵頵夫妇合葬墓;1984 ~ 1985 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了永熙陵祔葬的李后陵。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布局 8 陵布局基本一致,陵墓的兆域包括帝陵、下宫以及祔葬的后陵和其他墓葬。帝陵坐北向南,由南向北为鹊台、乳台、神道列石;神道北即上宫;上宫四周夯筑方形神墙,周长近千米,四面正中辟有神门,神墙四隅筑有阙台(角阙);上宫正中为底边周长 200 余米的覆斗形陵台,台下为地宫。后陵在帝陵西北,布局和建筑与帝陵相同,只是形制较小,

石刻较少。下宫为日常奉飨的地方,在上宫的北面或西北隅,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

石刻 陵区内石刻很多,总数约在千件以上。帝陵神道两旁石刻一般有 23 对,由南向北为望柱 1 对、驯象人 1 对、瑞禽 1 对、角端 1 对、仗马 1 对、控马官 4 对、虎 2 对、羊 2 对、客使 3 对、武将 2 对、文臣 2 对、门狮 1 对、武士 1 对。上宫四周其他神门外亦有门狮 1 对,门内有宫人 1 对。一些下宫的门外亦有门狮 1 对。后陵的石刻数量较少。宋陵石刻摆脱了传统的神秘色彩,着重反映了当时的世俗生活风貌,具有形神兼备的高超艺术造诣。

陪葬墓的发掘 1961 年发掘的魏王赵頵夫妇合葬墓,由主室、耳室、甬道和墓道组成。墓门为青砖券砌仿木构建筑。甬道两侧各有一耳室。墓室为穹顶,平面为圆形,直径 6.54 米,自底至顶高 6.48 米。墓内地面用石板平铺。墓葬早期被盗,出土墓志两合,随葬遗物有薄胎白釉瓷碗片等。

1984 年发掘的永熙陵北祔葬的李后陵,斜坡墓道,墓门为券门,青石门楣和门扉线刻飞天、武士等图像。墓室为接近圆形的多边形砖砌单室,穹窿顶,墓壁周围砌有砖雕的角柱、斗拱、昂、耍头、枋、椽、望板、檐瓦等,耍头锋面还刻有人首、人身、两手合掌、鸟腹、鸟爪、背上有翅的迦棱频伽图像;拱眼壁有墨线勾勒的盆花图案,周壁还绘有楼台殿阁和云朵彩画,已剥蚀不清;墓顶涂青灰色苍穹,用白粉绘出星辰及银河。墓前发现 2 道砖基,出土许多砖、瓦等建筑构件。推测陵前当时应有建筑。墓内遗物早年被盗殆尽,残存文物多已破碎。出有玉册及 80 多件青釉、白釉或黑釉的瓷器残片,其中带"官"字的定窑瓷器和越窑龙纹大盘,颇为难得。

多年来,在宋陵范围内还收集了一批墓志和碑记,其中包括亲王、公主和其他宗室子孙,如杨国公主墓志、益王墓志、燕王墓志以及燕国公主追封记、邓国公主追封记、沆哀献公追封记等。此外,还发现许多绿釉琉璃瓦和瓦当,说明北宋陵园建筑已使用琉璃构件。

宋陵的保护 1956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古迹名单的通知》,其中包括巩县宋陵。1963 年,省人民政府又公布宋陵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68 年,在各陵园附近的村子建立文物保护小组。1979 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各陵墓的石刻进行扶正、粘结和维修,并树立文物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一些重点保护范围内的土地由国家征购,设立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干部。巩县宋陵目前保存较好。

参考书目

郭湖生、戚德耀、李容淦:《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 年第 11 期。

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学集刊》第 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

(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

从考古发现谈南阳在华夏古文明中的历史地位

南阳位于河南的西南部，西临陕西，南接湖北，群山环抱，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深得天时地利之便。张衡在其《南都赋》中对南阳"既丽且康"的大篇描述，真令人心驰神往。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繁衍、生息。日月交替，沧桑更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漫长的岁月，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南阳有4处国家级或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南阳市区内古宛城垣犹存，"万祀千龄、令人景仰"的张衡和"医圣"张仲景都长眠在这里，墓地修葺完好。医圣祠、武侯祠、王府山等古迹错落有致。邓州市明代城墙尚在，古街犹存，福胜寺塔、开元寺、清真寺、望乡台、县衙、花洲书院等古建筑，星罗棋布。社旗是古老的商业集镇，保存有规模宏大的山陕会馆。会馆周围还有瓷器街、铜器街、山货街等，板门店铺林立。淅川荆紫关镇被称为"北通秦晋、南接吴楚"的水旱码头，南北5里长街有八大帮会、十三家骡马店、二十四家商行。还有平浪宫、万寿宫、禹王庙、清真寺、法海寺等古建筑群，鳞次栉比，古色古香。这些曾在历史潮流上辉煌一时，各自都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博物馆。

南阳有一大批古洞穴和聚落址、古城址、古窑址、古墓葬、古木构建筑、古塔、古桥、古长城、古石窟、古石刻，以及其他不可移动的文物点。80年代末，南阳完成了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普查，仅在《河南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著录的就有千余处之多，十年后的今天，更远不止此数。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家级、省级、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是1999年，建国五十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在南阳进行了许多考古发掘，从旧石器时代到宋金元明都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它们在世人面前展现了南阳在华夏古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一

南阳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较多。1973年夏、秋，在南阳市中药材仓库和西峡县中药材仓库及药店的"龙骨"中，先后找到了13枚人类牙齿化石。其中包括下犬齿、上第二前臼齿、下第一前臼齿、下第二前臼齿、下第三前臼齿和下第二乳臼齿等。由于这些人类牙齿化石全部都是由淅川县药材公司收购，而选取这些化石的时间又在同一年内，各个牙齿石化程度也相近，加上含有人类化石的地点极为稀少，因此，这些人牙不大可能来自许多化石地点和属于多种时代。尤其是里面有5枚牙齿化石在颜色、石化程度以及粘附的堆积物性质等方面，都非常近似，也许它们都出自同一地点和同一层位。考古工作者曾在淅

川县进行野外调查,并先后在几个地点作了发掘,但都未能发现人类化石。从牙齿化石的形态看,淅川猿人化石可以看作是从较早猿人类型到较晚猿人类型的过渡,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文化的范围。淅川猿人牙齿化石的发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和陕西蓝田猿人、湖北郧县和郧西猿人、河南南召猿人一样,证实了古人类在鄂豫陕三省邻接的广大地区内长时期生活着。在南方,1965 年发现有云南元谋猿人化石;在北方,早在 1927 年就发现了北京猿人化石。而鄂豫陕三省邻接地区猿人化石的发现,正处于华南、华北猿人化石地点的中间位置,显示了我国是猿人的沃壤,从南到北,都可能有猿人活动的踪迹[1]。

1978 年 9 月,在南召县云阳镇西北约 3.5 公里的杏花山脚下阮庄附近,发现了 1 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和一批动物化石。这里属秦岭东段、伏牛山南麓的浅山区,海拔 220 米。从遗址外观看,可能是个残洞穴,从暴露出来的地层剖面看,从上到下可以分为四层:一为坡积物层,含有粘土、灰岩块和岩屑;二是黄色土层,上为纯黄土,下部含有碎石屑;三是红色粘土层,含有钙质胶结土块和冲积沙,化石多在此层出土,还发现有打击石片;四是黄绿色细砂土。经鉴定,这枚人牙为 20 多岁青年人的右下第二前臼齿,和周口店北京猿人牙齿的形态基本相近。动物化石中有野猪、箭猪、猫、中国鬣狗、牛、马、羊、獾、豺、貘、熊、犀、鹿、肿骨鹿、剑齿象、剑齿虎等 21 种。其中剑齿象等属于我国南方第四纪更新世的动物,剑齿虎、中国鬣狗、肿骨鹿等属于我国北方的动物。剑齿虎是第三纪出现的动物,一直生活到更新世中期;肿骨鹿和中国鬣狗通常发现于更新世中期,尤其是肿骨鹿为这一时期的标准化石。从动物化石的组合来看,这里的地层堆积时代为更新世中期,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2]。南召猿人化石是河南省经过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地层关系的首次发现,也是我国继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云南元谋、湖北郧县和郧西等地发现猿人化石之后,又一新的重要发现。它不但扩大了秦岭地区猿人的分布范围,而且这次发现具有明确的地质层位,并有多种脊椎动物化石,为进一步研究中原地区第四纪地质和古生物及古代气候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1980 年和 1987 年,分别对南召小空山下洞和上洞进行清理发掘[3]。在下洞发现石制品 200 余件,其中包括盘状刮削器、直刃刮削器、龟背状砍砸器、砾石砍砸器、尖状器、石球,以及各类石核和石片等。在上洞发掘出各类石制器 150 件,其中有石核砍砸器、砾石砍砸器、盘状刮削器、直刃刮削器、双面雕刻器、斜边雕刻器、尖状器,以及石片、石核等。伴出有最后鬣狗、普氏野马、方氏鼢鼠等哺乳动物化石。依据对石器的造型和制作工艺分析,再参照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可以推断南召小空山下洞和上洞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此外,在西峡赵营、莲花寺岗、冢岗、土门、小沟岭、西沟岗、龙头沟、大沟口和镇平叶湾、石羊岗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内乡马山口、镇平八里庙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西峡小洞等地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上述诸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石器、石核、石片和动物化石,扩大了我国旧石器分布的地域,成为认识和研究北方与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关系的重要环节。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张森水先生对包括南阳在内的河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给予很高的评价[4]。这也说明南阳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南北传播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从已有

的考古发现和专家预测，在豫西南有许多洞穴和岩厦，为古人类提供遮风避雨防止野兽侵害的住所。豫西南地区的南阳盆地边缘山麓，从方城向西，顺伏牛山脉到西峡沿丹江而入淅川。从方城而南，沿伏牛山脉与桐柏山及相连绵的山带直到淮水之源。最有希望的就是在豫西南的秦豫鄂相邻地区，很有可能找到较完整的古人类遗址。我们期望今后南阳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能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二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南阳分布相当广泛，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140 余处。其中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多种遗存。裴李岗文化以 1977 年发掘新郑裴李岗遗址而得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段的文化，距今约 8000 ~ 7000 年。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地区，而南阳则发现很少，当是其分布的南界。方城大张庄裴李岗文化遗址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5]。遗址位于方城县独树乡大张庄村北河湾高地上，高出地面 1 ~ 3 米，高出河床 5 ~ 10 米，面积约 3 万平方米。发掘出口径和底径略等的圆筒形、口小底大袋状形及不规则形等灰坑 14 个。出土一批石器、陶器等遗物。石器以磨制为主，有长条形弧刃石斧、扁薄长条形石铲、弧背直刃锯齿石镰、圆柱形石磨棒、梯形石锛及砺石等；打制石器较少，有尖状器、刮削器、盘状器等。陶器以夹砂棕红陶为大宗，还有一些泥质黑陶、红陶及灰陶。器形有直口深腹圜底罐形鼎、敛口筒腹平底罐、敞口曲腹平底或假圈足碗、敞口弧腹圈足碗、侈口鼓腹双耳壶，各种平底盆、平底杯，以及器座、陶锉等。其中不少石器、陶器与裴李岗文化遗物相同，也有一些陶器与仰韶文化早期同类器物相近似。由此看来，方城大张庄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晚期向仰韶文化早期过渡的遗存，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仰韶文化是以 1921 年发现于河南西部的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命名的，是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 7000 ~ 5000 年。在南阳发现不少仰韶文化遗址，其中有南阳英庄、黄山、王庄、高河头、王李营、刘营，镇平安国城、冢上寺、冢洼、灰土坡、郭庄、吕岗、马潭，唐河湖阳、寨茨岗，新野凤凰山、邓禹台、西高营、翟官坟、马鞍山，西峡老坟岗、杨岗、马家营、上营、小水、秧地、牛王村，内乡茶庵、杨营、小河、朱岗，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门伙、前营、沟湾、东庄、龚湾、李寨、张河、金河、双河镇、马山根、大寨、庙岭，邓州太子岗、共和庄、八里岗、盆窑，南召竹园、观岭、二郎岗、榆树岭、寨上、老坟坡、白草岭、小余坪、王庄、李庄、亮马台、董店、莲花池，桐柏陡坡嘴、闵岗，方城油房庄、枣庄、金汤寨、平高台、徐庄、汉王台、大邵岗，社旗谭岗、茅草寺等 70 余处[6]。

屈家岭文化是以 1955 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一种古代原始文化。它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到川东，南逾长江至湘北，东达鄂东及江西修水一带，北抵河南西南部、南部及中部地区。是长江流域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 5000 余年。屈家岭文化在南阳分布尤为广泛。除了上述仰韶文化遗址绝多也有屈家岭文化遗存外，在南阳王营，唐河许河、回龙寺、陈马庄，西峡南塘岗，内乡香花寨、岗堤、寨后沟、黄龙庙

岗,淅川马岭,邓州老龙冢、下岗,南召庙坡,方城东楼庄、孟河、一里坡,社旗潘庄等近 20 处均发现有屈家岭文化遗址[7]。

龙山文化以 1928 年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这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 4800 年 ~ 4000 年。其遗址遍布河南全省,在南阳也迭有发现。除上述仰韶文化遗址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多数含有龙山文化遗存外,在南阳张小凹、新集、叶胡桥,镇平红土嘴,唐河冢子坡、后杜楼,新野光武台,淅川郭湾、胡家沟、西坪头,邓州杨岗、夏集,南召潘寨,桐柏火烧庄,方城关坡刘庄、张庄、傅庄等近 20 处均发现有龙山文化遗址[8]。

在南阳诸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有不少面积较大、内涵丰富、展现历史大跨度的重要遗址,其考古发现和学术价值在中国考古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淅川下王岗遗址[9],位于淅川县南约 35 公里下王岗村东的红石岗上,现存面积 6000 余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 2 ~ 4 米。自上而下包含着西周文化、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等五个时期的遗存,如此丰富的文化层叠压现象,在河南考古发掘工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的偏早阶段(原报告的仰韶文化一、二期),发现房基 4 座,平面均为圆形,分半地穴式和地面上建筑两种,屋内均有灶面,地面起建的房基周围还有很矮的内护墙。发现灰坑 37 个,多为圆形或椭圆形,个别为圆角方形或不规则形。发现残陶窑 2 座,火膛呈椭圆形,圆形竖穴的窑室稍高于火膛,二者有短而宽的火道相通,窑室北壁上有一内低外高的排烟斜道,窑壁烧成砖红色和灰色。发现竖穴土坑墓 574 座,大部分为二次葬。不少为集体合葬墓,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还有瓮棺墓 22 座。下王岗仰韶时期偏晚阶段(原报告的仰韶文化第三期),发现了一座坐北朝南的连间长屋,东西排列共 29 间,由带外间的单内间或双内间单元房连建而成。其东端南侧还有不相连的三间单室房。每个单元房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地坪多经火烤,非常坚实。有的房基还有门道和草拌泥墙,三分之一房间还有灶面。此外还发现 1 座圆形房基。也发掘出圆形或椭圆形灰抗 8 个,长方土坑墓 1 座。出土不少磨光石器和大批陶器。陶器以泥质红陶和棕色陶居多,多为钵、碗、盆之类,还有一些夹砂红棕陶和灰陶,多为鼎、罐、器盖之类。陶器多素面,少量饰附加堆纹、稀疏细绳纹和彩陶等。

在屈家岭文化层中,发现有一些遗迹和遗物。遗迹包括房基、瓮棺葬和灰坑。房基为东西两间并列的一组地上建筑。房门向南,房基周围有土墙和柱洞,屋内地坪经过火烤加工。瓮棺葬是用深腹罐作为葬具,罐口上扣合陶碗或大的陶片,罐内有小儿的骨骼。灰坑为长方形和圆袋形。出土的遗物有陶器,以泥质和砂质红陶最多,器表多为素面,只有少量的弦纹、细绳纹、彩陶和镂孔等纹饰。器形有瓦足鼎、罐、盆、镂孔豆、碗、钵、小杯、高圈足杯、圈足壶、器盖和纺轮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凿、石镞。骨器有骨镞、骨锥和骨匕等。这些遗物有不少和湖北京山屈家岭晚期文化是相同的。

在龙山文化层内发掘出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及不规则形灰坑 118 个。发现陶窑 3 座,为圆坑形火膛,与两条火道相通,火道另端通向窑室。窑底和壁均被烧成青灰色。虽没有发现房基,但发掘出与之有关的 4 座灶,分别为圆形、瓢形、簸箕形或马蹄形。灶坑底部平坦,坑壁呈暗红色,被火烧得十分坚硬,这是龙山文化先民们用火的遗存。发掘土抗

墓 29 座，多为长方形，少量为椭圆形，多为屈肢葬，还有一些仰身直肢葬。多随葬有陶鼎之类。发现瓮棺葬 24 座，葬具组合为罐和罐、罐和鼎、瓮和瓮、罐和瓮等，随葬有陶纺轮、石凿等小件物品。龙山文化遗物甚多，有大批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黑陶、灰陶占绝大部分，多饰以绳纹、篮纹及方格纹等，器形有罐、鼎、钵、碗、豆、杯、盘、甑、盆、簋、壶、瓮、缸、盉、器盖、器座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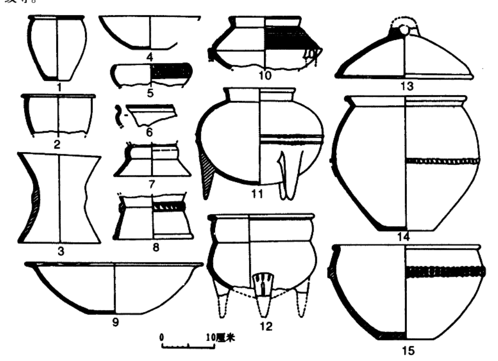
淅川下王岗遗址有着重大的考古、历史和科学价值。从其西周文化、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如此复杂的地层叠压关系，基本上解决了南阳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其中仰韶文化三期堆积丰厚，遗迹、遗物繁多，也解决了南阳地区仰韶文化的分期和编年问题，这里的仰韶文化遗存，南部在湖北大洪山、荆门、武当山和随枣走廊一带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早期犬牙交错；西部和北部隔秦岭和小秦岭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邻，北部和东北部在伏牛山和叶县一带与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相衔接。在时空定位上独树一帜，代表了豫西南和鄂北、鄂西北广大地区仰韶文化的面貌，被称为仰韶文化的下王岗类型。下王岗的龙山文化堆积和出土的遗迹、遗物同样非常丰富，很可能是由当地屈家岭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它的北面，与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相接触；西部同陕南汉中盆地相邻，与同时期的文化相互均有影响。又展示了豫西南和鄂西北广大地区龙山文化的面貌，被称为龙山文化下王岗类型。

邓州八里岗遗址[10]，位于邓州市城东约 4 公里处的白庄村北高岗地上，高出周围地面约 3 米。白河主要支流湍河在遗址北面自西向东流过。遗址面积约 6 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 3～4 米。1991 年以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南阳文物研究所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由于其考古收获的重要和丰富，曾被评为 1994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从地层叠压关系看，自上而下分别为龙山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仰韶文化早中期。在考古发掘中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堆积甚薄，所见遗迹均为少量灰坑，所出遗物除屈家岭文化陶片较多外，余者也甚寥寥。遗址中堆积最厚、遗迹遗物最丰富的就是仰韶文化了。

仰韶文化层中清理房址 24 处，分小型圆形房子和大型长方形连间长屋两种，这类长屋与淅川下王岗遗址中仰韶文化的长屋相类。如 21 号房址为数套房间相连而成的长屋，呈东西走向。一般两间或三间一套，即一大一小或两小一大，小间在南，大间在北，小间亦即淅川下王岗长屋的外间。墙体、居住地坪、灶台、门道等设施保存基本完好。整座房屋悉遭火焚，几乎每间房内都存留有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已清理出的部分长约 15 米，共计 5 套房间。房屋的构筑为先挖基槽，栽埋木柱，然后用泥抹墙，铺垫并修抹居住地坪。部分房间形制独特，类似现在的横向推拉门。八里岗遗址发掘出一批仰韶文化袋状或筒状的灰坑。清理仰韶文化墓葬 98 座，墓葬之间叠压打破关系较为复杂，可分为两大段。偏早段墓葬多为单人一次葬，随葬品较多，以陶器为主，骨器次之，石器少见。陶器多为明器，基本组合为鼎、罐、钵和器座等。偏晚段墓葬以二次葬为主，多为集体合葬墓，每墓人数从几人到近百人不等，随葬品较少，仅为数件陶明器。发掘的仰韶文化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骨器和石器，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较多，褐陶次之，灰陶和黑陶甚少。陶器基本组合为钵、罐、鼎、盆或器座（图一）。器表多为素面，有少量饰细绳纹、指甲戳印纹、指

窝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也有少量彩陶，彩绘题材主要有宽带纹、回旋钩连纹和双三角叶纹等。



图一 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陶器

1、2、14.罐 3、7、8.器座 4、5、6.钵 9、15.盆 10、11、12.鼎 13.器盖

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遗存极为丰富，与淅川下王岗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基本一致，当属同一文化类型。它与关中、中原仰韶文化有较密切关系，但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这里仰韶墓地偏早段盛行单人一次葬，葬式为仰身直肢，偏晚段盛行多人二次葬，从数人到数十人、近百人葬于一穴，不见于中原和关中，为本地区所特有。这里的房屋为地面建筑，在其偏晚阶段流行由多套单元套房相连而成的长屋和排房式的村落布局，区域色彩十分明显。排房之间留有空场，垫土致密而又纯净，不见同期其他遗迹现象，系人工刻意堆筑而成，其形成年代与长屋相当，这是当时人们户外活动的场所。从长屋的情况看，每套房间均独立设灶，这和较早阶段不设灶的单间房屋不同，似乎是为了满足一家一户的需求而建。这种独立设灶的套房和村落的排房式布局形成过程本身，反映了人们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此外，仰韶文化长屋的横向推拉门也见于社旗茅草寺、淅川下集、镇平赵湾和湖北枣阳雕龙碑等遗址的仰韶文化房址中，这也是本地区又一特色。这些都可表明邓州八里岗遗址和淅川下王岗遗址一样，代表了豫西南和鄂西北的仰韶文化内涵，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

如果说淅川下王岗遗址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其主要内涵而邓州八里岗遗址以仰韶文化为主要内涵的话，淅川黄楝树遗址最主要的内涵却是屈家岭文化。黄楝树位于淅川县城西南45公里黄岭河和丹江交汇处的台地上。村西侧即为一处古文化遗址。东西

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为14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为2~3米。1965年和1966年曾先后两次对这处遗址进行发掘。证明黄楝树遗址有三层文化相叠压，最下面为仰韶文化层，中间为屈家岭文化层，上面为龙山文化层。这是一处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村落遗址。这里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其文化层堆积之厚，发现遗迹和遗物之丰富，在河南全省是独树一帜的[11]。

在黄楝树遗址发掘出25座屈家岭文化的房基，都是方形或长方形地面上的建筑。房基布局较有规律，排列为两排，组成长方形的村落。其中有18座房基为单间房子，有7座房基为双间房子。房子面积一般为10平方米左右，个别有20平方米的。屋内都有做饭和取暖的烧灶，这反映了父系社会个体小家庭的特点，在这些房基中最有代表性的为11号房基(G11)。这是中间隔墙的一组两间的地面上建筑。东西长8.35米，南北宽4.15~4.25米，残墙高0.3米。房基的建筑程序是，先挖一个深约0.3米的长方形基槽，然后在四周立木柱。在木柱之间用细木棍或细竹竿作"木骨"，再用很厚的草拌泥涂敷成墙壁。西墙发现有5个柱洞，南墙10个柱洞，东墙3个柱洞，北墙8个柱洞，中间隔墙3个柱洞。在室内发现4个柱洞和5个用泥堆筑的柱础。柱洞底较平，有的还残存木柱灰痕。房内地坪是在长方形基槽内铺上厚近0.2米的细黄砂土，然后在上面涂敷白灰面，白灰面一直涂到屋墙的下部。房子的门开在西墙南头，屋内隔墙的门开在墙的北头，两个门的宽度都是0.8米。屋内有两个圆形的烧灶，外间的烧灶在隔墙外侧偏南部，正与房门相对；里间的烧灶在东北角，也与隔墙门相照。烧灶是在屋内黄硬土地坪上挖出浅抗，坑底坚硬，均烧成青灰色或黑灰色。房基内出土较完整的遗物26件，不仅是这批房基中出土器物最多的一座，而且分五堆放置得较有秩序，外间的北角一堆有7件，即3件陶罐和器盖、陶瓮、陶豆、彩陶壶各1件；外间中部一堆5件，即陶鼎、彩陶壶、陶碗、陶杯、陶钵各1件；内间西北角一堆有7件，即陶豆2件、陶杯2件、石球、石镰、陶纺轮各1件；内间东南角一堆有5件，即陶杯3件、器盖和骨针各1件；在烧灶南部还有一堆，有陶豆2件。由于在外间存留有两段焚烧过的木柱和很多碎炭块，房基的木柱、竹片都被烧焦，不少陶器被火烧裂成碎片，地坪的白灰面被火烧得龟裂松碎，变成红黄色。从上述迹象看G11是经历一场火灾而废弃的。值得注意的是，在G11内的填土中，发现烧土块上有庄稼秆和粮食粒的痕迹，经河南农业大学鉴定是稻壳和稻秆。

除了房基之外，还发掘出屈家岭文化的灰抗17个，有圆形坑、椭圆形坑和长方形坑等数种。发现土坑墓18座，随葬有陶器、石器，个别墓葬还埋有象征私有财产的猪颚骨。还有瓮棺葬20座，葬具都是两件一套，有罐和碗、罐和豆、双罐、瓮和罐、碗和豆等多种。和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瓮棺葬的缸一样，这里的葬具底部或盖上钻有一个小孔，反映灵魂出入的迷信思想。

这里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遗物也是引人注目的。陶器有鼎、甑、瓮、澄滤器、罐、缸、壶、尖底器、钵、盆、豆、杯、器盖、纺轮、陶垫子等；石器有石斧、石锛、石铲、石凿、石镰、石刀、石网坠、石镞、砺石、石杵和石臼、钻孔石器和钻孔石芯；骨蚌器有骨镞、骨锥、骨刻刀、鱼钩、骨匕、骨针、蚌刀和蚌镞等。此外还有一些装饰品，如石环、石珠、石镯、石璜、骨簪、骨环和蚌环等。其中以折腹镂孔高足陶杯、蛋壳黑陶塔式高足杯、彩绘陶壶等最为精美。

而陶纺轮出土总数达263个，这在全国同类遗址中也是罕见的。纺轮有角边的、弧边的、鼓面的、折边的，造型各异，有红色的、灰色的、黑色的，有的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钻孔石器和钻孔石芯的发现，使我们知道当时是用管钻法从两面钻成，钻管可能是竹管，再配以砂粒和水来进行钻孔。稻壳、稻秆的发现，说明当时以种植水稻为主，石杵和石臼是加工稻谷的工具，显然要比裴李岗文化石磨盘、石磨棒的加工进了一大步。用G11出土的木炭测定年代，距今约为4235±95年。

通过上述新石器时代诸遗址的考古发现，反映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在这里的相对年代和考古学编年序列，以其丰富的内涵构成了仰韶文化的下王岗类型、龙山文化的下王岗类型和屈家岭文化的独特风貌。其中屈家岭文化的遗存，除南阳地区外，在信阳地区和驻马店地区，以及禹州谷水河、郑州大河村也均有发现。这表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从豫西南扩大至颍河、汝河和洪河上游，甚至达到黄河南岸。我国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北方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南阳地区如此众多的屈家岭文化的发现，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文化。

三

商代和西周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奴隶制王朝，是华夏古代灿烂的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的历史阶段；而东周则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重大变革时期。这在南阳也留下了不少的历史轨迹。

在南阳十里庙、新集、黄台岗、龚营，镇平马圈王、大庄寺、马隐店、沙庄、安国城、红土嘴、打雁张，内乡茶庵、黄龙庙岗，淅川下王岗、门伙、郭湾、沟湾、东庄、龚湾、李寨、金河、胡家沟、西坪头、魏村、水田营、姚湾、龙城，邓州杨岗、高洼、陈营，桐柏回龙、古台寺、孤峰山、平氏，南召莲花池、下关、漆树园，新野大营，方城大马庄、寺门大关口，社旗陌坡、王庄等40多处均发现有商代或两周遗址。此外，在南阳东北郊、西关，新野小西关，桐柏左庄、钟鼓堂，西峡花园村，内乡郭营，淅川下寺、龙泉、毛坪、魏营、西岭、裴岭、杨河、磊山等地，均发现有西周或春秋战国的墓葬[12]。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

1959年2月，在南阳十里庙村发掘出商代圆形或椭圆形灰坑10个，烧灶1个，水井1眼和墓葬7座。在这处商代遗址中还出有一批石镰、石铲、石凿、石刀、石锛和陶纺轮、陶拍子、骨镞、铜镞等生产工具，厚胎矮裆陶鬲、回纹陶簋、高圈足陶豆、大口尊、骨簪、加工鹿角等生活用具，同时还发掘出熔铜坩埚、铸器陶范、铜渣等与铸造青铜器有关的遗物和占卜后留下来的卜骨等。表明这里是一处比较重要的可能具有城邑性质的商代遗址[13]。

1989年9月，在内乡城北郊黄龙庙岗村东高台地上，发现一处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商代房基和窖穴分布较为密集，还出土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从遗址内涵来看，这里是一处商代的村落遗址[14]。

1981年2月，在南阳市北郊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的青铜器[15]，其中包括鼎1、盘1、簋2和一批车马器。现场调查表明，这里是一处已遭破坏的墓葬。其中鼎腹内铸铭3行17

字:“中爯父作宝□其万年子子孙孙永用享孝。”2件铜簋皆有铸铭,其中一件盖、腹内各有铭文5行44字:“中爯父大宰南申厥辞作其皇祖考夷王监伯尊簋用享用孝用易眉寿钝佑康和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另一件有铭6行45字:“南申伯大宰中爯父厥辞作其皇祖考夷王监伯尊簋用享用孝用易眉寿钝佑康和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铭文中的“大宰”同于后世的相位,当为申国之相。“中爯父厥辞”是大宰的名字。“夷王监伯”是中爯父的祖、考两代。“夷王”即周夷王燮,“监伯”为夷王之子、周厉王之弟,因此,中爯父为与周宣王同辈。“南申伯”是周王室的重臣,宣王时徙封于谢邑,以加强周王朝南方屏障。中爯父簋在这里出土,确证西周晚期的申是在南阳。申国地望的确定,对探讨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等历史事件很有意义。

在先秦诸国中,楚国有着非常辉煌的史迹,从周成王时建国至秦灭楚,前后约存在八百年之久。楚国曾是号称“地方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泱泱大国,又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灭国六十有余,不少就在河南。其中就有南阳的申国,南阳以西的吕国,邓州南部的邓国。楚国灿烂的古文化,影响尤为深远。

淅川香花乡徐岗村西北有龙城遗址,平面近于方形,城墙经夯筑,东墙长730米,南墙长1030米,西墙长910米,北墙长974米,墙宽约8米,残高1~3.3米。城墙夯层厚7~10厘米,浅夯窝径8~10厘米。四面城墙有缺口8处,东西墙各2,南墙3,北墙1,可能是城门遗存,城墙夯土内有两周时期的鬲、罐、豆及其他绳纹陶片,城内也可见到汉代的陶片。至迟是一座春秋古城,也可能上溯到西周,延用到汉代。城址今已没人丹江水库区内。这里很可能是楚发迹之处。据《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经考证,楚建国之初所居之丹阳应在“丹淅之地”,即今淅川丹水一带。后来才迁至湖北。从地望上讲,龙城或与丹阳有某种联系[16]。

在西峡县城东北不远的莲花寺岗一带,调查发现有析邑故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城墙长700米,南墙长500米,西墙长750米,北墙长400米。部分城墙地段保存较好,东西南三面城墙的门址尚存。城内文化层厚1米多,出有战国时期板瓦、筒瓦、井圈、空心砖、瓮、罐等器物残片,并采集到铜镞。还发现有一些战国墓葬。据文献记载,该城为楚析邑,又名白羽城[17]。

在南阳东北部的方城一带,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长城遗址。向北连接叶县、鲁山,向南延伸到泌阳一线,这里是当时楚国的北部屏障。筑有关城、亭障,以富饶的南阳盆地作为后盾,进可攻,退可守。方城县大关口遗址,位于方城县独树镇方城山西麓大关口的两侧。东侧有南北两道夯筑的土石城垣,北墙长810米,南墙长640米,两墙相距250~380米,底宽10米,残高1.5~3米;西侧亦筑两道城墙,以石砌为主,全长1419米。城墙上还有一些方形土台之类的建筑,并发现铜戈、铜镞等遗物。这里是楚长城的重要关隘之一[18]。

1977~1979年,在淅川下寺发掘24座春秋楚墓和5座车马坑[19]。这批墓葬按照分布和时代先后,可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位于墓地南部,时代最早,约为春秋中期后段,包括

3座中型墓和2座车马坑;乙组位于墓地正中,时代为春秋晚期前段,包括大型墓2座、中型墓2座、小型墓15座和车马坑1座,是墓地中规格最高的一组,其中以2号墓最重要。丙组位于墓地最北部,约当于春秋晚期后段,包括2座中型墓和2座车马坑。乙组的2号墓为竖穴土坑墓,东西长9.1米,南北宽6.47米,墓室上部被丹江水库蓄水冲毁,下部现存深度为3.88米。填土经夯实,坑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椁两棺,人骨架已朽而不存。随葬品极为丰富,计有青铜器551件(包括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工具),玉、石、骨、料器921件,以及马甲2件,金箔192片和海贝4433枚。墓西侧的长方形车马坑,南北残长21.10米,东西宽4.5~4.6米,坑内葬车6辆,南北排成一横列,马19匹。由于坑南部被破坏,原来车马可能更多。2号墓随葬的礼器中有王子午鼎7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通高61.3~68厘米,口径58~66厘米。鼎均有盖,方唇外折,立耳外撇,颈内收,束腰,腹微鼓,平底,蹄足。纹饰繁缛,造型不凡,制作精美。每鼎均有鸟书铭文86字,涉及"王子午"、"令尹子庚"。鼎内尚存猪骨、牛骨,显然是下葬时实鼎祭物。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禁,通长131厘米,宽67.6厘米,高28.8厘米,重14.2公斤。周围以三层粗细不同的铜梗组成,内层铜梗粗而直以为骨架;中层铜梗稍细,由下而上向两侧伸出后上弯;外层铜梗最细,呈互相独立的卷草状。三层铜梗相互套结,构成禁身。禁身四周攀附12只铜怪兽,前后各4,左右各2。怪兽有角,张口吐舌,奋力攀附禁身之上。禁底部卧有12只虎形足,两长边各3,四角及两端各1。虎头饰高冠,昂首吐舌,全力支承禁身。铜禁庄重瑰丽,工艺复杂,给人以镂空透雕的视感,实为精美绝伦的精品。随葬乐器有铜甬钟26枚,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最大一件通高120.4厘米,重量152.8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3.35厘米,重2.8公斤。每枚钟的钲部及左右鼓上铸有铭文,大型钟仅在正面铸铭,中型钟正背两面铸铭,小型钟由2~4枚共铸一铭。每篇铭文均篆书113字,内容为王孙诰铸钟缘起、用途及歌功颂德等。

此外,在淅川下寺其他墓内也出有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如乙组1号墓中的龙耳虎足方壶、蟠螭纹盏、提梁盉、钮钟、玉牌和石排箫等,均堪弥足珍贵的上品。

淅川下寺楚墓群的发掘是楚文化研究中极为重要发现,从墓葬的布局、形制和铜器上的铭文,可以推断这是一处完整的楚国贵族家族墓地,前后延续约140余年。所出的铜禁、铜鼎、铜簋的不少构件,使用了失蜡法溶模工艺,这比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失蜡法铸造青铜器的历史,又提早一个多世纪。下寺春秋楚墓的发掘,对于我国古代冶金史、音乐史、文字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春秋时期楚国埋葬习俗进而全面揭示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历程,更具有直接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楚文王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国的显贵死后还要葬在丹水沿岸,这种归葬先祖封地的作法,也或与楚国早期丹阳在这一带有关。此外,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发掘,还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当时楚国上层的王室贵族在葬制规模和随葬礼器等方面基本上是遵照周礼,但它们的规格却又远远超过了墓主人自身的等级。如2号墓的令尹子庚,虽然在随葬礼器上(如使用7鼎)是符合卿大夫的等级,但在埋葬的规格上却大大超过了应有的规定,用了好几个妻妾陪葬,用16个侍婢奴隶殉葬,另外还有数十匹马陪葬……这些都与当时的诸侯国君死后的埋葬规格相同,这是一种僭越礼制的现象。这种

情况在其它的几组墓内也都普遍存在。表明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僭越礼制的现象比中原的东周王室贵族和其它各诸侯国贵族走得更远，这与当时楚国的社会发展和变革较快有很大关系。

1990年到1992年，在距下寺楚墓不远的和尚岭、徐家岭一带，又发掘了一批重要的楚国贵族墓葬[20]。其中和尚岭1号墓平面近于方形，墓口东西长6.80米，南北宽6.44米。葬具有棺有椁，墓室底部四周有熟土二层台，人骨架已朽尽无存。虽经多次盗掘，但仍出土有一些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和石磬及小件玉器等。青铜礼器中有带铭"克黄之鼾"2件。发掘者据文献记载认为克黄为楚庄王时的箴尹，是楚若敖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在徐家岭发掘的9号墓中，出土一对作为鼓架用的近似夔的铜神兽，通高48厘米。头部为六龙探首，分指不同方向，虎颈、虎身、虎尾、龟足，背上有座，座上又有另一奔驰欲搏状怪兽，为龙首双角，其口内又衔一条蛇形龙。怪兽通身镶嵌绿松石，当称一绝。淅川丹江库区楚国贵族墓地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图二　新野曾国墓葬出土铜甗铭文

1971年8月，在新野县城西门外小西关村，发掘了一座春秋早期墓[21]。墓内除出土一批小件玉饰、象牙玦、骨匕和骨贝之外，还出土不少青铜器。其中有鼎、甗、簠、盨、盘、匜等礼器，戈、镞等兵器，以及车軎、车饰、马衔、马镳、铜铃等车马器。铜甗为甑、鬲分铸，甑的内壁铸铭："惟曾子仲诲，用其吉金自作旅甗，子子孙孙其永用之。"21字（图二）。证明这是曾国的铜器。1974年8月，在该墓西侧仅20余米处，又发掘出一座春秋早期墓[22]。其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与前一座曾国墓葬相类。除一些兵器、车马饰和骨器外，也出有一批青铜礼器，其中包括列鼎3、簋4、鬲4、壶2、甗1、盘1、匜1、盨1等。虽然没有铭文，但鼎、甗、盘、盨、匜等的形制与其旁"曾子仲诲"墓内的同类铜器完全一样。在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盛行族葬的习俗，因此这座墓也应是曾国墓葬。《国语·郑语》记有："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韦昭注曰："缯，姒姓，申之与国也。"缯即曾。说明在南阳一带的申国附近，当有一个较为强大的曾国。关于曾国的文物资料，除新野之外，多年来在湖北京山、随州、枣阳和河南的桐柏，都出土过曾国的青铜器，形制和纹饰十分相似。与文献印证，表明西周末至春秋战国时期，在今淮河、汉水相邻地区，即豫西南和鄂北一带确有一个曾国的存在。新野当在曾国境内，也许是曾国

西北边陲的一个重镇。

1993年11月到1994年2月，在桐柏月河镇左庄村北丘陵地带，发掘大型春秋古墓1座，编号为月河一号墓[23]。墓葬封土残高2米，为夯土构筑，夯层厚20厘米。全墓由中部主室和南北两侧附葬坑组成。墓口南北长10.50米，东西宽8.80米，深11米。坑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中部主室有双椁双棺。椁外有青膏泥，外椁内椁用方木构筑，外棺内棺用木板构筑，棺板以榫卯相连，并通体髹漆，内棺铺朱砂并放置大量玉器。附葬坑均用青膏泥密封，内置木板器物厢。南面附葬坑厢放置青铜器和木漆器，北面附葬坑厢内置玉器和皮甲。墓内各类随葬器物450件。其中青铜器29件，包括鼎、缶、盘、匜、方壶、盂、筒杯等容器，剑、戈、铍、削、镞等兵器和用具，还有两件乐器铜铎。玉器400余件，包括瑗、璋、琮、环、璜、玦、戈、矛、钺、圭、刀、觿、虎形佩、牌饰、管饰、条形玉饰、玉人、玉鹿等玉器，造型厚重，制作精美。木漆器4件，包括簠、勺等。皮甲已残朽，尚可见角端带小孔眼的甲片，多为长方形，少量为梯形或三角形。在铜铎上有铭"养子白受止铎"6字，表明器主人是养子，亦即养国的国君。远在1944年和1964年，在左庄村即该墓北部附近就出土过春秋时期青铜器，鼎和盘上有"养伯庸"等铭文[24]。1975年在桐柏平氏镇张相公庄出有类似的盘、匜等青铜器，匜上有"养仲无龙"等铭文；1990年在左庄村又发现养伯盘[25]。由此可以推知这一带就是春秋时期养国贵族墓地，月河一号墓应为养国国君之墓，这为研究东周时期淮河流域小国诸侯的埋葬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实例。这也同时表明，在桐柏及其附近，在春秋早中期有一个养国的存在。

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虽然只存在短短的15年，但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统一全国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但也因为其存在时间太短，在南阳留下的遗迹简直寥若晨星。仅发现少量的秦代墓葬。如淅川县宋湾乡马川村北就发现10多座土坑墓，仅清理了其中的一座，为长方竖穴土坑墓，随葬陶瓮1、铜鼎1、铜蒜头壶2、铜甑1、铜盘2、铜缶1、残铁器1。其中铜蒜头壶和铜缶为标准的秦器特征[26]。

汉代是一个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它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又在春秋战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在东汉时期，南阳为皇室故里，被称为南都，遗留下来文物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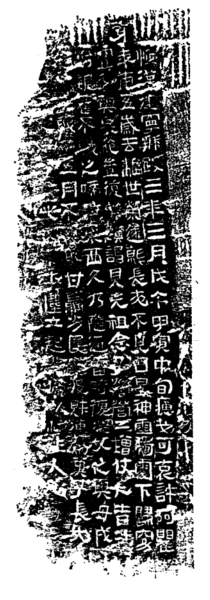
南阳是我国汉代重要的冶铁中心之一。在桐柏毛集乡铁山庙和后铁炉村、固县乡铁石档和张畈、南阳市瓦房庄、方城赵河村等地，均发现有汉代铁矿遗址或冶铁遗址，在镇平安国城发现汉代窖藏铁器，在新野、唐河、社旗、淅川、邓州、方城、南召、内乡等地，也都发现有汉代的铁器[27]。其中，1959年在南阳北关外瓦房庄附近发现的冶铁遗址规模最大，

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28]。在遗址范围内散布着很多绳纹筒瓦、板瓦、耐火砖、磨石、烧土块、烧结铁块、铁渣和烧土面等。在发掘中找到了一处当时的活动地面和用料礓石及瓦片铺的路面。发掘出多座炼铁炉、熔铁炉、炒钢炉和烘范窑。其中炼铁炉皆近似长方形。一些炼炉内填满木柴灰，堆有铁块、烧土块和碎砖瓦。其建筑方法是在地面挖一个长 3.6 米，宽 1.8 米，深 0.8 米以上的长方坑，留下炉门，周壁经夯打后再涂一层泥。修筑火池、炉膛和烟囱。从各个炼炉周围堆积的弧形耐火砖、土坯及烧土块来看，炉顶有的是用耐火砖券成，有的是用土坯和草拌泥券成。火池在炉门内，周壁烧成砖灰色，炉膛火烧较轻，三个烟囱设在炉的后部。推测炼炉的用法是：炉门通风，火池内装着燃烧的木柴，炉膛内放置一些坩埚，烟囱是排出炉烟的孔道。在有的炼炉旁边，还有填满铁渣的炼渣坑，应是冶炼时取出的铁渣。熔铁炉的修建方法是在平整的地面上，铺直径 2.6 米，厚 5 厘米的草拌泥，烧成橙黄色作为炉基，炉体全用弧形耐火砖砌筑，外敷草拌泥，内搪炉衬。炉口及上部的炉衬略现熔融，有许多龟裂纹道，温度较低，为预热区。炉体中部，炉衬均有烧流，说明温度较高，应是还原区。炉体下部，炉衬普遍烧流，甚至露出砖体，温度最高，可能就是靠近风口处氧化区。熔铁炉的炉体高度约 3～4 米。还有大量陶鼓风管，从风管表层受热情况推测，熔铁时有可能已使用换热式热风装置。遗址中所出大量碎铁块和熔渣中，有不少梯形铁板和铧、锸、锛、镬、锄、斧等铁器残片，看出都是熔炉所用的铁料。大量的木炭渣，是燃料的残存，从木炭年轮和粗大的辐射状纹理看，燃料是用栗木烧成的木炭，质量很好。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有相当数量的耐火砖，砖大小不同，皆有弧度，应为砌券顶用的，砖的内面涂有一层厚约 1 厘米的耐火泥，砖的外面敷很厚的草拌泥；如前所述，也出有一些陶鼓风管；还出土有坩埚，皆为椭圆形的圜底陶罐。罐外敷 3～4 厘米厚的草拌泥，罐的内部烧成砖红色，表面则呈光亮的深黑色，坩埚内壁还粘有铁渣；又有很多长条形磨石，上有光滑平整的磨石面，并有铁器磨痕。磨石有红灰两种，红磨石质粗砂粒大，为粗磨铁器用的，灰磨石质细，可细磨铁器之用；还发现不少的泥范、模和铁范，包括有鼎、罐、盆、锤、镬、犁铧、锸、楼铧、锛、六角圈等容器范和农业生产工具范，在一件铧模上有"阳一"二字。此外也出土有车饰和齿轮范等。还出土了许多铁农具、工具和生活用器。这里出土的犁铧范经过修复，依据铸造工序进行排列，大体上可以看出铁铧铸造的工艺过程：用两块上模套合，可以铸出一件铁上范；用两块下模套合，可以铸出一件铁下范；两块范芯模套合，可以铸出一件铁范芯。将铁上范、铁下范和铁范芯套合起来，可以铸出一件铁犁铧。这种铁范可以连续长期使用，大量铸造铁器，是一种新的铸造工艺。这起始于战国，河北兴隆曾出土过一批铁范，开其先例。而瓦房庄西汉铁范是其继续和发展。从上述发现可以看出瓦房庄冶铁遗址规模很大，产品的种类繁多，包括铸造铁器、炒钢和锻造铁器。显示了西汉冶铁生产的水平。从铧模的"阳一"二字可以看出，这里是汉代南阳郡铁官所管辖的第一座冶铁作坊。《荀子·议兵篇》云："宛（南阳）钜铁钝（短矛）惨如蜂虿"，说明当时的铁兵器是多么锋利；《汉书·食货志》记有：（西汉时）……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鬻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说孔仅管理南阳冶铁而发了大财；《后汉书·杜诗传》云："杜诗……迁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可以看出铸铁技术的发展。这些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大体上是相符的。

南阳最精彩的汉代遗物莫过于画像石了。南阳汉画像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一颗宝珠,它以"深沉雄大"的艺术成就而誉满中外。建国以来,已发现一千余块之多,大部分都收藏在南阳汉画馆内。这种用平面阴线刻、减地凹面阴线刻、减地浅浮雕,以及浅浮雕兼阴线刻四种镌刻艺术手法,在石料上刻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动物、神话和自然现象。题材广泛多样,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是豪强世族的生活。如:门阙、楼阁等建筑图、讲经图、加冠图、贿赂图、出行田猎图、宴乐图、丧葬图、执笏图、持节图、佩剑图、执金吾图、持棨戟图、拥彗图、执盾图、持钩镶图、执斧钺图、材官蹶张图、奴婢图、武库图等。其二是远古神话和历史故事。如伏羲、女娲和盘古图、西王母和东王公图、羲和常羲图、羿射十日图、嫦娥奔月图、黄帝战蚩尤图、虎吃女魃图、神荼和郁垒图、雷公图、河伯图、晏子见齐景公图、二桃杀三士图、狗咬赵盾图、赵氏孤儿图、伯乐相马图、聂政刺侠累图、范雎受袍图、鸿门宴图等。其三是祥瑞和辟邪。如:鹿车图、羽人图、应龙图、飞廉图、麒麟图、大螺图、神龟图、黄龙图、朱雀(凤凰)图、人面兽图等。其四是舞乐百戏。如:建鼓图、鞞鼓图、鼗鼓图,又有铙、镈、埙、龠、箎、竽、排箫、瑟等乐器图,还有建鼓舞图、踏鼓舞图、长袖舞图、盘舞图,百戏中有冲狭(一种杂技)图、飞剑跳丸图、弄壶图、倒立图、吐火图、蹴鞠图、角抵戏图。其五是天文图像。如:日月图、日月合璧图、日月同辉图、日蚀图、月蚀图、太阳黑子图、苍龙星座图、白虎星图、牵牛星图、织女星图、北斗星图、蚩尤旗(彗星)图、太白金星图等。这些丰富多彩的画像内容,对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俗和天文观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重要和形象的资料。

上述汉代画像石除一部分是搜集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汉代画像石墓。如南阳赵寨砖瓦厂墓[29]、杨官寺墓[30]、英庄墓[31]、中建七局机械厂墓[32]、辛店熊营墓[33]、蒲山墓[34]、刘洼村墓[35]、石化二厂墓[36]、王寨墓[37]、石桥墓[38]、军帐营墓[39]、南阳七里园墓[40]、西郊麒麟岗墓[41]、草店墓[42]、北关中原机校墓[43]、邢营墓[44]、十里铺墓[45],唐河湖阳镇墓[46]、石灰窑村墓[47]、新店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48]、针织厂墓[49]、电厂墓[50]、白庄墓[51],方城东关墓[52]、城关镇墓[53]、党庄墓[54],邓州长冢店墓[55]、梁寨墓[56],新野前高庙村墓[57],桐柏安棚墓[58]等。此外还有一些晚期墓利用汉画像石修建,如南阳李相公庄三国时期墓[59]、南阳东关晋墓[60]、南阳西关晋墓[61]、南阳王庄画像石墓[62]、南阳独山西坡画像石墓[63]、南阳妇幼保健院东晋墓[64]等均发掘出汉代画像石。其中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有两座带有纪年的汉代画像石墓。1977 年冬,在唐河县城南 35 公里处的新店村西,发掘出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墓[65]。该墓出土画像石 35 幅,内容有二龙交尾、二龙穿璧、四首人面虎图、门阙庭堂人物图、拜谒图、执笏或盾门吏图、材官蹶张图、舞乐百戏图、驯虎图、骑象图、兽斗图等。墓内还发现有纪年、墓主人姓名、官职及墓室建筑名称题记的 8 块石材,南北主室中柱上刻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柒日癸巳葬千岁不发"27字。"郁平"在今广西,"大尹"为新莽时的官吏,职如太守。"始建国天凤五年",始建国和天凤均为新莽年号,天凤在始建国之后,故当为天凤五年(公元 18 年)。其余在门楣或立柱上刻有"车库"、"中大门"、"藏阁"、"内门"等题记,类似墓主人生前宅院的再现。该墓有明确纪年和墓主人身份,所以对探讨西汉末年的历史,对南阳汉画像石墓的断代分期和综合研究,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而 1973 年 3 月在南阳市东郊李相公庄村北发掘的一

座三国时期砖石混合结构墓中，墓顶嵌有3块汉代画像石。一块原为汉墓门扉残石，上刻铺首衔环；另一块长条石刻执笏门吏图；还有一块为许阿瞿墓志画像石[66]。石横长1.12米，上下宽0.70米，厚0.11米。石面左侧为墓志铭文，竖刻6行，满行23字，总计136字，志曰："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身，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谒见先祖，念子营营，三增仗火，皆往吊亲，瞿不识之，啼泣东西，久乃随逐，当时复迁。父之与母，感□□□，□王五月，不□晚甘。羸劣瘦□，投财连篇，冀子长哉，□□□□，□□□此，□□土尘，立起□埽，以快往人。"(图三)石面右侧为减地浮雕兼阴线刻的画像，画像中间有一横格，把画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为，最上高垂连弧帐幔，左侧有一个身着长襦的小儿，端坐于榻上，榻前摆一案，案上放置耳杯等，右上方刻"许阿瞿"三字，这当为"年甫五岁"的许阿瞿。他身后立一仆，着长衣，手执扇；右侧有三个头梳双髻的儿童，一个玩鸟，一个牵双轮木鸠，一个执鞭赶鸠。这可能是家僮做游戏供许阿瞿取乐；下面亦饰垂幔，五人进行表演．左侧一人着长衣，面向右，抱盘，似击奏控切，其右侧一男子赤腩露腹，跳弄六丸一剑；画面中间有一个头梳双髻女伎，挥长袖跳盘舞；其左侧一人鼓瑟，一人吹排萧。整个画面形象十分生动。这块有纪年的画像石是很重要的发现，那136字记述许阿瞿五岁夭折，其家人对死者的悼念，实际上是一方墓志，志文为四言韵文，语句流畅，与当时的汉赋，有着不同的文风。书法为隶书，但字体在秀丽中有着方重遒劲的特点，某些字近似魏碑，显然出自民间无名工匠之手。建宁三年是东汉灵帝的年号，即公元170年。这是我国继抗日战争前在洛阳发现东汉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67]后第二次类似的发现。



图三　南阳许阿瞿画像石志铭文

与汉代画像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汉代画像砖。在新野张楼、任营、樊集，唐河城关、湖阳，方城城关、独树、杨集、陌坡、博望、赵河，以及淅川、邓州、镇平和南阳等地，均有发现[68]。其中以新野樊集最为集中，1985年曾征集到10多方很有价值的画像砖。其后又陆续在这里发掘37座汉画像砖墓[69]。

南阳的汉画像砖内容十分丰富，有西王母图、羽人图、黄帝战蚩尤图、泗州捞鼎图、二桃杀三士图等神话或历史故事；有车骑出行图、庭堂对饮图、六博图、狩猎图、楼阁图、凤阙图、房舍图、持节图、佩剑图、执钺图、执戟图、蹶张图等豪强世族生活；有二龙穿璧图、青龙图、白虎图、朱雀图、玄武图等祥瑞图；有日月图、苍龙星座图等天文图像；有建鼓舞图、七盘舞图、戏车图等舞乐百戏；有鹅、鸭、水鸟、双兔、双鱼、斗兽、长青树等动植物图像。其中不乏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的精品。如新野樊集 37 号墓出土的胡汉战争画像砖[70]。画面一方戴锐顶冠，发掘者依据山东出土带有“胡将军”题记的汉画像推知，该画像应是胡汉战争图。画左边为突兀的山峰，山顶有 3 人，右边立者正在使用蹶张弩；山中有疾驰的战马，皆右向，应是奔赴沙场的士卒。山右坡上有一队胡兵张弓劲射；平地上战马奔逐，有提首级回阵的，有驱赶战俘的。左边一形体高大的人。正欲拔剑，其前有 4 个首级和 4 个拜谒者，下设兰锜。这幅图像表现以射箭为主的骑、步兵交战的情况，是研究中国军事和战争史的重要资料(图四)。又如新野任营发现的一方戏车画像砖[71]，其画面



图四　新野汉墓出土“胡汉战争”画像砖

自右而左是近处一骑者肩旗导引，远处另一骑者，快马飞驰，回首张弓欲射。两骑之后，即为两戏车上履索倒挂的杂技表演。两车各有一马一橦(高大木竿)，车上均有一驭手和一乘伎。前一戏车橦木顶端置横木，橦木右端一伎人倒挂，两臂平伸，掌心向上，各放一个拳头大小的圆球，左手托一伎人，伎人右脚踩在圆球上，双手叉腰半蹲，似在休憩；右手亦托一伎人，伎人右足立在圆球上，左脚抬起，双臂张开，神态自若。后一戏车橦木顶端蹲一伎人，两手向两侧斜伸，左手紧握一索头，索的另一端握在前车乘伎手中，二人遥相注目，协力一致。从马的动态看，前车速度高于后车，后车驭手仰首望索，紧勒马缰，控制车速，使两车间软索始终保持斜直。令人惊叹的是，斜索中段有一伎人，正沿索向上举步，两臂稍举保持身体平衡。他所走的是两车联索，斜向上下，且又在跑动之中，其难度远远超过平地上的走钢丝。这种飞车联索上惊心动魄的杂技艺术，实为汉代舞乐百戏中的千古一绝。

在南阳汉墓中，还出有一些很有科学价值随葬品，如 1964 年，在淅川一座东汉晚期墓内，出土了一件绿釉陶水榭[72]。系由水池和亭榭两部分组成。水池呈圆盆状，池沿上有一人头戴平帻，长衣遮足，骑马巡逻。在骑者前后的水池沿上，还立有数人。池岸的另一边有手执弩机的两个武士俑，头戴尖顶帽，身穿裤褶，腰中束带。池岸周围还环列一些羊、鹿、鹅、鸡等禽、兽。池岸与池中亭榭下层圆形平座之间有一桥相连，桥侧有桥栏。桥外池沿边立有一人。桥下停泊一船，平底，以二横梁间隔成三个船舱，船头稍尖微向上翘，设有一个小孔可能用于系锚，船尾平齐亦稍上翘，设有两个小孔，似为安舵之用，船内有篙、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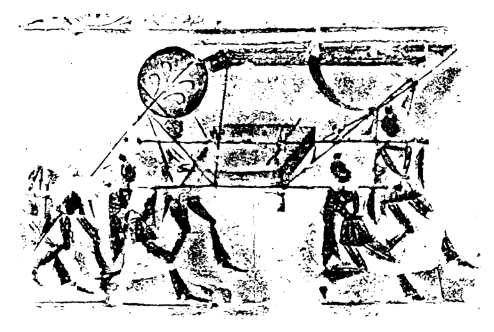
各一。另有龟、鳖、鸭、鹅、鱼,自左而右浮游于池内。水池正中矗立一座重檐四阿式顶的亭榭。平座中央有一人,头戴帏帽,身着长衣,袖手盘膝而坐,当为水榭的主人。还有两人头戴平帻,身穿长衣交领于胸前,腰中束带,双手拥彗,侍立桥头,作迎宾状。平座左右两侧及后面各立一人。在平座中部亦立有环形矮墙,其上有四根立柱支撑四阿式腰檐,腰檐有四条垂脊,每坡有 13 条瓦垅。腰檐上又有四根立柱,承托四阿式亭,其正脊上栖息一鸟。这件陶水榭模型内容繁杂,人物、动物以数十计。池周有轻骑巡逻,武士守卫,保护着水榭中央正襟危坐的主人。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豪强地主的生活面貌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他们建立坞壁望楼,设置部曲家兵,把水榭和水上楼阁变成了武士守卫的堡垒。而另一方面,这件框架结构、分层处理的水榭建筑形式,又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国的石刻文字,大约起始于商代,碑刻的产生,当在秦汉时期。欧阳修《集古录》云:"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的碑碣,卒不可得。"两千年过去,留存至今的汉碑已是凤毛麟角了。而南阳卧龙岗汉碑亭内就存有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 154 年)的《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孟初神祠之碑》和东汉时期的《赵仵残碑》;桐柏县招待所东院存东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 163 年)的《淮源庙碑》。1958 年,在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新发现了一通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 159 年)的《张景造土牛碑》[73]。碑身四周皆残,顶部碑穿尚部分残存,穿内有晕弦痕迹。现存高 1.25 米,宽 0.54 米,厚 0.12 米。该碑现存字 11 行,满行 23 字,全文可识者 225 字。碑文的文体属汉代公文体裁。碑文内容有三,一是郡太守丞"告宛"人的公文,即同意张景"愿以家钱"包作为举行立春仪式所需一切用具的要求,并以此免除他世世代代的劳役;二为宛令右丞指使追皷贼曹掾写移文件,遣张景作治"五驾瓦屋二间,周栏楯拾尺"等什物的公文;三为掾赵述"告宛"人文告。张景碑的发现,是解放后金石学上一大收获。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碑文中记载为举行立春仪式就需"调发十四乡正"进行准备,结果弄得"吏正患苦";张景愿以很大代价免除劳役,可见东汉徭役的苛重。碑中所记"右丞"官名及官名的统称为"列长"一词,汉书不见记载,由此可补其不足。此外,张景碑还是书法艺术之珍品,碑文字体宽扁,点、画、波、尾显明,端正工细,秀丽多姿,代表成熟的汉隶书体的一个流派。

魏晋南北朝时期,原住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南下,形成了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南阳临近南北朝边界处,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阳南边的邓州,宋、齐之时还是南朝的边防重镇,直到齐末,北魏的势力才伸到这里,到了梁初,邓州仍然处于南北互争之中。

1957 年 12 月,在邓州西北 30 公里处的学庄,发现了一座南朝彩色画像砖墓[74]。墓南北长 9.8 米,东西宽 3.09 米,高约 3.2 米。分墓室和甬道两部分,全部用特制的浮雕画像砖和花纹砖筑成。墓内出土有 55 件陶俑,都是头和身躯分别制成,因此,在陶俑头和身上分别刻划各种数字、文字或符号,以便于合成一体。在足底又刻划一些文字,如:"捉车"、"车""刀"、"仪万"、"大□"、"捉丩"、"捉大鼓"等,用这些字和陶俑姿态比较,可以看出刻字是表示陶俑的身份。如:"捉车"俑是车夫,"捉丩"俑是举仪仗等。其造型上承汉晋作风,下启隋唐的形制,体肥、凸腹、面部多带微笑,显示了南朝的特征。但最有价值的,还是

墓内的壁画和画像砖。墓内壁画只发现一处。是画在券门前面厚约半厘米的石灰面上。壁画全高3米,宽2.7米,每边门宽0.6米,壁画平面呈“∩”形。壁画正上方绘饕餮面,口衔一长柄兵器,黑目圆瞪,白牙外露,显得神奇勇猛。在饕餮两旁券门的中部各画一飞仙,身着朱红彩裙,并有蓝绿飘带,右边的手持博山炉,左边用手散花,四周云气衬托,飞行于云天之上。门两旁各画一持剑门吏。整个壁画构图紧凑、完整,线条用笔刚劲有力,人物形象准确生动,色彩非常鲜明。当壁画绘成后,从地坪紧贴画面(相距约半厘米)砌成一道单砖墙,中间空隙灌以粗砂土。直到揭开这道砖墙后,这幅距今1400多年的壁画,才展现在人们面前,色彩鲜艳如新,犹如刚刚脱稿。



图五 邓州南朝画像砖墓出土抬轿画像砖(拓片)

彩色画像砖大小完全相同,长38厘米,宽19厘米,厚6厘米。共发现34种不同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最主要的、数量最多的一类是以牛车为中心的车骑出行,除两乘牛车外,还有战马和铠马,以及侍卫、武士、鼓吹奏乐和仪仗,此外,还包括一些舞蹈表演、出游的仕女和后随的骑马仆人等(图五)。甚至墓中那一批陶俑也是属于为墓主出行而服务的,赶车的车夫,执刀、棒、盾的武士,手举各种器物的仪仗,挎鼓的鼓吹和一些奴婢。另一类是一些故事画像砖,如:属于孝子故事的“郭巨埋儿”和“老莱子”等,属于神仙故事的有“南山四皓”和“王子乔与浮丘公”等。上述每个故事都抓住各自突出的情节,分别只用一块画像砖来表现,显得非常洗炼和醒目。第三类是反映宗教迷信的,如:代表祥瑞的珍禽异兽——麒麟,凤凰、天马、双龙、双狮,以及飞仙、化生、羽人等(图六)。在一块战马和铠马画像砖的一侧,有墨书3行文字,其中有“部曲在路日久……家在吴郡”等语。南北朝时期的吴郡是今天的苏州一带,守卫邓州的将领,所率部曲家在吴郡,更可证实这是一座南朝墓葬。浮雕花纹砖有26种,形制有各种各样楔形砖、大长方砖、小长方砖、方形砖等。

纹饰主要是莲花、缠枝卷叶、忍冬纹等。大型花纹砖中心的莲花瓣较为宽肥，给人以厚重安祥的感觉。另一些莲花、卷叶纹，构图均匀，花纹流畅，显得生动活泼，富丽多彩，为隋唐时期广为流行的各种缠枝卷叶花纹的发展，开了先例。



图六　邓州南朝画像砖墓出土飞仙画像砖

墓内的画像砖、花纹砖、壁画和陶俑，都是经过琢炼的艺术精品，虽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但却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比起当时的名家来也毫不逊色。画像砖"郭巨埋儿"里的郭巨之妻褒衣长裙，衣带飘飘，和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绘的《女史箴图》里的人物相同；画像砖"仕女出游"里的纨扇仕女，酷似顾恺之所绘《洛神赋》里的洛神。这些画像砖对研究南朝社会生活、舆服制度、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等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唐宋以降，文化发展，经济繁荣，著名的内乡邓州瓷窑、方城宋代范氏家族墓、邓州福胜寺塔地宫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

1975 年 8 月，在内乡县城西约 25 公里的大窑店附近，北起土槽沟，南经房店、水沟、白杨至王沟等村，在南北长约 2500 米，东西宽为 400 米的范围内，断断续续都发现有成堆的窑具和瓷片。在部分河岸断崖上，还可以看到残留的烧土块和窑口直径 2.2 米的残窑基，其附近还堆积有瓷土和釉药等原料。经调查表明，大窑店遗址，是一处烧造时间较长，遗迹遗物比较丰富的瓷窑遗址[75]。这里出土窑具有粗砂瓷质匣钵，一种是直口方唇，深腹，腹外饰粗弦纹，近底部折向内收成小平底，在底外部烧结着一块青釉碗片；另一种匣钵为敞口，圆唇，浅腹似盆。还有支烧，一种似豆柄形，另一种为圆柱形。垫饼为圆形，多数饼面上留有圈足印痕，个别饼面上捏有三个乳钉。垫圈，均为不规则的环形，系用泥条弯曲而成，器面上留有圈足印痕。采集到的瓷片中以青釉最多，也有少量白釉瓷片，个别器物上还见有黑、褐釉。青釉瓷片中有各种各样的瓷碗、盏、盘、碟、盆、罐、器座、瓷枕等，绝多为宋代遗物。除素面之外，还有不少印花及刻花、剔花装饰，多以菊花、牡丹、水波游鱼和荷叶为装饰。也发现有一件罐为敛口、圆唇外翻、短颈、宽肩，肩上附有双系鼻，青釉上已出现丝棉状蓝色窑变，应属唐代；还发现有罐底片为假圈足，内底有粗弦纹，外壁和假圈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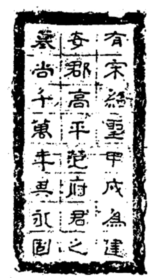
上有五道浓厚的深蓝和粉蓝色垂釉,内壁施青黑釉,亦为唐末常见之物。白釉瓷中有碗、盆、砚和玩具等。以花卉、鱼纹、莲瓣为装饰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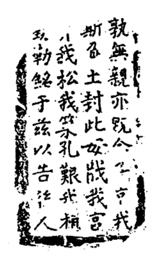
内乡在宋代属邓州,内乡大窑店瓷窑遗址就是文献中提到的邓州窑。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就曾记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可知邓窑是宋代河南地区汝窑系烧青瓷的瓷窑之一。出土的瓷器大量属于宋代遗物,也有一些具有唐代特征,个别青釉印花碗的碗底心有脐,内壁印折枝花卉,属于金元时代的风格。在窑址西边的石堂山,现存一通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石堂山麻衣道场重建十方普济宫碑铭》记有:"……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由上述可以看出内乡邓州窑始烧于唐末,宋代有较大的发展,金元时期,至少在元至大年间仍继续烧造。另外,又据明·李贤《大明一统志》记载:"南阳府土产瓷,内乡县出,有窑。"很可能这里明代还在烧造瓷器。说明内乡邓州窑前后延续达六百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发现的唐代瓷片中,已有窑变现象,说明钧瓷的烧造可上溯到唐末。为研究钧瓷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1958年初,在方城盐店村发现了一座宋代墓葬[76]。该墓为单室砖券墓,墓底用大方砖铺地,墓壁和墓顶用长方形小砖砌成。墓室内还有棺床,四周用花纹及波浪纹砖镶嵌,棺床面上铺有30多块篆字铭砖。记有墓主人埋葬年月和诸子姓名,形同墓志。从砖铭上可以看出,该墓为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范公夫人强氏之墓。其子范致虚为北宋尚书左丞,也是一位抗金的将领。此墓过去被盗,但仍出土150多件文物。除铁剪、银饰和崇宁通宝(公元1102~1106年)之外,大多都是石雕明器。包括石男俑25件,高30~40厘米,女俑10件,高20~37厘米。还有石牛、石兽、石鼠等。石俑和石兽均立于方座之上。也有石桌、椅、轿、方柜、器座、碗、盘、碟、杯、壶、碗托、圆盒、笔架、香炉、长方案、砚和筷子等生活用具。

无巧不成书。1971年2月,在盐店宋墓东北约1公里的金汤寨街内,又发现一座宋代石俑墓[77]。这也是一座砖砌单室墓,南有墓道。墓室长5.5米,宽4米。墓顶早被损毁。墓底的铺地砖共四层,最上面一层为方砖,其余均为小薄砖。墓门以楔形砖起券,用小薄砖封门。四壁砌有隶书和篆书的铭文砖,多为平砌,少量为立砌。还有两块楷书铭砖,背面模印六角形纹饰,对称砌在墓室的后墙上,周围以弧形砖镶边,六角形图案纹饰朝向墓室内面,组成两个棂式假窗,隶书的砖铭是:"有宋绍圣甲戌为建安郡高平范府君之墓尚千万年其永固"24字;篆书砖铭与盐店宋墓的篆书砖铭相近:"人孰无亲,亦既念子。哀我人斯,负土封此。毋戕我宫,毋斧我松。我筑孔艰,我植孔勤。勒铭于兹,以告后人。宋建安范府君之墓。绍圣改元。男致君、致明、致虚、致祥、致厚泣血铭"66字;楷书砖铭与篆书铭同,但仅有40字,缺少后段的姓氏(图七)。从砖铭中可以知道该墓为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范致虚父亲范通直的墓葬。据《方城县志》记载,在范致虚知邓州时,其父母随寓于方城而殁。该墓亦被盗掘,尚存石俑和其他石刻25件。石俑13件,均立于方座上,表面还饰彩绘,包括女俑3件,男俑10件。男俑中有导卫俑4件,方座上横刻"有宋范府君之导卫"8字;从卫俑4件,方座上刻"宋范府君之从卫"8字。还存有石俑方座1件,上刻"有宋范府君之驭士"8字。还有石鸡、石马,也均有方座,石马座上刻"有宋范府君之神

骥"，当与"驭士"石俑配套为一组。此外，还有石龙头、石桌、椅、屏风等。过去在宋墓中还很少发现石俑，这是河南仅见的二例。这些石俑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虽然没有巩县北宋诸陵石刻雕像那种雄伟的气势，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北宋小型圆雕中的优秀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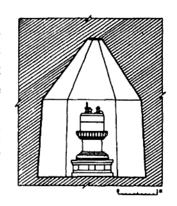


图七　方城金汤寨宋墓砖铭

1986年在金汤寨范通直墓的东北约100米处，又发掘出其四子范致祥墓[78]。该墓仅存铜镜和白釉黑花瓷碗各一件。在墓壁上有铭砖130余块。墓内还有墓志石3方，共计229字，分另由其兄范致君、范致明、范致虚，弟范致厚，子范寅恭、范寅宾、范寅用刻石，此类作法颇不多见。从《方城县志》记载中可知，其弟范致厚的墓在老招抚岗村，清光绪初年，在范致厚墓南侧发现其侄女范颐奴的墓志。由此看来，北宋范氏家庭三代人死后并未葬在一起，最远处相距11公里，连范通直夫妇也分葬在金汤寨和严店，相距约1公里。

邓州城内有著名的福胜寺塔，为河南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塔门向南，平面为八角形，为七层仿楼阁式砖塔，通高38.28米。塔身各层内外壁面嵌砌各种雕砖2000余块，内容有坐佛、菩萨、天王、力士、罗汉、伎乐及各种花纹砖饰等。1988年8月，为配合该塔的维修，清理了塔基地宫[79]。地宫位于塔心室下，由宫道、大门、甬道和宫室组成。宫室平面为六角形，六角攒尖式顶。宫室内有砖砌方台，台上置白色石质须弥座(图八)，座束腰部分的正面和左侧面刻有《地宫记》碑铭。座上置方形石函，石函盖上左右各放铁塔1座，石函内有银椁、金棺、玻璃舍利瓶和鎏金双龙银壶等物。其中银椁放在须弥座铜椁床上，前宽后窄，前高后低，前后档均线刻门框和门扉，两侧錾满龙兴寺、开元寺施主姓名和梵语。银椁内置金棺，前档有仿木建筑装饰，屋檐下錾刻两尊护法神。后档錾刻维摩院、观音院、龙山院诸僧和打造人姓名，左侧为释迦涅槃图，右侧刻文殊菩萨出行图。《地宫记》记施主姓名和随葬物品，后者与出土物相符。最后落款为"大宋天圣十年二月二十五日记"，提供了建塔的确切年代，纠正了过去误为隋塔的提法。这是宗教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古代科技史、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南阳、淅川、邓州等地，还发现有宋金钱币窖藏，出土大批古代货币[80]。在方城还出土有南宋时期银铤。1975年4月，在方城县东北10公里王营村北岗坡的自然石下，发现一个陶盆，盆内放置6件南宋时期的银铤，其中3件完整，另3件已残断[81]。银铤大小不同。完整的银铤形制较大的1件，两端呈弧状束腰形，表面微凹，周有波纹，长15.5厘米，宽6～9厘米，厚1.8～2.1厘米，重1950克。表面錾刻铭文："广州经总制库起发绍兴二十六年春季经总制银经铤伍拾两。专库苏举、李枢，监官司黄亨，右宣教郎经略司干办公事权通判向。"4行51字。右角下砸印"北张铺"3字倒立款识。另2件较小，但形制完全相同，两端呈弧状束腰形，表面微凹，周有波纹，长7.8厘米，宽3.4～4.6厘米，重245克，表面四角各砸印"真花铤银"4字款识。还有3件残断银铤。1件有残铭："……二十四年下限上供银……总领司大军库交……等参军监祖敏中"；另一件表面左右两角各砸印"相国寺"3字；再一件"……中平等……铤银黄……等。"这6件银铤从铭文可知，属于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等时期，是"经总制钱"，经制钱是当时各地方官巧立名目，加征税款；总制钱是总制司抽"总制钱"。二者合起来即"经总制钱"。这都是剥削人民的苛捐杂税。1976年9月，在方城县南3公里的张伯和村北，出土宋代银铤1件，保存完整，两端呈弧状束腰形，表面微凹，周有波纹。长16厘米，宽6.3～8.7厘米，厚1.7～1.9厘米，重1950克。左右上角各砸印"聂北铺"3字；束腰处左右两边各砸印"出门税"3字；左下角砸印"重伍拾两"4字；右下角砸印"北聂匠"3字。这件银铤虽未砸印或錾刻年号，但它同前述第一件形制较大的银铤的形制和重量完全相同。"聂北铺"是盘剥人民化纳税银的银铺字号；"出门税"是一些贪吏"私立税场"，向过往客商收纳的一种税。上述银铤的发现，对研究南宋的经济情况、阶级剥削和当时的衡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八　邓州福胜寺塔地宫剖面图

如前所述，南阳在旧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东周楚文化、汉代文化、南朝文化及两宋文化，都有如此丰富的考古发现。其中不少文物精华在南阳市博物馆或其管辖的县博物馆(如淅川县博物馆)展出过，在河南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过，有些甚至飘洋过海在世界一些国家展出过。这一方面展示了南阳的、河南的、甚至省外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光辉创造，使南阳在华夏古文明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地位。

今年既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又适逢南阳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双喜临门，值得庆贺。今年还临近20世纪的末尾。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并祝愿南阳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更大成就，再创辉煌。

注　释

[1]吴汝康、吴新智：《河南淅川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年第20卷第1期。

[2]①未化：《南召县发现猿人化石》，《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

②邱中郎等：《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报》1982年1卷2期。

[3]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7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4]张森水:《河南省旧石器新线索及管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5]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
[6][7][8][12][18]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①北京大学考古系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调查与试掘》,《华夏考古》1994年第2期。
②北京大学考古系等:《河南邓州市八里岗遗址1992年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7年第12期。
[11]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13]游清汉:《河南南阳市十里铺发现商代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
[14]《内乡发现商代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1988年11月4日。
[15]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16]①张西显:《浅说楚都丹阳在淅川》,《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
②李玉山:《楚都丹阳管见》,《楚文化研究论集(四)》,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7]韩维周、王儒林:《河南西峡县及南阳市两古城调查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1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①曹桂岑:《丹江口水库发现楚国贵族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30日。
②曹桂岑:《河南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发掘记》,《文物天地》1992年第4期。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21]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2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1978年。
[23]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24]王儒林:《河南桐柏发现周代铜器》,《考古》1965年第7期。
[25]董全生、赵成甫:《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26]淅川县文管会:《淅川县马川秦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27]李京华、陈长山:《南阳汉代冶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2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
[29]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31]①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年第3期。
②南阳博物馆:《河南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32]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南阳中建七局机械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33]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南阳县辛店乡熊营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34]①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南南阳县蒲山汉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②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南阳蒲山二号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35]南阳市文物队:《南阳市刘洼村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36]南阳市石化二厂30号汉画像石墓资料待发,现存南阳市古建研究所。
[37]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38]南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石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39]南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军帐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4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南阳汉代石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
[41]南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市麒麟岗汉画像石墓》(资料待发)。
[42]孙文青:《南阳草店汉画像石墓》,雨湘图书馆1944年。
[43]《南阳北关中原机校汉画像石墓》,《南阳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5年。

[44]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邢营画像石墓(M2)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45]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南阳市十里铺二号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46]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47]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第5期。
[48][65]南阳地区文物队等:《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49]①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6期。
②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唐河县针织厂二号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50]《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51]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河南唐河白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52]南阳市博物馆等:《河南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文物》1980年第3期。
[53]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河南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年第3期。
[54]南阳地区文物队:《方城党庄汉画像石墓——兼谈南阳汉画像石墓的衰亡问题》,《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55]《南阳汉代画像石》编委会:《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56]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邓州市梁寨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57]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新野县前高庙村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58]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安棚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59][66]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第8期。
[6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南阳东关晋墓》,《考古》1963年第1期。
[61]王儒林:《河南南阳西关一座古墓中的汉画墓像石》,《考古》1964年第8期。
[62]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郊王庄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63]南阳市博物馆:《南阳独山西坡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64]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南阳市妇幼保健院东晋墓》,《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67]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中华书局1990年。
[68]张晓军、魏仁华、刘玉生:《南阳汉代画像石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69][70]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71]魏忠策:《罕见的汉代戏车画像砖》,《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72]孙传贤、张静安:《介绍一件东汉晚期的陶水榭》,《文物》1966年第3期。
[73]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年第11期。
[7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75]刘建洲、王与刚:《内乡县大窑店瓷窑址的调查》,《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4期。
[7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村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77]方城县文化馆刘玉生:《河南省方城县出土宋代石俑》,《文物》1983年第8期。
[78]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方城金汤寨北宋范致祥墓》,《文物》1988年第11期。
[79]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等:《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文物》1991年第6期。
[80]①崔庆明:《南阳发现一批窖藏铜钱》,《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
②李松:《淅川发现一批古代铜钱》,《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③魏仁华:《河南邓县发现大批古钱》,《考古》1964年第8期。
[81]刘玉生:《河南方城县出土南宋银铤》,《文物》1977年第3期。

(原载《纪念南阳市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学术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黄河小浪底水库区古遗址古墓葬概述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哺育了亿万华夏儿女，也孕育了璀璨的古代文明，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历史上也曾多次泛滥成灾。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黄河的治理。除了在黄河中上游植树造林，修建了诸如龙羊峡、刘家峡、青铜峡等大型水库外，在河南境内也修建了著名的三门峡水库，如今，规模更大的小浪底水库也合龙在即。5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三门峡水库范围内发掘了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了三门峡虢国墓地，调查发现了三门峡汉唐漕运遗迹，包括古栈道、开元新河、摩崖题记，还有唐代的陆上通道和集津仓、盐仓遗存，以及唐宋时期的禹庙、开化寺等遗址。这些都是新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

正在施工的黄河小浪底水库，位于黄河中游末端，横跨山西、河南二省。其中河南部分包括孟津、济源、新安、渑池、陕县和三门峡湖滨区等7个县、市、区。它正处于东西交通之要冲，亦即唐代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深得天时地利之便。

自90年代初以来，在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的领导下，在黄河小浪底建管局移民局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院的大力支持下，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焦作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济源、新安和孟津等县、市文物部门，联合组成“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队”，对小浪底水库河南部分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其中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

旧石器时代距今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由于年代久远，所以，保留至今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寥若晨星。除了在济源市的大峪乡大峪村、大峪乡洛峪村、下冶乡岭村以及新安县仓头乡大章村发现有与古人类有关的哺乳类动物化石之外，在渑池的任村和青山村，还发现有一些人工打击的石片。这些石片均出土于上述两村北面的黄河南岸红色土层中，其时代甚早，属于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这些发现无疑增加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地域，扩大了寻找远古人类活动的视野，在科学研究上有重大价值。

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大约在距今1万多年前，人类发明了磨制石器、弓箭和烧制陶器，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其发现是70年代河南考古的重大收获。裴李岗文化遗址，绝大多数分布在河南中部，而在小浪底水库豫西淹没区内，也发现了多处。其中孟津县寨根遗址最下层（即第六层）为裴李岗文化堆积，包括文化层和5个灰坑，出有角把罐、三足钵、圜底钵、深腹罐、细颈壶等陶器，还有别具特色的长条形石磨盘和粗短的石磨棒。济源市长泉遗址最下层（即第五层），为裴李岗文化堆积，出土有细绳纹灰褐陶

罐、红陶三足钵和大口缸等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低，陶质差，易破碎，足见其原始，这是豫西北地区的首次发现。渑池班村遗址发现有裴李岗文化的房基、窖穴和用于烧烤食物的室外灶坑，出土有三足钵、筒形带把罐等陶器，还有一些石器、骨器等。这些重要的发现，扩大了裴李岗文化分布的地域，填补了豫西古文化的某些缺环，丰富了考古学编年系列。同时，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并非与河南中部裴李岗文化完全一样，它带有陕西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的少量因素，说明二者有某些交流和影响。

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在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建设中，找到了一批仰韶文化遗存。如孟津妯娌遗址、寨根遗址、赤河滩遗址，新安西沃遗址、荒坡遗址、槐林遗址、盐东遗址、太涧遗址、马河遗址、李村遗址、竹园遗址，渑池班村遗址、杨家遗址、洋湖遗址、白浪遗址，陕县郑家圪瘩遗址、张上遗址，济源桥沟遗址、长泉遗址等，均发现有仰韶文化遗存，其时代涵盖仰韶文化的早中晚期。其中渑池班村遗址发掘出相当于庙底沟一期的仰韶文化遗存，其延续时间较长，出土一些较为精美的弧旋钩连纹、花瓣纹以及太阳纹的彩陶片，发掘出一批窖穴和房基。房基多为半地穴式，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三种，其地坪和墙壁面都十分坚硬，反映出当时较高的房屋建筑技术。班村遗址的发掘采用了科技、环境、动植物、地质、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技术，并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成为小盆地区域性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范例之一，已引起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

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黄河小浪底库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也很多，如孟津妯娌遗址、小浪底遗址、赤河滩遗址、清河遗址，新安西沃遗址、冢子坪遗址、盐东遗址、马河遗址，渑池班村遗址、任村遗址、南村遗址、杨家遗址、柳窝遗址、白浪遗址，陕县张上遗址，济源桥沟遗址、留庄遗址等。上述不少龙山文化遗存都叠压在仰韶文化之上。其中妯娌遗址属龙山文化早期即庙底沟二期文化，发掘出圆形房基15座，均为半地穴式，入口处设有台阶。还有灰坑146个，墓葬56座。出土有鼎、罐、瓮、壶、甑、盆、豆、杯、碗、缸、器盖等陶器，斧、铲、锛、凿、刀、镰、矛、镞、网坠等石器。引人注目的是出有1件直径20厘米的石璧、带穿孔的石钺和3件成组的"陶铙"，均具有礼器性质。由于文化层堆积较厚，还有一些遗迹存在打破关系，因此，对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再分期有重要意义。该遗址曾被评为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原始社会崩溃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夏代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奴隶制国家，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夏商遗址也有一些发现，如孟津小浪底遗址，新安盐东遗址、太涧遗址，渑池杨家遗址，济源交兑遗址等。其中新安太涧遗址发掘夏末商早的二里头文化灰坑24个，开口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三种，出土有罐、大口尊、鬲、盆等陶器。济源交兑遗址最下边堆积为二里头文化层，出土有绳纹深腹罐、带鋬罐、大口尊、捏口尊、盆、壶、缸等陶片。渑池杨家遗址也发掘出早商的灰坑和篮纹罐、花边口沿罐、盆等陶片。这些发现对探索夏文化、研究早商文化均有一定学术价值。

两周时期，经济文化相当发达，这里也有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在孟津小浪底遗址，新

安冢子坪遗址、盐东遗址，渑池南村遗址、洋湖遗址，济源交兑遗址等均发现周代遗存。在济源下冶乡长泉村北，发现一座东周城址。城墙系夯筑而成，南北长 250 米，东西宽 150 米。北墙残高约 2 米左右，西北城角、东北城角保存最好，分别高6～7米和8～10米。其它城墙残存较低，有些已掩埋在地面之下。城内出土有灰陶盆、绳纹板瓦等东周遗物，城西有春秋墓地。该城地理位置重要，为黄河北通向黄河南的交通要道，也可能是当时的军事重镇。此外，在新安石井、李村，济源大峪、留庄等地还发现不少东周墓葬。其中在济源留庄发掘春秋早中晚期墓葬 130 座，出土了一批陶器、铜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随葬品。较典型的墓葬有 1 号墓和 123 号墓，均为较大型的竖穴土坑墓，墓室长3.7米，宽2.3～2.6米，深达 10 米以上。1 号墓曾遭破坏，但仍出有鼎、匜、钺等青铜礼器，戈、镞等青铜兵器，还有一些青铜车马饰件和若干骨贝；123 号墓出有鼎、簋、盘、匜、舟等青铜器，还有各种陶器 140 件，以及一些玉器、石器、骨器等。留庄墓葬的陶器基本组合为鼎、鬲、罐、盆、豆，且随时间早晚也有些变化，对探讨这一地区东周陶器的分期编年，有重要意义。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前者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凝聚了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后者进入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位于古都长安和洛阳之间，在东汉和唐代属于近畿地区，其有古可考之多，是不言自明的。

在孟津小浪底、桃树沟、煤窑、李家坡、冢子坪、大西沟，新安盐东、仓头、马河、石渠、石井、李村、西沃，渑池龙门、南村、河水、班村、陵上、杨家、洋湖、柳窝、青山、白浪、槐扒，陕县张上、老雕窝、曲里、东庄、赵李河，三门峡七里沟，济源小沟、洛峪、白沟、交兑、竹峪、大交、刘庄、关阳、长泉、逢石、大峪、柏圪瘩、涧北等地，均发现有汉代墓群，有些还发现有唐代墓群。在新安盐东发现有汉代建筑基址，有 2 米～3 米厚的夯土层，并有大量的板瓦和筒瓦。在新安北冶，发现有汉晋冶铁遗址。在三门峡七里沟发现有汉唐漕运遗址。在陕县峪李村发现有唐代城址，俗称“运粮城”，面积约 3 万余平方米，地表散见布纹瓦片等建筑构件。此城史书无确切记载，当与唐代漕运有密切关系。在新安西村，也发现有一座唐代城址，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宽约 200 米。城内发现有唐代文化层和瓦片。这应是唐初为漕运而设置的长泉县。

还要指出的是，济源邵原乡毛田村有毛公冢，据县志载毛田是周司空毛公的采邑。冢较高大，年代和内涵不详，疑为唐墓。而新安西沃乡下坂峪败仗沟有后唐庄宗李存勖墓，即县志所载的“雍陵”，今墓冢土已不存。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当时的全国五大名窑河南就占其三。这里虽然赶不上名满天下的汝窑、钧窑和官窑，但也发现一些质量上乘的民间窑址，其烧造年代有的延续到元代，也发现一些元代始烧的瓷窑址。如新安横山沟口、滩子沟、梁庄、蒿子沟、庙后、北冶等处均发现宋代瓷窑址，或宋元瓷窑址，或元代瓷窑址。出土有窑炉残壁遗存，也有匣钵、支烧、器托、窑衬等窑具，还有各种釉色和花卉图案的碗、钵、盘、盆、缸、炉、瓶、壶等瓷片。这些琳琅满目的遗物，反映了当时瓷业的繁荣。另外，在新安盐东、马河、石渠、梁庄、李村，渑池关家、南村、洋湖、济源涧北等地发现一些宋代墓葬。其中有一些为仿木结构砖室墓，并绘有彩色壁画或雕砖人物花卉。在渑池南村有张玘父子墓。张玘《宋

史》有传，世居渑池，为抗金名将，曾屡立战功，历官领御营宿卫前军都统。海州之役，玘歼金兵万计，后中流矢牺牲。其子张世雄，殁于符离之战，赠武节大夫。张玘父子均葬于渑池南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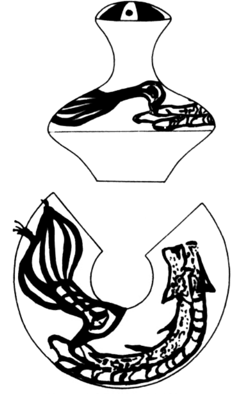
上述的考古发现，体现了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示了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发展历程。让人们看到现代化的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的同时，也能看到这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以此激励我们向着美好的未来继续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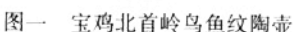
（原载《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8 年）

从出土文物看古代的龙

龙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但却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理想动物形象。所谓龙，实际上是以鱼或蛇再装点其他一些动物特征而组成的神物。《说文》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葬内，出有一件彩陶壶，高 21 厘米，腹肩处用黑彩在红地上绘出一只水鸟啄着一条大鱼的尾巴，形象十分生动[1]（图一）。鱼头呈方形，巨腮，有鳞纹；水鸟为人眼，彩羽，有冠绶。有同志认为这应是龙凤纹[2]，也是有些道理的，鱼的外形近似于后来的蟠龙。这件彩陶壶距今 6120 ± 140 年 ~ 6790 ± 145 年，应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龙纹了。

在原始社会，龙作为氏族的祖先和保护神（图腾）而存在，往往把古史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和龙联系在一起。《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





图一　宝鸡北首岭鸟鱼纹陶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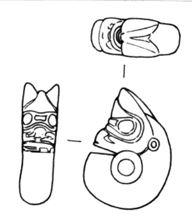
图二　甘肃武山人面龙身纹陶瓶

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着感生炎帝。”《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也就是说，开天辟地的盘古，以及炎帝、黄帝等都是龙的后裔。《山海经·南山经》记有：“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甘肃武山出土的仰韶文化双耳陶瓶的腹部，就绘有人面龙身纹，龙身较长，前有双爪。身有斜方格鳞纹（图二），很符合上述文献记载。

古代传说中有许多龙。《广雅》云：“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述异记》卷上记有：“水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在龙的家族里还有烛龙、苍龙、蟠龙……等。《山海经·大荒北经》就记有：“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在出土文物中，还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龙。最近，在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两座仰韶文化墓葬中，分别发掘出土随葬的用蚌壳摆的龙、虎等动物造型。龙长1.78米，张牙舞爪，似在云中行进[3]。如果说宝鸡北首岭和甘肃武山出土的彩陶壶、彩陶瓶的龙纹还相当原始的话，濮阳的蚌壳龙形就和后代的龙比较接近了，而且形制如此巨大，简直难以令人相信这是五千多年前的杰作。《三辅黄图》卷三：“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龙与老虎对称摆在人骨架两旁，也许就是“四灵”的雏形吧。

前几年，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有泥塑猪龙和玉猪龙[4]。泥塑猪龙仅存头、耳、吻及前身、下肢部分，头部似猪形，身卷曲，有蹄爪；玉猪龙雕作兽首形，大耳，睁圆眼，



图三　辽宁牛河梁玉猪龙



图四　内蒙翁牛特旗玉龙



图五　山西陶寺彩绘蟠龙纹陶盘



图六 殷墟妇好墓蟠龙纹铜盘



图七 偃师二里头带爪龙纹陶片



图八 偃师二里头一首双身龙纹陶片

吻部前凸,口略张开,体卷曲如环,整体扁圆、厚重、光洁(图三)。内蒙巴林右旗也出土有类似的玉猪龙。内蒙翁牛特旗出土一件大型玉龙,高26厘米,通体墨绿色,龙身光洁圆润,卷曲为C字形,龙头吻部前伸,双眼突起呈棱形,颈脊饰有长鬃,很有生气(图四)。上述均为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余年,是不可多得的考古发现。1978～198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出土一件彩绘陶盘[5]。盘为泥质褐陶,盘壁斜收成平底,高为8.8厘米,口径为37厘米,盘面上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蟠龙图案。龙形如鳝鱼,龙首有角状饰物,牙如梳形,身有两行半月形鳞甲(图五),这是距今4000多年的艺术珍品。《太平御览》卷九三〇引《沈怀远南越志》有关蟠龙的描述:"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与之近似的是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蟠龙纹铜盘[6],盘为敞口宽沿,浅腹圜底,高16厘米,口径41厘米;盘内饰蟠龙纹,巨头长躯,头作侧面形,口向下,身尾绕盘底一周,上饰半月形鳞纹。龙头旁边,还饰有游鱼(图六),大约就是影射"常随水而下,入于海。"

偃师二里头是闻名中外的夏末商初的遗址,也出土有龙的纹样。一件残陶器上的龙纹是龙首巨目,龙躯蜿蜒,趾爪俱全(图七);另一件陶片上的线刻龙纹是一首双身,头朝下,眼珠外凸,周身有鳞,上方卧一只小兔(图八)。这两件龙纹造型生动,而且在眼眶内部涂有翠绿色颜料,浅刻线条内部涂有朱砂,是相当珍贵的艺术品[7]。

到了商代后期,龙的图案、纹饰和造型更加增多。除上面提到的蟠龙纹铜盘外,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方壶、四足觥等铜器上都饰有龙纹;不少玉器也都雕作各

种龙形[8]。如一件玉璜，弧度大于半圆，龙上下门齿相连，方形目，一角向后，足前屈，雕四爪，尾尖上卷，背脊雕作扉棱形，颈饰鳞纹，身、尾饰变形云纹(图九)；一件玉玦，圆形，中间有小缺口，两面均雕蟠龙纹，龙的头、尾衔接，背脊作扉棱形，龙口微张，露齿，角向后，目字形眼，尾尖外卷，通身饰云纹(图一〇)；一件玉龙，作蟠曲形，头尾相接，中有缺口，尾尖内卷，张口露齿，目字形眼，细长眉，头上有两钝角，腹下有两短足，中脊突起、通身饰菱形和三角形纹，可谓栩栩如生(图一一)。1973年，在安阳小屯村北，出土了一件大型龙纹石磬，长88厘米，高28厘米，厚4.2~4.5厘米，两面均饰龙纹，大头巨目，张口欲吞，长躯鱼尾，有高脊，趾爪俱全，雕刻线条刚劲流畅，为这件古乐器增色不少[9](图一二)。

不但商代铜器、玉器、石器饰有龙纹或龙的造型，在商代甲骨文中也有一些龙字，犹如带角的长虫，十分形象(图一三上)；商周金文中同样出现一些龙字，也多是象形字，晚一些的近似篆书(图一三下)。这就更可证明，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龙不但与水有关，还与天、云相联系，前面提到《说文》云：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而《易经》也说："云从龙"，"飞龙在天。"在我国古代传说中，人、神都可以乘龙上天或遨游太空。《大戴礼·五帝德》："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山海经》则记有：祝融"乘两龙"，夏后启"乘两龙"，冯夷"乘两龙"，蓐收"乘两龙"，句芒"乘两龙"等。《九歌》中说：大司命"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湘君"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东君"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连屈原自己在幻想超脱尘世，灵魂升天时也是借助于飞龙驮载："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兮瑶之圃。"这些在出土文物中也有一些印证。1973年，长沙城东南子弹库楚墓出土一件罕见的人物御龙帛画，帛画为细绢地，呈长方形，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面正中为一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略呈一舟形。龙尾上部站着一鹤，左下角为一鲤鱼，人头上方为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是乘龙升天的形象[10](图一四)。郭沫若同志专为此写了一首《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

仿佛三闾再世，
企翘孤鹤相从。
陆离长剑握拳中，
切云之冠高耸。

上罩天球华盖，
下乘湖面苍龙。
鲤鱼前导意从容，
瞬上九重飞动。

此外，1957年发掘的洛阳西汉壁画墓有男女墓主人骑龙升天图[11]；1970年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砖墓就有东王公驾龙图：左为一只昂首展翅飞翔于云气之中的龙，右有二人乘在上面，前为御人，执鞭驾辔；后面冠冕长袖者为东王公[12]。还有乘龙图：一有翅仙人骑在张翼飞翔的龙背上，龙下有一游鱼(图一五)。



图九　殷墟妇好墓龙形玉璜



图一〇　殷墟妇好墓龙形玉玦





图一一　殷墟妇好墓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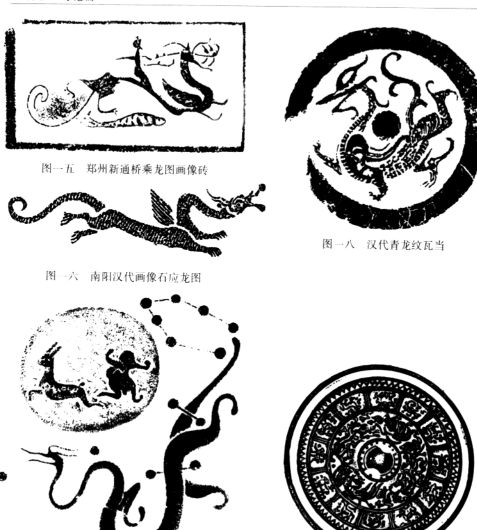
图一三　甲骨文(上)、金文(下)中的龙字



图一四　长沙楚墓人物御龙帛画



图一二　殷墟龙纹石磬



图一五　郑州新通桥乘龙图画像砖

图一八　汉代青龙纹瓦当

图一六　南阳汉代画像石应龙图

图一九　隋代四神十二生肖铜镜

图一七　南阳汉画像石苍龙星座图

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有许多龙的形象，有黄龙、应龙、苍龙星座等。应龙是一种有翼的龙（图一六），也是黄帝的神龙，《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苍龙星座图为一昂首、长尾、神态生动的苍龙，由头至尾刻有十八颗星，上为一轮满月，月内有玉兔和蟾蜍。该星座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龙首两侧二星为角宿（图一七）。苍龙即四灵中的青龙，其形象在汉代四灵图案的瓦当中也有表现，由此可以看出到了汉代，龙的形象才固定下来（图一八）。



图二〇　唐代四神十二生肖铜镜

龙与年相联系的是十二生肖，古代的术数家拿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地支：子为鼠，丑为牛，寅为虎，卯为兔，辰为龙，巳为蛇，午为马，未为羊，申为猴，酉为鸡，戌为狗，亥为猪。《论衡·言毒》就记有："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人生在某年就肖某物，如寅年生的肖虎，卯年生的肖兔，辰年生的就肖龙，这也称为十二属相。今年岁次戊辰，自然就是龙年。《陔余丛考》，卷三十四谓十二相属之说起于东汉，汉以前未有言之者。隋唐时盛行四神十二生肖铜镜，内区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外周是排列一周的十二生肖（图一九、图二〇）。

隋唐以降，龙的装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除铜镜之外，石雕、瓷器、织锈、绘画等，无不表现龙的气势磅礴或活泼浪漫的色彩。明清时期，龙成了最高统治威仪的象征，宫殿建筑、雕刻绘画和各种美术工艺品中龙的形象更加丰富多彩。

千百年来，还流传一些"好龙"的故事。《新序·杂事》就记有"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里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这则好假龙、怕真龙的"叶公好龙"，已成了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还有一个"董父好龙"的故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有："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

从历代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发现证明，由于人们把龙当作太平盛世和吉祥的象征，所以关于龙的神话、龙的传说、龙的纹饰、龙的造型，数千年来久盛不衰，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注　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2]蔡易安：《中国龙凤艺术研究》，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7 年。
[3]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 年第 1 期。
[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8 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
[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7]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 20 页，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 年第 1 期。
[10]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 年第 7 期。
[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
[12]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1972 年第 10 期。

（原载《中原文物》，1988 年第 1 期）

建国以来河南古代钱币的发现和研究

建国以来,在河南发现了大量的古代钱币。仅在《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和《中原文物》上截止到1982年底以前发表的资料,河南发现的古代钱币包括:贝4838枚,布币2141枚,半两711.5公斤另1983枚,五铢30公斤又12筐另15480枚,宋钱3365公斤另703枚,金银币446块、枚[1]。上述统计不及实际发现的十分之一,从一斑而窥全豹,可以勾画出中国古代货币文化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全过程。反映了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和王朝兴衰的梗概。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生产、科学技术、商品经济,书法和造型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下面依据早晚的顺序,介绍一下河南从商到宋金的古代钱币发现。

一

中国钱币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种类繁多,丰富多彩。最早的钱币是贝。因为贝数量较少,得之不易;本身有使用价值,可以做装饰品,在古代被人们看作吉利的象征;贝有天生的单位,便于计数作价;还便于携带;本身坚固,经久耐用。所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被人们选中为钱币。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使用过贝。在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墓葬中,随葬有海贝、石贝、骨贝和蚌壳[2];在西宁朱家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以及云南西双版纳原始社会遗址也出土有海贝[3]。但这些贝很可是作为生活中的装饰品。夏代作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是应当有钱币的。桓宽《盐铁论·错币》中就记有:"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但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夏代钱币的实物。

目前我国最古的钱币,是在河南发现的商代早期贝币,远在50年代末,在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早期遗址中,就曾发现过1枚骨贝。"平背,两面磨光,半圆,顶有一穿,下为一直沟槽,槽左右的横道齿状,使用光滑,与真贝形状非常相似"[4]。更明显的例子是在1975年秋,在偃师二里头发掘一座商代早期墓葬(编号75YLVIK3),是奴隶主贵族墓[5]。墓坑南北长2.3米,东西宽1.26米,深1.26米,在墓底铺有朱砂。除随葬有一批铜器、玉器、石器、骨器和陶器之外,在棺内偏北部还发现有海贝12枚,在近尖端处都有一个孔。这是早商时期的钱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和交换的一些情况。为中国货币文化史上最早的实物资料。

有更多的考古资料证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贝在商代前期的确已作为货币使用

了。1955年，在郑州商代二里岗期墓葬中，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尤其在郑州白家庄一座奴隶主墓葬中(编号C8M7)，除了出土多件铜器、玉器之外，还有穿孔海贝460多枚[6]。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商代晚期，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历史阶段。各种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尚书·酒诰》记有："肇牵牛车，远服贾"。大约在商代晚期，已经有了专业的商人。"商人"一词，可能就因商族人善于经商而产生的。货贝显然更广泛地应用于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之中，成为奴隶主贵族和商人们追求与聚敛的对象之一。因此，在安阳殷墟发现的贝币就更多了。

1950年春天，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北，发掘一座大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深8.4米。虽几经盗掘，但还残存相当一批铜器、玉器、石器和白陶器，还出有多量海贝[7]。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发掘168座商代小型墓，其中83座墓殉有贝。少者1枚，多者20枚，总数达234枚。"它们放置的位置，绝大部分都是在人骨架的口中、手内和脚下三处，这些贝都是天然的，仅在背上的一端琢孔1个。"与此同时，在大司空村商代车马坑的车箱内，也出土了一批海贝。"约有50余枚(整体起回，未分开数)在舆中偏西，贝形与附近殷墓中出土的相同"[8]。

1955年秋，在安阳小屯发现海贝11枚。都出在一个商代灰坑内。椭圆形，一面平直，一面微鼓，中部都有一个圆穿孔"[9]。

1957年，在安阳高楼庄商代遗址内，发现3枚海贝；在2座商代墓内，分别随葬有1枚海贝和3枚海贝[10]。

1958年春，又在安阳大司空村发掘一批小型商代墓。其中11座墓殉有海贝，少者1枚、2枚，多者达83枚，总数为120枚[11]。

1958年，在安阳薛家庄发掘的一些小型商代墓中，有8座墓殉葬海贝，各置贝1枚[12]。

1959年，在安阳后岗发掘出一座圆形祭祀坑。坑呈圆形袋状，口径1.9米，底径2.15米，深3.78米。共发现人骨架54具，下层埋葬29具，上层有25具。坑内除有铜器、陶器、粟和麻织品外，也有类似殉贝的情况。贝"或系于手臂或系于腰部。第一层人架中的16号人架左尺骨上的一串最为精美，由48枚海贝串合而成……。挂在腰部的贝多发现于盆骨上，以第二层27号人架为例，在右盆骨上发现有排列规整的海贝三串。第一串20贝，第二串10贝，第三串5贝。贝孔皆向下，似有线索穿贯其间。随葬贝的数目多少不一，最少1枚，最多达300枚左右。有的放在口中，有的压于胸下或腹下，也有成堆装在麻布袋中的"[13]。

1969年~1977年，在安阳殷墟西区发掘出939座商代墓葬，有342座墓殉贝，总数达2459枚，背部均穿一孔。其中有4座墓殉贝有百枚以上，最多的1座(编号为M272)有350枚[14]。有人推测可能是商人的墓葬[15]。

1976年，在安阳小营村南、武官村北的王陵东区范围内，发掘出一大批祭祀坑。都是长方形竖穴，平均长2米，宽1米，深2米左右。多为南北向坑，每坑掩埋青壮年男性无头

遗骨8~10具；少量为东西向坑，每坑埋有多具女性遗骨和少年儿童。这是惨绝人寰的祭祀遗存。在个别祭祀坑中也发现有海贝，如编号为M240的祭祀坑中就出有海贝4枚[16]。

1976年5月，在安阳小屯村北略偏西约100米处，发掘一座完整的王室墓葬，这就是闻名中外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妇好墓”[17]。墓口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墓深7.5米。墓内出有大批精美的铜器、玉器、石器、宝石制品、骨器、象牙器、陶器和蚌器。不少铜器铸有“帚(妇)好”的铭文，当为墓主人。妇好之名，在武丁时期甲骨文中有近250条记载[18]。郭沫若同志指出：“帚乃妇省，妇好乃武丁之妇，名常见，每有从事征战之事”[19]。引人注目的是，妇好墓内随葬海贝竟达6880多枚。在全国的考古发掘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据鉴定，这种贝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以至更远的海域，可见来之不易。这表明商代晚期大量的货币已集中到少数大奴隶主贵族手中。

从上述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在商代晚期用贝殉葬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但王室贵族墓葬内有，大批的小型墓内也有；甚至在祭祀坑内，在马坑内和一般灰坑中，也有不少海贝。从有些贝放置的部位看，可能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但多数含在口中，握在手里，与后世用玉或铜钱随葬的习俗是相同的，显然是作为财富的象征。《尚书·盘庚篇》记有：“滋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其中“具乃贝玉”与“无总于货宝”前后对应，而“贝玉”和“货宝”都居同等地位，作为财富无疑了。由此推之，大墓内众多的贝，车舆内装载的贝，则更是当时的钱币了。

在甲骨文中，有一些关于“贝”的记载。如“丁亥卜，光取贝二朋在正月，取”[20]。商末铜器中“赐贝”或“赏贝”的铭文颇为习见。如：“侯赐中贝三朋，用作祖癸宝鼎”(“中鼎”铭文)；“王赏戍嗣子贝二十朋”(“戍嗣子鼎”铭文)。从上述记载中也可证明，贝是作为钱币来赏赐的，而且以“朋”为计算单位，这可与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不少人认为，10贝为一朋；也有人认为5贝为一朋[21]。《毛诗》郑笺说：“古者货贝，五贝为朋”[22]。如前所述，后岗圆形祭祀坑中发现成串的海贝，有45枚一串的，有20枚一串的，有10枚一串的，有5枚一串的，皆为5贝的倍数。5贝一朋的说法，看来也不无道理。

除了海贝作为钱币之外，还有石贝、骨贝、蚌贝、铜贝等人工仿制的贝，也同样起过钱币的作用，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来弥补海贝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铜贝的发现了。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14号商墓中，随葬1枚铜贝；312号商墓内，随葬2枚铜贝。且“型式相同，系仿海贝铸成”[23]。1967~1977年，安阳殷墟西区620号商墓内，又出土2枚铜贝。“似海贝，长1.6厘米”[24]。此外，还应提及的是，1971年11月，在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商代晚期墓中，发现有109枚铜贝和112枚海贝[25]。这些铜贝都是仿海贝铸造而成的，是解放后仅有的三次发现。其时代明确，出土地点清楚，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这些铜贝虽少，但它开创了金属铸币的先河，代表了中国钱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实为不可多得的稀世奇珍。

西周时期和商代一样，通用的钱币仍然是贝。由于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贝的钱币作用显示得更加充分。有一些西周铜器铭文记载贝的购买力。如“遽伯睘簋”记有：“遽伯睘作宝障彝，用贝十朋又四朋”。意即铸造这件铜簋用钱14朋贝。又如“裘卫盉”记有：“……矩伯庶人取觐璋于裘卫，才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矩又取赤虎两、麂韨两、韨韐

一，才二十朋，其舍田三田”[26]。大意是，矩伯用10块田，换取裘卫用于朝觐的价值80朋贝的玉璋；又用3块田，换了价值20朋贝的两张赤色虎皮、两件鹿皮披肩和一件杂色围裙[27]。由此可见，西周时的贝，已是交换铜、玉器、皮件、衣服甚至土地等商品的媒介，自然是通行的钱币无疑。

西周的金文中也常有“赐贝”的记载，一次赏贝5朋、10朋甚至30朋、50朋不等，最多的一次赏贝百朋。《诗·小雅·菁菁者莪》记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由此可见，这些贝都是作为钱币赏赐的。

解放前，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群内，曾发现货贝3472枚[28]。建国后，1956～1957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西周晚到东周初）中，发现大量的海贝、石贝和陶贝[29]。这些都是作为钱币或钱币的象征来殉葬的。

二

春秋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也是古代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尤其是铁器的使用，使城市的规模愈加扩大，各诸侯国都出现了不少人口集中、商业繁盛的通都大邑。例如：“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太平御览》卷七七六引桓谭《新论》）。再如：“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在这种情况下，贝币已经远远不敷需要，于是产生了大量的金属钱币。三晋地区的布币脱颖于农具铲形器；齐燕地区的刀币则溯源于刀削；秦及中原地区的圜钱时间较晚，可能仿自纺轮或玉璧；南方楚地的蚁鼻钱是由海贝演变而来，称之为有文铜贝，河南地处东西南北的要冲，正是各种铸币相互交流的交汇之地。尤其是布币，解放后有不少重要发现。

1954年春，在洛阳西郊小屯村北出土1枚空首布[30]。有同志定为斜肩弧足空首布[31]。

1954年，郑州岗杜战国墓出土4枚有“武”字铭文的垂肩弧足空首布[32]。

1958年9月，在洛阳老城东南5公里夹于伊、洛河之间的董村，村东200米远距地表1.2米深处的黄土层中，发现平首布583枚，圜钱118枚[33]。

1962年3月，在宜阳县西31公里的仟佰岭村西约300米处，距地表深约0.5米的灰土层中，发现19枚平肩弧足空首布[34]。

1966年10月，洛阳市郊马坡村的群众，捐献72枚平肩弧足空首布。据说是解放前夕（1948年冬）在孟津县东南6公里的后海资村出土的[35]。

1970年12月，在伊川县东南7.5公里的富留村，村西有殷周遗址，出土一陶瓮共753枚空首布。其中平肩弧足空首布604枚，斜肩弧足空首布149枚。解放前，在其西约800米处，也曾出土过一瓮同样的空首布[36]。

1971年3月，新安县东5公里尤彰村，在村西300米远的台地上挖水渠时，发现401枚平肩弧足空首布[37]。

1973 年冬，在新郑县北关，发现一罐窖藏战国货币，共计 226 枚平首币[38]。

1974 年初，在临汝县西北 22 公里的陵头村北，发现 287 枚平肩弧足空首布[39]。

1974 年 8 月，在洛阳市西工十五工厂，出土两罐总计 1883 枚空首布。其中平肩弧足空首布 1516 枚，斜肩空首布 367 枚[40]。

1975 年 5 月，在孟津县西南刘家嘴村北约 250 米处，出土平肩弧足空首布 336 枚[41]。

1976 年初，在洛阳市涧河东岸七〇四厂发掘战国粮仓遗址时，出土空首布 57 枚，其中平肩弧足空首布 52 枚，斜肩弧足空首布 5 枚[42]。

1980 年春，宜阳县柳泉村出土斜肩弧足空首布 150 余斤，约 2000 枚左右[43]。

1982 年，河南省文物商店在洛阳地区征集到平肩空首布 200 多枚[44]。此外，洛阳、伊川、宜阳、孟津、登封等地零星征集到平肩弧足空首布近百枚[45]。

1984 年 4 月，在郑州西北郊沟赵乡，出土一罐战国平首布，总计 2065 枚[46]。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发现的空首布约 6115 枚左右，平首布 2874 枚，圜钱 118 枚。其中平肩弧足 3587 枚，多数形制较大。均为长銎、平肩、足面微向内凹呈弧形。布身铜质甚佳，造型相当规整。布的四周均有郭，正面和背面都有三道平行竖线，銎上都有一个三角小凸起点，两面还有相对应的不规则形穿孔。形状大小基本一致，通长一般为 9～10 厘米，肩宽 4.7～5.2 厘米，足宽 4.9～5.5 厘米。铭文多为一个字。少量是小型的，制作粗糙，肩部两端常有流铜现象。布身正面和背面也各有三道平竖纹。通长 6.3～7.4 厘米，肩宽 3.3～3.8 厘米，足宽 3.9～4.3 厘米。大型和小型平肩空首布上的铭文有：一、二、三、四、五、六、八、十、甲、丙、戊、己、辛、壬、丑、卯、午、戌、王、谷、商、土、日、月、雨、雪、屮、弃、行、工、君、山、北、公、土、金、臣、勿、贝、田、鼎、莘、盱、应、毕、柳、禾、黍、秆、室、皿、化、匕、喜、兑、史、尚、是、巨、弄、封、上、下、卜、非、利、向、益、沇、鬲、高、智、宁、文、祝、成、台、吴、邬、留、石、斩、古、丹、南、平、止、疾、阜、白、陬、贸、穆、伐、升、奉、共、未、竹、册、贡、周、亳、京、印、仁、武、宋、同、示、戈、昌、木、羊、羔、立、氏、目、元、文、斤、只、戚、叔、丝、宗、市、井、甗、松、侯、合、空、来、口、非、仓、高、坩、箕、珥、斤、臧、丰、束、谷、介、壬、午、安臧、东周、安周、邵文、官考、王氏、二口、公斩、鄩、市南小化、周南小化、戊弋小化、□□小化（有背文“易”字）等 160 余种。斜肩弧足空首布 2526 枚，铭文较简单，只有：武：卢氏、三川斩、武安，武爰等 5 种。这些铭文的内容，有数字如一、二、三、四；有干支如甲、丙、辛、丑；有地名如周（成周）、商（商丘）、莘（郑地）、戚（濮阳）；有吉语如吉、喜、祝、昌；还有不少尚弄不清含义。这些铭文大部分前人已作过著录，但也有近 40 种是新的发现。这为研究我国先秦币文字，增添了新的内容。

平首布要比空首布晚。在洛阳发现的 583 枚平首布中，包括平肩平首布 17 枚，均为平首、平肩、弧裆、方足。铸造较精细。钱面铸铭有：薄坂一斩、阴晋一斩、晋阳一斩、京一斩、梁一斩等 5 种。除晋阳一斩有郭外，其余钱的周围均无郭。圆肩平首布 566 枚。皆为平首、圆肩、弧裆、方足。钱面铭文有：安邑一斩、安邑二斩、虞一斩、梁正尚百当寽等 4 种。前两种周缘无郭，后二者周缘有郭。新郑出土的平肩平首布铭文主要有：颖一斩、梁邑、蔺、蒲子、數垣、安阳、马服邑、鄗、中都、屯留、郲、北屈、垂、鲁阳、平阳、盘、宅阳、阴晋一斩、阳邑、鄁涹安、涅金；圆肩平首布铭文：梁充斩金当斩、梁充斩五当寽十二、梁正尚金当寽、

安邑二釿、安邑一釿、虞一釿等。郑州沟赵乡出土的平肩平首布铭文,除一些与新郑的相同之外,还有平阴、郹、邬、隰城、周是、奇氏、涅、露、莆子、同是、高都、丘贝、郞子、践土、王氏、邪氏、皮氏、皿阳、壤阴、咎如、祁、朵邑、虐阳、曾尚、盥、声阳、歹邑等。这些地名均在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属韩、赵、魏"三晋"地区。

圜钱出现要晚于空首布,均为圆形,中央有圆孔,周缘无郭,背面光素,制作粗朴。钱外径3.9~4.4厘米,孔径0.6~0.9厘米。洛阳董村出土的118枚圜钱正面铸有铭文:垣、共、安臧等三类。这些铭文也是地名。垣(山西垣曲县西),共(河南辉县)均属魏国,安臧(河北正定)属赵国。

上述东周货币很有价值。过去见于著录的空首布,多为传世之物,缺乏具体的出土地点。而这些空首布出土地点明确,数量又多,说明地处中原的东周王都洛阳地区,远在春秋早、中期已流通金属钱币,其铸造和使用的时间,均比山西侯马春秋战国之际铸造空首作坊作出的空首布要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和手工业进步。平首布和圜钱过去发现得不多,尤其是后者,自成一个体系,对古代钱币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东周时期,位于江淮流域的楚国,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楚文化,铸造了自成体系的钱币,除铜质的贝形蚁鼻钱外,还有丰富多彩的金、银币。

1960年,在信阳长台关苏楼村,一位农民在楚王城的跑马岭附近,发现了一块楚国金币。长2.2厘米,宽1.4厘米,厚0.4厘米,重25克。经鉴定含纯金百分之九十以上。金币上铸有"郢爰"、"爰"三个字,显然是一块"郢爰"[47]。

1972年~1973年,也是在信阳长台关楚王城附近,又发现一些楚国的金币。多呈扁平块形,大小多半像钮扣一样,每块质量、形式、大小等,并不很一致。面上有些类似图章的印记。上面铭文有"郢爰"或"爰"字[48]。

1975年元月,在固始县北关,发现有三块楚国金币。每块略近方形,平均为1.5厘米见方。正面皆有"郢爰"二字,背面素平,四边留有分切痕迹。这里处于一座周代古城址的东南,还出有东周时期的铜剑和器物[49]。

最重要的发现是1974年8月,在扶沟县西南17.5公里的古城村,找到一处金银币窖藏。有两件锈结在一起的铜器,上为铜鼎,内盛银币18块,重3072.9克,下为铜壶,内盛金币392块,重8183.5克[40]。

银币皆为布币,依据本身可分长、中、短三种。短型布6件,通长为10~11厘米,身宽为5.8厘米。外形呈长方铲子状。其中空首布1件,实首布5件。中型布10件,通长14厘米,身宽6.4厘米。均为实首,其中一件背面刻铭"五"字。长型布2件,长15.7厘米,身宽5.8厘米,皆为实首,背面都刻有"五"字。

金币有金版和金饼两种,金版195块,其中有"郢爰"170块,最大者在金版的一面钤"郢爰"二字阴文方印四整印和二半印,重74克;"陈爰"17块,最大者钤有"陈爰"方印三整印和三半印,重54.8克;"鄗爰"1块,在被切割成方形的金版正面,保存着三整印和二半印,"尃"字金版2块,其中最大者为一整印和一半印;此外,还有字迹不清的金版1块和无字金版2块。金饼共197块,其中扁平圆饼14块,半球形圆饼5块,不规则形圆饼167

块,马蹄形圆饼11块。后者底面往往有刻文或凿文,如"上"、"大吉"、"木"、"六半"、二□四分"等。

扶沟古城村位于鄢陵与淮阳之间,战国时鄢陵属楚,楚有鄢陵君;淮阳古称陈是楚地,一度还是楚国晚期的都城。由此可知,扶沟古城村曾为楚地,出土的银布币应是楚国钱币,为首次发现,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银币。金版中的郢、陈、鄗、郢等均为楚地名,郢爰,陈爰是常见的楚国钱币,而鄗爰却是第一次发现;战国虽有金饼,但为数也不多。扶沟这批楚国金银币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货币史,研究古代使用贵重金属货币的历史以及楚国货币制度等,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乱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虽然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但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统一全国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秦又统一了全国纷乱的钱币制度,规定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20两);铜为下币,单位是半两,其形为方孔圆钱,秦半两的钱文突起而狭长,多小篆而兼大篆,古朴而浑厚,豪放而俊逸。无内外郭,背平素。从此,中国的主要货币——"铜钱",基本固定下来,一直通行了两千多年,甚至还影响到周围的一些邻国。正是因为秦代所存在的时间太短,在河南留下的遗迹遗物就不多,而秦代钱币的发现就更少了。

1964年夏,在三门峡市西郊基建工程中,发掘出一批秦、汉、唐、宋的墓葬,一些秦墓中随葬有半两钱,且多放置于人的骨盆附近[51]。

1964年5月,南阳县杨新庄村西在距地表半米深处挖出一个西汉的绳纹灰陶罐,敞口、高领、圆肩上附对称双耳、鼓腹、圜底。罐内装有铜钱20余公斤,其中就包括秦半两和一大批西汉初的钱币[52]。

1979年,在三门峡上村岭,发掘出一些秦墓和战国墓。出有方肩平首布、楚蚁鼻钱和秦半两[53]。

上述秦代钱币虽然为数不多,但在中国货币文化史上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一页。

汉代是一个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它继续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又融合了春秋战国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浑厚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特别是钢铁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加快了封建制的巩固,使商品经济空前繁荣,钱币的用处大为增加,流通渠道也有改变。买卖要钱,租赋收钱,薪俸发钱。从考古发现上也可以看出钱币数量是很多的。

1952年11月~1953年6月,配合基建在洛阳北郊的烧沟一带,发掘了225座汉墓[54]。除了出土一大批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金银器、木漆器、玉石器、琉璃和琥珀器、骨蚌器之外,还发现钱币11265枚。少的一座墓随葬10~50枚,多的有几百枚,最多的达千余枚或

近两千枚。钱币大都放在人身旁，如胸前、两胁或两手上。钱币较多的用绳穿起，虽绳朽但痕迹仍存。极个别的还有放在陶仓内或陶扑满内。其中有一批半两钱，除1枚秦半两外，其余为西汉至东汉晚期的半两。五铢钱占绝大多数，从西汉武帝至东汉灵帝时均有。还有一些新莽钱，包括大泉五十、契刀、小泉直一、大布黄千、货布、货泉、布泉等。这是建国后汉代钱币的首次较多的发现。在洛阳烧沟发掘的数百座汉墓，从西汉中叶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时起到东汉晚期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时至，延续约三百年之久。墓葬的形制从早到晚逐渐变化；平顶墓→弧顶墓→单穹窿顶墓→砖室双穹窿顶与土圹抛物线顶墓→前堂横列墓。随葬器物也随之变化，除人们熟知的陶器之外，还有铜镜：星云镜→昭明镜→变形四螭纹镜→规矩镜→雷云纹镜→长宜子孙镜→人物画像镜。而钱币也是如此，除新莽钱之外，两汉的五铢，从早到晚分出西汉中期(武帝、昭帝)、西汉晚期(宣帝—平帝)、东汉早期(光武—质帝)、东汉中、晚期(桓帝、灵帝)等许多型式来。这些至今还都成为汉代墓葬随葬品其中也包括钱币的断代标准。犹如一部字典一样，为汉代考古所参考。

1955年在洛宁中原村发现古币12筐之多，多是五铢钱和少量货布[55]。

1962年7月，在邓县王寨村西北，发现一处金代椭圆形地窖，窖口用十几块砖封盖。窖径1.2米，深1.5米，内置铜钱1500多公斤，都用绳贯连成串，其中有少量的汉代半两、五铢和货泉[56]。

1963年8月，在渑池城关兰沟村南，同样发现一处金代古钱窖藏，在地表半米深处，有四块大砖，砖下盖一个大型陶瓮，瓮内有铜钱1000多公斤，用绳贯串，放置有序。其中包括一些汉代半两、五铢、新莽大泉五十和货泉[57]。

1963年11月，在宜阳县后院村附近的洛河岸边，发现一处北魏时期的窖藏，出土铜钱300多公斤。其中较多的有汉代半两、五铢，新莽的大泉五十、货泉、布泉等，还发现一枚画像钱，与西汉五铢大小相等。钱的一面浮雕二人、一鱼、一刀，另一面有二人一立一跪，跪者双手持杯。画像形态与汉代陶俑也很相似，可能是东汉早期的“压胜钱”[58]。

前面已经提到，1964年5月在南阳县杨新庄的考古发现。除少量秦半两之外，还有吕后二年的八铢半两、汉初半两、汉文帝四铢半两，以及榆荚半两和小半两等西汉初叶的钱币[59]。

1964年12月，在禹县朱坡村旁，距地表1～2米深处，发现一座东汉晚期砖砌窖藏。除铜釜、铁炉等器物外，还有一枚“部曲将印”和20公斤铜钱，绝多为五铢，还有半两、大泉五十、货泉等[60]。

1969年11月上旬，在临汝佛山寺西距地表2米深处，发现两瓮窖藏钱币，总重达510公斤，上迄西汉，下至金代、共170种。其中就有一部分西汉的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时期的货泉、大泉五十等[61]。

1972年，在灵宝张湾的汉墓内，发现钱币501枚，其中大部分为西汉晚期和东汉的五铢，还有少量大泉五十、货泉和货布等莽钱[62]。

1972年7月。在鲁山北1华里的古路沟，发现一件陶瓮，瓮口盖盆，瓮内置有350公斤铜钱，包括汉、唐、五代和宋等各个朝代。其中就有西汉半两、两汉五铢和新莽货泉[63]。

1978年5月,在南阳市西南郊,发现两缸金代钱币窖藏。两个陶缸形制相同,通高均为1.52米,用四块灰色方砖封闭,缸内装有铜钱350多公斤,大小混杂或成串放置。汉、唐、宋、金均有。汉代的就有四铢半两、五铢和新莽的货泉、布泉[64]。

1978年11月下旬,在宝丰县贾寨,发现一瓮窖藏铜钱,约有41.5公斤,瓮口用陶盆封闭,铜钱多数成串,其中有西汉半两、两汉各类五铢、新莽的大泉五十、布泉和货泉,以及三国时期的钱币[65]。

近年来在一些废品回收站,也拣选了不少钱币,如在安阳一带,一次就收回新莽货泉3000多枚[66]。

上述材料还是很不完全的,在发掘过的大部分汉墓中,几乎都有钱币出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西汉的半两钱,沿袭秦制,不过重量却名不符实。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产生以来,由于大小轻重适宜,文字端庄挺秀,铜色浓厚匀称,一直沿用700余年,对后代钱币也颇有影响。新莽钱币先后进行四次变动,十余年间,铸造不同质地、不同式样、不同单位的钱币达37种,其混乱程度,可谓空前绝后。但在铸造技术上却很精美,其中有一些堪称艺术珍品。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所铸别具一格的四出五铢,可作为断代的标本。

应该提到的是,另外一些有关汉代钱币的其他发现。

1957年4月,在临颍县纸坊村,发现石质大泉五十钱范两方,皆为长方形。其一长27厘米,宽16厘米,厚4.5厘米。上有钱模24枚,分四行整齐排列,钱范中部刻有2厘米宽的干槽,两侧各刻有六个支槽,模子之间也有小支槽;另一长16.3厘米,宽11厘米,厚2.8厘米。上有钱模8枚,分两行排列。亦刻有干槽和支槽[67]。

1963年秋,在南阳市东关外的小庄(即汉代宛城东城墙外),出土半两钱范四块,系用细腻而光滑的青石板制成,分正面范和背面范两种。正面范长24厘米,宽11厘米,厚2厘米。钱范上端两角切去成为折肩,中间有一凹槽直通底部,两边共有12个小槽,各连接一个半两钱范;背面范大小相仿,中间亦有凹槽。两范相对在一起后,凹槽上端合成喇叭形圆孔,以便注入铜液,铸出方孔无郭的半两钱,属于西汉中期的四铢半两[68]。

1964年春,在南阳市北关(即汉代宛城内北半部)发现汉代遗址,出土有一批陶铸钱范。其中包括圆形钱范,上有两个契刀五百和一个圆钱的背面;方形钱范,上有两个契刀五百;长方形钱范,上有两个大泉五十。与钱范同出的还有炼渣、铜锈、铜块、红烧土和木炭屑等。表明这里可能是一处铸造契刀五百和大泉五十的作坊[69]。

1964年8月,在孟津县出土一套完整的契刀五百石范,正背各一扇,呈长方形。长17厘米,宽7厘米,两扇合厚3.5厘米。每扇各刻有4个钱模,两正两背,范两端正中均有槽口[70]。

从上述发现可以看出,汉代铸钱是一范多铸,产量为数不少。

此外还要提及的是,1971年2月,在郑州西北的古城村(即汉荥阳故城内)附近,距地表1米深处发现四块重叠堆放的金饼,皆圆形,背面中间有滴铸不规则的隆起面,周边有饰纹,正面中心呈凹形。每块大小重量约略相等,直径4.8~5.1厘米,边厚0.3~0.4厘米,中间厚1.5~1.9厘米,重244.6~250克。这与山西、陕西、江苏、湖南、广西等地汉代

遗址或墓葬内所出相同,应是文献记载中的汉代麟趾马蹄金[71]。这种称量金币是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开始铸造的,从此再不用豆腐干形的金饼了,也算是一次形制上的改革。

四

从汉末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乱的年代。原住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南下,整个北朝时期达到了高潮。这也是一次各民族的大融合,前前后后达三个世纪之久。由于战乱兵燹,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反映在钱币上也十分混乱,在钱文上变化万千。这时正处在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从重量钱向年号钱过渡。但在考古发现上却不多。

1963年11月,宜阳县后院村的一处铜钱窖藏内,除前面提到的汉代铜钱外,还出土有三国时蜀汉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小"直百"钱,孙吴的大泉当千,以及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所铸的永安五铢[72]。

1964年12月,禹县朱坡村也发现有三国孙吴时期的大泉当千[73]。

1978年11月,宝丰贾寨铜钱窖藏中,出有三国铜钱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大泉当千等[74]。

1980年冬,在洛阳棉纺织厂西发掘一座西晋时期的小儿墓,墓内随葬铜镜、青瓷盂等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出土1件合背五铢,铜钱两面钧铸有五铢二字,罕见于著录,为古钱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75]。

1982年,在荥阳县城关距地表2米深处,发现窖藏隋五铢3000余枚。正面五字交叉两笔较直,五字近穿处有一竖画,其它三面无内郭,外郭较宽。其形制与《古今钱谱》所记相同。隋代是最后铸五铢的朝代,只存在短短的三十年,所铸货币保留下来的不多,这次发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76]。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在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五铢,改铸开元通宝。由此开始,中国钱币,改称通宝、元宝或重宝,不再以重量为称。钱文由篆书改为隶书为主,这是钱币铸造上又有一个重大发展。唐代的钱币品种不多,但数量不少,不但许多唐墓内都随葬有钱币,而且在一些宋、金的古钱窖藏内也有发现。

1962年7月,在邓县王寨村西北的一处窖藏内,就出有一些唐代的开元通宝和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铸的乾元重宝,后者是唐代铸造的第二个年号钱[77]。

1963年8月,渑池城关兰沟村的古钱窖藏中,也出有唐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78]。

1965年2月,在洛宁县南10公里的南赵村北,距地表0.4米深处发现一圆形穴坑,坑底平铺一块石板,内置铜钱350公斤,除大量的宋钱和少量金代钱币之外,还出土一些唐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79]。同时,在洛宁西北15公里的田凹村,也发现一座砖砌圆形窖穴。内置铜钱275公斤,其中包括一些开元通宝[80]。

1969年11月，临汝佛山寺西古钱窖藏，出土有隋五铢，还有唐代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引人注目的是，开元通宝的背文有京(京兆府)、洛(洛阳)、兴(兴元府)、昌(扬州，另一说为会昌年号)、梓(东川)、润(浙西)、鄂(鄂州)、益(西川)，蓝(蓝田)、洪(江西)、潭(湖南)、宣(宣州)、越(越州)等13种，可能是当时铸地或钱监的代号[81]。

1972年7月，在鲁山县北古路沟古钱窖藏中，出土一批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和小样乾元重宝[82]。

1977年3月，淅川县张营附近的灌河桥西，发现一处古钱窖藏，出土唐宋钱币240多公斤，其中有少量开元通宝[83]。

1978年5月，南阳市西南郊的古钱窖内藏也出土一些唐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84]。

唐代国内外贸易兴盛，需要单位较大的货币，因此金银币重要性增加，朝庭赏赐，公私收付，往往使用金银。1970年春，在洛阳化学制药厂(隋唐宫城西北角)发现2件银铤和1件银饼[85]。银铤中1件，正面有铭"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上部有铭"安边郢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下部有铭三行，右行为"专知官监太守宁远将军守左司卿(御?)率府副率"，中行为"充横野军营田等使赐紫金鱼袋郭子昂"，左行为"天宝十二载十二月 日"银铤为长条板状，上端呈弧形，下端两角近似直角。全长30厘米，宽5.5厘米，厚0.9厘米，重2055克。另1件银铤为不规则长方形，素面无文字，重2050克。银饼为圆形，直径为14厘米，重940克。正面有铭三行，右行为"通州税口银纳官"，中间为"朱义"，左行为"贰拾叁两"下部边缘还有一个"云"字。上述铭文中，"安边郢"在今河北涞源县，"通州"在今四川达县。"和市银"与"税口银"都是把地方上征收的口税折换为白银转输到京师。这些银币也是很重要的资料，对研究杨国忠等历史人物、唐代的官职、地名、税制，衡制等均有参考价值。

还要提及的是，1955年在洛阳北郊唐墓内发现波斯萨珊王朝银币[86]；1981年4月，在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内发现东罗马金币[87]。结合墓内三彩器中各种胡人形象，以及身负囊囊、肉食、水壶和丝绸的骆驼俑，可以看出当时中西交通的往来，而洛阳就是古代丝绸之路最东端的一个起始站。

从晚唐到五代十国一百多年间，全国处于分裂动乱之中。南北方一些小国封建割据，经济上彼此封锁，生产凋敝，民不聊生，形形色色的钱币，自铸自用，除铜钱外，还有铁钱，甚至铅钱，这正是当时社会的反映。河南发现的遗物也寥若晨星。

1962年7月，邓县王寨村西北的古钱窖藏内，就发现有后周世宗的周元通宝[88]。史称系当时毁佛像铸此钱。

1963年8月，渑池城关兰沟村古钱窖藏，也出有周元通宝，还出有南唐中兴二年(公元959年)所铸的唐国通宝[89]。

1969年11月，临汝县佛山寺西古钱窖藏，还有后晋的天福镇宝；后汉的汉元通宝；后周的周元出宝；前蜀的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南唐的开元通宝和唐国通宝，后二者分别为真、篆"对钱"，这是我国最早的对制钱了[90]。

1972年7月，鲁山北古路沟古钱窖藏出有南唐开元通宝、唐国通宝[91]。

1982年，曾征集到2枚周元通宝的样钱[92]，1枚正面隶出"周元通宝"四字，钱背有飞

龙戏珠图案，飞龙头在穿上，龙身以左侧而下，龙尾至穿下，龙身占钱背面约占四分之三，穿右有一带火的珠子。此钱造型细腻美观。另1枚正面相同，钱背穿上是一尊手持拂尘的坐佛像，面目清晰，端重大方。这两枚做工精细，而且钱背铸有“龙”、“佛”图案样钱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铸造工艺和样钱的发展史，提供了新资料。

宋代是个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反映到货币文化上也是五彩纷呈。虽然仍以铜钱为主，但白银也广泛流通，铁钱数量也很多，尤其是首次出现了纸币。宋代的铜钱最复杂，钱的名称种类繁多，有通宝、元宝、重宝等，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还有永宝、之宝、全宝等22种，不仅每换一个皇帝铸钱，而且同一个皇帝每改一次年号也大都铸新钱，另外即使用一种年号钱也多铸“对钱”，即用不同字体铸同一年号的钱；再者，同一种年号的钱，也大小值量不一。从平钱到折二、折三、折五(当五)、折十(当十)、折十二钱等。宋代的钱文书体多样，篆、隶、真、行、草兼备，钱币铸造和书法艺术达到了新水平。尤其徽宗赵佶一朝所铸崇宁通宝、大观通宝，传说钱文出自赵佶手笔，铁画银钩，号瘦金体或铁线书，自成一家。而圣宋元宝小平钱、政和通宝小平钱、宣和通宝小平钱，尤为精美。南宋时期，钱文水平不减，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所铸的绍兴元宝，字体匀称端庄，秀丽大方，即流传至今的“宋体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至南宋末，在钱背面铸明年份，这是世界最早的纪年钱，比欧洲货币纪年要早三百多年。据统计，北宋九帝，改元35次，共铸29种年号钱，另有3种非年号钱；南宋七帝，改元20次，也铸了19种年号钱和两种非年号钱。总计为48种年号钱和5种非年号钱。若再用大小、等级、年份、成色、钱监或板别，以及钱文字体的不同，则有更多的种类。在考古发现中，宋代钱币的品种、数量之多，往往超过任何一代。

1962年7月，邓县王寨村西北的钱窖出土1500多公斤铜钱中，绝多都是宋钱。计有北宋的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庆历通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嘉祐通宝、嘉祐元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熙宁重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南宋的建炎通宝、绍兴通宝、绍兴元宝、淳熙元宝等36种，由于有不少字体不同的“对钱”，所以品类就更多，此外还出有金代的正隆元宝，证明这是金代窖藏[93]。

1963年8月，渑池城关兰沟村的古钱窖藏中，出土100多公斤，其中绝多是宋钱，共计35种。最晚也出有金代的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等，说明这也是金代窖藏[94]。

1965年2月，洛宁南赵村古钱窖藏，出土铜钱350公斤，绝多是宋钱，达27种。最晚的是金代正隆元宝；同时，洛宁田凹村古钱窖藏，出土铜钱275公斤，绝多仍是宋钱，达16种，并出有金代正隆元宝。看来上述两处均为金代窖藏[95]。

1969年11月，临汝佛山寺西古钱窖藏中出土最多的是宋代钱币，共有107种，几乎包括宋代所有的品种，其中包括宋罕见的靖康元宝，这是北宋末，处于金人南侵、风雨飘摇的宋钦宗时所铸。此外还有较少见的辽代的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大康通宝、寿昌元宝、天庆元宝；西夏的天盛元宝；刘豫(齐)的阜昌通宝；最晚的是金代正隆元宝、大定通宝。说明这里还是金代窖藏[96]。

1972年7月,鲁山北郊古路沟古钱窖藏,发现铜钱350公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宋代钱,包括许多品种,不少是字体不同的"对钱"[97]。

1977年3月,淅川张营古钱窖藏,出土铜钱240多公斤包括大量的宋钱,计有18种[98]。

1978年5月,南阳市西南郊古钱窖藏内,出土铜钱350多公斤、十分之九都是宋代铜钱,计有34种。也出有金代正隆元宝、大定通宝等,显然也是金代窖藏[99]。

1983年初,宝丰县古垛村古钱窖藏,出土铜钱90多公斤,绝多为北宋铜钱,而且以"对钱"为主,若按不同年号和书法来分,竟达132个品类[100]。

从上述古钱窖藏发现中可以看出,不少是金代窖藏。金代也是战乱频仍,纸币大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铜钱实价高于名价,所以大量的铜钱存放起来而不用于市场流通,这在货币文化上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反映。

1960年,在渑池县西南1公里的"秦赵会盟会台"东侧,发现一处面积2000平方米的宋代铸铁钱遗址,也很引人注目[101]。

1975年4月,方城县东北10公里王营村,发现6件南宋银铤,形制大小不同,大的长15.5厘米,宽6~9厘米,厚1.8~2.1厘米,重1950克,表面錾刻铭文"广州经总制库起发绍兴二十六年春季经总制银经铤伍拾两。专库苏举、李枢、监官黄亨,右宣教郎经略司干办公事权通判向。"四行五十字。小的长7.8厘米,宽3.4~4.6厘米,重245克,表面四角各砸印"真花铤银"四字款识。这是一批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的"经总制钱",这是当时各地方官巧立名目,加征税收得来的[102]。

1976年9月,在方城县南3公里张伯和村,出土1件宋代银铤,形制重量与前述的大银铤相似,上面有铭"聂北铺 "、"重伍拾两"、"出门税"、"北聂匠"等[103]。"聂北铺"是盘剥人民纳税银的银铺字号;"出门税"则是地方官"私立税场",向过往客商收纳的一种税。这些发现,对研究南宋的经济情况,银币的使用和衡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注 释

[1]赵宁夫、汲津:《试论建国以来河南出土钱币的学术价值》,《中原文物》1984年第2期。

[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3]《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复比利时钱币研究会名誉主席的信》,《中国钱币》1983年第3期。

[4]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7]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8][23]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10]周到等:《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

[1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

[1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安阳薛家庄殷代遗址、墓葬和唐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14][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5]戴志强:《安阳殷墟出土贝化初探》,《文物》1981年第3期。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8]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8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
[19]郭沫若:《殷契粹编》659页,科学出版社1965年。
[20]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的甲骨文》,《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21]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5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参看《诗·小雅·菁菁者莪》。
[25]吴振录:《德保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26]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
[27]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第5期。
[28]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2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30]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图版陆11,《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31]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46页注[二],科学出版社1957年。
[3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岗杜附近古墓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33][34]蔡运章等:《洛阳附近出土的两批东周货币》,《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35][36][37]洛阳博物馆:《洛阳附近出土的三批空首布》,《考古》1974年第1期。
[38]赵新来:《河南新郑城关出土的战国布币》,《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39]任常中等:《河南临汝出土一批空首布》,《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
[40][41][42][43][44][45]蔡运章:《谈解放以来空首布资料的新发现》,《中国钱币》1983年第3期。
[42]洛阳博物馆:《洛阳战国粮仓试掘纪略》,《文物》1981年第11期。
[46]赵新来等:《郑州市郊沟赵乡出土一批战国布币》,《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47]欧潭生:《信阳发现一块楚国金币》,《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48]秦佩珩:《爰金考释》,《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49]詹汉清:《固始发现楚国郢爰》,《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50]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51]该项资料未发表,作者曾参加过此项发掘。
[52][59]魏仁华:《河南南阳发现一批秦汉铜钱》,《考古》1964年第11期。
[53]黄士斌:《上村岭秦墓和汉墓》,《中原文物》特刊1981年。
[54]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55]裴琪等:《河南洛宁县发现大量古币、唐墓及古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56][77][88][93]魏仁华:《河南邓县发现大批古钱》,《考古》1964年第8期。
[57][58][72][78][89][94]赵新来:《河南渑池、宜阳两县发现大批古钱》,《考古》1965年第4期。
[60][7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禹县出土一批汉代文物》,《考古》1965年第12期。

[61][81][90][9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临汝出土一批金代窖藏铜钱》,《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62]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第11期。
[63][82][91][97]杨焕成:《鲁山县发现一批古钱》,《考古》1976年第4期。
[64][84][99]崔庆明:《南阳发现一批窖藏铜钱》,《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
[65][74]宝丰县文化馆:《宝丰县发现一批窖藏铜钱》,《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2期
[66]戴志强等:《"货泉"初探——兼论莽钱制作特征的演变》,《中国钱币》1984年第1期。
[67][70]河南省博物馆:《河南临颍和孟津发现新莽时代石钱范》,《考古》1966年第2期。
[68]王儒林:《河南南阳发现半两钱范》,《考古》1964年第6期。
[69]王儒林:《河南南阳发现汉代钱范》,《考古》1964年第11期。
[71]杨焕成:《郑州市郊发现汉代麟趾马蹄金》,《考古》1974年第1期。
[75]赵振华:《洛阳出土西晋"合背"五铢铜钱》,《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76]宋秀兰:《荥阳发现一大批隋五铢》,《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79][80][95]吕品:《洛宁县发现大批古钱》,《考古》1965年第11期。
[83][98]李松:《淅川发现一批古代铜钱》,《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85]苏健:《洛阳隋唐宫城遗址中出土的银铤和银饼》,《文物》1981年第4期。
[86]赵国璧:《洛阳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文物》1960年第8、9期。
[8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基》,《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92]谢世平:《介绍两枚周元通宝样钱》,《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100]邓城宝:《宝丰县发现北宋对子钱窖藏》,《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101]赵青云《河南渑池县发现铸铁钱遗址》,《考古》1960年第6期。
[102][103]刘玉生:《河南方城县出土南宋银铤》,《文物》1977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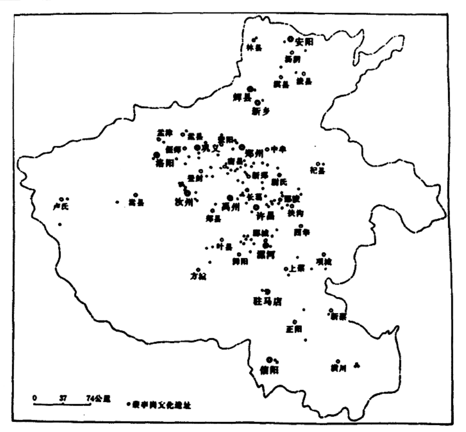
(原载《中州钱币论文集》,1986年10月第1版)

史前篇

河南裴李岗文化的分布和地域类型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独自发生、土生土长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原大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这深厚基础中无可替代的一块基石。解放前，在河南只发现十多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建国后，在被誉为"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1]的岁月里，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在河南找到了近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2]。其中大部分是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前者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中及豫南，后者遍布全省。二者往往是叠压存在的。除此之外，还找到了一批源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和源于湖北的屈家岭文化遗址[3]。这些对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是搞清楚了河南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承袭关系，即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来的，是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二是展示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交流，又反映了北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影响。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等地区的文化面貌日趋一致，有着更多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这就充分说明我国统一的民族文化正在形成。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探索仰韶文化的起源和了解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面貌成了新的研究课题。1958 年春，在漯河翟庄曾发现石磨棒、锯齿镰、红陶三足钵等，这是最早发现的中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物。1959 年，在偃师马涧沟发现有石磨盘和石磨棒。到了六七十年代，在新郑和密县等地发现更多的石磨盘及石磨棒。直到 1977 年春首次发掘新郑裴李岗遗址，表现了特殊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仰韶文化早期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后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这表明在这项研究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从 1977 年至今，在河南中部的新郑、郑州、荥阳、密县、巩义、登封、中牟、杞县、尉氏、汝州、郏县、许昌、禹州、长葛、鄢陵、扶沟、西华，在河南南部的叶县、舞阳、方城、漯河、郾城、驻马店、上蔡、正阳、新蔡、项城、信阳、潢川，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偃师、孟津、嵩县、卢氏，在河南北部的新乡、孟县、辉县、淇县、浚县、安阳、汤阴、林县等 42 个县、市调查发现 105 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及遗存（图一）。其中以新郑、密县、长葛、许昌、汝州、鄢陵和舞阳等县、市较为集中。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东部边缘的丘陵地带，以及豫中和豫南的黄淮平原地区。此外，在豫北太行山东麓和豫南大别山北麓也有少量发现。详细情况可参看"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及遗存分布一览表"。



图一　河南省裴李岗文化遗址分布图

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分布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1	裴李岗遗址	新郑县西北新村乡裴李岗村西地	面积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1977年4月、1978年4月、1979年4月～10月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共发掘2663平方米。出有墓葬114座、陶窑1座、灰坑22个，遗物有石器、陶器200余件。有石磨盘、棒、锯齿石镰、两端有刃石铲、石斧、泥质红陶三足钵、小口双耳壶、乳钉纹罐形鼎、三足壶、筒形罐等。	《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2期。 《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3期。 《发掘裴李岗遗址又有新收获》，《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4期。 《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1期。	
2	沙窝李遗址	新郑县北小乔乡沙窝李村西北	面积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1981年春进行发掘，1982年进行第二次发掘，两次共发掘850平方米，出有墓葬32座，灰坑20个，并有一批石器和陶器。	《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2期。 《河南新郑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12期。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3	唐户遗址	新郑县南偏西观音寺乡唐户村西南	面积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4米。1976年试掘，1982年春又进行发掘，发掘面积66平方米。发现灰坑5个，出有夹砂红陶罐、泥质红陶三足钵、碗、壶及石磨盘、石磨棒等。	《河南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3期。	遗址尚发现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还曾发掘出39座两周墓葬和一座西周车马坑。
4	西土桥遗址	新郑县西辛店乡西土桥村西南	面积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发现有石磨盘、石磨棒、泥质红陶钵、三足钵、夹砂红陶筒形罐等。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	
5	岗时遗址	新郑县北郛店乡岗时村北	面积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及泥质红陶三足钵、夹砂红陶罐。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6	岭西遗址	新郑县城关镇西北3公里岭西	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出土有石磨棒、石铲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7	洪府遗址	新郑县东北孟庄乡洪府村南	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发现有石磨棒、石斧、石铲、泥质红陶片及大量烧土块、草拌泥块。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还有仰韶文化遗存
8	店张遗址	新郑县东北薛店乡店张村东北	面积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出土石磨盘、石斧、石镰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上还有龙山文化遗存
9	莪沟遗址	密县城南超化乡莪沟村北岗	面积8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3～0.5米。1977年11～12月，1978年3～5月两次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747平方米。发现房基6座、灰坑44个、墓葬68座。出土陶、石器370余件，并采集到一批较完整的陶、石器。有石磨盘、棒、锯齿石镰、双面刃石铲、石斧、泥质红陶三足钵、双耳壶、夹砂红陶罐形鼎等。	《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3期。 《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5期。 《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1981年。	
10	马良沟遗址	密县城东来集乡马良沟村西	面积3.29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1.5米。1979年5月试掘80平方米。发现灰坑2个，出有四矮足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泥质红陶三足钵、双耳壶、篦纹、坑点纹陶片等。	《河南密县马良沟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81年3期。	
11	老城遗址	密县老城东北角的坡地上	即城东北角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7～1.2米。采集有一批不同类型的石磨盘、石磨棒，并有一些泥质红陶片、夹砂红陶片等。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 《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3期。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12	东关遗址	密县老城东关外高岗上	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7～1.3米，采集有长条形两端弧刃磨光石铲。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3期。	
13	杨家闲遗址	密县城东刘寨乡杨家闲村北	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14	张湾遗址	密县城东曲梁乡张湾村东	面积不详。采集有夹砂红陶罐片、长条形两端均有弧刃石铲。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3期。	
15	青石河遗址	密县城关镇西2公里青石河村南	面积不详。采集有石磨盘及泥质红陶片。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密县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3期。	
16	王嘴遗址	密县城东刘寨乡王嘴村东	面积2万平方米。采集有泥质红陶片，陶质疏松易碎。还采集有两端均有弧刃的磨光石铲。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3期。	
17	铁生沟遗址	巩义市南夹津口乡铁生沟村西	面积1万平方米，但在遗址以东100米外还发现有石磨盘，说明遗址范围更大一些。文化层厚1米左右。1979年3月进行试掘，发掘面积200多平方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基1座、灰坑3个。出土一批石磨盘、棒、石斧、石铲、石镰，还有泥质红陶三足钵、双耳小口壶、碗等。	《巩县铁生沟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2期。《河南巩县铁生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0年5期。	
18	滩小关遗址	巩义市东沙鱼沟乡滩小关村西偏南	面积4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4米。采集有红陶钵、壶残片。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中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迹和遗物
19	水地河遗址	巩义市东南北山口乡水地河村西	面积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曾进行试掘，出土有打制的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等细石器，还有泥质红陶双耳壶、钵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还有较丰富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
20	赵城遗址	巩义市西南鲁庄乡赵城村南	面积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采集有石磨棒等。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	遗址以仰韶文化为主，发现有灰坑及一大批红陶、彩陶片。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21	宋庄遗址	郑州市西须水乡宋庄村西北	面积不详。曾采集有石磨盘。	《郑州宋庄出土的石磨盘》，《考古》1982年3期。	这是一处以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为主的遗址
22	岳寨遗址	郑州市西北侧金水区岳寨村东北	面积约2000平方米。采集有石磨盘和泥质红陶片。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23	南阳寨遗址	郑州市西北郊金水区南阳寨	遗址面积不详。采集有石磨盘、棒。	《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考古》1979年4期。	
24	牛口峪遗址	荥阳北北邙乡草庙沟村西牛口峪	遗址面积不详。采集有弧线篦点纹陶片。	《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79年4期。	
25	王宗店遗址	荥阳城南崔庙乡王宗店村北	又名织机洞遗址。为一座原始洞穴，洞口宽12.9米，进深19.6米，面积约250平方米。在旧石器时代堆积层的上面，采集有夹砂红陶篦点纹罐片。现正发掘。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26	业王遗址	中牟城南黄店乡业王村东北	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等。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	遗址以大面积龙山文化为主
27	冯庄遗址	中牟城西南八岗乡冯庄村西	面积约4000米，文化层厚0.5米。采集两端舌状刃石铲和泥质红陶片。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	
28	双庙沟遗址	登封东南告成镇双庙村东南	面积1.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3米。1975年、1976年进行试掘。在遗址下层发现有夹砂红陶罐和泥质红陶钵等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物相似的陶片。	《登封双庙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调查与试掘》，《华夏考古》1989年4期。	遗址上层堆积有仰韶文化早期遗存
29	向阳遗址	登封东北唐庄乡向阳村北	又名东岗岭遗址。面积8.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5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等。	《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3期。	遗址以仰韶文化为主
30	王城岗遗址	登封东南告成镇西侧王城岗	面积1.5万平方米。1977～1982年曾多次进行发掘。发现灰坑1个，墓葬1座。出有两端舌状刃石铲、泥质红陶三足钵等。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遗址主要为一座龙山文化城址
31	兴隆岗遗址	尉氏西南洧川镇兴隆岗村	面积3.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8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夹砂篦纹罐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
32	马家庄遗址	尉氏县北庄头乡马家庄	面积不详。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等。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	
33	孟岗遗址	杞县东裴村店乡孟岗村北	面积9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3米。采集有石磨盘、泥质红陶壶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34	石固遗址	长葛西南石固镇岗河村西	面积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3～1.7米。1978～1980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145平方米，发现灰坑189个、墓葬69座。出土有泥质红陶三足钵、平底钵、双耳壶、折肩壶、夹砂褐陶罐形鼎、角把罐、篦纹罐、石磨盘、棒、锯齿石镰、石斧、两面刃石铲等。	《长葛县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1期。 《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1期。	遗址上层有丰富的仰韶文化堆积
35	西杨庄遗址	长葛西南石固镇西杨庄西地	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左右。断崖上发现有灰坑及墓葬和红烧土，采集有石磨盘、长条两端弧形刃石铲、泥质红陶钵、砂质红陶罐等。	《长葛县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1期。 《许昌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36	夹岗遗址	长葛东古桥乡夹岗村北	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3米。遗址破坏严重。采集有磨光石斧、石铲、泥质红陶三足钵、夹砂红陶篦纹罐等。	《长葛县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1期。 《许昌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37	南张庄遗址	长葛西南石固镇南张庄村南	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现有一批墓葬，采集有四柱状高足石磨盘等。	《长葛县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1期。 《许昌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38	刘庄遗址	鄢陵县西陈化店乡刘庄村北	面积约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7～1米。出有数量较多的石磨盘，平面呈鞋底形、梯形、牛舌形，有的有足，有的无足，厚2～10厘米。还采集有石磨棒及石斧、两端有刃石铲、泥质红陶壶片等。	《许昌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39	唐庄遗址	鄢陵南安陵镇唐庄村西	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1.5米。出有石磨盘、棒、泥质红陶碗、壶、蚌珠等。	《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40	半截岗遗址	鄢陵东北马坊乡半截岗村东南隅	面积近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泥质红陶片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41	滕岗遗址	鄢陵西偏北柏梁乡滕岗村东	面积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1.5米。采集有石磨盘、泥质红陶钵片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42	双堂遗址	鄢陵西陈化店乡刘庄西双堂	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0.7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43	古城遗址	鄢陵北彭店乡古城村	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3米。发现有石磨盘、棒、石斧、泥质红陶壶等。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尚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
44	蝎子岗遗址	鄢陵南马栏乡胥庄村南偏西	面积约3.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3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泥质红陶双耳壶等。	《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遗址有丰富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存
45	灵井遗址	许昌县西灵井乡灵井寨西	面积约4.5万平方米，出有磨光石斧和红陶片	《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2期。《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及商、周时期遗存
46	丁集遗址	许昌县西南长村张乡丁集村西北	面积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曾进行试掘。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锯齿石镰、泥质红陶三足钵、壶等。	《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尚有龙山文化遗存
47	丁庄遗址	许昌县东五女店乡丁庄村北	面积近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曾进行试掘，出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锯齿镰、泥质红陶三足钵等。	《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遗址还有龙山文化和西周时期遗存
48	崔庄遗址	许昌县东北小召乡崔庄	面积不详。采集有舌形两端刃石铲。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	
49	五女店遗址	许昌县东五女店	面积不详。采集有一些石磨盘、石磨棒。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	
50	枣王遗址	禹州市东南褚河乡枣王村	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和少量龙山文化遗物
51	前闸遗址	扶沟县东北江村乡前闸村东高地	面积1.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采集有石磨盘等。	《周口地区的裴李岗、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遗址尚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西周文化的遗存
52	雁周遗址	扶沟县西韭园乡雁周村北	面积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采集有石磨盘、泥质红陶钵、壶、夹砂红陶鼎片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53	宋马岗遗址	扶沟县东北崔桥乡宋马岗村西北	面积2500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采集有泥质红陶钵、夹蚌屑棕陶鼎和深腹罐、石磨盘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54	小白庄遗址	西华县西奉母乡小白庄村南	面积2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采集有石磨盘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还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存
55	后高老家遗址	项城南高寺乡后高老家村西北	面积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8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泥质红陶三足钵、双耳壶、夹砂红陶鼎、夹蚌粉褐陶罐等。	《周口地区的裴李岗、仰韶和大汶口文化》，《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遗址还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
56	阎湾遗址	汝州市西北陵头乡阎湾村南	面积56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5米。采集有泥质红陶钵、盆。火候低，易破碎。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57	辛庄遗址	汝州市东纸坊乡辛庄村西	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壶、夹砂褐陶罐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58	槐树荫村南遗址	汝州市北骑岭乡槐树荫村南800米	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许。采集有舌形石铲、石磨棒、石磨盘、石斧、泥质红陶壶、夹砂红陶片、夹炭粒或夹云母石粉褐陶片。	《临汝县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4期。	
59	槐荫树村北遗址	汝州市北骑岭乡槐树荫村北300米	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采集有泥质红陶三足钵、双耳壶、碗、夹砂红褐陶篦点纹筒形罐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60	安沟遗址	汝州市东偏北尚庄乡安沟村南	面积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采集有石磨棒、圆弧刃石铲等。	《临汝县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4期。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
61	后户遗址	汝州市西北陵头乡后户村西南	面积近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采集有泥质红陶三足钵、小口双耳壶、碗、篦点纹夹砂红褐陶筒形罐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62	前户西遗址	汝州市西北陵头乡前户村西	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双耳壶、深腹壶、侈口壶片。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较多的仰韶文化遗存
63	中山寨遗址	汝州市东纸坊乡中山寨村及其周围	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4米左右。1984年发掘，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发现灰坑4个、墓葬4座。出有无足石磨盘、石铲、石斧、锯齿石镰、圜底钵、篦点纹平底钵、三足钵、双耳壶、角把罐、篦点纹侈口罐和筒形罐、鼎足等。	《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7期。	遗址内中层和上层为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
64	湾张遗址	汝州市西北陵头乡湾张村北	面积1500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采集有质地疏松易碎的泥质红陶钵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65	水泉遗址	郏县东北安良乡水泉村东	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2米，1986年进行试掘，出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凿、泥质红陶双耳壶、夹砂红褐陶鼎等。	《河南郏县水泉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9年6期。《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66	十二里庄遗址	叶县西南夏李乡十二里庄村东北	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采集有石磨盘、石斧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67	文集遗址	叶县西南常村乡文集村东	面积约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3米。采集有长条形两端舌刃石铲。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
68	翟庄遗址	漯河市区东翟庄乡翟庄村（今漯河电厂内）	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1958年进行试掘，出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锯齿石镰，红陶三足钵、双耳红陶壶。	《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69	付庄遗址	郾城东北黑龙潭乡付庄村东北	面积8.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30米。采集有裴李岗文化常见的磨光石斧，分大型和小型两种。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
70	贾湖遗址	舞阳北北舞渡乡贾湖村东	面积5.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2米。1983～1987年先后六次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房基30多座、灰坑300多个、墓葬300多座。出土石器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锯齿石镰，陶器有盆形鼎、罐形鼎、釜形鼎、筒形角把罐、篦纹罐、双耳壶、折肩壶、深腹或浅腹钵、三足钵、支足、纺轮等。还有一批骨器、牙器、龟甲。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个别刻有符号，有的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还有一批用猛禽腿骨制作的七孔骨笛。	《舞阳贾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1期。《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2期。《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期。《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71	湖南郭遗址	舞阳北侯集乡湖南郭村东南隅	又名郭庄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3米。采集有石磨棒、锯齿石镰、石斧、红陶双耳壶、夹砂红陶釜形鼎、罐形鼎等。	《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72	阿岗寺遗址	舞阳北马村乡阿岗寺村西北	面积2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4米。采集有锯齿石镰、红陶折肩壶、陶支足等。	《河南舞阳县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5期。《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还有一些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及周代、汉代遗物
73	张王庄遗址	舞阳北马村乡张王庄村北	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3米。采集有泥质红陶片，火候低，质松易碎，还有带椭圆形凹窝的鼎足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仰韶文化遗存
74	长村赵遗址	舞阳东北拐子王乡长村赵村	面积不详。采集有长条形两端双刃石铲、磨光石斧等。	《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75	孙庄遗址	舞阳东北太尉乡孙庄村	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0米。采集有长条两端舌形刃石铲、磨光石斧等。	《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遗址有龙山文化遗存
76	大岗遗址	舞阳北侯集乡大岗村北	面积2万平方米，文化层1～1.4米。曾进行试掘。出有石磨盘、泥质红陶壶、钵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下层出有细石器，近于更早的灵井文化
77	尚店遗址	舞阳东吴城乡尚店村	面积不详。采集有石磨棒等。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	
78	杨庄遗址	驻马店市西刘阁乡杨庄西	面积4.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采集有锯齿石镰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龙山文化遗存
79	郭家遗址	新蔡西南关津乡郭村东北	面积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采集有石磨盘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屈家岭文化遗存
80	晾马台遗址	正阳东南铜钟乡铜钟村东北晾马台	面积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左右。采集有磨光石斧、夹炭褐陶钵、鼎足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
81	李楼遗址	正阳东北寒冻乡李楼村西北	面积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壶片、夹炭褐陶鼎足、陶纺轮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龙山文化遗存
82	高岳集遗集	上蔡县东杨集乡高岳集村东南	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双耳壶、夹砂红褐陶鼎片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还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83	尹庄遗址	上蔡南邵店乡尹庄村东北	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采集有舌状两端有刃石铲、磨光石斧、夹砂褐陶篦点纹罐片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还有仰韶文化遗存
84	航寨遗址	上蔡东北朱里乡段寨村西北航寨	面积8.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壶、夹砂褐陶鼎片，火候低，质地疏松易碎。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还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存
85	大张庄遗址	方城东北独树镇大张庄北	面积2万余平方米，1980年进行试掘。出土有石磨棒、锯齿石镰、泥质红陶双耳壶等。	《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5期。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
86	南山嘴遗址	信阳市东五星乡平西村北	残存面积1800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采集有泥质红陶三足钵(?)片，还有陶质疏松火候很低触之易碎的泥质红陶片。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丰富的仰韶文化及少量龙山文化的遗存
87	平桥遗址	信阳市东五星乡琵琶山村东2公里平桥火车站	面积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壶、磨光石斧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为主
88	陈岗遗址	潢川县东张集乡霸王台村南1.5公里陈岗	面积8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5～0.8米。采集有石磨盘、泥质红陶壶、夹砂褐陶篦纹罐。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89	霸王台遗址	潢川县东张集乡霸王台村东侧	面积9.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篦点纹褐陶罐片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尚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
90	鲁寨遗址	潢川县东张集乡鲁寨村	面积不详。采集有石磨盘、火候较低疏松易碎的红陶片和篦纹陶片。	《潢川县发现裴李岗文化类型的石磨盘》，《中原文物》1981年4期。	
91	高崖遗址	偃师西南高龙乡高崖村北	面积1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4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双耳壶片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以仰韶文化为主，也有一些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遗存
92	马涧河遗址	偃师西南20公里府店乡马涧河水库东侧	面积不详。采集有石磨盘、双耳壶片等。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	
93	杨窑遗址	洛阳市区南辛店乡杨窑村西轱辘沟东台地	面积1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圜底钵、带椭圆形凹窝的鼎足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以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为主

（续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遗址概况	资料出处	备注
94	朱寨遗址	孟津东送庄乡朱寨村东	面积2.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壶、圜底钵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大量仰韶文化遗存
95	乌稍岭遗址	嵩县西旧县乡西店村乌稍岭	面积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采集有泥质红陶钵、磨光石斧等。陶片火候低，陶质疏松易碎。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仰韶文化遗存
96	薛家岭遗址	卢氏西南五里川乡河南村南薛家岭	面积2.8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采集有磨光石斧、锯齿石镰、火候低易碎的红陶片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
97	祁树湾遗址	卢氏县城东侧城郊乡祁树湾村北	面积约2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采集有泥质红陶圜底钵、盆等。	《略论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考古》1984年10期。	遗址以丰富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为主
98	骆驼湾遗址	新乡市东郊牧村乡骆驼湾村东南	面积2500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采集有泥质红陶钵、夹砂红褐陶深腹罐。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还有仰韶文化遗存
99	玻璃阁遗址	辉县市区东南500米琉璃阁	面积不详。采集有长条两端双刃石铲、锯齿石镰等。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	附近有商代遗存
100	子昌遗址	孟县东北城伯乡子昌村北	面积4.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1.5米。采集有石磨盘、两端弧刃石铲、质松易碎的夹砂红陶片。	《新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综述》，《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101	凌湖遗址	浚县西白寺乡凌湖村南	面积不详。采集有石磨棒、磨光石斧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还有龙山文化遗存
102	花窝遗址	淇县东北高村乡花窝村东	面积1.9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1979年进行试掘。发现灰坑4个，出有石磨棒、石铲、石斧、石凿、三足钵、小口双耳壶、深腹罐等。	《河南淇县花窝遗址试掘》，《考古》1981年3期。	
103	程岗遗址	汤阴城东菜园乡程岗村西北	面积3.3万平方米，文化层2～2.5米。采集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遗址以仰韶文化为主
104	洪岩遗址	安阳县西曲沟乡洪岩村北	面积1.2万平方米。采集有石磨盘、石磨棒等。	《略论华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考古》1984年10期。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105	嵩园遗址	林县城关嵩园	面积不详。采集有石磨盘等。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2期。	

在这100余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及遗存中，有一些经过科学发掘，其中最重要的有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北岗、长葛石固、舞阳贾湖等遗址，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遗迹和遗物。

裴李岗遗址位于新郑县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高岗地上，双洎河（即《诗经》里提

到的洧水)在西南流过,面积约2万平方米。1977年4月、1978年4月、1979年4~10月在这里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共发掘出22个灰坑,多为不规则的圆形坑和少量的圆角长方形坑;发现陶窑1座,窑室为圆形,直径近1米,窑底为圜形,比较规整。窑室南壁有五个半圆形的孔眼,直径约6~8厘米。窑口火道向东,在窑壁、窑底和火道壁都有很厚的烧土。发掘墓葬114座,分布比较密集,排列基本有序,应是一处氏族墓地。除一座为双人合葬墓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单人葬。随葬品1~10件不等,皆为石器和陶器。值得注意的是,单人墓内除一座之外,其余凡随葬石磨盘、棒的均不见石斧、镰、铲等工具。反之,随葬有石斧、镰、铲的也不见石磨盘、棒,两者不共存。整个遗址出土石器甚多,包括有两端有刃的石铲、锯齿石镰、磨光石斧、鞋底状四柱足石磨盘和圆柱形石磨棒,还有石弹丸及打制细石器。出土陶器中绝多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以三足钵、小口双耳壶为大宗,还有乳钉纹罐形鼎、三足壶、筒形罐等,并出有陶猪头、陶羊头之类的简单艺术品。此外,还出有骨镞、锥、匕、簪、鹿角器及猪、羊头骨等遗物[4]

莪沟北岗遗址位于密县城南7.5公里莪沟村北的高岗地上,高出现今的河床70米,面积约8千平方米。1977年11~12月和1978年3~5月在这里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基6座,其中5座为圆形,1座是方形,均为半地穴式的小型建筑。房门朝南,有斜坡式或台阶式门道,房基墙壁残高0.1~0.4米,有柱洞,发掘灰坑44个,分圆形坑、椭圆形坑和不规则形坑三种。也发现一处氏族墓地,清理墓葬68座,绝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9座墓坑内挖有壁龛,大部分墓内随葬有石器和陶器,一般2~8件,最多的14件。出土石器有石磨盘、棒、锯齿石镰、弧形双面刃石铲、磨光石斧、石弹丸、砺石和打制细石器等。出土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最多,火候不高,易破碎,泥质红陶多素面,夹砂红褐陶有压印点纹、篦纹、划纹、指甲纹和乳钉纹。器形有三足钵、双耳壶、罐形鼎、罐、钵、缸、勺、杯、纺轮等。还出有一件陶塑老人头像,扁头方脸,前额较平,粗状的眉脊左右相连,宽鼻深目,下额前突,口、眼是剔出来的,形象生动,是一件难得的陶塑艺术品。还发现有麻栎、枣、核桃之类的果核,以及猫骨、鹿角等[5]。

石固遗址位于长葛县城西南12.5公里的石固村东,石梁河、小洪河从南、北流过,面积约10万平方米。1978~1980年先后进行四次发掘。发掘出裴李岗文化的房基3座,均为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的建筑,有阶梯式门道,还发现有柱洞。发现灰坑189个,多为圆形坑、椭圆形坑,也有少量袋状坑、长方形坑、半圆形坑和不规则形坑。发掘墓葬69座,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其中1座墓有壁龛。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少量单人仰身屈肢葬、单人侧身葬和个别的单人俯身葬。多数有随葬品,为石器、陶器和骨器。少则1件,一般为3~5件,最多的达10多件。出土陶器有泥质红陶三足钵、平底钵、双耳壶、折肩壶、夹砂褐陶罐形鼎、角把罐、篦纹罐及少量的杯、盘、碗、豆、纺轮等。出土石器较多,有磨光石斧、两端刃石铲、锯齿石镰、石磨盘、棒及石凿、石杵、石饼、石球、砺石和打制的细石器。此外,还出有骨器、蚌器、以及榛子、核桃、榆钱、酸枣核等植物籽实。石固遗址最突出的特点是裴李岗文化层堆积延续的时间很长,从早到晚可分四期,上面叠压着仰韶文化早期的灰层。从文化遗迹上看,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基和圆形灰坑、袋状灰坑及长方竖穴土坑单人墓葬等,均与仰韶文化早期同类遗迹相似。从文化遗物上看,石固遗

址裴李岗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早期的陶器都以红陶为主，灰陶很少。仰韶文化早期的红顶钵、敛口深腹钵、碗、罐形鼎、浅盘喇叭形圈足豆等，可在裴李岗文化晚期同类遗物中找到渊源关系[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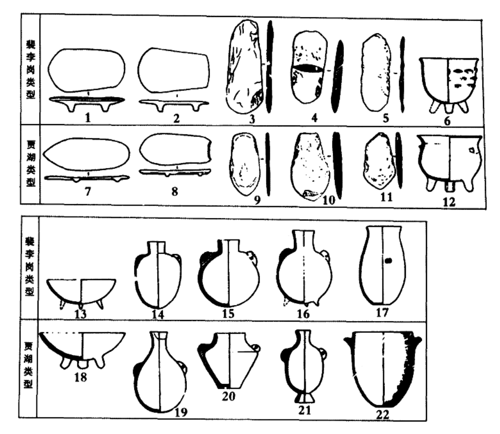
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城北22公里的贾湖村东，面积5.5万平方米。1983年春、1984～1987年先后六次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房基30多座，均为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有单间和多间两类。多间有二间的、三间的和四间的，大多依次扩建而成，各间之间有门坎或隔墙。发掘出灰坑300多个，有圆形坑、椭圆形坑和不规则形坑多种。发掘出墓葬300多座，按其位置可分为几个墓群，均为竖穴土坑墓，个别墓留有二层台。多为单人一次葬，还有单人二次葬、多人二次葬、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多人合葬，尚有一例多人一次葬。大多数墓葬有随葬品，少者1件，多者为10件。均为实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宗教用品等。有陶器、石器、骨、牙器和龟甲等，尤以骨器数量最多，也最为常见。龟甲往往成组出现，龟甲内装有数量不等、大小不均、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小石子。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完整和能复原的陶器达数百件。其中有盆形鼎、罐形鼎、釜形鼎、筒形角把罐、篦纹罐、双耳壶、折肩壶、深腹或浅腹钵、少量的扁凿状或圆锥状三足钵，以及各种支足、纺轮等。石器有磨光双面弧刃石斧、长椭圆形两端有刃石铲、锯齿石镰、鞋底状四足、无足和不规则形石磨盘、圆形、椭圆形、半圆形、圆角方形及三棱形石磨棒，还有柄形饰、绿松石饰、刮削器等。骨、牙器中有鱼镖、骨镞、骨针、杈形骨器、骨笛、獐牙器和龟甲片。此外，还出土有猪、鹿、狗、牛、鸡、野兔等家畜或兽骨，以及鱼骨、鱼鳞、蚌壳和一些果核。贾湖遗址中最具特色的遗物是一些刻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的符号，其中有的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还有那些用猛禽腿骨制作的骨笛，多为七孔，已具备七声音阶结构，现仍可吹奏出旋律[7]。

经碳14测定，裴李岗文化距今的年代为：裴李岗遗址9300±1000年（ZK572，T31①、T34①②），7885±480年（ZK434，T1H1、T2H1），7445±100年（ZK759，T111②），7185±200年（ZK753，T106H17），7145±300年（ZK571，H11），6435±200年（ZK751，T10H18）[8]；莪沟遗址7290±120年（WB78—17，T79H27），7265±160年（WB78—39，T24），7240±80年（ZK580，T79H27），6975±100年（WB78—38，T1H1）[9]；石固遗址7450±90年（WB79—60，T41H159），7295±85年（WB80—15，T56H238），7010±85年（WB80—17，T52H197）[10]；贾湖遗址7920±150年（WB83—60，H1），7561±125年（H82，国家地震局测定），7137±128年（H39，国家地震局测定），7017±131年（H55，国家地震局测定）[11]。上述数据经树轮校正，年代还要提前四五百年。除掉几个过早过晚可能有误差的数据之外，可以看出它们都在距今7000～8000年之间。表明裴李岗文化延续的时间较长，可以分出早、中、晚几个不同的阶段；也显示出裴李岗文化要比仰韶文化的年代还要早数百年至一千年，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裴李岗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数量众多造型又很特殊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识别裴李岗文化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舌形或长条形两端有弧刃的石铲，磨制精致，有的两端都有使用磨擦痕迹，石铲的寿命无疑可以大大延长；弧背锯刃石镰也是石器中的代表作，这种镰的把部上端翘起，下端有一缺口，便于捆扎按柄，制作精美，个别的把部还有穿孔。

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灰陶很少。三足钵和各式小口双耳壶为其典型器物,其它还有圈足碗、敞口钵、罐形鼎、深腹罐等。除表面之外,不少陶器饰有篦点纹,还有一些划纹、指甲纹、乳钉纹等。这些因素构成了裴李岗文化的基本特征。

裴李岗文化遗址由于所处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以及相对年代的先后,除共性之外,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依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的资料,综合考古研究的成果[12],大致可以分为裴李岗和贾湖两种不同的类型(图二)。



图二 裴李岗类型与贾湖类型器物比较图

1.尉氏马庄 2、4、5、6、13、14、17.新郑裴李岗 3、15、16.密县莪沟 7.郑州南阳寨 8、10、11.中牟业王 9.中牟冯庄 12、19、20、22.舞阳贾湖 18、21.长葛石固

裴李岗类型以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相对年代较早一些,多半分布在浅山丘陵地区,所处位置地势较高,遗址面积稍小一些,文化层堆积较薄,灰层颜色较浅,内涵比较单纯。墓葬密集,排列有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绝多为南北向,随葬器物多为陶器和石器,骨器很少见。生产工具中石磨盘数量很多,且多作鞋底形,下有较高的四足;石铲多两侧平直的长条形,两端有舌状弧形刃;陶器火候一般较低,有的一触即碎,泥质红陶数量最多,夹砂红陶次之,灰陶很少。以小口双耳壶、锥状三足钵较多,还有三足壶、直沿钵、锥状足鼎、深腹罐等。陶器纹饰除素面外,篦点纹、篦划纹较多。属于裴李岗类型的遗址和遗

存除新郑裴李岗之外，还有密县莪沟、马良沟[13]和老城[14]、巩义铁生沟[15]、登封王城岗[16]、郏县水泉[17]等。

贾湖类型以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相对年代较晚一些，多半分布在平原地带，遗址面积一般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灰层颜色较深，并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或更晚一些文化层相叠压的遗存。墓葬中除常见单人葬之外，还出现不少二次葬与多人合葬，绝多为东西向，随葬品以骨器居多，陶器和石器较少，有些还随葬有成组龟甲或獠牙。石磨盘数量较少，且出现有矮足或无足；石铲除长条形两端刃者之外，还有一种体形较短、一端较平、另一端为尖刃的石铲；陶器中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比例相当，还有夹炭褐陶及一定数量的灰陶。火候高一些，质地较硬一些。常见的锥状三足钵和小口双耳球形壶数量大减，新出现有圈足壶、斜肩壶、小口折腹壶等；直口钵减少，敛口钵增多，个别口沿饰红色宽带纹；陶器中篦纹减少，出现了细绳纹；锥状足减少，多为扁圆锛形足鼎；还出有角把罐及少量的支足。此类遗址及遗存除舞阳贾湖外，还有舞阳湖南郭[18]和阿岗寺[19]、漯河翟庄[20]、长葛石固、许昌丁集[21]、鄢陵刘庄[22]和古城[23]、临汝中山寨[24]、新郑沙窝李[25]、中牟业王[26]和冯庄[27]、郑州南阳寨[28]等。

分布在豫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如淇县花窝[29]等，出土夹砂红褐陶占陶器总量的69.6%，其文化内涵受到河北省磁山文化的若干影响，但由于遗址数量太少，尚构不成一种文化类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砍伐、开垦土地用的石斧，播种、耕作、松土用的石铲，收割作物用的石镰，还有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就是说从农业生产到粮食加工全过程的工具应有尽有，这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有了一定的进步性，并且成为氏族经济的主体和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及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不但发现了猪骨、羊骨、牛骨、狗骨，还出土了陶塑的猪头和羊头，能把猪、羊等制成简单粗糙的艺术品，说明了这些家畜与人们的关系多么密切，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渔猎和采集等项生产活动依然存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弹丸、骨镞、骨鱼镖和猫骨、鹿角、其它兽骨、龟甲、鱼骨、鱼鳞，还有麻栎、枣核、核桃、榛子、榆钱、酸枣核等籽实，就是很好的实物例证。

裴李岗的原始手工业以制造石器和烧制陶器为主。在石器制造中，人们不仅已经熟悉选料和制坯技术，而且在磨制工艺上也达到了一定水平，各种各样石器的造型有一定的规范。陶器虽然都用手制，不少器物火候低，胎质疏松，容易破碎，但从器形和纹饰上看已经脱离了最原始的阶段，显得较为丰富多采。新郑裴李岗遗址那座陶窑结构比较简单，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最早的陶窑。出土的一些陶纺轮，说明当时的原始手工业中还有纺织。同时，还制作装饰品和艺术品。半地穴式房基的发现，说明裴李岗的先民们已掌握了一定的建筑技术，要比旧石器时代晚期进了一大步，人们再不用树上筑巢或洞穴而居了。

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相比，有一定的共同因素。这两种文化的遗址都位于河边台地；都有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子，并带有斜坡式或阶梯式门道；都有氏族公共墓地，墓葬比较集中，排列基本有序，多数都是仰身单人直肢葬；氏族经济生活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还有一定的家畜饲养及少量的渔猎、采集经济；石器中都有石斧、石铲和石镰；陶器中都是

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较多,灰陶很少。器形上都有钵形鼎、钵、小口双耳壶、纺轮等,其中裴李岗文化中的小口尖底双耳壶可视为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祖型器物。在纹饰上都有划纹、指甲纹、乳钉纹和细绳(线)纹。在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长葛石固遗址、汝州中山寨遗址、舞阳湖南郭遗址和阿岗寺遗址等,均发现了仰韶早期文化层叠压在裴李岗晚期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堆积,这种现象大大缩短了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在年代上的距离。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出土的弧刃扁圆体石斧、弧刃长方形石铲、锯齿石镰和V式罐、I、II式钵、I式鼎、I式壶等均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形相似[30]。这些表明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当溯源于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细石器,这与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最晚期遗址的细石器有些相似[31],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文化关系还值得深入探讨。鉴于在舞阳大岗遗址裴李岗文化层下发现有出有细石器的文化层,在荥阳织机洞遗址旧石器时代堆层之上发现有裴李岗文化的陶片,由此可以推测裴李岗文化至少填补了灵井文化与仰韶文化时空之间的某个空白。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注　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1984年第10期。
[2]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3]①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
②罗彬柯:《略论河南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兼述中原与周围地区原始文化的交流问题》。《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③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④同[2]。
[4][8]①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②开封地区文管会等:《裴李岗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
③薛文灿:《发掘裴李岗遗址又有新收获》,《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4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5]①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②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1981年。
[6][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
[7]①朱帜:《舞阳贾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④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
[9]同[5]②。
[11]同[7]②、③。
[12]①赵世纲:《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②郑乃武:《略谈裴李岗文化的类型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文物》1989年第1期。

[13]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密县马良沟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83年第1期。
[14]魏殿臣等:《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
[15]①傅永魁:《巩县铁生沟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
②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巩县铁生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5期。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17]郑县文化馆:《河南郑县水泉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9年第6期。
[18]朱帜:《河南舞阳县郭庄南大岗古代文化遗址调查》,《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19]舞阳县文化馆:《河南舞阳县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5期。
[20]同[12]①。
[21]朱帜:《许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22][23]①同[12]①。
②同[2]。
[24]①方孝廉:《河南临汝中山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②临汝县博物馆:《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6年第6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
[25]①薛文灿:《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2期。
[26][27]开封地区文管会:《河南开封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
[28]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79年第4期。
[29]安阳地区文管会:《河南淇县花窝遗址试掘》,《考古》1981年第3期。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31]①晓平:《河南许昌灵井地区发现细石器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10卷1期。
②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第2期。

(原载《华夏考古》1992年第4期)

关于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

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是仰韶文化的命名地。而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解体甚至迈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漫长岁月，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发展一个重要阶段，处于我国古代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对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及原始社会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仰韶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地域分布又广，形成了多种既相近又有区别、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分离的文化面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化类型较多；二是"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不仅年代早，延续的时间长，还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同时周围地区具有彩陶的新石器文化，大都接受它的影响"[1]。从纵向来看，向前上溯与裴李岗文化，向后延伸与龙山文化都有密切的联系；从横向来看，向东与大汶口文化，向南与屈家岭文化也息息相通。即使远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也可以找到仰韶文化的影子。

一、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五种类型

1.庙底沟类型

黄河水库考古队于1955年的考古调查中，在陕县庙底沟找到了一处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1956～1957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2]，发现了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有明显差别的仰韶文化遗存，内涵相当丰富。其后在陕西关中、晋南和豫西其它地区，陆续发现相类似的遗迹和遗物，被称之为庙底沟类型。

庙底沟类型的房屋面积较大，一般为长方形半地穴式的房子，周围有立柱，已经开始使用柱础，房屋地坪经过加工处理，屋内有较深的圆形灶坑，屋的一侧有斜坡形门道。用以藏物的窖穴数量很多，以袋形坑为主，容积较大，窖穴内壁和坑底不少还涂抹草拌泥，经火烧后变得相当坚硬，有较好的防潮效果，还发现有大小不一的圆形坑和椭圆形坑，有的坑内尚有人或家畜（猪、狗）的骨架遗存，这可能是利用当时废弃的灰坑作为埋葬之所。墓葬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少量墓内还有二层台。多是仰身直肢葬，但随葬品很少。也有一定数量的瓮棺葬，其组合多为瓮和钵或瓮和盆，个别还有用尖底瓶的。

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多为磨制的，还普遍使用穿孔技术。石器除斧、锛、凿之外，还有石铲和石刀。骨器为数不多，有骨锥、针、凿、镞、簪等，磨得很精致。此外，还有一些角

凿、角锥和陶刀、陶锉、陶弹丸、陶纺轮等。庙底沟类型最有特色的遗物莫过于陶器了。以泥质红陶最多，也有相当数量的夹砂红陶和为数不多的泥质灰陶、褐陶。陶器均为手制，口沿多经慢轮修整。陶器种类丰富，有曲腹碗、敛口曲腹钵、卷沿曲腹盆、双唇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敛口鼓腹罐、盆形罐、圜底罐、盆形灶、瓮、镂孔器座等。其典型器物正如苏秉琦先生所指出的："这类文化遗存中，特征容易识别，形制发展序列完整的器物有植物花纹图案彩陶盆、鸟形花纹彩陶盆、双唇小口尖底瓶、曲腹钵、砂陶罐等"[3]。陶器除素面外，还有线纹、弦纹及少量附加堆纹，在尖底瓶上还印有麻布纹和席纹，这可能是在制作过程中垫麻布和放在席上留下的痕迹。彩陶数量很多，以黑色为主，少量白衣彩陶涂黑、红彩或涂红彩，分外醒目。彩陶纹饰有条带纹、涡纹、三角纹、垂弧纹、圆点纹、网格纹等，组成一周富于变化连续装饰图案，以花瓣纹最为突出；个别也有动物纹样，如鸟纹、蛙纹等。还要提及的是，一些用于装饰品的陶环，有圆形、五角形、六角形、七角形和齿轮形等多种，别具一格。

庙底沟类型属于仰韶文化的中期偏早，其影响远远超过其分布范围，东到豫中、豫北、河北甚至到鲁南、苏北，西到甘肃，北到陕北、晋北，南到豫西南、鄂西北和陕南。它在仰韶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

2.大河村类型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北郊，1964 年在文物普查中发现，自 1972 年至 1985 年，先后进行了八次发掘[4]，发现有厚达 12 米多的七层文化堆积，包括有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晚期的遗迹和遗物。其中仰韶晚期文化层分布普遍，堆积较厚，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被称为大河村类型。同类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洛阳、郑州之间[5]，其影响可达豫西、豫西南和豫北。

大河村类型的房屋多有发现，都是方形或长方形建筑，除个别为半地穴式之外，绝多修筑在地面之上。一些为单体房屋，而两间或多间一组的排房已普遍出现，为一大特色。房屋地坪用多层草拌泥、细黄沙铺垫，并用砂质细泥抹平，墙壁用木柱、横木和芦苇束作成木骨，内外涂草拌泥，再用砂质细泥抹平，经火烧烤成砖质，然后在烧好的墙壁上架梁缮草，建成坚固耐用、防潮保温的草房。房屋的建筑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窖穴数量也不少，甚至三五成群，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生产的提高。多为口小底大的袋形穴，也有少量椭圆形、直筒形或不规则形坑。袋形穴容积较大，坑壁坑底光滑平整，有的还涂抹砂质细泥或草拌泥，并用火烧烤成棕红色。墓葬也大量发现，成人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单人直肢葬，多数没有随葬品；儿童都是瓮棺葬，其组合为鼎和罐、缸和盆、大口尖底瓶和鼎、大口尖底瓶和豆、盆和罐、罐和缸、缸和豆等，在大口尖底瓶的下腹部或底部，留有特意预制的圆孔。

大河村类型的遗物十分丰富，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其中包括石斧、有肩平刃石铲、石锛、石凿、石镰、石刀、石镞、石弹丸、骨锥、骨镞、骨针、蚌刀、蚌铲、蚌镰、蚌镞、陶刀、陶拍子、陶弹丸等。石器加工技术较高，多为磨制，少量打制或打磨兼制，不少还有钻孔。器形规整，刃部锋利。生活用具有一组颇有特点的陶器群，灰陶和褐陶较多，红

陶也占相当数量。有轮制的和手、轮兼制的。制作出来的陶器，比较适度，厚薄均匀，造型美观，火候较高，甚至还出现薄胎蛋壳陶，显示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陶器的数量和种类也非常多，有鸭嘴形足或凿形足或瓦形足的折腹鼎、釜形鼎、罐形鼎、盆形鼎、敛口深腹罐、敛口折腹平底罐、敞口直壁罐、带流罐、鼓腹和斜腹平底盆、圆肩鼓腹平底瓮、敞口直壁小平底缸、折腹镂孔圈足豆、曲腹钵、小口深腹圈足壶、双连壶、敞口尖唇圈足碗、敛口鼓腹小圈足杯、大口束腰尖底瓶、直壁浅腹平底甑、深鼓腹平底甑、弧形钮器盖等。纹饰有弦纹、线纹、附加堆纹、鸡冠纹、镂孔和少量的绳纹、篮纹。彩陶尤为发达，其中以白衣彩陶最多，还有素底彩陶和少量的红衣彩陶。彩绘以黑彩和红彩或棕色与红色兼用为主，也有少量仅施黑彩和红彩。纹饰除一些弧边三角纹、圆点纹、平行线纹之外，还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星座纹、六角形纹、锯齿纹、窗棂纹、睫毛纹、网状纹、S纹、X纹等，匠心独具，丰富多彩。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临汝阎村遗址出土的一件大型陶缸绘有一幅"鹳鱼石斧图"，画面上有一只肥硕的鹳鸟，口衔一条正在挣扎的大鱼，旁边竖立着一件带柄石斧，实属仰韶文化彩陶艺术中不朽的杰作[6]。

3.后岗类型

后岗类型的遗迹和遗物，早在30年代初发现于安阳后岗，其后又在这里进行过多次发掘[7]。类似的遗址分布在豫北和冀南地区[8]，集中于卫河和漳河流域，在河北中部也有发现[9]。是仰韶文化早期的一种类型，其影响可达冀西北洋河、桑干河一带。

房屋发现不多，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建筑技术较为原始。窖穴为锅底状，形状不一，也不规整。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多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个别也有多人二次合葬墓，墓内有9人(骨架)或24人(头骨)不等。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磨制的最多，个别为打制的。器形有石铲、斧、刀、锛、凿等，还有加工谷物的无足石磨盘、棒。也有少量骨器，如骨锥、匕、针、镞等。还曾出土过一件陶铚。生活用具中的陶器数量较多，以泥制红陶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绝多为手制。器形有圆柱足盆形鼎、罐形鼎、大口小底罐、敛口鼓腹圜底钵、大口深腹碗、小口细颈大腹瓶、圜底瓮、锥刺纹盆、小口鼓腹双耳壶以及盂、灶等，其中以红顶碗、红顶钵最为特殊。陶器大量为素面，也有少量的线纹、弧纹、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彩陶数量不多，以红彩为主，黑彩较少，常见有口沿下饰一周宽带纹，还有平行竖线纹、菱形网状纹、同心圆纹、波形纹等。

从发掘的情况看，后岗类型的遗迹遗物较少，尤其是鲜有重要遗迹发现，期望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能有新的收获。

4.大司空类型

1958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10]，其后在安阳大正集、大寒南岗、鲍家堂，河北磁县下潘汪[11]，界段营[12]、以及邯郸百家村[13]、邢台柴庄[14]等地，也发现有同类的遗址，被称之为大司空类型。该类型遗址与后岗类型遗址交错分布，但其分布范围比后岗类型要小一些，遗迹同样也不丰富，是属于仰韶晚期的一种文化类型。

大司空类型的遗址，很少发现墓葬和房基，只找到一些残窑和窖穴。窖穴有圆形坑、

椭圆形坑和比较规整的袋形坑。出土遗物还相当多。生产工具中以石器为主,绝多为磨制。有梯形双面弧刃石斧、扁平弧形刃石铲、长方形穿孔石刀和石锛等,还有蚌刀和少量骨器,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较多,泥质红陶次之,夹砂红陶较少,个别还有白陶和黑陶片。有模制的,也有手制和模制兼用的,口沿上多有轮制的修整痕迹。器形有敛口钵、折腹盆、斜腹碗、高领罐、杯、缸、圈足器等。器表以素面居多,还有一定数量的篮纹,以及少量的方格纹、弦纹、线纹、划纹、附加堆纹和锥刺纹等。也有不少彩陶,以红彩和棕彩为主,黑彩颇为少见。彩绘纹饰有弧边三角纹、平行线纹、水波纹、睫毛纹、蝶须纹、S 纹、同心圆纹、锯齿纹、螺旋纹等多种。在钵或盆的上部组成一周花纹带,显示出强烈的地方色彩。

5.下王岗类型

以淅川下王岗遗址[15]为代表,同类遗址在南阳盆地的淅川黄楝树[16],唐河茅草寺、寨茨岗[18]、南阳黄山、镇平赵湾[19]、南召二郎岗[20]和湖北郧县青龙泉、大寺、均县朱家台[21]等地均有发现。豫西南和鄂西北的仰韶文化与河南地区和陕西的其它仰韶文化遗存有一定差别,属于仰韶早中期的一种文化类型,被称为下王岗类型。

下王岗类型的遗迹发现较多。房屋多为方形,也有圆形的,均为平地起建,在一些遗址中还发掘两间或多间一组的排房,屋内有烧土台或火池。窖穴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多为口小底大的袋状坑,也有一部分口大底小的桶形坑。墓葬多是竖穴土坑墓,墓坑排列有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数墓内都有随葬品,习见有鼎、罐、钵、壶、碗等。中晚期有不少二次葬或二次合葬墓,随葬品为形制小火候低的非实用性陶器。

下王岗类型遗物相当丰富,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偏早一些打制的较多,个别还采用磨光和穿孔技术。器形包括扁平长条形石斧、有肩尖刃石铲、长方形石刀、锯齿石镰、锛、凿、网坠、镞等。此外,还有一些骨锥、骨镰、陶锉、陶纺轮。陶器很多,以红陶和棕色陶为主。器形有锥状足的罐形鼎、深腹罐、折沿或卷沿平底盆、圈足碗、敛口钵、小口长颈壶、瓮、圈足杯、器盖、器座等。器表以素面为最多,还饰有细绳纹、弦纹、附加堆纹,也有不少彩陶,黑彩较多,还有红色和橙黄彩,绘以带条纹、三角纹、弧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状纹、花瓣纹、圆点纹、涡纹、方格纹、平行线纹。

综上所述,分布在丹江和汉水流域的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遗存,虽然包含有庙底沟类型和西安半坡类型的某些因素,但其自身的特点还是十分明显的。"它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南界"[22]。

二、河南地区仰韶文化与其它原始文化的关系

从考古发现看,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深受裴李岗文化的影响。从遗址分布的地理环境、圆形房子布局和结构、墓葬的形制和排列、以农业为主饲养家畜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看,仰韶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都有近似之处。从陶器上看,都是以泥质素面红陶为主。裴李岗

文化的圜底钵、小口双耳壶、圈足碗[23]，在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中也有发现；裴李岗文化的小口尖底壶则是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祖型；裴李岗文化的深腹罐形鼎、深腹罐、圈足碗、钵、器座等，在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遗址中也有出土。安阳后岗出土的无足石磨盘、淅川下王岗和下集出土的锯齿石镰，也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物相似。更重要的是，在长葛石固等地，找到了仰韶文化层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叠压关系[24]。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还有某些缺环，但仍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一种承袭关系，即仰韶文化的某些类型溯源于裴李岗文化。

至于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归宿，则是先后过渡为各种类型的龙山文化。这早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并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大汶口文化早在50年代初就已发现，到1959年在山东发掘大汶口遗址后[25]才受到重视。这是一种分布在黄河下游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距今6000多年前开始，经历了大约2000年早、中、晚期的发展历程。出土器物有釜形鼎、深腹钵、喇叭形杯、高柄杯、觚形器、实足鬶、空足鬶、镂孔豆、器座、背壶、宽肩壶、敛口盉等，还有一定数量的彩陶。

在河南曾发现不少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如在郑州大河村、禹县谷水河和鄢陵故城等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里，在偃师古滑城、孟津寺河南、偃师二里头、上蔡十里铺、段寨、钓鱼台、蟾虎寺、晒书台等龙山文化遗址里，以及在平顶山寺岗、商水章华台、郸城段寨等地的墓葬内，都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遗存。

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遗存内，发现有白衣上饰花瓣纹、圆点勾叶纹的彩陶钵和彩陶盆，以及八角星纹的彩陶盆，这与河南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彩陶相近；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随葬器物组合为鼎、钵、釜，中期墓葬中随葬器物组合为鼎、豆、罐(或壶)，其形制变化序列与洛阳地区仰韶文化同类器物形制变化序列相似，显然吸收了很多仰韶文化的因素。而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有细泥灰陶尊、背壶、敛口盉等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在禹县谷水河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如盆形鼎、罐形鼎、长颈壶、宽肩壶、觚形杯、镂孔高柄杯、深腹罐和袋足鬶等。加之在河南其他地方大汶口遗存的发现，又反映了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受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强烈影响[26]。

分布在江汉流域的屈家岭文化，最早于1955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27]。从地层叠压关系上看，屈家岭文化晚于仰韶文化或大溪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在豫西南的淅川、唐河等地，在河南中部稍偏南的上蔡、平顶山，以及郑州、禹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找到了如瓦足盆形鼎、圈足壶、三足碟、浅盘粗柄镂孔豆、高圈足杯等具有屈家岭风格的陶器。这表明屈家岭文化由南向北推进，从湖北到豫西南，再扩大至颍河，汝河和洪河上游甚至达到黄河南岸。而屈家岭文化的彩陶中，有一些白衣彩陶，绘以圆点纹、弧线纹组成的图案，显然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南阳盆地屈家岭文化的发现，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古代文化。

不仅如此，连远在川东、鄂西的大溪文化，也与河南地区仰韶文化互有影响。二者均以红陶为主，在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层内，出土的豆、圈足碗、筒形器座与大溪文化同类器物相似，而筒形瓶则是大溪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双唇小口尖底瓶片和饰有圆点勾叶纹、弧边三角纹的彩陶片，则与仰韶文化相同。

黄河流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而河南则是摇篮里的一颗明珠。正是由于其

位居中原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所以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以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易于接触周围地区的其它原始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不断丰富和充实提高，从而共同创造出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注 释

[1]安志敏:《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1981年第3期。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3][26]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4]①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②1985年在大河村遗址进行第八次发掘,在距地表8~12.5米的文化层中,发现仰韶文化早期的遗物。
[5]在这一地域发现的大河村类型重要遗址有:洛阳孙旗屯、王湾,临汝大张、阎村,以及荥阳点军台等。
[6]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7]①梁思永:《后岗发掘小记》,《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2年春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8]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7期。
②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1期。
③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6期。
[9][12]河北省文管处:《正定南杨庄遗址试掘记》,《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10]同[7]②。
[11]同[8]②。
[13]罗平:《河北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4期。
[14]唐云明:《河北邢台柴庄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第6期。
[15]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文物》1972年第10期。
[16]淅川黄楝树发掘报告待发表。
[1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1期。(茅草寺1965年划归社旗县)。
[1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1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1期。
[2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召二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7期。
[21]长办文物考古直属工作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0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2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3]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24]长葛县文化馆:《长葛县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25]山东省文管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原载《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试论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若干问题

——纪念苏秉琦师诞辰九十周年

1965年第1期《考古学报》发表苏秉琦先生的著名论文《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先生在文中提出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的一次重大变化：

"在它们的前期，我们很难分辨两者的哪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更多一些，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在它们的后期，则显然像是东边对中原的影响要多一些。例如，在东边发现的那种彩陶是很个别的，而在中原所发现的鼎、豆等显然是受东边影响之下产生的东西，不仅已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具有极其相似的型式变化序列，从而大大缩小了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异。"苏先生在文中还提到中原与江汉地区文化关系也有相近的变化。

此后，在河南地区不断有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具有这两种文化因素的遗存发现，一再证明着苏先生的科学预见。

一、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首先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这是一种主要分布在以山东省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大约在6300年至4500年之间，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可追溯到50年代在荥阳点军台遗址、郑州林山寨遗址、信阳阳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而首次发现成组的大汶口文化器物则是1962年4月在偃师滑国古城墓葬内出土，主要有高领罐、高柄杯、觚形杯、背壶、器盖等[1]。此后，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分别在永城洪福，虞城营廓，夏邑三里堌堆[2]，鹿邑栾台，郸城段寨、展庄户、丁寨、汲冢，沈丘黄花城、东冢，项城高寺[3]，淮阳平粮台、范丹寺、蒋台寺、三里堂、磨旗台、朱丘寺，太康方城、槐寺，扶沟梅桥，商水章华台、大邵、宋王、洼刘、阎庄、白塔寺，周口水灌台，西华陆城、小白庄、瓦屋赵、前柳城、陵西、泥土店，禹州谷水河[4]、瓦店[5]，鄢陵故城，新郑唐户，郑州大河村，平顶山寺岗，汝州大张、北刘庄[6]，洛阳矬李，偃师二里头、南寨，孟津寺河南，正阳姜黄庄，遂平唐岗，上蔡十里铺、段寨、钓鱼台、蟾虎寺、晒书台[7]、李湾，固始刘楼，潢川霸王台、碾盘山，淮滨沙冢[8]，唐河湖阳等遗址或墓葬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存。分布地区已遍及黄河以南的商丘、周口、

许昌、平顶山、郑州、洛阳、南阳、信阳和驻马店等9个市和地区。由上述分布可以看出,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主要集中在商丘、周口等豫东地区。其中不少大汶口文化遗存,还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甚至屈家岭文化交织在同一处遗址内。这些考古发现为研究大汶口文化在河南的分布、文化面貌和特征,为确定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年代的发展序列,为研究上述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河南境内比较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墓葬有段寨、栾台、平粮台、章华台、水灌台、大河村、谷水河、寺河南、寺岗等。其中:

段寨遗址位于郸城县西南巴集乡段寨村西北,是一处面积约7500平方米的台地,高出周围地面约5~6米。遗址堆积很厚,以大汶口文化为主,也有一些龙山文化和少量仰韶文化及商周的遗存。1974年以来,该遗址由于平整土地,多次发现白陶鬶、褐陶鬶、高圈足盘形镂孔豆、宽肩壶、篮形器、宽边罐、高柄杯等陶器,大部分与大汶口文化同类器物相同。1979年12月在这里进行试掘,发掘出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和13个灰坑。其中1号墓为圆形土坑墓,直径1.12~1.20米。墓内人骨架紊乱,可能是二次葬。经头骨鉴定,为一成年女性。从死者外侧门齿的齿痕已经愈合的情况推测,表明该牙齿早已被拔掉。这与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拔牙的习俗相似。墓内随葬有高领壶、小杯、鼎、器盖等陶器。2号墓为长方形土坑墓,长2.90米,宽1.31米,深0.18米。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面向上,骨架南侧放置随葬品,计有高足杯、盘形粗柄镂孔豆、高领釜形鼎、背壶等陶器,墓坑东壁下还有残石铲,右臂、腰部及股骨间放有猪牙。经鉴定,死者是一个老年男性。灰坑以圆形居多,椭圆形次之,少量为长方形,坑内出土不少陶器残片,一些还可以复原,器形有罐形鼎、圈足罐、高领罐,长颈高流鬶、背壶、杯等[9]。

栾台遗址位于鹿邑县东南10公里王皮溜乡普大庄村西北地,其上有栾香寺旧址,高出周围地面5米左右,当地村民称之为"栾台"。其北有白沟河流过,面积约2.5万平方米。1987年进行发掘,初步将已发掘的各类遗存分为六个文化期。第一期即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除包括文化层堆积外,主要遗迹单位是一批窖穴。如H142、H155均为圆形,直壁,底部近平。而H156则为不规则形,坑壁倾斜,为锅底状。坑内堆积主要是大块红烧土,红烧土一般厚5厘米左右,多有平整的草泥土面,另一面有清晰的木痕,似为倒塌的墙体。由此可以推之,这时期的房屋可能是地面上建筑,有经过火烧的墙体。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其中以泥质棕红陶最多,还有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褐陶、夹砂灰陶等。器物多为素面磨光,也有饰以横篮纹、弦纹、瓦棱纹等纹饰。主要器类有鼎、鬶、盉、壶、尊形器、罐、高圈足镂孔豆、高柄杯、器盖等。此外,还有石斧和蚌刀。其年代距今约4900~4500年之间[10]。

平粮台遗址位于淮阳县城东南大连乡大朱庄西南台地上。在这里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而闻名于世。被城墙夯土层及第⑨层直接叠压的第⑩层,为平粮台一期文化。该期陶器以棕陶居多,灰陶次之,素面居多,篮纹次之,不见方格纹和绳纹。器形有侈口敛颈鸭嘴形足鼎、尖唇折沿鼓腹罐等大汶口文化典型陶器[11]。

水灌台遗址位于周口市区内水灌台村西南高地上,面积残存1000平方米,在此修建

地区烟草公司仓库时将其推平。1984年在这里发掘大汶口墓葬4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分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两种，死者头向北或北略偏西，其中1、2、3号墓均有随葬品，而4号墓未见随葬品，但发现切齿被拔除，这是大汶口文化典型习俗之一。随葬的生产工具有舌状刃石铲，磨光精致，质细如玉。还有夹蚌粉的陶纺轮，两面磨光，中间穿孔。随葬生活用具均为陶器，有盆形鼎、直口高领彩陶壶、双耳背壶、敞口杯、黑陶三乳足杯、圈足豆、平底钵、碗、黑陶壶、红陶壶、小陶罐、磨光黑陶觚形器等。从器物形制看，这些墓葬为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偏早者，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也很密切[12]。

章华台遗址位于商水县城北郊章华台村，遗址为近似方形的台地。东西长140米，南北宽120米。在遗址东北部和东南部发现有大汶口文化墓地，清理出多具完整的人骨架和一批随葬陶器。较为典型的器物有：凿形足罐形鼎、短流鬶、盘形高粗柄镂孔豆、宽肩瘦腹壶、背壶、宽平沿红陶高柄杯、觚形杯、细柄杯、长颈盉等[13]。

郑州大河村遗址，曾清理出大汶口文化墓葬，如探方10的9号墓，出土有2件小口、宽肩、鼓腹、平底的彩绘背壶。在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堆积层中，也出土有细泥灰陶尊、背壶、长颈敛口盉等具有大汶口文化风格的陶器[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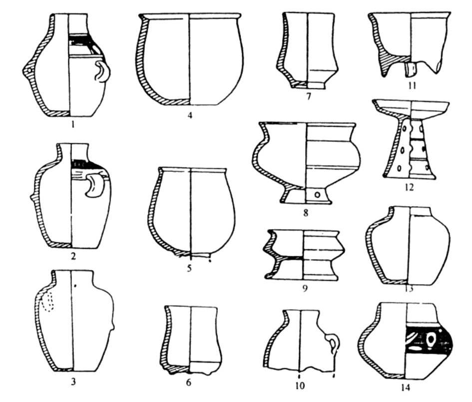
谷水河遗址位于禹州西北顺店乡谷水河村西，是一处颍河与谷水河汇合处的三角台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这里文化层堆积丰厚，以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为主，但也出土了一批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如盆形鼎、罐形鼎、长颈壶、宽肩壶、觚形杯、镂孔高柄杯、深腹罐、袋足鬶等[15]。

寺岗遗址位于平顶山市东郊的东环路边，即东高皇庙乡大营村北，面积约3.2万平方米。曾在这里清理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随葬器物有鬶、长颈壶、粗柄豆、高柄杯、觚形杯、圈足尊等10多件陶器[16]。

依据目前发现的资料，可将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以周口水灌台大汶口墓葬的出土物为代表。早期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一次葬或二次葬。生产工具有石铲和陶纺轮等。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红陶和棕陶次之，还有少量的黑陶；陶器表面磨光较多，彩陶甚少，有白衣褐彩和红彩两种，纹饰主体为圆圈弧三角纹和网状平行线纹；器形有盆形鼎、背壶、杯、尊、盉、钵、碗、壶、豆、觚形器等。其中鼎为红陶或棕陶，胎内夹蚌末，折沿，盆形，圜底，下附三个鸭嘴状足。背壶为泥质灰陶或泥质红陶，通体磨光，小折沿，口微敛，腹部一面圆鼓一面平直，双耳，小圈足。壶为高领彩陶壶，也有泥质红陶或灰陶的直口、短颈、鼓腹壶。杯为微侈口，下腹垂折，小圈足或乳突足。尊为小折沿，腹稍垂鼓，平底或微凹底（图一）。

晚期遗存以鹿邑栾台一期为代表。晚期墓葬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圆形竖穴土坑墓两种，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并有一定数量的二次葬。灰坑多为圆形，也有一些椭圆形及个别的不规则形。生产工具有石铲、陶纺轮、骨镞等。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泥质棕红陶也占一定比例，还有一些黑陶和少量褐陶、黄陶和白陶。陶器素面较多，还有少量彩陶，一些拍印横篮纹及绳纹、镂孔、瓦棱纹、弦纹、指窝纹等。典型器物有泥质陶背壶，有灰、黄灰、棕灰、红等多种颜色，有双耳或再加一鋬；有款足鬶，体肥硕，细长颈，高尖流，腹上部多有一周附加堆纹；有实足鬶，凿状三足，球形腹，短流；有盆形鼎、釜形鼎，多为夹砂棕陶、灰



图一　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早期陶器

1、2、3、10.背壶　4、5.尊　6、7.折腰杯　8.宽肩壶　9.折腹簋　11.鼎　12.豆　13、14.壶

陶，腹部多饰横篮纹，少量饰绳纹，下附三个鸭嘴形足；有泥质灰陶盘形豆，卷沿，浅盘平底，口沿上常有小鋬，柄上有圆形、菱形、三角形镂孔；盂形豆，侈口，圜底，粗柄上饰圆镂孔；还有浅盘细高柄豆；泥质黑陶或红陶高柄杯，陶胎轻薄，器表光亮，侈口，弧腹；大口折沿罐，深腹，平底，腹饰横篮纹或素面。还有宽肩壶、尊、器盖等(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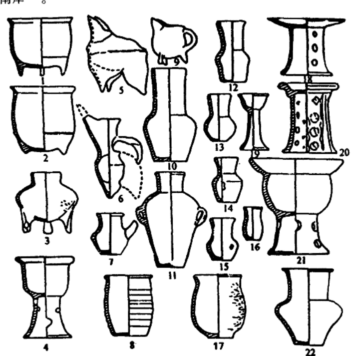
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早期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相比较，约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而又略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晚期，则相当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又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相当。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其文化性质、年代、族属以及与仰韶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讨。

有学者指出，传说中的太昊时代应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因为根据“陈，太昊之虚也”，其地在河南淮阳县，只有这时大汶口文化分布到淮阳一带，而太昊的后裔现多在山东，说明有北迁的趋势[17]。有学者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很可能就是古代太昊族的文化遗存[18]。

对其文化性质，有学者把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称之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认为大汶口文化遗存在颍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的分布是广泛而密集的，向南可达淮河岸边。依其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可分两类。一类与仰韶文化晚期共存；另一类与仰韶文化

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期及龙山文化早期共存。其影响向西可到秦岭，向南则进入江汉地区，甚至到长江南岸[19]。



图二　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

1、2、3.鼎　4.杯形豆　5、6、9.鬶　7.盉　8.尊形器　10、12、13、16.长颈壶　11、14、15.背壶　17.圈足罐　18、20.镂孔高柄豆　19.高柄豆　21.盂形豆　22.宽肩壶

又有学者认为，豫东地区相同于仰韶晚期的遗物，是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共存，都应归入大汶口文化系统。而到了仰韶向龙山过渡的庙底沟二期，豫东地区文化遗存，如郸城段寨、永城黑堌堆、鹿邑栾台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大汶口文化系统，应该归入中原文化系统，它们与豫中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山东大汶口文化最晚期共存且关系密切，但与前者更接近，可称之为段寨类型，这是中原文化系统之内一个相对较独立的特殊类型[20]。

也有学者指出，永城黑堌堆下层、胡道口遗址、郸城段寨、商水章华台，从文化面貌看多与大汶口文化类似，基本上应属大汶口文化的范畴，不过它也有一些地方特点。这些遗址的年代有早有晚，早的相当于仰韶晚期，次者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最晚的似也早于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在该地区是经过长期发展的，在造律台类型形成之前，这里一直居住着大汶口文化的先民。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或王油坊类型陶器中有不少器物是传承当地大汶口文化而来[21]。

近年来，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遗存内，发现有白地上饰花瓣纹、圆点勾叶纹的彩陶盆和彩盆钵，还有八角星纹的彩陶盆等，这与河南豫西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相似；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随葬品组合为鼎、钵、釜，中期墓葬随葬器物组合为鼎、豆、罐

(或壶),其形制变化序列与洛阳地区仰韶文化同类器物形制变化序列相拟,显然吸收了很多仰韶文化的因素。而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有细泥灰陶尊、背壶、敛口盉等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在禹州谷水河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如盆形鼎、罐形鼎、长颈壶、宽肩壶、觚形杯、镂孔高柄杯、深腹罐、袋足鬶等。加上在河南其他地方大汶口遗存的发现,又反映了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受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强烈影响[22]。

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联系紧密,其墓葬特征与埋葬习俗,以及出土的陶器、石器等均十分接近。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陶器中大量棕红陶的存在,背壶、鸭嘴形足鼎和高柄镂孔豆及杯等,都具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典型特征。两种文化内涵主体十分接近,决定了河南境内的遗存,应属大汶口文化的范畴。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内随葬猪头、龟甲、象牙或骨雕饰品,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等习俗,陶器中的钵形鼎、折腹鼎、双腹豆、圈足盉、双耳瓶等器物在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中非常少见。这应是因为地域关系的差异。

总之,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曾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并吸收了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充实了自身的发展。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亦即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时,山东大汶口文化向东、向南扩展,至少已达到颍河流域,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文化,构成了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仰韶文化,某些陶器特征又被仰韶文化所吸收。郑州大河村、禹州谷水河等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正是这种影响的结果。这些考古发现又证明了苏秉琦先生远在1965年对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相互之间关系的论断是多么正确[23]。

二、河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首先发现的一种古代原始文化。它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四川东部,南逾长江至湘北,东达湖北的东部及江西修水一带,北抵河南西南部地区,分布地域辽阔,是长江流域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距今约5300余年至4200余年之间。屈家岭文化的蛋壳黑陶、朱绘黑陶、彩绘陶纺轮等陶器,独具一格,有别于其他的古代原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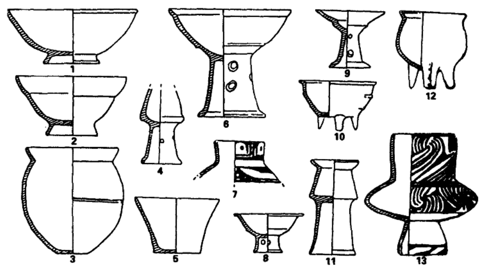
河南境内的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发现也可上溯到50年代,在泌阳三所楼、信阳阳山、唐河寨茨岗、社旗茅草寺、镇平赵湾和淅川下集诸遗址的发掘中,都包含有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初,又较大规模地发掘了淅川黄楝树、下王岗等遗址,并在淅川下集、黄楝树、下王岗等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三叠层。这些发现对研究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研究同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甚至探讨楚文化的发展渊源,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进入80年代,河南开展第四次文物普查,加之陆续进行的考古发掘,又在豫南和豫中地区发现不少屈家岭文化遗存,总计有160多处[24]。其中有豫西南的淅川下王岗[25]、下

集[26]、马岭、黄楝树[27]、门伙、沟湾、东庄、李寨、张河、金河、双河镇、马山根、大寨、庙岭,邓州太子岗、老龙冢、八里岗[28]、下岗,西峡马家营、上营、小水、秧地、牛王村、南塘岗,内乡茶庵、杨营、小河、朱岗、香花寨[29]、岗堤、寨后沟、小寨、李南村、黄龙庙岗,镇平冢上寺、冢洼、灰土坡、赵湾[30],唐河湖阳、寨茨岗[31]、许河、回龙寺、陈马庄,新野凤凰山、邓禹台、西高营、翟官坟、马鞍山,南阳黄山、王营,南召竹园、二郎岗[32]、寨上、小余坪、庙坡,桐柏陡坡嘴、闵岗、回龙,社旗谭岗、茅草寺[33]、潘庄,方城油房庄、枣庄、金汤寨、平高台、徐庄、汉王台、一里坡;豫南的信阳阳山[34],罗山堰嘴、小罗湾、庙岗、杨树、宋畈、周桥、杨寨、姜嘴、刘台、李上湾[35]、梨园堆[36]、方湾和擂台子[37],息县秦楼、张庄、龙岗、兴泰寺、前王沿、赵庄、许冢、黄围孜,光山徐畈、陈乡、卧龙台、翁岗、古城村、小易畈,潢川后盘龙岗、刘冢、钟冢、凉马台、新印堆孜,新县南墩、天亮寺,驻马店双高楼,新蔡郭冢、小侯寨、冢子怀,遂平杨台寺、唐岗、梅庄、魏湾、陈庄,上蔡高岳集、杨庄、邝庄、张卜楼、李湾、十里铺、蟾虎寺[38]、叶王、太子庙、土屯、翟庄,泌阳唐瓷岗、蒋庄、太子岭、三所楼、荆树坟,正阳王家冢、刘岗、黄刘庄、楼台、台子坡、台子堆、老母洼、西夏湾、卢庄、八里庙、小唐庄、大黄庄、卧牛堆、七门村、潘庄、黎台、清凉寺、李台、任庄、李楼、翟庄、晒谷堆、鲁庄、薛寺、姜黄庄,确山朱庄,汝南曹寨;河南中西部一带的郑州大河村[39]、禹州谷水河[40]、汝州北刘庄[41]、荥阳青台[42]、洛阳王湾[43]等处,均发现有屈家岭文化遗址或遗存。从调查或发掘中可以看出,豫西南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与河南龙山文化层之间,内涵单纯,遗迹遗物相当丰富,或可独立分期;豫南和河南中部的屈家岭文化遗存是散存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地层与器物群之中,亦即只有部分遗物与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不能独立分期。

下王岗遗址位于淅川县西南宋湾乡下王岗村东河旁台地上,四周受丹水浸蚀,现存面积约6000余平方米。1971~1974年,在这里多次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文化层堆积厚达2~4米。自早到晚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西周文化五个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这样丰富的、漫长的文化层叠压现象,在河南考古发掘工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下王岗遗址的屈家岭文化层,发现了一些遗迹和遗物。其中有房基1座,为东西两间并列的一组地面上建筑,房门朝南,房基周围有土墙和柱洞,屋内地坪经过火烧加工,十分坚硬。发掘出灰坑35个,平面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不规则多种;立面则为口小底大的袋状坑、口底相当的平底直筒坑、口大底小呈锅底状的坑,一般较浅,坑壁较弧。坑内多填满灰土,出土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如H15,口长2.37米,底径2.56米,深为1.40米。出土一大批陶器、石器,有一些还相当完整,底部还堆积不少蚌壳。看来此坑原来是储存东西的窖穴。发掘出墓葬6座。其中土坑墓3座,均为长方或椭圆形竖穴土坑墓,一座是单人仰身直肢葬墓,墓坑长1.85米,宽0.55米,深0.10米。面向北,左肱骨上部残缺,中年女性,有拔牙现象,随葬骨笄1件置于头部,填土中还有1件骨镞。另一座近椭圆形,底部平整,上墓口直径为1.03~1.30米,墓底直径1.01~1.25米,深0.18米。墓内合葬人骨4具,头向北或东北,葬姿各异。包括40~50岁男性1、40~45岁女性1、幼儿2,均为一次葬、但无随葬品。另一座长方竖穴土坑墓,长仅1.00米,宽0.60米,葬一儿童。还有3座瓮棺葬,置于圆形或椭圆形坑内,用陶罐作葬具,内葬幼儿,盖以陶碗。在下王岗屈家

岭文化层内，共出土遗物490件。其中生产工具284件，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石镰、石刮削器、石镞、石弹丸、石网坠、磨石、骨镞、骨鱼钩、骨鱼镖、骨锥、骨匕、骨针、牙刀、陶锉、陶纺轮；生活用具110件，包括陶鼎、钵、豆、碗、杯、器盖、彩绘壶、甑、盆、澄滤器、鬶、盉、瓮、器座、支座等（图三：1～7）；装饰品和工艺品96件，包括骨笄、石环、石管、陶环、陶空心球、陶鸡、陶狗等，其中陶空心球十分精致，直径3.4厘米或5厘米，表面饰弧形短线或麻点，中空内置小颗粒，摇之作响[44]。



图三 豫西南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陶器

1、2.碗 3.罐 4、5、11.杯 6、8、9.豆 7、13.彩绘陶壶 10、12.鼎 （1～7下王岗遗址出土，8～13黄楝树遗址出土）

黄楝树遗址位于淅川县城西南45公里滔河乡黄楝树村西黄岭河与丹江交汇处的高台地上。由于高台地俗称龙山岗，故又称龙山岗遗址。遗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50米，面积约1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3米。1965年和1966年曾先后两次对这处遗址进行发掘，证明黄楝村遗址有三层文化相叠压，最下面为仰韶文化层，中间为屈家岭文化层，上层为龙山文化层。这是一处原始社会晚期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村落遗址。这里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其文化层堆积之厚，发现遗迹和遗物之丰富，在河南境内是比较少见的。在黄楝树遗址发掘出25座屈家岭文化的房基，都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地上建筑。其中18座房基为单间房子，有7座房基为双间房子。房基布局较有规律，北排房5座，东排房17座，二者垂直构成长方形村落庭院的东北角，另有2座位于东排房南段和南端，构成庭院的两个西南角，还有1座位于庭院中部。房子面积一般为10平方米左右，个别有20平方米的。房屋是先挖出基槽和四周的柱洞之后，就在槽内立柱筑墙。墙壁是以木柱和竹竿作骨架，再以烧土块掺和粘土、稻秆、稻壳搅拌成泥，涂抹为墙的。屋内地面是以黄砂土铺垫而成，并经夯打，涂敷白灰，也有把白灰涂抹至墙壁脚上。还有由于房屋使用时间较长，地坪残破，致使多次铺垫黄土和涂抹白灰面进行修补。房门在修墙时就留下缺口，再在垫铺屋内地坪时筑起一道高出屋面的门槛。双间房子的过道门，是在

修建隔墙时建成的，作为房内往来的通道。每间屋内都有1个火塘，个别有设2个或3个火塘的，这是为了保存火种作饭和取暖，这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个体小家庭的特点。

黄楝树遗址的屈家岭文化房基中最有代表性的11号房基。这是中间有隔墙的两间为一组的地面上建筑，东西长8.35米，南北宽4.25米，残墙高0.30米。西墙发现有5个柱洞，南墙10个柱洞，东墙3个柱洞，北墙8个柱洞，中间隔墙3个柱洞。在室内还发现4个柱洞和5个用泥堆积的柱础，这可能也是为了支撑屋顶而用。柱洞底较平，有的还残存木柱灰痕。房内地坪铺有0.20米厚的细黄沙土，其上涂敷白灰面。房门开在西墙南头，过道门开在隔墙北头，两个门的宽度均为0.80米。屋内各有1个圆形火塘，外间火塘在隔墙外侧偏南部，正与房门相对；里间的火塘在东北角，也与过道门相照。火塘是在屋内地坪上挖出浅坑，坑底坚硬，均烧成青灰色或黑灰色。房基内出土较完整的遗物26件，不仅是这批房基中出土器物最多的，而且分5组放置较有秩序。第一组为外间西北角的一堆有7件，即陶罐3、器盖1、陶瓮1、陶豆1、彩陶壶1；第二组即外间中部的一堆5件，有陶鼎1、彩陶壶1、陶碗1、陶杯1、陶钵1；第三组即里间西北角的一堆有7件，有陶豆2、陶杯2、石球1、石镰1、陶纺轮1；第四组为里间东南角的一堆有5件，即陶杯3、器盖1、骨针1；里间火塘南侧还有一堆2件即第五组，为陶豆1、陶碗1。由于在外间存留有两段焚烧过的木柱和很多碎炭块，房基的木柱、竹片都被烧焦，不少陶器被火烧裂成碎片，地坪白灰面被火烧得龟裂松碎，变成红黄色。因此推断11号房基是经历一场火灾而废弃的。值得注意的是，在11号房基内的填土中，发现烧土块内的庄稼秆和粮食壳痕迹，经河南农学院鉴定是稻秆和稻壳。对11号房基内出土的木炭作^{14}C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为4730年[45]。

除房基之外，还发掘出屈家岭文化的灰坑18个，有很规整的圆形坑，还有圆袋形坑、椭圆形及个别的长方形坑。坑内均填满灰土，出有陶器、石器等遗物。在1个椭圆形坑内埋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发掘长方竖穴土坑墓18座，墓坑长0.96~1.76米，个别长达2米，宽0.37~0.64米，深0.05~0.32米。绝多为仰身直肢葬，仅有一墓仰身屈肢葬。随葬品很少，只有4座墓分别随葬1~2件陶鼎、罐及粗糙的石珠、陶环等。发掘出瓮棺葬20座，放置在土坑内，葬具还用陶器作盖，有罐和碗、罐和豆、罐和罐、罐和瓮、碗和豆等多种。在葬具底部或盖的底部钻有小孔，可能反映灵魂出入的迷信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3座土坑墓和3座瓮棺葬分别组成合葬墓，瓮棺位于土坑墓骨架的腰下，犹如殷商时期墓葬的腰坑。土坑墓主为成年女性，发掘者推测或因分娩难产，致使母子双亡，出于亲子之心，遂同葬一墓。

黄楝树遗址屈家岭文化遗物非常丰富，陶器有敞口折沿平底凿状足盆形鼎，敛口鼓腹平底罐，敞口斜壁平底钵，深盘高柄圆形镂孔豆、高柄直口或敛口杯，直口高领鼓肩彩陶壶（图三：8~13），覆盘形器盖，以及甑、瓮、澄滤器、尖底器、缸、纺轮、陶垫子等；石器有斧、锛、铲、凿、镰、刀、网坠、镞、杵、臼、砺石、钻孔石器和钻孔石芯等；骨器有锥、刻刀、镞、匕、鱼钩、针等；蚌器有刀、镞等。此外还有一些小件装饰器，如石环、石珠、石镯、石璜、骨簪、骨环和蚌环等。这些出土遗物中以折腹镂孔高足陶杯、蛋壳黑陶塔式高足杯、彩绘陶壶最为精美。而出土的陶纺轮总数达263个，这在全国同类遗址中也是罕见的。纺轮有角边的，弧边的、鼓面的、折边的，造型各异；有红色的、灰色的、黑色的，有些还绘有各种各样的

图案。真可谓琳琅满目,五彩纷呈。钻孔石器和钻孔石芯的发现,使我们知道当时是用管钻法从两面钻孔而成。钻管可能是竹管,再配以砂粒和水来进行操作。稻壳和稻秆的发现,说明当时以种植水稻为主。石杵和石臼是加工稻谷的工具,显然要比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进了一大步。

类似于淅川下王岗、黄楝树遗址的还有淅川下集、邓州八里岗等诸多一批遗址。根据考古发掘出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特征,豫西南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大致可分作两期。

第一期以黄楝树、下集、下王岗屈家岭文化一期为代表。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泥质黑陶和夹砂棕陶次之,泥质红陶数量较少,陶胎中夹蚌粉的现象十分普遍。陶器制作以手制轮修为主,一般为素面,少量陶器器表饰有弦纹、细绳纹和附加堆纹,陶壶、陶钵腹部或口沿有彩绘图案。主要器形有深腹罐、盆形鼎、敞口钵、深盘高柄豆、折腹碗、高足杯、器盖、彩陶壶等。

第二期以下王岗屈家岭文化二期为代表。陶器以泥质和夹砂棕陶为主,约占近半数,泥质灰陶次之,泥质黑陶和泥质红陶较少。器表以素面为主,还有一些绳纹、方格纹、篮纹和弦纹。主要器形有深腹罐和折腹罐,多种形制的罐形鼎,大浅盘矮柄豆,以及盆形甑、直壁高柄杯、袋足鬶、管流盉、大口浅腹钵、圆唇深腹盆、高领鼓肩壶、覆钵形器盖和瓮、盘、澄滤器、器座、喇叭形支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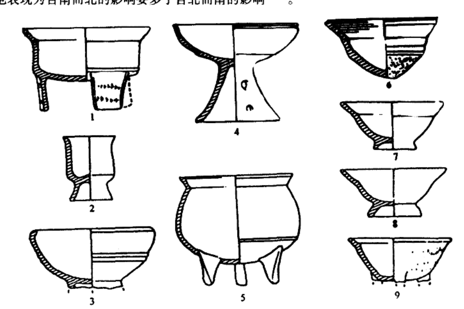
与湖北京山屈家岭、郧县青龙泉、大寺诸遗址相比较,豫西南地区第一期屈家岭文化与湖北屈家岭文化晚期相类同;豫西南地区第二期屈家岭文化承袭了豫西南地区第一期屈家岭文化,是屈家岭文化向当地龙山文化过渡的文化,其年代与龙山文化早期相当。

而豫南地区的诸多屈家岭文化遗存,如信阳阳山、罗山李上湾、梨园堆、方湾、擂台子诸遗址,所出土的遗物约可分为3组,一组为盆形鼎、高领罐、深盘豆、圈足碗、高柄豆、器盖等屈家岭文化陶器;一组为折沿罐形鼎、敛口红陶钵、鸭嘴形鼎足、折沿深腹罐等近似于仰韶文化的陶器;一组为少量的不同于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器物,可能是当地的土著文化。而属于仰韶文化器物的数量所占比例较大。

在豫中地区的郑州大河村、荥阳青台、禹州谷水河、汝州北刘庄等遗址中,都出土有瓦足盆形鼎、罐形鼎、簋、釜、双腹碗、浅盘粗柄镂孔豆、高圈足杯等具有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图四),但与原汁原味的屈家岭文化典型陶器已有了较大的差别。这些陶器仅出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地层中,构不成内涵单纯的屈家岭文化遗存。且与同期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数量和种类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综上所述,豫西南地区南面与江汉平原连成一片,从许多遗址的发掘可知,这里是屈家岭文化分布的北部地域,或者可说豫西南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是湖北屈家岭文化向北扩张的结果。而豫南地区较多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和豫中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因素,也是受到江汉地区强大的屈家岭文化和豫西南地区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而豫南特别是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利用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吸收融合周边各地区的文化精华,当然包括屈家岭文化因素在内,不断丰富和充实自身的文化内涵,使之得到不断发展。这些又证实了苏秉琦先生另一个著名论断:"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邻境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

也表现为自南而北的影响要多于自北而南的影响”[46]。



图四 豫中地区屈家岭文化陶器

1、9.盆形鼎 2.高圈足杯 3.簋 4.圈足豆 5.罐形鼎 6.釜 7、8.双腹碗

以山东为主体的大汶口文化和以湖北为主体的屈家岭文化，在其后期都深入到河南境内，并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晚期以强烈的影响。苏秉琦先生把这时期三方面文化联系的主导活动方向示以图解(见附图)，让读者有形象化的理解[47]。这无疑促进了中原地区古代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在华夏大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周边各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最终形成我国统一的民族文化，使中国古化文明以其连绵不断和博大精深而在全世界大放异彩。

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

鲁南苏北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

江汉间屈家岭文化

三、后记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考古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之一，他在六十多年的考古生涯中，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尤其是对考古学理论的探索和实践，对考古学谱系的建立与研究，对考古人才的教育和培养，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于河南的文物考古事业也非常关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给予很多支持和指导。

1952 年以来，我国数届考古人员训练班都在河南进行考古发掘实习，苏先生亲自为学员们授课。他们结业后，绝多都成为全国各省市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和业务中坚。

1954 年，苏先生主持洛阳中州路的考古发掘和整理，他把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按其陶

器的组合，分为鬲、盆、罐组，鼎、豆、罐组，鼎、豆、壶组，鼎、盒、壶组四大类；再对每一种器物，进行类型学分型分式分期研究，然后在四大类组合之内排列每种典型器物型式的发展序列，找出其相互之间的替代和交错关系，细分为前后七期；又按照墓葬的形式分为大、中、小三型。按照与陶器的共存关系，还把不易看出演变规律的和已订其年代的玉器、铜剑、铜镞、铜带钩、铁刀等互相参照，推断其年代，分出相应的期别。再通过各期之间变化的比较，发现三、四期之间，亦即春秋、战国之间，是发生重大变革的阶段。这样，就把年代学考察，上升到分析社会关系变化的高度，成为考古类型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全国其他古代遗址、墓葬的发掘和整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48]。

50年代中期，苏先生曾先后两次来河南指导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他提出无论在发掘现场，还是在室内整理过程中，除应注意地层关系外，还应注意不同地层中和墓葬内出土遗物的特征，尤其是陶器质地、制法、形态和纹饰的变化等等，这对于遗址和墓葬的分期是至关重要的。在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掘和报告整理过程中，除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灰坑与灰坑的早晚打破关系外，还根据不同地层和灰坑中出土的陶器进行分类排队，然后把二里岗遗址分为下层和上层两大期。其中最早是通过陶鬲的不同特征来区分下层和上层的，在此基础上又把下层和上层的甗、斝、豆、爵、大口尊、瓮、小口尊、簋、盆等陶器区分开[49]。实践证明，苏先生一贯倡导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编写报告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64年，苏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专题讲座上讲了"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除了涉及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外，还较多地讲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同时对于仰韶文化的年代、分期、社会发展阶段、分布和分区、同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等，均作了深刻的论述。其中特别提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前期在与周围原始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仰韶文化后期，除对西方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则对中原地区有强烈影响。这反映了我国民族文化关系的重大变化。在讲稿中，苏先生引用了不少河南的考古资料[50]。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十年动乱中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期间，在非常困难的环境条件下，苏先生还念念不忘我国的考古事业，以"业余考古"者的身份，进行了一些田野考古调查。先后发现了息县范庄遗址、米围子遗址、姜黄庄遗址和信阳朱庄遗址、黑铃铛遗址、周庄遗址，遗址内涵分别包括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殷商文化，并有比较明显的地方特点。这为了解豫南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编年提供了重要线索，展示了老一辈学者酷爱考古事业的拳拳之心[51]。

1983年春，苏先生来河南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会后抽出三天时间到登封王城岗遗址和禹县瓦店遗址进行现场考察与指导。他深入观察出土的不同陶器器类，并详细分析了鼎、罐、斝等器物的谱系、分型分式及演变轨迹。他特别告诫大家，在进行遗址的分期时，不要忽略了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分析；而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析时，又要注意到它的运动、变化特点和规律。这对我们认识王城岗和瓦店遗址发现的意义、文化类型的研究和分期，以及考古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都是十分重要的[52]。

1986年，苏先生为《论仰韶文化》一书写了一篇序言，题目是《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

周年》。该书是1985年11月5日至10日，在河南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苏先生在序言中首先阐明了仰韶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和重大学术意义，其次又分析了仰韶文化区系类型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特征。宝鸡、陕县间为中心区，东支以大河村、王湾为代表，西支以大地湾为代表，三者连为一个整体。最后还探索了仰韶文化的源流和社会性质。这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尤其对河南考古学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53]。

还要提及的，除了在建国初期苏先生为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授课之外，还长期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考古学专门人才，各省市都有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对河南考古人才的培养，也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匡瑜先生回忆，在1977年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建立之初，苏先生就十分坦诚地指出：地处中原的郑州大学举办考古专业，有着天时地利的优势，关键是坚持一条什么样的专业办学方向，以及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保证沿着这个方向去培养专业人才。近代考古学不同于我国以往的金石学，它是建立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郑大考古专业必须走近代考古学的发展道路，要围绕这个核心来组织教学内容。在对学生的培养方面，不仅要有基本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抓好田野教学实习，通过这个环节，培养学生的田野考古基本技能。这个技能不单单是会发掘，还必须是一个综合性的训练，应该是近代考古学全部过程的一个完整的概念。遵照苏先生十分精辟的指导意见，20年来，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为中原地区培养了许多合格的考古专门人才[54]。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又回想50年代后期，苏先生在北京大学文史楼给我们讲课的情景。先生謦语，生动诙谐，旁证博引，深入浅出，用知识的雨露，滋润每个学生的心田，使我们深受教益，终生难忘。

1997年，笔者曾赴河北参加苏先生回归大自然的仪式，与师母和其他师友一道亲手把先生的骨灰和花瓣洒进渤海湾，先生在大海中获得永生。在纪念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仅以此文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注　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2]孙明：《商丘地区仰韶文化初探》，《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3]韩维龙等：《周口地区的裴李岗、仰韶和大汶口文化》，《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4][15][40]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6][4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7][38]①尚景熙：《上蔡发现五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②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
[8]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淮滨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81年第1期。
[9]①郸城县文化馆：《河南郸城段寨出土大汶口文化遗物》，《考古》1981年第2期。
②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2]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13]商水县文化馆:《河南商水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考古》1981年第1期。
[14][39]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6]张脱:《河南平顶山市发现一座大汶口类型墓葬》,《考古》1977年第5期。
[17]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
[18][19]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20]段宏振、张翠莲:《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21]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22][23][46][47][50]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2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25][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26]长办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9年第1期。
[27][45]长办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28]①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调查与试掘》,《华夏考古》1994年第2期。
②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河南邓州市八里岗遗址1992年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7年第12期。
[29]徐新华:《内乡县香花寨遗址新出土陶器》,《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1期。
[3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3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召二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7期。
[3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1期。
[3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信阳发掘小组:《河南信阳市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35][36][3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1年河南罗山考古主要收获》,《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42]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43]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4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
[49][52]安金槐:《苏秉琦先生对河南考古工作的关怀与指导》,《华夏考古》1989年第3期。
[51]苏秉琦:《七十年代初信阳地区考古勘察回忆录——追记一篇下落不明的考古调查记》,《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53]苏秉琦:《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代序言)》,《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5)1986年。
[54]匡瑜:《为我国考古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倾注心血——祝贺苏秉琦教授八十寿辰》,《华夏考古》1989年第3期。

(原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观察

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对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这既涉及到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又与三代文明息息相关；既包括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也与北方内蒙草原、东北辽河盆地、南方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等地紧密相连。真可谓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但由于大家认识不同，看法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热烈的学术讨论，使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入，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们理解古代文明的起源，就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品有了剩余，使得一部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或强行掠夺，导致私有制产生和贫富分化，使人与人由相对平等变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氏族社会解体，出现了阶级，产生了国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于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产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其实，这部经典著作的书名本身，就言简意赅地阐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一方面靠历史文献的记载，另一方面主要靠考古发现来解决。中国古代的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又实实在在保存于古代的遗迹和遗物之中。诸如城、青铜器、文字、祭祀和礼制的遗存等，都是体现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它们各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都成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反映。

城是人类生活聚落的发展形态，对农村而言，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城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源于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是与国家的产生相同步的，是奴隶主阶级作为防御和统治人们的设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1]。中国城的出现很早，《吕氏春秋·君守篇》记有："夏鲧作城。"《世本》张澍补注转引《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训》也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这些说的是夏王朝建国之前的事情，与多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吻合。

闻名中外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是1928年调查发现的，1930～1931年进行了考古试掘，1989～1991年又进行了调查和发掘。遗址位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东侧武源河边的一个高台地上。遗址中有一座保存较好的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为390米。因地就势修建，东、南、西三面城垣平直，北墙向外凸出。"城子崖"之名可能就与这座城址有关。城墙高出地面2.1～3米，城墙宽10.6米，墙下有宽13.8米、深1.5米的基

槽,层层填土夯筑而成。城内龙山文化堆积相当丰富,有的地方厚达3~5米。发现有房基、窖穴、水井等遗迹,表明这座龙山文化城址人口较多,生活繁荣[2]。

河南登封是"禹都阳城"的地方。1977年,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一座与城子崖城址同样古老的东西并列的城堡遗址,位于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的高岗台地上,"王城岗"之名也可能就源于这座古城址。东城残存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它们垂直相交,构成略呈弧形的西南城角,东墙已被五渡河水冲毁;西城保存较好,它的东墙即东城的西墙,北墙西段残长29米,西墙长约92米,南墙长82.4米。南墙东段有一宽约10米的缺口,很可能是西城的南门。东西两城筑法相同,都是先挖城墙基槽,然后填土逐层夯筑。城内中部和西南部较高的地方,发现有断续的夯土建筑遗存,其下填有多具人骨架,可能与奠基或祭祀有关。城内还发现有青铜容器的残片[3]。

河南东部偏南的淮阳县,是传说中的"太昊之墟"。1979年,在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也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均为185米,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10米,底部宽约13米。其下有基槽,用小版筑堆筑法建成。在南城墙和北城墙的中部,发现有城门缺口和路土。南城门东西两侧有门卫房,门道路土下铺设有陶水管道,北高南低以便向城外排水。类似的排水管道还有多处发现,组成了一定规模的排水系统。城内发掘出10多座房基,多为长方形排房,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是夯土高台建筑。其中一座房基(F4)有高0.72米的夯土台基,房基东西长15米多,南北宽5.7米,中间有三道土坯隔墙,构成一组4间的建筑,现存面积达85.5平方米。城内也发现有陶窑、窖穴和墓葬,出土遗物中有铜炼渣等[4]。

1984年,在山东寿光县边线王村北,又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坐落在弥河两古道之间的高岗地上,分为内城和外城,平面均呈圆角方形。外城每边长约240米,城墙挖有上宽下窄呈梯形的基槽,宽约7~8米,深约5~7米,槽内夯土坚硬,夯层清楚,其厚薄不一,为5~10厘米或更厚一些。有的夯面铺细砂,夯层内还有一些长方形或椭圆形土坑,其内外分别埋置人、狗、猪等牺牲,有的是数人同埋一坑,这当是祭祀或奠基的遗存。东、西、北三城墙各有一门,南墙为村子所压,门址不详。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东南,每边长100米,东墙和北墙各有一门,西墙和南墙遭到破坏。从所出陶片分析,内城建筑时间在前,外城修筑时间在后[5]。

1986年,在河南郾城郝家台发现另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222米,东西宽148米。四个城角保存较好,南墙和西墙遭破坏,东城墙中部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门遗存。城内发现有成排的房基,有些为红烧土地面,有的还铺以木地板。又发现有陶窑、窖穴、水井、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骨器、蚌器等遗物[6]。

1990年,在山东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发现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于方形,四周城垣比较规整。南北长约390米,东西宽约350米。夯土城墙残高1.5~2米,宽约20米。城内龙山文化层堆积厚达2米左右。发现有房基、陶窑、窖穴和墓葬。较大的房基面积近50平方米,其下用儿童或成人奠基。除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之外,还发现有刻文陶片[7]。

1992年,在河南辉县孟庄,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面积约16万平

方米。城墙夯土为黄花土，土质坚硬，内含较多的料礓石和少量龙山文化陶片。城墙内侧有二里头文化层或龙山文化层叠压着夯土，城墙外侧有一周护城河，河底距地表深 5.7 米。东城门已发掘出来，宽 2 米多，有版筑痕迹。城内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8]。

1994 年，在山东西部的阳谷、东阿、茌平 3 县，接连发现 8 座龙山文化城址[9]。阳谷县有景阳岗、皇姑冢、王庄 3 座城址。其中景阳岗城址最大，平面呈东北至西南向椭圆形，两端较窄，中部弧形凸出。南北长约 1150 米，北端宽约 230 米，南端宽约 330 米，城中部最宽处约 400 米，全城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城内中部有两座大型台基，还有丰富的文化层堆积。皇姑冢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景阳岗西南 8 公里处，此城亦作东北西南向，南北长约 400 余米，东西宽为 150 米，城内发现有夯筑台基。王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景阳岗东北 10 公里处，城垣被龙山文化灰坑打破，为一座面积不详的小城。

茌平县有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尚庄 4 座龙山文化城址。其中以教场铺城址为最大，东西长约 1100 米，南北宽为 300 米。城内发现东、西两处大型夯土台基。大尉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教场铺东北 3 公里，面积约 3 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一处夯土台基。乐平铺（又称三十里铺）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教场铺北偏东 6 公里，平面近方形，东西长约 200 米，南北宽为 170 米，城垣范围很清楚。尚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茌平县城南 1 公里处，南距教场铺 19 公里。北城墙较直，西墙和南墙不规则，面积约 4 万平方米。

东阿县在王集龙山文化城址，位于东阿县北，西北距茌平教场铺仅 4 公里。城作东北至西南向，南北 320 米，东西 120 米。

上述 3 县 8 座龙山文化城址大体分为两组，即南面阳谷县的景阳岗、皇姑冢、王庄一组；北面的茌平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尚庄和东阿县的王集为一组。且在教场铺西南不远有孟尝君龙山文化遗址，西面 4 公里有高垣墙龙山文化遗址；在尚庄东面约 4 公里有台子高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均有高大的堌堆，据调查也极有可能为城址。像这种成组龙山文化城址，组群中有一座大型中心城址，中心城址内又有大型台基，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

近年，在山东临淄桐林（田旺）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为 15 万平方米。由于资料没有发表，城址的结构和内部布局尚不很清楚。

此外，在 30 年代，河南安阳后岗也曾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发掘一段长 70 余米、宽 2～4 米的夯土城墙，但城的其他情况也不明[10]。

通过上述考古学观察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城址较多，这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也反映了当时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这些城都是建筑在平原或低矮的丘岗台地上；城墙都是用土夯筑的；平面大多为长方形或近于正方形；面积都不很大，小者数万平方米，大者近 35 万平方米。这也符合城址由产生到发展，从小到大的一般规律。有的城址为东西两城并列、中间共用一墙，如登封王城岗古城，有的城址为内外两重城墙，如寿光边线王古城。从发现的遗迹可以看出，城内有成排的房基，有的还是一些高台建筑，甚至有大型夯土台基，有不少灰坑或窖穴，有烧制陶器的窑址或冶铸青铜器的遗存，有地下排水设施，城内外还有墓葬。表明这些城址具有生产和生活的职能。但更重要的是，夯土城墙高大、坚固，城门较窄，有的还设门卫房，这是封闭和防卫职能的表现。有的城内还有奠基牺牲或祭祀

的遗存，是阶级和压迫的反映，是统治权力的象征。而当时用木、石工具修筑如此规模的土城本身，就足以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城已与原始社会聚落址有本质的不同。当然，也不同于后世经济发达、货币关系活跃的城市，而主要是作为维护统治阶级权力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吕氏春秋·离俗篇》记有："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些城址也许就是万国中几个国的都邑。

除了这一批龙山文化城址的考古发现之外，还发掘出龙山文化的大型墓葬。如山东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东北部有一些小墓，西南部有一些大墓，二者相距约180米，看来等级有别。在发掘的3座大墓中有2座是重椁单棺，有一座是一椁一棺。棺椁上均有彩绘。随葬品放在边箱和脚箱内，有的放在棺椁之间或棺内。出土有一大批陶器和一些玉器、石器、骨器、牙器等，还有大量彩绘木器的残迹。陶器中有许多精美的黑陶罍、盖豆及蛋壳陶高柄壶等，当已属于礼器。玉器中有象征权力的钺，还有头饰和镂孔玉笄等，抛光晶莹，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墓主人可能就是统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11]。又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规模巨大，遗址范围内总面积达430多万平方米，除去被后来水土流失破坏的约60万平方米，实存面积尚有300余万平方米。其墓地在遗址东南，约占4万平方米以上，墓地的使用时间与居住地相始终，在近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1309座。其中大墓6座，多有木质葬具，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成组的玉器和石器组成的家俱、炊器、盛器、食器、酒器、饮器、乐器、兵器或仪仗、工具、饰物等，尤其以彩绘龙纹陶盘是最富有特征的器物，玉石器的钺、璧、环、特磬，还有鼍鼓等，也非常珍贵。上述随葬品已构成一大组礼、乐器，可以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礼乐制度并影响后世。墓主人当属拥有特权和大量社会财富具有"王"者地位的显贵。中型墓约192座，也有木质葬具，随葬品减少，有成组的陶器，少量有彩绘，还有一些彩绘木器及玉、石饰物。这些可能是不同等级的中、小贵族，小型墓有1000余座，墓坑很小，多无葬具，绝大部分无任何随葬品，墓主应是相当贫穷的平民。上述三种墓葬的大小、数量的多少、随葬品的悬殊，由贫到富，由小到大，由人多到人少，排成金字塔式的结构，反映了少数贵族与多数平民的阶级分化，处于塔尖的大型墓主，显示出权力中心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12]。值得注意的是，在晋南的临汾盆地，发现与陶寺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80余处，遗址面积多为一至数万平方米，少数在10万平方米左右，个别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如汾城南关遗址面积为40万平方米，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开化遗址，面积128万平方米，方城——南石遗址面积230万平方米。显示了龙山文化在晋南的繁荣。

这些龙山文化时期大型遗址的发现，预示着在西朱封遗址、汾城南关遗址、开化遗址、方城——南石遗址可能有同期城址的存在，尤其是陶寺遗址更会有国都一类的大型城址。同样，山东城子崖、边线王、丁公、桐林(田旺)、景阳岗、教场铺和河南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孟庄等龙山文化城址附近，也可能有同期大墓的存在。

夯筑技术至少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晚期。郑州西山遗址，就发掘出一座近似椭圆形仰韶晚期的古城。夯土城墙西垣残长64米，北垣长171米，东墙残长44米，南墙为枯河冲毁。现存279米多的城墙，高3米，宽5～6米，西北城角和东北城角宽8米。北墙中部有

缺口,缺口外有路土伸向城内,可能是城门的遗存。城垣系从两侧挖沟,就地取土,中间建墙。城墙建筑采用了少见的方块版筑法,城墙剖面结构,随高度增加而逐级内收。夯层明显,夯窝隐约可见,版筑痕迹清晰。城垣内房基、灰坑等遗迹和墓葬较多,城垣外遗迹较少[13]。龙山文化的人们用夯筑技术修建诸多城垣,其速度大大加快,意义非常。龙山文化城址的出现,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而且对后世也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夯土筑城一直为后代所沿用。例如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垣曲古城、黄陂盘龙城等商代城址,还有周代及秦汉时期的诸多城址,均为夯土筑墙。唐宋以后,即使一些城址虽然采用包砖,但墙体还是土筑。夯土技术还用于龙山文化城址内的高台建筑,这应是宫殿建筑的雏形。偃师尸乡沟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宫殿也建在夯土台基上。而其后的陕西周原西周建筑基址和易县燕下都、邯郸赵王城、新郑郑韩故城等一批东周古城的宫殿建筑,咸阳秦阿房宫和西汉长安宫殿遗址均是如此。这种高台宫殿建筑,一方面宜于防潮、防水和通风;另一方面,从外观上看,层叠巍峨,居高临下,既便于了望,又便于防守。龙山文化诸城址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平面布局,成了我国城址平面形状的传统模式。龙山文化城址有两城并列或两重城墙的内外城建筑,大大加强了防御的功能。这对以后的城址建筑也颇有启迪。偃师尸乡沟商城除大城之外,城内还有宫城等3座小城。郑州商城在东城墙南段外侧、南城墙外侧和西城墙南段外侧700~900米处,发现有同时期的一大段夯土墙,现存继续长约5000米,墙宽12~17米,可能是外城墙的遗存。一些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就分布在内外城墙之间。东周时期的新郑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均为东西城并列;临淄齐故城为内外城相套合;侯马晋都新田故城和邯郸赵王城更是多座城组合在一起。

以城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又是以生产力有较大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工具的改进,为农业增产提供了条件;水井的开凿[14],为水利灌溉提供了保证;贮粮窖穴的增加,酒器品类的繁多,说明了粮食的丰富。当时的手工业已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出至今还令人倾倒的重不及50克、厚不到0.5毫米、雕镂精细的磨光蛋壳黑陶杯,晶莹光润的玉器,五彩纷呈的木漆器等便是实证。除前面提及的夯筑技术外,还出现了土坯砌墙,石灰涂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铜器的出现和使用了。

铜器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社会由新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使生产力有了一个飞跃,为改变生产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冶铸青铜器本身,就体现了生产力的进步;而冶炼生产的组织工作,又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据考古发掘可以知道,早在仰韶文化时期的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过黄铜片和黄铜管[15];属于马家窑文化的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曾出土1件通长12.5厘米青铜刀,短柄长刃,刀体厚薄均匀,表面平整,系由两块范闭合浇铸而成[16]。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了更多的铜器遗物或与冶铜有关的遗存,真正揭开了青铜时代的帷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建国以来,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两段铜锥[17];栖霞杨家圈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一段残铜锥、铜炼渣及孔雀石[18];诸城呈子龙山文化遗址和长岛县北长山岛店子龙山文化遗址均发现了铜片[19];临沂大范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残铜件和铜炼渣[20];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铜炼渣[21]。在河南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中,发

现有炼铜用的坩埚[22]；在郑州董砦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曾出土有铜片[23]；汝州煤山龙山文化遗址的灰坑（H28、H40）内，出土有炼铜用的坩埚残片，较大的一块长5.3厘米，宽4.1厘米，厚约2厘米，为红烧土，上面有六层铜液的痕迹，每层厚0.1厘米[24]；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的窖穴（H617）内，出土一件青铜器残片，残高5.7厘米，残宽6.5厘米，壁厚约0.2厘米。器表在烟熏痕迹，说明为实用容器。根据铜片的弧度分析，可能是鬶或斝的残片。残片左端还留有一小段合范缝，说明铸造工艺已有了一定的进步性[25]；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的一座灰坑（H15）内，发现一块铜炼渣，呈铜绿色，长1.3厘米，断面近方形，每边长0.8厘米，显然是炼铜的遗存[26]。此外，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一座墓葬（M3296）内，出有一件铜铃，这是用复合范铸造成型的乐器。外面有清晰的布纹痕迹，可能是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器表横断面呈菱形，长对角5.2～6.3厘米，短对角2.1～2.7厘米，高2.65厘米，顶部圆孔直径0.25厘米，圆孔系整器铸成后再加工钻成。这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的青铜乐器了[27]。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有很多四千多年前的青铜器保留到今天而让我们随手可得，但这并不能否认人们发明青铜器后，推动古代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巨大历史作用。现今的考古学观察，反映了龙山文化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但并没有完全反映当时的水平。窥一斑而知全貌，推测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要更高一些。

龙山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发现，也与古文献记载较相一致。《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越绝书》卷第十二："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虽然至今尚未见到较为像样的夏代青铜器，但从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青铜容器残片、襄汾陶寺的龙山文化青铜铃和偃师二里头早商青铜爵、斝、鼎、盉、觚的发现看[28]，至少在夏代晚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已具有一定水平，我们有理由期望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能找到夏代晚期较大的青铜器。

龙山文化的青铜器，主要还是用于维护和加强统治，而不是用于生产。即使到了商代，虽然生产了大批的青铜器，除部分是生产工具外，绝多还是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用于祭祀和打仗，即《左传》上所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青铜器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关系密切，被称为"国家政权、等级制度的物化形式"。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观察，自然还要涉及到文字的发明，这又是一个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重要媒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就文字而言，早在距今八千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就发现有一些契刻符号[29]。有的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字形相似，有的也和郑州商城所出的大口尊口沿上所刻的目字陶文相近[30]，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距今六千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也发现有近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等口沿上，常发现刻划简单而又整齐的符号，共有20余种之多[31]。而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陶器刻符数量更多，有一些与半坡相似，有的更复杂一些[32]。也可视为文字的先驱[33]。在距今五千余年前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曾发现有刻划的象形文字，有个别字也与安阳殷墟甲骨文相似。这些字被释为旦、炅、戊、凡、斤、南、

享等[34]。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出土的陶器上也有刻划文字，如灰坑 H473 的一件泥灰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曾发现有烧造前刻划的一个"共"字，系由左右两部分组成，象双手有所执持，其字形结构与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的共字相似[35]。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有毛笔朱书文字，古文字学家确认与殷墟甲骨文属同一系统，且字形结构与甲骨文几无区别[36]。陕西长安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批骨刻原始文字，能辨认出来的有大、万、元、三、二、戊、八等字[37]。更有说服力的是，最近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字，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现存文字计 5 行 11 个字，笔划比较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也很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显然已经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38]。

众所周知，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已是六书俱备、相当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应有一个漫长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结合上述考古学观察，推断龙山文化中晚期已产生了文字当不会有什么差错。鉴于中国文字产生的动力，不是来自经济的或贸易的需求，而是来自当时普遍、频繁、日趋强烈和制度化的宗教召唤[39]。所以在文字的初创阶段只被极少数人掌握，那么考古发现就会极为困难，能找到以上关于古文字的线索，已实属不易。即使到了商代后期，能使用甲骨文的也只是统治集团中的高层人物和贞人之类，广大平民和奴隶均与此无缘。若此推测不错，则当时文字所起的作用也只限于占卜记录等，用来维护王权的统治。这与夯土筑城用于防御，青铜兵器用于战争，青铜礼器（当然也包括玉质礼器等）用于祭祀，具有相似的作用。

这样，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城市，发明了文字，开始使用青铜器，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祭祀和礼制也成了统治者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进入了文明社会。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存在的只是为数众多的方国。当时方国的情况，张学海先生从其分布范围、经济基础、等级结构、血缘亲族关系、考古学文化等诸多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40]。在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周围约 20 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几十处龙山文化遗址；山东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周围，也分布有一些龙山文化城址或遗址；山东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附近，亦存在多座小型龙山文化城址；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周围，同样有一批龙山文化遗址；河南平粮台、王城岗、孟庄、郝家台等龙山文化城址附近，也有一些龙山文化遗址发现。说明这些龙山文化城址是各自范围内的中心，亦即各个方国的都城所在。这种文明社会所展示的是方国文明。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开始建立，中国历史出现了第一个由中央统治的奴隶制王国，其疆域西起华山以东，东达豫东平原，北自济水之南，南至淮河沿岸，方圆千里。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更高一级的王国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着明显的个性和特征，根基深厚，光辉灿烂。除了中原地区之外，在其周围和边远地区，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

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的大型建筑基址，以长方形的主室为中心，两边

扩展为与主室相通的东西侧室，左右对称；主室后面以主室后墙和延伸的侧墙又构成单独的后室。整组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房址居住面坚硬平整，外观很像现代水泥地坪。表层下为厚15～20厘米的砂粒、小石子和用料礓石煅烧的混合层，抗压、防潮和保温性能良好。部分墙体保存高度近1米，并有顶梁柱、附壁和角柱。主室前的附属建筑尚存有青石柱础。这些建筑以其规模雄伟、结构复杂、设计严谨、工艺精湛，展示了我国古代先民们令人惊叹的成就，被称为"五千年前的殿堂[41]"。

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大型祭坛，其中心部分是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东西两翼有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墙基外有大面积的铺石，南面有圆形基址。这组石建筑基址，在总体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南北方圆对应，具有我国建筑的传统特色。基址内出有陶塑妇女人像和玉饰，可能是祭祀"地母和生育神、农神"的场所[42]。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女神庙和大型积石冢群。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发现的建筑构件中有一些彩绘的墙壁面残块，壁面绘有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纹几何图案或赭红色勾连纹图案，这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壁画了。还出土有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其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完好，双目中均嵌有淡青色圆饼形玉片为睛，塑造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神化了的女性，被誉为"黄土之神"、"民族之神"。已发现的积石冢群分布在数十个山顶或山坡上，中心大墓居高临下，墓上封土积石，四周用石筑砌边框，并有小墓围绕，突出了墓主崇高至尊的地位[43]。近年，又在牛河梁积石冢附近，发现一座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为人工夯筑的土丘，外包巨石，高约25米，直径60米，令人惊叹[44]。苏秉琦先生指出："喀左东山嘴相当于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等，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45]。

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除陶器上刻划文字符号外，还出土有精美的薄胎高柄杯、洁净的白陶鬶、镶嵌绿松石的骨牙雕刻、光洁透亮的玉铲等，显示了很高的生产工艺水平。有的大墓随葬一二百件器物，包括象征权威的玉钺、石钺，一些小墓随葬品寥寥几件或空空如也，反映了贫富极端分化。

这些位于西方的、北方的、东方的考古发现，在一些方面还领先于同期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并给后者以强烈的影响。它们和中原地区一样，虽然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但距离文明社会的门坎已近在咫尺了。

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同时，东南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也达到与此相似的水平。浙江余杭的反山，发掘出一批良渚文化的大墓。有11座埋葬在堆筑起来的熟土堆上，土方量达2万立方米左右，反映了当时人们组织的严密和营造能力之恢宏。这些墓葬有棺有椁，随葬品十分丰富，表明了一定的等级规范，当属大贵族的专用墓地。墓内出土了一批用阴线刻、浅浮雕、半圆凸雕、镂孔透雕等手法雕琢成的玉器，制作非常精美，线刻细如毫发。其中一件玉琮，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高17.6厘米，重6.5公斤，刻有神人与兽面的组合"神徽"及鸟形装饰，形制巨大，堪称"琮王"[46]。在距反山东北约7.5公里的瑶山顶上，发掘了大型祭坛与大墓的综合遗迹。祭坛呈方形，里外三重，中

间为一座方形红土台,红土台四周有黄土围沟,围沟的西、北、南三面有用砾石铺面的黄土台。整个祭坛面积约400平方米,用于祭天礼地。其附近的大墓也出有许多精美玉器[47]。1987年冬,在反山东南的大观山果园发现了良渚文化一处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利用自然土岗加以修平补齐的巨大土台子。土台上面还有三个更高的人工土台,分别称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大土台上面还有土坯砌墙及大型梁柱等木构件的房屋建筑遗存。这样大规模的台基和这样高规格的建筑实在惊人[48]。近年在余抗汇观山遗址,发掘出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面积达1600平方米。打破祭坛的4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一大批玉器和其他随葬品,其中一座墓仅石钺就出48件[49]。在江苏武进寺墩遗址,发掘一批良渚文化墓葬,其中3号墓随葬陶、石、玉器百余件,包括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50]。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良渚文化大墓,亦修建在人工堆筑的土山上,随葬品均在百件以上,以精美玉器为主。墓上或墓旁有祭祀遗迹,有的还有奴隶殉葬[51]。良渚文化遗址似乎和龙山文化一样,也是分片较集中分布,诸多遗址中有一个中心。诸如余杭的反山,青浦福泉山,武进寺墩,嘉兴雀幕桥等均是如此。此外,在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和上海马桥遗址的良渚文化陶器上,还发现有刻符陶文。按照良渚文化用精美玉器为礼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和大墓及祭坛的规模,当时肯定也有了青铜器。而每一个中心遗址当可能有城。这应属于长江下游的方国文明。

湖南澧县南岳村城头山有屈家岭文化的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址。平面呈圆形,直径310多米,夯土墙顶部宽7米,底宽约20米。城外有护城河,宽35~50米,深约4米,似以工人河道和自然水道结合而成。城墙的四周保存有两两相对的4个缺口,可能是城门的遗存,东门正中有一条宽约5米且用河卵石铺垫的道路。此门是内外相通的水上通道,当地群众俗称为"水门",看来护城河有防御与交通并重的功能。城内中部稍偏西南地势较高,发现多座长方形夯土台基,为建筑遗存[52]。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最为辽阔,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00多米,面积近100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层次分明。西城墙保存较好,北墙和东南城角保存较差。城外有护城河遗迹,城内有大片房基,出有铜块、孔雀石、圆形符号、大批塔形陶器、数以万计的红陶杯、包括猪、牛、羊、鸡、猴、象、长尾鸟、龟、鱼等数千件陶塑动物,可能是祭祀与宗教活动的遗存[53]。在湖北江陵发现阴湘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40米。城南和城东部有护城河遗迹。四面城墙均有缺口,可能是城门。北门较低,并与湖水相通,当为水门[54]。湖北石首有走马岭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短。城垣周长约1200米,城墙周围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城墙有数处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城门缺口两边,有的保存着圆形土台,可能是城门附属的防御性建筑台基[55]。湖北荆门马家垸发现一座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的古城址,平面呈梯形。东墙和西墙均长600多米,南墙长400多米,北墙短一些。城垣四周也有护城河环绕,西边护城河系利用自然古河道,与流经城内的古河道相通。城墙上还有若干处高台,可能是防御性建筑台基。南墙、北墙、西墙的中部和东墙的南端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其中西墙中部和东墙南端的缺口与古河道连接,似为水门。城内偏北有一片建筑台基[56]。

上述城址均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其规模一般比中原地区龙山文

化城址要大,且多依自然岗地和河道修建,形制上不很规则。其防御性能也是显而易见的。能修建如此规模的城址,再联系到城内发现的其他遗迹和遗物,反映了当时有很高的发展水平。这些应该是代表了长江中游的方国文明。

在北方的内蒙长城地带,发现有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在凉城岱海地区有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等城址。这些古城都建在蛮汗山的东南坡上,面向岱海和与岱海相连的开阔盆地,相互距离均约5公里左右。城址都是依山坡用石头筑墙,面积多为数万平方米,只有老虎山城址最大,为13万平方米,该城先用黄土奠基,上砌石头,石墙外部平齐,内侧不甚规整,估计原来是土墙外包石头护墙。城内房址多为窑洞,有数百座之多。坡下城墙外发现有窑室直径在1.5米以上的陶窑。老虎山可能是这些城址的一个中心。在包头大青山南麓有威俊、阿善、西园、莎木佳和黑麻板等古城址,相距5公里左右。均有石砌围墙,面积不大,一般为数千至2万平方米。城址所在地势陡峭,城内有石砌房基或台阶式祭坛、可能是一些军事防卫性的小城堡。在准格尔旗和清水河县之间,有寨子塔、寨子上、马路塔和后城嘴等古城址。建在黄河岸边高台地上,也都有石砌围墙,规模不大,当也是一些城堡[57]。这些城址与中原地区虽不尽同,但也展示了文明的曙光。

在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红铜器和青铜器达50多件,多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其中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铜镜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面铜镜,系合范铸造,显示了一定的进步性[58]。所出土的大量玉器,制作精细,有些用作礼器。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一些陶文刻符。墓葬形制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差别很大。在甘肃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发现有多处"石圆圈"祭祀遗迹,其周围有卜骨和被砍的牛、羊骨架。虽然还没有发现城址,但也同样迈入文明时代的门坎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和大汶口时期等,就有了较大的起步。到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以及齐家文化时期等,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建立了方国文明。这些文明除中原地区外,还分布在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地区。可见,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是起自一地,而是起自东西南北中许多地方。这些文明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不但在地理上相靠近,而且在文化内涵上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交流、碰撞、渗透、影响,彼此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统一整体的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地区,位于祖国的腹地,历来古代经济文化平均发展水平较高,又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能够吸收四面八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素和精华,创造出气势磅礴、异彩纷呈的文化面貌;与此同时,方国部落之间频繁的冲突和战争,以及治理洪水,抵御自然灾害的斗争,迫使中原地区更快的提高生产力,改变和完善社会组织,使中原地区居于中国古文明的中枢地位。这种地位是国内其他文明发祥地无法比拟和代替的。肯定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这种地位,既是尊重历史,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统一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核心。因而中原地区率先建立高于各地方国文明的王国文明。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绝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五六个世纪的发展,到了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在中原地区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甲骨文字,出现了

一大批青铜重器，精美玉器和礼制祭祀的遗存，出现了像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这样规模巨大的王都，展示了高度发达的商代文明。总之，正是由于中原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周围及边远地区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当进人文明社会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凝聚力就愈来愈强，周围各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数千年来，我们祖国虽然有过多次分裂而没有灭亡中断，继之而来的是又一次的大统一，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也使中国古代文明以其连绵不断、博大精深而在全人类文明史上大放光彩。建国后的考古发现，把我国许多发明、发现的时间大大提前了。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被证明为事实。我们相信，随着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新的考古发现会越来越多，中国古代文明会更加辉煌。

注　释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2]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 年。

②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 年 7 月 26 日。

[3][2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 年第 3 期。

[4][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3 期。

[5]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 年 7 月 15 日。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 年第 3 期。

[7]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1 年 1 月 12 日。

[8]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2 月 6 日。

[9]山东省考古所、聊城地区文研室：《黄河流域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5 年 1 月 22 日。

[10]①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

②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

[11]①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 年第 7 期。

[12]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1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 年～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③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年鉴》，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第 83 页、1985 年第 116 页。

[13]①张玉石、乔梁：《郑州西山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 年 3 月 13 日。

②《华夏最早城址重见天日》，《光明日报》1995 年 5 月 14 日。

[14]安阳地区文管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 年第 3 期。

[15]谢端琚：《我国早期铜器》，《中国文物报》1988 年 3 月 11 日。

[16]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7]昌潍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 年第 4 期。

[1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史前研究》1984 年第 3 期。

[19][21][23]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0]郑笑梅:《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22]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年第12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28]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
[2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近年来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收获》,《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31][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6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3]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文物与考古》1980年第3期。
[34]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
[35]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36]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晋文化与丁村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
[37]郑洪春、穆海亭:《陕西长安花楼子客省压二期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38]①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文字》,《中国文物报》1993年1月3日。
②张学海:《关于"丁公陶文"的时代》,《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4日。
[39]巩启明、姜捷:《试论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40]张学海:《城子崖与中国文明》,《纪念城子崖发掘6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41]①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
②《甘肃出土五千年前殿堂遗址》,《光明日报》1986年8月7日。
[42]郭大顺、孙守道:《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4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44]①《红山文化遗址又有惊人发现》,《光明日报》1989年12月23日。
②魏运亨、卜昭文:《红山文化遗址又发现五千年前金字塔式巨型建筑》,《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8日。
[45]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46]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47]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祀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48]①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②刘军:《从良渚文化考古资料看当时的社会性质》,《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49]《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大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2月2日。

[50]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51]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4年第2期。

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第10期。

[52][53][54][55][56]①单先进、曹传松:《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被确认》,《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

②亚权:《近十年江汉史前考古的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2年9月6日。

③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调查与探索》,《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

④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

⑤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⑥何介钧:《石家河文化浅析》,《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

⑧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57]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58]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6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原载《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中国史前城址与古代文明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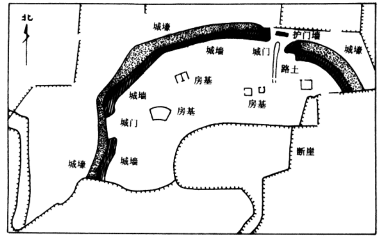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涵盖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王朝建立的历史进程。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品有了剩余，使得一部分人通过不等价交换或强行掠夺，导致私有制产生和贫富分化，使人与人由相对平等变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出现了阶级，产生了国家。研究这一段历史进程，一方面要靠历史文献的记载，但更主要的要靠考古发掘的成果。所谓古代的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早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印在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中。尤其是史前城址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密切相关。

中国史前城址产生的脉络还是很清晰的，最早是小的原始聚落，发展为大的聚落，进而到中心聚落，再跨一步就是高于聚落的城邑了。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知道，远在距今 1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湖南道县玉蟾岩[1]、广西桂林甑皮岩[2]、江西万年仙人洞[3]和吊桶环[4]等处的原始小聚落，有的还发现了稻作遗存。到了距今 8000 年左右，河南新郑裴李岗[5]和舞阳贾湖[6]、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7]、辽宁阜新查海[8]、湖南澧县彭头山[9]和八十垱[10]等处已发展成为大型聚落。有的周围已有壕沟，甚至沟旁还有围墙，有的居址和作坊址各自相对独立，有的还发现有排列有序的氏族公共墓地。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陕西西安半坡[11]和临潼姜寨[12]等中心聚落。聚落内包括成组的大小房子围成的中心广场居住区，居住区外有围沟环绕，并有寨门等设施，沟外有公共墓地，还有制陶的作坊区等。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高于聚落的防御性史前城址（详后）。

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形态，对农村聚落而言，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城的出现是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源于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是统治阶级防御外敌入侵和治理人民的设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13]中国城的出现是很早的，传说黄帝时代已经筑城。《史记·封禅书》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战"。这说的是夏王朝建国之前的事情，而考古发现也与之基本吻合。

从考古学角度讲，史前城址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能够提供出政治、经济、军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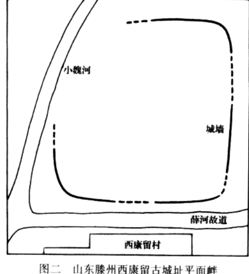
化、宗教、礼制等诸多方面最大的信息量，在筑城过程中所显示的人力、物力之集中，以及行政控制及组织管理之强有力，都是十分明显的。这些与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也是密不可分的。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史前城址的探索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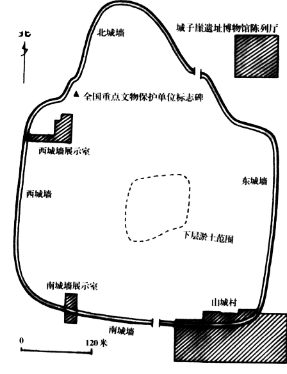
图一　河南郑州西山古城址平面图

二

从考古发现可以知道，中国的史前城址，集中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发现最早的史前城址为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 5300 ~ 4800 年。西山古城位于郑州市北郊 23 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坐落在枯河北岸的二级台地边缘，高出枯河河床约 15 米。西山古城的平面为不很规则的圆形，西墙残长 64 米，北墙自西北城角向东北方向延伸 60 米后，又向东圆缓而折，略向外凸，长约 120 米，再折向东南，形成东北城角，残长约 50 米。西墙南段、东墙大部和南墙被枯河冲毁，可能已不存在。城墙现存高 3 米，宽 5 ~ 6 米，西北城角和东北城角宽 8 米。北墙中部有缺口，城内有南北向路土通过缺口伸向城外，这应是城门的遗存。城外有宽 5 ~ 7.5 米、深 4 米的壕沟（图一）。城墙系两侧挖沟，就地取土。中间采用少见的方块版筑法分段逐层逐块修建而成。夯层明显，圆形的集束棍夯窝印隐约可见，版筑痕迹十分清晰。城墙剖面结构随高度增加而逐级内收，形成一级级错落的台阶。内侧的沟在城墙筑起后为保护基础不受破坏而封填。城墙外侧则另筑宽度不等的附



图二　山东滕州西康留古城址平面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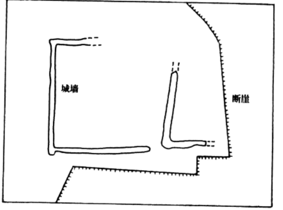


图三　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址平面图

加城墙，以形成陡峭的斜面，适于防御之需。在西山古城址已清理房基 120 座，窖穴、灰坑 1600 多个，墓葬 200 余座，瓮棺葬 130 多座，出土数千件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在 10 多座坑内扔弃有完整或散乱的人骨，一些人骨明显呈挣扎状，或可说明当时氏族间掠夺性战争的情况。在 20 多座灰坑中有完整或零乱的兽骨，这当是原始祭祀和宗教活动的反映。墓葬中已经出现父子合葬或夫妻合葬墓，表明当时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根本转变。氏族之间的激烈战争、原始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家庭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正是西山古城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14]。

比郑州西山古城稍晚一些的是滕州西康留古城，位于山东滕州官桥镇西康留村北。城平面近圆角方形，南北长 195 米，东西宽 185 米，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东墙、南墙、北墙东段和西墙南端保存较好(图二)。此城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约 5000 年左右。由于只作过考古调查和小型试掘，城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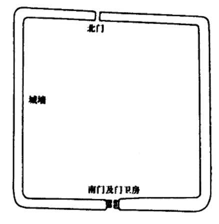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史前城址发现的数量就增多了。闻名中外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是 1928 年调查发现的，1930～1931 年进行了考古试掘，1989～1991 年又进行了调查和发掘。遗址位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东侧武源河边的一个高台上。遗址中有一座保存较好的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450 米，东西宽为 390 米。城因地就势修建，东、南、西三面城垣平直，北墙向外凸出(图三)。“城子崖”之名可能就与这座城址有关。城墙高出地面 2.1～3 米，城墙宽 10.6 米，墙下有



图四　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址平面图

宽13.8米、深1.5米的基槽,层层填土夯筑而成。城内龙山文化堆积相当丰富,有的地方厚达3~5米。发现有房基、窖穴、水井等遗迹,表明这座龙山文化城址人口较多,生活繁荣[16]。

河南登封是"禹都阳城"的地方。1977年,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一座与城子崖城址同样古老的东西并列的城堡遗址,位于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的高岗台地上,"王城岗"之名也可能就源于这座古城址。东城残存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它们垂直相交,构成略呈弧形的西南城角,东墙已被五渡河水冲毁;西城保存较好,它的东墙即东城的西墙,北墙西段残长29米,西墙长约92米,南墙长82.4米。南墙东段有一宽约10米的缺口,很可能是西城的南门(图四)。东西两城筑法相同,都是先挖城墙基槽,然后填土逐层夯筑。城内中部和西部较高的地方,发现有断续的夯土建筑遗存,其下填有多具人骨架,可能与奠基或祭祀有关。城内还发现有青铜器的残片以及刻字的黑陶薄胎平底器残片[17]。



图五 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平面图

河南东部偏南的淮阳县,是传说中的"太昊之墟"。1979年,在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也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均为185米,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10米,底部宽约13米。其下有基槽,用小版筑法建成。在南城墙和北城墙的中部,发现有城门缺口和路土,南城门东西两侧有门卫房,门道路土下铺设有陶水管道,北高南低以便向城外排水(图五)。类似排水管道还有多处发现,组成了一定规模的排水系统。城内发掘出10多座房基,多为长方形排房,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是夯土高台建筑。其中的一座房基(F4)有高0.72米的夯土台基,房基东西长15米多,南北宽5.7米,中间有三道土坯隔墙,构成一组4间的建筑,现存面积达85.5平方米。城内也发现有陶窑、窖穴和墓葬,出土遗物中有铜炼渣等[18]。

1984年,在山东寿光县边线王村北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坐落在弥河西古道之间的高岗地上,分为内城和外城,平面均呈圆角方形。外城每边长约240米,城墙挖有上宽下窄呈梯形的基槽,宽约7~8米,深约5~7米,槽内夯土坚硬,夯层清楚,厚薄不一,约为5~10厘米或更厚一些。有的夯面铺有细砂,夯层还有一些长方形或椭圆形的土坑,其内外分别埋置人、狗、猪等牺牲,有的是数人同埋一坑,这当是祭祀或奠基的遗存。东、西、北三面城墙各有一门,南墙为村子所压,门址不详。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东南,每边长100米,东墙和北墙各有一门,西墙和南墙遭到破坏。从所出陶片分析,内城建筑时间在前,外城修筑时间在后[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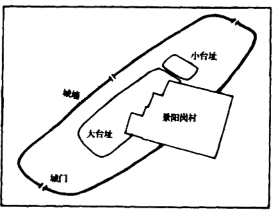
1986年,在河南郾城郝家台发现另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为222米,东西宽有148米。四个城角保存较好,南墙和西墙遭破坏,东城墙中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门遗存,城内发现有成排的房基,有些为烧土地面,有的还铺以木地板。并发现有

陶窑、窖穴、水井、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骨器、蚌器等遗物[20]。

1990年，在山东邹平县苑城乡丁村东发现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于方形，四周城垣比较规整。南北长约390米，东西宽约350米。夯土城墙残高1.5～2米，宽约20米。城内龙山文化层堆积厚2米左右。发现有房基、陶窑、窖穴和墓葬。较大的房基面积近50平方米，其下用儿童或成人奠基。除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之外，还发现有刻文陶片[21]。

1992年，在河南辉县孟庄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城墙夯土为黄花土，土质坚硬，内含较多的料礓石和少量龙山文化陶片。城墙内侧有二里头文化层或龙山文化层叠压着夯土，城墙外侧有一周护城河，河底距地表深5.7米。东城门已发掘出来，宽2米多，有版筑痕迹，城内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22]。

1994年，在山东西部的阳谷、东阿、茌平三县接连发现8座龙山文化城址[23]。阳谷县有景阳岗、皇姑冢、王庄3座城址。其中以景阳岗城址最大，平面呈椭圆形，两端较窄，中部弧形凸出。南北长约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约330米，城中部最宽处约400米，全城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墙外陡内斜，南、西、北三面城墙中部皆有缺口，当为门址，东城墙中部压在景阳岗村下，门址不详(图六)。城内中部有两座利用天然岗丘经部分加工的台址。大台址在西，面积有9万余平方米；小台址在东，面积约8千平方米。台址都经多次修建，原应有大型建筑。小台址夯土中发现人头骨，台址边缘有牛、羊骨架的祭祀坑。城内还发掘出刻文陶片，与甲骨文似有渊源关系。皇姑冢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景阳岗西南8公里处，此城作东北西南向的圆角扁长方形。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150米，城内发现有夯筑台基。王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景阳岗东北10公里处，城垣被龙山文化灰坑打破，为一座圆形扁长方形城址，南北长约360米，东西宽约120米，城内还见有大汶口文化遗物。



图六　山东阳谷景阳岗古城址平面图

茌平县有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尚庄4座龙山文化城址。其中教场铺城址最大，东西长约1100米，南北宽为300米。城内发现东、西两处大型台址。大尉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教场铺东北3公里，面积约3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一处夯土台基。乐平铺(又称三十里铺)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教场铺北偏东6公里，平面近方形，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70米，城垣范围很清楚。尚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茌平县城南1公里处，南距教场铺19公里。北城墙较直，西墙和南墙不规则，面积约4万平方米。

东阿县有王集龙山文化城址，位于东阿县北，西北距茌平教场铺仅4公里。城作东北至西南向，南北320米，东西120米，面积近4万平方米。

上述三县8座龙山文化城大体分为两组,即南面阳谷县的景阳岗、皇姑冢、王庄一组;北面的茌平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尚庄和东阿县的王集为一组。且在教场铺不远有孟尝君和高垣墙2处龙山文化遗址,在尚庄附近有台子高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均有高大的堌堆,据调查也极有可能成为城址。像这种成组龙山文化城址,组群中有一座大型中心城址,中心城址又有大型台基,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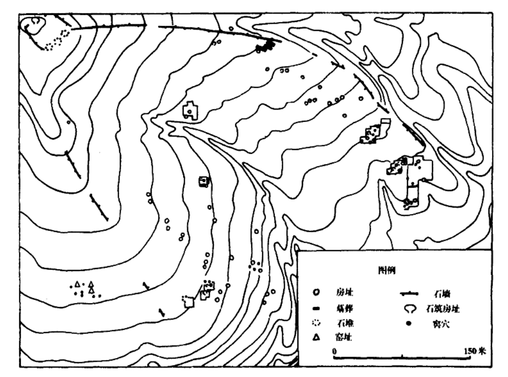
在山东临淄田旺村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方形,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近400米,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24]。在山东五莲丹土,也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墙高出当时地表2~3米,城内有手工作坊区[25]。在山东滕州张旺镇古薛河西岸的西周至春秋薛故城西南角的宫城下面新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呈方形,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50米,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内高外低,城墙夯土较坚硬,所发现的小棍夯痕直径约2.5厘米。这是泰沂山南侧首次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26]。最近在河南新密古城寨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平面呈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城墙还高高立于地面之上。由于资料未发表,城址的结构和布局尚不清楚。

此外,30年代在河南安阳后岗也曾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发掘出一段长70余米、宽2~4米的夯土城墙和大批直径3~5米的圆形白灰面房址,但城的其他情况也不很清楚[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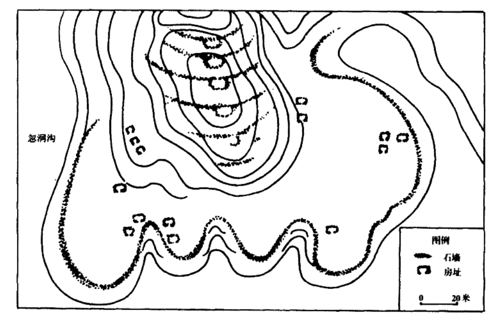
在北方的内蒙古长城地带,亦即黄河流域的河套地区,发现有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在凉城岱海地区共有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等城址。这些古城都建在蛮汗山的东南坡上,面向岱海和与岱海相连的开阔盆地,相互距离均约5公里左右。城址都是依山坡用石头筑墙,面积多为数万平方米,只有老虎山城址最大,为13万平方米,该城先用黄土奠基,上砌石头,石墙外部平齐,内侧不甚规整,估计原来是土墙外包石头护墙。城内山坡修成8层阶地,每层两三座为一组成排分布的房子,有数百座之多。坡下城墙外发现有窑室直径在1.5米以上的陶窑。平台上还连接一座边长约40米的小方石城居高临下,起到了望、护卫的作用。老虎山可能是这些城址的一个中心(图七)。

在包头大青山南麓有威俊、阿善、西园及莎木佳和黑麻板等古城址,相距5公里左右。均有石砌围墙,面积不大,一般为数千至2万平方米。城址所在地势陡峭,城内有石砌房基或台阶式祭坛遗迹,个别还有面积很大的多室房子,可能是一些军事防卫性的小城堡(图八)。在准格尔旗和清水河县之间,有寨子塔、寨子上、马路塔和后城嘴等古城址,均建在黄河岸边高台地上,也都有石砌围墙,规模不大,当也是一些城堡[28]。

长江流域的史前城址,主要是分布在长江中游湖南、湖北的一批屈家岭文化古城,还有分布在长江上游四川成都平原一批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古城,其中时代最早的当属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位于澧县西北约11公里的车溪乡南岳村,城址选在一个东西走向的垅岗东端之尾。平面近圆形,直径310多米,城由夯土城墙、护城河、城门和城内夯土台基等几部分组成。城墙顶部宽7米,墙体宽25~37米,残高2~6米。城外护城河东南北三面为自然河道,西面为人工河道,宽35~50米,深约4米。城墙的四周有两两相对的4个缺口,当是城门的遗存(图九)。东门正中有一条相通的水上通道,当地群众俗称为"水门",



图七　内蒙古凉城老虎山石城址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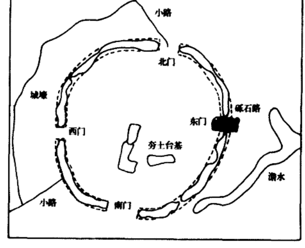


图八　内蒙古包头威俊石城址平面图

看来这里的护城河有防御和交通并重的功能。城内中部稍偏西南地势较高，有台址两个，东小西大，在西部台地上发现多座长方形夯土台基，为房屋建筑遗存。城内有横贯东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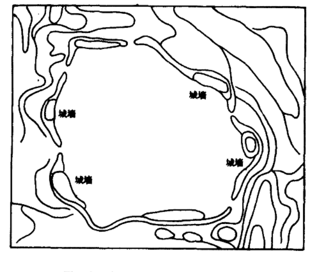
大道及制陶作坊区。在城内北部还发现有公共墓地。城址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有专家认为,其始建年代可上溯到大溪文化时期,这比后面介绍的屈家岭文化古城要早,是目前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城址[29]。

澧县鸡叫城,位于湖南省澧县城北10公里的涔南乡文家村。城址坐落在一个岗地东端之尾,平面呈圆形,直径东西400米,南北370米,城墙宽约20~30米,残高为2~4米。城外有护城河,东西南三面为自然河道,北面为人工河道,城墙也有相对的4个缺口,这应是城门的遗存。城内地势西高东低,也有东西并列的两个台地,东小西大[30]。



图九 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平面图

公安鸡鸣城,位于湖北省公安县三洲乡清和村,坐落在一个岗地西端。城址平面呈圆形,直径约200米。东北南三城墙尚存,西墙已破坏殆尽。城外有人工护城河,城墙亦有四门的残迹,东、西两门外各有一个凸出的台地。城内遗迹、遗物发现很少[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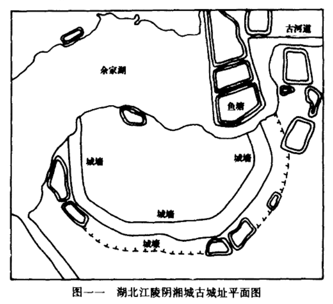
图一〇 湖北石首走马岭古城址平面图

石首走马岭城,位于湖北省石首焦山河乡。平面呈椭圆形,东西横长,南北较短。城墙周长1200米,墙体宽约28米,残高5米。城外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宽约35米,深2米。城墙有缺口数处,其中有的就是城门遗存(图一〇)。城门缺口两边,有的保存着圆形土台,可能是城门附属的防御性建筑台基[32]。

江陵阴湘城位于湖北省江陵马山镇,平面近似椭圆形,北城墙已被湖水冲毁,东西长约580米,南北残宽约350米,城墙宽约10~25米,东城墙墙基最宽达46米,高出地面1~2米。城南和城东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宽约30~40米,深2米。东、西、南三面城墙各有一处缺口,可能是城门(图一一)。城内东部和西部为居住区,中部低洼处可能是稻作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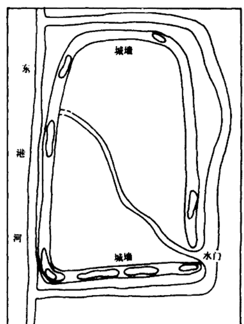
区,西南部可能是墓葬区。城内发现有精美的漆器和刻划陶文的陶缸[33]。

荆门马家垸城位于湖北省荆门五里镇,平面呈梯形。东墙长约640米,西墙长约740米,南墙长约440米,北墙短一些,长约250米。城墙宽30米,高5~6米。城墙四周也有护城河环绕,西边系利用自然河道,东、南、北三面为人工河道。护城河宽20~50米,深4~5米,与流经城门的古河道相通。城墙上还有若干处高台,可能是防御性的建筑基址。南墙、北墙、西墙的中部及东端的南端各有一个缺口,当为城门(图一二)。其中西端中部和东墙南端的缺口与古河道连接,似是水门。城内偏北处有一片夯土建筑台基[34]。



图一一　湖北江陵阴湘城古城址平面图

天门石家河城位于湖北省天门石家河镇,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长1200米,东西最宽1100米,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层次分明,但夯窝不很清楚。西墙保存较好,北墙和东南城角保存较差。城墙底宽约30~50米,高3~8米。城外有护城河遗迹,宽约60~100米,深4~6米(图一三)。城内中部的谭家岭一带发现大片房基,当为主要居住区。城内西北的邓家湾除发现墓葬区之外,还发现大批塔形陶器,还有一些大黄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其中有些陶缸上还刻划符号。在两个灰坑内出土包括猪、牛、羊、鸡、猴、象、长尾鸟、龟、鱼等数千件陶塑动物,还有成百件人抱鱼像。这些可能是祭祀与宗教活动的遗存。在城内西南三房湾出土数量惊人并非实用器的红陶杯,除了表明陶器已专业化生产外,也反映了一种宗教活动,显示了石家河古城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特殊地位[35]。



图一二　湖北荆门马家垸古城址平面图

1998年,在湖北应城门板湾又发现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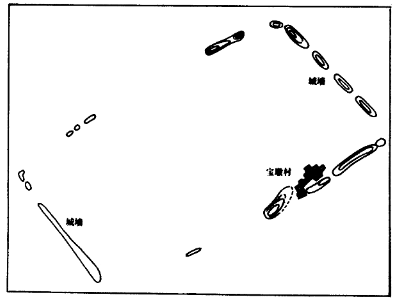
屈家岭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南北最长 550 米，东西最宽 400 米。西城墙保存最好。高 3～5 米。城内东北部、西北部各有一个面积较大的高台。城外有护城河，护城河外还发现有点状分布并环卫城址的多座土台。西城墙中段有缺口，可能是城门的遗存。西城墙处发现一座大型长方形房子，房内分四开间，中间两间较大，两侧各一间稍小，房内每间都有门道相通，中部两间各开一个朝北的房门，其南端和两侧房间南北墙上均开有窗户，窗户框架痕迹明显。房内地坪用红烧土铺垫，墙壁用土坯砌筑，现存最高为 2.1 米，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最高和最好的土坯建筑[36]。



图一三　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址平面图

近年来，在长江上游的四川成都平原新发现了 5 座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古城址[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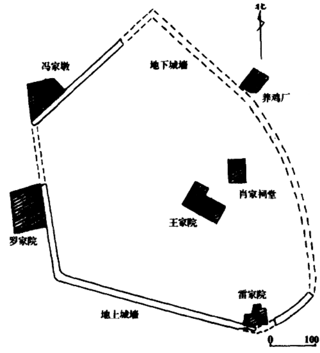
宝墩古城，位于新津县城西北 5 公里龙马乡宝墩村，城址建于高台地上。城东北 4 公里处有西河，城西南0.5公里处有铁溪河。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为 1000 米，东西宽约 600 米，最高处约 5 米，顶宽为8.8米，底宽为31.3米。部分夯土城垣之上有卵石叠压（图一四）。



图一四　四川新津宝墩古城址平面图

芒城，位于都江堰南 12 公里处青城乡芒城村，城址建于高台地上，其东约 1.4公里有泊江河由北向南流过。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墙分内外两圈，外圈南北长约 360 米，东西宽约 340 米；内圈南北长约 290 米，东西宽

约 270 米。现存城墙部分高出地面1～2.2米，似堆筑而成。



图一五 四川温江鱼凫城址平面图

鱼凫城，位于温江北5公里的万春乡直属村，城址也建在高台地上。其西南1.6公里处有江安河流过。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每边城墙对角超过500米，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城墙宽为12～30米，残存最高处约2米(图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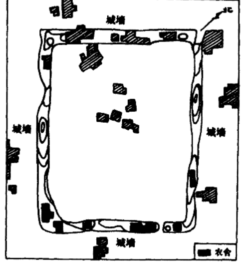
梓路古城，位于郫县城北9公里处的古城乡梓路村，修建在台地上。附近有青白江和锦水河流过。城址平面为西北至东南向的长方形，长约650米，宽500米，城墙宽约30米，残存最高处约3米。部分城垣之上也有卵石叠压。城内发现有地面起建的房基和一批灰坑(图一六)。

三

从上述多座史前城址来看，由于时代的先后或地域的差异，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

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古城址的特点：

1.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郑州西山古城和湖南、湖北的一批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古城，城址平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能是古代的先民们已经意识到圆的面积最大，站在圆形的城墙上视野开阔，宜于了望，便于防御。另从意识形态上考虑，“为人君者，敢象于天”，按天圆的形态而把城设计为圆形。同时，这也是受仰韶文化早期的圆形聚落、圆形房屋影响的结果。



图一六 四川郫县梓路古城址平面图

2、在位置的选择上，城址多坐落在临河的岗地上，有的一面临水，有的两面临水，有的甚至是三面环水，尽量利用自然水系作为护城河，个别城址内还有河流穿过。不临水的地方则开挖成人工河道。这样可以减少筑城的工作量。尤其是湖南、湖北屈家岭中晚期古城，护城河既宽又深，除具有防御功能之外，这些护城河也应该用于交通和城内的供水。

3、各个城址的城墙多利用岗地较高的地势，再在其上夯土筑墙，成为对四周的制高点，加之城墙内侧较缓，城墙外侧较陡，墙外还有护城河环绕，构成一种易守难攻的防御设施。同时，由于城墙较高，自然具有防水患的功能。

4、各个城址内地势高低错落与城门相通，城内中心区为夯土建筑台基，有的为一处，有的为东西并列且东小西大两处台基。有的城址内还有道路、窑址、灰坑和墓葬区，并出有丰富的各类遗物，展示了集居住、生活、宗教礼仪、生产、交通、排水、埋葬为一体的城内布局。

5、从考古发掘中可以得知，郑州西山古城还出土了不少早于城址的仰韶文化早中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晚一些的向龙山时期过渡的遗迹和遗物；在湖北、湖南的各个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城址中，也发掘出早于古城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早期的遗迹和遗物，还有晚于城址的石家河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这些表明，大部分城址在修筑城墙以前已经是人们居住的聚落，在城址废弃之后，仍然有人在这里生活。

龙山文化古城址的特点：

1、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数量远较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和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城址为多，地方特征也很明显。位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多为方形或近似方形，个别为椭圆形，后者当是更早古城的传承或与当地环境的制约有关。个别特殊者如登封王城岗是东西两城并列，中间共有一墙。有的城址如寿光边线王古城为大城套小城，类似内外城。而北方内蒙古城地带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的平面不统一，大约是依城址所在地的地形起伏修筑的，所以城址平面形状不规则，有近似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三角形的、梯形的或其他形状的。

2、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城址多修筑在平原或丘岗台地上，城墙用夯土构筑，城外有起土形成的护城河，极少有自然河道，大多为人工筑成。护城河主要用于防御，而交通方面的作用并不大。这与南方的古城不同。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一批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址也都建在高台地上，有的城墙分内外两圈，也是为了加强防御。内蒙古一带的龙山文化城址多修在高差较大的山坡上，用石头筑墙，墙基下面经过夯打，其上用大小不等的石头错缝垒砌成石墙，石缝之间填充碎石块或黄泥，城门两侧的墙往往加厚。由于建造石城明显是为了防御，所以临近陡峭山崖的一边就不再筑墙。

3、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城址内均有成排的房基，有的还是一些高台建筑，甚至有大型的夯土台基。如山东阳谷景阳岗城和茌平教场铺城，城内都有两个大型夯土台基，且均为东小西大。成排的房基，似乎成了龙山文化城址的一种标志。此外，城内还有一些奠基或祭祀的遗存，也有不少窖穴或灰坑，有烧制陶器的窑址或冶铸青铜器的遗存，有水井或地下排水设施，有些还发现墓葬，表明这些城址有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功能。内蒙古一带龙山文化城址，城内高低错落成若干层阶地，发现有成排的房基或布局有序的半地穴窑洞

式的房子，或发现面积近290平方米的多室大房子。城内还有一些祭坛的遗迹，也有一些陶窑或墓葬。反映了这些城址除防御之外的其他作用。

4、大部分龙山文化城址在建城之前，在龙山文化早期甚至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如淮阳平粮台古城和阳谷王家庄古城）就已经是聚落遗址。有些城址在废弃后，仍然是有人居住的聚落。有的城址到龙山文化之后还在继续修补使用。在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古城之上就有同样大小的岳石文化城址。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之上有二里头文化城址，再晚还有同样大小相重叠的殷商文化城址。

四

如前所述，城的出现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是分不开的，与阶级产生和国家的出现息息相通。掠夺或保护财富、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战争，使得筑城的防御功能显得如此重要。当时人们发明的夯筑技术，为修筑城墙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扩大和频繁，史前城址变得更多、更高，不但在岗地上修建，还在平原地区修建。

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当时贫富分化、地位悬殊是很明显的。例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墓地，有的墓葬没有随葬品或仅有一二件，有的却是随葬一百多件器物的大墓，包括制作精美的玉器和象征王权的石钺。对于更晚一些的龙山文化来说，其考古发现更反映了阶级的分化。

如山东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东北部有一些小墓，西南部有一些大墓，二者相距约180米，看来等级有别。在发掘的3座大墓中有2座是重椁单棺，有一座是一椁一棺。棺椁上均有彩绘。随葬品放在边箱内，有的放在棺椁之间或棺内。出土有一大批陶器和一些玉器、石器、骨器、牙器等，还有大量彩绘木器的残迹。陶器中有许多精美的黑陶罍、盖豆及蛋壳陶高柄壶等，当属于礼器。玉器中也有象征权力的钺，还有头饰和镂孔玉笄等，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墓主人可能就是统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38]。又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规模巨大。其墓地在遗址东南，占4万平方米以上。墓地的使用时间与居住地相始终，在近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1309座。其中大墓6座，多有木质葬具，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成组的玉器和石器组成的家具、炊具、盛器、食器、酒器、饮器、乐器、兵器或仪仗、工具、饰物等。尤其彩绘龙纹陶盘是最富有特征的器物。玉钺、玉璧、玉环、特磬和鼍鼓等，也非常珍贵。上述随葬品已构成一大组礼、乐器，可以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礼乐制度并影响后世。墓主人当属拥有特权和大量社会财富具有"王"者地位的显贵。中型墓约192座，也有木质葬具，随葬品减少，有成组的陶器，少量的有彩绘，还有一些彩绘木器及玉、石饰物。这些可能是不同等级的中、小贵族。小型墓有1000余座，墓坑很小，多无葬具，绝大部分无任何随葬品，墓主应是相当贫穷的平民。上述三种墓葬的大小，数量的多少，随葬品的悬殊，由贫到富，由小到大，由人多到人少，排成金字塔式的结构，反映了少数贵族与多数平民的阶级分化。处于塔尖的大型墓主，显示出权力中心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39]。登封王城岗

发现多具人骨架奠基或祭祀坑；郾城郝家台墓葬中发现被肢解的人骨架；寿光边线王发现人和兽骨架的奠基或祭祀坑；邯郸涧沟发现多个埋人的丛葬坑，坑内头骨被砍，或身首异处，或作挣扎状，还发现用4个人头骨祭祀的遗存[40]。这些都是战争、暴力和阶级压迫的佐证。

此外，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修建这样巨大规模的古城绝非易事，更不是少数人能够完成的，筑城的本身足可以说明当时存在着掌握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大权的统治集团，城垣的建造不仅是建筑行为，更重要的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这些史前古城址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在它们的周围或多或少、或远或近都分布一些与之关系密切的聚落遗址。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期第一座古城，当然这不会是当时惟一的一座古城，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肯定还会发现其他同时期的城址。在郑州西山遗址附近，还发现有陈庄、杜寨、张河、阎村、杨寨北、秦王寨、点军台等许多仰韶文化遗址，似是西山古城为中心分布的聚落址。

同样，在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江陵阴湘城、天门石家河等一批屈家岭城址周围，也都有一批屈家岭文化聚落分布，不同等级的城和聚落构成一个网络。

黄河中下游的各个龙山文化古城多为中心城址，各个中心城址之间相距并不十分遥远，像章丘城子崖 、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王等4座龙山文化城址，位于山东北部呈东西一线分布，相邻城址之间距离约30～50公里。鲁西南的阳谷景阳岗和茌平教场铺等两座龙山文化中心城址相距约43公里。在两座中心城址周围，还有一些小型城址。而河南相邻的龙山文化城址之间相距约90公里，估计在它们之间，还可能有龙山文化城址分布。

内蒙古一带的龙山文化城址，也有中心城址和较小的石城聚落分布。例如凉城岱海

图一七　内蒙古凉城岱海古城址分布图

周围以老虎山石头为中心，其西5公里有白玉石城，其东5公里有板城石城，再向东有园子沟聚落址和大庙坡石城（图一七）。

上述这些中心城址和大、小聚落的分布，形成了一个初级国家的规模，这就是被人们称作的方国。张学海先生认为城子崖龙山城是中国东方某一个方国的中心，他指出这些方国具备如下的基本特征：

1、有一个特定的地理区间，范围大小不等，一般说来范围都不很大，方圆几十公里而已；2、农业是方国的经济基础，家庭手工业有一定发展，但主要服务于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存在一定的商品交换，但交换关系并不发达；3、方国社会呈等级结构，区内有一座具有该区间或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地位的城市，也即方国的统治中心，周围散布着若干乡邑和数量不等的村落；4、血缘亲族关系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方国中心以外的乡邑、村落，一般都以族聚居；5、一般具有单一的考古学文化，属于某一文化共同体或其他地方类型的一部分[41]。这些中心城址，应具有都邑的地位，统辖十几个至几十个大小的聚落。《世本》张澍补注转引《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也说明这些城址的作用，一是卫君，二是守民，保护统治阶级以及整个方国的利益和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址的作用逐渐向卫君方面转移。伴随这些城址的是青铜器的使用和文字的出现，宗教和礼制的发展，历史进入了文明社会。这种文明社会所展示的是方国文明。这些方国都邑，与原始社会聚落址已有本质的不同。当然，它们与后世经济发达、货币关系活跃的城市也不一样，而主要是作为维护统治权力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也是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吕氏春秋·离俗篇》记有："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也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自然是形容其多，这些城址应是万国中的几个都邑。经长时期的战争、征伐、兼并，一些城址扩大了，一些城址衰落废弃了，一些方国强大了，一些方国灭亡了，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等集团。它们之间又不断发生冲突，展开了相当惨烈的争夺，诸如炎帝和黄帝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禹南下征三苗之战等。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余年的时候，夏王朝开始建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由中央统治的奴隶制王国，其疆域扩大到西起华山以东，东达豫东平原，北自济水之南，南至淮河沿岸，方圆千里，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更高一级的王国文明。

综上所述，这些史前城址所处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解体向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过渡时期，也可以称为方国时代。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史是至关重要的。史前城址夯土筑城的方法，也一直为后代所沿用。例如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垣曲古城、黄陂盘龙城等商代城址，还有周代及秦汉时期的诸多城址，均为夯土筑墙。唐宋以来，虽然一些城址采用包砖，但墙体还是土筑。夯土技术还用于龙山文化城址内的高台建筑，这应是宫殿建筑的雏型。偃师二里头、偃师尸乡沟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宫殿也建在夯土台基上。而其后的陕西周原西周建筑基址和易县燕下都、邯郸赵王城、新郑郑韩故城等一批东周古城的宫殿建筑，咸阳秦阿房宫和西汉长安宫殿遗址均是如此。这种高台宫殿建筑，一方面宜于防潮、防水和通风；另一方面，从外观上看，层叠巍峨，居高临下，既便于了望，又便于防守。龙山文化诸城址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平面布局，成了我国城址平面布局的传统模式。龙山文化城址有两城并列或两重城墙的内外城建筑，大大加强了防御的

功能。对以后的城址建筑也颇有启迪。偃师尸乡沟商城除大城之外,新近又发现了小城,小城中还有宫城。郑州商城在东城墙南段外侧、南城墙外侧和西城墙南段外侧700~900米处,发现有同时期的一大段夯土墙,现存长约5000米,墙宽12~17米,可能是外城的遗址。一些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就分布在内外城墙之间。东周时期的新郑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均为东西并列。临淄齐故城为内外相套合。侯马晋都新田故城和邯郸赵王城更是多座城联系组合在一起。这充分反映了史前城址对后世城址的深远影响。

注 释

[1]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2]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3]①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②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

③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

[4]同[3]③。

[5]①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②开封地区文管会等:《裴李岗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4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6]①朱帜《舞阳贾湖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第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7]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获硕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13日。

③杨虎、刘国祥:《敖汉旗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

[8]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县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

②《辽西发现'前红山文化'遗存——阜新原始村落遗址》,《中国文物世界》第40期,1989年。

③辛岩:《查海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1日。

④辛岩:《查海遗址发掘再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0日。

[9]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第10期。

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

[10]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12]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

[14]①张玉石、乔梁:《郑州西山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

②《华夏最早城址重见天日》,《光明日报》1995年5月14日。

③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15]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队等:《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3期。

②张学海:《浅说中国早期城的发现》,《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16]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年。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17]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9]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21]①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12日。

②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文字》,《中国文物报》1993年1月3日。

[22]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

[23]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3日。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

③王守功:《景阳岗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4日。

[24]魏成敏:《临淄区田旺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

[25]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第4期。

[2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试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26日。

[27]①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出版社1955年。

②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28]①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等:《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2期。

②包头市文管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③田广金:《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

④刘幻真:《内蒙古包头威俊新石器时代建筑群址》,《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

⑤魏坚:《准格尔旗寨子塔二里半考古主要收获》,《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⑥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出版社1993年。

[29]①单先进、曹传松:《澧县城关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被确认》,《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

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

③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城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

[30]①曹传松:《湘西北楚城调查与探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曹传松、曹毅:《湘北新石器时代城址考古发现及研究》,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

[31]曹传松、曹毅:《湘北新石器时代城址考古发现及研究》,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

[32]①张绪球:《石首市走马岭屈家岭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②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 年第 7 期。

[33]①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江汉考古》1986 年第 1 期。

②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第 5 期。

③贾汉清、张正发:《阴湘城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 年 7 月 1 日。

[34]①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 年第 7 期。

②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垸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 年第 7 期。

[35]①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5 期),四川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②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 1987 年发掘简报》,《文物》1994 年第 4 期。

③石河考古队:《湖北天门市邓家湾遗址 1992 年发掘简报》,《文物》1994 年第 4 期。

[36]陈树祥、李桃元:《应城门板湾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 年 4 月 4 日。

[37]①《成都平原发现一批史前城址》,《中国文物报》1996 年 8 月 18 日。

②《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 年 1 月 19 日。

③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 年第 1 期。

④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 1996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1 期。

⑤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 年第 12 期。

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 年第 1 期。

[38]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 1 辑),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 年第 7 期。

[39]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1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

[40]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 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10 期。

[41]张学海:《城子崖与中国文明》,《纪念城子崖发掘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3 年。

(原载《中原文物》1999 年第 2 期)

先秦篇

^{14}C 年代框架与三代考古学文化

学习、了解和珍重自己的历史是每个国家的共同追求。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绵延流传，从未中断，世所罕见。无论是战乱、暴政，或外族入侵和水旱灾疫，都未能阻止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历史的长河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造化了民族伦理道德，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但是中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大部分的确切年代，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都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历史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记叙的，年代学是历史学的骨架，没有准确的年代历史学就无法建立起来。夏商周被人们尊称为三代，在我国古代文明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但其年代学始终是一个学术难题。多少年来，历代学者不断努力，试图解决这个古史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但由于涉及的领域很广，而研究又大多是分散进行，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有限，所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始终没有突破，学术界迄今未能达成共识。这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建国五十年后的今天，由于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的研究，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为解决年代学研究的难题创造了条件。1996 年 5 月在国家的支持下，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

历史学家将从历史文献上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辑集起来，建成资料库，加以分析整理。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进行详细考证，逐一判断其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在历史地理学方面，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文献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各都城的地理位置，并与考古调查相结合，为进一步探索夏代和商代前期都城提供依据。还要从古文字上结合考古学研究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分期，选取有年代学意义的标本，以供天文历法研究或进行测年。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消除过去研究中的误解。

天文学家要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的成果，推断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在历史文献和古文字学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天文数据库和天文计算重新核查对断代特别有用的古代天象记录。从天文学角度进行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历法的研究，改订甲骨文、金文历谱，推定商武丁以后商周各王世的绝对年代。这些年代

将与若干测年结果互相比照。

考古学家将对与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系列和分期，为利用现代化手段测定夏商周绝对年代提供层位明确、文化属性明确、相对年代清楚的系列测年标本。研究重点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同时兼顾周邻地区与夏商周文化关系密切的其他考古学文化。

在测年科学技术方面，主要采用^{14}C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计(AMS)法。常规法将做若干条件试验，达到高精度测定。加速器质谱计(AMS)法将做重大改进，提高精度和可靠性。在制样方面也要做若干条件试验。测年样品的采集要与考古学家联手进行，尽量系统广泛采集可靠而又合适的标本。所有测试的年代数据都要同考古学家共同分析研究，以确定文化的分期和比较细致的年代学框架，对重要的坐标点，还要同历史学家取得共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相关学科的优势，力求作出能反映20世纪年代学研究最好水平的成果，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根据各历史阶段材料的不同情况，《夏商周年表》要达到对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1]。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经论证设立了9大课题。其中包括"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14}C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这9个课题下面又分设36个专题，其后，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滚动增设了8个专题。例如"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课题包括有"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小双桥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3个专题，其后又滚动增设了1个"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2]。

夏商周断代工程吸引了9个学科12个专业的200多位学者参予攻关。这支200多人的研究队伍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学科广泛而目标一致，大家都有共同语言，随着研究的深入，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第二，强手如林而彼此互相尊重，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若干学科中容纳了若干不同观点，并始终保持学术空气的自由；第三，少长咸集而同心同德，人人都珍惜机遇，力求贡献，不计得失。这些特点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感召下形成的，并且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蔚然成风。集合这样一支攻坚队伍，才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目标任务能够完成的最基本条件[3]。

笔者参加了夏商周断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课题组，多位学者在一起进行研究。笔者虽然没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诸公的智慧，也没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先生们的繁忙，又没有青年学者们在考古工地第一线的辛劳，但毕竟还是在完成本单位岗位工作的同时，全力以赴投身于课题研究中去。这反映在10多万字的课题、专题结题报告和在《考古》、《殷都学刊》、《中原文史》、《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发表的文章上[4]，反映在多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殷商文明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上，反映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小

双桥遗址、东先贤遗址等考古发掘工地留下的足迹上。个人对此无怨无悔,非常自豪。

经过近年的努力,仅多学科的学术讨论会就召开了52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没有偏离项目设定的课题、专题轨道,各个专题的目标基本都得到实现,终于结下了丰硕的成果。59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推选“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以第5位入选。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参见表一[5])这是我国迄今最有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标志着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这个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年表排出了西周共和元年之前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后12王大致在位年。其中对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这不但为进一步使夏商西周的年代精确化开创了良好的条件,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

表一 夏商周年表

夏(公元前2070—前1600)

禹	少康	不降	发
启	予	扃	癸
太康	槐	廑	
仲康	芒	孔甲	
相	泄	皋	

商前期(公元前1600—前1300)

汤	沃丁	中丁	沃甲
太丁	太庚	外壬	祖丁
外丙	小甲	河亶甲	南庚
中壬	雍己	祖乙	阳甲
太甲	太戊	祖辛	盘庚(迁殷前)

商后期(公元前1300—前1046)

王	年代(公元前)	年数
盘庚(迁殷后) 小辛 小乙	1300—1251	50
武丁	1250—1192	59
祖庚 祖甲 廪辛 康丁	1191—1148	44
武乙	1147—1113	35
文丁	1112—1102	11
帝乙	1101—1076	26
帝辛(纣)	1075—1046	30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

王	年代(公元前)	年数
武王	1046—1043	4
成王	1042—1021	22
康王	1020—996	25
昭王	995—977	19
穆王	976—922	55(共王当年改元)
共王	922—900	23
懿王	899—892	8
孝王	891—886	6
夷王	885—878	8
厉王	877—841	37(共和当年改元)
共和	841—828	14
宣王	827—782	46
幽王	781—771	11

表二 ^{14}C 年代框架与夏商周年表

夏商周年表(B.C.)	考古遗址分期年代(B.C.)	公元前	考古遗址分期年代(B.C.)	B.C.
	王 二段	2100		
2070	城			
夏 禹	岗			2070
•	遗 三段	2000		
•	址			
•				
•	1800	1900		
•				夏
•	一期 二			
•		1800		
•	1740 里			
•				
•	二期 头	1700		
•				
夏 履癸	1610 遗			1600
1600	三期	1600	1580	
商 汤	1560 址 偃 一 一段		早 二 郑	1600
•	1520 四期 期 二段 1530		1520 下	
前 •	师 一 三段 1500	1500	1480 晚 一 州	商
•	二 1470		二下二	
•	商 期 四段		1430 商	前
期 •	1400	1400	1400 水井框木 (二上一)	
•	城 三期 五段		1390 城	期
盘庚	1320 1320		1320 二上二	
1300	一期	1300		
盘庚	1250 殷			1300
1250-武丁	二期			商
1192-祖庚	1200 墟	1200		
后 •	三期			后
期 •	遗			
帝乙	1090	1100		期
商1075 帝辛	四期 址		1050 H18 丰镐	1046
1046	1040 1040		1020 T1 (4) 遗址	周
周 武王	一期	1000		
西 •	琉 960			西
周 •	璃		940±10 M121 张家坡	
列 •	河 二期	900	921±12 M4 遗址	
王 •	遗 850			周
•	址 三期		808±8 M8 晋侯	
西周 幽王		800		
770	770	770	~770 M93 墓地	770

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对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史和科技测年等有关学科自身的发展，都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如测年技术，改进常规法与加速器质谱计（AMS）^{14}C测年设备，改进样品制备及测试方法，使常规法测量精度达到千分之三（相当于±24年），AMS法测量精度达到或优于千分之五（相当于±40年）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这一点我们考古工作者感触很深。过去用常规法测年都是少量的单个标本进行的，测出年代后面的±年数，少则80年、90年，多则100多年甚至到200年。这样大的误差只能作为参考数据。而此次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年，常规法用的不是单个标本，而是采用大量的系列标本，并充分运用标本的文化分期和样品之间的先后顺序等考古信息，在进行日历年代校正时与树轮曲线的扭摆进行匹配拟合，从而减小标本日历年代的误差，使测出年代后面的±年数，达到24年，显然准确多了。而某些标本的测年，由于标本的条件较好，更可以达到±8年即千分之一的精确程度。

在考古学上，对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山西天马——曲村遗址、曲沃北赵晋侯墓地，陕西丰镐遗址、周原遗址、商州东龙山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和安阳殷墟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如1999年对新密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与分期研究，证实了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填补了二者不很明显的小小空白。1997年在偃师商城中部和南部，发掘了一座时代更早一些的小城，而原来发现的偃师商城是在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这样宫城就位于小城南部的中轴线上，并在宫城内发掘出与小城同时的宫殿基址，这样就把偃师商城的始建的年代又提前了一个阶段[6]。1996～1998年，在郑州商城宫殿区除发掘出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的宫殿建筑基址外，还发现有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的夯土建筑基址，并发现多处二里岗上层二期的绳纹板瓦，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板瓦，肯定与宫殿建筑有关。在宫殿区南测又发现一道二里岗上层二期夯土墙，也许与当时的宫墙有关。在西城墙南段外侧，发掘的二里岗上层二期的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2件青铜器，包括鼎、斝、簋、爵等礼器和钺、戈等兵器。其中4件铜方鼎，形制很大，又依次递减，具有列鼎性质，当为王室所用重器。放置铜器的上面和下边，均有朱砂痕迹，应与祭祀有关[7]。这些发现表明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上层二期时仍有商王室活动，并未废弃。1999年发现的安阳洹河以北的商城，面积达4平方公里，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商城城址，年代略早于现在确认的殷墟一期文化，这是殷墟发掘70多年来又一重大收获，也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标志性成果[8]。1997年发掘陕西丰镐遗址的沣西H18，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发现。沣西97SCMT1探方，由一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H18，由4个小层构成，包含内容丰富，所出的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均可作为测年标本，时代相当于文王迁丰到武王克商之间，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与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时代大体相当。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叠压或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H8、H3和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属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西周中期。以上单位均出土有各时期典型特征的陶器群。作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单位的H18和作为灭商后西周初期

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武王克商之年应包括在这一段年代范围内[9]。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M1193出土克罍、克盉，铭文记载了燕国的始封，其墓主为第一代燕侯，当在周成王时期；而1996年秋发掘的琉璃河H108，出土龟甲上刻有“成周”二字，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当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得超过成王时期。H108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存之一[10]。这两次考古发现，对确定西周始年有重要断代意义。此外，山西曲村——天马遗址和晋侯墓地的考古发掘，对西周中期和晚期断代非常重要。对上述夏商周遗址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并为科技测年提供系列样品，建立了相当精确的^{14}C年代框架，又为有关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2000年9月15日，在国家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的大型会场上，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举办了有关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展览，其中一个版面展示了“^{14}C年代框架与三代年表关系”(参见表二)。这张表把夏商周年表与^{14}C测定考古遗址分期年代的关系排列在一起，这项^{14}C年代框架与三代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对照，已成为考古学者多年为之努力的研究成果，无疑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从表二可以看出，登封王城岗遗址二段即王城岗古城址时期，相当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亦即夏的起始年代，这样就从^{14}C测年上把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古城址纳入了夏代早期文化的范畴。这个学术难题从1977年4月调查发掘登封告成遗址(即王城岗遗址)和同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时就引起很大的争论，安金槐等先生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属于夏代早期，登封王城岗古城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的意见[11]。也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笔者曾参加了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其后并写文章支持和补充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属于夏代早期的观点[12]。而新密新砦遗址的发掘，已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紧密衔接起来。至此可以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当为夏代早期。表二又显示二里头文化一期最早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亦即距今3880年，从历史常识可以推之，这决不是夏的起始之年。鉴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时，遗迹遗物不多，与王都差之甚远。因此，二里头遗址作为王都的时间若从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开始则为公元前1740年，而偃师商城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那么二里头遗址作为王都的时间约140左右年。这样又可反证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夏代早期。

从表二也可看出夏商文化分界约在公元前1600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前，亦即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偃师商城是商灭夏后所建最早的都城，而且就矗立在夏都二里头遗址近旁。也就是说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已经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这样偃师商城就成了夏商分界的界标[13]。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属于夏文化晚期，而二里头文化四期已进入商代纪年。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认为偃师商城与《诗·商颂·殷武》所记的“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和春秋齐器《叔夷钟》铭“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有关。也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卷七所记“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的宫邑；即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所载殷汤在偃师“尸乡”所建之都；亦即皇甫谧在《帝王世纪》所称的“西亳”。而近年来在偃师商城一带发掘出一批唐代纪年墓葬，从其墓志记载看，有唐一代这里就称为“亳邑乡”、“薄台里”、“西亳”、“尸

乡”、“景亳”等[14]。这些有的是唐代建制的乡名，有的是别的地名，但都是沿袭古代的旧称，均应与偃师商城有关。这就从另一侧面说明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

从表二还可以看出，郑州商城始建年代为公元前1580年，要比偃师商城晚一个阶段。我们知道整个商代战事不断，如对西部的羌方、北部的土方、南部的楚方、西南的巴方、东部的夷方等，但战事最频繁的还是在东方，而且贯彻商代始终，直到殷末还曾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东方夷人力量相当强大，夏与东夷既有通婚关系，又是政治联盟，这不能不对刚刚建立的商王朝构成重大威胁。商汤灭夏定都在偃师商城之后，并没有忘记东方战事。约20年后郑州商城的始建，就是作为东进战略的桥头堡而开始的。这样，郑州商城从一个大的聚落址建设成为防御东方的重镇。又经过若干年的经营，大约到了二里岗上层一期阶段，郑州商城达到最繁荣的时期。从考古发现看，这时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最为丰富。四面城墙的使用和维修，外城投入使用；宫殿区内有大批夯土台基及多处大型水井、大型蓄水池、输水管道；铸铜、制陶、制骨作坊继续使用并新建了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发现有用于祭祀的窖藏坑，出土有成双成对大型铜方鼎和其他青铜礼器；发现多处墓葬，其中不少随葬青铜器；还在几个不同地点出土少量诸如“㝵玉”、“玉㝵”等刁刻字骨。这些表明郑州商城已经具备了作为王都的条件[15]。

从表二又可获知，二里岗上层一期年代当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郑州商城内中部偏东处，即今郑州电力专科学校内发现一座大型商代水井J3。水井底部发现的碎陶片为相当数量的直领方唇或圆唇捏口罐、方唇颈部施弦纹和同心圆圈纹鬲、卷沿弧腹盆、高领圆鼓肩壶、方唇高领折肩瓮等，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在井坑即H10夯土内最晚的遗物也是二里岗上层一期陶片。证明J3为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无误。从其井框圆木上取8组系列标本用常规法进行^{14}C测年，确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400±8年，十分精确。

二里岗上层一期约为相当于商王仲丁时期。据《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传》也记有：“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蓝夷是东夷的一支，约在今鲁南境内的郯城、枣庄一带及相邻的苏北接壤地区。仲丁迁都也是与征伐东方的蓝夷有关，故只能从偃师商城东迁到郑州商城，即从亳迁至隞。这样，郑州商城从一座防御东方的重镇，进而又发展成为一代王都。就始建而言，郑州商城晚于偃师商城一个阶段。就作为都城而言，郑州商城开始作为王都的时间比起偃师商城开始作王都的时间就晚得更多。

从商代历史看，商汤都亳在前，仲丁迁隞在后。既然偃师商城为商灭夏所建最早的都城，即汤之西亳，而郑州商城要比其晚一个阶段，因此郑州商城就不可能是亳都。1999年9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学术报告会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俞伟超先生在发言中谈到郑州商城时曾指出：“郑州商城的规模和内涵是商代前期最了不起的遗址，但是说郑州是‘亳’，有什么根据？第一文献根据，书上关于‘郑亳’没有一条材料，没有这个说法。第二是发现陶文，现在可以肯定都是战国晚期的，就是秦人设三川郡以后。这是什么字呢？单独一个字有人说是‘亭’，有人说是‘京’，有人说是‘亳’，现在好像多采用‘亳’的说法。这个字周初时还没有，是秦人出现了才有。单独一个字怎么解释都可以，如果解释‘亳’，它又跟别的字搭在一起，一个陶器上两个字，一个是所谓

'亳',一个是'昳'。另外还有一个'昳亭',那个'亭'字不是这个写法,是战国小篆,一对比是个'亭'字。'亭'这个字秦人特别爱用,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走到哪里就把这个字带到哪里,咸阳很早就有,出于战国什么时候说不清楚,所以秦设三川郡后在郑州出现这个字,当是秦灭六国过程里面出现的。这个字孤零零本身很难说,但从整个文化过程看,应该怎样解释就很清楚。郑州商城是个了不起的都城,但一定要说有个'郑亳',确实难。按照史书严格地说,郑州战国属'管京','亭'和'京'本来就难分。郑州在战国是'京',没有叫'亳'这一说。还有,战国陶文上面很难是一个地名。"[16]俞先生这段精彩的论述对郑州商城的研究很有启迪。

至于郑州小双桥遗址也不可能是隞都。其原因是郑州小双桥遗址的时代为二里岗上层二期,还有些遗存时间更早一些,与郑州商城晚期相并存,当时郑州商城还有那么多遗迹、遗物表明商王室仍有重大活动,并未到所谓废弃的时候;其次仲丁迁隞之时,内忧外患均在,作为隞都没有防御设施的城墙是不可想象的,但至今未见踪迹;再次,仲丁迁都为了征伐蓝夷,蓝夷在东方,不往东方迁却到西北来是何故?又次,看郑州小双桥与郑州商城的地理环境,放着有高墙深池的郑州商城不用,跑到无险可守的小双桥干什么?而且二者相距咫尺,古代建新都谈何容易,这种从市区到郊区的迁都有何意义和必要?最后,在小双桥很少见到人们长期居住的遗存,即很少有生活垃圾,主要的遗迹都与祭祀有关。因此,推断郑州小双桥遗址是属于郑州商城王室的祭祀遗址当不致有大差。

1999年发现的安阳洹北商城,该城址深埋于现今地表以下约2.5米,地面上已无痕迹,均仅存基槽。平面略呈方形,东墙长约2230米,西墙长约2200米,南墙长约2170米,北墙长约2150米。其西南与殷墟相连。过去,也曾在小屯东北到三家庄东一带发现早于殷墟一期文化的一些遗存,但规模很小。在殷墟范围内只找到武丁及以后各王的宫殿、宗庙建筑和陵墓,找到武丁至帝辛时期的甲骨文,而没有找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上述遗迹和遗物,更不用说发现城墙了。这就产生了盘庚迁殷最初在何地的问题。新发现的洹北商城,其时代与过去三家庄发现的遗迹遗物相同 ,即早于武丁时期,又晚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呈现出由二 里岗商文化向殷墟文化过渡的特征。这样对于安阳洹北商城的性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河亶甲居相的相都,另一种认为是盘庚最初迁殷之地。我们认为后者更合乎实际一些。殷墟和洹北商城从大范围讲应是一个地方,商代王都的地名是不会随意更改的,,如果是相就不会是殷,如果是殷就不可能是相,不可能既叫相又称殷,或者先称相后叫殷。如果这里是相都,则文献可记"盘庚复迁相",不会说成是"盘庚迁殷"了。过去文献记载多认为相都在相州内黄县,而不在被称为相州的安阳,且在今内黄县南的刘次范村有商中宗陵,还存有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所立的"商中宗庙碑铭序",碑文记述商代世系、河亶甲迁相及当地建商中宗庙的情况,这也可作为内黄是相都的旁证[17]。所以,洹北商城应为盘庚最初迁殷之地。到了武丁时候,国力隆盛,即《史记·殷本纪》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骧,殷道复兴。"商王朝强大到周边方国无法染指于此的地步,于是又迁到现在所知距洹北商城西南城角不及1公里的小屯一带。可能因为是小屯地势较高,避免水涝,又与洹河相依,用水方便之缘故。当然洹北商城刚刚发现,城墙基槽的发掘才有几条探沟,关于城址的布局和确切年代及其他相关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工作。

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考古工作者就是实现这个主题的使者。中华古文明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宝库，对其相邻地区甚至全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对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对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是一件普遍牵动情感的大事，对学术界是一个既责无旁贷又极富挑战的攻关项目，是一个特别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研究课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丰硕的成果之后，人们把目光又转向与之息息相关的探源工程，希望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取得的成果为起点，探索中华古代文明起源。由已知推未知，再上溯一千年，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近年来，北京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的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聚集了历史学、考古学、物理学、环境保护学等一批知名的文理科教授，主任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副组长、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已出版多期《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0 年 3 月，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又面向海内外创办大型学术刊物《古代文明》(年刊)。2000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将有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的学者及国内外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中心的研究工作。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由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担任。并成立了中心的专家委员会，聘请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相当影响、学术造诣深厚的学者担任专家委员会的院外委员。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了我国人文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成立，无疑将大大推动古代文明学术研究的开展，并加快探源工程的启动。

中原地区位于祖国腹地，古代文化的发展水平历来较高，对周围及边远地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还能够吸收四面八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素，因而有条件率先进入文明社会，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地区，绝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在华夏大地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随着历史长河的奔流，这种凝聚力就愈来愈强，周围各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数千年来，我们祖国虽然有过多次分裂而没有灭亡中断。继之而来的是又一次大统一，使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在全世界大放光彩。河南作为文物大省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积淀，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未来的探源工程中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 释

[1]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1996 年 5 月。

[2][9][10]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 ~ 2000 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 8 月。

[3]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执行情况验收文件资料·工作报告》2000 年 9 月。

[4]①安金槐、杨育彬:《偃师商城若干问题的再探讨》，《考古》1998 年第 2 期。

②杨育彬、孙广清:《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殷都学刊》1998 年第 2 期。

③杨育彬:《河南考古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原文史》2000 年第 2 期。

④杨育彬:《从考古发现谈夏、商前期年代学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

[5]李卫、解冰:《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重大 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2日。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2期。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8]马宝珠:《河南安阳新发现商代城址》,《光明日报》2000年1月8日。

[11]①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告成遗址的调查发掘》,《河南文博通讯》1977年第2期。

②安金槐:《豫西夏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2期。

[12]①杨育彬:《谈谈夏代文化的问题——兼对〈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一文商榷》,《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②杨育彬:《从建国后的考古发现来探讨夏文化的始末》,《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95年。

[13]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1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考古》1984年第10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墓》,《考古》1986年第5期。

③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县四座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④樊有升、李献奇:《河南偃师唐严仁墓》,《文物》1992年第12期。

⑤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偃师唐柳凯墓》,《文物》1992年第12期。

[15]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结题报告》,1999年3月。

[16]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七十期,1999年10月30日。

[17]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原载《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郑州商城的考古学研究

一、郑州商城历年来的发掘概况

1950年秋,在郑州东南郊二里岗一带,发现商代陶片。同年冬,河南省文管会派安金槐等人到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进行调查,从而证实这一带是埋藏丰富的商代遗址。

1952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曾在郑州二里岗进行考古发掘实习,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商代遗迹和遗物,同时也发掘出龙山文化遗存。

1953年3月至1954年春,河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设,又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更多的商代遗存,其中包括一段商代夯土墙基,还发掘了一大批战国墓。这两次大规模发掘的收获是如此丰富,不但先后分别编写了《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的考古发掘报告和《郑州二里岗》考古专刊,而且按照考古学的惯例,把以后其他地方类似的考古发现,都命名为商代二里岗期文化。

1954年和1955年,在华东文物工作队支援下,在郑州配合基本建设先后发掘了人民公园的商代遗址和墓葬,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作坊遗址,郑州紫荆山北铸铜作坊遗址和制骨作坊遗址,郑州白家庄商代遗址和墓葬,郑州铭功路西侧商代制陶作坊遗址,郑州杨庄商代铜器墓葬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白家庄的两座商代房基下面还叠压有商代夯土层,后经调查与试掘,方知这里是郑州商城的东北城角。从此,发现了郑州商代城遗址。

1956年至1965年,陆续发掘了郑州铭功路商代墓葬,早于二里岗期的郑州西郊洛达庙遗址,郑州南关外早商遗址等。对郑州商城四面城墙也进行发掘,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城址。

1972年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恢复了对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工作。针对有些专家的怀疑,在郑州商城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分别开挖了探沟,再一次证实了郑州商城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城址。在郑州商城的东北部发现了多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在今东里路1号院发掘出大型房基(C8G10),在今黄委会水利科学院南院发掘另一座大型房基(C8G15),在今省中医研究院前院发掘出又一座大型房基(C8G16),说明这一带是郑州商城的宫殿区。与此同时,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约300米处的张寨南街,发掘出一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一对商代大型铜方鼎和1件铜鬲,当为商王室所用之物。在今东里路发掘的一条商代壕沟内,出土近百个奴隶的头盖骨及少量

的牛骨和猪骨，一些人头骨上有明显的锯痕。在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和黄河中心医院内，发现有商代铜器墓。尤其是黄河中心医院的C8M32，是比较少见的二里岗期下层墓葬。在郑州商城北约500米处，即今新华社河南分社院内，配合基建进行发掘，出土有大量陶片、骨器、废骨料、砺石、铜刀、铜块、铜渣等遗物，说明这里属商代制骨和铸铜手工作坊遗址的范围。同时还发现有被绑缚的弓身屈肢人骨架、无首人骨架、杂乱人骨和猪骨掷埋在一起的现象，这也许与祭祀有关。

1977年到1984年，在东里路和二里岗发掘商代铜器墓；在郑州商城北城墙缺口以南，即今紫荆山百货大楼范围内，发掘有商代文化层和窖穴；在郑州商城中部偏南处，即今郑州变压器厂家属院内，发现面积约250平方米的商代夯土，这是当时发现最偏南的一处夯土基址。为打通东里路与城东路相接，需通过一段东城墙，经过发掘知道这段城墙修建在较高的沙土岗上，这沙土岗就是紫荆山的一部分。在黄河中心医院发现战国文化层，出土一批战国陶片，在一些陶豆柄和陶豆盘上，印有三种形制的“亳”字，或印有“十一年以差”五个小字，这可能是战国“亳社”的遗存。战国文化层下，还发掘出商代夯土台基。在黄河中心医院8号宿舍楼下发掘出一段由石板砌成的石板池遗迹。鉴于该遗迹内遗物很少，上被战国文化层直接叠压，下又打破商代夯土，因此被定为战国祭祀遗迹的一部分。其后，在1992年，又在其西侧9号宿舍楼下发掘出同样遗迹，证明这是商代二里岗上层时的蓄水池遗存。在郑州商城中部偏西处，即今天成路南侧市中级人民法院内，发掘出一座商代窖穴，出土能复原的陶器如鬲、斝、大口尊、小口尊、罐、瓮、盆、甑、簋、盂、罍、盉、爵、豆等20余件，还出有骨匕和卜骨等。在大口尊口沿或颈外刻有十字陶文符号、小鸟纹饰或“目”字，有1件瓮的腹壁当时曾用白灰面修补过。在郑州商城西墙外500余米处，即今德化街商业大楼下，发掘出两座相近的商代灰坑，靠北的一座为东西向长方形，出有二里岗下层较完整的盆、斝、甗、大口尊和石器、骨器等；靠南的一座为南北长方形，出有能复原的二里岗上层陶鬲、仿铜器的饕餮纹陶簋。在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即今向阳回族食品厂院内，发现1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内置大方鼎2件、大圆鼎1件，还有其他尊、罍、卣、鼎、盘、觚等10件。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外约700米处，即今郑州市木材公司院内，发掘一座商代窖穴，坑内有一件折沿大口绳纹罐，罐内放置石镰19件，刃部均较锋利。在郑州商城西墙外约500米处，即今北二七路中段路东，发掘4座商代墓，其中3座随葬有青铜器。

1985年配合修建商城路及黄委会食堂的改建和其它基建工程进行了调查、试掘和大面积发掘工作。其中在配合修商城路的发掘中，在管城区政府门前东侧，发现有商代夯土堆积，由于揭露面积有限，对整个夯土遗迹的面貌已无法全面弄清，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接近郑州商城的中部，仍存在有夯土堆积，这对于我们探讨宫殿区的范围提供了新的线索；商城路与郑州商城东墙交叉点的发掘，发现城墙上部覆盖文化堆积有宋、元时期的陶瓷残片，只是在城墙的中心部位才发现有商代夯土城垣，城墙下叠压有仰韶文化晚期的堆积，这次发掘中，未发现城门遗迹。通过天成路西头的发掘，基本上弄清了商城西城墙墙基部分的结构和时代，同时发掘清理了3座打破城墙的商代墓葬。在黄委会食堂发掘出一段二里岗下层的夯土墙基，为东北——西南走向，长约80米（其中发掘25.2米，钻探50多米），宽约7米，厚1.4～2.4米。可能是宫城墙。

1986年配合基建发掘，在郑州火车站广场以南，一马路东侧振兴商场的施工中，发现夯土墙基一段，宽16米左右，夯层明显，夯窝清晰，另外在郑州饭店东侧，地下管道沟槽的南北断面上，也发现与振兴商场性质相同的夯土墙基，两处夯土墙基连成一线，方向约为353°，向北一直延伸到东方红影剧院门前。郑州商城外夯土墙的确认使我们想到50年代的调查、试掘材料中发现的夯土城墙，并组织力量对这两段夯土墙的延伸地带进行了钻探。西墙长度已探明了700余米，南墙1100余米，在探明的南墙位置上布置探沟6条，面积149平方米。二者的宽度和结构相同，应为同时筑成的夯土城墙，当是郑州商城的外城墙。

1987年随着郑州市旧城改造工程的进展，共对13个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以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黄委会锅炉房、东里路污水管道工程等地点的发掘资料较为重要。郑州医疗机械厂布置探方、探沟16个，面积1200多平方米，发现大面积的商代夯土堆积，夯土南部边缘发现排列有序的柱础坑，由于发掘面积有限，除南部边缘外，其余三边目前尚不清楚。在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北半部发现大量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文化层。黄委会锅炉房发现有战国和商代的柱础坑9个，排列有序，规模较大，这一带有级别较高的战国遗迹。东里路污水管道工程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位于东里路两侧的郑州回中操场的夯土基址和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院内的夯土原来是连成一片的，位于路南侧的省中医院家属院内的夯土堆积也一直延伸到了北大街菜地。

1988年配合基本建设发掘2360平方米，发掘单位14个。通过发掘，肯定了郑州医疗器械厂西院商代宫殿基址的年代和性质，进而弄清了该区域内商代宫殿建筑的叠压打破关系。其他地点的发掘，也取得了十分丰富的实物资料。如黄河医院战国陶文的大量发现，对研究这一带的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9年配合郑州商城保护区域内的基本建设单位，进行了大量的抢救性发掘。除了发现堆积层次较厚、内涵丰富的商代文化层和宋代层外，还发现商代窖穴1个，唐代陶窑1座，宋代古河道1条，在配合郑州电力学校的发掘中，清理出残破夯土台基1座，面积500平方米，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

1990年，在黄委会61号、62号楼的发掘中，揭露面积700多平方米，发现商代夯土建筑基址2座，其中1座保存较好。有商代柱础坑22个，规模较大，排列有序。在再次进行的郑州电力学校的发掘中，继续清理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残夯基，又发现商代灰坑7个，商代、战国和唐代水井各1眼。商代水井结构复杂，井框平面呈长方形，但在井框外有一个直径近9米的椭圆形坑，口大底小，略呈锅底状。井框底部用榫卯结构作成一个长方形井盘，井盘上用粗加工的木材作成高1.5米的木结构“井”字形框架，木井框外侧附贴0.30～1.0米的青膏泥；井盘内铺有20～30厘米厚的碎陶片和汲水时损毁或掉下来的水器，碎陶片层的作用主要是澄沙过滤。这为研究商代前期的凿井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配合黄委会电缆沟槽的发掘，在位于郑州商城的东城墙与北城墙转弯处通过解剖发现墙基宽33米，平地起建，未见基槽。在打破城墙的1座残商代墓葬中出土觚、爵、斝3件残破青铜礼器。郑州化工三厂家属楼基建工地的发掘，发现2个商代灰坑和1眼宋代水井。其中1个灰坑出土物形制比较特别，表现了比较早的时代特征，为我们研究郑州商

文化中较早的文化因素的源流提供了线索。

1991年配合郑州市的基建工程,发掘面积达4000平方米。共清理夯土建筑基址6处,其中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2处,陶窑2座,灰坑30余个,水井1眼,还有城墙夯土,外城墙的西南拐角,少量墓葬等。为研究商代城墙的筑法与结构、商代宫殿建筑的布局、水井与供水,以及外城墙的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1992年,主要在郑州商城南稍偏西的三德里和花园新村等地,发掘出外城墙南墙西段,其上部已被破坏,只剩下夯土基槽,下面坐落在生土上。在郑州商城宫殿区的黄河中心医院南半部发掘出商代石板蓄水设施,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20米,深约2.5米,用青石板铺底,用圆形或不规则形石块砌壁。西北至东南方向,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在回民中学和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各发现3座夯土台基,尚保留有部分石柱础。在省中医学院家属院还发掘出商代水井。商城外城墙南墙西段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郑州商城的军事防御设施以及外城的形状、范围、城墙本身的营建方式、结构特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和商代水井的清理,为研究宫殿区的建筑布局特点和宫殿区生活供水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宫殿区内石板筑蓄水设施的发现,为研究郑州商城宫殿区的供水和排水,以及其它水利设施的布设提供了实物佐证。

1993年,主要在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南侧的郑州丝钉厂发掘出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2处,一处在南部为东西长条形,长度超过70米(其中东段为1996年发掘),南北宽2.2~2.3米。在夯基上有长方形柱础55个,间距0.5~0.8米,应是廊一类的建筑。另一处在东部,东西总长40余米,发现一排圆角方形柱础槽,每边宽为1~1.4米之间,中间有直径0.4米的木柱灰痕,其下都埋有柱础石。时代约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在东部夯土的东南侧,还发掘出一眼夯土井,井外侧为一圆形井坑,直径11米,坑内分层夯打,质地坚硬。中间为一口部呈不规则圆形井筒。亦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1994年,在郑州饭店建筑工地,发掘出长约58米的一段外城墙,属于西城墙的南段,和过去其它的外城墙一样,主要是基槽部分。新的发现是该段外城墙下面还压着一些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此外,在郑州商城的东北部宫殿区,即今郑州皮毛工艺厂院内东侧,发现2座商代夯土基址。其中一座的地坪上尚有少量的圆形柱洞,另一座残存两个柱础槽,槽内底部有柱础石。由于建筑物和马路所压,以及晚期遗迹的破坏,所以其形状的范围尚搞不清楚,从包含物看,属二里岗上层时期。在郑州商城内南半部的南学街一带,发掘出一些二里岗上层时期的灰坑。此外,在东里路东段南侧(现为东里路38号院)发掘出商代房基、灰坑、水井等。

1995年,继续在东里路38号院进行发掘,发掘出连间房1座,南北长11米,东西宽6米,中间有墙隔为4间。房基四周有柱洞10个,洞内放置柱础石,房内地坪多次铺垫而成。发掘出1座大型宫殿基址,基本呈南北走向,略偏西南。南北长25米,东西宽16米,并有7排柱础槽,每排有柱础槽14个。柱础槽间距1.9~2.3米,槽内下部均放置有柱础石。

上半年在东里路东段北侧,发现一段商代夯土墙和供水设施。墙呈西北至东南向,现仅存基槽部分,墙宽约3米,目前发现长度约60米,高约1.1~1.4米,墙基槽直接打破生

土，上部被二里岗上层二期遗迹打破。供水设施位于夯土墙以北并与之平行，二者间距4米，已发现长度约40米。由地下夯土沟槽、石板筑水管道和汲水井三部分组成。沟槽平面为长方形，断面呈倒梯形，口宽11米，底宽3米。底部中间为用长方形石板筑砌的水管道，管道内侧为方形，高0.68米，宽0.55米。其上盖有3米多厚的夯土，管道底部有沉淤的细黄沙及螺壳、河蚌壳等。汲水井位于夯筑沟槽的中部，向下打破夯土与石板水管道相通。井平面呈长方形，长2.5米，宽1.5米，南半部均有二层台。汲水井发现4个，间距均为8米。可能用于汲取清水、清淤或控制水量。该供水设施向北延伸可与1992年黄河医院发现的商代蓄水池相通。

在黄河中心医院，发掘出2座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商代石板蓄水设施的北侧不远。其地坪上还分别保存有成排的料礓石筑柱础或圆形柱基槽，槽底部有石柱础。

1996年，在春节前发现一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位于郑州商城西城墙中段外侧50米处(今南顺城街路西)，出有商代青铜器12件。其中青铜方鼎4件，分别高83厘米、72.5厘米、64厘米、59厘米，具有列鼎性质。还有铜斝2、铜爵2、铜簋1、铜钺1、铜戈2。在青铜器的上下还有朽木痕和朱砂痕，可能是盛装木器的残迹。从青铜器形制和坑底部和一些陶器看，当属于二里岗上层二期甚至还稍晚一些。很可能为王室祭祀的遗存。

本年内，在东城墙内侧的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内，发掘出破坏较甚的夯土基址3处，不怎么成形，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还发现大型商代水井，由夯土井坑、井台和井筒组成，深约7.75米，因井内水位较高，井底部是否有木井盘尚不清楚，属二里岗上层二期。在院内西北角，还发掘出石板砌供水管道，残长4米，为东北西南向，其结构与东里路发掘的相同，但方位形成直角，二者关系密切，作用相同。

本年12月开始，在黄委会43号院(该院位于顺河路西段北侧，其东南不远为黄委会食堂工地，西南200米处为C8G15)进行发掘，发现二里岗上层一期夯土台基2处。发掘进行到次年4月结束。

1997年，配合郑州打通紫荆山路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开挖探沟16条，实际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共发现商代墙基1段，残夯土遗迹2处，灰沟3条，丛葬坑2座，还有水井、灰坑等。其中沟3比较重要，位于商城路北近200米处，沟口宽7米，底宽6米，深1.5米，发掘20余米长，从出土陶片看为二里岗下层二期。在沟内发现2座商代丛葬坑，一座坑埋葬人骨3具，有2具作捆绑状交叉在一起，另一座坑有人骨4架，上下两层叠葬，其中下层有一具人骨的脊椎内被射进一枚骨镞。这2座丛葬坑属于二里岗上层二期。

还在紫荆山路通过的南城墙开挖南北长35米，东西宽6米的探沟4条。南城墙顶部现宽7米，底部宽22.5米，残高5.5米。城墙底部有宽5.9米、深0.4米的基槽。夯层较薄，夯窝密集，土质纯净，相当坚固。还发现有二里岗上层一期文化层叠压城墙底根部。

与此同时，在紫荆山路北段西侧的民族小区也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一座二里岗下层的夯土基址，平面呈曲尺形，其东部压在现代路面下，西北部被晚期污水坑打破，其下多为生土和沙土，也压着1座洛达庙晚期灰坑。夯土面上发现柱洞4个。

本年开始发掘黄河河务局宿舍区。

1998年,在黄河河务局发掘出一些商代夯土基址,鉴于被晚期破坏严重,其平面形状难以看出原貌,夯土结构也残缺不全。其时代从二里岗上层二期到二里岗下层二期均有,其中最早的,可能为二里岗下层一期。发现二里岗下层一期墓葬1座,出土有青铜鬲、盉、戈各1件,还有玉柄形器、涂朱圆陶片、骨镞和由海贝和绿松石组成的串饰。

在黄委会1号高层楼宿舍进行发掘,又发现一段夯土墙,与1985年黄委会食堂改建工地发现的夯土墙相连,其总长度已近百米。在此范围内还发现一条东南——西北向的输水管道,其底部和两壁均为夯土,其上面盖有石板。该输水道上宽0.68米,下宽0.79米,高0.50米。在管道东端壁上还发现4组用来控制水量插木板闸阀的竖向窄沟槽,该输水管道向东南延伸与1992年在黄河中心医院发现的蓄水池相对应。从其地层打破关系和出土陶片看,该输水沟道建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并使用到二里岗上层二期。

本年度在东里路东段北侧的北大街农业队宿舍区进行大面积发掘,已发掘出大大小小18块夯土基址,由于后期破坏,所看到的夯土均为地面以下的基槽部分,除少量为长方形外,多不成形。从夯土之间的打破关系及与夯土密切相关的活动面堆积来看,这里的夯土基址从二里岗下层到二里岗上层均有,延续时间较长。在个别夯土下面还压有洛达庙期灰坑。

二、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

(一)郑州商城的城墙结构和布局

郑州商代文化遗存分布范围较广,东起凤凰台,西至西沙口,北抵花园路,南到二里岗,遍及整个郑州市区,面积约25平方公里。既发现有商代房基、窖穴、壕沟、水井、墓葬和祭祀坑等遗迹,也发现有铜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原始瓷器以及习刻字骨、陶文符号等遗物。

郑州商代城墙,全是用土分层夯筑起来的。每层夯土的厚度一般为8~10厘米,但也有厚达20厘米或薄到3厘米的。每层夯土表面皆布有密集的圆形尖底和圆形圜底夯杵印痕,夯窝口径多为2~4厘米,深约1~2厘米。另外还发现数量很少的长方形或三角形夯杵印痕。根据夯窝的大小、形状和分布的密集程度推测,有可能是用成捆的圆木棍作为夯筑工具夯筑城墙的。由于夯层薄、夯窝密,所以夯土层相当坚硬。从夯筑的质量看,城墙中部的夯层一般稍厚,夯打的质量较差,甚至有些地方还比较松软,而城墙边缘部分夯层较薄,夯打质量也较好。这种现象可能是被迫参加筑城的奴隶们,为了反抗奴隶主的压迫,在筑城时进行消极怠工的结果。

城墙的横剖面呈梯形,中部夯层呈水平分布,层层叠筑,是城墙的主体,即"主城墙";梯形两腰的夯层则是倾斜筑成的,即"护城坡"。城墙内侧的坡度较缓,外侧坡度陡峭。"主城墙"是用版筑法筑成的,两侧与"护城坡"接缝处有近于垂直的壁面,壁面上留有横列木板的痕迹。由此可以看出,"护城坡"的斜夯土层除了有加固城墙作用外,还与版筑"主

城墙"时,支撑横堵的木板有关。

在南城墙探沟CST3、CST4内,清理出来的商代城墙内侧壁,部分保存较好。它的筑法是:在修筑城墙之前,先平整地面,然后在"主城墙"内壁相应的地面上,向下挖出一道与城墙相平行的沟槽,作为建筑城墙的底部基础。商代城墙夯土层是从沟槽底部层层夯筑的。当夯土层筑到与沟槽口部相平齐时,便开始用横列木板相堵,逐层夯筑出两壁近于垂直的"主城墙"。因此,在"主城墙"两壁上遗留有比较明显的横木板痕迹。现存版筑痕迹的两壁通高1.5米,每块木板长约3米左右,板宽0.16~0.19米。在紧靠"主城墙"版筑面的内侧,附加有内高外低的斜夯土层,即"护城坡"。"护城坡"顶面上铺有一层料礓石碎块,这可能是为了防止"护城坡"受雨冲刷而铺设的保护层。

在东城墙探沟CET7中,清理出来的商代"主城墙"下半部宽约10.6米,内外侧均保留有近于垂直的版筑壁面,壁面高3.5~3.6米。版筑痕较清楚,木板长2.5~3.3米,板宽0.15~0.3米。"主城墙"外侧的"护城坡"底宽约4米,内侧的"护城坡"底宽7.25米。在"护城坡"的表面,也铺设有料礓碎石块的保护层。从发掘中可以看出,"主城墙"是分段版筑而成的,每段长约3.8米左右。其筑法是,将两壁和一个横头用木板相堵夯筑而成。采用这种方法,逐段向前延伸,从而使城墙逐渐加长。在段与段相接处,也发现有横列木板的版筑痕迹。

从上述情况看,在郑州商城修建的时候,采用了"护城坡"堵挡木板的方法,但尚未使用立柱、夹棍和绳索来固定木板的技术,表现出夯筑技术有一定原始性。

郑州商城的平面近似长方形,北城墙长1690米,西城墙长约1870米,南城墙和东城墙均长约1700米,周长将近7公里。西北城角、西南城角和东南城角都近似成直角,唯北城东段向南倾斜。北城墙东段即现在的紫荆山,这里有一条相当古老的沙土岗子,商代筑城时,到这里便依照土岗的走向,就其高度修建过去,所以商城的东北角就不成直角了。在郑州商城四面城垣上,共发现11个宽窄不同的缺口,有些缺口是城墙废弃后损毁的,有的可能与商代城门有关。郑州商城的西城墙和北城墙西段破坏较甚,残墙绝大部分掩埋在现今地面之下;北城墙东段、东城墙和南城墙的大部分还保存在地面之上,其中尤以东南城角保存最好。

郑州商城不仅有高大的夯土城墙,而且城内外还有丰富的遗迹。

在郑州商城内的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以东里路为中心,北自顺河路北侧,南至城北路南侧,西起河南省戏校西院和黄委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南院,东到黄河医院和郑州医疗器械厂院内,约占郑州商城四分之一左右的范围内,先后发现了数十处成组的或大型的及结构复杂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有的夯土基址面上,还保存有柱子洞或柱础槽和石柱础,表明这里是商代宫殿遗址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在郑州商城的中部偏东、偏南、偏西处,也有少量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此外,在城内还发现一些形制较小的房屋基址,以及相当数量的商代遗存,这可能是一些平民居住区。

在城内还发现许多农业生产工具,由此推测,在偌大的郑州商城内,可能有若干空地进行农业种植,这正是早期城市的特点。

在郑州商城城郊,还发现一批按照一定布局建立起来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北城墙外

300多米处，即今河南饭店一带，有1处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在铸造作坊遗址北面，即今新华社河南分社院内，发现1处磨制骨器的作坊遗址。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外约600米处，即今河南省公路运输公司院内，也发现1处铸造铜器的作坊遗址。以上三处手工业作坊遗址，正好位于郑州商城南北中轴线上。此外，在西城墙外约1300米处，即今铭功路西侧的郑州第十四中学院内，发现一处烧制陶器的作坊遗址。这些手工业作坊全部安置在城外，可能是为了防范手工业的奴隶"作乱"。

在城外还发现不少商代遗址，如二里岗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小型房屋、窖穴，从出土的遗物看，这些居民大半是农业人口。

商代墓葬，也多分布在城外，如城东北角的白家庄附近，城东南隅的杨庄一带，城南的郑州卷烟厂，城西的北二七路、人民公园和铭功路等，都是分布集中的墓葬区。

近年来，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外900～1200米处和西城墙南段外700～900米处发现一大段夯土墙基，可与50年代在二里岗一带发现的夯土相连接。即从凤凰台向西经水利厅仓库、商业仓库、市粮一库、市木材公司、市二轻仓库，继续向西稍偏北，再经郑州五中、新民村、东豆腐寨、臧家门、郑州三十中、郑州四十七中，再折向北稍偏西，又经振兴商场、群众影剧院、中原大厦、郑州长途汽车站直到东方红影剧院，断断续续发现夯土墙基约2900米，自郑州商城东南、南、西南和西部的外侧环绕着郑州商城，其总长度约在5000米左右。南面的夯土墙基宽12米左右，西面的夯土墙基宽17米，残存高度1.2～2.3米，夯层厚10～15厘米，夯层面上的夯窝与郑州商城城墙和城内宫殿基址的夯层、夯窝相同。夯土内的遗物很少，有鬲、碗和细绳纹、篮纹、方格纹陶片，分别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洛达庙期和商代二里岗下层时期。按时代最晚的遗物推断，夯土墙应属于二里岗期下层时期。这应是作为防御的外城墙遗迹。一部分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就分布在郑州商城东南城墙、南城墙、西城墙南段的外侧与这道夯土墙基之间。而在外城墙之外，商代遗迹就非常少(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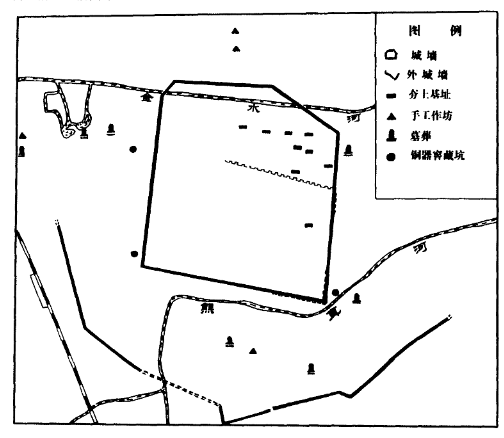
(二)郑州商城的宫殿建筑

1973年以来，在郑州商城东北部以及中部和东部，曾发掘出一批商城大型宫殿基址，为研究郑州商城内的宫殿布局、形制和建筑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东里路东段北侧，即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工作站院内，发掘出第10号房基(C8G10)，房基为长方形，南北长34米，东西宽约10.2～10.6米。房基是由10多层夯筑硬土堆垫而成的，一般每层厚8～12厘米(也有薄到5厘米或厚到26厘米的)，皆为红花硬土，或红灰硬土，或灰硬土，或夹白砂灰硬土。每层又可分为三小层。以第五层为例，上层为地面层，采用料礓石粉铺垫而成，质地坚硬，厚0.5厘米；中层是厚约0.9～1.2厘米的白灰砂层；下层是厚约10厘米的夯土，夯层面上有密集的夯窝印痕。从10多层堆积的房基地坪看，10号房基使用的时间相当长。

在房基地坪上保留有大小不同、高低深浅不等的圆形柱础的柱洞，大致分为7排，由于不少地方遭到破坏，每排现存的数量差别较大，最多的有13个，最少的仅存2个。从圆形柱础和柱洞的形制看，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圆形柱础是用料礓石块砸成的，柱础直径为

30～40厘米；另一种圆形柱础是用料礓石碎块和砂土修筑的，周边用调合的料礓石粉涂抹，柱础直径为28～42厘米。这两种露出房基地坪的柱础可能是明础。第三种是挖的柱子洞，数量最多，边缘整齐，上口稍大，底较小，为坚硬的平底，有的底部还铺有料礓石层，但其下没有发现柱础石，柱洞口径18～36厘米，深9～30厘米。在房基西壁中部和北部，还残存有夯土筑成的墙基。由于该房基被战国及其以后的文化层破坏，整个房基的平面结构目前还不能复原。



图一 郑州商城遗迹分布图

紧靠10号房基西侧，还发现6座商代大型夯土基址，但损毁较甚，无法看出原貌。这些房基也是夯土筑成，有的还发现有方形柱础石或圆形柱础槽。方形柱础石间距2.15米。其中有一个长35厘米，宽37厘米，顶面平整，系用红褐色石头稍加打制而成；另有一个长30厘米，宽27厘米，顶面近平，系用青白色河卵石制成。圆形柱础槽仅有一个保存完整，直径约1米，中间留有直径42厘米的圆形木柱痕迹，木柱下面垫有柱础石。此外，在这些夯土基址上，还发现3个河卵石，直径35～50厘米，也应是柱础石的遗存。这些夯土基址，与10号房基是一组宫殿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在宫殿遗址范围内，出土一些铜簪和玉簪，这些珍贵的装饰品，在郑州商城的其他地方很少发现或没有发现。由此可见，居住在这里的当是奴隶主贵族。

在10号房基以东约近百米处，即今北大街农业队宿舍区内，发掘出大大小小18块夯土基址。其中较完整的为F1和F2。这是东西并列的2处夯土基址，其形制、大小、方向、填土和结构相若，应属同一组建筑。F1在西，平面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9.4米，南北宽6.3米。从剖面看这是房址基槽，深近2米，西、南、北三壁均呈阶梯状内收，底部近平。填土呈深灰色，质地较细腻，结构紧密，平面夯窝和剖面夯层皆很清晰。现存房址地坪面上尚未发现柱础痕迹。F2在东，二者相距11米，其北部边缘基本在一条线上。平面亦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9.1米，南北宽应与F1相当，因大部分尚压在探方南壁之下，详细情况尚不尽知。其它夯土基址由于发掘甚少，或者破坏较甚不成形，其平面布局等情况尚待日后发掘结束方可知晓。

在东里路西段南侧，即今黄委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南院内，发掘出第15号房基（C8G15），房基地坪距今地面深约3.7米，东西长65米以上（东边被马路叠压），南北宽13.5米。房基面上尚存在两排柱础槽。北面一排有27个柱础槽，皆为长方形，一般南北长1.5米，东西宽0.8米，现存深度约0.4～0.7米；南面一排的东段已发现10个（中段和西段被现代建筑所压），也为长方形，一般南北长1.2米、东西宽0.85米。这两排柱础槽除已被破坏者外，周边都很清楚，槽的中部有深灰色的圆形木柱痕迹，柱径约0.3～0.4米。木柱下面有石柱础，有的是红色砂岩，有的是青灰色河卵石，平面向上，但形状不甚规整，长、宽约0.3～0.5米。据北排的一个柱础槽的剖面看，槽壁并不是垂直的，而是向内收，底部比口小，现存深0.74米，石柱础为厚0.24米的红色砂岩。两排柱子各排成直线，柱与柱之间相距约2.1米，排与排之间相距9米。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面一排柱础槽的外侧，还发现4个排列有序的较细的木柱痕迹，直径约0.15～0.2米，其下没有石柱础。这应是擎檐柱的遗存。

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出这座大型房基修建的大致程序：先挖一个东西横长的大型房基槽，在房基槽内填土分层夯实，逐渐高出地面，筑出一座夯土台基，然后在夯土台基上挖两排长方形的柱础槽，把石柱础放进柱础槽内，再把木柱立在石柱础上，然后把柱础槽填土夯实，使木柱固定。这两排木柱是起檐柱的作用。接着在两排檐柱的内侧修筑房子的木骨泥墙或夯土墙，最后再上梁架，修茅草屋顶。这大致就是所谓的"茅茨土阶"。

根据南北两排柱础槽外侧留有较宽的夯土台面以及北面一排柱础槽外侧尚有4个擎檐柱遗存来看，15号房基曾修建有回廊。从一些石柱础已露出的情况分析，由于夯土台基的地坪已毁，所以，回廊中间原有的一排木骨泥墙或夯土墙房子，以及回廊外沿的绝大部分擎檐柱等也均被破坏了，现已无存。但仍可将15号房基复原成"四阿重屋"式的建筑。这座宫殿可能与《考工记》中描写的"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的建筑形式相似，或许就是一座九室重檐顶并带有回廊的大型寝殿。

在15号房基东部偏南10米之外，距地表3.6米深处，有一大片夯土，东西长26米以上，南北宽约14米，厚0.7～1米，夯层清晰，每层厚8～12厘米，夯层表面都有密集的圆形夯窝印痕。由于夯土台基破坏较甚，没有发现柱础槽和石柱础。在15号房基西部偏南10多米的地方，距地表3米多深处，有一片近方形的夯土台基，南北宽约16米。由于没有发掘，详情不明。这两处相距近的夯土台基，可能与15号房基是同一组的宫殿建筑。

在城北路中段南侧，即今河南省中医研究院内，发掘出第16号房基(C8G16)，南北长38.4米，东西宽31.2米，距地表深3米多。西部和南部保存较好，北部、中部和东部均被战国文化层破坏。它的建筑方法和第15号房基相似。16号夯土台基现存最厚处为1.5米，夯层明显，每层厚约10～16厘米，夯层表面有与商代城墙相同的密集圆形夯窝印痕。房基面上发现有内、中、外三排距离很近且又相平行的柱础槽。柱础槽皆为圆形，边框直径为0.95～1.35米，槽内中部灰色的圆木柱痕直径为0.3～0.4米，石柱础都是青白色的河卵石，平面向上，径长为0.34～0.45米。柱础槽排与排之间相距1.2～1.6米，木柱中心相距2.05～2.5米。同一排的柱础槽之间相距0.5～1.5米，木柱中心相距1.6～2.45米左右。柱础槽口大底小，槽壁斜直，石柱础平置于底部中间，其上木柱灰痕明显。从残存的柱础的布局看，原建筑可能有较宽的回廊和重檐，也许就是"堂"一类的建筑。由于中部、北部和东部破坏较甚，这座规模巨大的宫殿整体格局已无法复原。在16号房基的南侧、西侧和北侧，均钻探出面积较大的夯土台基，这很可能与16号房基同属一组建筑群。

此外，近年来在顺河路南侧黄委会家属院内，发掘出一座东北、西南向的长方形宫殿基址，南北长47米，东西宽11米。夯土台基面上发现有南北纵列有三排柱础槽，保存完好的有34个，柱础槽内有圆形木柱痕，其下均有柱础石。在城北路东段北侧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内，发掘出一座东西长32米，南北宽11米的夯土台基，其南北边缘各有一排柱础石，在其东西两侧还各有面积较小的附属建筑，构成一组宫殿。在东里路中段南侧的郑州回民中学院内，发掘出3座夯土台基，发现有柱础槽遗存，还发现有排列密集的木骨泥墙柱洞。在夯土台基底部有古河道的河相堆积层，为加固基础，在古河道上先用天然石块垫筑2米多厚，然后再在其上修建夯土台基。在东里路东段南侧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内，发掘出近10座夯土建筑基址，多排的柱础槽保存较好，是宫殿区中建筑最集中的地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宫殿区内发现了几处相对应的大型商代石板蓄水池和石砌的或夯筑底、壁而其上盖有石板的输水管道。其中在黄河医院内发现的一处蓄水池就东西长100米，南北宽20米，深1.5米。底部用掺有碎料礓石的白色土铺平夯实，再用青灰色石灰岩板铺底，用河卵石加固池壁。其西段可能与输水管道相通。管道底部和两壁均为夯土，其上面盖有石板。在管道东端壁上还发现4组用来控制水量插木板闸阀的竖向窄沟槽。其东段与供水管道相通，供水管道设置在夯土沟槽内，用石板砌成方腔形管道。在夯土沟槽内还有小型汲水井，平面为长方形，南部留有二层台，可能与汲取清水、清除淤泥和控制水量有关。在宫殿区内还发现多座大型水井，均为先挖一个井坑，以清除流沙，填土夯实后修建井筒，井筒下部用木结构井框，井框底部有长形木拼成的井盘，在井盘内侧，铺垫有厚0.2～0.3米的破碎陶片层，以过滤井水。这在当时来讲，已是很高的技术水平了。上述这种由输水管道、蓄水池、供水管道和汲水井构成的供水系统，当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又很科学的地下供水设施。是我们祖先了不起的发明。

夯土技术也是我们祖先的杰出创造之一。远在仰韶文化晚期就出现夯土城垣。在龙山文化时期，修建房屋地坪时，也已进行了夯筑。这便于对建筑基址的平整和加固，同时也起着保护人体健康的作用。而《墨子·辞过》记有："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

雪霜雨露，……。"说明原始的穴居、半地穴居，曾给人们以严重的潮湿危害，若居址夯筑，则有一定的防潮功能。另外，夯土还有较高的强度，不但可以修筑雄伟的夯土城垣，又可作为木构建筑的夯土基础，在商代已由过去的平面修整发展成为高出一般地面的台基。郑州商城的多组宫殿建设都坐落在夯土台基上，这是我国高台建筑的雏形，正符合"堂崇三尺"的文献记载。这种高台宫殿建筑，既有防潮、防水、通风性能，又有更重要的防御性能。

此外，为使殿堂台基和外围木结构免遭雨淋，采用了承檐屋盖技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保持建筑雄伟壮观的一种很成功的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高超的才能和智慧。郑州商城几座宫殿建筑，可复原为有回廊的重檐顶建筑，就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这也符合文献中的"四阿重屋"的记载。

郑州商城的宫殿与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宫殿，在建筑结构和建筑形式上是一样的，甚至连方向都是一致的，均为北偏东 20°左右。同时，两地的商城城垣营造技术、墓葬的埋葬习俗、青铜器、陶器和玉器的种类、形制、纹饰、风格也是一样的。这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商代二里岗期文化时期商代统一政权和疆域的认识，至少可以说，此时，商王朝已是南抵长江、幅员广大的国家。若考虑到江西清江县吴城和新干大洋洲商代二里岗期文化遗址与墓葬的发现，就可推知商王朝的影响，甚至扩大到赣水流域。

郑州商城宫殿分布在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这也开了以后各个王朝宫殿布局的先例。如汉魏洛阳城、宋代东京城(开封)、明清北京城的宫殿区，都位于城内中轴线的北半部；又如唐代长安城的宫殿区除在北半部外，城的东北部还有大明宫，在城内靠东偏北处有兴庆宫。由此可以看出郑州商城宫殿布局对后世的一些影响。

(三)郑州商城的手工作坊

1.铸造青铜器作坊和铸铜工艺

商代属于青铜器时代，是以生产和使用青铜器生产工具、兵器和容器为其标志的。在郑州商城，冶铸青铜器是一种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当时各类手工业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1954 年在南关外和北城墙外紫荆山北发现了两处铸铜作坊遗址。在这两处作坊遗址内，分别发现有当时进行冶铸的操作场地——粘附有一层铜渣的硬土面，硬土面上还有圆锥形的坑窝，很象是放置坩埚的地方。还发现有大量的坩埚残器和碎片、红烧土块、炼渣、木炭和数以千计的铸造各种青铜器的陶范。在作坊遗址范围内，还发现有非常简陋的半地穴式住室和一些小型房基，这些可能是在作坊劳动的奴隶居住的。由此可以看出，其生产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

当时熔铜的坩埚有三种，一种是用黏土堆制而成的，外部敷有较厚的草拌泥，椭圆形口，坩埚内外粘有一层铜渣，有的口部还有破裂痕，大概是由于高温而形成的。另一种是用泥质陶大口尊作胎改制的。改制时，在器壁内外涂有很厚的草拌泥，由于高温，器内壁变成青灰色，并粘有一层铜渣。还有一种是由砂质红陶缸改制的，其耐火程度比泥质大口尊高，所以只在外壁涂草拌泥，由于高温，缸的胎壁被烧成砖红色，内壁也粘有一层铜渣。

在大量的陶范中，能看出器形的有镬、铲、斧、刀、凿、锥等生产工具范，约占一半左右；

而镞、戈等兵器范较少；方鼎、圆鼎、鬲、斝、爵、觚、尊等容器范也占相当数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铸铜作坊遗址中，除了出土相同种类的陶范之外，在南关外作坊遗址中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镞范和镬范，而在北城墙外作坊遗址中则发现有较多的刀范和戈范。看来它们的产品还有些不同，从而说明，郑州商城的铸铜手工业作坊可能已有了一定的分工。

郑州商城铸铜作坊遗址中出土的陶范是一种"硬范"，商代用硬范来铸造青铜器，是一种先进的技术，远远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采用范铸法，第一步是先制模，模是用泥仿制要铸造的器物，并刻划上纹饰，经过烘烤而成。第二步是制外范，即用一定厚度的泥块贴在模的表面，用压力印出模的形状和纹饰，待泥半干时，选择适当部位，用刀切开。在切开的泥块之间附有三角形榫眼，使合范时各个范块能扣合紧密，然后晾干、烘烤、修饰内壁花纹，这样就翻制成外范。第三步是做内范，用泥先做成器物外形，然后依照要铸造器物的厚度刮去一层，再经过烘烤，这样就制成内范。通过预制在内、外范上的榫卯或支钉、定位销，使其在合范时不会发生移动或错位。在范面上涂一层涂料后，就可合范。最后在外面用泥加固，并留出浇口和冒口，再经过烘烤，就可用坩埚里的铜液进行浇铸。

在郑州商城内外的二里岗、杨庄、白家庄、东里路、铭功路、张寨南街、北二七路、人民公园、南关熊耳河、向阳回族食品厂、南顺城街等地，出土了一大批商代青铜器。除生产工具和兵器之外，还有很多青铜容器，其中有饕餮纹或夔纹圆鼎、夔纹扁足小圆鼎、饕餮纹大圆鼎、饕餮纹或乳钉纹大方鼎、夔纹或人字形纹鬲、饕餮纹或乳钉纹斝、弦纹或饕餮纹爵、弦纹或饕餮纹盉、龟形纹或羊首纹罍、牛首纹尊、素面或夔纹盘、饕餮纹或联珠纹觚、饕餮纹提梁卣、涡纹中柱盂和簋等。这些为研究我国商代青铜铸造工艺和独特的装饰技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在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表面，或多或少都遗留有铸造的痕迹，与铸铜作坊遗址出土的陶范相对照，不但可以证明这些青铜器是在郑州商城制造的，而且还有助于了解当时铸造青铜器的工艺。

大方鼎是用多范、分铸、嵌铸、分次浇注的多种方法铸造的。鼎耳与口沿相接处较光滑，看来鼎耳和鼎腹是同时铸造的。从鼎腹四壁纹饰看，凡横向纹饰的上下界线都是笔直相通的，没有一点歪曲或错缝的现象，而器壁外四角从口沿至底部均留有明显的铸缝，可知鼎腹是由 4 块完整的外范铸造的。铸鼎时，先铸造留有鼎足位置(四角各有一个圆孔)的腹底，然后把倒置的内范四周合上 4 块外范，再把铸好的腹底放在内范之上，合铸而成。四个鼎足是倒置嵌铸于鼎底上的。还有的大方鼎的铸造方法稍有不同，鼎腹是由 4 块角壁外范和 4 块中壁外范，以及 1 块腹底外范和腹内范合铸而成的。在郑州商城铸铜遗址中，就发现有铸造乳钉纹方鼎的外范残块。

由于大圆鼎的耳和腹有弧度，其铸造程序较方鼎复杂。鼎耳是分铸的，鼎腹从外壁铸缝看，上腹有 3 块外范，铸好的鼎耳嵌在上腹外范上，下腹也用 3 块外范与 1 块内范合铸。三个鼎足中，一足为浇口，另两足为冒口，是一次倒立浇铸而成的。

铜鬲是由 3 块外范和 1 块内范合铸而成的。鬲的裆底有范线的遗存。鬲腹的右侧有一道与鬲腹相垂直的青灰色凹槽，当为铸造时注入铜液的浇口，浇口为外宽内窄的小喇叭形，在连着器面的中间，有一个三角形脊棱，把浇口分成两个小凹槽，这样可以使铜液很快

流入范腔内。

铜斝是倒铸而成的。斝的一足尖端为浇口位置,因此,足端留有修补的痕迹。在郑州商城铸铜作坊遗址中发现斝的外范残块,腹与腰的界线分明,腹壁为凹入的圆弧形,与铜斝底部外沿的弧度相近,足呈三棱锥形。

从铜爵底部外壁看,有合范时的三条范线,可证明外范是3块、三条范线向外的一端与足的上端对应。流口间的矮柱,可能就是浇口位置。郑州商城铸铜作坊遗址出土有爵的外范和内范,外范为粉红色,铸面处为深灰色,范块之间相接的切面平直光滑,范内壁下凹成圆弧形,恰与铜爵外壁的圆弧相吻合;内范为褐红色,顶部为近椭圆形的平面,流口部分突起且狭窄,尾部呈尖圆形,侧面呈漏斗状。

铜盉器身外范3块、内范1块,顶部外范2块。流和鋬上有纵向合范线,说明是一次铸成的。器上部的后端凸起,应是浇口的遗存。

尊、罍、觚、盘等器物的铸造方法相同,都是倒铸的,浇口在圈足的底部。关于尊的牛首和罍的羊首等装饰的铸造,是把牛首纹或羊首纹凹刻在外范上,在内范相对应的位置上塑出不刻花纹的一块凸起,这样,合范铸成后,铜尊的牛首或铜罍的羊首就是凸出的。个别的牛首尊有扉棱,正好位于范线上,这很可能是由铜器表面遗留的合范铸缝逐渐发展变化而成的。

涡纹中柱盂是采用分铸法,先铸好中柱,然后放入盂内范中,再与3块外范铸成盂体,同时使中柱和盂身嵌铸在一起。

提梁卣的铸造颇为困难,是经过多次铸造而成的。先用2块外范铸好套环链,然后把套环链的一端在铸盖时与之相连,另一端穿以先铸的半圆形铜环和后铸的提梁;用4块卣体外范、1块卣体内范以及4块半圆形外范合成铸成带半圆环耳的卣体。铸提梁时,在卣体二环耳内各加一块小范,提梁浇铸后,除去小范,形成间隙,使提梁通过环耳和卣身相连,且又能活动。卣体是倒铸的,浇口是圈足底部。

通过对郑州商城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进行的成份含量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掌握了复杂的青铜铸造工艺,知道了用金属原料的多种配合方法冶炼青铜。根据含锑量差别较大,可以推知当时选用了不同地区的矿石。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器上承河南中西部地区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下启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青铜器,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2.烧造陶器作坊和制陶工艺

在郑州商城,烧制陶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1955年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的铭功路西侧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制陶作坊遗址。在约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14座排列有序的陶窑和10多座小型房基。陶窑大多数为圆形,个别为椭圆形。陶窑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窑室,下边是火膛和火门,中间以带圆孔的窑箅相隔,箅下有长方形土柱支撑,箅下可以烧火。因经高温火烧,窑壁内侧已变成砖灰色,向外渐成红色。在陶窑和房基附近,出土有一批陶垫子(又称"抵手")和陶印模等用于制造陶器的工具。陶垫子的面一般呈凸状或半圆形凸起,后部加有圆柱形或半环形把柄,在制作陶坯时,可以进行打磨或作垫子使用;陶印模则用来印制陶坯上的各式各样的花纹。还出土有大量的陶器碎片和烧坏的残破陶器,以及未经烧制的陶坯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发现

的大量陶器中,品种比较单一,多为泥质陶盆和陶甑,而夹砂陶器的鬲、甗、缸等却很少发现。由此可以看出,这处作坊是专门烧制盆、甑等泥质陶器的。这就证明,在当时,不但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同一种手工业内部,如制陶业,也已经有了固定的分工。作坊主生产如此大量的盆和甑决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进行产品交换,这显然是一种商品生产。

郑州商城出土最多的遗物就是陶器,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是考古断代的重要标志。在当时,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普遍使用陶器。从陶质上看,有泥质和夹砂的;从陶色上看,有灰陶、红陶、黑陶和白陶;从制法上看,有轮制的、模制的、轮模合制的和手制的;从器形上看,有平底器、圜底器、三足器、圈足器和器盖等;从用途上看,有炊器、饮器(酒器)、盛器、生产工具、雕塑艺术品和乐器等;从类别名称上分,陶容器有鬲、鼎、甑、甗、罐、斝、爵、觚、杯、豆、簋、盆、壶、大口尊、小口尊、盉、罍、澄滤器、瓮、钵、缸、器盖等20多种,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弹丸、垫子、印模等,雕塑艺术品和乐器有虎、猪、羊、龟、鱼、鸟及埙等;从纹饰上看,有绳纹、弦纹、篮纹、方格纹、圆圈纹、附加堆纹、人字纹、云雷纹、饕餮纹、乳钉纹等十几类。真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虽然郑州商城出土的陶器数量很多,但当时人们在使用时还是比较爱惜的。在郑州商城内中部偏西处,即天成路北侧的一个商代窖穴中,出土了20多件较完整的陶器,其中一件小口高领圆肩直腹瓮的腹壁破裂后,被当时的人们用白灰面之类的东西粘补过。这种修补陶器的现象在龙山文化晚期也有发现,表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陶器的修复技术。

能够代表郑州商城陶瓷工艺最高水平的是原始瓷器。它们用高岭土制成,火候高,质地硬,吸水性弱,敲起来近似金属声。器形多为尊,也有少量的罍和罐。胎为灰白色或黄白色,个别为灰绿色和浅褐色,多施青绿釉,少数为褐色釉或黄绿色釉。经化验证明,郑州原始瓷器与一般瓷器的胎骨相似,郑州的原始瓷釉与一般所谓的豆青色釉所含化学成份也相似。由此可见,郑州商城的原始瓷器已经接近一般的瓷器,这样,就把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提早到3500多年前,中国被全世界誉为"瓷的祖国",是当之无愧的。

3.磨制骨器作坊和制骨工艺

前面提到的郑州商城北郊的磨制骨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是1954年发现的。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出土遗物却非常丰富。在一个长方竖井形窖穴中,就出土了上千件骨器的成品、半成品以及带有锯痕的骨料和废料,还有一批磨制骨器的砺石和加工骨器的小型铜刀。骨器的成品和半成品绝大多数为骨簪和骨镞,也有少量的骨锥和骨针。由此可见,这是一处以生产骨簪和骨镞为主的手工业作坊。骨器和废料经过鉴定,除有牛骨、猪骨、羊骨和鹿骨外,半数以上竟是人的肢骨和肋骨。

1974年,在郑州商城东北部,即今东里路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院内的一条商代壕沟内,发现有三堆总数近百个人的头盖骨和少量的牛骨、猪骨,但没有发现人的肢骨和肋骨。不少的人头骨上有明显的锯痕,一般都是在眉骨和耳部上端横截锯开。经鉴定,多为青壮年男性,这些人可能是战俘。安阳殷墟发现有人头骨刻辞,而没有发现过带锯痕的头骨。但在一些文献中却有这样的记载,《战国策·赵策一》:"及三晋分智氏,赵襄

子最怨智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史记·大宛列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晋书》卷一百十五《载记》第十五"符丕、符登"条:"及垒陷,姚方成执而数之,〈徐〉嵩厉色谓方成曰……,方成怒,立斩嵩,漆其首,以为便器。"在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中译本195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古代斯基泰人在战争中,把他们最痛恨的敌人的首级,自眉骨处锯开,包上牛皮镀上金,当作杯子使用。有时也用与己不合的族人头骨做成杯子,用来款待客人,以证实自己的勇武。上述记载表明,在古代的中国和外国都有用人头骨做器物的。解放前,在我国西藏地区,也有用人头骨制作器皿的现象。由此推知,商代壕沟内带锯痕的人头骨,也是用来制作器物的,这里可能是商代制作人头骨器皿手工业作坊的一个废料堆。联系到商城北面磨制骨器手工作坊遗址中的半数人骨,使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奴隶们生前像牛马一样劳动,一但被奴隶主折磨死或残遭杀害之后,他们的骨骼还要被做成各种工具和器皿,这充分暴露了商代奴隶社会的残酷。

除了上述骨器之外,在郑州人民公园出土有双股骨簪和顶端雕刻有小鸟等图形的骨簪。在郑州商城内外,还发现一些象牙器和蚌制品。如1955年夏初,在郑州白家庄的商代墓内,出土有象牙觚和象牙梳。象牙觚呈椭圆筒状,颈部和下腹部各有一周凹槽。象牙梳下部有10个梳齿,制作相当精致。蚌制品除常见的蚌刀、蚌镰外,1956年2月在郑州铭功路西侧的商代墓内,出土了6串蚌珠,共计1000多颗。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的制骨手工业产品还是比较丰富的。

(四)郑州商代墓葬

1.商代铜器墓

据初步统计,在郑州商城内外,发现有19座铜器墓。其中人民公园3座、白家庄3座、铭功路4座、河南省中医院家属院1座、黄河医院1座、黄委会人防工程1座、黄河河务局1座、黄委会43号院1座、二里岗1座、北二七路3座。墓内除出土有铜器外,还有陶器、玉器和其他随葬品。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1954年3~4月,在郑州商城西墙外人民公园内先后发掘了20座商代墓葬,其中有3座铜器墓。这3座墓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25,长2.07米,宽0.76米,深0.86米。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北。墓底中部有一长方形腰坑。墓内随葬有铜爵、铜刀、铜镞、原始瓷尊、陶盆、玉柄形器、卜骨及带有锯痕的加工骨。M9,长3.1米,宽1.1~1.5米,深2.7米。骨架已朽,葬式不明。墓底中部有长方形腰坑,腰坑底部有红色朱砂。随葬有铜壶、铜戈、铜镞、铜饰、玉器、石斧、石戈、贝和加工蚌壳。M9时代较晚,应属商代晚期。M15,长2.35米,宽0.95米,深2.65米。方向朝东。有棺椁痕,墓主骨架已朽。椁内殉葬一个青年女性,屈肢,椁外殉葬一只狗。随葬器物有铜钺、铜戈、残铜器、铜片、玉璜、带孔玉器。从出土的器物形制看,M15也属商代晚期。

1955年5月和9月,在郑州白家庄发掘了一批商代墓葬,其中3座为铜器墓。这3座墓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2,已被破坏,残长1.5米,宽1.05米,深1.06米。方向朝北。有棺痕,墓主人骨架已朽,墓底铺有厚约0.01米左右的朱砂。随葬器物有铜罍、铜爵、

铜鼎、铜斝、铜盘、象牙觚、玉柄形器、绿松石饰、涂朱圆陶片。其中铜罍的颈部有三个龟形图案装饰，可能是族徽，唐兰先生曾考释为“黾”字，若这种考释正确，那么这就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了；铜爵的底部有烟熏痕，流口处粘附有编织物痕迹；铜斝的表面粘附有白色编织物痕和木痕；涂朱陶片通体磨光，一面涂朱，商代墓中常见，这可能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带有避邪之意的祥瑞之物。M3东部被破坏，长2.9米，残宽1.17米，深2.13米。墓室底部四周有熟土二层台，正中有长方形腰坑，坑内殉一狗，仅存肢骨和肋骨。墓室内有棺椁痕，椁长2.2米，宽约1.1米，棺长1.85米，宽0.6米。墓底及腰坑内皆铺朱砂。棺内人骨架已朽，仅在北端发现有牙齿和残头骨。在墓内西边二层台上，有一具头向北、面向下稍偏西的俯身葬骨架，应是殉葬的奴隶。这座墓内随葬品丰富，绝大多数放置在二层台的西南角上，计有铜鼎、铜鬲、铜斝、铜爵、铜觚、铜罍、铜簪、玉璜、玛瑙环、残石器、涂朱陶片、涂朱蚌片。这是郑州商代墓葬中目前所见的形制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墓葬，墓内殉葬奴隶也是商代前期少见的现象。M7也被破坏，墓内有较低的二层台。墓底铺有朱砂，并隐约可见有棺灰，人骨架已朽无存。随葬品有铜爵、铜斝、铜凿、铜戈、石戈、玉戈、玉圭、玉柄形器、涂朱圆陶片和贝等。

1956年3月和1965年2月，先后在郑州铭功路一带发掘了一批商代墓葬，其中有4座铜器墓。这4座墓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146，长2.26米，宽0.58～0.7米，深1.35米。墓向朝南。墓底铺有一层朱砂，有棺痕，人骨架为仰身屈肢，头向南、面朝西。人骨架下有一长方形腰坑，腰坑内殉葬一只狗。墓内随葬有铜鼎，出土时底部有烟熏痕，还有陶鬲、陶爵、陶斝、陶饼、玉柄形器等。M148，长2.32米，宽0.7米，深1.35米。墓向朝南。墓底铺有朱砂，有棺痕，人骨架为仰身直肢，头向南，面朝西。墓底中部有一长方形腰坑，坑内殉一只狗。随葬器物有铜爵、陶豆、陶鬲、陶觚、陶盆、陶斝、陶饼、骨匕、骨饰、玉饰、玉带饰、蚌饰及海蚌等。M2，长1.9米，宽1.35米，深0.65米。墓底铺有厚约1.5厘米的朱砂，还有类似棺板腐朽后残存的木漆片等。人骨架为俯身直肢，头向南。墓内随葬器物比较丰富，计有铜斝、铜爵、铜觚、铜戈、铜刀、玉戈、玉璜、玉璧、玉柄形器、原始瓷尊、陶盆、涂朱圆陶片、绿松石、骨器以及由1000多颗蚌珠串成的6条项链。其中铜斝在出土时器表有熏痕，器内有水锈痕；铜鼎在出土时器外腹部和底部也均有烟熏痕；原始瓷尊出土时，已成碎片，并散置墓底各部，这种现象在其他商代墓也曾发现，推测在随葬时就已经打破，这与墓内挖腰坑、墓底铺朱砂、墓内随葬涂朱圆陶片等一样，是商代埋葬习俗之一。M4，长2.08米，宽0.69米，深0.55米。人骨架多已朽，但仍可看出为头南足北的仰身直肢葬，面部偏向西侧。墓内随葬品有铜爵、铜觚、玉璜、玉饰、涂朱圆陶片等。其中铜爵在出土时，底部有烟熏痕。

1971年9月，在河南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内发现了1座商代墓。因被破坏，墓葬形制、葬式等均无法得知，仅发现有一件铜盉和一件铜爵。其中铜盉造型奇特，上有圆顶，顶的前部斜伸着管状长流，顶后部有鸡心状口，鋬在足的上部，深腹，分裆，下附三个袋状空心锥足，颈部饰三道弦纹。

1975年3月，在郑州黄河医院院内发现1座商代墓（M32）。该墓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南北长约1.8米，东西宽0.5米。骨架无存，仅有零乱的碎骨头。墓内随葬器物有铜爵、铜

斝、陶鬲、陶簋和陶器盖。其中铜斝在出土时器底外部有烟熏痕，内底有白色水锈。器盖较特殊，为大敞口，沿外卷，腹内收，平底，底部正中立一空柱握手，外形象盘，又象浅腹盆，有人称之为空柱盘或空柱盆，但据其作用看，应是器盖。这是郑州商代铜器墓中较早的一座。

1979 年 6 月，在东里路和顺河路之间，黄委会挖防空洞时，发现了 1 座商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39)，长 1.7 米，宽 0.44 米。骨架已乱。出土器物有铜鼎、铜斝及残玉戈。

1979 年 9 月，在郑州二里岗发现 1 座商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2.05米，宽0.55米，深0.95米。方向为南偏东20°，骨架已朽，仅存一段腿骨。随葬器物有铜斝、铜爵及残玉柄形器。

1982 年 11 月，在郑州北二七路中段路东，发掘了 3 座商代铜器墓。1 号墓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2.7米，东西宽1.4～1.5米，残深0.15米。墓底铺有 1 厘米厚的朱砂土，还存有板灰痕迹。人骨架已朽，仰身直肢，头北足南，面向西。人骨架下有一长方形腰坑，腰坑内殉葬一只狗。墓内随葬品较多，有铜鼎、铜斝、铜爵、铜觚、铜刀、铜片、玉戈、玉铲、玉柄形器、玉璧、玉饰、石戈、石铲、石柄形器、石钵、骨匕、骨簪、骨镞、牙饰、涂朱圆陶片等。其中石钵为白色粗砂石制成，口微敛，方唇，深腹稍鼓，圜底，口径 16 厘米，高10.2厘米，是罕见的石制品。2 号墓距 1 号墓仅0.2～0.4米，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2.7米，东西宽1.1米。墓底铺有 1 厘米厚的朱砂土，也有少量棺板灰痕迹。人骨架仅存下肢骨，仰身直肢。人骨架下有一近正方形的腰坑，腰坑内殉葬一只狗，狗骨架已朽。墓内随葬品有铜斝、铜刀、玉柄形器、石戈、石铲、涂朱圆陶片、印纹硬陶尊等。其中印纹硬陶尊在出土时，皆为碎片，并铺在墓底南半部。还有 4 号墓，位于 1 号墓和 2 号墓南约 6 米处，墓中出土有铜爵和几件陶器。

1997 年，在东里路中段以北和顺河路中段以南的黄河河务局宿舍工地，发掘出一座商代铜器墓(M6)，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1.1米。为 3 人合葬墓，均为俯身直肢葬，头向东。中间 1 人为男性，身上身下均铺撒大量朱砂。北侧 1 人为女性，右手上举。南侧 1 人为儿童，双手交叉捆绑于头顶部。在墓东北侧随葬 1 件铜鬲，在墓南侧中间，随葬有铜盉、铜戈、玉柄形器和涂朱圆陶片各 1 件，并有骨镞 30 余个，在墓中间男性胸颈部，挂有 1 串由 90 余枚海贝和 1 块绿松石组成的串饰。从随葬器物形制看，这是目前郑州商代铜器墓中最早的一座。

1997 年，在顺河路西段北侧黄委会 43 号院，发掘出一座商墓(M1)，南北长 2 米，东西宽0.5米，随葬青铜鬲，还有玉璧、玉饰等。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除上述 19 座铜器墓外，在人民公园出土有饕餮纹铜尊和爵，在商城东北角的白家庄出土有饕餮纹铜斝、盉、觚、罍，在南城墙外的郑州卷烟厂出土饕餮纹铜盉，在南关外出土有饕餮纹铜觚，在熊耳河边出土有弦纹铜盉和爵，在城东南角杨庄一带出土有 X 纹铜鬲、弦纹铜鬲和饕餮纹铜爵，在二里岗一带出土有饕餮纹铜斝、罍和镬、凿等。另在郑州商城内外还搜集到很多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应为商代墓内的随葬品。

2.小型墓葬

小型墓葬也是长方形土坑墓，不过规格比铜器墓略小，一般长约 2 米，宽约0.6米。随

葬品多用陶器，如鬲、斝、豆、鼎、盆等器。有的还用骨器或玉饰等物。也有少数墓无随葬品。葬式以仰身直肢者居多，俯身葬较少。

郑州商代遗址的二里岗期灰坑或灰层中，还发现一些没有墓圹、没有随葬品的死者。有的5具成人骨架与2具孩童骨架分四层埋在一起；有10数个成人骨架与数架猪骨分层合埋在一个灰坑；也有4个成年人骨、4个人头和1副猪骨架分三层合埋在一起。在城墙的发掘中，发现狗坑9个，每坑埋狗6至23只。有一个坑中，狗架下面还埋有人骨架2具。这些死者的身份应属奴隶或战俘。

（五）郑州商城的其他考古发现

多年来，郑州商城先后发掘出3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如1975年在西城墙北段外侧300余米处的张寨南街距地表6米处，发掘出一座青铜器窖藏坑，坑的直径约2米，2件大方鼎东西并列，端正地放置在一起。由于1号鼎较高，就把其下的生土面挖低一些，特意使两鼎上面的口沿平齐。在2号鼎内还放置1件青铜鬲。1982年在东南城角外的向阳回族食品厂，也发掘出一座青铜器窖藏坑。坑口距现今地表5米多，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7米，南北宽1.62米。坑内有13件青铜器口对口并列或套装放置在一起。包括大方鼎2、大圆鼎1、扁足圆鼎2、牛首尊2、羊首罍1、提梁卣1、觚2、中柱盂1、盘1，其中坑的南半部有7件，坑的北半部有6件。窖藏坑的旁边还有同期的3个长方形坑，其中2个还埋有残缺牛骨架。1996年在西城墙南段外侧约50米处的南顺城街，又发掘出一座青铜器窖藏坑。距地表5米处，坑口呈长圆形，东西长2.1米，南北最宽处约1.8米。坑内放置大方鼎4，以及簋、斝、爵等共12件青铜器。坑的底部和铜器上面的堆积中都铺有一层朱砂。这3座窖藏坑，皆在城墙外侧不远处，底部都坐落在生土上，青铜器放置井然有序，且都有成双成对的大方鼎，有的坑旁还有牛骨架坑，有的还铺有朱砂，这些均与祭祀有关，而且放置时十分从容。其时代前两个窖藏坑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南顺城街窖藏坑为二里岗上层二期，有的铜器可能更晚一些，说明郑州商城使用的时间更长。

在郑州商城内外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玉簪、玉璜、玉玑、玉戈、玉铲、玉璋、玛瑙环、玉柄形器、玉饰等玉器。有白色的、淡黄色的、青色的、墨绿色的，光泽晶莹，是商代的艺术珍品，也反映了商代前期相当高的制玉工艺水平。

在郑州商城东北角内侧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内，出土了一团极薄的金箔片，展开之后是一件罕见的夔龙纹金叶，很可能是镶嵌在某种漆器上的装饰（在河北省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中曾出土过镶嵌绿松石的漆器残片）。这说明商代的奴隶们不但在冶铸青铜工艺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还掌握了黄金的冶炼技术并能制成精美的艺术品。

在郑州商城白家庄商代墓出土的铜爵和铜觚器表上，遗留有用麻布包裹的痕迹。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能够纺线的陶纺轮和石纺轮，能够缝衣的骨针和骨锥；也发现有竹席和竹篮的痕迹，其编织方法与现在的芦苇席、竹篮的编织法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当时的纺织技术和编织技术工艺已经具有相当水平了。

在陶器和铜器中，有相当数量的酒器，显示了酿酒手工业的发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以致能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可以用来酿酒。铜斧、铜刀、石

斧、石刀、石铲、石镰、蚌刀、蚌镰、骨铲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出土,以及许多石杵、石臼等谷物加工工具的发现,为研究商代的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郑州商城的铸铜、制骨、制陶等有一定分工的手工业作坊,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商品生产出现的。郑州商城还发现过只有海里才有的鲟鱼甲和海贝。而铜矿石、锡矿石、黄金、玉料、绿松石和象牙等,郑州地区也不出产。其中有一些可能是远方进贡来的,另一些则是与远方交换的。郑州白家庄商代墓内,曾出有460多枚穿孔贝,也许就是当时使用的货币。《尚书·酒诰》中提到的商代有些人是"肇牵牛车,远服贾",可能就是当时进行贸易交换的写照。

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数量较多的卜骨和少量的卜甲,表明占卜已成为奴隶主贵族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惜的是,还没有发现象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甲骨文)。只是在郑州二里岗遗址中发现过2片习刻字骨,一片上只有一个"㞢"字,另一片上有"又土羊乙丑贞从受十月"10个字;在郑州商城内出有"玉劦"、"劦玉"等少量字骨。我们有理由期望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能找到一定数量的甲骨卜辞,从而真正打开郑州商代文化宝库的大门。

反映当时精神生活的除了一些装饰品、工艺品之外,还发现有吹奏乐器——石埙和陶埙,这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埙一样,展示了我国音乐发展源远流长。

三、郑州商代二里岗期文化的分期

商代二里岗期延续时间较长,地层堆积很厚,遗迹、遗物相当丰富。在50年代郑州二里岗遗址发掘之时,考古工作者曾根据该地区商代遗址的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和陶器等遗物特征的明显不同,将郑州商代二里岗遗址划分二里岗期下层和二里岗期上层两大期。随着对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发掘面积的扩大和新的地层关系的出现,以及各层出土陶器特征的一些变化,有些学者在原来划分为二里岗期下层和二里岗期上层前后两大期的基础上,又细分为二里岗下层一期、二期和二里岗上层一期、二期等前后四期,或二里岗期下层一段、二段和二里岗期上层一段、二段等前后四段。这些反映了对郑州商代二里岗期文化研究的新水平。通过对郑州商城典型遗址考古学年代分析,再参照已发表的资料如《郑州二里岗》[1],《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2]等,可以确定与郑州商城关系最密切的郑州商代二里岗期文化的分期。如在二里岗发掘的H9、H10、H14[3],郑州商城城墙夯土内或被城墙所压的灰沟中[4]所出的陶片,可以作为二里岗下层一期的代表。二里岗的H2甲、H15、H17、H18[5],与城墙有关的CWM7、CWM8、CWM9和C8H22[6]等出土的陶片可作为二里岗下层二期的代表。二里岗的H1、H2乙、H13乙[7],与城墙有关的CNM15、C8M10、C8H21[8],以及郑州市人民法院灰坑内[9]所出的陶片,可以作为二里岗上层一期的代表。郑州白家庄遗址上层[10]和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T5、T6二层[11]所出陶片可作为二里岗上层二期代表。其主要特征是:

二里岗下层一期:陶器中的鬲和甗都为卷沿圆唇;斝的颈部瘦细而较长,颈与腹相接

处稍显有折线；豆的圈足细高，且中部内凹有镂孔；爵的椭圆形口近平，有流、尾，腹部瘦细，平底；盆有鼓腹圜底盆和大敞口深腹斜壁平底盆；簋为敛口，深腹圆鼓，下附圈足；大口尊的口径略小于肩径，肩部凸起，在肩部的附加堆纹条带之间，多加有对称的兽面形握手，有的腹部还加饰几周附加堆纹带条。该期青铜器数量较少，有爵、斝、盉、鬲等四种。其中爵有素面爵，颈部饰弦纹爵，以及颈部饰弦纹、乳钉纹爵；斝有无柱顶帽、圆鼓腹、素面斝，还有与此相似但颈部饰窄凸线弦纹和方格纹的斝，有颈部饰两周窄凸线弦纹的青铜斝；鬲为折沿，颈内收，深腹，分裆，袋状空足并有锥状高足尖。总之，铜器器壁较薄，纹饰简单。属于此期的遗存有东城墙、西城墙下压的灰沟，属于此期晚段的遗存有正在修建的四面城墙，城内东北部的9号房基（C8G9）、探方62（C8T62）的夯土台基和紫荆山路中段西侧民族小区的夯土房基F1，还有黄委会青年公寓的夯土墙基（CW22）。这是属于郑州商城的始建阶段。

二里岗下层二期：陶胎较一期稍厚，器表绳纹稍粗。除卷沿圆唇鬲外，新出现一种数量较多的卷沿双唇鬲，即在唇面中部有一折棱，形成内厚外薄的双唇沿；陶甗除一期的卷沿圆唇外，新出现了卷沿双唇和唇沿加厚的方唇；陶斝颈部皆加粗变短，呈弧形内凹，且袋状也较前稍直而略鼓；爵的腹部多变短而稍胖；陶豆的圈足中部稍向内收，圈足底部稍外侈，圈足中部多有对称的十字镂孔装饰；陶盆除少量和一期类同的敛口、圆鼓腹的圜底盆外，新出现了较多的直口、腹近直的圜底盆和大敞口、卷沿、浅腹圜底盆；陶簋为敛口，鼓腹，圜底，下附矮圈足，部分簋的颈部有加饰弦纹或方格纹带条；大口尊的颈部较一期加长，肩部凸起部分变低，口径一般大于肩径或与肩径相等，但在肩部只饰一周附加堆纹带条，很少再加饰兽面形握手。该期的青铜器种类增多，有爵、斝、盉、鬲、鼎、觚等6种。铜爵为窄长流，三棱体双柱顶帽作半月形，束腰，平底，三棱锥状足，腰部饰细弦纹或三角纹与方格纹或细线饕餮纹与联珠纹；铜斝有的为圆腹，圜底，颈部饰弦纹与联珠纹斝，有的为圆柱顶帽，腹略鼓，平底弦纹斝；盉为袋状足，外壁较直，颈部饰窄凸线饕餮纹；鬲为方棱体圆拱耳，肥胖袋状空足，饰弦纹和人字纹；鼎有直口，折沿，深腹略鼓，圜底弦纹鼎，还有颈部饰目纹的鼎；觚形体短粗，饰细线饕餮纹。此期，郑州商城城墙已经筑好，并开始修建南城墙外侧和东城墙南段、西城墙南段外侧的外城墙。城内东北部有15号房基及其周围的夯土台基，16号房基及其周围的夯土台基，以及11号、12号、14号房基等宫殿建筑均已使用。同时在北大街农业队宿舍区夯土基址（F1、F2、夯土Ⅵ、夯土Ⅶ）、黄河河务局、黄委会水文局、黄委会幼儿园、郑州皮毛工艺厂、郑州回民中学、紫荆山路民族小区F1、郑州变压器厂家属院均有这时期夯土台基。南关外铸铜作坊、紫荆山北制骨作坊、铭功路制陶作坊也已经使用。在东南城郊的杨庄，在城内的东里路还发掘出这时期的铜器墓。这一切反映了郑州商城已进入使用和发展时期。

二里岗上层一期：陶器胎壁一般较厚，器表绳纹较粗，但绳纹印痕比较清晰。陶鬲口部多为卷沿近折，其唇部有的下垂形成方唇，也有的沿面带一周似子母口的凹槽，袋状足稍直而鼓，颈部多饰有二周划纹或圆圈纹装饰；陶甗也多为卷沿近折，其唇部有的为方唇，也有的沿面中间为内凹的子母口，均为细腰，袋状足斜直瘦细；新出现一种敛口斝，窄方唇；陶爵有流无尾，腹部近直，底稍平；陶豆多作厚胎，浅盘，假腹；陶盆有直口直壁圜底深

腹盆和大敞口折沿圜底浅腹盆；陶簋为直口，直壁，圜底下加圈足；大口尊均是大敞口，方唇，长颈斜向内收，肩微鼓接近消失，腹部细长，肩部饰一周附加堆纹，有的上腹部饰一周竖凹槽的窗棂纹。本期的青铜器种类最多，有爵、斝、盉、鬲、圆鼎、方鼎、扁足鼎、觚、尊、罍、盘、盂、卣等10多种。爵多为长流，短尾，颈斜而内束，腹略鼓，底较平，下附三锥状足，流口间有半月形顶帽的矮双柱或圆鼓形顶帽的双柱及独柱，颈部饰弦纹或饕餮纹；斝为大敞口，长颈向下内收，鼓腹，平底或微鼓，三锥状空足，口沿前部有二柱，口沿后部的颈与腹间有扁体弧形鋬；鬲为敛口，卷沿，深腹，袋状足加高足尖；鼎有大型方鼎、大型圆鼎、圜底深腹锥状足鼎和浅腹扁足鼎；觚为大敞口，长颈，细腰或粗腰，平底，下有喇叭形圈足座，座上有镂孔；罍的颈与肩有折棱，深腹略鼓，下附带镂孔的圈足，也有的颈与肩无明显分界；此外，大敞口折肩鼓腹圈足尊、素面盘、中柱盂、提梁卣也别具一格。此期，郑州商城城墙继续使用。过去的宫殿建筑有些仍在使用。城内东北部又修建了10号房基和8号、13号房基等宫殿建筑，靠近东城墙的郑州医疗机械厂有101号、102号等大型建筑基址，省中医学院家属院、黄委会幼儿园、黄河中心医院、黄河河务局、郑州丝钉厂、黄委会43号院，也都发现出这一时期诸多的夯土建筑基址。在宫殿区内还有大型石砌蓄水池、石砌供水管道、木结构框架的水井等供水系统。此外，在城中部偏东的郑州电力专科学校，也发现有大型建筑夯土台基和水井，说明宫殿区范围已经扩大。原有的铸铜、制陶、制骨作坊仍在生产使用，并在北城墙外新建一座铸铜作坊。在东里路和顺河路，以及城郊的白家庄、杨庄、郑州烟厂、二里岗、北二七路、铭功路、人民公园发现有铜器墓葬。在西城墙北段外侧的张寨南街和东南城角的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了该期偏晚些时的青铜器窖藏祭祀坑。展示了这一时期郑州商城人口较多、高度繁荣的景象。也正是在二里岗上层一期时，郑州商城已经拥有王都的地位。

二里岗上层二期：陶器的形制较大，胎壁明显加厚，绳纹更粗，但印痕变浅。陶鬲均为折沿，沿面斜上伸，唇部下垂折成方唇，颈部已绝少饰圆圈纹；陶甗口部唇沿多呈方折状，有的沿面还有一周凹槽，腹部圆鼓，袋状足更细瘦；陶斝的内折棱上多有一周凹槽；陶爵腹身上加长，底部已由平底发展成圜底；陶豆为浅盘，圈足座皆为上下粗而中间稍细的内凹弧形；陶簋为敛口，折沿，深腹下部圆鼓，下附矮圈足。陶盆多为大敞口，折沿，浅腹，圜底；大口尊为喇叭形口，方唇，长颈斜直，肩部微鼓，腹部加长，腹壁近直，有的在上腹部刻划竖条窗棂装饰，有的在肩部饰对称兽面形握手。本期铜器数量减少，有爵、斝、觚、鬲、尊、罍等。铜爵流较弯曲，尾较短，腹圆鼓，底部已稍成圜形，流口间双柱高且柱顶圆鼓；斝为大敞口，长颈内收，腹圆鼓，底部微凸近圜，口沿边双柱较高，柱顶饰涡纹；鬲为敛口，沿外卷，方唇，分裆，肥胖袋状足，矮圆锥状足尖；鼎为大口，沿外折，方唇，深腹略鼓，圜底，三锥状空足；觚为大敞口，长颈，束腰，平底，下有喇叭形圈足座，座底部周边有折棱，腰部饰饕餮纹，圈足上饰夔纹并有3个十字镂孔。此期已是郑州商城从繁荣走向衰落，发现有西城墙南段外侧的青铜窖藏祭祀坑，人民公园和白家庄发现有该期墓葬。在白家庄和郑州医疗机械厂一带发现有文化层和灰坑。在黄河河务局发现有灰坑和狗坑。在紫荆山路南城墙旁边发现有文化层、绳纹板瓦和丛葬坑。在紫荆山路中段，发掘出一段东西向的夯土墙，其长度已达百米以上。在黄委会1号高楼宿舍区发现有夯土遗存。在宫殿区范围内多处

发现绳纹板瓦，当与建筑有关(图二)。表明此期郑州商城仍有商王室活动。

图二 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陶器分期图

四、典型遗址考古学年代分析

(一)城墙

有关城墙的资料，主要依据已发表的郑州商城试掘简报和发掘报告，如北城墙C8T27、东城墙CET7、南城墙CST3和CST4、西城墙CWT5，以及1997年配合旧城改造打通紫荆山路，在南城墙开挖的探沟资料，将其地层关系整理如下。

1.北城墙

以C8T27[12]——北城墙东段探沟为例的地层情况：

农耕土和扰土层

↓

战国时期文化层和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

↓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

↓

商代夯土城墙

↓

洛达庙期灰坑

↓

龙山文化层

↓

生土层

战国时期文化层和战国时期夯土城墙，直接倾斜叠压着商代城墙外侧(即北侧)的夯土层。战国时期文化层在上，包含有战国时的绳纹板瓦、筒瓦片和盆、豆、碗等陶片。战国时期夯土城墙在下，夯土坚硬，夯层清晰，在每层夯面上均有很浅的圆形平底夯杵印痕，夯层内出土战国陶片。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以北高南低倾斜叠压着商夯土城墙内侧。该层曾清理出同期的5座小型房基、7座小型墓葬和8座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其中有两座墓和两座狗坑的底部破坏了商代城墙内侧近底根处的夯土层。文化层内出土有折沿鬲(有的颈部饰有圆圈纹)、敛口斝、长颈大口尊、有流无尾爵、矮圈足簋、浅盘假腹豆、深腹粗绳纹罐、缸、甑等陶片，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被二里岗上层文化层所叠压，其下又直接压着商代夯土城墙内侧近底根处。该层含有卷沿双唇鬲、敞口斝、短颈大口尊、卷沿甗、深腹盆、圆唇捏沿小口尊、

有流有尾爵、高圈足簋、深盘真腹豆、长颈小口瓮、深腹细绳纹罐和缸、甑、器盖等陶片，属二里岗下层二期。

商代夯土城墙，被直接压在战国时期文化层和二里岗上层及下层文化层下面。现存城墙顶宽近12米，底部宽近20米，残高约近4米，系用红色粘土并夹杂一些砂土及遗址灰土夯筑成的。土质坚硬，夯层清晰，每层夯土面上皆布有密集的圆形尖底或圜底的夯窝印痕。城墙夯土内有少量碎陶片，多为绳纹，也有篮纹和方格纹，能辨认出器形的有罐、瓮、豆、钵、缸和鼎足，有属龙山文化的，也有洛达庙期的和二里岗下层一期的。

洛达庙期灰坑，被直接压在商代城墙靠北部的夯土层下面。平面近似椭圆形，口径1.06～2米，深0.80米。坑内出土有大口尊、罐、瓮、豆、缸等洛达庙期陶片，还有1件铜器残片。

龙山文化层，也是被压在商代城墙靠北部的夯土层下面，又被上述洛达庙期灰坑所打破。文化层内包含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鼎、罐、瓮、盆等陶片，器表饰有绳纹或篮纹或方格纹。

2.东城墙

①以CET7[13]——东城墙北段的探沟为例的地层情况

农耕土层

↓

战国时期文化层和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

↓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

↓

商代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下层小沟及洛达庙期灰土沟

↓

生土层

战国时期文化层和战国夯土城墙，也是战国文化层在上，战国夯土城墙在下。出土有战国时期的绳纹板瓦和盆、碗、豆等陶片。直接倾斜叠压在商代城墙外侧（即东侧）夯土层上。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作东高西低倾斜堆压在商代城墙内侧（即西侧），其东部还直接压在城墙夯土层上。除包含有鬲、斝、大口尊、豆、鼎、盆、钵、缸、簋等二里岗上层时期陶片之外，还出有原始青瓷片和白陶片，以及石器、骨器、蚌器、鹿角、木炭粒、烧土块等遗物。还清理出属于该层开口的两座小型商代墓和一个埋有完整猪骨架的椭圆形坑。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它被二里岗上层文化层所叠压，其下还直接叠压着商代城墙内侧近底根处的夯土层。文化层内出有鬲、大口尊、豆、瓮、缸、罐等二里岗下层二期的陶片。

商代夯土城墙,它的外侧(即东侧)被直接叠压在战国时期文化层下,内侧(即西侧)被直接叠压在二里岗上、下层文化层下。现存城墙顶宽约10.6米,底宽21米多,残高5.4米。其夯筑结构与北城墙相同。夯土层内出有鬲、罐、瓮、大口尊、缸等陶片和坩埚碎片。从陶片的形制和纹饰看,多为洛达庙期,也有少量为二里岗下层一期。

二里岗下层小沟及洛达庙期灰土沟,分别压在商代城墙靠西侧和中部的夯土层下面,沟均为南北向,与城墙平行。西侧沟内堆积浅灰土,包含有二里岗下层一期陶片。中部的沟内堆积较硬的浅灰土,包含有洛达庙期陶片。

②1983年配合东里路东端与城东路连接打通工程,对东城墙进行发掘,即CET8[14],其位置在CET7北边约百余米处,其地层关系为:

农耕土

↓

宋代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

↓

商代夯土城墙

↓

黄沙土层

商代文化层,分布在城墙内侧(西侧),其上为宋代文化层,其下部分布着商代夯土城墙。由黄灰土(在上)和深灰土(在下)组成,出土遗物相同,有长颈大口尊、折沿鬲、敛口斝、小口尊、瓮、罐、盆、刻槽盆、豆、甗、缸、器盖等,多属于二里岗上层一期。

商代夯土城墙,其东侧(外侧)被取土挖土相当部分,直接露在外面,夯层看得很清晰。现存残宽10.75~11.6米,高1~2.9米。夯土十分坚硬,每层夯面上都有很薄的一层黄沙。夯土内出有方唇绳纹罐、圆唇绳纹罐、方格纹罐、短颈大口尊、瓮、盆等陶片,少量为二里岗下层一期。

黄沙土层,高于城墙内外的地面,原来应是一条沙土岗子,城墙就其高而修建,可视为城墙下面的一部分。

3.南城墙

①以CST3、CST4[15]——南城墙中段偏东的两条合二为一的探沟为例的地层情况:

扰土层

↓

宋代城墙堆积层

↓

战国时期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

↓

商代夯土城墙

↓

南关外期文化层及壕沟和灰坑

↓

生土层

宋代城墙堆积层，堆积相当厚，分布在商代夯土城墙内侧（即北侧）的上面，有经过夯打的痕迹。出土有大量唐代和宋代的瓷片、砖、布纹瓦片等遗物。

战国时期夯土城墙，位于探沟南半部，直接叠压在商代城墙外侧（即南侧）下部的夯土层上面。与商代城墙相接处，还留有许多铁铲修整的痕迹。夯土内有战国时期瓦片和陶片。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仅在 CST3 内发现此层。被叠压在宋代城墙堆积下面，作南高北低倾斜状堆积，其下叠压着商代城墙内侧底部夯土层。该层还包括一个商代二里岗期下层的长方形窖穴，均出土有二里岗下层二期的陶片、石器、骨器等遗物。

商代夯土城墙，被压在宋代城墙堆积层、战国夯土城墙和二里岗下层文化层之下。夯筑结构同于北城墙和东城墙，夯层明显，似乎更坚硬一些。现存顶宽10.8米，底宽22.4米，残高5.7米。在城墙内侧下面，发现有宽2.3～2.5米，深0.55米，与城墙平行的沟槽，与修筑城墙有关。夯土层内包含少量碎陶片，有饰绳纹的或饰篦纹的，但看不出器形。

南关外期文化层及灰沟和灰坑，位于商代夯土城墙内侧边缘处的下面，当修筑商代夯土城墙时破坏了上述文化层的一部分。该文化层下又压着两条同期的灰沟和一个灰坑。文化层内和灰沟、灰坑填土内，包括有大量南关外期的鬲、瓮、盆、大口尊、罐、甑等陶片。在灰沟 1 的底部还埋有一个侧身屈肢的人骨架。

②1997 年，在配合郑州老城紫荆山路打通工程，在南城墙开挖了南北长 35 米，东西宽 6 米的探沟 4 条，其地层关系为：

扰土层

↓

战国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

↓

商代夯土城墙

↓

生土层

战国夯土城墙，位于城墙外侧（南侧），其下压着部分二里岗上层文化层和商代夯土城墙。夯层面上有较大的圆形浅夯印，夯土内有绳纹瓦片和战国陶片。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也位于城墙外侧（这与其他城墙探沟内所见二里岗上层文化层方向不同，多是在城墙内侧），该层似可分两个层次，上面出有大口尊、鬲、罐，属二里岗上层二期，同时出有 3 块绳纹板瓦。而下面则出有不少长颈大口尊、折沿方唇同心圆鬲、假腹

豆、敛口斝、浅腹盆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商代夯土城墙，夯层较薄，夯窝密集，土质纯净，建筑异常坚固。该段城墙现存顶部宽7米，底部宽22.5米，高5.5米。城墙底部也有与之平行的宽5.9米，深0.4米的沟槽。城墙夯土内没有发现陶片。夯土城墙下压生土层。

4.西城墙

以CWT5[16]——西城墙中段的探沟为例的地层情况：

扰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时期文化层和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
↓
商代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下层灰沟
↓
生土层

宋代文化层，其堆积位于探沟偏东端上部，其下压着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和商代城墙内侧(即东侧)夯土层。该文化层内出土有唐宋瓷片和瓦片。

战国时期文化层和夯土城墙，位于探沟西部即商代夯土城墙外侧。战国文化层在上，战国夯土城墙在下，出有绳纹瓦片和战国时期陶片等。战国夯土城墙还直接压着商代城墙外侧的夯土层。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在探沟东部，其上为宋代文化层所压，其下部分叠压着商代城墙内侧夯土层上。还清理3座同期的灰坑。均出土有二里岗下层二期的陶片。

商代夯土城墙，被压在宋代文化层、战国夯土城墙和二里岗下层文化层的下面。其建筑结构与前述北、南、东城墙相类似。现存城墙顶宽约6.6米，底宽19.35米，残高5.15米。在城墙内侧壁面上有横木版筑痕迹。夯土层内出有鬲、瓮、罐、器盖等碎陶片，属于洛达庙期或二里岗下层一期。

二里岗下层灰沟，被压在商代城墙内侧夯土层边缘的下面。沟作南北向与城墙平行，宽0.8~1米，深0.7~0.8米。沟内填红褐色土和淤土，质地较硬，出土有盆、罐、大口尊等陶片，以及螺壳、木炭屑、草拌泥等，属洛达庙期和二里岗下层一期的遗物。

综合上面有关郑州商城四面城墙的地层叠压关系，可以归纳为：

农耕土和扰土层
↓
宋代文化层和城墙堆积层

↓

战国时期文化层和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上层一期文化层、房基、灰坑、墓葬和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

↓

二里岗下层二期文化层及灰坑和墓葬

↓

商代夯土城墙

↓

二里岗下层一期小沟

↓

南关外期文化层及灰沟和灰坑或洛达庙期的灰沟和灰坑

↓

龙山文化层

↓

生土层

在这些地层关系中,商代夯土城墙是介于二里岗下层二期和二里岗下层一期之间,即不会晚于二里岗下层二期,也不能早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其始建年代约在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阶段,使用时间应是从二里岗期下层二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二里岗上层二期。

5.外城墙

从1953年到1955年,在郑州凤凰台经二里岗到南仓西路以西,经过发掘或钻探,发现夯土城墙遗存,长约2100米[17]。夯层清楚,夯窝明显,墙宽约25米,高1.8~3.75米。1986年,在郑州火车站以南的振兴商场(今银基商贸城),发现南北向的夯土城墙墙基,宽约16~17米,高约2~2.3米。该墙向北延伸至兴隆街和福寿街北段(即东方红影剧院门前)[18]。1991年至1992年在三德里和花园新村(即布厂街东侧),又发掘出夯土城墙遗存,宽13.5~14米,高0.8~1米[19]。1994年,在郑州饭店工地发掘出长约58米的一段外城墙,宽16米,高1.9米(包括基槽)。其夯土为红褐色,土质坚硬,较纯净,夯层面上布满密集的圆形尖底夯窝印。夯土内包含物很少,其中有细绳纹鬲足和斝、瓮、钵、簋、鬶等碎陶片。城墙下还压有龙山文化层,该层土色深灰,出土有篮纹、方格纹和细绳纹陶片,能看出器形的有罐、碗等。

据已发表的资料和1994年郑州饭店发掘资料,综合外城墙的地层关系为:

现代扰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商代夯土城墙

↓

垫土层
↓
龙山文化层
↓
生土层

宋代文化层为黄灰土堆积，出有布纹瓦片和白釉、青釉瓷片。

商代夯土城墙内出有夹砂红陶罐、泥质灰陶豆、泥质灰陶钵、细绳纹鬲、褐灰陶簋圈足及碗、斝、瓮、鬶等陶片，还有夹砂方格纹陶片、篮纹陶片、粗绳纹夹砂灰陶片、绳纹泥质灰陶片。有些为洛达庙期的，有些为二里岗下层的。夯土城墙的建筑结构与郑州商城城墙相类似，可以推断其始建年代与郑州商城相近或稍晚一点。可暂定为二里岗下层二期。

垫土层在商代夯土城墙下，可能是修建城墙时铺垫而成，但在垫土层内未见包含物。

龙山文化层，仅在郑州饭店工地发现，出有罐、碗及篮纹、方格纹和细绳纹陶片。

（二）宫殿

有关郑州商城宫殿的资料已发表的有第10号夯土基址及其周围遗迹、第15号夯土基址周围遗址、第16号基址，还有黄河医院、郑州回民中学、省中医院东里路家属院、郑州医疗机械厂、黄委会食堂工地、黄委会水文局、郑州变压器厂、郑州电力学校等，还有近年发掘尚未发表或发掘仍在进行的黄河河务局、紫荆山路民族小区、黄委会1号高楼宿舍、东里路东段北侧北大街农业队宿舍区、郑州皮毛工艺厂、郑州丝钉厂的资料。主要分布在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少量在郑州商城北部偏中、中部偏南、东部偏中的地方。

1. **东里路东段北侧1号院内第10号夯土基址（C8G1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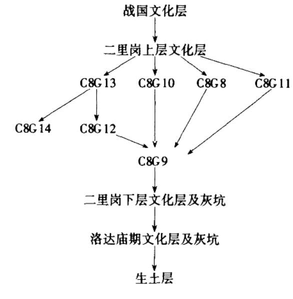
农耕土
↓
宋代文化层
↓
汉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
↓
二里岗上层壕沟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C8G10）
↓
淤土和生土层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出有大口尊、盆、瓮、鬲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二期。

二里岗上层壕沟，打破了 C8G10，壕沟内有不少带锯痕的人头骨。出有盆、瓮、大口尊、鬲、罐等陶片，亦属二里岗上层二期。沟内还出有绳纹板瓦片。

商代夯土建筑即 C8G10，该基址有 10 多层堆积。在现存的 1～5 层房基地坪内，出有大口尊、小口尊、盆、缸、罐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在 C8G10 旁边（主要是西侧）还有 6 座残破夯土基址，在它们的下面压有二里岗下层或洛达庙期的文化和灰坑。与 C8G10 算在一起，其地层叠压和相互间打破关系为：



鉴于 C8G13 压在二里岗上层二期文化层下面，又打破二里岗下层二期文化层和 C8G12、C8G14，C8G8、C8G11 被二里岗上层二期文化层叠压，又打破二里岗下层二期文化层和 C8G9，其时代可属于二里岗上层一期。而 C8G12、C8G14 均下压有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和洛达庙文化层，又被 C8G13 打破，可定为二里岗下层二期晚段。而 C8G9 被 C8G8、C8G10、C8G11、C8G12 打破，其下又压着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和洛达庙期文化层，可定为二里岗下层二期早段或二里岗下层一段晚段。

2. 东里路西段南侧黄委会水科研究院内第 15 号夯土基址（C8G15）[21]

耕土层和扰土层

↓

宋代黄细砂土层

↓

战国文化层

↓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及灰坑

↓

二里岗下层灰坑及墓葬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C8G15)

↓

洛达庙期文化层

↓

生土层

战国文化层为浅灰土层,出有战国绳纹厚瓦片等。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为深灰土层,出有假腹豆、粗绳纹罐、簋、缸、小口尊、小口瓮、盆、钵、鬲等陶片,最晚者为二里岗上层一期。还发现同期一个不规则形灰坑(C8H50),口径约1.15米,深2米以上,打破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出有浅腹盆、折沿小口尊、鬲等陶片。

二里岗下层灰坑及墓葬,均打破商代夯土建筑基址。灰坑为C8H49,坑口呈椭圆形,口径0.85~1米,深0.76米,出有卷沿鬲、小口尊、深腹盆等陶片。属二里岗下层二期晚段。墓葬为C8M36,该墓北部被战国文化层破坏,墓内随葬敞口斝、高柄豆各1件,属二里岗下层二期晚段。

商代夯土基址(C8G15),其夯筑结构与城墙相同,夯土层内包含有红陶罐、绳纹罐、深腹盆、缸等,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

洛达庙期文化层,在C8G15北部,被夯土基址基槽挖破,出有洛达庙期各类陶片。

在C8G15旁边的东南侧和西南侧,以及稍稍远一点的西南部和南部,均发现有夯土基址(分别在C8T55、C8T60、C8T61、C8T62、C8T67)。有的被晚期破坏较甚不能成形,有的只经钻探没有发掘,详情不明。它们上面有农耕土和扰土层、宋代文化层、汉代文化层、二里岗上层和下层文化层及灰坑,其下为洛达庙期文化层或生土层。这些夯土基址也应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与C8G15相同。其中C8T62内的夯土基址也可能稍早一些。

3.城北路中段南侧省中医研究院内第16号夯土基址(C8G16)[22]

农耕土和近代砂土层

↓

宋代文化层和壕沟

↓

战国文化层及墓葬、灰坑

↓

二里岗上层灰坑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C8G16)

↓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

↓

洛达庙期文化层

↓

生土层

二里岗上层灰坑，近似直筒形，压在战国文化层下，打破了夯土基址西部边缘，并打破了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和洛达庙期文化层。坑内出有长颈大口尊、浅腹盆、瓮等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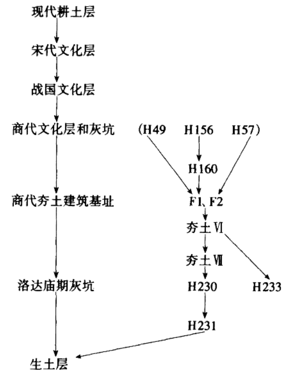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C8G16)出土有短颈大口尊、卷沿小口尊、卷沿绳纹罐、小口瓮、深腹盆、鼎足等陶片，最晚的一些属二里岗下层二期。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出有瓮、罐、大口尊等，可定为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

洛达庙期文化层，出有罐、瓮、甑、鼎足等洛达庙晚期陶片。

4.东里路东段北侧北大街农业队宿舍区(原为菜地)商代夯土建筑夯址

这里位于C8G10东面100多米处，发掘出商代夯土基址18处，地层关系较为复杂，不少尚看不出形状，仅F1、F2，可看出是长方形，目前仍将继续进行发掘。其地层关系为：



商代文化层和H49、H57、H156、H160约为二里岗上层一期，而F1、F2约为二里岗下层二期偏晚，夯土Ⅵ、夯土Ⅶ约为二里岗下层二期偏早或一期偏晚，而H233、H230、H231可能为洛达庙晚期。鉴于这一带尚需进一步发掘，因此，商代夯土建筑基址的年代待发掘结束及^{14}C测年之后，方可最后确定。

5.郑州医疗机械厂商代夯土建筑基址[23]

发掘地点在该厂西院，而发现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101、F102、F103位于西院南半部。其中较完整的为F101。

表土层

↓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101)

↓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

↓

生土层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出有长颈大口尊、瓮、浅腹盆、敛口斝、折沿深腹绳纹罐等,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101),为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31.2米,南北宽11米。在房基南部边缘留有石柱础9个,北部边缘留有石柱础4个。房基为红色夯土,夯层明显,但在夯土层内未发现遗物。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被二里岗上层文化层和F101打破和叠压,出有卷沿束颈绳纹罐、圆唇捏口尊、圆唇直口瓮等陶片,属二里岗下层二期。

F102与F101情况相类似,它们的时代约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早段。而F103被F101打破,且夯层内有颈尊大口尊和深腹绳纹罐陶片,其下坐落在生土层上,因此,F103时代稍早于F101,约为二里岗下层二期偏晚段。

6.郑州回民中学商代夯土建筑基址(91F12)[24]

该校位于东里路东段南侧和城北路中段北侧,东邻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北部操场钻探出的宫殿基址,与第10号夯土基址相距不远。这次发掘位于学校南部。其地层关系:

现代扰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91F12)

↓

河相堆积层

战国文化层,为灰褐土,出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和较多的战国筒瓦、板瓦片。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91F12),被压在宋代文化层和战国文化层下。已发掘的面积东西19.5米,南北12米。在基址北侧发现两排相距较近的石柱础,北排3个,南排4个。夯土层内出有少量残陶片,包括有罐、小口尊、鼎、缸等,约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偏晚段。与其套接叠压的还有91F11、91F13,其地层关系是91F11打破91F12,91F12又打破91F13,发掘面积均不很大,其时代也应为二里岗下层。

河相堆积层,此层压在91F12下面,厚度在3.4米以上,因见水无法再向下挖。土色灰褐,土质松软,在其上部有一道东南——西北向的石头堆积带,厚达2米多。河相堆积层内出有罐、瓮、盆、小口尊等陶片,属于二里岗下层。

7.省中医学院东里路家属院商代夯土基址[25]

①该处位于东里路东段南侧与城北路东段北侧之间,1992 至 1993 年,在南半部发掘出商代夯土建筑基址 F1、F2、F3,其中 F2 较为完整,其地层关系为:

近现代扰土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
↓
河相淤土堆积
↓
生土层

战国文化层,除出有一批战国陶片之外,还有不少商代绳纹陶片。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1 东西残长 30 米,南北宽 13 米,发现多排、多个柱础坑,西部夯土厚达 4 米,是在处理地基时平整低洼河相堆积所致。夯土内多有商代碎陶片。F2 位于 F1 西侧,相距 3 米。南北残长 20 米(两端均在探方外未发掘),东西宽 8 米,发现柱础 3 排,夯土层内有商代碎陶片。F3 位于 F1 南侧,又被 F1 打破,大部分压在探方南壁之下,其范围不清楚,夯土面上未见柱础石。此外还发现 2 眼商代水井,出有鬲、盆、大口尊、罐、小口尊等陶片。从出土物看 F1、F2、F3 和水井的时代应属于二里岗上层一期。

河相淤土堆积,为黄沙土、水锈土淤土层,包含陶片极少。商代夯土基址修建时,对该层进行处理。

②1994 年至 1995 年,在北半部又发掘几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其地层关系为:

农耕土
↓
近代黄砂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5、F16 等)
↓
商代灰坑及商代残夯土堆积
↓
洛达庙期灰坑
↓

生土层

战国文化层,范围较大,出土一些绳纹板瓦、筒瓦和其他陶片。其下压商代文化层和商代夯土建筑基址。

商代文化层,面积较小,分布不均,包含有鬲、斝、罐、瓮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5,仅发掘出该基址的南部边缘,东西残长20余米,发现一排9个柱础坑,从夯土内包含物看,应为二里岗上层一期。F16,南北长25米,东西宽16米,夯土厚1.2米。地坪有上南北向7排柱础槽,每排有柱础槽14个。亦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在商代夯土建筑基址下,打破或叠压有二里岗上层一期灰坑,以及二里岗下层二期灰坑和残夯土。最下面,还发现个别洛达庙期灰坑。

8.郑州丝钉厂商代夯土建筑基址

该处位于城北路东端南侧,其地层关系为:

表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及灰坑

↓

商代夯土建筑及水井

↓

(其下未作)

战国文化层,出有碗、罐、盆等战国陶片和绳纹板瓦、筒瓦片。

商代文化层和灰坑,为二里岗上层二期。其中H30为不规则圆形。口径2米,深0.6米,除出有折沿鬲、斝、盆、瓮、簋、罐等二里岗上层二期陶片外,还出有数量较多的绳纹板瓦,瓦表面为粗绳纹,内壁为麻点,宽窄不一,与其他陶片应该同时,这在郑州商城宫殿区内已有多次发现,当与建筑有关。

商代夯土建筑有夯1至夯4,其中夯1和夯4多压在城北路下,情况不明。夯2为东西长条形,长70米以上,宽2.2~2.3米,其上有55个长条形小柱础坑,可能是廊一类的建筑。夯3东西长40余米,北部压在城北路下,宽度不详,发现17个圆角方形柱础槽,长宽在1~1.4米之间,中间有直径0.4米左右的木柱灰痕,其下有石柱础。从其夯土内包含物看,应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在夯2东南侧,还发现同时期的大型商代水井。

9.郑州变压器厂家属院商代夯土基址[26]

该处位于郑州北大街南段东侧,为郑州商城中部偏南处,发现一处商代夯土基址,地层关系为:

扰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

↓

生土层

战国文化层,出有绳纹瓦片,以及盆、罐、瓮等战国陶片。直接压在商代文化层和商代夯土建筑之上。

商代文化层,部分叠压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出土有长颈大口尊、折沿鬲、盆、罐、甗、器盖等陶片及原始瓷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范围较大,东西长 37 米左右。南北宽 7 米以上。主要是红色夯土,也有一些含灰土较多的灰色夯土和含黄沙较多的黄色夯土。出有绳纹碎陶片,约为二里岗下层二期。

10. 郑州电力学校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1)[27]

这里位于郑州商城中路东段南侧,属郑州商城东侧稍偏南。其地层关系为:

近现代回填土层

↓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及水井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1)

↓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

↓

生土层

二里岗上层文化层,出有折沿鬲、夹砂罐、大口尊、小口尊、盆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开口于该层下的有水井 J3,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井口长2.1米,宽1.3米;井底长2.68米,宽1.42米;井口距地表2.7米,距井底7.8米。井下部有木构井框,底部有 4 块粗大长方形木拼成的井盘。井底铺垫有0.20~0.25米厚的破碎陶片,有相当数量的小口尊,以及大口尊、鬲、盆、罐等。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

夯土建筑基址(F1),东西残长 34 米,南北宽 20 米,残高仅0.1~0.3米,其上部被破坏无存。夯土内出有鬲、盆、小口尊等,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二里岗下层文化层,压在 F1 下,分布面积较小,堆积甚薄,仅包含有红烧土粒和炭层屑。暂定为二里岗下层时期。

11. 郑州紫荆山路北段西侧民族小区夯土建筑基址(F1)

农耕土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及灰坑(H6)
↓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1)
↓
洛达庙晚期灰坑(H18)
↓
生土层

商代文化层和灰坑(H6)出有大口尊、小口尊、罐、盆、豆、簋、甑、瓮、缸等,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

商代夯土建筑基址(F1),被战国文化层破坏相当部分,还有部分为商代文化层和灰坑所叠压打破。夯土层内含有大口尊、鬲、罐、盆、器盖等,约为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

洛达庙晚期灰坑(H18),包含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还有夹砂灰陶和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器形有鬲、盆、大口尊、罐、簋、缸、器盖等,属洛达庙晚期,有人认为这些陶器还明显地受到山西光社文化和黄河以北辉卫文化的影响。

12.宫殿区内商代夯土墙基

发现于黄委会食堂和1号高楼宿舍范围内,为东北——西南走向,两处相连接,长度近百米。

①黄委会食堂部分(发掘25.2米,钻探50多米)[28]

表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和灰坑
↓
商代夯土墙基(W22)
↓
洛达庙期文化层和灰坑
↓
生土层

战国文化层,分布面较广,厚达1.2~3.2米,出有很多绳纹板瓦、筒瓦片,以及印纹圆瓦当、米字纹空心砖和瓮、盆等陶片。

商代文化层和灰坑(H35),出有大口尊、鬲、盆、瓮等陶片,属二里岗下层二期偏晚。

其下叠压或打破夯土墙基。

商代夯土墙基(W22),宽6.9~7米,厚1.4~2.4米,夯层厚10~15厘米。夯层内出有二里岗下层一期的罐、大口尊、小口尊、鼎、盆、簋、缸、刻槽盆、瓮、器盖、甗等陶片,也出有洛达庙晚期的花边口沿罐、鼎足、鼎腹、豆盘、盆等陶片。说明 W22 是属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段的夯土墙基。其下压有少量洛达庙期文化层和 1 个灰坑(H73),大部分都坐落在生土上。

②黄委会 1 号高楼宿舍部分(发掘近 10 余米,其南段被一个二里岗期上层二期灰坑打断):

表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和灰坑
↓
商代夯土墙基
↓
洛达庙文化层和灰坑
↓
生土层

战国文化层堆积厚0.2~0.45米,出有绳纹板瓦、筒瓦片等。其下叠压着商代的文化层灰坑、夯土墙基、夯土基址、水管道等。

商代文化层和灰坑,从二里岗上层二期至二里岗下层二期均有发现,还发现有二里岗上层二期的夯土遗存。

商代夯土墙基,宽7.65~8.3米,厚2.25米。出有盆、罐、鼎、小口尊、大口尊等陶片,最晚为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其时代即为此。其下还压有洛达庙期的几座灰坑。

13.郑州商城宫殿区内商代输水设施

在黄河中心医院、东里路东段北侧北大街农业队宿舍区、黄委会 1 号高楼宿舍、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等处,均发现有商代输水设施。大致为西北——东南走向,到郑州医疗机械厂垂直向西南拐弯。有的是石板砌筑的蓄水池,有的为石板砌筑的输水管道,并有汲水井或控制水量的插木板闸阀等设施。

①黄河中心医院商代石板蓄水池地层关系[29]

表土层
↓
战国文化层及灰坑和夯土遗迹
↓
商代文化层

↓

商代石板蓄水池

↓

商代文化层

↓

生土层

战国文化层、灰坑和夯土遗迹，这一带可能是战国的建筑遗存，出土有不少空心砖、方砖、筒瓦、板瓦、瓦当和其它战国陶片，其中一些豆柄和豆盘上，印有“亳”字等陶文。

商代文化层，土色深灰，土质较硬，出有大口尊、瓮、簋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遗物。

商代石板蓄水池，为长方形，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20米，下为1米厚的铺垫土层，再用石板平铺，池边砌有石块。

商代文化层，被石板蓄水池壁叠压和打破，深灰土，出有鬲、大口尊、捏口尊、亦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这样可推断石板蓄水池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此外，在石板蓄水池北侧，还发现2座并列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夯土建筑基址，均呈东南——西北向。一座长25米，宽10米，其上有18个料礓石柱础。另一座长23米，宽约10米，发现圆柱础槽7个，间距2.3～2.5米，槽内底部均有石柱础。

②东里路东段北侧北大街农业宿舍区商代输水管道地层关系

表土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

↓

商代输水管道

↓

（其下未作）

商代文化层，浅灰土，出有鬲、罐、瓮、小口尊等陶片，为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

商代输水管道，已发现长约40米，由地下石板筑水管道、夯土和汲水井三部分组成。从夯土内包含的陶片来看，属于二里岗上层一期。

③黄委会1号高楼宿舍商代输水管道地层关系：

表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夯土和灰坑（H2、H3、H35）

↓

商代输水管道

↓

商代灰坑（H60、H69、H104、H105）

↓

生土层

该处输水管道已发掘长20余米，为坐落在生土的倒梯形沟，底部和两壁均经夯筑，顶部盖石板。

战国文化层在这一带普遍存在，出有绳纹板瓦、筒瓦和其他战国陶片。

商代灰坑H2、H3、H35，均为打破商代输水管道的灰坑，在商代输水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灰夯土。灰坑和灰夯土内出土有折沿鬲、盆、斝、罐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

商代输水管道所出有折沿颈饰同心圆鬲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商代灰坑H60、H69、H104、H105，均被商代输水管道打破，约属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

④郑州医疗机械厂商代石板砌输水管道地层关系：

表土层

↓

战国文化层

↓

商代输水管道

↓

（以下未作）

仅发掘4米多长，其两端尚压在探方外的房屋下，为东北——西南向，与东里路东段北侧北大街农业队宿舍区商代输水管道相似但方向垂直。

战国文化层较厚，出有绳纹板瓦、筒瓦和盆、豆、瓮等战国陶片。

商代输水管道，其上部被战国文化层破坏严重，仅存输水管道底部石板和两侧壁3—5层石板。从残留出土陶片看，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14.其他商代夯土建筑基址

在顺河路黄委会43号院发掘2座二里岗上层一期夯土基址；在东里路中段郑州皮毛工艺厂和黄委会幼儿园，发现二里岗上层一期和二里岗下层二期的夯土基址；在顺河路中段黄河河务局宿舍区发掘二里岗上层一期和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夯土基址；在城北路黄委会水文局发掘二里岗下层二期的夯土建筑基址。

（三）手工作坊遗址

1.铸铜作坊遗址：

共发现两处，一处在南城墙外约600米处，被称为南关外铸铜作坊[30]；另一处在北城墙外300多米处，被称为紫荆山北铸铜作坊[31]。

①南关外铸铜作坊地层关系

农耕土层（上层）

↓

商代文化层(中层即1甲层和1乙层)

↓

商代文化层(下层即2~5层)

↓

生土层

商代文化层(中层即1甲层1乙层),为铸造青铜器的场地,还有窖穴和熔铜炉残底,并出有长颈大口尊、敛口斝、盆、壶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还出有与铸铜有关的铜矿石、炼铜坩埚、炼渣、木炭屑、各种陶范和少量铜镬、凿、镞及铜容器残片。这应是南关外铸铜作坊兴盛时期。

商代文化层(下层即2~5层)内出有卷沿鬲、敞口斝、短颈大口尊、盆、罐、缸、甗、鼎、小口尊、簋、豆、爵、罐、器盖等陶片,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也发现铸铜有关的窖穴等遗迹,还有铜矿石、坩埚、炼渣、木炭屑以及各种陶范等遗物。这应是南关外铸铜作坊起始阶段。

②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地层关系:

农耕土层(上层)

↓

扰土层(中层)

↓

商代文化层(下层)

↓

生土层

商代文化层内出有折沿鬲、长颈大口尊、折沿深腹罐、浅盘豆、盆、瓮、爵、小口尊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并发现有与铸铜有关的房基、铸铜场地、窖穴等遗迹,还有铜矿石、铅块、坩埚、木炭、炼渣、陶范,小件铜器等遗物。

2.制陶作坊遗址

该遗址位于郑州商城西城北段外约1300米处[32],即今铭功路西侧郑州第十四中学院内。其地层关系综合为:

农耕土

↓

商代文化层(人民公园期)

↓

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岗期上层)

↓

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岗期中层)

↓

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岗期下层)

(其下有水未作到生土)

商代文化层，出有折沿短颈浅腹矮裆鬲、宽沿浅腹平底盆、甑、瓮等陶片，属商代晚期的郑州人民公园期。

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岗期上层)，发现陶窑4座、墓葬6座、灰坑17个，出土有陶垫子、陶印模等制陶工具，还出有颈部饰同心圆鬲、敛口斝、浅盘豆、盆等陶器，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岗期中层)，发现房基17座、陶窑10座、制陶白灰地坪场地3处、储陶器坑1个、灰坑40个，墓葬22座。出有陶垫子、陶拍子、陶印模等制陶工具，还有折沿方唇鬲、敞口斝、浅盘豆、宽流无尾敛口重沿爵、中颈大口尊、盆、簋、直口瓮等陶器，其时代似乎介于二里岗下层二期晚段和二里岗上层一期早段之间。是制陶作坊的兴盛期。

商代文化遗存(二里岗期下层)，发现有灰坑10个，墓葬1座。出有鬲、斝、爵、大口尊、豆、甗、盆等陶器，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

3.制骨作坊遗址

郑州商城的制骨遗存有两处，一处为紫荆山北(今新华社河南分社院内)制骨遗存[33]，另一处为东里路1号院制骨废料堆[34]。

①紫荆山北制骨遗存：

位于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北120米处，在1座长1.9米，宽1米的竖井形窖穴中，发现了上千块经锯、磨过的骨镞、骨簪等成品、半成品、骨料和废料，还有用于磨制骨器用的砺石11块，伴出的陶片属二里岗下层二期。

1983年，又在该窖穴东南部数十米处进行发掘[35]，其地层关系为：

农耕土

↓

扰土层

↓

商代文化层(浅灰土)

↓

商代文化层(深灰土)

↓

生土层

商代文化层(浅灰土)，出有长颈大口尊、折沿颈饰圆圈纹鬲、浅腹盆、刻槽盆、折沿罐、带耳簋、有流无尾爵、敛口斝、浅盘假腹豆、甗足等，多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同出还有骨簪、骨锥、卜骨、加工鹿角和废骨料，加工骨架用的砺石、小铜刀等，又有铜块铜渣等遗物。

商代文化层(深灰土)，出有短颈大口尊、卷沿鬲、深盘石、小口尊、瓮、器盖等，属二里岗下层二期。还出有骨簪、卜骨、加工鹿角、废骨料、碎铜块、铜渣等。

1983年，还在经五路省保险公司工地发掘，这里距紫荆山北制骨遗址200多米[36]。其地层关系为：

农耕土层

↓

黄沙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汉代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灰土)

↓

商代文化层(黄花土)

↓

生土层

商代文化层(灰土),包括10个同期灰坑。出有盆、罐、长颈大口尊、饰同心圆纹折沿鬲、簋、浅盘豆、瓮、缸、敛口斝、刻槽盆、器盖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还出有骨镞、骨锥、骨簪、骨梳和大量的带锯痕的牛、猪、鹿等废骨料及磨制骨器的砺石等。

商代文化层(黄花土),包括一些灰坑、灰沟。出有盆、卷沿深腹罐、卷沿鬲、小口直领瓮、缸、碗等陶件属二里岗下层二期。还出有几件骨镞、骨簪等,但未见废骨料。

综合以上3处发掘,应是属于制骨作坊范围,可以看出,是从二里岗下层二期偏晚到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进行生产使用的。

②东里路1号院制骨废料堆

这里实际上是堆积在打破C8G10的一条壕沟内的近百个人头骨,其中不少带锯痕。似为加工人头器皿的废料遗存。沟内伴出的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二期。

(四)商代青铜器窖藏坑

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有3处,一处在西城墙北段外侧的320米处的张寨南街[37],一处在东南城角外50多米远的向阳回族食品厂[38],一处在西城墙中段外侧50米南顺城街路西边[39]。

1.张寨南街商代青铜器窖藏坑

扰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汉代文化层

↓

商代文化层

↓

商代青铜器窖藏坑

↓

生土层

商代文化层为浅灰土,出有长颈大口尊、折沿鬲、盆、小口尊、小口瓮等陶片,属于二里

岗上层一期偏晚。商代青铜器窖藏坑，直径约2米，放置有大方鼎2、铜鬲1。坑内填土中出有折沿鬲、长颈大口尊、浅腹盆、短颈瓮、折沿罐、浅盘豆、壶、簋、甗、器盖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2.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

农耕土

↓

明代文化层

↓

宋代文化层(晚)

↓

宋代文化层(早)

↓

商代文化层

↓

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及灰坑 H1、H2、H3、H4

↓

生土层

商代文化层内出有长颈大口尊、折沿鬲、盆、瓮、缸等陶片，约为二里岗上层二期早段。H1除放置13件青铜器外，填土中还有长颈大口尊、缸、绳纹罐、深腹盆、鬲足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H2内发现一具残缺的牛骨架，还出有长颈大口尊、大口罐、深腹盆、瓮、折沿饰同心圆鬲、折沿饰粗绳纹附加堆纹鬲、簋、缸、甗、瓮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H3出有浅腹盆、甗、缸、长颈大口尊、折沿饰同心圆鬲、敛口斝、小口尊、夹砂绳纹罐等，属二里岗上层一期。H4出有长颈大口尊、绳纹罐、大口瓮、小口瓮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早。从上述推之，向阳回族食品厂商代青铜器窖藏坑约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段。

3.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

扰土层

↓

宋代文化层

↓

商代青铜器窖藏坑(H1)

↓

生土层

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坑口呈东西长、南长窄的不规则形(也可能原为长方形坑，遭坍塌或其他原因而变形)，坑口距地表约4.9米，开口于宋代文化层下。坑深4.26米，直接坐落在生土之上。坑内大致可分上下两层堆积。上层为12件青铜器和回填窖藏时所形成的文化堆积，还包含有折沿鬲、夹砂罐(尊)、盆、簋、大口罐，应属二里岗上层二期。但从铜器上分析，个别铜器接近于殷墟早期。下层堆积是在放置青铜器前形成的，有大量的鬲、甗、小口罐、尊、壶、豆、夹砂罐、罍、瓮、盆、簋、大口尊、器座、器盖等陶器，属二里岗上层二期。

(五)墓葬

1.白家庄墓区

这一带发现商代墓葬20余座,其中随葬铜器墓不多,有C8M2、C8M3、C8M7[40]等,地层关系为:

表土层
↓
商代文化层(黄灰土)
↓
C8M2、C8M3
↓
商代文化层(深灰土)
↓
生土层

商代文化层(黄灰土),出有长颈细腹大口尊、折唇颈带同心圆纹饰鬲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二期。C8M2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出有铜罍、爵、鼎、斝、盘各1件,并有象牙觚、绿松石、玉柄形器、涂朱圆陶片等;C8M3亦为长方竖穴土坑墓,有人殉1,随葬有铜鼎1、鬲2、斝2、罍1、觚2、爵1,还有玉璜、玛瑙环、涂朱陶片、涂朱蚌片等。从出土的青铜器特征看,C8M2、C8M3约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也有人认为应属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早。

商代文化层(深灰土),出有短颈粗腹大口尊、卷沿绳纹鬲陶片,应为二里岗下层二期。

此外,还有C8M7,墓底铺有朱砂,随葬有青铜爵2、斝1、凿1、戈1,以及石戈、玉戈、玉圭、玉柄形器、涂朱圆陶片等。从铜器的形制看,当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在白家庄一带,还出土有铜觚、罍、盉、斝等,亦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应与墓葬有关。而白家庄墓区的其它商代墓,也都是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或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早,说明,这一带在当时是郑州商城的一处重要墓地。

2.人民公园墓区

这里已发现商代墓葬19座,其中C7M9、C7M15、C7M18、C7M25等随葬有青铜器[41],其地层关系为:

①C7M15

殷商文化层
↓
C7M15及多座殷商墓
↓
商代灰坑(H6)

殷商文化层,出有矮裆鬲、腹底内缩簋等,相当于殷墟文化时期。

C7M15,墓内有一人殉,出有铜钺、戈、残铜器和铜片,还出有玉璜、玉戈、带孔玉器等,其年代为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晚或更晚一些。另几座殷商墓内出有大口罐、罍、簋、豆、壶、鬲等陶器,时代要比二里岗上层二期再稍晚一些。

商代灰坑(H6),出有大口尊、周壁近直的簋、折沿颈饰圆纹的高足鬲等陶片,为二里

岗上层一期。

②C7M25

殷商文化层

↓

殷商灰坑

↓

C7M25

↓

商代文化层

殷商文化层和灰坑，出有厚胎矮足浅腹鬲等陶片，属殷墟文化时期，晚于二里岗上层二期。

C7M25随葬有铜爵1(窄流尖尾，流口处有二矮柱，平底下附3个三棱形锥足，腰饰三周弦纹)、铜刀1、铜镞1，还有陶斝、盆、原始瓷尊、玉柄形器等。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

商代文化层，出有鬲、斝、盆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通过以上论述，再参考C7M18出的铜戈，以及人民公园1954年和1961年在人民公园出土的两件铜尊，1958年出土的1件铜爵。可以看出这一带是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时期又一处重要墓地。

3.铭功路墓区

这里先后发现10余座商代墓，其中M2、M4[42]和C11M146、C11M148等随葬有青铜器。其地层关系为：

①M2

表土层

↓

M2

↓

H21

↓

生土层

M2，揭去表土后即露出墓口。出土铜斝2、爵2、鼎1、觚、1、刀1、戈1，还有玉璜、玉戈、玉柄形器，以及釉陶尊、陶盆、涂朱圆陶片、蚌珠串饰、绿松石等，从器物形制上看，属二里岗上层一期早段。墓内填土中有折沿陶片，亦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H21，为商代灰坑，出大有甑、瓮、盆等陶片，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偏早。

②M4

表土层

↓

M4

↓

商代灰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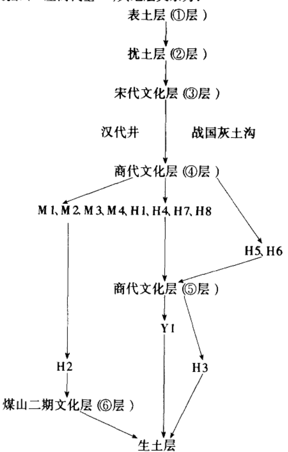
M4,亦为揭去表土后就露出墓口。出有铜爵、觚各1件,还有玉璜、玉饰和涂朱圆陶片等。墓内填土出有敛口斝、浅腹盆等陶片,其时代要晚于M2,因为其铜爵底部已由平变稍圜,铜觚由粗矮变细高,底部由平变微弧。由此,M4应为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

③此外,在1956年3月,发掘有C11M146,随葬有铜鼎1,还有陶鬲、爵、觚斝、涂朱圆陶片、玉柄形器等,墓下腰坑内殉一狗。C11M148,出有铜爵1,还有陶豆、鬲、觚、盆、斝、涂朱圆陶片、玉饰、蚌饰等。墓底铺有朱砂,亦有殉狗腰坑。这两座墓的时代,当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从上述可知,铭功路一带也是郑州商城一处重要墓地。

4.北二七路墓区

这一带发掘出4座商代墓[43],其地层关系为:



商代文化层(④层),出有长颈大口尊、折沿鬲、折沿罐、盆、瓮、小口尊、器盖等陶片,属二里岗上层二期。

H1、H4、H7、H8出有大口尊、盆、瓮、鬲足、罐、簋、小口尊、缸、甗、原始青瓷片等,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M1墓底铺朱砂并有殉狗腰坑,出有铜鼎1、斝3、爵1、觚2、刀1、铜片1,还有玉戈、铲、

璧、柄形器、玉片饰，以及石戈、铲、柄形器、钵和圆陶片等。M2 墓底铺有朱砂并有殉狗腰坑。随着有铜斝 2、爵 1、觚 1、刀 1，以及印纹硬陶尊、玉柄形器、石戈、石铲和圆陶片等。M3 没有随葬品，在墓葬填土中有二里岗期绳纹陶片。M4 亦有腰坑，随葬有青铜爵 1，还有带流无尾爵、敛口斝、折沿鬲等陶器，又有玉簪等。从地层叠压关系和所出青铜器的形制看，这 4 座商墓应属二里岗上层一期。

H5 出有短颈大口尊、方格纹红陶缸、卷沿罐、深腹盆、鼎足、瓮、卷沿鬲等陶片；H6 出有短颈大口尊、细绳纹罐、瓮、折沿深腹盆、缸等陶片。其年代均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

商代文化层(⑤层)出有短颈大口尊、卷沿鬲、折沿罐、深腹盆、缸、豆、小口尊、刻槽盆等陶片，其年代为二里岗期下层二期。

Y1 仅见细绳纹陶片，时代亦属二里岗下层二期。

H2 出有磨光黑陶豆、磨光黑陶瓮、篮纹高领瓮、带耳篮纹红陶瓮、折沿深腹绳纹罐、斜腹平底碗等陶片。H3 出有折沿深腹绳纹罐和方格纹罐、折沿深腹甑、敞口宽卷沿素面磨光黑陶觚形器、直口高领圆肩双耳篮纹瓮、敛口圆肩鼓腹篮纹瓮、钵、碗、单耳杯等。煤山二期文化层(⑥层)出有高领瓮、折沿瓮、方格纹折沿深腹罐、折腹盆、斜腹平底钵、磨光黑陶平底斝、斜腹平底碗、杯鋬等陶片。从上述遗迹单位所出陶片的形制和纹饰看，大多和临汝煤山一期陶器特征相近，少数与二里头文化一期陶器接近，因此，上述灰坑和文化层应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煤山二期。这里与铭功路、人民公园等地墓区以及张寨南街青铜器窖藏坑相距不远，因此，北二七路一带应是郑州商城的一处重要墓地。

5. 杨庄墓区

杨庄墓区位于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不远处。这一带先后发现商代青铜器。有 X 纹鬲 2 件、弦纹鬲 1 件、饕餮纹爵 2 件[44]。其中 2 件 X 纹鬲和 1 件饕餮纹爵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而 1 件弦纹鬲和另 1 件饕餮纹爵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这些青铜器当均为商代墓内随葬品，因此，这里也应是郑州商城的重要墓地。

6. 二里岗墓区

1979 年 9 月，在郑州商城东南郊外的二里岗，即今省商业厅仓库西墙外，发现一座商代土坑墓[45]。出土有青铜斝 1、爵 1，还出有玉柄形器。从铜器的形制看，应为二里岗上层一期。此外，多年来在二里岗一带还出有铜斝、罍、镬、凿等[46]，显系商代墓随葬之物，亦属二里岗上层一期。所以，二里岗也应是郑州商城墓地之一。

7. 东里路墓区

1971 年以来，在东里路东段南北侧发现多座随葬青铜器的商代墓[47]。如路南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商代墓，出土有弦纹盉、弦纹鬲等青铜器，属二里岗下层二期。路北黄河中心医院商代墓(C8M32)，出土铜爵 1、斝 1，还有陶鬲、斝、簋、器盖等，属二里岗下层二期。路南黄委会挖人防工程发现一座商代墓(C8M39)，出有铜鼎 1、斝 1 和残玉戈，属二里岗上层一期。这一带位于白家庄西侧，相距很近，或可与白家庄墓地划归一个范围。

8. 郑州烟厂墓区

这一带，近年来配合厂区和紫荆山路北段基建工程，曾发现少量残破的商墓。而这里过去曾出土过 2 件饕餮纹铜斝[48]，在相距不远的熊耳河边出有弦纹盉、弦纹爵[49]，在相近的南关外出有饕餮纹觚[50]等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青铜器，这些都与墓葬有关。由此可知这一带也是郑州商城的重要墓地。(参看“郑州商城遗迹分期表”)

郑州商城分期表

分期		城墙：北城墙	城墙：东城墙	城墙：南城墙	城墙：西城墙	城墙：外城墙	宫殿区：黄委会食堂及一号高楼宿舍区	宫殿区：C8G10及周边遗迹	宫殿区：C8G15及周边遗迹	宫殿区：C8G16	宫殿区：北大街农业队宿舍区夯土基址	宫殿区：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夯土基址	宫殿区：郑州回民中学夯土基址	宫殿区：东里路东段南侧38号院
二里岗上层	二期（白家庄期）			文化层叠压城墙夯土外侧并出有绳纹板瓦			文化层及灰坑、夯土基址	文化层、绳纹板瓦			灰坑	文化层		
	一期	文化层和房基、墓葬、以狗为牺牲祭祀坑叠压或打破城墙夯土内侧底根土近处	文化层、墓葬、猪骨架坑叠压城墙夯土内侧	文化层叠压城墙夯土外侧			文化层及灰坑、输水管道	C8G10 C8G13 C8G8 C8G11	文化层及灰坑	灰坑	文化层或灰坑、大型输水管道	文化层、输水管道 F101、F102	F11	文化层、F5、F16、F1、F2、F3、水井、文化层
二里岗下层	二期	文化层叠压城墙夯土内侧下部	文化层叠压城墙夯土内侧下部	文化层和灰坑叠压城墙夯土内侧底部	文化层和灰坑叠压城墙夯土内侧	城墙夯土内包含此期陶片	灰坑	C8G12 CG814	文化层及灰坑、墓葬、C8G15、C8T55、T60、T61、T67夯土台基	C8G16	F1、F2	夯土基址	F12、F13	灰坑及残夯土
	一期	城墙夯土包含有此期陶片	城墙夯土包含有此期陶片，城墙夯土下压有此期小灰土沟		城墙夯土包含有此期陶片，城墙夯土下压有此期灰土沟		夯土墙基	C8G9 其下压有本期文化层及灰坑	C8T62 夯土台基	文化层	夯土Ⅵ、夯土Ⅶ			

宫殿区										作坊				
										铸铜		制陶	制骨	
郑州丝钉厂夯土基址	郑州变压器厂家属夯土基址	黄河中心医院夯土基址	郑州电力学校夯土基址	紫荆山路民族小区夯土基址	黄委会43号院夯土基址	黄委会幼儿园夯土基址	郑州皮毛厂工艺夯土基址	黄河河务局宿舍区夯土基址	黄委会水文局夯土基址	南关外铸铜基址	紫荆山北铸铜基址	铭功路制陶遗址	紫荆山北制骨遗存	东里路1号院制骨废料堆
文化层及灰坑，并出有绳纹板瓦								文化层						文化层、壕沟、经过加工的人头骨废料堆
夯1、夯2、夯3、夯4、大型水井	文化层	夯土基址和大型蓄水池	文化层、水井、F1		夯土基址	夯土基址	夯土基址	夯土基址		文化层、窖穴、铸铜遗迹	文化层、房基、窖穴、铸铜场地	陶窑、灰坑、墓葬	文化层、窖穴、制骨遗存	
	夯土基址		文化层	文化层及灰坑		夯土基址	夯土基址	夯土基址	夯土基址	文化层、窖穴、铸铜遗存		陶窑、房基、灰坑、制陶场地	文化层、制骨遗存	
				F1										

青铜器窖藏坑			墓地							
张寨南街青铜器窖藏坑	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	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	白家庄墓区	人民公园墓区	铭功路墓区	北二七路墓区	杨庄墓区	东里路墓区	郑州烟厂墓区	二里岗墓区
		青铜器窖藏坑	文化层、墓葬	文化层、灰坑、墓葬		文化层				
文化层、青铜器、窖藏坑	文化层、灰坑、青铜器窖藏坑、墓葬		墓葬	墓葬	墓葬	灰坑、墓葬	墓葬	墓葬	墓葬	墓葬
			文化层		灰坑	文化层、灰坑、陶窑		墓葬	墓葬	

五、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及其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关系

从前面所述郑州商城四面城墙的地层关系我们能看出，商代夯土城墙的根基部分被二里岗下层二期或更晚一些的文化层、灰坑、墓葬叠压和打破；商代夯土城墙本身包含最晚的陶片为二里岗下层一期；商代夯土城墙下面所叠压的有二里岗下层一期小灰沟或更早一些的文化层、灰坑和灰沟。由此可知郑州商城的相对年代是介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和二期之间，亦即不能早于二里岗下层一期，也不会晚于二里岗下层二期。其始建年代约在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阶段，其使用时间应是从二里岗期下层二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二里岗上层二期。其中二里岗上层一期是繁荣的时期。

关于郑州商城的绝对年代，其^{14}C数据已公布的很少，只有东城墙 CET7 的 2 个数据[51]和郑州商城内中部偏东的郑州电力学校商代水井 J3 井框木料的 2 个数据[52]。其中 CET7 第五层——城墙夯土层（标本 ZK—178）^{14}C数值为 3330±95 年，树轮校正 3570±140 年。CET7 第三层——压在城墙内侧的二里岗上层一期文化层（ZK—177）^{14}C数值为 3310±95 年，树轮校正 3545±110 年。J3 西壁井框木料树轮校正为 3580±70 年，J3 东壁井框木料树轮校正为 3540±50 年。

让我们再来看看与郑州商城关系十分密切的偃师商城以及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情况：

通过对偃师商城西城墙、西城门和北城墙的发掘，可以见到一批二里岗下层的文化层、路土、墓葬，叠压或打破城墙的附属堆积。与此同时，在西城墙和北城墙夯土内出有一批陶片，有罐、瓮、鬲、盆、大口尊等，从其形制看多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也有一些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此外，在北城墙东段发现有被夯土城墙基槽打破，同时又被城墙附属堆积所叠压的文化层，文化层内所出的陶片不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在城墙附属堆积下面还发现有几个小灰坑，坑内出土有一批陶片和与青铜铸造有关的木炭、铜液凝固块和小块陶范等遗物，其陶片也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这样可以证实偃师商城始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53]。近年，在偃师商城西南部，发现一座小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 1100 米，东西宽 740 米。已知北墙中段和东墙局部有曲折，墙宽 6～7 米。其南墙、西墙和东墙的南段同偃师商城（可称为大城）城墙重合。通过南墙和西墙的发掘证明，小城的始建要早于大城。当扩建大城时，曾利用小城的南墙、西墙及东墙的南段，将其内外两侧加宽并加高，亦即将小城城墙包在大城城墙之内。以致大城墙宽约 17～19 米。而大城的西墙北段、北墙的全部和东墙的大部则为新建。这样，偃师商城的宫城就正位于小城的中轴线偏南部位[54]。考古发掘资料又显示最初的宫殿和宫城，甚至比小城还要早，如 4 号宫殿呈长方形，包括正殿和东、西、南庑及庭院等遗迹，属三面封闭式宫殿建筑。从打破 4 号宫殿的灰坑 D4H29 的^{14}C测年看，其年代为 3380±75 年，树轮校正为 3630±125 年[55]，这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一致。而 6 号宫殿（原称为 5 号宫殿下层基址）平面呈口字

形,北面基址较宽,其余三面较窄,构成方形庭院。在宫殿内发现有二里头四期文化层。而打破6号宫殿的灰坑D5H19的^{14}C测年为3395±80年,树轮校正为3650±130年[56],这也和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相一致。宫城的建筑,是偃师商城最初出现的标志性建筑物,由此可以推断,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四期。这要比郑州商城早一个阶段。在偃师商城范围内的其他发掘表明,偃师商城建成之后,历经了二里岗下层一、二期和二里岗上层一期的断续繁荣之后,到二里岗上层二期时,就已经衰落甚至废弃了。

郑州小双桥遗址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商代遗址[57]。发掘出一些夯土台基、多座牛头及牛角的祭祀坑、埋有人骨或狗骨的奠基坑,出土一批陶器、石器、青铜器、玉器及朱书陶文,还有孔雀石、炉壁残片、铜渣、残范块等遗存。这些遗物少量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或二里岗上层一期,大量为二里岗上层二期。据此推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属于二里岗上层二期,但某些遗迹的时代也可能会早一些。

如上所述,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它们之间的繁荣与衰落,发展与停滞,高潮与低谷是相互交错的。当偃师商城始建时,郑州商城尚是一个聚落址;当偃师商城进入繁荣期时,郑州商城才开始修建;当偃师商城停滞时,郑州商城进入使用和发展时期,成为一座防御东方的重镇;当偃师商城又稍有恢复时,郑州商城却更加辉煌,进而发展成为一代王都;当偃师商城废弃时,郑州商城又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才逐渐衰落下去。一些学者认为,偃师商城是商灭夏后所建最早的都城,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已经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更替,偃师商城成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58]。至于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在其出现时,郑州商城早已存在,其废弃时,郑州商城仍在维持,有相当长的并存时间。

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郑州小双桥遗址的时空框架确定之后,也为探讨它们的性质创造了条件。对于偃师商城来说,从其始建年代、地理方位、规模和形制来看,它是商代最早的一座都城。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认定是商汤灭夏后在这里所建的亳都。《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条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从偃师商城西墙和北墙的发掘来看,商代夯土城墙之上均有汉代文化叠压,说明至少在汉晋时期,城墙还矗立在地面之上,而班固一定也曾目睹了这座城址,并以汉代地名转述前人旧说。虽未直言亳都,但汤都为亳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从历史发展看,这一带是夏王朝的辅畿地区,商灭夏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为了加强控制迅速扩大的商代疆域,为了镇抚夏王朝的残余势力,成汤就在这里建立都城。《诗·商颂·殷武》记有:"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春秋齐器《叔夷钟》铭说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卷七)云:"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均可提供佐证。

还是指出的是,在偃师商城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低洼地带穿城而过,当地群众世代相传称之为尸乡沟或尸乡洼,今发掘出的偃师商城亦被称为尸乡沟商城即由此而来。这与文献所记的"尸乡"相同,当非巧合。而近年来在这一带的吓田寨、杏园村、槐庙村等处,发掘出一批唐代墓葬,从其墓志记载看,有唐一代这里就称为"亳邑乡"、"薄台里"、"西亳"、"尸乡"、"景亳"等。这些有的是唐代建制的乡名,有的是别的地名,但都是沿袭古代的旧称,应与偃师商城有关。这就从另一侧面证明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59]。

而郑州商城规模宏大，布局有序，是一座商代前期无可置疑的王都。从商代历史看，汤都亳在前，仲丁迁隞紧接其后。前已论述，偃师商城为商灭夏后所建最早的都城，即汤之亳都。郑州商城比其要晚，其繁荣期可能就是仲丁的隞都。

一些文献记载说得较为明确，如《诗·小雅·车攻》记有："东有甫草，……搏兽于敖。"郑玄注："敖在郑地，今近荥阳。"甫草即甫田之草，在今郑州东郊圃田一带。把"甫草"与"敖"并列于诗内，说明二者相距不远，且"敖"在"甫草"以西。由此可知，敖就在郑州一带。

从郑州商城修建的背景和仲丁迁都的情况看，有商一代在商王朝的东西南北时而有些战事，如对西部的羌方，北部的土方，西南的巴方，东部的夷方等。但战事最频繁的还是在东方，而且贯彻商代始终，直到殷末还曾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夏部族与东夷既有婚姻关系，又是政治联盟，这不能不对商王朝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商灭夏后在偃师建都，待大局平定国力有恢复之后，就在郑州修建城池，为日后平息东方威胁作准备。到"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当时迁都的最主要原因是对付外部敌人。而仲丁之时，就有征伐东方蓝夷的战争，《竹书纪年》记有："仲丁即位，征蓝夷。"《后汉书·东夷传》亦曰："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而蓝夷是古代东夷族的一支，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仲丁迁都主要是为了便于征伐蓝夷，也只能从偃师商城东迁到郑州商城，即从亳迁都至隞。

近些年郑州外城的发现，把郑州商城的范围扩大了近一倍。商汤灭夏后不可能立即兴建这样大的都城，而只能在定都偃师商城经过一长段时间休生养息之后才可办到。这就为郑州商城是仲丁所迁之隞都提供新证。

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偃师商城要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不可能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亳都。而郑州小双桥遗址兴衰的全过程，均与郑州商城始终并存，绝不是郑州商城废弃后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才兴起来，即所谓年代上"一兴一废"的前后衔接关系。从前面提及的《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可知，仲丁即位之后，蓝夷作寇，外患不安。又据《史记·殷本纪》所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这又反映了中丁后期政治动荡，内忧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若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作为隞都，则势必要有城墙等防御设施。但时至今日，尚未发现一点线索。这要用当时没有修建城墙是难以解释的。

废旧都迁新都，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主要都是因为政治和军事原因。从最早的夏商周迁都到北魏孝文帝迁都，以及辽金元明清诸朝迁都都是如此，而且新都离旧都相距甚远，从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者，比比皆是。但郑州小双桥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中心部位相距仅 20 公里，若以边缘计算，尚不及此数。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废掉郑州商城，在其远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再建新都。有人反驳说西周初文王都丰邑，而武王又建镐京，两者不是相距很近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迁都。从考古发现获知，沣水以东的客省庄、张家坡一带是丰邑，沣水以西的普渡村、花园村、斗门镇一带是镐京，二者基本连成一体。从文献记载看，《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这说明，虽然周武王建镐京，但成王时还经常在丰发号施令，且成王可以自镐步行至丰。丰

邑在整个西周时期仍然起到宗庙祭祀和政治中心的作用。丰邑和镐京实际上是一座扩大的了国都,而被连称为丰镐,绝非废丰兴镐。犹如今天襄阳和樊城组成了襄樊,武昌、汉口和汉阳组成了武汉一样。

再从郑州小双桥发掘的考古内涵看,是一些夯土台基、牛头牛骨祭祀坑、少量奠基坑,和一些陶器、石器、青铜器、玉器及朱书陶文。没有发现明显的居住生活的迹象,即没有发现考古学者一般所称的“生活垃圾”。这表明,郑州小双桥只是一处商代王室祭祀遗址,而不是一座王都。

还要提及的是,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最初调查是15万平方米,目前已扩大到144万平方米,那是把发现的若干遗址点连线而成,据说类似的点还在增多,那么遗址面积还可能扩大。但是它们不同于一个大城垣之内的若干遗址地点,这些遗址点的时代和内涵是否都完全一样,是否属于同一个大型遗址,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证实。

对于夏文化研究来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夏代的起始年代和夏商的分界年代。按目前情况看,偃师商城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有可能逐步达成共识,那么夏代的起始年代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了。

有些学者认为,夏代起始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而止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再早再晚均不是。而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进行考古发掘的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时,偃师二里头一带遗迹遗物较少,尚属于一般聚落。二、三期为其繁荣阶段,夏王朝在这里建都。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这里已经衰落,至迟到了四期晚段,二里头遗址旁边已出现了偃师商城,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更替。据^{14}C测定,它的年代最早距今不超过3900年,其繁荣期也不过200年。这与整个夏代来比,可能太短一些。鉴于至迟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属于商文化,那么夏文化就不能向后延续,只能向前面追溯。早于二里头文化而又与之紧密相连的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它们时间早晚衔接而又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二里头一期陶器中的鼎、盆、罐等的形制和纹饰还遗留着河南龙山文化的作风。以至于在50年代进行考古发掘时,就把二里头文化早期归入河南龙山文化之内。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本来就是根据发掘情况人为确定的,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渊源,二里头文化也可以说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归宿。如果把二里头文化早期归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内,或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纳入二里头文化早期之内,也实在不算大差。有的学者也认为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一期文化不是夏代的早期,但却提出要去寻找所谓比这里的二里头一期文化还要早的二里头一期文化,其实,这还是要追溯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不过不提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名称而已。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夏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在邹衡先生的领导下,自1996年至今,已经在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等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第一手的全新资料。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时,已经出现了诸如登封王城岗[60]、淮阳平粮台[61]、郾城郝家台[62]、辉县孟庄[63]、安阳后岗[64]等城邑,已经能够铸造青铜器,发明和使用文字,并有了较为复杂的礼制遗存,这都为夏王朝的建立创造条件。到了距今4000多年的时候,夏王朝开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西起华山之东、东到豫东平原、北自济水之南、南抵淮河沿岸方圆千里的奴隶制王国。

注 释

[1][3][5][7][1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

[2][4][6][8][12][13][15][16]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9][14][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近年来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收获》,《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10][40]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白家庄遗址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

[11][2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医疗机械厂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工作站:《郑州三德里、花园新村考古发掘简报》,《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20][21][2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内宫殿遗址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年第4期。

[24][25][2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2年度郑州商城宫殿区发掘收获》,《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27][5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2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30][3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6)1989年。

[32]①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33][35][36]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队作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近年来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收获》,《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③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4期。

[34]①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城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和奴隶头骨》,《文物》1974年第7期。

②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

[37]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3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3期。

[3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南顺城街窖藏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41]①安金槐等:《介绍郑州新发现的古遗址及殷代墓葬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②安志敏:《郑州市人民公园附近的殷代遗存》,《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③郑州市文物工作组:《郑州市人民公园第二十五号商代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42]①马全:《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商代遗存》,《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

②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第10期。

[43]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年第3期。

②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4期。
[44][48][49][50]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
[45][46]①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王彦民、赵清:《郑州二里岗发掘一座商代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47]杨育彬、赵灵芝等:《近几年来在郑州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2期。
[55][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考古》1988年第7期。
[57]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58]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59]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考古》1984年第10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墓》,《考古》1986年第5期。
③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县四座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④樊有升、李献奇:《河南偃师唐严仁墓》,《文物》1992年第12期。
⑤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偃师唐柳凯墓》,《文物》1992年第12期。
[60]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6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6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63]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
[64]①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出版社1955年。
②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摘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郑州商城专题结题报告》1999年3月。与曾晓敏先生合写)

夏文化探索者的足迹(笔谈录)

一、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夏文化的？您参加过哪些与夏文化有关的田野工作？能顺便谈一些您学考古干考古的经历吗？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自远古以来绵延传流，没有中断，令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对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且不说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仅仅回顾一下从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王朝建立的历史过程，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知道，远在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河北徐水南庄头等处的原始小聚落，有些地方还发现了稻作遗存。到距今8千年左右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舞阳贾湖、河北武安磁山、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辽宁阜新查海、陕西华县老官台、山东滕县北辛、湖南澧县彭头山和八十垱、浙江余姚河姆渡等处，已出现大型聚落。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已出现了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河南郑州大河村、山东泰安大汶口等中心聚落，有的聚落内包括成组的大小房子围成的中心广场居住区，居住区外有围沟环绕，并有寨门等设施，沟外有公共墓地，还有制陶作坊区等。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出现了防御性的史前城址。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出现了中心城邑和许多小的城邑，进入了万国林立的方国文明时代。经过长期的战争、征伐、兼并，一些城邑扩大了，一些城邑衰落废弃了，一些方国强大了，一些方国灭亡了，逐渐形成了中原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它们之间又不断发生冲突，展开了异常惨烈的争夺。诸如炎帝和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禹南下征三苗之战。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开始建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中央统治的奴隶制王国。在中原地区形成更高一级的王国文明。对于夏代积年，比较可靠的是《竹书纪年》的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史学界通常以此为据，把夏代定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这就是说，夏初距今约4000余年，前后有5个世纪。由于脍炙人口的大禹王治水的故事，使妇孺皆知有一个夏王朝，说起来倒很容易，但真正找起夏王朝来却十分困难。过去，国内有些疑古派否认夏王朝的存在，西方一些学者也持怀疑态度。时至今日，青年旅美学者沈幗帧先生在1998年8月4日写给"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江林昌先生的信中还提到："但是在西方学者眼中，夏朝仅是一个传说的朝代；即使有考古证据显示中国的文明在商朝建国前即已萌芽，然而所谓的夏朝并不是一个所谓'政治国家'(Political State)"(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四十二期1998年9月25日)。

一百年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其内容不但涉及当时的国家架构、宗教——宗法等级制

度、阶级关系、农牧生产、周边方国、战争、信仰与祭祀等许多方面,更重要的是从中考释出殷王名谥10余人,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代帝王世系大致相同,从而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由此推之,《史记·夏本纪》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数百万年原始社会的结束,数千年阶级社会的开始。夏王朝既然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所以,研究夏王朝的历史,对于揭示我国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对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有关夏王朝的文献资料相当贫乏,连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都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感叹文献之不足,因此考古学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和无可替代了。也正因为记载夏商的古文献太少,所以我们就应该更加珍视它,运用它,绝不能在肯定考古学的价值和作用时,有意无意去贬低或否定历史文献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工作者对此更应慎之又慎。

从考古学角度去探索和研究夏文化,是建国后提出的新课题之一。50年代初期发现了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进而又发现了同时期的郑州商城,这比安阳殷墟要早约一二百年,从已知推导未知,这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豫西嵩山周围和伊洛平原一带,以及晋西南汾水下游和其他一些地方。根据这些线索,从195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相继在河南郑州、登封、巩县、临汝、禹县、密县、偃师、洛阳、渑池、陕县等地,进行广泛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尤其在登封玉村、郑州洛达庙和上街、巩县稍柴、偃师二里头和灰嘴、洛阳东干沟、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发掘出早于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一种新型文化——二里头文化。再具体一些说,作为二里头文化命名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坐落在伊洛平原夏王朝中心地域的都邑遗址,地下湮埋着许多夯土建筑遗存,已经发掘出2座大型宫殿基址,还发掘出大量中小型房基、灰坑、水井、一些祭祀遗迹和数百座墓葬,又有规模很大的铸铜等手工作坊遗存。出土完整或复原的陶器已达3000余件,其中不少堪称为精品。还出有不少玉器,包括圭、璋、钺、戚、戈、多孔刀等,造型优美,雕琢精细,抛光光洁,五彩纷呈。出土漆器有觚、豆、盆、钵、鼓等,绘有繁缛的图案纹饰,显得富贵华美。更值得重视的是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容器、兵器、工具和牌饰等,展示了气势恢宏的王者风范和高度发展的青铜文明。从考古发现上看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一脉相承,中间没有什么缺环。而二里岗文化被公认为是商文化,这样就把夏文化限定在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范围内,这是探索夏文化的重大进展。

通过上面简单的回顾,就足使我这个在河南已经工作了40年的老考古激动不已。笔者与夏文化结缘应该说是很早的。远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的时候,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老师讲的是炎黄、唐尧、虞舜、夏商周……,讲授考古学通论的老师讲的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但这些考古学文化怎样能与古史传说及夏代联系起来,老师们也讲不出圆满的答案,学生们自然更有些不明白,至少笔者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即使是讲授"商周考古"的邹衡先生,也只把重点放在商代,对夏文化只是一笔带过。到了50年代后期,我们已是高年级学生的时候,除了系里讲授断代考古之外,还请到了校外著名的考古学者讲授考古专题课。比如说请胡厚宣先生

讲授“甲骨学与商代史”、夏鼐先生讲授“田野考古学”、郭宝钧先生讲授“商周青铜器”、徐旭生先生讲授“古史传说与夏文化”。学生们印象很深的是，依次讲课的先生一个比一个年岁大，而后面两位老先生，一个比一个胡子长。先生们的博学使我们受益匪浅。尤其是徐旭生先生的讲课，引发了学生们对夏文化的浓厚兴趣。徐老先生的课时约是每周两节，也没有讲几次。讲述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即北方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它们之间时而相互斗争，时而和平共处，三者势力的消长、融合、同化，最终形成了后来的汉族。讲述探索夏文化的问题，指出要明确夏文化的涵义，包括夏族文化与夏文化两个概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息息相关的联系。前者指夏族本身的文化，其地域范围较小，但年代较长，包括禹之前和桀之后；后者则指夏王朝时期的文化，地域范围较广，但年代较短，始于禹而终于桀。徐老先生特别指出中原地区有两个地域与夏的关系最为密切，一是豫西伊、洛、颍水流域，二是晋南汾、浍、涑水流域。这些已被日后的考古实践所证实。上述表明，徐老先生最早提出探索夏文化，远见卓识，功不可没，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夏文化的学者们均不应该忘记的。无论是哪一位先生研究夏文化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也都是在徐老先生为我们铺就的奠基石上起步的。与此同时，也就是在 1959 年 11 月，在当年第 11 期《考古》上，笔者读到了徐旭生先生撰写的《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文章的第一部分论述了文献记载中夏代的活动时间和活动区域，其中一部分就论及夏都阳城的地望。第二部分论述了 1959 年 4 月 14 日 ~ 5 月 26 日在河南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进行考古调查的情况，着重介绍了登封告成八方间遗址和石羊关遗址、禹县阎砦遗址和谷水河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这 5 处遗址均可在中国考古学上书写一笔，其后都又作了不少工作。其中告成八方间遗址就是后来著名的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只是城墙基槽埋在地面之下，当时未发掘没有发现而已。石羊关遗址是登封告成镇(其东侧有战国阳城遗址)顺颍水东下通向豫东大平原的要道，为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上层有龙山文化遗存。阎砦遗址为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发现有成排的方形房基和灰坑等。谷水河遗址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有丰富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如同前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章第三部分是后话，也就是结语，虽然没有作什么结论，但老先生却明确指出：“告成和八方间、石羊关、谷水河三遗址都有仰韶和龙山的陶片，阎砦遗址也有龙山的陶片。我们觉得这种相类似的性质应引起注意。此后对于河南偏西部、山西西南部两重点当作大规模的调查或复查，以便能早日订定科学的发掘计划。”这里面一是强调了龙山文化对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了探索夏文化必须与考古调查和发掘相结合。这从徐旭生先生亲自到豫西调查“夏墟”的本身也可看出来。探索夏文化对于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是多么诱人，尤其是对在河南长大的学生更是如此。

1961 年 9 月，笔者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满怀喜悦分配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工作。当年 10 月至年底，就到洛阳参加古墓葬资料整理工作。1962 年全年参加全省碑刻调查，这是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当年的中心任务。笔者足迹走过许昌、郾陵、扶沟、禹县、襄县、郏县、鲁山、平顶山、叶县、宝丰、长葛、邓县、南阳等县市。那时候还是生活十分困难的年月，饿肚子似乎是常事，但这并没有影响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一年

之内整整有10个多月都在外面调查。奔波于深山之间去摩挲石刻,徘徊在古庙之中望碑而兴叹!偶遇古遗址虽与夏文化无缘,但也令人心驰神往。同年底,读到了徐旭生先生所著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本书凝聚了徐老的心力,蕴含着他独到的学术见解,尤其是提出探索夏文化的学术问题,鼓励后学者努力攀登。

1963年春,配合豫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笔者第一次参加偃师的古文化遗址调查。这次发现了宫家瑶遗址、南蔡庄遗址和夏后寺遗址。其中宫家瑶遗址位于县城西南20公里的沙河东岸台地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2~1.4米,发现有灰坑、墓葬,采集了一批泥质红陶或夹砂红陶的小口尖底瓶、钵、罐、釜等陶片,还有彩陶钵片和磨光石斧等,为仰韶文化遗存。夏后寺遗址距县城南20公里,西距著名的灰嘴遗址5公里,面积约2万平方米。灰坑甚多,并列或叠压相当密集。采集有一批二里头文化的罐、缸、盆、大口尊、瓮、器盖等陶片。南蔡庄遗址位于偃师县城西近9公里,与二里头遗址隔河相望,面积约3万平方米。采集有罐、豆、三足皿、器盖,扁鼎足和一些饰绳纹、篮纹或方格纹的陶片,其文化内涵与二里头遗址相同。这是笔者首次调查二里头文化遗址,尽管当时还被认为是商代早期。带着采集的文物标本,喜气洋洋返回郑州,很像是农民丰收的喜悦心情。其后,认真整理了调查记录,并对采集的陶片进行观察研究,写出了一篇题为《河南偃师仰韶及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简报,配以线图发表在1964年第3期《考古》上。这也是第一次把考古调查所获变成了铅字,虽然篇幅不长,也着实让笔者高兴了好几天。这篇小文还曾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录入夏文化考古资料编目之中。

1963年8月1日,笔者新婚第三天就告别爱妻奉命要急切赶到山西侯马参加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性考古发掘大会战,这真是谱写了一曲60年代的《新婚别》,至今还刻骨铭心地留在记忆之中!当年由于河北大水,京广线正在抢修,为了赶时间只好西走陇海线,夜宿潼关,再步行到黄河边,坐船渡河,颇有一番惊险,最后在风陵渡小停,再坐南同蒲线火车到侯马。直线225公里的距离,走了两天多。侯马考古工地除山西本省的人员之外,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陕西、河北、山东、河南、甘肃、广东、福建等地数十位考古专业人员,集中发掘晋国都城新田的铸铜遗址。这里文化层堆积丰富,发掘出房基、水井、灰坑、窖穴、作坊活动面、窑址等遗址,文化层与各种遗迹之间有许多组叠压打破关系。出土大量的陶器,一些器物的早晚变化及特点十分明显。根据地层关系和陶器演变,并结合其他遗迹遗物的变化,遗址的时代可分为三期六段,涵盖了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即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4世纪初的200余年间。遗址发现铸铜陶范5万多块,其中完整或能配套的近千件,还有熔炉和鼓风管残片2万多块,以及大量炼渣等。除了可以看出其规模巨大之外,还可了解当时从选料、制范到合范、浇铸等工艺流程和技术水平。在数千块陶范上刻有各类精美的纹饰达25种之多。几何纹饰类似剪纸,风格雅朴,甚有特色;动植物纹饰,雕刻精细,形态逼真,堪称艺术珍品。上述考古发现为研究遗址的年代、地望、晋国文化的特点、青铜铸造工艺以及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分工和产品的商品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是笔者大学毕业后首次参加大型遗址的考古发掘,由于地层叠压打破关系非常复杂,在分析遗迹现象时遇到不少困难,但这也是极好的锻炼机会,大大提高了笔者田野发掘技术水平和分析遗迹现象的能力,为日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那些繁

忙紧张的日子里，偶尔也有难得的一天假日，与两三知己沿着汾河河谷的阶地进行考古踏察，时而采集到一些龙山文化或类似二里头文化的陶片，漫步在这被《左传》称为“夏墟”或“大夏”的故地，真令人心旷神怡，忘记了一切的疲劳，用当时的话来讲，“快乐得像自由的鸟儿一样”！后来的日子就不那么美妙了，由于时间紧张，在12月中下旬，发掘还在进行，考古工作的艰苦就显现出来，晋南刺骨的寒风，覆盖大地的白雪，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从1964年到1966年初，笔者曾参加豫北地区和南阳地区的文物普查，发现若干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文化的遗址；参加三门峡一些工厂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多是一些战国、汉、唐墓葬，有的墓葬四周有围墓沟，有的墓是大墓道小墓室，出土一批典型秦人风格的陶器和铜器，有些陶器肩部或底部印有“陕亭”、“陕市”等陶文，这不仅是器物产地的标志，也是研究当时社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管理的重要实物资料。还有一批东汉墓内的绿釉陶器和建筑模型，唐墓内制作精美的铜镜和三彩器，都是重要的考古收获。三门峡墓葬的发掘，由于赶工期和文物安全，每一座墓葬必须在当天发掘结束，时值盛夏，骄阳似火直射竖穴土坑墓内，40多度的高温，让人挥汗如雨，不知怎地又想起侯马严冬的寒风，要是能平均一下该多好！后来，笔者又参加了新郑郑韩故城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大致了解了这座面积约22.5平方公里东周郑国和韩国都城的平面布局，为日后划分文物区，制订城市发展规划，加强文物保护创造了条件。还参加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考古调查和文物分布图的测绘，仰韶村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命名地，远在1921年就首次进行考古发掘，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考古圣地”。上述这些考古工作，有些比夏代早，有些和夏代相近，有些比夏代晚，但每次工作都与后来探索夏文化直接或间接有关。当1966年4月下旬从仰韶村遗址回来时，一场令人始料不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站在了中国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对立面，一切都在横扫破坏之中。文字资料成了废纸，古物陶片成了四旧，让人们感到茫然、可怕和不解。

社会毕竟还是要前进的，60年代末，配合焦枝铁路的修建，笔者和一些同事终于又开始参加河南境内从焦作经济源、洛阳、宝丰、鲁山、南阳、邓州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由于为了抢工期，除济源境地内发掘一批很有价值的汉墓外，其余多半是跟着工程捡文物，但这比起文革前期破“四旧”毁坏文物来，已经好多了。在铁路工地沿线不时见到一些醒目的大标语，其中印象最深的现在看来又是最为荒谬酸楚的一条是“出大力，流大汗，把刘邓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好在历史是最公正的。既然考古发掘工作又开始进行，那么考古学的春天也就不远了。

二、您曾长期主持过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请介绍一下您在郑州商城作过哪些发掘与研究工作？

1972年笔者开始参加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连续干了十多年。其中在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了大地，老父亲在1958年初被最后一批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光荣离休。笔者也时来运转，以42岁的高龄被任命为相当于副科级的考古部副主任，这在当时本单位的同辈人中是难得的殊荣。

在郑州商城进行考古发掘的日子也是令人难忘的。1972年到1976年，针对某些专家对郑州商城年代的怀疑，在郑州商城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分别开挖了探沟，再一次证

实了郑州商城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城址。随即还在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发现了多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在今东里路1号院发掘出大型房基(C8G10),在今黄委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发掘出另一座大型房基(C8G15),在今省中医研究院发掘出又一座大型房基(C8G16),成排的石柱础赫然在目,说明这一带是郑州商城的宫殿区。与此同时,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约300米处的张寨南街,发掘出一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一对大型铜方鼎和1件铜鬲,方鼎通高分别为0.87米和1米,造型深厚,气势磅礴,当为王室所用之物。在今东里路发掘的一条商代壕沟内,出土近百个奴隶的头盖骨,不少头骨上明显的锯痕,可能是制作人头器皿的遗存。在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和黄河中心医院内,也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和墓葬,墓内随葬有一些青铜器。在郑州商城北约500米,即今新华社河南分社院内,配合基建进行发掘,出土大量陶片、骨器、废骨料、砺石、铜刀、铜块、铜渣等遗物,说明这里属于商代制骨和铸铜手工作坊遗址的范围。同时还发现有被绑缚的弓身屈肢人骨架、无首人骨架、杂乱人骨和猪骨掷埋在一起的现象,这可能与祭祀有关。从1977年到1983年,在东里路又发掘商代铜器墓;在郑州商城北城墙中部缺口以南,即今紫荆山百货大楼范围内,发掘出商代文化层和窖穴;在郑州商城中部偏南处即今郑州变压器厂家属院内,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的商代夯土基址,这是当时发现最偏南的一处大型房基;为打通东里路与城东路相接,需通过一段东城墙,经过发掘知道这段城墙修建在较高的沙土岗上,这沙土岗就是当今紫荆山的一部分。在郑州商城中部偏西处,即今天成路南侧,发掘出一座商代窖穴,出土能复原的陶器20余件,还出土有骨匕和卜骨等。在大口尊口沿或颈部外侧,刻有十字陶文符号、鸟字陶文或目字陶文,颇为罕见。还有1件瓮的腹壁当时曾用白灰面修补过。在郑州商城西城墙中段外侧500余米处,即今德化街商业大楼下,发掘出两座相近的商代灰坑,靠北的一座为东西向长方形,出有二里岗下层较完整的盆、斝、甗、大口尊和石器、骨器等;靠南的一座为南北向长方形,出有二里岗上层较完整的鬲、仿铜器的饕餮纹簋等。上述有些陶器不用修复就可在标本室展出。在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即今向阳回族食品厂院内,又发现1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内置大方鼎2件、大圆鼎1件,还有尊、罍、卣、小圆鼎、盘、觚等10件,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实为千古不朽的杰作。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外约700余米处,即今郑州市木材公司院内,发掘一座商代窖穴,坑内有1件折沿大口绳纹罐,罐内放置石镰19件,刃部均较锋利。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约500米处,即今北二七路中段路东,发掘4座商代墓,其中3座随葬有青铜器。总之,自1972年至1983年,笔者参与的郑州商城考古发掘,年年月月都有考古新发现,直到奉调到省文物局任副局长之后,方才离开商城工地。但每每回想起这十余年的考古生活,还是那样让人激动,让人留恋。

与此同时,笔者还积极整理考古发掘资料和进行夏商考古研究。先后发表了10多篇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20多篇研究论文。至于那部专著《郑州商城初探》的出版,则是1985年9月的事情了。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成果,稍向前推,就与夏文化的探索有密切关系。如果把探索夏文化比作是考古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商代前期距此也就是一步之遥了。这是多么艰难的一步,为此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用了大约数十年的时间,还没有完全跨过这一步。

在笔者参与郑州商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不少矛盾。除了经常与基建部门打交道，宣传文物政策法规，解释考古发现，有时还要进行争论，甚至变成唇枪舌剑。此外在学术界也时而有些不同看法。例如1978年第2期《文物》发表邹衡先生《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第一次提出来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改变了过去认可的隞都说法。1980年第1期《郑州大学学报》刊登荆三林先生《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提出“所谓的商代古城，不是一个城垣，也不是建于商代，更不是‘仲丁迁敖’的敖都。”“现在郑州旧城的创建时代，只可说是在唐代。”“现在的郑州旧城墙基及其主要部分，似是隋唐及其以后的建筑物。”邹衡先生在笔者上学时讲授“商周考古”，是受人尊敬的老师；荆三林先生是郑州大学德高望重的教授。前者把郑州商城的年代提前，后者把郑州商城的年代拉后，干脆认为是隋唐城。这两位老先生的一前一后，就使我们在郑州商城进行考古发掘的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几位年轻人坐不住了。他们对我说：“杨老师，你说郑州商城是隞都，北大邹衡教授说是亳都。你说是郑州商城，郑大荆教授说是隋唐城。人家写文章你不吭声，是不是默认了。”对此，一笑了之。笔者的态度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避免争论，息事宁人。随着年轻人说的次数多了，又听到外界同行的同样反映，我也就心动了。于是，在1980年第4期《河南文博通讯》上发表一篇《谈谈夏代文化的问题——兼对“郑州商城汤都亳说”一文商榷》，文中论述了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郑州商城可能为隞都。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目前看来，郑州商城‘亳都’说和‘隞都’说都有一定理由，但也都不充分。因此，还有待于今后对郑州商城继续进行发掘，这个问题和对夏代文化的争论一样，终究会得到解决的。”在1980年3期《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对“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一文的商榷》，用考古发掘资料详细论述了郑州商城何以为商城的理由。荆三林先生随即又发表了《再论郑州故城址的年代——答杨育彬同志》，文中强调了“郑州的大城是在大业年间建成的，它是在隋代恢复重建郑州地区政治经济地位时而创建。”“紫荆山是隋朝郡治城垣荒废后一段遗迹，因此，实际今日郑州旧城为宋元之后城池。”对郑州商城再次给予全盘否定。笔者只好又写了一篇《是郑州商城还是郑州隋唐城——拜读荆三林先生大作“再论郑州故城址的年代”》，刊登在《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上，从考古学上断代等七个方面进一步阐明郑州商城年代的可靠性。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1983年5月在郑州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会议主题是夏文化探索、商文化研究和各地出土的青铜器)彼此所写的论文中。现在看来，这些学术争论虽然有些益处，但倒不如只论自己的对，而不提对方的错，尤其不提名字，也许会更好一些。这实际上也是1983年后，笔者在考古研究中所遵循的信条。

三、郑州商城性质的判定，直接关系到夏文化的推断，作为隞都说的主要代表者之一，您是怎样接受这种观点的？

让我们再回到五六十年代。众所周知，郑州商城的发现是安金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贡献。这也关系到夏文化的推定。1961年笔者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到河南之后，学术界正在开展关于郑州商城的年代和性质的争论。1959年7月4日，史学泰斗郭沫若先生来郑州视察时，不但仔细看了郑州商城考古发掘工地和出土的文物，还亲笔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题诗：

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
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而殊。
佳肴仍有黄河鲤，贞骨今看商代书。
最爱市西新建地，工场林立接天衢。

诗中提到郑州商城可能就是仲丁所迁的隞都。1961年4、5期合刊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安金槐先生文章《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从地层叠压关系和遗迹、遗物的分析看，笔者认为郑州商代城址的时代没有什么问题。再联系到安先生在文章中列举的文献记载，看来郑州商城是商王仲丁的隞都也没有大差。其实早在1954年进行整理、1955年完稿的《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专集中，安先生就指出"郑州在商代当不是一般的小村落，很可能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邑。""郑州在殷代应属隞。"而1956年，邹衡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研究生毕业论文中也曾认为"郑州商代遗址在当时确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虽未明确指出是仲丁的隞都，但紧接着就引用了七条与仲丁隞都有关的文献记载，其意不言自明，只是后来改变了观点。

1977年上半年，在登封县城东南告成镇西侧，安金槐先生发现了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位于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名叫"王城岗"的高台地上，为东西两城并列，东城残存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它们垂直相交，构成略呈弧形的西南城角，东墙已被五渡河水冲毁；西城保存较好，它的东墙即东城的西墙，北墙西段残长29米，西墙长约92米，南墙长82.4米。南墙东段有一宽约10米的缺口，很可能是西城的南门。东西两城筑法相同，都是先挖城墙基槽，然后填土逐层夯筑。城内西部和中部较高的地方，发现有断续的夯土建筑遗存，其下填有多具人骨架，可能与奠基或祭祀有关。城内还发现有青铜器的残片，以及刻字的黑陶薄胎平底器残片。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古城址，经^{14}C测年距今4010±85年，应在夏初积年之中，据古文献记载，这里的地望在"夏都阳城"的范围之内，城址虽小，城墙基槽夯土的夯筑方法也很原始，但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城垣建筑由小到大，从原始趋向成熟的发展规律。这对探索夏王朝中心区域的文化，可算是一次突破。为此，1977年11月18日~22日，国家文物局在登封主持召开了一次"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文物考古界一次重要的学术盛会，实属不易。这次会议是围绕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探讨夏代文化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国家文物局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河南省博物馆等中央及有关省市的文物考古部门和大专院校的代表共计32个单位110人。其中包括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陈滋德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和佟柱臣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邹衡教授、河南大学历史系孙作云教授、河南省博物馆安金槐先生等领导和著名考古学者。会议期间，安金槐先生向大家介绍了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情况，代表们参观了发掘工地现场和出土文物标本室，并进行了多次学术座谈，对有关夏文化的问题各抒己见，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求同存异，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夏文化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并作为材料组的成员整理大会资料。会后以"余波"的笔名，写了一篇《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

现场会》的会议报道，发表在1978年第2期《河南文博通讯》上。当时对待夏文化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其一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1期）；其二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只有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才是夏文化（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1期）；其三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而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于商代早期文化（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1期）。笔者认同第三种意见。这实际与郑州商城为仲丁隞都说是密不可分的。

前面已提到，邹衡先生在1978年第2期《文物》上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向郑州商城隞都说提出质疑。1980年邹衡先生在其《夏商周考古论文集》中又提出隞都有可能在山东。这些虽有一定道理，但并未动摇郑州商城隞都说的地位。其后，到了1983年，在偃师发现了尸乡沟商城，1995年发掘了郑州小双桥遗址，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对郑州商城亳都说和郑州商城隞都说都有所冲击，旧案未了又出现新的问题。郑州商城亳都说者认为偃师商城为太甲所放逐的桐宫或监视夏遗民的重镇，郑州小双桥则为仲丁自郑州商城所迁到此的隞都。郑州商城隞都说者认为，偃师商城为汤所居的西亳，郑州小双桥则为郑州商城王室的祭祀遗址。这似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争论。这种争论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很正常的。关于郑州商城隞都说的问题，下面还要详细谈。

四、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7年工作汇报会上，您提到对某些资料的认识，研究者往往与发掘者的意见不同，请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感受？

近些年来，在考古研究中还有一种争论现象，即田野考古发掘者与一些考古资料研究者往往看法不同，这在郑州商城遗址、郑州小双桥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都曾经发生过。如郑州商城城墙的始建年代，发掘者认为：由于夯土城墙下压有二里岗下层的遗迹，如东城墙CET7和西城墙CWT5的下面均压有二里岗下层的小灰沟；而在夯土城墙内包含最晚的陶片属二里岗下层陶片，并且还发现有二里岗下层遗迹叠压在夯土城墙内侧根部，因此，郑州商城城墙始建年代不早于也不晚于二里岗下层时期。但有的研究者却认为郑州商城城墙下面所压的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小灰沟值得存疑，城墙内包括的少量二里岗下层陶片，其出土的层位、座标也不明确，这样，它到底是城墙始建时的包含物还是后期的掺入物就值得存疑。再者，城墙的夯土层很薄，夯窝很密，夯打非常坚实，一般说来包含的陶片多被夯打成碎片，而且又是少量，对于这少量的碎陶片，其文化年代的断定是否准确，也还是个问题。同时，依据南城墙破坏了南关外期文化层，因此，把郑州城墙城墙的始建年代定为南关外期。即早于二里岗期下层。又如偃师商城，通过对大城、小城、宫殿基址和大灰沟的发掘，发掘者认为偃师商城至迟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即早于郑州商城。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始建年代不会那么早。退一步说即使始建于二里头四期晚段，也要比始建于二里岗下层早段郑州商城晚。其逻辑是二里岗下层早段与二里头四期晚段有相当的并存时期。因此，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下层早段有可能早于偃师商城的二里头四期晚段。其实，从历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河南或山西南部，只发现多处二里岗下层叠压或打破二里头四期，而没有发现哪怕是一处二里头四期叠压或打破

二里岗下层。与此相同的是,在偃师商城北城墙东段附属堆积下面叠压的几个小灰坑,明明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但有的研究者在看其陶片时随口就说出这属于二里岗上层,大约是他把折沿罐看成折沿鬲了。这些也都应该是正常现象,可能因为站的角度不同,思考的方法不同。相互争论既能相互启发,也能相互促进,只不过是发掘者接触实际更多一些,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在您参加的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中有哪些进展?请具体谈一下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年代和性质问题。

这个问题和下面关于目前夏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在 1998 年 12 月我们所写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郑州商城专题结题报告》中已经写过,这里再重复讲一下。

从 1996 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的重点社科项目。广泛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学等学科,通过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夏商和西周前段时期的年代进一步科学化、量化,需要这些学科的专家改变自我封闭的状况,彼此合作,联合攻关。历史学者将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等不同角度开展工作。在文献学方面,将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辑集起来,建成资料库,加以分析整理。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进行详细考证,逐一判断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文献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各都城的地理位置,为在考古学上探索夏代提供依据。在古文字学方面,将结合考古学研究,进一步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分期,选取有年代学意义的标本,以供天文历法方面研究或进行测年。天文学者将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的成果,推算确定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准确的坐标。在历史文献学和古文字学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天文数据库和天文计算重新核查对断代特别有用的古代天象记录。从天文学角度,进行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历法的研究,改进甲骨文、金文历谱,推定商代武丁以后商周各王世的绝对年代。考古学者将对与夏商周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和分期,为利用现代化手段测定夏商周绝对年代提供层位明确、文化属性明确、相对年代清楚的测年标本。研究重点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同时兼顾周邻地区与夏商周文化关系密切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在测年技术科学方面,主要采用^{14}C 测年方法,提高精确度和可靠性。最后希望达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半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后期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无疑为解决争论多年的夏文化和确定早商文化奠定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进行之后,属于考古学的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在安金槐先生领导下,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郑州小双桥遗址作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加上过去考古成果和积累,为综合探讨商代前期的文化分期,研究这些城址遗址的年代和性质提供了有利条件。

通过对偃师商城西城墙、西城门和北城墙的发掘,可以见到一批二里岗下层的文化层、路土、墓葬,叠压或打破城墙的附属堆积。与此同时,在西城墙和北城墙夯土内出有一批陶片,有罐、瓮、鬲、盆、大口尊等,从其形制看多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也有一些二里头

文化三、四期的。此外,在北城墙东段发现有被夯土城墙基槽打破,同时又被城墙附属堆积所叠压的文化层,文化层内所出的陶片不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在城墙附属堆积下面还发现有几个小灰坑,坑内出土有一批陶片和与青铜铸造有关的木炭、铜液凝固块和小块陶范等遗物,其陶片也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这样可以证实偃师商城始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近年,在偃师商城西南部,发现一座小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740米。已知北墙中段和东墙局部有曲折,墙宽6~7米。其南墙、西墙和东墙的南段同偃师商城(可称为大城)城墙重合。通过南墙和西墙的发掘证明,小城的始建要早于大城。当扩建大城时,曾利用小城的南墙、西墙及东墙的南段,将其内外两侧加宽并加高,亦即将小城墙包在大城城墙之内。以致大城墙宽约17~19米。而大城的西墙北段、北墙的全部和东墙的大部则为新建。这样,偃师商城的宫城就正位于小城的中轴线偏南部位。考古发掘资料又显示最初的宫殿和宫城,甚至比小城还要早,如4号宫殿呈长方形,包括正殿和东、西、南庑及庭院等遗迹,属三面封闭式宫殿建筑。从打破4号宫殿的灰坑D4H29的^{14}C测年看,其年代为3380±75年,树轮校正为3630±125年,这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一致。而6号宫殿(原称为5号宫殿下层基址)平面呈口字形,北面基址较宽,其余三面较窄,构成方形庭院。在宫殿内发现有二里头四期文化层。而打破6号宫殿的灰坑D5H19的^{14}C测年为3395±80年,树轮校正为3650±130年,这也和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相一致。宫城的建筑,是偃师商城最初出现的标志性建筑物,由此可以推断,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在偃师商城范围内的其他发掘表明,偃师商城建城之后,历经了二里岗下层一、二期和二里岗上层一期的断续繁荣之后,到二里岗上层二期时,就已经衰落甚至废弃了。

在郑州商城,配合旧城改造纵穿南北紫荆山路及横贯东西的顺河路打通工程,以及一些工厂、学校的基建项目,在南城墙、东城墙和宫殿区等处进行考古发掘。再结合以往的考古收获,发现有二里岗下层一些文化层等遗迹,叠压或打破夯土城墙。在西城墙和东城墙下,压有少量二里岗下层的灰沟。夯土城墙内包含最晚的陶片亦属二里岗下层。城内虽然也发现少量的二里岗下层一期甚至洛达庙期的遗迹,但其规模较小,形不成气候。由此推断郑州商城始建年代不早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阶段,也不晚于二里岗下层二期,这要比偃师商城晚一个阶段。此外,从郑州商城东城墙夯土层的^{14}C测年看,距今为3330±95年,树轮校正为3570±140年。要比偃师商城晚数十年。通过对郑州商城内外的发掘,可以看出在二里岗下层二期时已初具规模开始使用;在二里岗上层一期时已达到繁荣阶段;到了二里岗上层二期时,一些手工作坊仍在使用,在城墙外侧发现与祭祀有关的青铜器窖藏,出土大量王室使用的青铜重器,在宫殿区内多处发现目前我国最早的绳纹板瓦,这自然与宫殿建筑有关。其它遗迹和遗物也发现不少。这表明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上层二期时虽然没有前段繁荣,但绝非是被废弃的时期。

测年专家认为,用^{14}C常规法其精度要达到或优于千分之三,用加速质谱计法精度优于千分之五。这也就是说,常规法更为准确。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到1999年8月6日为止,笔者仅获知一个^{14}C测定的年代数据,即郑州电力学校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水井J3井框圆木的年代。测年专家在此圆木上采集8组样品,经用常规法系列测定拟合,该圆木外轮年代为公元前1400年,亦即距今为3400年,误差仅8年,十分精确。在J3井发现的陶器为相当数量的直领方唇或圆唇捏口罐、方唇颈部弦纹和同心圆圈纹鬲、卷沿弧

腹盆、高领圆鼓肩壶、方唇高领折肩瓮等,属二里岗上层一期;在井坑即 H10 夯土内最晚的遗物也是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陶片。证明 J3 为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无误。由此可知二里岗上层一期为公元前 1400 年。J3 的测年数据,已为测年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研究员和测年专家北京大学考古系原思训教授共同确认。有些专家曾推断二里岗上、下层四期文化约 200 年左右,每一期约 50 年左右。据此推断二里岗上层二期约为公元前 1350 年左右,二里岗下层二期约为公元前 1450 年左右,二里岗下层一期约为公元前 1500 年左右,鉴于郑州商城始建年代约在二里岗下层一期晚段,则不会超过公元前 1500 年即不超过距今 3500 年。还有学者把商代始年估定为公元前 1622 年,但若以已经确定的二里岗上层一期为公元前 1400 年来推定,公元前 1622 年说不定会相当于二里头三期,这为一些学者认为夏商分界在二里头二、三期提供了一些信息。同时,商代始年为公元 1622 年,依今本《竹书纪年》商汤到外壬各王的在位年数近 200 年,这样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上层一期时作为王都,即公元前 1400 年时作为王都,那与仲丁与外壬之时相差不远。

郑州小双桥遗址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商代遗址。发掘出一些夯土台基、多座牛头及牛角的祭祀坑、埋有人骨或狗骨的奠基坑,出土一批陶器、石器、青铜器、玉器及朱书陶文,还有孔雀石、炉壁残片、铜渣、残范块等遗存。这些遗物少量属于二里岗下层二期或二里岗上层一期,大量为二里岗上层二期。据此推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属于二里岗上层二期,但某些遗迹的时代也可能会早一些。

如上所述,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它们之间的繁荣与衰落,发展与停滞,高潮与低谷是相互交错的。当偃师商城始建时,郑州商城尚是一个聚落址;当偃师商城进入繁荣期时,郑州商城才开始修建;当偃师商城停滞时,郑州商城进入使用和发展时期;成为一座防御东方的重镇;当偃师商城又稍有恢复时,郑州商城却更加辉煌;进而发展成为一代王都;当偃师商城废弃时,郑州商城又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才逐渐衰落下去。一些学者认为,偃师商城是商灭夏后所建最早的都城,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已经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更替,偃师商城成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至于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在其出现时,郑州商城早已存在,其废弃时,郑州商城仍在维持,有相当长的并存时间。

说起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这是个形象化的比喻,商灭夏就其时间而言,在商王朝的版图内应该能找到不少证据,但作为界标只能有一个。近年来有的学者坚持把郑州商城也列为界标,似乎不妥。说偃师商城是界标,那是因为该城建立在夏都的旁边,是夏王朝已灭亡和商王朝已建立的标志。而郑州商城的建立先不说其早晚,但与夏王朝灭亡联系远没有偃师商城那样紧密。就实际情况讲,商灭夏应在偃师商城建立之前,只不过是用其作个标志。若把郑州商城或其他什么都作为界标,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时空框架确定之后,就为探讨它们的绝对年代亦即商前期年代奠定了基础。在田野发掘中,依据考古学文化分期,对各个典型单位,连续层位采集了一大批包括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各个时期的含碳测年标本,通过^{14}C高精度的测定,得出较准确的商前期日历年代。与此同时,还要与夏代年代学研究和商后期年代学研究两个课题相结合,为建立夏商编年提供方便。将上述两种途径得出的结论与有关文献关于商年的记载以及天文学研究成果相对比,最终可以建立起商代前期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同样,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郑州小双桥遗址的时空框图架确定之后,也为探讨它

们的性质创造了条件。对于偃师商城来说,从其始建年代、地理方位、规模和形制来看,它是商代最早的一座都城。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认定是商汤灭夏后在这里所建的亳都。《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条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从偃师商城西墙和北墙的发掘来看,商代夯土城墙之上均有汉代文化层叠压,说明至少在汉晋时期,城墙还矗立在地面之上,而班固一定也曾目睹了这座城址,并以汉代地名转述前人旧说。虽未直言亳都,但汤都为亳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从历史发展看,这一带是夏王朝的辅畿地区,商灭夏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为了加强控制迅速扩大的商代疆域,为了镇抚夏王朝的残余势力,成汤就在这里建立都城。《诗·商颂·殷武》记有:"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春秋齐器《叔夷钟》铭说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卷七)云:"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均可提供佐证。

还要指出的是,在偃师商城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低洼地带穿越而过,当地群众世代相传称之为尸乡沟或尸乡洼,今发掘出的偃师商城亦被称为尸乡沟商城即由此而来。这与文献所记的"尸乡"相同,当非巧合。而近年来在这一带的吓田寨、杏园村、槐庙村等处,发掘出一批唐代墓葬,从其墓志记载看,有唐一代这里就称为"亳邑乡"、"薄台里"、"西亳"、"尸乡"、"景亳"等。这些有的是唐代建制的乡名,有的是别的地名,但都是沿袭古代的旧称,应与偃师商城有关。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偃师商城是汤都西亳。

而郑州商城规模宏大,布局有序,是一座商代前期无可置疑的王都。从商代历史看,汤都亳在前,仲丁迁隞紧接其后。前已论述,偃师商城为商灭夏后所建最早的都城,即汤之亳都。郑州商城比其要晚,其繁荣期可能就是仲丁的隞都。

一些文献记载说得较为明确,如《诗·小雅·车攻》记有:"东有甫草,……搏兽于敖。"郑玄注:"敖在郑地,今近荥阳。"甫草即甫田之草,在今郑州东郊圃田一带。把"甫草"与"敖"并列于诗内,说明二都有相距不远,且"敖"在"甫草"以西。由此可知,敖就在郑州一带。

从郑州商城修建的背景和仲丁迁都的情况看,有商一代在商王朝东西南北时而有些战事,如对西部的羌方,北部的土方,西南的巴方,东部的夷方等。但战事最频繁的还是在东方,而且贯彻商代始终,直到殷末还曾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夏部族与东夷既有婚烟关系,也有政治联盟,这不能不对商王朝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商灭夏后在偃师建都,待大局平定国力有恢复之后,就在郑州修建城池,为日后平息东方威胁作准备。到"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当时迁都的最主要原因是对付外部敌人。而仲丁之时,就有征伐东方蓝夷的战争,《竹书纪年》记有:"仲丁即位,征蓝夷。"《后汉书·东夷传》亦曰:"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而蓝夷是古代东夷族的一支,约在今鲁南、苏北一带。仲丁迁都主要是为了便于征伐蓝夷,也只能从偃师商城东迁到郑州商城,即从亳迁都至隞。

近些年来,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外 900~1200 米处和西城墙南段外 700~900 米处,发现有一大段属于商代二里岗的夯土墙,可与 50 年代在二里岗北部即东城墙南段外侧发现的夯土墙相连,断续长度约在 5000 米左右。这应是起防御作用的外城墙。在内外城墙之间有铸铜作坊遗址、窖穴、房基、青铜器窖藏坑和多处墓葬。而在外城之外,商代遗迹就非常少。这样,就把郑州商城的范围扩大了近一倍。商汤灭夏后不可能立即兴建这样大的都城,而只能在定都在偃师商城经过一长段时间休生养息之后才可办到。这就为郑州商城

是仲丁所迁之隞都提供新证。

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偃师商城要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不可能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亳都。而郑州小双桥遗址兴衰的全过程，均与郑州商城始终并存，绝不是郑州商城废弃后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才兴起来，即所谓年代上“一兴一废”的前后衔接关系。从前面提及的《竹书纪年》等方面记载可知，仲丁即位之后，蓝夷作寇，外患不安。又据《史记·殷本纪》所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这又反映了中丁后期政治动荡，内忧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若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作为隞都，则势必要有城墙等防御设施。但时至今日，尚未发现一点线索。这要用当时没有修建城墙是难以解释的。

废旧都迁新都，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主要都是因为政治和军事原因。从最早的夏商周迁都到北魏孝文帝迁都，以及辽金元明清诸朝迁都都是如此，而且新都离旧都相距甚远，从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者，比比皆是。但郑州小双桥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中心部位相距仅 20 公里，若以边缘计算，尚不及此数。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废掉郑州商城，在其远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再建新都。有人反驳说西周初文王都丰邑，而武王又建镐京，两者不是相距很近吗？其实这不是什么迁都。从考古发现看沣水以西的客省庄、张家坡一带是丰邑，沣水以西的普渡村、花园村、斗门镇一带是镐京，二者基本连成一体。从文献记载看，《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这说明，虽然周武王建镐京，但成王时还经常在丰发号施令，且成王可以自镐步行至丰。丰邑在整个西周时期仍然起到宗庙祭祀和政治中心的作用。丰邑和镐京实际上是一座扩大的了国都，而被连称为丰镐，绝非废丰兴镐。犹如今天襄阳和樊城组成了襄樊，武昌、汉口和汉阳组成了武汉一样。

再从郑州小双桥发掘的考古内涵看，是一些夯土台基、牛头牛角祭祀坑、少量奠基坑，和一些陶器、石器、青铜器、玉器及朱书陶文。没有发现明显的居住生活的迹象，即没有发现考古学者一般所称的“生活垃圾”。这表明，郑州小双桥只是一处商代王室祭祀遗址，而不是一座王都。

还要提及的是，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最初调查是 15 万平方米，目前已扩大到 144 万平方米，那是把发现的若干遗址点连线而成，据说类似的点还在增多，那么遗址面积还可能扩大。但是它们不同于一个大城垣之内的若干遗址地点，这些遗址点的时代和内涵是否都完全一样，是否属于同一个大型遗址，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证实。

六、您认为目前夏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对于夏文化研究来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夏代的起始年代和夏商的分界年代。按目前情况看，偃师商城为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有可能逐步达成共识，那么夏代的起始年代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了。

有些学者认为，夏代起始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而止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再早再晚均不是。而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进行考古发掘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时，偃师二里头一带遗迹遗物较少，尚属于一般聚落。二、三期为其繁荣阶段，夏王朝在这里建都。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这里已经衰落，至迟到了四期晚段，二里头遗址旁边已出现了偃师商城，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更替。这又是前面说过的田野考古发掘者与一些考

古资料研究者意见的不同。据^{14}C测定，它的年代最早距今不超过3900年，其繁荣期也不过200年。这与整个夏代来比，可能太短一些。有的学者称，二里头一至四期为夏文化，但并不包括夏禹王在内。且二里头一期虽然遗迹甚少，但也应该是王都所在。其理由是：由于二里头一期时间早，受破坏就很严重，所以遗迹留下就少；由于二里头二、三期宫殿基址等未发掘到生土，所以其下可能压有二里头一期遗存，因此所见遗迹就少；由于二里头一期为夏初王都初建阶段，本来遗迹就少一些……云云。即使这样，二里头文化作为夏积年还是有一定差距。鉴于至迟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属于商文化，那么夏文化就不能向后延续，只能向前面追溯。早于二里头文化而又与之紧密相连的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它们时间早晚衔接而又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二里头一期陶器中的鼎、盆、罐等的形制和纹饰还遗留着河南龙山文化的作风。以至于在50年代进行考古发掘时，就把二里头文化早期归入河南龙山文化之内。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本来就是根据发掘情况人为确定的，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渊源，二里头文化也可以说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归宿。如果把二里头文化早期归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内，或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纳入二里头文化早期之内，也实在不算大错。有的学者也认为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一期文化不是夏代的早期，但却提出要去寻找所谓比这里的二里头一期文化还要早的二里头一期文化，最近有的学者观点稍有松动，认为在密县新砦遗址发掘的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阶段，即被称为新砦期的阶段，可以划归到夏文化早期，相当于夏初启在位的时期。其实新砦期实际上已是龙山文化晚期的范畴。这还是要追溯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不过不提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名称而已。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夏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在邹衡先生的领导下，自1996年至今，已经在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等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第一手的全新资料。在河南龙山晚期之时，已经出现了诸如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安阳后岗等城邑，已经能够铸造青铜器，发明和使用文字，并有了较为复杂的礼制遗存，这都为夏王朝的建立创造条件。到了距今4000多年的时候，夏王朝开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西起华山之东、东到豫东平原、北自济水之南、南抵淮河沿岸方圆千里的奴隶制王国。

夏商是我国文明国家的形成时期，也是我国文化底蕴的奠定时期，其年代问题的解决，对深入阐发中华文明的源流，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成就有重要作用。我们相信，通过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通过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和学术界坚持不懈地努力，夏代及商代的年代和历史面貌必将大白于世人面前。这必将大大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面向世界，开创未来。

（《寻根》杂志特约稿，原载《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

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概述

河南地处祖国的中原，太行山脉蜿蜒于西北，大别山脉逶迤于东南，西部的伏牛山脉与秦岭相接，黄河与淮水横贯其间。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

河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它和黄河流域的其他几个省区，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祖先就已经劳动生息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创造了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这一地区开始进入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建立的商王朝，把我国古代社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迄今为止的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商代文化所分布的范围，西达现在的山西、陕西，南抵江西，北至辽宁，东及渤海湾西岸和山东半岛。而河南正处于这一区域的中心。代表商代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的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安阳殷墟三大遗址，也都在河南境内。因此，对河南的商代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的研究，是我们探讨和了解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艺术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一

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最早著录于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其后许多书籍也载有不少器物的图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偃师二里头，郑州白家庄、铭功路，安阳殷墟和辉县琉璃阁、褚邱等地都有成批重要的青铜器出土。此外，在密县曲梁，登封告成、袁桥，荥阳西张、张片庄，中牟黄店，新郑贾庄、望京楼，偃师塔庄，项城毛冢，获嘉照镜、东张居，孟县涧溪，林县下庄和洛阳西关等地，也有所发现。

偃师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代城内的宫殿建筑群遗址的发现，是我国奴隶制时代考古学的重大收获。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层的宫殿建筑和郑州商代城内的宫殿建筑群遗迹，表明这里曾是商代前期的两处重要都邑。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这三处遗址都有大批青铜器出土，我们对河南出土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不妨以此为线索，划分为偃师二里头期（简称二里头期）、郑州二里岗期（简称二里岗期）和殷墟期三段加以考察。

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生产工具，有戈、戚、锛、凿、锥、刀、镞和鱼钩等。这些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都模仿同形制的石器或骨器，具有商代早期青铜器的特征。例如直内戈的援与内的分界不明显，曲内戈的援与内交接处呈直角，无阑。锛、凿的顶端无銎，不能安装木柄。出土的容器只有爵，且数量很少。一般细腰平底，铸造较粗糙，器壁极薄；口沿前有窄流，后有尖长尾，流口间有短柱或无柱，口沿边略

加厚;爵身横剖面呈桃形;带鋬一侧近流处的口沿微向内凹;一足与鋬相对应,另两足分别与流和尾的部位相对应;足较矮,且长度不一。也有的爵,两足呈三棱形,一足呈四棱形,外侧错出器身。从流口和尾尖到底部,以及底部、三足都留有范痕。一般的爵装饰简朴,素面无纹饰,有的鋬上有镂孔。还有一种爵,细长的流尾,从流端到尾端的长度几乎与爵的通高相等,流口间有小柱。三棱锥足外撇,且是另行铸造后再与身嵌接在一起的。爵身一侧有两道弦纹和一排乳钉,这是我国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鋬上有镂孔,是填塞范芯时上定位销遗留的痕迹,它显然是模仿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文化陶盉或陶爵器鋬的镂孔装饰。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另一特征,是出现了镶嵌装饰。1975 年秋,在遗址 3 号坑出土的铜戚和铜戈的近旁,发现散置着细小规整的片状绿松石,估计是铜戈曲内云纹间的凹槽中镶嵌用的。在 4 号坑出土的一件圆形铜器,直径 17 厘米,厚 0.5 厘米,边沿镶嵌了 61 块长方形绿松石,有如钟表盘面的刻度,中间镶成两周,每周由 13 个"十"字形绿松石构成,相当精致。这都说明了二里头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已经脱离了原始阶段。

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二里头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郑州白家庄、铭功路和河南其他地区二里岗期墓葬,出土了约 150 件青铜器。它们的年代虽晚于二里头遗址第三期,但从器形和纹饰的风格特征加以考察,一般都要早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和江西清江城三处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二里岗期最常见的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有:斧、镬、斨、戈、矛、镞、刀、锥、钻和鱼钩等。它们的形制多仿石器和骨器,但已有明显的变化和改进。例如:斧、镬、斨、矛的顶端有銎眼,用以纳柄;镞有两翼和血槽;戈的援内有凸起的阑,以防戈头脱柲。这一时期最常见的青铜容器有:鼎、鬲、斝、爵、盉、觚、尊、罍和盘等。它们的形制虽还未脱离陶器的窠臼,但纹饰却有了自己的特点,比起陶器表面极简单的拍印纹饰,要复杂多了,出现了饕餮纹。二里岗期下层墓葬出土的铜器,鼎、鬲的口沿上都有半环状耳,两耳和三个尖锥状空足,排列的部位和同期出土的深腹陶鼎相同,即一耳在两足间的空裆,另一耳与另一足相对应;一些鼎的颈腹间饰两周弦纹;鬲的腹部与分裆间的外壁饰两周凸起的人字纹;敞口斝的形制和二里岗期下层陶斝相似,但在颈下铸两周弦纹,弦纹之间铸一周凸起的乳钉;盉的器形极似二里头第二期的陶盉;爵窄流,两柱矮小,靠近流部。三足支点不很稳定,椭圆形的平底上有"　"形的范线与三锥足相连,腰较二里头期铜爵略粗,口沿保持着略加厚的特点。有的腹部铸两周弦纹和一周乳钉纹,如同二里头期铜爵上所铸的纹饰。在二里岗期下层出土的青铜器上,还可以看到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兽面纹。登封袁桥、中牟黄店和郑州东关出土的爵,兽面纹的双目是空白的,形象很简单,并且各不相同,说明这种纹饰尚未定型。二里岗期上层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较下层数量增多,器类也有不同。有的爵,器身瘦长,上腹较细,下腹圆鼓,腹壁间饰两层饕餮纹,流口间有独柱或较高的双柱。新郑望京楼出土的圆鼎,深腹空足,两耳和三足的位置与下层的鼎相同,但出现子母口沿,可以承盖。郑州张砦南街出土的方鼎,口沿的长宽比例相近,四足空心。斝的器形虽与下层的相近,但双柱的顶端已作菌状,且饰涡纹。尊、罍、盘的圈足较矮,并有镂孔。觚体较矮,作筒状。二里岗期上层墓葬时有下层类型的铜器出土,如属二里岗期下层的郑州黄河医院 32 号墓出土的爵和斝,在二里岗期上层墓葬内也可见到,这可能是铜器本身的使用寿命较长的缘故。二里岗期上层青铜器的纹饰

已经趋向成熟。鼎、鬲、爵、斝、盉、觚、罍和尊，大都采用单层花的流动云纹和带状饕餮纹作装饰的主题，但偶然也可见到目雷纹、三角雷纹和弦纹。在布局上，这些纹饰多安排在器物的颈部、肩部、上腹部或圈足的外壁。环绕于爵、觚外壁的，通常是两组，在鼎、鬲、盉、斝、罍、尊、盘外壁的多系三组。这时期的纹饰，也并非单一的，还有由单线条或双线条组成的饕餮纹，双目凸出器表，线条间的空隙较大，似是后世用白描手法勾勒出来的。这在郑州白家庄和辉县琉璃阁出土的一些铜器中，最为典型。此外，也有用单线条组成的目雷纹和联珠纹，以及云雷纹、圆涡纹和十字镂孔等装饰。二里岗期上层个别青铜器的纹饰，有由带状分布转向通体开展的趋势，如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尊、罍，偃师塔庄和郑州人民公园东门内出土的尊，郑州杨庄、辉县琉璃阁和郑州铭功路4号墓出土的爵，荥阳张片庄出土的斝等就是如此。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郑州白家庄出土的罍，颈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唐兰释为“龟”字），肩部饰云雷纹，腹部饰较大饕餮纹及云雷纹，主纹上增添了细线，上下缘以雷纹作边饰，圈足上饰弦纹和十字镂孔。这种装饰打破了以往用饕餮纹作带状的习惯，腹部主纹上的细线，预示着即将出现主纹衬以地纹的新形式。1954年郑州人民公园东门内出土的尊，腹部饰饕餮纹，肩部有凸出的兽头和扉棱，由于器物表面纹饰层次的增多，加强了器物的立体感。这在商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上，应是一件划时代的作品。

殷墟期出土的青铜器，在数量上远较二里岗期增多，器类也较复杂。常见的兵器有：戈、矛、戣、钺、戚、刀、镞和弓形器等。工具有：斧、斨、䦆、锛、凿、锥和铲等。还出现了大批通体饰有花纹的礼器，如：鼎、斝、鬲、爵、盉、觚、罍、尊、甗、觯、盘、簋、壶、卣、瓿、角、觥、方鼎和方彝等。许多新器形的出现，说明在商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铸铜手工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

考虑到殷墟期包括的年代较长，为便于说明，我们把它划分为四期，分别加以叙述。殷墟一期的青铜器，解放前在殷墟出土不多，解放后也很少出现。密县曲梁遗址出土的觚，器形与二里岗期上层相近，但圈足饰饕餮纹，改变了以前只在腰部饰饕餮纹的格局。灵宝东桥墓葬出土的鬲、爵、斝 、尊、瓿、钺、斨，明显地具有此期的特征。鬲的器形虽与二里岗期的相似，但器壁已明显增厚，锥足的足根已较二里岗期的平整，有向柱足发展的趋势；斝颈部饰目雷纹，足的横断面作“T”形；爵柱已退至流口间，腹的横断面趋向扁圆，浅圜底与腹壁间有明显的分界线，中腹外壁一侧饰以雷纹地的饕餮纹；瓿的器形和纹饰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相似；尊器壁较郑州人民公园东门内出土的厚重。如上特征都表明，这些器物的年代稍晚于二里岗期上层，与殷墟一期接近或相当。根据这个论断，我们认为殷墟一期似可列入商代前期的范畴。

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和武官村大墓为代表的殷墟二期，出现了新的器类和器形，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甑、缶、偶方彝、方彝、方罍、方壶、方尊、透雕觚、圈足觥、四足觥和鸮尊，还有5枚成编的铙以及镜、卷云纹铲、箕形器、多钩形器和斗等，都是以前所没有的。器壁较以往厚重，“三层花”装饰已相当普遍。有些器形已经大型化，甚至发展成联体的形式。有的模拟动物的形象，有的还增加了器盖。方鼎长与宽的差距较大；圆鼎都是深腹柱足，两耳与两足对应，改变了二里岗期的形制。妇好墓出土的龙首刀、銎内戈和弓形器，可能与当时战车的装备有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提梁卣、分裆柱足鬲、带扉棱的爵、三角形

的戣以及 1931 年春殷墟 331 号墓出土的卣和提梁方卣都是这期的代表作。这期的礼器多成双成套。平底爵数量减少，圜底爵盛行，平底斝的三足外撇，觚腹较深，圈足器的圈足较高。礼器的纹饰可分立体和平面两种，立体纹饰有龙、夔龙，双头盘龙、虺、人头、虎头、牛头、羊头、鸱鸮、鸟、鹰头和其他怪兽。平面纹饰以饕餮纹为主，也有虎面纹、夔纹、蝉纹、蚕纹、蕉叶纹、对角雷纹、云雷纹、圆涡纹、龙纹、凤纹、象纹、鱼纹和龟纹等。这些铜器有铭文的不多，即使有铭文字数也少。铭文的图画和象形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有的器物还铸有族徽。

殷墟三期以 1957 年发掘的安阳高楼庄 8 号墓、1958 年发掘的安阳大司空村 51 号墓和罗山蟒张 1 号墓为代表。前两座墓葬都是小型的，出土的青铜器虽不如王室墓葬，但在器形、纹饰和组合方面都具有特点，可看作这期铜器的典型作品。这两座墓出土的青铜器分类及组合情况如下表：

安阳高楼庄 8 号墓和大司空村 51 号墓出土青铜器对照表

器名 / 数量 / 墓别	鼎	爵	斝	卣	壶	簋	尊	觚	觯	戈	矛	刀	削	弓形器	铙	铃	镬	凿	镞	铲
高楼庄 8 号墓	3	2	1	1	1	1	0	2	1	8	3	1	2	0	3	4	2	0	0	0
大司空村 51 号墓	2	2	0	2	0	1	1	2	0	6	5	1	1	1	3	2	2	1	2	1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两座墓出土的青铜器类和数量都很接近，前者比后者多一鼎，卣、壶、尊等互有差异，戈、矛、镞、削、刀、镬和弓形器等随葬的成套兵器和工具的类别和数量也很近似。这说明了两座墓的墓主的身份是相似的。两座墓出土的兵器和工具的形制与大司空村车马坑出土的战车所附属的兵器和工具几乎完全相同，表明它们的主人也属于武士阶层。这期的器物特征是：觚腹较殷墟二期的浅；簋敞口，下腹斜收，器形与同期陶簋相近；圜底爵和罐形斝盛行；尊的器形似殷墟二期的粗体觚；细体觚的器形更为细长；壶器身横断面呈扁圆形；瓿形卣有提梁；弓形器多星形装饰。这期器物还流行尾部下卷的饕餮纹，三角纹、三角雷纹、菱形乳钉纹和小型兽面纹很普遍，夔的唇口多反卷，鸮纹、蕉叶纹和“三层花”也较常见。1976 年殷墟祭祀坑 229 号墓出土的约为祖庚、祖甲或廪辛时期的两件大小铜鼎，与 1939 年殷墟出土的文丁时期的著名“司母戊”鼎，都是这期的代表作。它们的造型和纹饰都较精致美观，气魄雄伟，标志着商代青铜冶铸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59 年发掘的安阳后岗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是殷墟四期的代表。这里经过两次发掘，出土鼎、卣、爵、刀、镞各一件，戈两件。此外，还发现了 30 余件殷代晚期的陶器。出土的鼎有铭文 30 字，是商代铜器中铭文字数较多的一件。鼎贯耳外侈，上腹饰带状饕餮纹，且有扉棱，柱足上下较中部粗，上段饰兽面并起扉棱，足根似蹄形，与西周初期的大盂鼎器形

相似。瓿形卣没有提梁,肩饰小型兽面,器形和殷墟三期的接近。镞的双翼作燕尾状,中间起脊,有短铤。环首刀系直背直刃。所有这些,都属于殷代晚期铜器的特征。出土的戈中,有一件的冒,原应钉在柲端,却被装饰在援、内间的上部;另一件,长胡两穿。类似的戈,在西周的墓葬中也曾见到。殷墟四期的簋、盂,圈足较高,普遍有双耳;盆形鼎、分裆鬲和甗的腹部相对变浅;爵的双柱较长,退至口前沿;斝分裆,菌状柱较高;盉作壶形;粗体觚为平底,高圈足内壁偶尔有铭文;细体觚有扉棱。在纹饰方面的变化,主要是饕餮纹的尾部下垂,夔纹口部作上下对称的钩状。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河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此外,还有一种素面无纹饰的或纹饰极为简单的器物,例如仅有弦纹的鼎、鬲、爵和斝,或仅饰×、︽纹的鼎和鬲,乳钉纹的爵和斝,以及腹部饰有椭圆形鼓面纹的斝等等。这些风格简朴,保持着陶器特点的青铜器,从商代早期到晚期与铸有饕餮纹等较复杂纹饰的青铜器始终并存着。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注意。在50年代,有人曾认为,它们可能属于明器。我们以为这个论断似难成立。据我们推测,这种青铜器并非明器。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与当时使用这一类型器物的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

二

早在20年代和30年代,安阳殷墟一带就曾出土过带有铜锈的陶范、炼渣、木炭、熔铸的铜块、锡块,还发现过重达18.8公斤的孔雀石、粘有炼渣的"将军盔"残片、重达21.8公斤的炼渣以及铜壶和铜方彝的泥模残片。但是这些发现都较为零散。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河南境内商代铸铜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商代青铜器和铸铜手工业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1953年,在洛阳东郊泰山庙发现一处商代铸铜遗址,出土有大量铸铜的碎片,其中云雷纹的觚范极为精细。1954年,发掘了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出土了坩埚、灰陶大口尊、红陶缸等熔铜工具和镞、刀、斝、方鼎、鬲及爵等铜器的陶范和范芯,以及孔雀石、铜渣、木炭和一些青铜器。1955年、1956年,在郑州紫荆山北地商代铸铜遗址,发现了房基和地坪上布满了绿锈的铸铜场地。1959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了坩埚残片、铜渣和陶范,说明这里有商代早期的铸铜遗址。1960年,调查了武陟县城东的商村铸铜遗址,在商代文化层中发现了陶制的镬范和铜渣。1959年、1960年,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包括薛家庄一带)和孝民屯,发现一处约1万平方米的铸铜遗址。经过发掘,在苗圃北地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单间和双间房基、工棚遗迹和坩埚,还有铸造鼎、爵、觯、觚、卣、盘、器盖、簋、罍、镞、矛和铜泡等使用的外范3835块,铸造觯、觚、斝、爵、鼎、簋、戈、矛等使用的内范1003块,以及少量的陶模残片。长达1.2米的方形陶范、直径0.83米的坩埚、直径1米的炼炉也是在这里发现的。这里是一处规模相当大的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具有冶铸大型青铜器的能力,当是无疑的。上述考古资料表明,商代在通都大邑,都设有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其中以殷墟宗庙宫室遗址附近的规模最大。

在郑州和安阳的商代铸铜遗址，我们发现当时用于冶炼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主要原料是孔雀石，冶炼的温度估计在1000℃左右。对两地出土青铜器进行化验，可知当时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锡和铅等元素。在冶铜器具方面，郑州两处铸铜遗址出土的红陶缸、灰陶大口尊，安阳殷墟出土的“将军盔”，都是夹砂厚胎陶器，外壁抹有耐火土，用以增加其强度和耐热保温性能。规格均较小，灰陶大口尊口径36.8厘米，壁厚2厘米，残高55.4厘米；红陶缸大小与此近似；“将军盔”口径25厘米，壁厚3厘米，高35厘米。看来它们只适宜铸造一些小型器物。前面提到的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出土的直径1米的炼炉，内壁有一层烧熔的渣釉，表面粘有木炭末和铜渣。在相当于炉座部位的周围，有许多炼炉残壁和木炭粒，硬土面上还遗留有几道有一定流向的凹槽，表面粘有铜渣，估计是流铜液的渠道。有一炼炉的残块，在炉壁与底部间有直径约5厘米的小孔，从由内向外的烧流遗迹看来，可能是出铜液的炉眼。炉内铜液从炉眼流出，经过渠道，输送到铸范浇铸。在同一处遗址里，还出现一种在地面下的土坑式的炉子，直径1米，深0.5～1米，内壁已经烧熔，也粘有铜渣和木炭。这两种炉子看来是与当时大型铜器的冶铸规模相适应的。殷墟出土的著名的牛鼎、鹿鼎、“司母戊”鼎表明了这点。商代青铜器的铸造采用的是陶范法。安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三棱形铜棒(一端尖锐如锥，一端扁平有刃)和一些骨制锥形器，当是刻划范模花纹用的。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有一次可铸造两把刀的刀范和一次铸造七枚箭的镞范，表明当时已经发明了多腔型的范铸法。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出土的长达1.2米的方形陶范，是用泥条层层垒筑成的，当时的铸铜工匠已掌握了制作这样大型陶范的复杂技术，是毫无疑问的。从郑州张砦南街出土的两件大方鼎，以及郑州铸铜遗址出土的和上述大方鼎器形和纹饰相似的泥范看来，郑州二里岗期的工匠，在青铜器的铸造中就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我们还从郑州和安阳等地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陶范在使用前必须经过烘烤，进行预热处理。这样处理后的陶范，具有一定的强度、透气性和耐热性，浇铸时可承受铜液的压力，避免产生大量水蒸气，造成废品。在上述的铸铜遗址中见到的呈浅红色的陶范，就是经过预热处理的。

三

自从1898年发现殷墟遗址以来，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这80多年的时间里，在河南境内，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国内外学者对这些青铜器的标型、名称、纹饰、铭文和铸造工艺等，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但是，在旧中国，往往由于器物的出土情况不明，或者发掘方法不够科学，地层关系不清楚，使研究工作受到了一定限制。建国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商代文化的田野考古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我们认为，关于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工作，至少已经取得了以下成果。

第一，确立了二里头期、二里岗期和殷墟期的先后顺序。考古工作者对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辉县琉璃阁等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从地层关系上搞清楚了二里头文

化早于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文化，而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又早于殷墟代表的商文化。这一顺序的确定，使我们认识了早于殷墟期的青铜器，从而改变了商代青铜器只限于殷墟期即商代后期的观念。像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那种商代前期青铜器，在过去青铜器著录中是罕见的，这可能是由于它们比较简陋原始，不为当时收藏家重视的缘故。二里岗期的一些器物虽见于某些著录，但以前也不可能正确判断它们的年代。对二里头期和二里岗期青铜器的认识，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第二，提出了我国青铜文化起源的线索。二里头期青铜器固然朴素简陋一些，但已有比较复杂的形制和器类，有相当成熟的范铸法和嵌绿松石等工艺。由此可以推想，在制造出这类青铜器之前，青铜器的冶铸已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从河南的考古工作看，铜器并不是到了商代才开始出现的。在临汝煤山和郑州牛砦的晚期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分别发现过铜刀和铜块。由此可见，河南地区冶铸青铜器的历史应上溯到商代以前。商代青铜器冶铸技术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古代传说中夏族活动频繁的豫西和晋南地区作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对夏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虽然至今并没有完全探明夏文化的确凿证据，对一些大型的重要遗址，如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商代早期都城——西亳的问题，也还有争论。但这处遗址的一、二期文化层属于夏文化的历史范畴，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处遗址一、二期文化层虽没有出土青铜器，但由于临汝煤山和郑州牛砦晚期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铜刀和铜块，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它属于青铜文化的范畴。在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可找到若干片断记载。如《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乙卜于目若之龟，龟曰：鼎成，三(《玉海》三作四)足而方……。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夏时可能已有铜器。探索夏文化的内涵，对我们深入研究商代青铜器和商文化的渊源，将有很大帮助。

第三，对殷墟期青铜器作出分期。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遗址地层的发掘、陶器的排队和分期的探讨，以及新出土甲骨的考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的工作对于全面考察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分期和系统研究整个商代青铜器有很大的帮助。

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商代青铜器承袭了龙山文化鼎、鬲、杯、盘等陶器的造型和艺术特点。作为重要祭器和生活用具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可能承袭了龙山文化时期人们饮酒的习俗。铜鼎、铜鬲等三足器和铜戈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器具，它们以及其他青铜器的大量出土，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商代的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有很大的进步，而且种类很多，分工颇细。从商代本身来说，以各期的青铜器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前期青铜器的器形一般较小，说明当时的铸铜手工业还不太发达，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到了后期，也就是殷墟期，铸铜手工业得到发展，分工更细，生产规模也有相当的扩大。这时，不论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的精美程度都超过了前期，出现了许多气魄雄伟的大型作品。根据文献记载和学者的考证，商朝在盘庚迁殷以前的一段时间，政治局面比较动乱，王都多次迁徙，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盘庚迁殷之后，政治局面渐趋稳定，政权得到巩固，生产力也得到提高。特别是高宗武丁在位的59年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大，达到商代后期的极盛阶段。相当武丁时期的青铜器，也较之前代有明显的变化。殷墟

出土的大体属于或略晚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器形较大,制作精美。如侯家庄西北岗1001大墓所出器物,就非常精致。上面谈到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成批的“妇好”铭青铜器,学者多认为是武丁时期的妇好所有,器类繁多,纹饰华丽美观。同出的很多玉石器,也十分精美。这些考古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武丁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

青铜器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青铜器体现了我国古代铸铜技术的高度成就。是当时手工业工匠以及整个奴隶阶级的智慧的结晶。虽然其造型和纹饰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们作为古代社会的艺术遗产,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杰出创造,是几千年前人类辛勤劳动的光辉成果。它们至今被认为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精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叹。

商代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卜辞一样,是研究古文字和古代史的珍贵材料。商代文字,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有体系的文字。虽然有很多学者殚心研讨,但仍有许多疑难问题有待解答。我们应当在不断发现新材料的过程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是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以期得出更明晰的结论。

(原载《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本文与贾峨先生合写)

夏和商早中期青铜器概论

中华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从遥远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片辽阔的热土上，创造了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表明中国开始进入了人类历史的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诞生的商王朝，把我国古代社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夏、商属于青铜器时代，是以开始生产和使用青铜器生产工具、兵器和容器为其特征的。自夏代到商代早、中期，青铜铸造工艺由滥觞到发展，从小到大，由简到繁，从朴素无华到富丽堂皇，推动了商代晚期以至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大发展，使之达到高峰，在考古学和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

在人类文明史上，青铜器的出现，对社会进步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古代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由于青铜器的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个飞跃，为改变生产关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冶铸青铜器本身，就体现了生产力的进步。而冶铸生产的组织工作，又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据考古发掘可以知道，早在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就曾出土过黄铜片或黄铜管；属于马家窑文化的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曾发现过青铜刀；在晚一些的甘、青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红铜器和青铜器，多为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其中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铜镜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面铜镜，系合范铸造，显示了青铜工艺的进步。而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更多的有关青铜铸造的遗物和遗迹。龙山文化真正揭开了青铜时代的帷幕。

建国以来，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两段铜锥；栖霞杨家圈遗址出土有一段残铜锥、铜炼渣及孔雀石；诸城呈子遗址和长岛县北长山岛店子遗址均发现铜片；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铜炼渣。在河南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炼铜用的坩埚残片，经化验分析确认所炼之铜为铅青铜；郑州西郊董砦遗址也曾出有铜片；临汝煤山遗址的灰坑（H28、H40）内，出土有炼铜用的坩埚残片，较大的一块长5.3厘米，宽4.1厘米，厚约2厘米，为红烧土，上面有六层铜液的痕迹，每层厚0.1厘米；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的窖穴（H617）内，出土一件青铜器残片，残高5.7厘米，残宽6.5厘米，壁厚约0.2厘米。残片表面有烟熏痕迹，说明其原为实用的容器；从它的弧度来看，可能是青铜鬶的残片；其左端还留有一小段合范缝，说明铸造工艺已有了一定的水平，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的一座灰坑（H15）内，发现一块铜炼渣，呈铜绿色，长1.3厘米，断面近方形，边长0.8厘米，显

然是炼铜的遗存。此外,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墓葬(M3296)内,出土有一件铜铃,它的外面有清晰的布纹痕迹,可能是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铜铃横断面呈菱形,长对角线为5.2~6.3厘米,短对角线为2.1~2.7厘米,高2.65厘米,顶部有直径约为0.25厘米的小圆孔,系成器后再加工钻成,便于舞蹈时将铃挂在腰间。这是一件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用复合范铸造成型的乐器。

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有很多龙山文化的青铜器保留到今天,但这并不能否认青铜器的发明对于推动古代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的巨大的历史作用。龙山文化的青铜器,主要还是用于维护和加强统治,而不是用于生产。即使到了商代,虽然生产了大批青铜器,除部分是生产工具外,大多还是礼器和兵器,用于祭祀和打仗,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青铜器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密切相关,被称为"国家政权、等级制度的物化形式"。上述这些与铸铜有关的遗迹与遗物的发现,证明在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中国已开始出现了铸铜工艺,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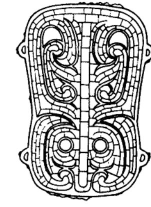
从考古学角度去探索和研究夏文化,是建国后提出的新课题之一。1950年发现了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其后又找到了与之同时的郑州商城,这是中国考古学领域第一次找到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这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从195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河南嵩山周围和伊洛平原一带,以及晋南汾水下游等地,进行广泛地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终于发现了一种早于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新型文化——二里头文化。同时还找到了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这对探索和研究夏文化当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目前,学术界对夏、商文化的分期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是:其一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分别属于夏文化的早、晚阶段,而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则属于商代早期,郑州二里岗文化属于商代前期,安阳殷墟属于商代后期;其二认为二里头文化全属夏文化,郑州二里岗文化为商代早期,安阳殷墟属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发展虽然比较复杂,但仍可大致依附于考古学分期之内。本文采取一种综合的分期意见,即龙山文化晚期为夏代早期,而所收录的夏代晚期青铜器则为二里头文化遗物,商代早期青铜器为二里岗文化遗物,而商代中期青铜器则属于二里岗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之间过渡期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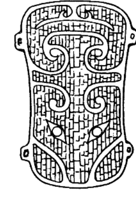
二

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范围较广,以河南偃师为中心,北到晋南,西至陕西东部,东到豫东,南至湖北,均有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这大致相当于夏王朝的近畿地区和周围的方国部落。其中著名的遗址有偃师二里头和灰嘴、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洛阳矬李和东干沟、汝州煤山、郑州洛达庙、密县新砦、夏县东下冯等地。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出土的确凿地点较少,大部分出自偃师二里头遗址,新郑望京楼遗址、豫西洛宁一带和豫东商丘附近也有少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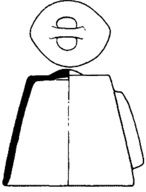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先后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其中有刀、凿、锥、鱼钩等生产工具，有戈、戚、镞等兵器，有爵、斝、鼎、觚、盉等容器，还有铜铃等乐器和圆牌铜器及兽面铜牌饰等。这些青铜工具和一些简单的铜镞，可能是仿石、骨、蚌器而制作。但另有一些工具和兵器，从形制到铸造都比较复杂。如双翼带铤式的铜镞，制作就有一定难度；铜戈中有直内戈和曲内戈，内部有穿，还有变形动物纹（其状近似云纹）或齿状装饰：铜戚呈长条弧刃，有上下阑，内部有方孔；铜刀中有一件尖部圆钝稍向上翘，厚背略方，柄部微曲，两侧饰平行凸斜纹，中间有6个凹槽，环首。圆牌铜器的器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石镶嵌，很近似于钟表刻度形，中间镶嵌两圈装饰，每圈均由13个十字形组成，制作相当精致。这不仅需要熟练的铸造工艺，而且还需要高超的镶嵌技术。出土的3件盾形铜牌饰，近似长方圆角盾牌的形状，两侧各有二穿孔钮，凸面用许多长条形、方形和三角形绿松石小片镶嵌成兽面纹，图案组合异常精巧，色彩斑斓，当为二里头文化的稀世珍宝（图一、二）。出土铜铃2件，上有系，一侧有扉，为较早的青铜乐器（图三）。最能反映当时铸造工艺的是青铜礼器。



图一　偃师二里头出土兽面纹铜牌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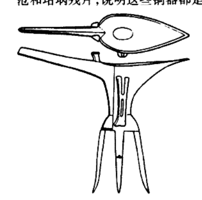
图二　偃师二里头出土兽面纹铜牌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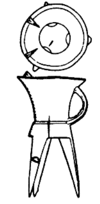
图三　偃师二里头出土素面铜铃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至少已出土10件铜爵，这种容器需采用多合范的方法铸成，既要有外范，又要有内范。从铸痕上看，用范已达4块或更多。有的铜爵仿陶器制作，器体较低，流口无柱，口沿边稍厚，流尾间距较近，束腰平底，三足较短，微向内敛；还有些铜爵已与陶爵有别，可能是专门设计制作。其器体较高，流尾间距稍远，束腰平底，腹下接三足向外撇。鋬上有长条形镂孔，这是二里头文化铜爵的突出特点。偃师文化馆保存有一件铜爵，形制很大，窄长流，尖尾，流口间立二矮柱，束腰平底，腹部的一面有两道宽1.2厘米的凸线，中间排列有5个乳钉装饰，鋬上两个长条形镂孔显得更大，底部呈椭圆形，三足较细长，造型别致，独具一格，显示了较高水平的造型美。该器通高22.5厘米，流尾长达31厘米（图四）。另出有铜斝3件，均为敞口，口沿立二矮柱。其中有一件近似于陶斝，为束腰平底，下附三棱锥状足，通高30厘米（图五）；另一种则具有独立特征的铜器风格，长颈腰内收，下部圆鼓并收成圜底，下附扁圆袋状空锥足（图六）。还出有铜鼎一件，折沿，薄唇内附加厚边，沿上立二环状耳，平底，下附空心四棱锥状足，腹饰带状网格纹（图七）。又出有铜盉一件，这也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半封顶，顶上插一竖直的管状流，下为三个袋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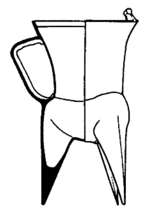
容器，与陶盉 形制相同。还出土有铜觚等容器。由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铜渣、陶范和坩埚残片，说明这些铜器都是当地制造的。



图四 偃师二里头出土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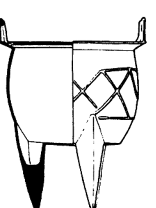
图五 偃师二里头出土三棱锥足斝



图六 偃师二里头出土袋状空锥足斝

除此之外，新郑望京楼出有一件素面铜爵，天津历史博物馆收集一件豫东商丘附近出土的素面铜爵，上海博物馆也收藏有素面铜爵，均与偃师二里头所出铜爵相似，应是同时期遗物。郑州二里岗文化商代墓内曾出有两件铜斝，均为敞口，沿立二钉帽状矮柱，长颈腰内收，鼓腹，圜底，袋状空足。与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出一种铜斝形制相同，只是腰部饰乳钉纹和弦纹，其中一件腹部还饰有5个圆形鼓面纹，可见其使用和流传时间之长。上海博物馆和郑州博物馆所收藏的几件铜斝，虽然出土地点不明，但形制相同，都是二里头文化遗物。

还要指出的是，陕西省博物馆收集一件豫西洛宁一带出土的青铜角（亦称管流爵），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器身扁圆。腹中部置一个管形长流，外伸超出器的口部，其长度与凹弧形口相等，流根宽大，向上逐步收缩，到流口为一小圆管。腹侧有一大鋬平底，三个三棱形锥足置于器底旁的腹外壁，而且上端高于器底，使之距离拉大，可使器物稳定放置。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件铜角，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口沿有加厚的唇边，器身狭长呈扁形，底下部有假腹，似圈足形，有一周圆孔装饰，似联珠纹，圈足下设三个三棱形锥足。假腹稍高处有一斜置的管状流，流上有钩形棱脊。器身有两行平行的小乳钉纹，一侧有一个扁形鋬。从这两件角的造型看，亦应为二里头文化的遗物。



图七 偃师二里头出土网格纹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品类较多，不仅有工具、兵器，还有包括爵、角、斝、鼎、觚、盉在内的成组礼器，表明当时的青铜器已脱离了原始阶段，在铸造技术上有了很大发展。除素面之外，有的铜器上还饰有变形动物纹、乳钉纹、鼓面纹、网格纹、弦纹、镂孔等花纹，尤其是圆牌铜器和盾形铜牌饰镶嵌成钟表刻度或兽面纹，更显示出较高的艺

术水平。若考虑到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玉柄形器上已有多叠层的兽面纹装饰,陶器上有浅刻的龙蛇纹,可以推测当时青铜容器上也可能有动物纹装饰。这开创了中国青铜器以动物纹样为装饰主题的先河。此外,根据《左传》宣公三年的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再联系到诸如偃师二里头高 22.5 厘米,流尾长 31 厘米的青铜爵和通高 30 厘米青铜斝的出土,就可以知道夏代晚期完全能够铸造出形制较大和较为复杂的铜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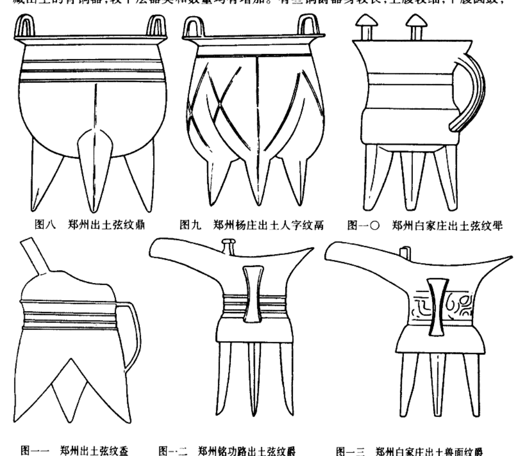
三

商灭夏之后,疆域迅速扩大,以郑州二里岗所代表的商文化,其影响向北达到北京附近的潮白河流域,向西到陕西扶风的渭河中游一带,向东到山东曲阜的泗河流域和淄河附近的青州以及豫东的永城地区,向南到湖北长江北岸的黄陂和江西赣水流域的清江、新干周围。在这个大范围内,都发现有二里岗期商文化遗址,其中不少地方出土有青铜器。青铜器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郑州附近,其次有河南密县、登封、荥阳、中牟、新郑、偃师、辉县、林县、获嘉、武陟、孟县、舞阳、项城、柘城,还有陕西铜川、子长、岐山、清涧、绥德,山西平陆、垣曲,山东济南,湖北黄陂,江西新干、清江等地。上海博物馆也收藏许多二里岗期商文化的青铜器。有一些二里岗期青铜器还流散到国外。

二里岗期商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可划分为较早的二里岗期下层和稍晚的二里岗期上层。二里岗期下层青铜器较少,器壁普遍很薄,纹饰也较简单;二里岗期上层青铜器数量很多,有一些器壁已相当厚重,纹饰也很复杂。

二里岗期商文化最常见的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有斧、镬、斨、凿、锛、钻、刀、戈、矛、镞和鱼钩等。它们的形制仍多仿石器和骨器,并承继二里头文化同类青铜工具和兵器的特点,但已有明显的变化和改进。如斧、镬、斨、矛的顶端有銎眼,用以纳柄;镞有两翼和血槽;戈的援内有凸起的阑,以防戈头脱柲。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种类很多,其中以酒器为主,包括爵、觚、斝、尊、罍、提梁卣(壶)、盉等,而爵、觚、斝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组合;食器也有相当数量,包括圆鼎、方鼎、鬲、甗、簋等,尤以鼎和鬲居多;水器较少,有盘、盂等。这些青铜容器的形制已逐渐脱离陶器的窠臼,在纹饰上也有了自己的特点,开始以兽面纹为主体的装饰,远比陶器表面的拍印纹饰富于变化和精致。二里岗期下层墓葬出土的铜器,鼎和鬲的口沿上都有半环状耳,两耳和三个尖锥状空足排列的部位和同期出土的深腹陶鼎相同,即一耳在两足间的空裆,另一耳与另一足相对应。一些鼎的颈腹间饰数周弦纹(图八)。鬲的腹部与分裆间的外壁饰两周凸起的人字纹(图九)。斝的形制和同期的敞口陶斝相似,但在颈下铸两周弦纹(图一〇)。盉的器形与二里头文化的铜盉相似 ,只是管状流加长且有些向前倾斜(图一一)。爵扁体平低 ,窄长流,流口间立二矮柱,三锥状足支点似不稳定,底下外壁有" "形的范线与三足相连,腰较二里头文化的铜爵略粗,口沿保持稍加厚的作风。有的铜爵饰弦纹(图一二)和乳钉纹,有的已经装饰处于起步阶段的兽面纹(又称饕餮纹)(图一三)。如郑州、登封、中牟出土的铜爵上,兽面纹的双目是空白的,形

象很简单且各不相同，说明这种纹饰正在发展过程中，尚未定型。二里岗期上层墓葬或窖藏出土的青铜器，较下层器类和数量均有增加。有些铜爵器身较长，上腹较细，下腹圆鼓，



图八　郑州出土弦纹鼎　　图九　郑州杨庄出土人字纹鬲　　图一〇　郑州白家庄出土弦纹斝

图一一　郑州出土弦纹盉　　图一二　郑州铭功路出土弦纹爵　　图一三　郑州白家庄出土兽面纹爵

腹壁间饰两层兽面纹，流口间有独柱(图一四)或较高的双柱。郑州、中牟、黄陂出土的铜盉，多饰较前复杂的兽面纹，斜管流，顶有鸡心状口，后侧有大鋬，下为三宽袋足，很富有特色(图一五)。新郑出土的圆鼎，深腹空足，两耳和三足的位置虽与下层的鼎相同，但出现子母口沿，可以承盖。郑州和平陆出土的大型铜方鼎，口沿的长宽比例相近，下为深斗方腹，四足空心(图一六、一七)。郑州、黄陂和平陆出土的大型铜圆鼎，颈部饰兽面纹，圜底下附三空心足，前所未见(图一八)。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的云雷纹扁足鼎，为侈口，折沿，方唇，浅鼓腹，圜底，下附三夔纹足(图一九)。这对商代中晚期同类器的装饰和造型有一定影响。也有青铜器专家认为该扁足鼎时代较晚一些。铜斝有的器形与下层还颇接近，但双柱已变高，顶端铸成菌状并饰涡纹，通身纹饰已较复杂(图二〇)。觚、尊、罍、盘的圈足较矮，并有十字镂孔。兽面纹提梁卣、涡纹中柱盂(图二一)、带流铜觚，是新出现的器类，独具匠心。二里岗期上层青铜器的纹饰，已经趋向成熟。鼎、鬲、爵、斝、觚、罍和尊，大都采用单层花纹的流动云纹和带状兽面纹作装饰的主题，但偶然也可见到目雷纹、

三角雷纹和弦纹，夔纹也是重要的装饰内容。在布局上，这些纹饰多安排在器物的颈部、

图一四
郑州杨庄出土兽面纹独柱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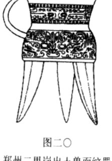
图一五
河南中牟黄店出土兽面纹盉

图一六
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兽面纹大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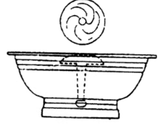
图一七
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兽面纹大方鼎

图一八
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兽面纹大圆鼎

图一九
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扁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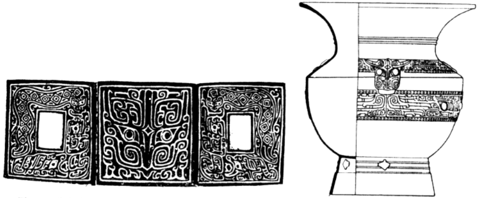


图二〇
郑州二里岗出土兽面纹斝



图二一
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涡纹中柱盂

肩部、上腹部或圈足的外壁。环绕于爵、觚外壁的通常是两组，在鼎、鬲、盉、斝、罍、尊、盘外壁的多系三组。这时期的纹饰，也并非单一的，还有单线条或双线条组成的兽面纹，双目凸出器表，线条间的空隙较大，似是后世用白描手法勾勒出来的。这在郑州和辉县出土的一些铜器中，最为典型。郑州西北郊小双桥遗址，曾出土两件相似的青铜建筑构件，整体近方形，平面为凹字形。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高18.5厘米，正面宽18.8厘米，侧面宽为16.5厘米，两侧面各有一个6×4.2厘米的长方孔，壁厚0.6厘米，重6公斤。构件正面饰单线兽面纹，侧面在长方孔的四周为一组龙虎斗象图，龙虎形象生动，象为艺术变形。其造型独特，纹饰繁缛，实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图二二）。此外，二里岗期上层还有用单线条组成的目雷纹和联珠纹，以及云雷纹、圆涡纹和十字镂孔等装饰。二里岗期上层偏晚阶段的少量青铜器，其纹饰由带状分布转向通体展开，如郑州出土的个别尊（图二三）、罍、



图二二　郑州小双桥出土兽面纹青铜建筑构件纹饰　　图二三　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兽面纹牛首尊

卣、爵，偃师出土的尊，辉县出土的爵及荥阳出土的斝等就是如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郑州白家庄出土的罍，颈部饰有近似族徽文字的三个龟形图案，肩部饰云雷纹，腹部饰较大的兽面纹及云雷纹，主纹上增添了细线，上下缘以雷纹作边饰，圈足上饰弦纹和十字镂孔。整件器物显得富贵华美，该器时代也可能晚一些（图二四）。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的



图二四　郑州白家庄出土兽面纹罍及纹饰

提梁卣(亦有称为壶者),提梁、卣盖、器身和圈足均有纹饰,尤其颈腹部通体饰用竖向夔纹组成的兽面纹,使全器变得富丽堂皇(图二五)。这件提梁卣从地层关系和同出陶片看,当为二里岗期上层遗物。此卣形制开晚商细颈卣的先河,但颈部还不明显。二里岗期青铜器饰有如此繁缛的花纹,尚不多见。有些青铜器专家认为其应属向殷墟文化过渡的器物,此说也不无道理。


图二五 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兽面纹卣

由此可以看出,二里岗文化青铜器已在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朴素造型和装饰的基础上,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青铜礼器占据了主导地位,已成为青铜时代最主要的象征。这些青铜器不但有诸多种类各异的器物造型,而且还有形形色色的纹饰使之锦上添花。这些纹饰中最主要的是各种兽面纹。有些是简单抽象的兽面纹,用粗犷的勾曲线条组成突出的双目,其余角、躯干、爪等部分极为简略。在兽面两侧平直延伸,末端总是向上下对称,作刀尖状弯曲,类似鱼尾形。线条之间有一定空隙,显得庄重大方。兽面纹上下多界以联珠纹 ,成为二里岗期文化青铜器装饰的特有标志。还有一些用细线条组成的简单抽象的兽面,中间有突出瞳仁形双目或仅有一对椭圆形边框的双目。线条弯曲自如,纹饰的空间更大一些。更有甚者连双目也省掉了,仅存左右两则向上弯曲的线条,上下亦多有联珠纹作为边饰,呈现出一种别致的变形兽面的风采,达到了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这类细线条装饰,也多以条带状饰于爵、觚、斝的腹部,时代相对比粗线条装饰早一些。还有一些较复杂的兽面纹,多以粗线条组成,在双目的两旁为躯体,向两侧展开后,尾部向上卷曲,有的是相向卷尾,有的是相背卷尾,结构较繁,形成尾部上下不对称。多饰在斝、爵上,尽管还是带状分布 ,但宽度有所增加,有的上下亦界以联珠纹,时间稍偏晚一些。在二里岗上层时期,一些尊和罍的肩部,还饰以突出器表的牛首或羊首,以增加立体感。除兽面纹之外,还有已经提到的联珠纹,以及涡纹、弦纹等几何纹饰,多作为陪衬装饰在青铜器上。使每件青铜器都成了精妙无双的瑰宝。这些丰富的艺术装饰,展现了二里岗期青铜文化的特点。

探讨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研究课题。1954 年,发掘了郑州南关外商代二里岗期铸铜遗址。1955 年在郑州紫荆山北地又发掘了一处商代二里岗期铸铜遗址。均发现有小型房基和硬土地坪上粘附铜渣和布满绿锈的铸铜场地,还出土大量的坩埚残器和碎片、红烧土块、炼渣、木炭和数以千计的铸造各类青铜器的陶范,表明当时生产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

当时熔铜的坩埚有三种。一种是用黏土堆制而成,外部敷有较厚的草拌泥,椭圆形口,坩埚内外粘有一层铜渣,有的口部还有破裂痕,大约是由于高温形成的。另一种是用泥质陶大口尊做胎改制成的,这是二里岗商文化常见的一种器物,其形制为大口,颈内收,凸肩,深腹,圜底,通常饰有绳纹、弦纹和附加堆纹。为了加固器壁,改制时在器壁内外涂有较厚的草拌泥,由于高温,器内壁变成青灰色,并附有一层铜渣。还有一种是由砂质红

陶缸改制的,其耐火程度要比泥质大口尊高,所以只在外壁涂草拌泥。经过高温,缸的胎壁都烧成砖红色,内壁也粘附有一层铜渣。

在大量的陶范中,能看出器形的有䦆、铲、斧、刀、凿、锥等生产工具范,数量较多;镞、戈等兵器范较少;方鼎、圆鼎、鬲、斝、爵、觚、尊、罍等容器范也占相当数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除了出土相同种类的陶范之外,在南关外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䦆范和镞范,在紫荆山北地出土的刀范和戈范较多。看来它们的产品还有些不同,可能在生产上有了一定的分工。

这种陶范是一种"硬范",商代用硬范来铸造青铜器,是一种先进的技术。采用范铸法,第一步先制模,模是用泥仿制成要铸造的器物,并刻划上纹饰;第二步制外范,用一定厚度的泥块附贴在模的表面,用压力印出模的形状和纹饰,待泥半干时,选择适当部位,用刀切成多块,每块之间附有三角形榫眼,使合范时各个范块能扣合紧密,然后修饰内壁花纹,晾干、烘烤,这样就翻制成外范;第三步是制内范,把泥模刮去外层,其厚度即待铸的青铜器壁的厚度,也经过晾干、烘烤,就制成内范。通过预制在内、外范上的榫卯或支钉、定位销,使其在合范时不会发生移动或错位。在范面上涂一层涂料后,就可合范。最后在外面用泥加固,留出与外范相对应的浇口和排气、排渣的冒口(冒口仅在铸造大型铜器时才有),再经过烘烤预热,就可用坩埚里的铜液进行浇注,制作铜器。

二里岗商文化的青铜器表面,或多或少都遗留有铸造的痕迹,再与出土的陶范相对照,可以了解当时铸造各种青铜器的若干工艺。

大方鼎是用多范、分铸、嵌铸、分次浇注的多种方法铸造的。鼎耳与口沿相接处较光滑,鼎耳和鼎腹是同时铸造的。从鼎腹四壁纹饰看,凡横向纹饰的上下界线都是笔直相通的,没有一点歪曲或错缝的现象。而在器壁外四角从口沿至底部,均留有明显的铸缝,由此可知鼎腹是由四块完整的外范铸造的。铸鼎时,先铸造留有鼎足位置(四角各一个圆孔)的腹底,然后把倒置的内范四周合上四块外范,再把铸好的腹底放在内范之上合铸而成。四个鼎足是倒置嵌铸于鼎底上的,为了加强器底的承受力,与柱足相连接的底部内外都加了一圈厚度。还有的大方鼎铸造方法稍有不同。鼎腹是由四块角壁外范和四块中壁外范,以及一块腹底外范和腹内范合铸而成的。在郑州商城铸铜作坊遗址内,就曾出土过铸造乳钉纹大方鼎的的外范残块。

大圆鼎由于耳和腹有弧度,其铸造程序较方鼎复杂。鼎耳是分铸的,鼎腹从外壁铸缝看,上腹有三块外范,铸好的鼎耳也嵌在上腹外范上,下腹也用三块外范与一块内范合铸。三鼎足中一足为浇口,另两足为冒口,是一次倒立浇注制成的。

铜鬲是由三块外范和一块内范合铸而成的,鬲的裆底有范线的遗存。在郑州商城铸铜作坊遗址内,出有鬲的外范。鬲口沿垂直向上折,颈稍细,腹圆形内凹,分裆,足作上粗下细凹圆形。鬲腹的右侧有一道与鬲腰相垂直的青灰色凹槽,当为铸造时注入铜液的浇口,浇口为外宽内窄的小喇叭形,在连着器面的中间,有一个三角形脊棱,把浇口分成两个小凹槽,这样可以使铜液很快流向范腔内。

铜斝是倒铸而成的。斝的一足尖端即为浇口位置,因此,足端上留有修补的痕迹。郑州出土的斝外范残块,腹与底边的界线分明,腹壁为凹入的圆弧形,它和铜斝底部外沿的

弧度相近,足呈三棱空锥形。

铜爵从底部外壁看,合范时的三条范线可证明外范是三块,三条范线向外的一端对准一足的上端。流口间的矮柱,可能就是浇口的所在。郑州出土有爵的外范和内范,外范为粉红色,铸面为深灰色,范块之间相接的切面平直光滑,范内壁下凹成圆弧形,恰和铜爵外壁的圆弧相吻合。口部外侈并有流和尾,腰部细而内收,刻有一组凹下的兽面纹,腹的外侧有半圆形爵鋬,鋬的上下两端接于外范的口和腰上。内范为褐红色,顶部为近椭圆形的平面,流口部分突起而狭窄,尾部呈尖圆形,侧面作漏斗状。

铜盉器身的外范是三块,内范一块,顶部外范是二块,流和鋬上有纵向的合范线,说明是一次铸成的。器鋬上部后端往往有一凸起,这是浇口的遗存。

尊、罍、瓿、盘等器物的铸造方法相同,都是倒铸的,浇口就在圈足的底部。而尊的牛首和罍的羊首等装饰,则是把牛首纹或羊首纹凹刻在外范上,而在内范相对的位置上,塑出稍小的不刻花纹的一块凸起,因而合范铸成后,铜尊或铜罍肩部的牛首或羊首就是凸出的。个别的牛首尊有扉棱,正好位于范线上,这很可能是由铜器表面遗留的合范铸缝逐渐发展变化而成的。

涡纹中柱盂采用分铸法,先铸好中柱,然后放在盂内范中,再与三块外范铸成盂体,同时使中柱和盂身嵌铸在一起。

提梁卣的铸造颇为困难,是经过多次铸造而成的。先用二块外范铸好套环链,然后把套环链的一端在铸盖钮时与之相连,另一端穿以先铸的半圆形铜环并和后铸的提梁相铸接。用四块卣体外范、一块卣体内范以及四块半圆形外范合铸成带半圆形环耳的卣体。铸提梁时,在卣体二环耳内各加一块小范,提梁浇注后,除去小范,形成间隙,使提梁通过环耳和卣身相连,而又能活动。卣体是倒铸的,浇口在圈足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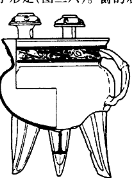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二里岗商文化时期,已经建立起极为可观的青铜铸造业,掌握了较复杂的青铜铸造工艺,能用金属原料的多种配方冶炼青铜,铸造出通高 1 米的大型青铜重器和装饰精美的中小型铜器,这应是商代早期青铜文化所结出的丰硕之果。

四

就青铜器发展而言,在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期,其青铜器既接近于二里岗商文化,又与成熟的殷墟文化有某些差别。过去,把这些青铜器不是归为郑州二里岗期文化偏晚阶段,就是放在殷墟早期。这一段时间大约相当于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至盘庚迁殷时期。由于当时政治不够稳定,"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所以,这一时期青铜器出土地点并不象二里头文化时期集中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岗文化时期集中在郑州商城、商代晚期集中在安阳殷墟等都邑附近,而是分散在许多地方,如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安徽、湖北和江西等地区。其中有河南郑州、郾城拦河潘、灵宝东桥、安阳殷墟、柘城孟庄、密县曲梁,陕西西安老牛坡、城固龙头镇、洋县安中村、户县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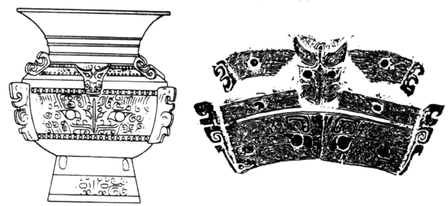
家庙、扶风法门镇，山西长子北关、忻县连寺、洪洞双昌，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安徽阜南常庙月牙河、嘉山泊岗，湖北黄陂盘龙城、随州西河、枝江，江西新干大洋洲、清江三桥、横塘等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也收藏一批属于这时期的青铜器。也有一些流失到国外。

这一时期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和兵器之外，容器的种类比前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瓒、尊、盉、壶、卣、罍、瓿、盘、簋、豆、杯等。圆鼎为敛口，立耳，鼓腹，圜底，下附三锥状足。与前期相比，一鼎耳不再与一鼎足对立，造成不平衡感，而是三足与双耳对称，形成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方鼎已不再是正方的鼎身，而近长方形，平唇立耳，平底附四柱足，平谷刘家河所出即如此，壁饰云雷纹和联珠纹。扁足圆鼎在二里岗期比较少见，此时的数量逐渐增多。为直口，折唇较厚，唇边有双立耳，腹部深如罐形，圜底下置三个兽形扁足，兽张口托住鼎腹，着地处为兽的尾部，口沿下饰兽面纹，安阳小屯与盘龙城李家嘴所出即是。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扁足鼎也已与此相似。郾城拦河潘所出的浅腹扁足鼎纹饰较为复杂，也属于同一时期。鬲的三足也已与双耳对称，器壁明显增厚，锥足的足根已较二里岗文化平整一些，有向柱足发展的趋势。城固龙头镇出土的一件四足鬲，较为少见。斝为敞口，菌状立柱较高，颈腹有明显折棱分界，腹微鼓，圜底，下附三个丁字形足。灵宝东桥所出的铜斝，圆鼓腹，颈饰目雷纹，圜底下亦有三个丁字形足(图二六)。爵的双柱已增高，柱顶由钉帽状变为菌状，个别的还高如伞状。安徽阜阳、阜南、嘉山出土有很高的独柱爵。爵身逐渐增高，且由平底渐变为圜底。觚较细高，圈足有十字镂孔，切地处有折棱，如藁城台西出土的兽面纹觚即如此。瓒是新出现的器类，器身为觚，只是一侧加了个匕形大柄，出土于新干大洋洲。上海博物馆所藏斜角云纹带鋬觚也与此相类。尊的器壁加厚，造型雄伟，灵宝东桥所出牛首纹、兽面纹尊，阜南常庙月牙河出土的龙虎纹尊和兽面纹尊是这一时期的上品。瓿的纹饰繁缛，敛口，短颈或无颈，广肩，宽腹，圈足，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器物。灵宝东桥、黄陂盘龙城等地均有出土，有不少可以归到商代晚期。罍，形制近似细高的瓿，有人亦称之为尊。长颈，广肩，深腹，肩腹间有折棱，高圈足，通体装饰花纹。城固龙头镇、湖北枝江、黄陂盘龙城、郾城拦河潘、藁城台西、长子北关等地均有出土。盘数量也有所增加，敞口，平沿，腹内收，圈足。黄陂盘龙城、平谷刘家河、城固龙头镇均有发现。簋，为这时期新出现的器类。一种口微敛，窄沿外折，深腹稍鼓，底近平，下承矮圈足，另一种形制与此相似，唯两侧有对称的兽首形双耳。这在黄陂盘龙城均有出土。城固龙头镇亦出有双耳深腹圈足簋，饰乳钉纹和雷纹。盉的造型与二里岗商文化铜盉颇不相同，通体像壶，上有提梁和盖，腹上伸出一长流，下附三足。平谷刘家河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均有出土。提梁卣，外形亦像壶，上有提梁，盖，下有圈足。城固龙头镇出有兽面纹三足壶，与上述盉、卣相类。豆，数量极少，只在新干大洋洲出土过假腹铜豆。杯，也是新出现的器物，在扶风法门镇出土一件高足杯，形体上口大而底收束，器壁斜直，下承一上小下大的高圈足，其上有十字镂孔。这一时期



图二六 灵宝东桥出土目雷纹斝

青铜器造型有了相当的发展,装饰艺术也有了一定的进步。青铜器的纹饰不少由条带分布变为通体装饰,在瓿、罍、鬲、杯和其他一些容器上表现十分明显,颈部、腹部甚至圈足上都有花纹,显得繁缛、密集,成为当时的艺术特点之一。青铜器纹饰由平面线刻逐渐采用较多的高浮雕装饰,安徽阜南的龙虎纹尊和兽面纹尊、陕西城固出土的兽面纹罍、河南安阳出土的兽面纹瓿均很典型。而郑州人民公园和灵宝东桥出土的兽面纹尊,牛首纹、兽面纹和扉棱更加突出,立体感更强,近似于商代晚期"三层花"的装饰,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效果,成为当时青铜装饰艺术又一个突出的特点(图二七、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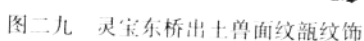


图二七　郑州人民公园出土兽面纹牛首尊　　图二八　灵宝东桥出土兽面纹牛首尊纹饰

如若再作更深层次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装饰的主题兽面纹,在这时期已产生了较大变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较二里岗文化更为复杂。用粗犷夸张或密集较细的勾曲回旋的线条,绘出鼻、目、角、口等,组成一种正视的兽面,兽面两边,还有展开的体躯,最外端则为卷曲的尾部,左右对称,上下协调,显得壮严而又威武,凶恶而又神秘,写实而又抽象,似诗如画,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而又回味无穷的美感。

这一时期的兽面纹,突出了双目,有的比例很大,相当有神。在双目的上端有各种各样的角,又构成不同兽面纹的造型。陕西城固龙头镇出土的铜鬲,兽面纹双目上端有丁字形角,别具一格;湖北盘龙城出土的提梁卣,兽面纹双目上端有外卷角,角很粗大,向外卷曲;灵宝东桥出土的铜瓿,兽面纹双目巨大,目上端为曲折角,其形状是角根在下,向上折曲而下,再向外弯曲而翘,弯曲之处皆作方折形。兽面纹的鼻梁较短,下为张开的大口,并露出尖齿。除双目外,所有粗线条内皆饰雷纹,相当复杂(图二九)。这种用众多雷纹作为粗线条中的增加装饰,开了安阳殷墟青铜器以雷纹作为底纹组成兽面纹的先河。也有一种无角形兽面纹,如陕西城固龙头镇出土的卣和壶即如此,所有粗线条上皆增饰雷纹,末





图二九　灵宝东桥出土兽面纹瓿纹饰



图三〇　黄陂盘龙城出土兽面纹簋纹饰

端呈刀形。

当时的青铜器上,又装饰着一种被称为配置式的兽面纹。即兽面纹是主题,放置在中央,在其两侧配置一些变形的小动物,似兽、似鸟。主题纹饰作正面形象,配置的小动物作侧面形象。这种主次相配的兽面纹,是由商代早期单体兽面纹发展来的。例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瓿,其装饰兽面纹的主体条纹上,增饰许多勾曲形线条,这些复杂的条纹使图案显得更富美感。双目很突出,并有对称展开向上弯曲的体躯,其余部分已经省略,并因势在这组兽面纹的两侧配置一兽形,兽头向上有长吻,体躯很短。又如安徽肥西出土的斝、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簋(图三〇),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尊和斝,它们所饰的兽面纹,全部以繁缛而均匀的勾曲形线条组成,双目也较突出,鼻梁较短,张目露出尖状齿。体躯向上弯曲,在弯曲的体躯下,即兽面纹的左右下角,配置极简单的鸟纹,只能看到一目与钩喙。再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斝和瓿、陕西岐山京当出土的斝、安徽嘉山泊岗出土的瓿、江西清江横塘出土的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斝,其用细线条组成的兽面纹很抽象,除双目之外,仅隐约可见其上卷的体躯。配置的小动物有的在兽面两侧,也有在体躯下面,仅占左右下角。其表现形象则更为抽象,可以见到的仅有一目。

当时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浮雕兽面纹。多饰在瓿的腹部。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所出土的瓿均如此。兽面纹除突出双目外,在额顶有一对向外卷曲的角,比较粗大,占了整个兽面纹的一半左右。这种兽面纹线条的轮廓有浑圆感,从器壁里面完全可以看到兽面纹的粗线条是凹陷的,因此从正面看,浑圆的线条就突出器壁,这是最早的浮雕技术在青铜器纹饰上的表现。其体躯和配置的小兽,也属于浮雕装饰。

总之,从上述这一大批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来看,它们既接近于二里岗期而又有些不同,与安阳殷墟前期青铜器有某些相似而又有明显差别。其造型种类较多,制作颇为精良,装饰艺术又别具一格。向前上溯是二里岗期青铜器的发展;向后延伸,又开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先河。在我国商代青铜工艺史上,承上启下,填补缺环,占有重要的地位。

还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分布范围甚广,周边地区已是方国部落或其他氏族聚居地区。因此,诸如平谷刘家河、城固龙头镇、新干大洋洲等出土的成批整组的青铜器,有一些造型和结构与中原地区一模一样,可能就是由中原地区传来的;有一些青铜器的造型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很接近,但又具有一些地方特征,还有少量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不同,完全是地方土著的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相互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也使这些青铜器造型、结构和纹饰各具特色,五彩纷呈。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从铸造到艺术装饰,为商代晚期达到青铜器发展的高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青铜器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青铜器既是生产工具、兵器和礼器,又是精美的艺术品。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夏商青铜器继承了龙山文化陶器的造型和艺术特点,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夏商青铜器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我国古代铸铜技术的高度成就,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进步。夏商青铜器作为中国艺术传统的精华而不朽,数千载之下,仍使人惊叹和倾倒。

参考资料

昌潍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年第1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年第4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第3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一九七八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

新郑县文化馆:《河南新郑望京楼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81年第6期。

天津市文化局文物组:《天津市新收集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9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6)1989年。

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年第10期。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文物》1975年第6期。

杨育彬、赵灵芝等:《近几年来在郑州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年第3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3期。

赵新来:《中牟黄店、大庄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0年第3期。

武陟县文化馆:《武陟早期商墓清理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

孟新安:《郾城县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1987年第8期。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灵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1979年第1期。

宋国定、曾晓敏:《郑州发现商代前期宫殿遗址》,《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22日。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王寿之:《陕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博》1988年第6期。

《山西平陆发现商代前期遗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2月19日。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

葛冶功:《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出土的四件商代铜器》,《文物》1965年第7期。

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

杨育彬:《郑州二里岗期商代青铜容器的分期与铸造》,《中原文物》特刊1981年。

裴明相:《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容器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杨育彬:《从郑州新发现的商代窖藏青铜器谈起》,《中原文物》1983 年第 3 期。
安金槐:《对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容器分期问题的初步探讨》,《中原文物》1992 年第 3 期。
陈佩芬:《商代殷墟早期以前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6),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杨育彬、孙广清:《商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南方文物》1994 年第 1 期。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概论——〈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青铜卷〉序》,《中国文物报》1994 年 7 月 31 日。
河南省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1),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1),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原载《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卷》,文物出版社 1996 年)

华夏古代文明的丰碑

——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

一、王懿荣最早发现甲骨文,功不可没

在上世纪的1899年,即距今一百年以前,在中国发现和认识了商代甲骨文,这是近代学术史上惊世骇俗的大发现。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首先要归功于王懿荣。王懿荣字正熙,一字廉生,谥文敏,山东福山人。他素常收藏金石,精于古文字考订,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金石学家。清光绪己亥年(公元1899年),他从古董商手中见到带字的龟甲,认定其文字"非篆非籀",其时代"确在篆籀之前"。并三次收购,达1500片之多。光绪庚子年秋七月(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以身殉国。其所收藏的甲骨文多归于刘鹗,并多著录在光绪癸卯年九月(公元1903年)问世的《铁云藏龟》一书中[1]。

王懿荣最早发现和认识商代甲骨文,其首创之功,影响十分深远,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经过几代诸多学者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风靡海内外的一门学科——甲骨学。是以出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为研究对象。其内容包括文字释读,卜法文例及分期断代研究,文字内容和社会历史考证等。甲骨学的研究对中国的古代史、古代科技史以及古文字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二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后经有关学者的察访,终于弄清了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点在今天的安阳小屯村,又通过学者们对甲骨文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祭祀的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名谥,与《史记·殷本纪》和《世本》等古代文献中所记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帝王世系大致相同。而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地望又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虚上",《水经注》:"洹水出山东,迳殷虚北"的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安阳小屯及洹河南北岸附近是商王盘庚所迁的殷墟。纠正了自唐代的《通典》、宋代《考古图》等文献,将殷墟定为河亶甲城、河亶甲墓之误。殷墟的发现,源于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促使了后来具有先进学术思想的学者们进行殷墟的考古发掘。殷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选择殷墟进行发掘,不但可以科学地寻找甲骨文,而且还可以揭示商代王都的文化面貌。于是就有了自1928年到1937年殷墟的十五次发掘。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在十年的考古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发掘方法,奠定了田野考古的基础,使中国考古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并为之培养了大批人才。也就是说,甲骨文的发现成了中国考古学起步

的先兆。

总之,发现甲骨文的同时也就发现了一种伟大古老的文化,甲骨文无形中将自己的发现者契刻在这一文化的丰碑上。王懿荣就是这一文化丰碑的第一人,功不可没,当之无愧。

二、甲骨百年回眸

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直到1927年,殷墟甲骨文仍处于村人乱挖、古董商收售的混乱状态。不少为国内收藏,更有半数为国外掠走,总计约10万片左右。

此三十年间,出有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殷墟书契》系列著作、王襄《簠室殷契徵文》和《簠室殷契类纂》、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叶玉森《殷契钩沉》,以及加拿大人明义士《殷虚卜辞》、日本人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等一批甲骨文著录、考释、研究的专著。已可识读甲骨文800多字,并把甲骨文与商史研究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地位。

自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保护民族文化,为了不让甲骨文继续遭受破坏和流往国外,在安阳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加上河南省博物馆的发掘,共获甲骨文近2.8万余片,其中包括著名的"大龟四版"、"大龟七版"和YH127坑。后者出土字甲17088片,字骨8片,其中完整大龟竟有300多版,可谓空前的大发现[2]。经专家研究,认为这一大批同坑出土的甲骨文有许多特点。时代单纯,都属于武丁时期。其中有用墨或朱写成的简单文辞,证明殷代已有了书写的颜料和毛笔。还有不少涂朱或涂墨的刻辞,反映甲骨文不但记实,而且要求美观。这次发现了契刻龟甲卜兆的现象,还有一些经过改制的背甲,平面呈椭圆形,并有钻孔,这表明殷人也可能将甲骨穿成简册。记龟甲来源的刻辞很多,且字甲占绝大多数,由此可以推断甲与骨是在不同地点埋放的。鉴于YH127坑形状较规整,坑内甲骨数量巨大,且又集中地堆放在一起,说明该坑是有意储藏甲骨的[3]。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特大的龟甲,其中最大的长44厘米,宽35厘米。据鉴定产于马来半岛,说明殷代卜用龟甲有些来自南方。除了甲骨文之外,还发掘了小屯宫殿区、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发现有一大批宫殿建筑基址、11座商王大墓,出土有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角牙器、骨蚌器等遗物,为研究殷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资料[4]。

这十年的考古发掘,所获甲骨文具有很高的科学性,绝非过去村人乱挖可比。使得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金石学只重文字而不注意与甲骨文同出的遗迹和遗物的局限,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此间关于甲骨文的著录、考释和研究有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大龟四版考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历谱》,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董作宾、胡厚宣的《甲骨年表》,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系列著作,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系列著作,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孙海波《甲骨文编》等。把甲骨学的分期断代和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依照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断代标准,将甲骨文划分为五期。即第一期为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为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为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为

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为帝乙、帝辛(二世二王)。这是甲骨文研究中一项划时代的成就,它使过去千头万绪的10多万片甲骨,可以梳理成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商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为科学的基础上。董氏的十项标准和五期分法,尽管还有需要补充和修正之处,但时至今日,60多年过去,仍然为学术界普遍采用。

令人遗憾的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小屯一带私人盗掘之风又复盛行,盗掘出来的甲骨文近6000片,流落到北京、上海等地,少量流往国外。

新中国成立之后,杜绝了私人盗掘之风,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安阳殷墟的发掘年年都有新进展。除了发现武官大墓、妇好墓、后岗祭祀坑、殷墟西区平民墓、小屯宫殿基址和多处手工作坊外[5],在小屯东南[6]、小屯西地[7]、小屯南地[8]多次发现甲骨文。以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最为丰富,共发现卜甲、卜骨7150片。其中卜甲110片,有刻辞的60片,卜骨7040片,有刻辞的4761片。此外,还有未加工的牛胛骨106片,有刻辞的4片,以及有刻字的牛肋骨条4片。这是建国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其时代相当于甲骨文的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和第五期。其中以第四期武乙时期最多。这批甲骨文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祭祀、天象、田猎、旬夕、农业、征伐、王事等。其中有不少新见的人名(包括贞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新的字和词,以及军旅编制、天文等方面的新内容。为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尤其难得的是,基本完整的大版刻辞字骨达100多版,这应是自1928年以来历次发掘所未见的。和YH127坑相反,坑内绝多是字骨,字甲数量很少,这再次证实甲与骨是分开地点埋放的,同时这批甲骨文多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这对甲骨文的进一步分期研究是有很高科学价值的。

不仅在安阳殷墟中心区小屯一带继续出土甲骨文,而在小屯周围地区也有甲骨文发现,如在四盘磨西地[9]和大司空村[10]就有少量发现。而数量特多的当属1991年9月在殷墟花园庄东100米发现的一个甲骨坑。坑口呈长方形,南北长2米,东西宽1米,坑深2.5米。当发掘到坑口以下1.70米时,发现甲骨堆积层,厚约0.80米,绝大部分为卜甲。它们有的正面朝上,有的反面朝上,有的紧贴坑边,相互叠压得很紧密。已经清理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取出甲骨856片,包括卜甲839片,卜骨17片,有刻辞的甲骨为170片。该坑甲骨以大版卜骨居多,仅完整的就有300多版,上刻卜辞的整甲达90多版。每版上刻辞少者1~2字,一般数十字,多者有200余字。有的卜甲字中还填以朱红色。属殷墟文化一期。字体较细小、工整、秀丽,具有独特风格。花园庄东地甲骨坑是继1936年小屯北地YH127坑和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11]。

在殷墟之外,也有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例如在郑州二里岗[12]和郑州商城内[13]均出土有商代的习刻字骨。此外,在山西洪赵坊堆村[14]、陕西长安沣西[15]、北京昌平白浮[16]、陕西岐山凤雏[17]和扶风齐家[18]等地,又先后发现西周甲骨文,总计为302片,总字数1041个。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印证了"周因于殷礼"。扩大了甲骨学研究的领域,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西周甲骨学[19]。

此间甲骨文著录、考释、研究的专著数量大增,如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郭沫若、胡厚宣等《甲骨文合集》、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和《殷墟卜辞综类》、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高明《古文字类

编》、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和《甲骨学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和《殷商历法研究》等。其中《小屯南地甲骨》收录甲骨文4612片，分上、下两册。上册刊甲骨图版，图版前有《前言》，概述甲骨出土情况、甲骨分期及小屯南地甲骨的主要收获；下册刊载甲骨释文、摹本及《小屯南地甲骨钻凿形态》论文。全书资料完备，集甲骨图版、摹本、索引、释文和钻凿图版于一书。按出土单位著录甲骨，还发表了与甲骨同出的陶器，为读者提供了可与出土地层及有关遗物相互联系起来的科学资料。书中将甲骨钻凿形态的演变与分期断代联系在一起，对甲骨学断代研究独辟蹊径。还有在1978～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41956片，占已知甲骨的四分之一以上。共有十三册，第一至十二册为甲骨拓本，第十三册为甲骨摹本。是按其时代分为五期，每期又按卜辞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进行编排的。收集资料广泛而全面，凡有研究价值的均在囊括之中。选出的拓片，经过校重、缀合、同文集中、辨伪等项工作，都是科学和可靠的。它为学术界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甲骨文资料。既是对八十多年殷墟出土甲骨文的总结，又为未来甲骨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被誉为甲骨学史上一座里程碑。

三、甲骨文所反映商代社会的面面观

甲骨文发现一百年来，用于研究商代奴隶社会是其最重要的价值和内容。从甲骨文研究中，可以了解商代的政治情况，其中包括阶级关系和政权机构。甲骨文中的官吏名称有几十种。在管理各种事务的臣正，此类有臣、正、小臣、王臣、小王臣、多臣、多辟臣、小耤臣、小丘臣等[20]；有各种武官，如多马、亚、多亚、箙、多箙、自、射、多射、三百射、卫、戍、牧、犬、多犬等，有些是职位很高的武官，有些是驻守边境的武官，有些是管理弓箭手的武官，有些是从事打猎的武官；有各种史官，此类有尹、多尹、又尹、作册、多卜、史、大史、小史、御史等。商代的史官地位高，权力大，负责记录政事，还管占卜，以及祭祀、天文、历算等[21]。商王以下有一大批妇、子、侯、伯等王室贵族和异性诸侯，再加上上述的官吏，构成了奴隶主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有奴隶和平民。在甲骨文中有众、众人、羌、仆、奚、刍、妾、婢等。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商代已有监狱和各种刑法。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商王朝已经有一支为数众多的正规军队和师、旅的编制[22]。军队也常用于战争，既可抵御方国入侵，又能主动向外征伐。军队有步兵、战车、骑射。最多一次动用军队达13000人。

甲骨文中还反映商代的方国地理和政治区域，包括周边的方国、四土、四方，还有邑和鄙，以及邦方等。记载了不少地名。从甲骨文中所见的都邑和征伐的方国，大致可划出商代的疆域，其北约在易水流域，其南在淮河流域，其西在太行山与伏牛山一线，其东可到黄海、渤海岸边。大致以河南、山东为主，还兼有河北和苏皖北部。到盘庚之后，商王国的主要范围在河南[23]。

甲骨文也反映了商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商代农业生产是“协田”即集体耕作，所用农具有木制的力、耒和石、蚌制的辰（耨）、刈（镰）。农作物有黍、稷、麦、秫、稻等。还有开垦荒地、施肥的记载[24]。甲骨文还反映畜牧业，当时圈养的马、牛、鸡、犬、豕等六畜，从祭祀杀牲之多，也反映了畜牧业的发达[25]。当时的田猎有设陷、网罗、箭射、围射等[26]。最多的一次狩猎获麋700头。也有关于手工业铸铜、纺织的记

载[27]。还有商业、交通的反映,如货币的贝,计算货币单位的朋,及车、舟等交通工具[28]。

甲骨文还反映了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包括日蚀、月蚀、星象(新星、新大星、鸟星、大岁、火或大火),阴阳合历的干支,年、月、春、秋、日、夕等[29]。甲骨文又反映了古代的医学,卜辞中有关疾病的名称有疾首、疾目、疾耳、疾自、疾口、疾齿、疾舌、疾言、疾胸、疾腹、疾手、疾肘、疾胫、疾止、疾骨等。胡厚宣先生研究了武丁时期有关疾病的甲骨文后指出:"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16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30]。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还有"心疾",是指脑神经系统的疾病[31]。还有治病的方法、药物及医生(即"小疒臣")[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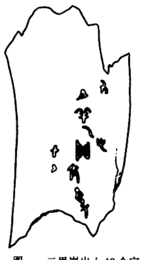
甲骨文还反映了商代的宗教,主要是天帝崇拜,认为天帝掌握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水旱涝灾,决定农作物收成,又主宰人世间灾疾祸福[33]。还有自然崇拜,经常祭祀日月星云、风雨雷电、山川土地诸神。也有祖先崇拜,对先公、先王、先妣进行频繁和隆重的祭祀[34]。

以上无论是政治、军事、祭祀、宗教……,实际上都是礼制的反映。因为甲骨文就是占卜的遗物,卜辞的内涵无一不与古代礼制有关。商周礼制是相因袭的,从文献和其他材料中获知的周代礼制,可以上推商代礼制。这有助于甲骨文研究和认识商代的历史文化。李学勤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断[35]。

四、关于郑州商城发现的甲骨文

1953年4月,在郑州商城东南郊的二里岗遗址,发现了1片习刻字骨,是在发掘范围内被翻动过的土中采集到的,已失去了地层关系。这片字骨长7.3厘米,宽3.8厘米,厚0.3厘米。为一段牛的肋骨[36]。当时曾送往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鉴定,陈梦家先生为此作了如下记录:"这是在一片牛肋骨上刻着练习契刻卜辞的10个字。占卜用肩胛骨,不用肋骨。在肋骨上习刻,从前小屯发掘中也出过一片(《甲编》三五八三,又胡厚宣《京津新获甲骨集》三九二二也是肋骨刻辞)。安阳出土卜用甲骨的区域并不限于小屯,但只有小屯侯家庄所出的牛肋骨和龟腹甲背甲刻了卜辞。小屯周围附近出了很多不刻卜辞的甲骨和少数习刻的卜骨。这片肋骨所刻的字,和小屯的殷代晚期的卜辞相似。可能也属于这个时期。它的出土启示着黄河以南很有可能发现殷代的刻辞卜骨。"[37]

关于这片习刻字骨,李学勤先生也有论述[38],是卜辞的习刻,认为此辞属于武乙或文丁时期是可能的。其刻字为"又土羊乙丑贞从受十月"(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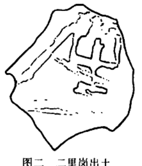


图一 二里岗出土10个字的习刻字骨

1953年9月,在郑州二里岗遗址C1T30探沟出土1块牛肱骨残片,属于牛肱骨上关节面的一部分,长宽均约3.2厘米。骨的一面用刀削平,上面刻了一个不完整的正三角形,中间刻一个笔划较粗的㞢(有或侑)字[39](图二)。李学勤先生认为它并不是卜辞或卜辞习刻,而是一件骨器的残部,也可能

属于武乙或文丁时期。

1954年4月，在郑州二里岗遗址发现1片骨条，长约10.5厘米，宽约1.6厘米。在骨条的一端刻划有文字，但尚不能辨识[40]（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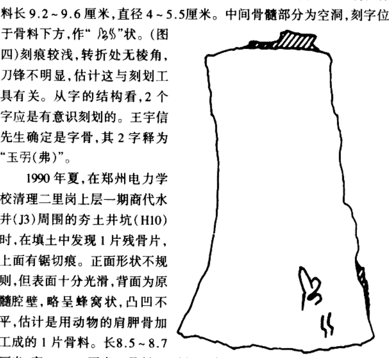


图二　二里岗出土“㞢”字骨块

以上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的3片字骨，属于商代的无疑，可能属于晚殷即武乙或文丁时期。但也可能属于早于殷墟的二里岗上层。因为从二里岗遗址的大面积发掘中可以看出，这里的地层叠压关系较为简单，在耕土层下除个别探方为生土或无文化层或有较薄的战国文化层，绝大多数探方全是商代文化层，依据土色和遗物可分为二里岗上层和二里岗下层。没有发现一点相当于殷墟时期的文化层或陶片。这几片属于商代的习刻字骨，不可能从3公里多以外发现有殷商文化遗存的人民公园运来，更不可能从安阳殷墟运到这里。很可能是二里岗上层文化层出土的。

时间又过了30多年，1989年秋，在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的发掘中，出土了1件用动物肢骨加工的骨料，两端锯痕明显，经现场清洗，发现在近一端正面有2个刻划文字，引起了重视[41]。首先对该骨料出土地点的层位进行核实，该骨料出于一个商代灰坑内，该坑开口于3层下，打破生土，包含物绝多为二里岗上层一期的陶片，该坑从层位和出土器物的形制特征看，时代应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骨料长9.2～9.6厘米，直径4～5.5厘米。中间骨髓部分为空洞，刻字位于骨料下方，作“[illegible]”状。（图四）刻痕较浅，转折处无棱角，刀锋不明显，估计这与刻划工具有关。从字的结构看，2个字应是有意识刻划的。王宇信先生确定是字骨，其2字释为“玉弜（弗）”。

1990年夏，在郑州电力学校清理二里岗上层一期商代水井（J3）周围的夯土井坑（H10）时，在填土中发现1片残骨片，上面有锯切痕。正面形状不规则，但表面十分光滑，背面为原髓腔壁，略呈蜂窝状，凸凹不平，估计是用动物的肩胛骨加工成的1片骨料。长8.5～8.7厘米，宽2.4～3厘米。骨料正面偏上部中间位置也发现2个



图三　二里岗出土刻字骨条

图四　郑州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出土字骨

刻划的文字[42]，作"ʃʃ乡"状，释为"丐玉"（图五）。刻痕也较浅，笔锋不明显，波折圆缓。而第一个字的写法，与省水利第一工程局出土的字骨中第二个字写法相同，这种巧合出土在相距数百米的两个遗迹单位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同时也说明这种骨刻文字的发现不是偶然性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性。



图五　郑州电力学校出土字骨

从上面相近的这 2 片字骨看，其字的写法和结构，确实是人为有意识刻划的文字；由于刻划工具的局限，例如用敲击出的燧石尖端在骨骼表面进行刻划，刀具较钝，笔锋不明显，波折无棱，刻痕较浅，正好反映了它的原始性；而进行刻划的人肯定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刀笔文吏，使用的文字也不是祭祀时于记录的规范文字，或可认为是流行在民间的一种手体文字，所以在释读和隶定上就有了一定的困难；这 2 块骨料上的刻字"玉丐"和"丐玉"，是一种习刻短句，不具备史料价值。但这种民间习刻的发现对研究当时文字的发展和刻写工具的演进，以及字体的结构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总之，以上在郑州发现的 5 片商代甲骨文，虽然是习刻字骨，但毕竟是殷墟之外难得的发现，而且是属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其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早，因此也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还要指出的是，出习刻字骨的郑州电力学校、商代水井 J3 和周围的夯土井坑 H10，均出土有大量的二里岗上层一期陶器。而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把 J3 作为重要的^{14}C测年座标点。从井框还带有树皮的圆木上，取了不同年轮的 8 组系列样品，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 1400 年，其误差仅 8 年，非常精确。也就是说二里岗上层一期为公元前 1400 年，即距今为 3400 年。这里正是郑州商城作为王都时的最繁荣期。若按二里岗下层一、二期和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每期 50 年，则据可推出二里岗下层一、二期和二里岗上层二期（即小双桥时期）的绝对年代。同时，若按有专家论证商代始年为公元前 1622 年，即距今 3622 年，再依《竹书纪年》从商汤至外壬各王在位年数总和近 200 年，那么，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上层一期作为王都时距今 3400 年，当与仲丁和外壬之时相差无几。这一段只是本文的插曲而已。

注　释

[1]王宇信：《甲骨学通论》23～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2]石璋如：《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六同别录》上册，1945 年 1 月。

[3][4]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 期。

[7]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②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 年第 2 期。

[8]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 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 年第 1 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 1980 年。
[9]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 1951 年。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 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
[11]《殷墟花园庄发现早期甲骨坑》,《中国文物报》,1991 年 12 月 22 日。
[12][3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13][41][4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14]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7 期。
[15]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张家坡村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3 期。
[16]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 年第 4 期。
[17]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第 10 期。
[18]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9 期。
[19]王宇信:《甲骨学通论》373~40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20]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小臣的职别》,中华书局 1979 年。
[2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十五章《百官》,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22]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师和旅》,《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 1981 年。
[2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八章《方国地理》、第九章《政治区域》,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24]①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 年。
②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考古》1972 年第 4 期。
③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 年第 1 期。
④胡厚宣:《殷代农作施肥说》,《历史研究》1955 年第 1 期。
⑤胡厚宣:《殷代农作施肥说补正》,《文物》1963 年第 5 期。
[25]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51~15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26]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 1981 年。
[27]①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 年第 5 期。
②胡厚宣:《殷代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28]①贾谷文:《商品货币与殷商奴隶制》,《考古》1976 年第 1 期。
②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 年第 2 期。
[29]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七章《历法天象》,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②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
[30]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4 年。
[31]陈世辉:《殷人疾病补考》,《中华文史论丛》第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年。
[32]①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4 年。
②张永山:《殷契小臣辨正》,《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33]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59 年第 9、10 期。
[34]①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十七章《宗教》,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②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59 年第 9、10 期。
[35]李学勤:《序〈甲骨学通论〉》(参见王宇信:《甲骨学通论》6~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37]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5 期。
[38][39][40]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1 期。

(原载《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齐鲁书社 2000 年)

试论近年来河南出土的西周玉器及相关问题

在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中，玉器以其特有的品位和属性，融入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古之玉器，是沟通天地，以礼四方，祭祀祖先和鬼神的社稷礼器；又是王公贵族明辨身份，严格尊卑等级的凭信；也是辟邪敛葬，以求尸身不朽的灵物；更是"君子比德如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陶冶情操，修养身心道德的宝贝。由此而折射出灿烂的光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摇篮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早在新石器时代，玉器先见于北方的辽宁查海遗址[1]和南方的浙江河姆渡遗址[2]。继之，在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得到飞速发展，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到了夏商时代，玉器则在中原地区崛起而跃居全国之冠，在商代后期迈入了第二个繁荣期。春秋战国之时，由于社会大变革，各国间相互征伐、交流、开放、融合，促进了生产力大提高和经济大发展，从而把玉器制作推向了第三个繁荣期。而西周时期的玉器制作则处于两个繁荣期的过渡阶段，承前启后，占有重要地位。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地处中原的河南，出土了大量的西周玉器，主要集中在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和最近发掘的鹿邑长子口大墓，都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拟就河南出土的西周玉器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鹿邑长子口墓出土西周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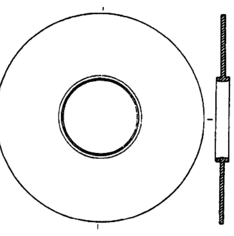
1997～1998年发掘的西周初年长子口墓，位于河南东部鹿邑县太清宫镇。因随葬青铜器上多铸有"长子口"字样的铭文(图一)，当为墓主人，由此定名为长子口墓。该墓为带南北两个斜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南墓道为南宽北窄刀把形，长21.5米，南端宽7.15米，北端宽4.7米。南墓道内葬5匹马，还有些车器。北墓道为长方形，长16.5米，宽2.6米。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口大底小，上口长9米，宽6.63米，墓底长8.1米，宽5.6米，墓室深8米。东、西、北三面均有生土二层台，东、西二层台上有少量朱砂，并各有1个殉人。墓室南部与墓道相接处置殉人8具。墓为重棺单椁，在椁室东西两侧靠近外棺处各殉1人。最下有腰坑，内殉1人1狗。该墓随葬品丰富，出有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瓷器、骨器、蚌器606件，其中玉器104件。若加上骨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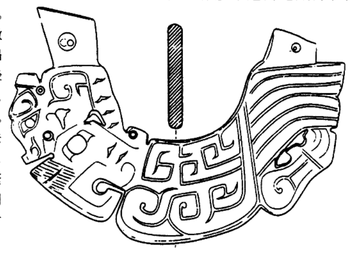
图一 鹿邑长子口墓铜器铭文拓本(M1:86)

贝币、蚌泡等小件器物则有可达到千余件[3]。青铜器、陶器、瓷器和少量玉器放置在椁室内，而大量玉器则置于棺内。玉器种类较为齐全，包括礼器、仪仗、工具和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四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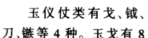
玉礼器类23件，包括琮、圭、璋、璧、环、璜、玦、簋等8种。其中玉璧(M1:280)出自棺内北部，米黄色，局部泛白，有褐灰色斑纹，半透明。边宽略小于孔径，器壁薄而匀称，中心大圆孔对钻，孔周两面均凸起呈环状圆口。两面抛光，制作精致，素面。直径17.8厘米，孔径6.6厘米，孔壁厚1.2厘米，边厚为0.3厘米(图二)。龙凤纹璜(M1:111)，深绿色，半透明。璜体扁平，为一透雕凤鸟，勾喙，臣形目，方圆睛，昂首收足，垂尾双分。高冠雕成龙形，长嘴厚唇，臣形目，圆睛，矮粗角，长尾向下伸，尾尖向上卷。璜两端及嘴和龙尾处，各有一对钻圆孔。两面纹饰相同，凤体和龙身饰阴线卷云纹，龙尾及凤颈施阴线鳞纹，突显大尾长羽。亦真亦幻，展示了丰富的想像力(图三)。玉簋(M1:74)，出于椁室北部，与青铜礼器放在一起。浅白色，微泛青色和黄色，半透明，内外均抛光。口微敛，斜折沿。方唇，弧壁，圜底，圈足微向外撇。腹饰弦纹和圆涡纹。高10.2厘米，口径13.5厘米，腹径14厘米，圈足径11厘米(图四)。此类玉簋发现甚少，过去仅殷墟妇好墓出过2件，为深腹矮圈足，纹饰较繁缛。而此簋为浅腹高圈足，纹饰简练，具有明显时代特征。



图二　鹿邑长子口墓玉璧(M1:280)



图三　1.鹿邑长子口墓玉龙凤纹璜(M1:111)



玉仪仗类有戈、钺、刀、镞等4种。玉戈有8件，其中6件放置在墓主头、胸、腿等部位，无使用痕迹。造型端庄，材质精美，通体抛光，为玉器中之上品。最大者(M1:289)长47.1厘米，宽8.3厘米(图五:1)；最小者(M1:362)长20.3厘米，宽5.5厘米。玉刀(M1:330)，放置在墓主人腰间。墨玉，刃部微透明，弧背曲刃，尖上翘，柄宽短，刀身中部略厚，为单面钻一孔，刃极锋利。刀背两侧有阴刻竖向及横向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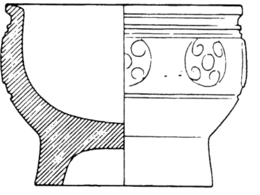
点纹。通体乌黑发亮，制作甚佳。通长23厘米，宽5.5厘米，厚0.5厘米（图五：2）。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短柄玉刀形制几近相同。

玉工具和生活用具类有锛、刀、刻刀、抄等4种。其中锛（M1：139）为长条形，顶部稍残，上宽下窄，上薄下厚，弧形单面刃。正面上部饰阴线兽面纹，背面光素。上端中部有一单面钻孔。残长9.3厘米，宽3.4厘米，厚0.2～0.4厘米（图六：1）。玉刻刀（M1：347）为鱼形，出土于棺内南部，灰黄色，半透明，粘满朱砂。顶部呈长方体，中部为圆柱体，下端呈三角尖状，有斜刃，头部有圆形对钻孔，用阴线刻出鱼眼、鳃、鳞的轮廓。长6.6厘米，直径0.5厘米。玉抄（M1：209），出于棺室北部。米黄色，半透明。扁长形体，前口后柄，在长方形器面上向下挖出长方形凹槽。柄刻蝉纹和兽面纹。通长25.7厘米，宽7.2厘米，高5厘米（图六：2）。过去只发现有青铜抄，此为商周时期玉抄第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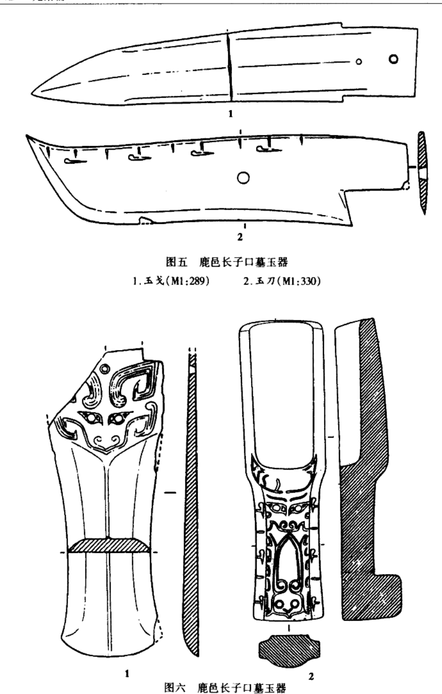


图三　2.玉龙凤纹璜拓本（M1：111）

玉装饰品类数量最多，包括佩类和饰件37件，还有柄形器28件。佩类和饰件的质地和制作均佳，为长子口墓出土玉器的精华。其中的虎首跽坐人（M1：319），出于棺内北部墓主人身侧。绿黄色，微透明。从正面看为一虎首跽坐人，从背面看为一鸮。虎首高昂，大口暴张，利齿森森，长圆形双目，虎视眈眈，半圆形双耳。虎首下为人身，跽坐，着衣。鸮呈蹲状，虎之双耳亦为鸮耳，圆目，突睛，人背作鸮身，人的两臂作鸮之双翼，人之两足作鸮足。鸮鼻下有一圆孔，显系佩戴之物。通身饰阴线刻云纹。通高5厘米，宽2.5厘米，厚2.8厘米（图七）。过去殷墟妇好墓曾出有玉跽坐人2件和石跽坐人1件，纹饰与此相同。但将虎首、人身和鸮鸟完美地集于一体的圆雕虎首跽坐人为首次发现。其他如龙凤佩、牛面佩、兽面佩、龙、鹿、鸟、兔、鱼等，均形象生动（图八）。此外还有璜形、管形、觿形、片形等饰件。而柄形器一般为扁平长条形，有浅白色、乳白色、绿色，还有



图四　鹿邑长子口墓玉簋（M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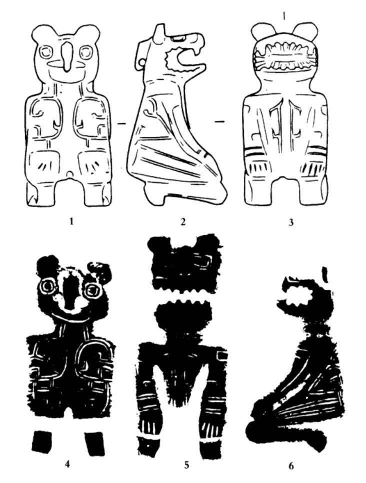
图五　鹿邑长子口墓玉器

1. 玉戈(M1:289)　　2. 玉刀(M1:330)

图六　鹿邑长子口墓玉器

1. 玉锛(M1:139)　　2. 玉抄(M1:209)

墨玉和杂玉。个别出土于椁室,大多置于棺内,均粘有朱砂。多为素面,个别饰有凸弦纹和四叶纹,或饰有凸弦纹和卷云纹,也有器身带钻孔。形制较大的通长 11 ~ 15 厘米(图九)。



图七 鹿邑长子口墓玉器(M1:319)
1、2、3.玉虎首跽坐人 4、5、6.纹饰拓本

长子口墓形制和葬俗有商代遗风,青铜器造型、纹饰和组合具有商末周初两重特征,陶器和玉器亦然。经鉴定墓主人长子口系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发掘者推断其为商末贵族,在西周初归附之后,又成为这一带的封君,从双墓道大墓和丰富的随葬品可看出,其地位要高于一般诸侯。墓葬年代不晚于周初成王时期。

二、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出土玉器

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位于洛阳老城北郊的北窑村一带。1954年发现,1963年春~1966年夏,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至70年代初,又继续作了一些清理。总计发掘西周墓348座,马坑7座。除2座带有双墓道的墓葬外,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其中长5米、宽4米以上的大型墓46座,长4米、宽3米的中型墓284座,长3米、宽2米的小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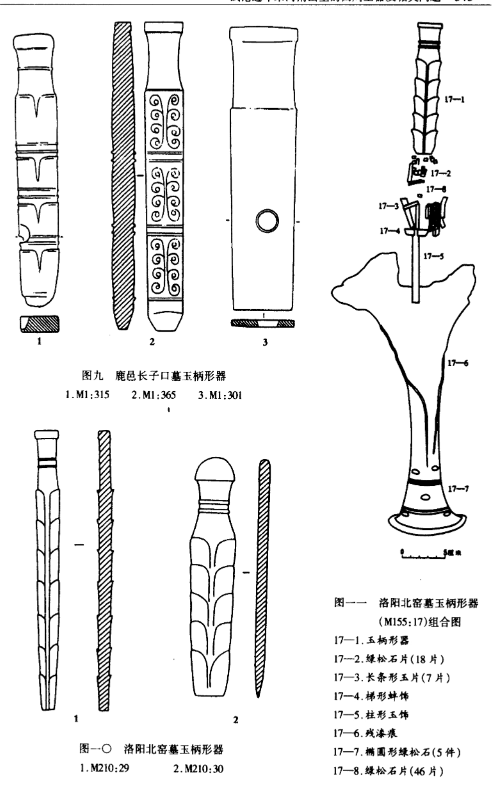
图八 鹿邑长子口墓玉器纹饰拓本

1. 龙凤佩(M1:340) 2. 牛面佩(M1:312) 3. 龙(M1:345)

4. 鹿(M1:316) 5. 鸟(M1:323) 6. 鱼(M1:240)

12座,另有大小不明的6座,早中晚期均有。墓内多有二层台,但绝多均没有腰坑。随葬器物中的青铜器、陶器、瓷器等多在二层台或椁室内。玉器则多在棺内。每一座墓葬多被不同程度盗扰过,不少随葬品已无存[4]。

西周早期墓116座,出土玉器51件。包括柄形器、戈、钺、刀,并有鱼、虎、鸮、鸟、蝉、蚕及各种小型饰件。玉柄形器20件。其中M210:29,青灰色玉,质地纯净,光泽晶莹。通体呈现长柱状,截面为长方形,平首,颈饰二周凸弦纹,器身四面雕饰七节四叶纹。通长19.2厘米、宽1.8厘米、厚1.1厘米(图一〇:1)。M210:30,灰白色玉,下部有棕黄色云斑。首部呈圆弧形,下端磨成锋刃,颈部亦饰二周凸弦纹,器身雕五节四叶纹。长16.6厘米,宽3.2厘米,厚0.8厘米(图一〇: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玉柄形器出土时有些横放在椁顶上或悬挂于墓壁上,四周和下端往往带有玉饰和喇叭形漆器痕。如M155:17,出土于墓的东北角,紧贴东壁似悬于其上。玉柄形器的柄部向上,下端有7个长条形玉片等距围绕,并杂以4片椭圆形绿松石片,它们粘附在下端。玉片下托以插有圆形玉柱的蚌饰,再下为一喇叭形漆痕,可能是承受玉柄形器的鞘。这种组合体应是玉柄形器的原貌(图一一)。玉戈(M420:7)为乳白色玉,质地纯净,琢磨精细,戈体瘦长,援锋微上扬,戈内



图九 鹿邑长子口墓玉柄形器

1.M1:315 2.M1:365 3.M1:301

图一〇 洛阳北窑墓玉柄形器

1.M210:29 2.M210:30

图一一 洛阳北窑墓玉柄形器(M155:17)组合图

17—1.玉柄形器

17—2.绿松石片(18片)

17—3.长条形玉片(7片)

17—4.梯形蚌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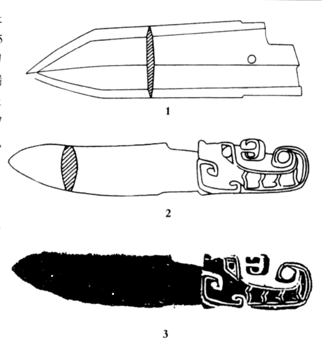
17—5.柱形玉饰

17—6.残漆痕

17—7.椭圆形绿松石(5件)

17—8.绿松石片(46片)

偏向上部，内端上部内凹。长13.1厘米，宽3.8厘米，厚0.35厘米（图一二：1）。玉刀（M215:52），刀身上下略薄，端部呈尖状，柄作卷尾龙形。长10.7厘米，宽2.1厘米，厚0.7厘米（图一二：2、3）。玉凤（M198:2），为黄绿色玉，高冠，分尾上卷。鼻及后肢下各有一穿孔。周身以阴线刻划羽毛翅膀和头尾。长7.2厘米，宽2厘米，高4.6厘米（图一三：1）。玉虎（M198:1），浅灰色玉，色泽丰润，为一件圆雕精品。作伏卧状，头向下垂，张口欲食，长尾后拖且向上卷曲。背饰雷纹，两侧刻卷云纹，一侧的背部从头至身后均有黑灰色玉斑，这是用俏色手法就势雕造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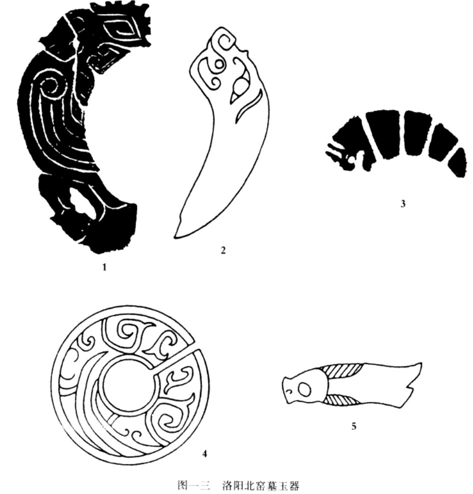


图一二　洛阳北窑墓玉器
1.玉戈（MM420:7）　2、3.玉刀（M215:52）及拓本

西周中期墓57座，出土玉器66件。包括牛形调色器、柄形器、戈、铲、璜、觿、鱼、鸟、蚕，以及各种小件玉饰、绿松石珠、红玛瑙珠等。其中牛形调色器（M14:8），灰白色玉，首部有黑色斑纹。圆雕作伏卧状，头向前伸，两侧有耳，上端浅浮雕双角，牛身作方形，背部宽平，雕琢有4个圆洞，作调色之用，出土时圆洞内残留有朱红色颜料。周身饰卷云纹。长10.1厘米，宽5.2厘米，高3.4厘米，背部圆洞径1.9厘米，深2.3厘米。玉柄形器（M250:1），乳白色纯玉，光泽晶亮。通体呈圆锥状，首端作圆尖形。颈部束腰，环饰二周凸弦纹，器身雕七节较浅的四叶纹，下端圆收有锋。通长14.3厘米，径1厘米。出土时器身周围亦有漆器残迹，其下部有玉片、蚌托、玉柱等，构成完整的组合。玉觿（采:029），淡黄色玉，间以白色云斑。形如角锥，一端饰兽头，另端有锋，以松解绳结。长6厘米，宽1.4厘米，厚0.3厘米（图一三：2）。玉蚕（M375:6），浅黄色玉，光泽晶莹。通体丰满圆润，环节分明，首尾共有6节。全身弯曲呈蠕动状。长3.9厘米（图一三：3）。

西周晚期墓34座，出土玉器235件。包括柄形器、戈、铚、璋、璜、玦、鱼，以及大量小件玉饰和石英珠等。其中玉玦（M534:22），灰白色玉，有光泽。一面阴刻涡纹，一面平素。直径4.1厘米，孔径1.5厘米，厚0.25厘米（图一三：4）。玉鱼（M378:4），鱼的嘴、眼、鳍、尾具全。长3.6厘米（图一三：5）。

此外，还有141座未能分期的西周墓，多空无一物。总计出土玉器17件。有柄形器、鱼和各种饰件。其中1件玉压眉（M59:1），浅黄色，形似弯月，制作精致。长4.4厘米。



图一三 洛阳北窑墓玉器

1. 玉凤(M198:2)拓本　2. 玉觿(采:029)
3. 玉玦(M534:22)　4. 玉蚕(M375:6)拓本
5. 玉鱼(M37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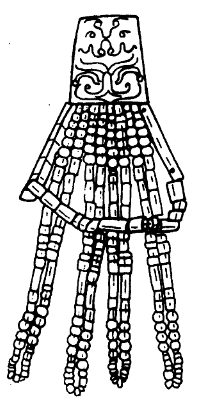
洛阳是西周初营建的洛邑成周,为全国另一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的东土之都。北窑西周墓地出土不少带铭青铜器,如"王妊"、"太保"、"康伯"、"毛伯"、"丰伯"、"虢公"、"蔡叔"、"荣中"、"王母"、"宗人"等,表明墓主人为西周高级贵族和官吏。其中两座周初带有南北墓道的大型墓,当属周天子的卿大夫,与诸侯国君地位相当。墓葬绝少有腰坑,也不见殉人,随葬陶器以鬲、罐组合为主,反映了周人的葬俗。

三、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西周玉器

应国是一个商周时期湮灭已久的小国。周代应国地望据《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滍

水注》的记载，当在今平顶山市西20公里临近滍水（今沙河）、应水和澎水处。1986年，在这一带薛庄乡北滍村西的滍阳岭上，发现了应国墓地。经过持续10年的考古工作，发掘墓葬300余座，包括西周墓36座，春秋早中期至战国墓葬20余座，其余均为汉代小型墓。而应国在春秋早中期之际为楚所灭，这里成为楚国北方边境的军事重镇。战国早期曾一度属韩，战国晚期并入秦国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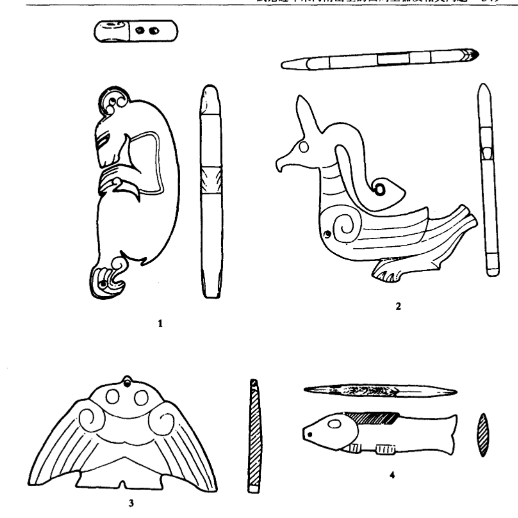
在发掘的西周时期应国墓中，有5座为西周早期，9座为西周中期，22座属西周晚期。西周早期均是竖穴土坑墓，个别有单墓道。青铜礼器组合有鼎、簋、爵、卣、尊、觯等，器物制作精美，多实用器，酒器占较大比例，具有明显的商人遗俗。西周中期均为竖穴土坑墓，青铜礼器组合有鼎、簋、盨、盘、盉、甗、尊、卣、爵、觯等，与早期相比，酒器所占比例下降而食器增多。西周晚期大多有单墓道，平面呈“甲”字形。青铜礼器组合有列鼎及与之配套的簋、鬲和壶、盘、匜、尊、爵、方彝等，酒器更加减少。这正是以列鼎制度为中心的礼制形成并日臻完善之时，还伴出有成套的铜编钟、铃、石编磬等乐器，与西周早中期确有差别。上述西周墓葬无论形制大小，一般都随葬有一定数量的玉器，其中包括戚、圭、琮、璧、璜、玦、柄形器等。而装饰性的项饰和玉佩饰更为习见。项饰由玉片、玉管、玉珠、料珠等组成，小巧玲珑。玉佩饰有的由玉牌和多组串饰组成，如37号西周晚期墓出土的1件玉佩饰，长35.5厘米，宽9厘米，由梯形玉牌饰和缀在玉牌下面的五组玉管、玉珠、玛瑙珠串饰组成，色彩斑斓，美观大方（图一四）。有的为大型玉组佩，由数件自上而下依次排列的玉璜及连缀其两侧相互对称的两行玉珠、玉管、料珠等串饰组成，十分壮观。而46号西周晚期墓，有多组项链、缀饰、佩饰、串饰，杂以琮、玦、圭、玉握、玉鱼，布满全身，令人目不暇接。


图一四　平顶山应国墓地37号墓玉佩饰

230号墓为西周早期，长方竖穴土坑墓，墓室长5.02米，宽3.8米，深6.2米。葬具为单棺单椁。墓早年被盗，青铜礼器已无存，尚有一些车马器、玉器和蚌器。玉器有玉戈、玉璜、玉柄形器，以及玉羊、玉凤鸟、玉鹰和玉鱼等饰件（图一五）。造型生动别致。

231号墓亦属西周早期，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墓室长3.18米，宽1.98米，深1.6米。葬具为单棺。随葬有鬲、豆、罐、大口尊等陶器，另有铜觯1件，还有一批玉器和砺石、蚌鱼、蚌饰等。玉器中包括项饰、胸组佩饰（图一六）和玉牛首，玉燕、玉蚱蜢、玉鱼等小型饰件，制作甚佳。

84号墓属西周中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长4米，宽2.64米，深1.8米。墓室四



图一五　平顶山应国墓地 M230 玉佩饰

1. 玉羊佩　2. 玉凤饰　3. 玉鹰佩　4. 玉鱼佩

周有宽0.3～0.6米的熟土二层台。葬具为单棺单椁。随葬品相当丰富，二层台上置陶鬲和几件车饰，椁室内置一批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和6件人面具，棺盖上有2件青铜人面具和7件玉柄形器。棺内随葬品主要是玉器，头部上方置有玉戚，另有玉鱼及小型玉饰等一类的发饰。颈部和胸部置5个玉璜，分别串连长短玉管和800多颗料珠、玛瑙珠，构成一组4串项饰和佩饰。腹部又置玉圭、玉璧和4件玉柄形器等。需要指出的是，在棺盖和棺内的多件玉柄形器的下面，总有3串或4串长条形玉缀饰，这可以说明玉柄形器是和玉缀饰共同构成组合型装饰的。墓内出土的青铜礼器制作精美，多铸有铭文，如铜甗（M84：89）上有"应侯作旅彝"5字（图一七），可知墓主人为一代应侯[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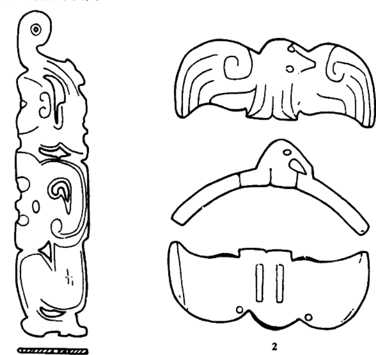
1号墓属西周晚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6]。墓室长4.65米，宽3.1米，深3.1米。墓室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单棺单椁。随葬品数量甚多，椁顶盖板上有车马器、铜鱼、

图一六　平顶山应国墓地 M231 玉器
1. 玉项饰　　2. 玉胸组佩饰

石贝、蚌贝、玉圭、石圭等，并有 8 层相叠的透雕铜片。椁内置大量青铜礼器、车马饰，还有铜戈、陶鬲和 1 件玉柄形器。棺内绝多为玉器，头骨顶部置 1 件玉琮、两耳附近各置 1 件玉玦，口含 3 块玉片，颈围一串项链，左肘关节处置 1 件小铜环，右肘关节处有 1 件小玉环，骨盆周围有玉璧、玉璜、玉蝉、玉人形佩、玉锥形器、玉鹰等，右脚趾处置 1 件夔形玉片。其中玉项链由 68 枚红玛瑙珠（管）、白玉珠（管）、白石珠、白玉片等相间串连而成。人形玉佩（M1:110）用白色薄玉片制成，略呈长方形，正背两面均饰以相同的透雕和线刻纹，各组成蹲坐的人形。上端有一穿孔，可供悬佩。长 8.8 厘米，宽 2 厘米，厚 0.1 厘米（图一八:1）。玉鹰（M1:114）为白色略泛黄，温润光洁，微透明。鹰头顶和右翅有褐斑，这也是有意运用的俏色工艺。鹰作展翅飞翔状，头向右


图一七　铭文拓本

扭曲，以嘴衔右翅，开成一个穿孔。双翅前端亦各有一个小穿孔。鹰眼、鹰背和双翅均为线雕，两爪作长条形卷曲于身下，形象逼真。长2.2厘米，宽5.7厘米(图一八:2)。在古文字中，应国之"应"与"鹰"是同一个字。于是，古应国之地的平顶山市，又被称作"鹰城"，鹰就成为平顶山市徽的形象。



图一八 平顶山应国墓地1号墓玉器

1.人形玉佩(M1:110) 2.玉鹰(M1: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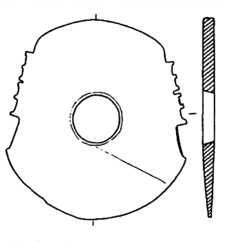
除84号墓主人为"应侯"之外，还有2座墓内青铜器有"应侯"字样铭文，另有不少墓内青铜器有"应史"、"应姚"、"应姜"及"应国公"、"应伯"、"侯氏"、"胙伯"、"青公"、"督诰公"等铭文，可以明确墓主人多为应国贵族。展现了非常丰富的古文化面貌。

四、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西周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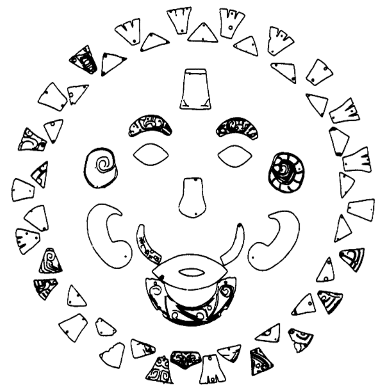
虢是西周初期始封的姬姓国。《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据此，周初封有二虢，分居东西，确切无疑。又据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期有西虢(今宝鸡一带)、东虢(今荥阳一带)、北虢(今三门峡和平陆一带)三虢并存[7]。而北虢于公元前655年为晋所灭。著名的"假虞灭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并给后人留下了"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千古遗训[8]。

1956~1957年和1990~1999年，先后两次在三门峡市区北面上村岭一带发掘虢国贵

族墓地[9]。第一次发掘墓葬234座、车马坑3座及马坑1座,第二次发掘墓葬18座、车马坑4座和马坑1座。经考古钻探,该墓地南北长590米,东西宽550米,总面积约为32万平方米,墓葬总数(包括车马坑、马坑)约在500座以上。上述两次发掘的墓葬内有2001号和2009号2座国君大墓,有2012号国君夫人墓,有1052号和2011号2座太子墓,有2006号、2008号、2010号、2013号等一批大夫和2016号、2017号等属于士一级的贵族墓,还有一大批庶民的墓葬。出土了数万件各类珍贵的文物,其中随葬的玉器就有4000余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玉质之好,制作之精。为西周考古中所罕见。



图一九　三门峡虢国墓地玉戚(M2001:22)



图二〇　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墓缀玉幎目(M2001:656)

2001号大墓为一座长方竖穴土坑墓,其旁陪葬有车马坑。墓室长5.3米,宽3.55米,深11.5米。葬具为重棺单椁。椁以方木叠垒构成。外棺髹红漆并有棺环,上部置长方形木质棺罩。内棺髹黑漆,上面铺一层红色丝织物。墓内各类随葬品极为丰富,约5293件,其中玉器有967件(颗)。外棺盖上置玉圭、戈、柄形器、戚等。内棺盖上置玉戚(图一九)、琮、璧、璜、戈、圭等礼器和玉龙、虎、鹿、鸟、鸽、鳖、鱼、牛首、马首等佩饰,以及玉柄形器、管、珠、片等饰件。棺内死者面部覆盖缀玉幎目(M2001:656),由14件仿自男性面部器官形状厚玉片和44件三角形、梯形、三叉形薄玉片及68颗小红玛瑙组合联缀成人的面部形象(图二〇);头部置玉发饰(M2001:675),系由衔尾双龙纹玉环、素面玉环、玉管、玉珠、牛首

形玉佩、红玛瑙与石贝等共 73 件颗串联而成(图二一:1);颈部有一玉项饰(M2001:659),由6件马蹄形佩和 112 颗红色玛瑙珠组成(图二一:2);另有一套大型组玉佩饰(M2001:661)置于颈间而达于骨盆以下,由 7 件大小递增的玉璜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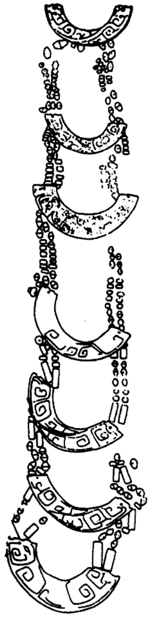


图二一 三门峡虢国墓地 2001 号墓玉饰
1.发饰(M2001:675) 2.项饰(M2001: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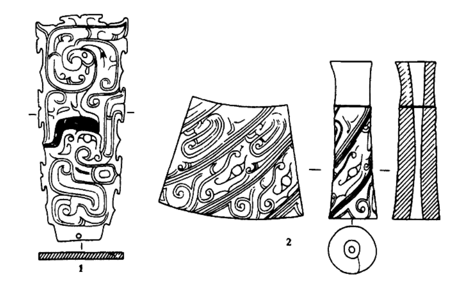
共 367 件颗玛瑙珠、玉管和料珠串缀而成(图二二);胸部及两侧置有玉戈、璧、圭、璋,其中出于左股骨之上的 1 件人凤合纹玉佩(M2001:685),发掘者定为玉璋,大致如长条倒置等腰梯形,周边刻牙形饰,正背面均饰一组人凤合纹。凤鸟在上,回首垂冠,尾羽向上卷过头顶复下垂于胸前,利爪附着于人形头顶。人形屈身蹲坐,长发飘逸,臣形横目,右侧鼻部外伸高扬,左侧有耳。器长 13.2 厘米,上宽 5.2 厘米,下宽 2.5 厘米,厚 0.4 厘米。下部有一穿孔,当用以系绳佩戴(图二三:1);死者口中含有玉珠和玉贝,手中并握有圆柱状玉握(M2001:645)(图二三:2),脚端踏 2 件条形玉片,趾间还夹有玉饰;尸骨下还放置多件大玉璧、戈等。还要提及的是椁室东南角底部出土有 1 件玉柄铁剑(M2001:393),由铁质剑身,铜质柄芯和玉质剑柄嵌接组合而成。玉柄包括茎、首两部分,均为和阗青玉,玉质细腻,光洁透润。剑茎为圆柱形,剑首底端作正方形,上端作圆弧状内收,下端的管口处以形状不

同的绿松石片嵌平。剑首前端有透穿小圆孔，孔内贯以铜质销钉，用来卯合玉质剑首与铜芯。钉孔两端各嵌入一圆形绿松石片。剑茎表面饰成组斜竖向平行纹与C形云纹，剑首表面饰以四瓣花萼形纹样。通长34.2厘米，柄长12.2厘米，剑身长22厘米，叶宽3.8厘米，玉茎最大径1.8厘米，剑首底端为2.7×2.3厘米(图二四)。据墓内出土大批青铜器上铭文可知。墓主人应是“虢季”。铜甬编钟有铭“用义其家，用与其邦”，俨然出自宗主国君之口，由此可以认定，2001号墓主人是虢国的一代国君。其入葬年代当在西周晚期。

2009号大墓亦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其旁车马坑未发掘。墓室长5.6米，宽4.4米，深19.7米。葬具为重棺单椁，随葬品之多，居虢国墓地已发掘的墓葬之最。从出土大量青铜礼器上铭文可知。墓主人为“虢仲”，亦为虢国一代国君。墓内随葬的各种玉器，其数量和质量均超过2001号虢季墓。就其功能而言，可分为礼仪用玉、生活装饰用玉、工具类玉器、敛葬专用玉器等。2009号墓内出有缀玉幎目、耳缀玉玦、六璜组玉佩，还有玉璜10多件、玉琮7件、玉璧27件、以及玉戈、玉钻、玉斧、玉握等。其中人龙透雕白玉璜，玉质、纹饰和制作工艺湛称一绝(图二五:1)。另有一对透雕白玉璜可组合1件完整的玉璧，可见汉儒称半璧为璜亦有所指。棺内所出龙纹玉璧用上好的和阗白玉制成，两面均饰变形龙纹，大方流畅而富于动感，圆度规整，制作考究。直径19.1厘米，好径7.4厘米，厚0.6厘米(图二五:2)。出于胸腹部的琮，青白玉，内圆外方，两端有短射，射高2.3厘米，射径6.5厘米，通高13厘米，厚0.5厘米(图二六:1)。另有1件和阗青白玉琮，射较高，一端近射稍下处有一穿孔，另一射口平面处竖刻铭文“小臣妥见”，当为商代武丁时期遗物。通高12.1厘米，射高2.2厘米，射径4.1厘米(图二六:2)。另出1件半琮，有称其为琥者，青白玉，方体短射，系琮半剖面而成。器高1.95厘米，射高0.9厘米，射径6.7厘米(图二六:3)。还有刻铭“小臣叕徙”玉瑗(M2009:1011)(图二六:4)。墓内出土的大玉戈，通长达0.7米。工具类的玉钻(M2009:715)，通长21.3厘米，这么大的羊脂白玉，实属少见。另外有3件青灰色饕餮纹玉斧，用玉考究，制作精美。墓内出的玉握，制作绝佳，又较特殊。左手为和阗青白玉握，圆角方形管状，周身饰八周弦纹，两端下各饰两对蝉纹，宽端另有一横穿孔。长11厘米(图二七:1)；右手为和阗碧玉握，作两端略收之圆管状，周身饰旋转龙纹。长12.3厘米(图二七:2)。还出有“王伯”玉管饰(图二八:1)、蟠龙玉饰(图二八:2)和人形玉饰(图二九)。



图二二 三门峡虢国墓地七璜联珠组玉佩(M2001:661)



图二三 三门峡虢国墓地玉器

1.人凤合纹玉佩(M2001:685) 2.玉握(M2001:645)

但玉器中最精致的莫过于各种圆雕动物了。包括有龙、虎、象、鹰、鸽、鸮、兔、鹿、鼠、牛、羊、猴、蛇、龟、蜘蛛、蜻蜓等,绝多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动物品类。其中的玉象,和阗青玉,长鼻上卷,方耳下垂,前额圆凸,双目前视,短尾矮足,憨态可掬,通身线刻饰纹(图三〇:1);玉鸽,和阗青玉,昂首敛翅,目视前方,通身线刻羽饰(图三〇:2);玉鸮,俏色圆雕,突喙前伸,双目圆睁,盘角后卷,周身直立,双爪蹲伏,高5.8厘米(图三〇:3);玉蛇,和阗白玉,曲身卷尾,双睛前视,口吐长信,满身饰纹,腰与信部有穿孔,长9.5厘米,宽1.9厘米,厚为0.75厘米;玉龟,和阗青玉,俏色圆雕,爪尾俱全,伏身昂首,双目前视,神态生动,脖下有对钻穿孔,长5.6厘米,宽4.4厘米,厚2.3厘米;玉蜘蛛,和阗白玉,凸肚上举,双目位于面上,长吻开口前端,精妙无双。长5.1厘米。更为珍贵的是,外棺盖上放置一批用毛笔写在玉片上的遣策,字迹工整醒目。遣策上有周宣王时重臣"南仲"的名字,这为墓主虢仲下葬的年代提供佐证。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遣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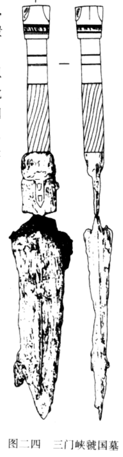
2012号墓,长方竖穴土坑墓,其旁有陪葬车马坑。墓室长5.3米,宽3.74米,深10.93米。葬具为重棺单椁。除随葬大量的青铜器和石器、陶器、骨器、蚌器之外,还随葬有806件(颗)玉器。其中外棺盖上有1件玉戈(M2012:86),青玉,玉质较好,三角形偏锋,有刃,有脊,直内,援本中部有一圆穿。内部有竖行铭文"小臣豉"3字,当为商代遗物(图三一)。内棺盖上置璧、戈、柄形器等,并有1方形铜盒,盒内装有以绿松石、料珠、煤精组成的串饰。内棺中置大量玉器,包括墓主人头部有玉玦,颈部有组合项饰,胸腹部有五璜联珠玉组佩,身上放有玉璧、玉柄形器和一些动物形玉佩饰等,左右手均有腕饰和玉握,足部有踏玉等。其中五璜联珠组玉佩(M2012:115)由1件人龙合纹玉佩、5件形态各异的玉璜和368颗红色或桔红色玛瑙珠及16颗菱形料珠相间串系而成(图三二);右腕饰(M2012:118)由1件兽首形佩,1件鸟形佩,9件形态各异的蚕形佩,2件蚱蜢形佩和8件不同的玉管组

成(图三三:1);左腕饰(M2012:124)由126颗红色或桔红色玛瑙珠、料管、绿松石珠串系而成(图三三:2)。类似的腕饰在2011号太子墓内也有出土。从墓内出土青铜器铭文和墓葬规格推定,2012号墓主人为梁姬,是目前虢国墓地发掘的等级最高的女性贵族,与2001号大墓相邻,应为国君虢季夫人之墓。

虢国墓地还发掘许多其他贵族墓葬和大批小型墓,后者或只有陶器随葬,或仅出小件镞、戈、玦、贝而没有别的器物,差别如此巨大的墓葬同处一地且排列有序,少有相互打破现象,这正与《周礼·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的记载相吻合。也就是说,这里的国君、国君夫人、太子、大夫、士以及庶民以金字塔式排列的墓地,构成了一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完整的诸侯国公墓。

五、河南出土西周玉器几个相关问题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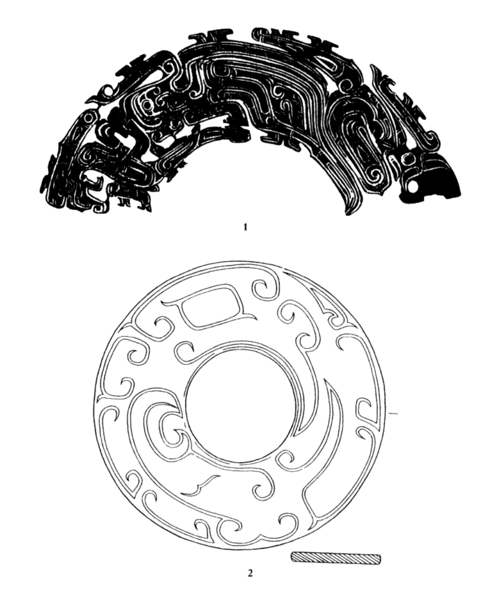
从上述河南四批西周墓内随葬的玉器,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西周玉器的发展面貌。由于这些玉器都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因此,又可作为鉴定西周玉器断代的参照标本。它们反映了西周玉器的"形制奇诡华饰,图案神异符合,构图细密繁缛,碾琢流畅婉绵",胜过商玉一筹。西周玉器完成了从殷商玉器繁荣期到春秋战国玉器繁荣期间历史的大跨越。使我们既可以从大范围之中深层次全方位进行广泛研究,又可以在小范围之内对某种玉器进行具体探讨。以下几个相关问题就涵盖在其中。



图二四　三门峡虢国墓地玉柄铁剑(M2001: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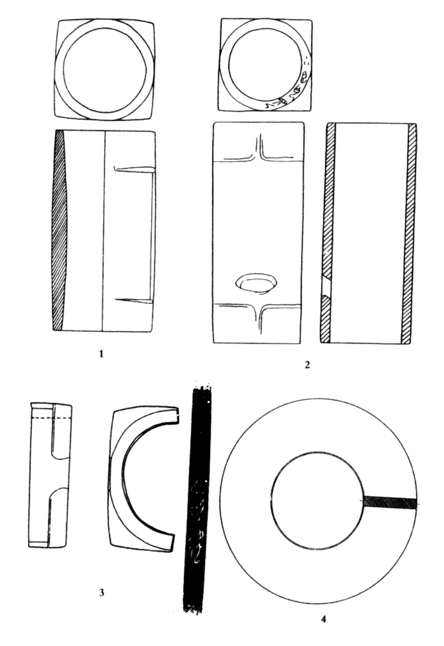
(一)河南出土西周玉器的重大学术价值

上述四批西周玉器分别出于豫东鹿邑长子口墓、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和豫西三门峡虢国墓地。这些西周墓地本身在中国考古学上就非常重要。鹿邑长子口墓属苏鲁豫皖交界,从考古学上讲,正处于黄河中游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海岱文化区和长江下游宁镇文化区之间,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流中起着十字路口的作用,古文化面貌相当复杂。商代晚期,这里是商王东征人(夷)方的必经之地。西周初年,周王室与淮夷势力在这里犬牙交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发掘的西周初年带双墓道的大墓,且随葬品如此丰富。其重要性就不能低估。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为西周时期陪都洛邑成周的所在地,包括双墓道在内的大批西周贵族墓地发掘,以及附近北窑西周大型铸铜遗址的发掘[10],为寻找西周洛邑成周提供了重要线索。应国是存在于中原地区的一个古老封国。平顶山应国墓地的发掘表明,最迟在西周初期,这里已有应国贵族下葬,而至少在春秋早期,应国仍犹存此地。春秋中期之后,这里埋葬了大量的楚人墓葬,或可说明应国此时已为楚国所灭。应国墓地对研究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的应国世系,以及应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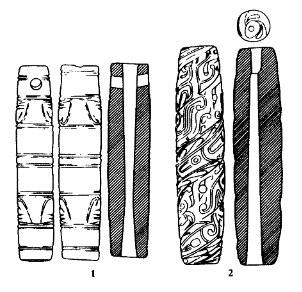
图二五　三门峡虢国墓地 2009 号墓玉器
1. 人龙纹透雕玉璜　　2. 龙纹玉璧

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三门峡虢国墓地的发掘，确切证明了这里在西周晚期有一个虢国的存在。这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封国史以及当时社会等级结构、血缘宗法关系、古代礼乐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最近在虢国墓地东南 2 公里李家窑遗址发现和发掘了虢都上阳城，揭示出城垣与城壕、宫城与环壕、宫殿建筑基址、供水设施、粮库及制陶、制骨、冶铜等手工业作坊[11]，使得虢国考古资料得以完整。这就更增加了虢国墓地的重要性。在上述如此重要的西周陪都或方国的贵族墓地内出土的玉器，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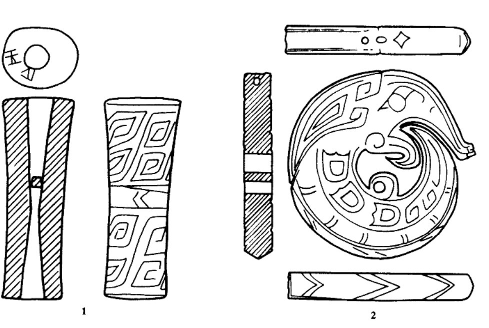


图二六　三门峡虢国墓地 2009 号墓玉器

1. 玉琮　2. 小臣妥见琮　3. 玉半琮　4. 小臣𤔲𬯀瑗(M2009:1011)



图二七 三门峡虢国墓地2009号墓玉器
1.左手玉握 2.右手玉握



图二八 三门峡虢国墓地2009号墓玉器
1.王伯玉管饰 2.蟠龙玉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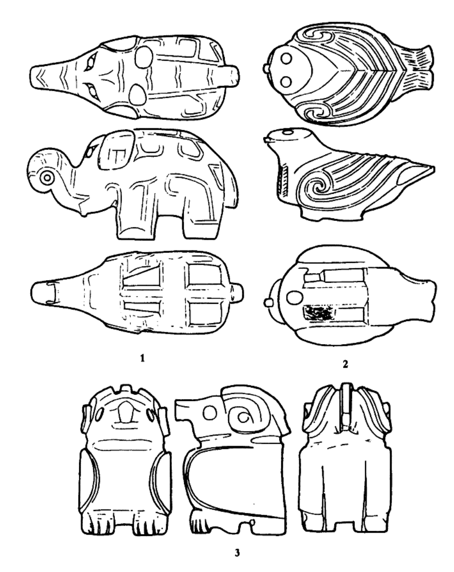


图二九 三门峡虢国墓地2009号墓人形玉饰及拓本

量丰富，品种多，质地好，功能全，贯穿了西周早中晚期的各个王世，其重大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玉器在西周礼制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礼制产生很早，而用玉器作为礼器又远在青铜器之前。经过夏商时代漫长的发展，西周时期的礼制就更加完备。东周成书的《周礼》，对不同等级和身份的人们，在祭祀和其他典礼的重大活动中，使用的青铜器、玉器的数量、质地、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而玉器作为用于礼制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载体，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因此，西周时期对于玉器的制作和应用均格外重视。周王室设立玉作，管理专为王室雕琢玉器的奴隶——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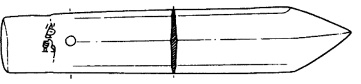


图三〇 三门峡虢国墓地 2009 号墓玉器

1. 玉象 2. 玉鸽 3. 玉鸮

人。《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人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春官·典瑞》又云:"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上面说的不少是西周用玉的规定。这在河南西周墓内出土的大量玉器中已基本得到证实。"六瑞"、"六器"在西周时期均是作为礼器使用的。其中三门峡虢国墓地 2001 号和 2009 号大墓内、尸骨上下出有玉圭、玉璋,肩胛骨与盆骨下出有玉璧,玉璜佩于尸身之上,玉琮、玉琥置于胸腹。足以证实"组六器以

敛尸"是存在的。至于缀玉幎目、口含玉、手握玉、足踏玉,还有耳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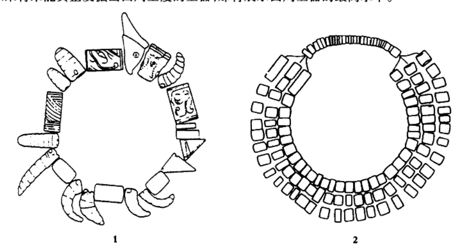


图三一　三门峡虢国墓地小臣豉戈(M2012:86)

发饰、项饰、腕饰,尤其是大型的组玉佩饰,也是西周礼制中用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要比夏商时期更为复杂。

(三)西周玉器雕琢工艺的发展水平

从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产生,又经殷商玉器的发展,到西周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并越过了两个繁荣期。玉器的制作,从使用范围、艺术造型、纹饰图案等又有了新的发展。西周玉器材质优良,和阗玉占有相当比例。相材施艺,据料赋形,俏色工艺,较多应用,尤其是立体动物圆雕,神形并重,惟妙惟肖。以象征手法夸张头部,玉虎阔口露齿,玉兔娇小温顺,玉鹿千姿百态,玉鸟冠羽勾喙突出。雕琢技艺在继承商代阴线刻的同时,独创细阴线和一面坡粗阴线相结合双勾技法,犹如绘画上的浓墨勾皴,奔放跌宕,线条美、韵律美而自成一格。玉器纹饰丰富多彩,龙纹、鸟纹、人面纹、重环纹等达 20 多种,不少是采自青铜器纹饰转化而来,鸟纹图案尤为突出,流行二百多年而长盛不衰[12]。与此同时,西周时期大量礼玉的出现,葬玉的充实与完备,组玉佩饰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反映了西周玉器工艺的进步,在继承商代玉器的基础上又为春秋战国玉器的第三个繁荣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将来能真正发掘出西周王陵的玉器,那将展示西周玉器的最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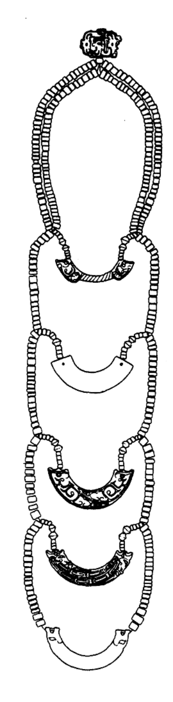


图三三　三门峡虢国墓地 2012 号墓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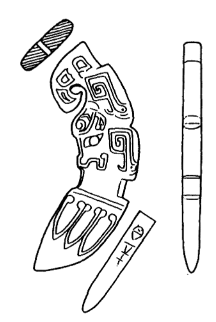
1. 右腕饰(M2010:118)　2. 左腕饰(M2012:124)

(四)西周玉器相当发达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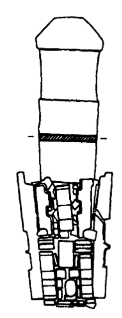
西周建国伊始,就接受殷商覆灭的教训,采取分封诸侯、班赐宗彝和等级世袭的制度,来巩固其统治。为此大力规范礼治,产生一套完整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亲疏、尊卑、



图三二 三门峡虢国墓地五璜联珠组玉佩(M2012:115)



图三四 三门峡虢国墓地2006号墓王伯玉觿



图三五 长安张家坡西周墓玉柄形器组成(M302:15)

贵贱的等级和礼仪制度，并通过青铜器和玉器等载体表现出来。这就需要大量的玉器。在殷商进入第二个玉器繁荣期之后，玉器生产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了促进西周玉器继续发展的技术准备。东西古玉道的开通，为新疆和阗玉东进提供了方便。远在殷商武丁时期的妇好墓，就出有不少精美和阗玉的玉器，那是通过南疆和北疆两路穿越河西走廊而到达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王都在陕西丰镐，距和阗玉产地要比殷墟更近。描写西周统治者与西域交流的《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昆仑会西王母的故事，说明当时获得和阗玉要比殷商更快捷[13]。这些都为西周玉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河南出土的西周玉器中有不少殷商玉器的遗存和一些商代遗风的玉器

诸如长子口墓出土的虎首跽坐人、龙凤纹璜和一批玉戈，三门峡虢国墓地 2001 号墓出土的玉戈，2006 号墓出土的龙首玉笄、玉兔、玉鱼、王伯玉觽（图三四），2012 号墓出土的小臣玻玉戈，2009 号墓出土的小臣妥见玉琮、王伯玉管饰，玉人、玉象、玉鸽、玉鹦、玉龟、玉蛇、玉蜘蛛、玉戈、蟠龙玉饰、小臣𢑓𢓜玉瑗等[14]。这些均为商代玉器。晚期墓葬中出土早期遗物，在考古学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在考古发掘中也常常见到。玉器既不像陶器那样易碎，又不像金属器那样可以被重新熔铸，且玉器一般较小，其流传的概率也远比其他器物为大，况且中国自古就有用玉爱玉藏玉的传统。《逸周书·世俘》："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形容武王伐纣之役获商玉极多。上述西周墓内出土的商代美玉，很可能也是武王克商的战利品，被周王室作为赏赉赐于给诸侯国贵族的。在山西天马——曲村西周晋侯墓地所出玉器中，亦有不少商代玉器与此相类[15]。长子口墓和洛阳北窑西周墓还有一些商代风格的玉器，也可能是西周初殷代玉工制作的玉器，随时光的流逝，到西周中晚期才逐渐融入周人文化之中。

（六）通过河南西周墓的发掘，使我们对玉柄形器的原貌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玉柄形器最早在二里头文化墓葬内有出土，也是商代和西周时期最常见的小型玉器，过去只认为玉柄形器是一种单体玉饰，还有人称之为"琴拨"或"玉圭"。洛阳北窑西周 155 号墓和 250 号墓出土的玉柄形器还带有绿松石小片、玉片、玉柱、蚌饰和喇叭形漆器鞘，平顶山应国墓地 84 号墓出土玉柄形器下面还带有 3～4 串长条形玉缀饰，表明这是一种复合型的玉饰件。发掘者推测其用途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为显示身份的高贵，出外时将玉柄形器佩带于腰部，居家时则悬挂于墙壁之上或陈设于室内。此外，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所出的玉柄形器上端连接一组小玉片组成的附饰[16]（图三五）；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強国墓地所出的玉柄形器一端有绿松石片和玉片镶嵌物[17]。也表明玉柄形器的另一种组合形式。当然更多的玉柄形器是单体出于墓主人的胸部或腰际，应该也是佩戴的装饰品。

从河南出土的西周玉器，可以窥见全国西周玉器发展的轮廓。在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中，玉文化以其特殊的魅力，占有光辉的一页，历经数千年而不朽。我们祖先留下的极为优秀的玉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永恒的篇章，使海内外每一位炎黄子孙都为之自豪。

注　释

[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 1987～1990 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11 期。

[2]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②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 5 期。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十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9 期。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市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 年第 1 期。
[7]《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条下班固自注:"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2 年。
[8]《左传·僖公五年》"宫子奇谏假道"条。
[9]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10]①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西周遗址 1974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7 期。
②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 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造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 年第 5 期。
[11]李家窑遗址考古发掘队:《三门峡发现虢都上阳城》,《中国文物报》2001 年 1 月 10 日。
[12]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 年第 3 期。
[13]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概述》,《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3 年。
[14]商志䃅:《论虢国墓中之商代玉器及其他》,《东亚玉器》,中国考古艺术中心 1998 年。
[15]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赵北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
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赵北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1999 年。
[17]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強国墓地》,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此为参加 2001 年台北"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

从考古发现谈河南境内的楚文化问题

楚在中国先秦诸国中，有着非常辉煌的史迹，从周成王时建国至秦楚灭，前后存在800年之久。楚曾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号称“地方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泱泱大国。楚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影响尤为深远。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灭国六十余，其中有一些位于河南境内。如申（南阳）、吕（南阳西）、邓（邓州南）、应（平顶山）、弦（光山）、黄（潢川）、蒋（淮滨）、番（固始）、道（确山）、柏（西平）、房（遂平）、江（正阳）、东不羹（舞阳）、西不羹（襄城）、顿（项城）、蔡（上蔡和新蔡）、陈（淮阳）……等，包括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建国后，在这里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河南境内的楚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一

在考古发现的遗迹中，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就是城址。

龙城遗址，位于淅川香花乡徐岗村西北，西距丹江2.8公里。平面近方形，南北长900米，东西宽800余米。夯筑城墙高约8米，夯层厚7～10厘米，夯窝直径8～10厘米。从出土陶片看属春秋时期的古城。城址已没入丹江水库区内[1]。这里很可能是楚发迹之处，据《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经考证，楚建国之初的都城丹阳，应在今淅川丹水一带。后来才迁至湖北。从地望上讲，龙城或与丹阳有某种联系。

鄢陵故城，位于鄢陵县彭店乡古城村、田岗村一带。城址分为内外两城，外城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916米，东西宽988米；内城在外城的偏东部，平面为正方形，每边长约200米。目前地面上仅存外城西南角城墙，残长约350米，高3米；东城墙残长100米，高1.50米。夯筑城墙上部为平夯，下部有夯窝。城内出有粗绳纹鬲、细柄豆、绳纹板瓦等遗物，当为春秋时期的鄢陵城[2]。

东不羹城，位于舞阳县章化乡前、后古城村一带。城周长5.5公里，夯筑城墙尚可辨寻。城内文化层最厚处达3米左右。曾出有陶水管道、绳纹板瓦、筒瓦、铜剑、镞、郢爰等遗物[3]《史记·楚世家》记有：“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是楚北上中原的军事要地。

西不羹城，位于襄城县范湖乡尧城宋村西。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1200米。地面四周城垣已不存，城内中部地势较高，采集有鼎、豆、鬲等陶器和铜车马饰

等。城外有东周墓群[4]。

上蔡故城，位于上蔡县蔡都镇芦岗乡一带。平面略呈长方形。周长 10.49 公里。夯筑城墙高 4~11 米，底宽 60 米，顶宽 15 米，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宫殿区在城内中部，散存陶排水管道和板瓦、筒瓦。还发现有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遗址及墓葬区。城内外历年出有铜编钟、鼎、壶、兵器、车马器和楚币。史载这里为春秋蔡国故城。战国属楚，曾进行增修[5]。

新蔡故城，位于新蔡县城关镇。城垣周长 3.2 公里，东墙和南墙保存较好。高 2~7 米，最高处达 10 米，城基宽 20~50 米，夯层厚 14 厘米，夯窝清晰。历年来出土有陶水管道、壶、鼎、豆及铜剑、镞、郢爰、蚁鼻线等。据考证这里为蔡平侯元年（公元前 530 年）所迁之新蔡城，后为楚所灭[6]。

析邑故城，位于西峡县城东北 1 华里处的莲花寺岗上，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墙长 700 米，南墙长 500 米，西墙长 750 米，北墙长 400 米。夯层厚约 8 厘米，部分地段保存较好，东、西、南城门址犹存。城内文化层厚 1 米多，出有战国时期板瓦、筒瓦、井圈、空心砖、瓮、罐等陶器和铜镞，并发现有同期墓葬。据文献记载，此城为楚析邑，又名白羽城[7]。

蓼国故城，位于固始县城及城北一带。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周长 13.5 公里。内城位于外城东北部，周长 6.5 公里。部分城墙尚存。城墙高 4~5 米，底宽 34~40 米，顶宽为 15~20米，断面夯层清晰。城内发现鼎、豆、鬲、盆、罐等陶器残片和 3 枚楚国金质郢爰。外城东南角有春秋、战国青铜器。据考证，这里为蓼国的都城。楚灭蓼后，一度为楚属番国的都城，后又为楚兼并[8]。

蒋国故城，又称期思故城。位于淮滨县朝思乡期思村。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700 米，南北宽 400~500 米。北墙已无存，其余三面城墙断续可见，残高 2~4 米，墙基宽 32 米。城内外出土有陶鼎、鬲、罐和铜鼎、壶、剑、戈、矛、镞、蚁鼻钱及金质郢爰等遗物。这里西周时为蒋国都城，春秋中叶灭于楚[9]。

古息城遗址，位于息县城郊乡张庄东南。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 846 米，南北宽 420 米。城墙大部已毁，但夯土墙基仍可辨寻。城内出有铜鼎、剑、戈、镞、车马饰，还出有陶鼎、鬲、罐、瓮、壶、豆、瓦当等。春秋时期灭于楚[10]。

黄国故城，位于潢川县隆古乡隆古集。城址平面呈长方形，现存东墙长 1650 米，西墙长 1550 米，南墙长 1800 米，北墙长 1720 米，城墙高 5~7 米，基宽 19 米，顶宽 10~15 米。城墙夯层厚 10~14 厘米，夯窝直径 4~7 厘米。城门豁口 3 处，护城河宽 36 米，深 1 米余。城墙夯土内包含有鼎、敦、鬲等陶片，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遗物。史载这里为春秋时黄国故都，公元前 648 年灭于楚[11]。

胡国故城，位于舞阳县拐子王乡胡城集村。城垣周长 1360 米，城墙夯土现今多被破坏，墙基较宽。城内文化层厚 2~3 米，散见板瓦、筒瓦及绳纹陶片。《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郾城县界。"地望与此相符。春秋末叶灭于楚[12]。

召陵故城，位于郾城县召陵乡召陵村四周。现存内外两城。外城呈正方形，周长约 6 公里。内城位于外城西北隅，南北长约 120 米，东西宽约为 100 米，多有高大台基分布。现存外城北墙长为 260 米，西墙长 270 米，高为 9~11 米，宽 3~8 米，夯层厚约 13 厘米。

其余城墙多存于地面之下。历年出土有陶鼎、罐、刻纹白陶瓮及铜镞等东周遗物。史载春秋中期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与楚盟于召陵即此[13]。

房国故城,位于遂平县城关。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四垣周长约3.7公里。北墙残长550米,高3～7米;西墙残段仅有33米,高1～2米。夯层厚9～14厘米。出土有陶鼎、豆、罐及铜镞等。史载这里为春秋时房子国,为楚成王所灭。后有吴王阖闾弟夫概奔楚封于此,故又称吴房[14]。

道国故城,位于确山县古城村东北。城址平面近似正方形,长度和宽度均为300米,现存城墙残高3米。出有陶豆、罐、板瓦等残片和铜镞。传为古道子国建于此,《确山旧志》也有记载[15]。

顿国故城,位于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城址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500米。现残存夯土城墙墙基和护城壕。出土有陶罐、绳纹板瓦、筒瓦和楚蚁鼻钱。春秋时顿子国都此,战国时为楚邑[16]。

南顿故城,位于项城县南顿乡司老街村、崔街村一带。面积约50万平方米,南墙、西墙和东墙已与地面近平,北墙尚残存长217米,高7米,宽5～10米,夯层厚18～30厘米。城内散存板瓦、筒瓦和绳纹陶片,城内外还发现有春秋晚期墓葬。史载顿子国受陈国侵扰而南迁这里建新都,故称南顿[17]。

扶沟古城,位于扶沟县古城乡古城村。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800米,东西宽480米。现存城墙基宽20米,高2～8米,四城角均呈圆转角,西墙中段偏南外稍向外凸。城外护城壕环绕,城址四门轮廓清楚,门道宽5米。城内现存数处夯土台基,发现有陶排水管道、鬲、罐、钵、碗等,为春秋中晚期城址。战国时为楚管辖[18]。并发现楚金银币窖藏[19]。

楚王城,位于信阳县长台关乡苏楼村。分内外二城,平面呈不规则梯形。内城在西南,周长1879米;外城系内城向东北扩筑而成,周长2768米。城墙残高一般为5米,夯层厚10～20厘米,内城西半部有大型夯土台基,可能是宫殿区。城内外散存陶鼎、豆、瓦当残片,历年出有铜簠、盘、兵器、蚁鼻钱及一块楚郢爰金币。文献记载为战国楚之城阳城。楚顷襄王可能以此作为临时国都,俗称楚王城[20]。

陈楚故城,位于淮阳县城关镇南。平面呈方形,周长4.56公里,夯筑城墙残高2～5米,墙基宽20多米。出土有陶鬲、豆、板瓦、筒瓦和铜蚁鼻钱等。城外平粮台、马鞍冢一带发现一批战国楚墓。根据文献记载,这里原为西周春秋的陈国都城,春秋末叶为楚所灭。战国晚期,楚顷襄王曾迁都于此[21]。

楚方城,即楚长城,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北部屏障,连泌阳、方城、叶县至鲁山一线,筑有关城、亭障。退可守,进可攻,并有富饶的南阳盆地作为后盾。楚方城现存有大关口遗址,位于方城县独树镇黄家闸村方城山西麓大关口的两侧。东侧分别夯筑有南北两道土石城垣,北墙长810米,南墙长640米,两墙相距250～380米,残高1.5～3米,顶宽1.5米,底宽10米。西侧亦筑两道城墙,以石为主,全长1419米。城垣上还有一些方形土台之类的建筑,并发现有铜戈、铜镞等[22]。另有象河关遗址,位于泌阳县象河乡北一线。夯筑城垣东至五凤岭,西到关山,全长6公里。残高2～3米,墙基宽12米,夯层厚14～16厘

米,夯窝直径6~8厘米。这里还遗留有多座烽火台,是楚方城的重要关隘之一[23]。

二

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了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一大批各种质地精美的随葬品,闪耀着楚文化无与伦比的光彩。

属于春秋早期的墓葬有:

南阳西关彭宇墓,1957年3月发现。出有铜器、玉器及残漆器等共644件。其中铜器有鼎3、壶2、簠2、戈3、削1、镞5及一批车马饰。两件铜簠形制相同,底内有铭"唯王十又一月辛子申公彭宇自作淄簠宇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32字。楚灭申后改为县,铭文中的申公彭字,可能是楚灭申后所封的县公之名[24]。

信阳樊君夔夫妇墓,1978年2月在信阳市郊南山嘴发现。这是并列靠在一起的土坑墓。1号墓在南,墓底铺朱砂,随葬有铜器、玉器、陶器10多件。铜器有鼎1、鬲2、壶1、盆1、盘1、匜1,除鼎之外有均有铭文,内容相似,如鬲铭为"樊夫人龙嬴用其吉金自作鬲",仅盆铭为"樊君夔用其吉金自作宝盆"。2号墓在北,随葬全为铜器,有壶、鼎、盘、匜、簠、削、锛、刻刀、锥等,但均无铭文。削和刻刀通常为男子使用的工具,墓主可能就是樊君。湖北襄阳之樊,后并于楚,该墓为其遗物[25]。

新野曾国墓,1971年8月和1974年8月在新野县城西门外小西关村各发掘一座。先发掘的墓内除出土有一批玉饰、象牙玦、骨匕、骨贝之外,还有鼎、甗、簠、壶、盘、匜等青铜器和兵器、车马饰等。在一件铜甗上部内壁有铸铭"惟曾子仲诲用其吉金自乍旅甗子子孙孙其永用之"21字。后发掘的墓相距20余米,出土一批青铜器虽无铭文,但形制与之相同,可证均为曾国墓葬。而湖北京山、随县、枣阳和河南桐柏也有曾国文物发现,说明这一带确有一个曾国存在,后为楚文王所灭[26]。

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1983年4月发现。墓内两个彩绘大椁南北并列,出有铜器、玉器、木漆器、竹排箫、麻鞋和丝绢残片等200多件。铜器有鼎、豆、壶、𬭚、鬲、盘、匜、盉、罐、方座、刀、削等,北木椁内铜器有铭"黄君孟"等字样;南木椁内铜器有铭"黄子作黄夫人孟姬"等字样。出土的玉器与铜器一样,制作工细,纹饰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这是黄国墓葬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现[27]。在解放前,潢川就出土一件春秋早期铜鼎,铭为"唯黄孙子傒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孙永宝用享",共23字[28]。

叔单自称为"黄孙子",可知是黄国的贵族,奚君系其称号。1972年秋,在罗山县高店村北,发现3件青铜器,铭有"奚君单"等字样,与前者同出一人之手[29]。1979年,罗山高店又发现一座青铜器墓,所出鼎、壶、盆、盘、匜上均有铭"奚子宿车"等字样,亦为奚君家族,属黄国铜器[30]。1979年3月,在信阳杨河出土一件铜削,铸铭有"惟傒仲𫝣子用"6字[31];1975年春,在潢川老李店出土铜器有"鄎子谋铸皿"或"黄孙须颈子伯亚臣"等铭文[32]。这均为黄国铜器,只是后三者时间稍晚一些。

潢川、信阳番国墓葬。1978年初,潢川刘寨发现一座古墓,出有鼎、簠、方壶、罍、盘等

青铜器。盘内底有铭“惟番君伯㪙用其赤金自(作宝盘)万年子孙永用之享”[33]。1974 年春,信阳县甘岸一座春秋墓内出有铜盘和匜,其中一件匜内有铭:“惟番伯酓自作匜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34]。1979 年 3 月,信阳杨河出有铜鼎、盘、匜、削和陶盂、钵及砺石等遗物。其中多数铜器均有铭“番昶伯者尹”等字样。[35]。番曾为楚的属国,楚成王时被灭。

属于春秋中期的墓葬有:

淅川下寺楚墓群,1976 年冬发现,1978 ~ 1979 年发掘。共有 26 座春秋楚墓和 5 座车马坑。其中 2 号墓最为重要,东西长 9.2 米,南北宽 6.5 米,周围还有多座陪葬墓和一座大型车马坑。下寺楚墓群出土遗物非常丰富,仅 2 号墓就有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及玉、石、骨、料器等达数千件。其他墓葬随葬品之多,也令人目不暇接。出土的列鼎、甬钟、禁、壶和石排箫均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不少青铜器都有铭文,其中 2 号墓的列鼎上有“王子午……令尹子庚”等字样,证明墓主为史书中所记的楚庄王之子午,亦即子庚,曾任令尹,为楚国高级贵族[36]。联系到近年在下寺附近的和尚岭发掘的一批春秋中期楚墓,其中一座墓内出土的铜鼎铭文表明,墓主为克黄,系楚令尹子文的孙子,楚庄王时任箴尹[37]。这表明楚国著名的王族之一的若敖氏家族也葬在这里。这些发现为探讨楚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提供线索。

淅川毛坪楚墓群,1974 年冬发现,1975 年春发掘。共有 27 座墓葬。均为中、小型墓。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也有双手交叉于胸前的。头向多朝南,少量朝北,出有青铜礼器、车马饰和陶器等。一部分墓如 18 号墓属春秋中期,也有一部分为战国时期墓葬。对研究丹江下游楚文化面貌及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很有价值[38]。

属于春秋晚期墓葬有:

固始侯古堆勾敔夫人墓,1978 年 3 月发现,为一座大型墓葬和一座陪葬坑。墓室底部和四周有积石和青膏泥。出土有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木漆器、肩舆、陶器、瓷器、玉器等 150 余件。墓主为女性,还有 17 人殉葬。据铜簠铭文“有殷天乙唐孙宋公䜌作其妹勾敔夫人季子媵簠“推断,墓主当为勾敔夫人季子。墓葬礼俗和出土遗物有吴、楚两文化的因素[39]。

潢川高稻场蔡公子义工墓,1966 年 4 月发现。为一座春秋晚期的木椁墓,出有鼎、敦、簠、匜、盘、缶、舟等铜器。铜簠盖内有铭“蔡公子义工作臥簠”8 字。当时的蔡国受楚威胁,屡屡东迁[40]。

固始白狮子地 1 号楚墓,1980 年 1 月发掘。该墓位于侯古堆大墓北 1 华里处,为土坑竖穴木椁墓,椁室用方木筑成。出土铜鼎、壶、匜、熏炉、兵器、工具、车马器及木漆器、陶器、玉器等大小 700 余件,并殉葬 13 人。进一步丰富了春秋晚期楚文化的内容[41]。

属战国早期墓葬有:

信阳长台关楚墓,1957 ~ 1958 年发掘。1 号墓在西,与 2 号墓并列。两墓都是木椁墓,形制结构相似。均有前室、主室、左侧室、右侧室、中后室、左后室和右后室等七个墓室。1 号墓出有成套铜编钟、彩绘锦瑟、大鼓和小鼓等乐器,一大批彩绘棺板、案、床、木俎、盒、耳杯、豆、鼓座、镇墓兽等漆木器,鼎、壶、盘、匜、敦、夌等青铜器,璧、璜、佩、管、带钩等玉器,百余枚竹简和制作竹简的铜刀、削、锯、锥等工具及书写竹简的毛笔,还有陶器、铁

器、丝织品、竹席等。2号墓出有木质编钟、编磬、瑟鼓等乐器，一批同样精美的漆木器，还有彩绘木俑和一些铜器、车马饰等[42]。长台关楚墓的发掘是考古的一大收获。椁室结构是古代木构建筑的实物例证；竹简的出土，是研究楚史和古文字的重要资料；编钟、编磬、鼓、瑟等成套乐器尚不多见；各木雕彩绘漆器色彩鲜艳，图案想像丰富，显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楚文化的高度艺术水平。

属于战国中期的墓葬有：

正阳苏庄1号楚墓，1986年2月发现并发掘。为土坑竖穴木椁墓，椁室、棺室、边箱、头箱均用方木构成，榫卯扣合严密。木棺的棺盖、左右棺板和底板各由一块巨大的独木板制成。该墓两次被盗，铜器已无存。出土有一批陶鼎、敦、壶、钫、盉、豆和井等，器表多饰有黑地，部分有朱绘图案，少量残留有银色金属物质痕迹；还出有杯、豆、案、俎、勺、窝形器、大鼓、小鼓、鼓杖、翣、梳等漆木器及瑟等乐器；也出有璧、璜、佩等玉器和木贝、残铁削、苇席等。这些随葬品中漆木器造型精巧，图案绚丽多彩，显示浓郁的楚风。鼓杖和木贝是豫南楚器的新发现[43]。

属于战国晚期的墓葬有：

淮阳平粮台16号楚墓，1979年至1980年发掘。为平面呈甲字形的较大竖穴木椁墓，随葬礼器均为陶质，有鼎、钫、壶、簠、豆、盆、罐、锥壶、编钟、编磬等；玉器有璧、璜、佩、环、管、带钩、镜架等；铜器仅有镜、削、饼等、此外还出有料珠。从墓内随葬陶九鼎看，墓主当为楚高级贵族。出土的玉器数量很多且十分精美，可能受中原影响。玉镜架为首次发现。陶器形制仍同于鄂、皖楚风[44]。

淮阳马鞍冢楚墓，1980年发现，1981年至1983年发掘。为南北并列二冢。南冢下为中字形大墓，北冢下为甲字形大墓，遗物被盗一空。两冢西边均有一座大型车马坑。南冢西边车马坑随葬各类车23辆、泥质马20匹、缀贝旌旗6面，并出有精美的错金银龙首辕头；北冢西边车马坑随葬车8辆、马24匹，并出有一大批鼎、敦、壶、钫、盒、簠、簋、豆、高足壶、匜、箕等陶礼器。从墓葬形制看，南冢是主墓，北冢是陪葬墓[45]。经考证，墓主很可能是战国晚期的楚顷襄王[46]。

三

从上述古城址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古城原是淮河流域或再北一些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大小列国的都邑所在，其形制为长方形或近于正方形，是中原文化的传统模式。随着楚的强大和向北扩张，依次成了楚的属国和最后为楚所灭。逐渐接受楚文化的因素和影响，出土遗物中不少是典型的楚器和楚币。作为临时国都的信阳楚王城和晚期都城的淮阳陈楚故城尤为明显。这些城址的分布，也成了楚国扩张和北进的座标。

墓葬的发掘，更使我们形象地看到河南境内楚文化阶段性的发展历程。春秋早期申国、樊国、曾国、黄国、番国的墓葬，这些江淮小国当时大多还处于独立地位，基本上还是继承西周文化的传统，少部分受楚文化的影响。到了春秋中期，豫南地区已基本落入楚国之

手，诸小国不是从属于楚，就是为其所灭。楚文化在融合吸收当地各小国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淅川下寺楚墓群的墓葬形制虽仍沿用长方竖穴土坑，但随葬品的配置等级分明，铜禁等器物已采用了失蜡法等先进铸造工艺，一些青铜器已具有南方楚器的风格。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已牢牢控制了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河南境内的楚文化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竖穴土坑墓的前面已增加了斜坡墓道，墓内椁室用木板构筑，随葬漆木器如异军突起，品种和数量空前，纹饰繁缛，富有浪漫色彩。加之各种乐器和竹简的出土，显示楚文化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战国晚期，随着楚政治、经济的衰退，河南境内楚文化自身的特征有所减弱，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铜器大为减少，木漆器绝迹，礼器由陶代铜，玉器增加。而淮阳马鞍冢楚顷襄王墓居然用陶礼器和泥马随葬，反映楚国国势已日落西山。

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约 400 年间，楚灭诸国，争霸中原，饮马黄河，问鼎于周……等重大军事和政治活动都在河南。到了战国晚期，楚国迁都于陈，这里更成了楚后期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楚国的兴衰荣辱都与河南息息相关，而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过去的考古发现反映了河南境内楚文化的高度发展水平，但距楚文化的全貌肯定还有一定距离。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发现，去探索，去研究。

注 释

[1]张西显：《浅说楚都丹阳在淅川》，《中原文物》1983 年特刊。
[2]刘东亚：《河南鄢陵县古城址的调查》，《考古》1963 年第 4 期。
[3]朱帜：《河南舞阳县北舞渡古城调查》，《考古通讯》1958 年第 2 期。
[4][6][10][12][13][14][15][16][17][22][2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 年。
[5]尚景熙：《蔡国故城调查记》，《河南文博通讯》1980 年第 2 期。
[7]韩维周、王儒林：《河南西峡县及南阳市两古城调查记》，《考古通讯》1956 年第 2 期。
[8]詹汉清：《固始县北山口春秋战国古城址调查报告》，《中原文物》1983 年特刊。
[9]李绍曾：《期思古城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3 年特刊。
[11]杨履选：《春秋黄国故城》，《中原文物》1986 年第 1 期。
[18]周口地区文化局：《扶沟古城初步勘查》，《中原文物》1983 年第 2 期。
[19]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 年第 10 期。
[20]欧潭生：《信阳楚王城是楚顷襄王的临时国都》，《中原文物》1983 年特刊。
[21]曹桂岑：《楚都陈城考》，《中原文物》1981 年特刊。
[24]王儒林、崔庆明：《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
[25]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26]①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②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1978 年。
[27]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4 期。
[2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29]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发现春秋早期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30]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31][34][35][40]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信阳发现两批春秋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32]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33]郑杰祥、张亚初:《河南潢川县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79 年第 9 期。
[3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3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春秋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 年第 3 期。
[38]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淅川县毛坪楚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 年第 1 期。
[39]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41]信阳地区文管会等:《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4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43]驻马店地区文化局:《河南正阳苏庄楚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 年第 2 期。
[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0 期。
[4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0 期。
[46]①张志华、骆崇礼:《淮阳马鞍冢墓主考略》,《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②马全:《马鞍冢楚墓墓主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 1987 年。

(原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河南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西周初年叔虞封于唐，其子燮改号为晋。疆域辽阔，横跨黄河中游广大地区。以晋南为中心，孕育了灿烂的晋文化，与南方的楚文化、东方的齐鲁文化及西方的秦文化交相辉映。晋文公春秋争霸在前，韩赵魏战国称雄于后，在先秦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国后，山西侯马晋国铸铜作坊[1]和盟书[2]的发掘，尤其是近年来曲村一批晋侯大墓带铭青铜器的出土[3]，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河南北部属晋国范围，三家分晋后的韩、魏两国的版图主要都在河南、赵国的影响也波及到豫北。晋文化，特别是后来的三晋文化，在河南都有许多考古发现，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

1979 年 3 月，在温县城东北 12.5 公里的西张计村，发现了一处东周盟书遗址[4]，出土有墨书文字的圭形石片。据调查，解放前在这里曾多次发现写有盟辞的圭形石片，但多已流散丢失。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 11 片“沁阳载书”就是在这处遗址出土的[5]。

1980~1982 年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并发掘 124 个土坑。有 16 个坑出土书写盟辞的石片 1 万多片（其中 8 个坑单出石圭片，5 个坑单出石简片，3 个坑石圭片堆积在石简片之上），其余的坑有的仅见玉璧、玉兽等玉器，还有 35 个坑出土羊骨架。这些坑绝大部分为长方形，个别为椭圆形，其中最丰富的为 1 号坑，长 2.04~2.08 米，宽 0.96~0.98 米，坑的上半部已被挖去，残深约 0.8 米。坑内出土盟书达 4588 片，完整的为 1382 片。盟书上原都有字，因埋藏年长日久，许多字迹已模糊不清。从发掘中可以看出，石圭片在 1 号坑内的放置是有规律的，若以圭尖方向一致、彼此靠近的石圭作为一组，共计十三组，第十四组包括有石简和石璋。石圭是薄片状，盟书文字是用毛笔墨书，由于出自多人之手，字体风格不一。盟辞的行文方式多是自上而下的，由右及左，仅个别是由左及右。凡在石圭、石简未写完的，则续写在背面。盟书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约束文书，温县盟书大体属于后者。盟书又称载书。《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宋“大尹谋曰：我不在盟，无乃逐我，复盟之乎？使祝为载书。六子在唐盂，将盟之，祝襄以载书告皇非我。”《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面埋之，谓之载书。”从上述记载又可以看出盟书的礼仪及其程序。先写好盟书，凿地为

"坎",也就是挖坑,再用牲歃血为盟,宣读盟书,用牲埋书……。古代盟誓多在坛上举行。《礼记·杂记》:"孔子过故杏坛曰:兹臧文仲盟誓之坛也。"盟誓的坛往往设在城门外,《韩非子·内储说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设坛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豭,若盟状。"《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盟于稷门之外"。《左传》成公十二年:"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温县盟誓遗址原为一座高 2 米多的土坛,上部已遭破坏,仅存基址。台基南北长 135 米,东西宽 50 米。正位于晋国著名的州城东北城垣之外,可与上述文献相互印证。

这次所出盟书中许多盟辞首句有"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的纪年。有的盟辞首句仅记"辛酉"二字,当是前述纪年的省略。"乙未朔"是说十二月初一这一天为乙未日,"辛酉"据干支推算是指二十七日。这一纪年表明,在晋国某一位国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了这次盟誓仪式。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 634 年)时,把州地赐给了晋文公。《国语·晋语四》记有:"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茅之田。"自此,晋国势力才达到豫北一带。晋国自文公之后共有十七君,其中超过十五年的有景公、悼公、平公、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和孝公九君。据朔闰干支推算,盟辞中"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可能是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元前 497 年 1 月 16 日)。这次盟誓举行之时,尚未三家分晋,州城归晋国六卿中的韩氏管辖,因此,温县盟书的主盟者应为当时的韩氏宗主——韩简子(名不信)。

建国以来,除 1965 年在山西侯马发现晋国盟书之外,温县是第二次发现,两地相距不远,又均属晋国,温县有一些盟书和侯马盟书很相似,因此它们之间可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温县盟书数量超过侯马盟书,1 号坑发现纪年的石圭、石简片,给温县盟书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温县盟书是河南晋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东周盟誓制度,古文字和书法艺术,以及晋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二

东周时期,由于列国分立,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战争频繁,作为防御的城垣日益普遍。虽然开封北部著名的魏都大梁尚在黄沙之下未见踪迹,但新郑郑韩故城、登封阳城、宜阳故城等都是韩国的通都大邑,考古发现甚丰。

周烈王元年(公元前 375 年)韩灭郑后,把国都从阳翟迁到新郑。直到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 230 年)被秦所灭。韩在此建都达一百四十五年之久。郑韩故城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 5 公里,南北宽约 4.5 公里,中部有一道南北向的隔墙,把城址分为西城(内城)和东城(外城)。在西城分布着较为密集的多处夯土建筑基址,应该是宫殿遗存。1983 年至 1987 年,在内城偏东侧发掘了三处战国晚期的大型夯土台基。其中 2 号夯土台基保存完好,平面呈长方形,长 45 米。发现南北向墙基 4 条,在南北两端各有一条东西向墙基。夯土台基中部有两行南北排列用以立柱的大型磉墩,每排 8 个,行距 2.7~3 米,间距 2.65 米,残存口径约 1.4 米。夯土台基南端有东西向排列的磉墩 6 个,间距 3.6 米~4.4

米，残存口径1.2米。这处夯土台基为高台建筑基址，可能是一座坐西向东的配殿[6]。这为研究韩国宫殿建筑结构、建造水平及城市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

位于韩国宫殿区西北的地下建筑和冷藏井的发现，是近年来郑韩故城考古又一重要收获。地下建筑是从地面向下挖成长方竖井形，南北长8.9米，东西宽2.9米，深3.4米。口部四周的地面上，有一些圆形的柱洞，说明当时上面建有屋顶。室内东南角有一条十三级台阶的走道，可以上下出入。地下建筑四壁用夯土筑成，墙脚嵌着正面饰米字格纹背面有凹槽的方砖。室内西部地坪铺有同样的方砖，东部地面有南北成行的五眼井，全是用预制的陶井圈套叠而成。口径1米，深约2米。在井中和地下建筑内出土有许多陶器和大量的牛、羊、猪、鸡等骨骼。有一些陶器上还刻有"仓公"、"左胅(厨)"、"吏"、"私官"和"啬夫"等陶文。这可能是韩国用于宫廷祭祀和日常生活需要的一处储藏肉类食品的地下建筑[7]。

在东城内发现有铸铜、制骨、制陶、制玉和冶铁等作坊遗址。后者位于东城内西南部(今仓城村南)，面积约4万平方米。出土有熔炉、烘范窑和大量的包括铸造铁镢、锄、镰、铲、锛、凿、削、刀、剑、戟、镞铤和带钩等十几种器物在内的陶外范和范芯。还有镢、锄、镰、铲、锛、刀、削、锥等铁器。反映战国时期韩国的冶铁业相当发达，已经大量生产铁制工具和兵器。

在郑韩故城附近，调查发现大型战国墓葬27座及陪葬坑或车马坑390余座，组成十余处陵区，每个陵区包括1至4座大墓。墓葬多南北向，平面可分为船形、中字形、甲字形和长方形。其中船形墓较多，中间部分为墓室，略宽于两端的墓道，墓室与墓道之间无明显界限。大墓的封土和填土都是经过夯打。应为韩国国君或王室墓葬[8]。如新郑许岗就发现4座东西并列的韩国大墓，1号墓和2号墓为中字形，1号墓室加南北墓道总长141米，墓室长宽均约20米；2号墓南北总长117.5米，墓室南北长15.5米，东西宽9.5米。3号墓和4号墓为船形，3号墓南北总长168米，墓室长20余米，宽为19米；4号墓南北总长121.5米，墓室长16米，宽13米。在大墓附近，还发现有车马坑、陪葬墓、附葬坑、杀殉坑等遗存[9]。

在东城内(今白庙范村)还发现一座韩国兵器窖藏[10]。在口径约0.6米、深约0.36米的不规则形土坑内，堆放着大量铸造精良的铜戈、矛、剑等兵器，其中有铭者达170多件。铭文中有不少关于地名的记载，如郑、阳人、郙、梁、阳城、焦、雍氏、平陶、安成、格氏、东周、长子等20余处。铭文中常有"郑令"、"司寇"、"工师"、"冶尹"等官名。"郑令"即郑城县令。"司寇"主刑罚，中国古代兵和刑无别，司寇监管兵器和刑具。《国语·晋语》(六)记有："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郑令和司寇可能就是兵器的督造者和监管者。而铸造兵器时，有一些刑徒参加劳动，刑徒也归司寇管理。"工师"可能就是兵器铸造的监工者，《荀子·王制篇》记云："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文中所指与此近同。"冶尹"或称为"冶"，应是当时铸造兵器的直接掌握者，掌握兵器合金比例和冶铸技术。在一些铭文中还有纪年，加上铭文中相同的郑令、工师、司寇和冶尹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测出兵器的铸造时间当在韩襄王二年之后，直到韩王安八年亡于秦为止，即公元前310～公元前231年之间。这批铜兵器的出土，在三晋考

古上有重要意义，不仅数量多，而且铭文内容丰富，对研究战国时期韩国的地理、文字、冶铸官职、兵器形制和铸造工艺都有重大学术价值。从中也可以看出韩国继承和发展了晋国的青铜铸造工艺。

阳城位于登封告成镇东北，平面为纵长方形，周长约5400米。其中北城墙是沿着丘陵坡地修筑起来的，墙基宽约30米，地面上尚存8米高。城内中部偏北，有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地面上还残留有成片的铺地砖，其上还堆积有较多的砖块、板瓦、筒瓦、瓦当和陶器残片。在建筑基址西侧断壁上，还发现地下埋有套接的陶水管道，这属于阳城内贮水输水的设施。陶水管道自北向南铺设在岩石层中挖好的沟漕内。已发掘约500米左右，每隔30～50米就有一个三通管，其南端与一个贮水池相连，贮水池也是开凿在红色岩石层中，水池底部用河卵石平铺了一层，用以沉积水内的泥沙。贮水池东壁底部有涵洞和阀门坑，可以向外输水[11]。

在阳城的南城墙外，发现一处战国时期铸铁遗址[12]。发现有熔铁炉底、炉壁及炉衬残块，陶鼓风管残块，还有大量铸造各种铁器如镬、锄、镰、斧、刀、削、戈、矛、镞铤、环、带钩及方棱条形器的陶范。包括外范和内范，均是用经过选择和淘洗的细泥掺细沙模制而成。引人注目的是带钩范，出土时还扣合在一起，外面糊有一层加固泥。就残存高度看，这块残范内至少有4～6个或更多重叠在一起的带钩范腔，中间有一个直浇口，直浇口和范腔间又有浇口，说明当时已采用一范多器薄壳铸造法。显示了韩国高水平的铸铁工艺。

宜阳故城为战国时期韩国的都城之一，既是军事重镇，又是著名的商业城市，位于今宜阳县韩城镇东侧。平面略呈长方形，分宫城和郭城两部分，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部。夯筑城垣，东墙长1579米，南墙长1680米，西墙长2050米，北墙长2010米。相当一部分埋在今地面之下，现存墙高1.2～8米，发现有北门和东门的遗迹。在郭城的北墙外侧，发现有5个马面遗迹，每个长约36～51米，宽35～50米，残高0.5～2.5米。亦均为夯筑，这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马面建筑。在东、北两侧城墙外，都有明显的护城壕遗存。在城内已找到纵横大道各2条，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3处，烧窑群1处。在城北不远，发现有韩国陵墓区，包括4座大冢和一批墓葬。在宫城内也发现10座战国墓，其中一座虽被盗掘，仍出土了铜列鼎7、铜编钟9、铜豆4，以及车马器和玉器、石磬等。可证墓主是韩国高级贵族。城内散见不少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还出土大量戈、矛、镞等铜兵器，据传当地还见有铜镞射入人头颅内的尸骨。这些可能是秦国攻破宜阳的战争遗存。《史记·韩世家》记有："(襄王四年)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阳。五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考古发现与此相吻合[13]。

三

除前述新郑郑韩故城发现韩国王室贵族大墓之外，1987～1988年，在禹县西关发掘83座战国墓[14]。其中有6座为甲字形墓，余者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甲字形墓皆有斜坡墓道，一般长6～9.5米；墓室为长方形，一般长3～4.5米，宽2.5～3.6米，深6～7米。

葬具为一棺一椁，均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置椁外边箱内，多为成套的仿铜礼器，也有墓主生前使用过的铜器和玉器。其中38号墓出土了鼎、敦、壶、盘、匜、勺等铜礼器，车軎、盖弓帽、马衔、马镳等车马饰，剑、戈等铜兵器，还有玉璧等遗物，多达65件。长方竖穴土坑墓一般长2.4～2.9米，宽1.4～1.9米，深4～6.5米。葬具为一棺或一棺一椁，亦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置于头前壁龛或墓主一侧。多为1～3套陶制仿铜礼器，其组合为鼎、敦、壶或鼎、豆、壶加盘、匜、高柄壶等。少数墓随葬有剑、戈、矛、镞等青铜兵器，以及玉璜、鹿角、串饰等。其中一件铜器戈上还有"□郢之王戟"的5字铭文。这次发掘的战国墓葬分布密集，不少是双墓并列，当为夫妇异穴合葬墓。墓葬以甲字形墓为中心成组排列，可能是分属几个不同的家族墓地。禹县在战国时称阳翟。曾一度作为韩国都邑，也是著名的商业城市。这处墓地的发掘，为研究中原地区战国墓葬的分期和韩国的埋葬习俗提供重要的资料。

魏国的墓地，在辉县、陕县、郑州、新乡等地均有发现。1950～1951年，在辉县固围村、琉璃阁、赵固、褚邱四地，共发掘魏国墓葬50多座[15]。其中固围村墓地坐北朝南，背倚山岗，中部为长150米、宽135米、高2米余的长方形平台，系就天然岗坡整治而成。平台上并列3座大墓，规模最大的2号墓居中，稍小的3号墓和1号墓分在东西两侧，其西另有南北并列陪葬的中型5号墓和6号墓。三座大墓的上部，都覆盖有气势恢宏的享堂建筑，其建筑基址范围大于墓室。2号墓的享堂包括周围的砾石散水每边长27.5米，现堆积有厚约0.5米的瓦片层，还残存有柱础。推测这座享堂应是七开间四角攒尖顶的长方形瓦顶建筑。3号墓的享堂每边长19米，1号墓的享堂每边长18米左右。均约是五开间的建筑。大墓墓室的南北两端都有较长的墓道，通长达150米以上，深约15米多。由于早年被盗，墓室已遭破坏。从2号墓残存看，墓室的结构方法是先在墓圹底部平铺以厚1.6米的8层巨石，再用木枋垒砌长9米、宽8.4米、高2米的近方形椁室，椁室放置套棺，外椁内填塞木炭以防潮。椁室两侧和靠近墓道处，以巨石筑墙，墙内充填细沙，最后填土夯实。1号墓南墓道的尽头，发现有放置两辆马车的木室。享堂基址东南部散水下面，还有两个瘗埋祭玉的小坑。各墓随葬的器物也大多不存。1号墓随葬品较多，主要是带暗纹的磨光黑陶仿铜礼器，其中包括带盖鼎9，还有带座豆2、圆壶4、鉴4及盘、匜、簋、筒形器等。祭玉坑内出有玉简策50、玉圭6、玉璜4及玉环、琉璃珠和石圭等。其中一件大玉璜全长20.2厘米，由5块洁白的美玉和两个鎏金兽头组成，布局匀称，雕工剔透，实为上品。置车木室中出有错金银马头形车挽饰，面目头额上均满饰错金银卷毛纹、夔纹、鳞纹和平行曲水纹，极为细致精巧。其中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5号墓出土的一件包金镶玉银带钩了，带钩呈琵琶形，长18.4厘米，中宽4.9厘米，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蟠龙，嵌以白玉玦和料珠，钩部则用白玉雕琢成鸭头状。这样纹饰复杂、透剔玲珑的带钩，代表了当时工艺技巧的最高水平。这5座墓内还出有铲、锄、犁、镢、斧、削等93件铁质生产工具，经金相学鉴定，系用固体还原法冶炼而成。这是中国第一次成批出土的战国铁器。固围村墓群当为战国中期魏国王族墓地，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组，对考察当时三晋地区高级贵族的埋葬情况有重要意义。

辉县琉璃阁、赵固、褚邱发掘的是一些中型的魏国墓葬。其中赵固1号墓形制较大，

出有5鼎,出土有动感很强的宴乐射猎纹铜鉴和纹饰繁缛的云雷纹铜壶。琉璃阁还发掘出一座大型车马坑,出有一批马和19辆车。

陕县后川、李家窑等地,发掘出100多座魏国墓葬[16]。其中后川2075号墓出土陶鼎多至9件,还出有豆、壶、罐、盘、匜、鉴和鸟柱盘等一批陶器。后川2040号墓出土铜器较多,有无盖大鼎5、带盖的7鼎和5鼎各一套,带座盖豆4、无座盖豆4、敦2、簠2、方壶2,还有鬲、甗、盘、舟、匜、鉴以及编钟、编镈、编磬和较多的玉石饰物。后川2041号墓出有5鼎,并出有与2040号墓相仿的各种器类。此外,还有一些出有3鼎的墓。上述墓主显系级别不同的贵族。

郑州二里岗[17]、岗杜[18]等地,共发掘出200多座魏国墓葬。多属小型墓,还包括一部分空心砖墓。随葬陶器的组合多为鼎、豆、壶、盘、匜各一件,有的缺盘、匜,有的另加细把豆或圈足小壶等,少数墓组合为鼎、盒、壶。

1984年4~5月,在新乡丁固城村发掘7座魏国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9],有屈肢葬和直肢葬。墓坑内共出土45件器物。陶器组合为鼎、豆、壶、小壶、盘、匜或浅盘豆。其中43号墓出土了5件印有"陶其"戳记的陶器,这为研究魏国陶文和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新的资料。

上述墓葬,反映了三晋地区不同社会等级的葬制、葬俗。

1982年,在汤阴县五里岗发现一处战国中晚期墓群,东西成行,排列有序,总数达4000多座[20]。墓葬全为竖穴土坑墓,在已经发掘的210座墓中,出土了一批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料珠等随葬品。死者绝大多数为男性青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的尸骨上还洞穿有铜镞,有的有明显刀砍痕迹。好象是一批战死者。

汤阴古称荡阴,战国属魏,地处魏、赵边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文献记载,秦昭王四十八年,亦即魏安厘王十八年(公元前259年),秦派大将王陵领兵围赵都邯郸。两年后,魏、楚联军救赵,魏派晋鄙率十万大军进驻汤阴一带,因畏强秦,不敢前进。魏相信陵君无忌窃取魏王的虎符,假造命令,带勇士击杀晋鄙,夺得兵权,挑选八万精兵进击秦军。同时,楚春申君黄歇派大将景阳带兵救赵。秦军在赵、魏、楚三国军队的内外夹攻下,终于大败,遂解邯郸之围。这就是有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由于战争激烈,延续时间又长,双方伤亡惨重。汤阴五里岗战国墓群其年代和地点均与这场大战基本相符,推测这里很可能是当时阵亡的兵士之墓地。这无疑是三晋考古的重要发现。

四

自春秋始,尤其到战国时期,各国为防御邻国进攻和东胡、匈奴的侵扰,广泛修筑长城。其中也包括三晋地区的魏、赵等国的长城。

密县尖山乡的小顶山、香炉山、蜡烛山及五岭一带,有一段南北走向的长城,现存长约5.8公里,为青石砌筑,墙基宽2.5米,高出地面1~2.5米不等[21]。这里属魏、韩边界,为魏国西陲之地。《史记·苏秦列传》云:"大王之地……西有长城之界。"可能指的是陕西华

阴向北经大荔、澄城、合阳至韩城的魏西长城，也可能指密县一带魏长城。《后汉书·郡国志》也提到“有长城经阳武到密。”

辉县北与林县交界处有石砌长城断续绵延约 30 公里，残高约 2 米，宽仅余 1 米余。再向北，经林县西部林虑山麓到林县北任村西山顶，断续又有三段长 10 多公里，亦为石筑，基宽 4～11 米，残高 1～2 米。据调查，这里为赵南长城遗址[22]。被公布为第二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上述长城遗迹的发现，充分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原三晋地区军事斗争和历史的大变革。

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盟书、城址、墓葬和长城遗存外，三晋钱币的发现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

河南发现的三晋货币主要集中在豫西和豫中地区。1958 年 9 月，在洛阳老城东南夹于伊、洛河之间的董村，出土平首布 583 枚，圜钱 118 枚[23]。1973 年冬，在新郑县北关，发现一罐窖藏战国货币，计有平首布 226 枚[24]。1984 年 4 月，在郑州西北郊沟赵乡，出土一罐战国平首布，总计 2065 枚[25]。

平首布包括平肩平首布和圆肩平首布两种：前者为平首，平肩，弧裆，方足，铸造很精细；后者为平首，圆肩，弧裆，方足。洛阳董村出土的平肩平首布钱面铸铭有：蒲坂一釿、阴晋一釿、晋阳一釿、京一釿、梁一釿等 5 种；除晋阳一釿有郭外，其余钱的周围均无郭。圆肩平首布钱面铭文有：安邑一釿、安邑二釿、虞一釿、梁正尚百当寽等 4 种；前两种周缘无郭，后二者周缘有郭。新郑出土的平肩平首布钱面铭文有：颖一釿、梁邑、蔺、蒲子、數垣、安阳、马服邑、鄃、中都、屯留、郸、北屈、垂、鲁阳、平阳、�、宅阳、阴晋一釿、阳邑、鄁涎安、涅金等 20 多种；圆肩平首布钱面铭文有：梁充五当寽十二、梁正尚金当寽、安邑二釿、安邑一釿、虞一釿等多种。郑州沟赵出土的平肩平首布铭文，除一些与新郑的相同之外，还有平阴、鄛、邬、隰城、周是、奇氏、涅、露、同是、高都、丘贝、郱子、践土、鄁、王氏、郛氏、皮氏、川阳、壤阴、咎如、祁、烋邑、虚阳、曾尚、盥等多种。上述钱铭为地名，都在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除个别为周王室外，均为韩、赵、魏三国所铸。

圜钱均为圆形，流行于三晋的圜钱中部为圆孔。洛阳董村出土的 118 枚圜钱正面铸铭文有垣、共、安臧等 3 种。这些铭文也是地名，垣（今山西垣曲县西）、共（今河南辉县）属魏国，安臧（今河北正定）属赵国。

平首布和圜钱过去发现的不多，尤其是后者，自成一个体系，对古代钱币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上述发现为研究三晋地区的货币制度和商品经济，提供了珍贵资料。

注　释

[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 1993 年。
[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 1976 年。
[3]《曲沃曲村发掘晋侯墓地》，《中国文物报》1993 年 1 月 10 日。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3 期。
[5]陈梦家：《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考古》1966 年第 5 期。
[6]郭木森等：《新郑发现一座韩国大型建筑遗址》，《中国文物报》1987 年 10 月 2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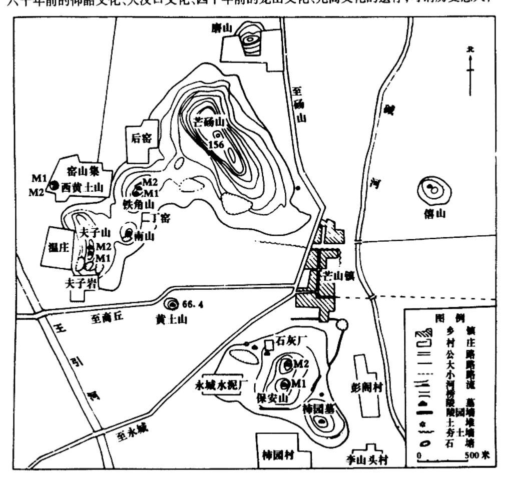
[7]马世之:《略论韩都新郑的地下建筑及冷藏井》,《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1 期。
[8]宋国定:《新郑县郑韩故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 年)》,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郑工作站等:《新郑县辛店许岗东周墓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7 年第 4 期。
[10]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 年第 10 期。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工作站:《登封战国阳城贮水输水设施的发现》,《中原文物》1982 年第 2 期。
[12]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等:《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调查与铸铁遗址的试掘》,《文物》1977 年第 12 期。
[13]①赵安杰:《战国宜阳故城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8 年第 3 期。
②蔡运章:《韩都宜阳故城及其相关问题》,(亚洲文明暨中国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③梁晓景:《韩国都城迁徙考辨》,《文物》1992 年第 11 期。
[14]孙新民等:《禹县发掘一处古代墓地》,《中国文物报》1988 年 7 月 1 日。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16]①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1957 年河南陕县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 年第 11 期。
②王世民:《陕县后川 2040 号墓的年代问题》,《考古》1959 年第 5 期。
[1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1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岗杜附近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0 期。
[19]孙新民:《新乡丁固城古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年)》,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20]河南省文物局:《汤阴发现战国阵亡军士墓》,《河南日报》1982 年 6 月 16 日。
[21][22]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 年。
[23]蔡运章等:《洛阳附近出土的两批东周货币》,《中原文物》1981 年第 3 期。
[24]赵新来:《河南新郑城关出土的战国布币》,《考古学集刊》(3)1983 年。
[25]赵新来等:《郑州市郊沟赵乡出土一批战国布币》,《中原文物》1985 年第 2 期。

(原载《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 年)

其他篇

从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国王陵看汉梁文化

商丘地区为豫东门户，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地处黄河中游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海岱文化区、长江下游宁镇文化区之间，自遥远的古代起，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曾发现有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先商文化的遗存，可谓历史悠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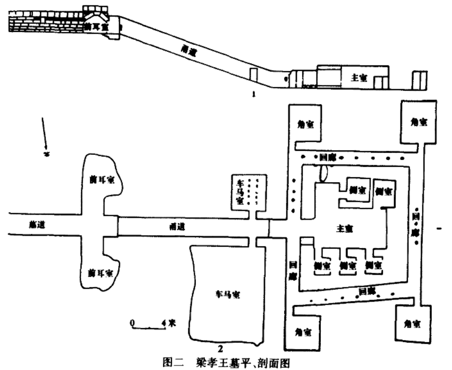
图一　永城芒砀山西汉梁国王陵分布图

文物荟萃。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创造了高度的古代文明，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据1984年文物普查资料，商丘地区八县一市，共发现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石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等不可移动的文物点1000多处，其中入选到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就有802处[1]。尤以商丘、永城、柘城更为丰富。而商丘还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商汤发轫之地，周为宋都，汉为梁国都城，现有明归德府旧城，城墙、城门和棋盘式街道保存较好，阏伯台、壮悔堂、梁园遗址尚存。

在这一系列丰富的遗迹遗物中，最为突出的是永城芒砀山梁国墓地，代表了商丘历史的辉煌[2]。在永城芒砀山周围2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除了主峰芒砀山和其北的磨山外，其余各山头上均发现有大型陵墓，共有8处14座。大致可分为保安山陵区、僖山陵区和夫子山陵区。（图一）陵墓形制为大型双墓道多室崖洞墓、大型单墓道多室崖洞墓或大型单墓道竖穴石室墓。墓顶均有巨大封土，墓室结构复杂，规模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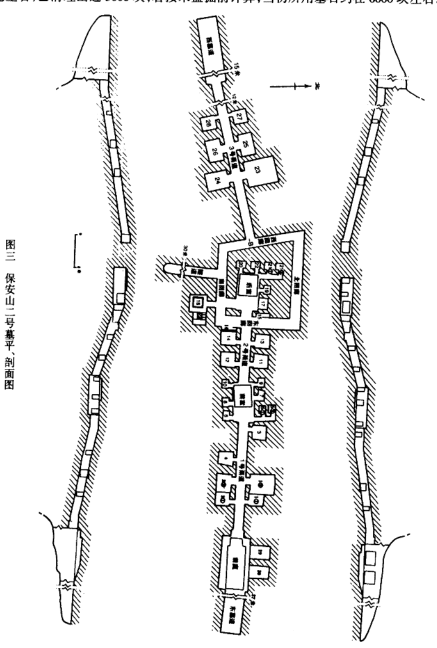
1978年以来，陆续在这里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先后清理了保安山1号墓、僖山墓、柿园墓、保安山2号墓等多座梁国王室陵墓。其中保安山1号墓即梁孝王墓，早就闻名于世，许多历史文献均有记载，“斩山为郭，穿石为藏”。该墓全长约90米，宽处30余米，高4米，由墓道、车马室、甬道、主室、回廊、排水设施等组成，墓内面积700平方米，容积为2800立方米。虽早被盗掘一空，但墓室结构复杂，气势恢宏，令人惊叹！（图二）



图二 梁孝王墓平、剖面图

其北200米有保安山2号墓，由出土“梁后园”铜印等文物推断，墓主应是梁孝王配偶李后。也是一座开凿在山岩之中的大型崖洞墓，由2个墓道、3个甬道、前庭、前室、后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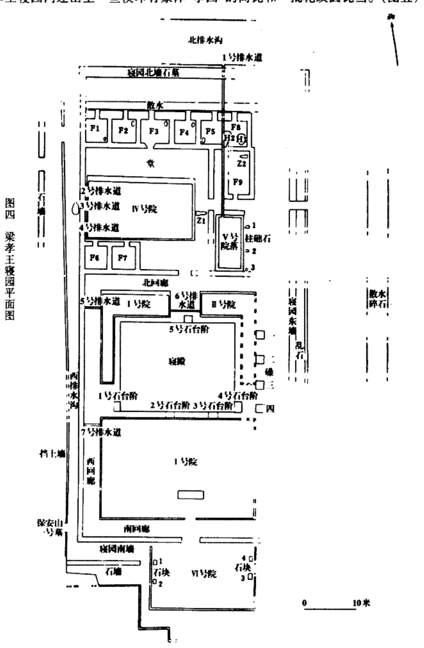
34 个侧室，以及回廊、隧道、排水设施、灯龛等组成。东西全长 210.5 米，南北最宽处(北回廊至隧道南端)72.6 米，墓内最高处 4.4 米，最大高差(东墓门口至隧道南端)约 17 米，总面积约 1600 多平方米，容积达 6500 余立方米。(图三)这是目前发现西汉诸侯国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陵墓，其规模远远超过梁孝王墓和河北满城的中山王墓、山东曲阜的鲁王墓、江苏徐州的楚王墓。其墓道、甬道、前庭及各侧室门道，均用巨型塞石封堵，每块石重 1 吨左右，已清理出近 3000 块，若按未盗掘前计算，当初所用塞石约在 6000 块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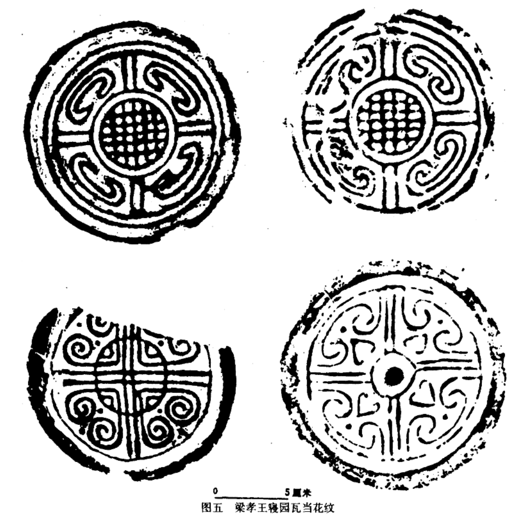
图三 保安山二号墓平、剖面图

用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与此同时，保安山还发现陵园遗址，南北长 900 米，东西宽 750 米，四周有夯土墙环绕。陵园内有梁孝王墓、李后墓和许多陪葬墓。此外，陵园内还发现有梁孝王墓的寝园遗址，位于梁孝墓东侧，为长方形，南北长 110 米，东西宽 60 米。包括围墙、寝殿、堂、室、回廊、院落、石台阶、排水道等，完全体现了前朝后寝制度，而后寝部分又可分为前堂后室。(图四)梁孝王寝园内还出土一些模印有篆体“孝园”的筒瓦和一批花纹圆瓦当。(图五)



图四 梁孝王寝园平面图



0 5厘米

图五 梁孝王寝园瓦当花纹

西汉自景帝开始，在帝陵、后陵都筑有陵园，这应是宫城的缩影。西汉早期的寝园就在陵园内，位于陵墓的附近，应属于陵墓的主要礼制建筑，又称为“陵寝”。寝园主要用于祭祀，亦即所谓侍奉墓主灵魂日常起居的处所。西安西汉汉宣帝刘询的杜陵，就发掘出保存较好的陵园遗址。而永城芒砀山梁孝王寝园，虽比不上西安诸帝陵，但在诸侯国王陵中的寝园，却是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

在保安山2号墓即李后墓的塞石上，发现多达1万多个的刻字。加上其他陵墓内发现的刻字，不可胜数。其中有塞石的序号刻字，有塞石尺度刻字，有干支记时刻字，有崖工名字刻字，有宫室方位刻字（图六），有施工次序刻字，有墓葬部位的尺度刻字，还有其它刻字和标点符号。墓内一些地方还有朱书文字，有干支记时，有墓葬部分尺度（图七），还有一些写在塞石上的序号。

塞石上刻有“东宫”、“西宫”，可能是指墓葬主体建筑的前室和后室。“旁”字其意可能指房，即墓内的侧室。还有“𠃜”字，为半个繁体门字，即门字的缩写，意为宽的门。又有

"户"字,则为窄的门。有"东车"、"西车"意指车马室。塞石上刻有表示长度的字为"长"、"袤"、"广"、"厚"、"高",表示面积单位的字有"方",尺度单位有"丈"、"尺"、"寸"。通过塞石上刻写有记录塞石尺度的文字,应该能推算出汉尺的长度。刻在塞石上或书写在墓壁上有一些用序数纪月的文字如"正月"、"七月"等,用干支纪日的文字如"甲辰"、"癸卯"、"癸亥"、"丙寅"、"戊子"等,有纪月和纪日的文字如"四月丙辰"、"十二月丙寅"等,有的将月字省略如"二乙丑"、"四庚子"、"六辛巳"、"七甲戌"、九丙寅"等,这种纪时方法为汉代历法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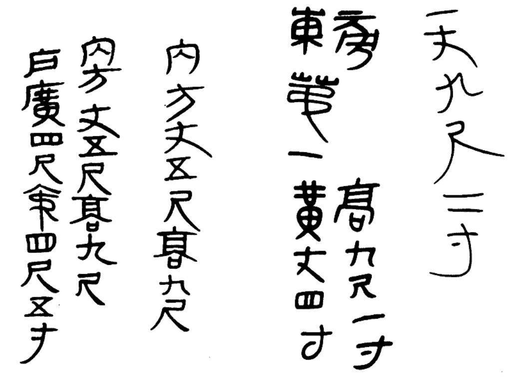
图六　保安山二号墓塞石上宫室方位刻字

从书法艺术上讲,刻字有的端正大方,有的凝重浑朴,有的字大盈尺,显得粗犷豪放。而朱书文字由于是书写的,要比塞石刻字更为规整流畅。汉代文字流传至今的有汉简等书写文字,有汉碑、汉石经等石刻文字,有洛阳出的汉代刑徒砖铭。而永城西汉梁国陵墓的塞石刻文,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数量很多,也是西汉石刻文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塞石刻文和朱书文字,除对建筑考古学、历法、尺度等历史方面研究不可缺少之外,对古代书法艺术和古文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柿园墓可能为梁国中期的国君墓,规模虽小于保安山的两座墓,仍有 2500 多块塞石,墓道有陶俑、车马饰等大量文物出土,墓门西侧出土铜钱 200 多万枚,重达 5 吨多。

主室墓顶和两侧石壁有大面积的龙、虎、朱雀、云气等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整个画面栩栩如生，实为罕见的瑰宝![3]

发掘的僖山墓规模更小一些，当为西汉末期梁国的一位国君之墓，国势已经大衰。但出土的一大批精美玉器和可复原的金镂玉衣，堪称弥足珍贵[4]。



图七 保安山二号墓朱书文字

结合历史文献可知，梁国是西汉众多刘姓侯国中实力很强、疆域很大的一个。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和窦太后之子，汉景帝的兄弟。“梁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四十余城，皆为大县。”“多作兵器弩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国在镇压“吴楚七国之乱”中，起了重要作用。从陵墓的建造和随葬品的出土，可以看出梁国的冶铁技术、青铜铸造技术是多么先进，经济实力是多么富有，军事实力是多么强大、文化素养是多么高深。展示了这里是西汉时期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西汉的梁国是汉文化向东、向东南传播的桥头堡。梁国所反映的汉梁文化，也正是博大精深汉文化的优秀代表。

注 释

[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 年。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3]阎道衡:《永城芒山柿园发现梁国国王壁画墓》，《中原文物》1990 年第 1 期。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1992 年第 3 期。

（原载《河南文物考古论集》(二)，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河南汉代画像石的分布与区域类型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它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又在春秋战国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河南在两汉时期，尤其在东汉，洛阳为繁华帝都，南阳是皇胄发迹之所，在经济文化上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遗存下来文物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墓葬内建筑构件的画像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以其“深沉雄大”的艺术成就而誉满中外。

建国以来，在河南林县正阳集、鹤壁鹿楼、温县招贤、新安孤灯村、巩县铁生沟、汝州夏店、郑州古荥、西平酒店和冶炉城、确山打铁冢、鲁山望城岗、煤渣岗和西马楼、方城赵河、南阳瓦房庄、桐柏张畈等许多地方，发现有汉代冶铁遗址[1]。其中有几处大型冶铁遗址，从其冶炼规模和铸造技术上看，都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这促进了汉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与繁荣，为汉代画像石的产生打下了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汉代“谓死如生”，提倡孝道，崇尚厚葬，为汉代画像石的产生在思想上准备了条件。先秦时期绘画、圆雕和碑刻艺术的发展，以及汉代壁画、帛画、漆画、陶画和画像砖的流行，为汉代画像石的产生创造了艺术渊源。

据不完全统计，在河南南阳、唐河、邓州、襄城、禹州、密县、永城、夏邑、浚县等46个县、市，均有汉代画像石出土(图一)，总计约有二千余块。它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显示了我们祖先非凡的聪明才智，凝聚着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思想和艺术的重要资料。从其分布和区域类型看，大致可分为豫南地区、豫中地区、豫东地区、豫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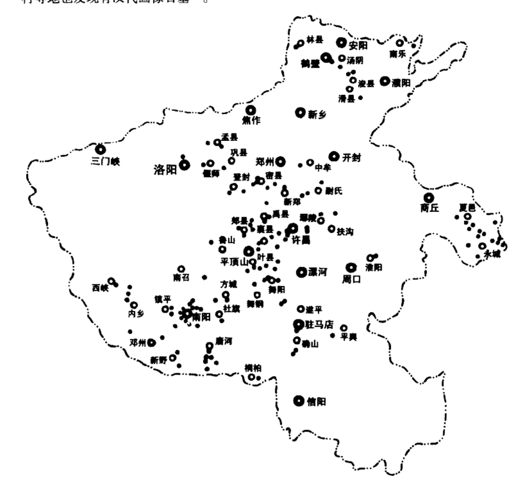
一

豫南地区汉代画像石分布地域较广，以南阳为中心，北到郏县、襄城一带，南到鄂北，东抵京广线，西至西峡，大致是汉代南阳郡及其边缘附近。在这个区域内主要发现有：

南阳市的赵寨、北关、麒麟岗、崔庄和七里园村等地，都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在市区西关，环城乡的袁庄、下关帝庙村和冉营，七里园乡的沙岗店村、枣园和八里屯，靳岗乡的靳岗、崔庄和石膏坑村，卧龙岗乡的刘洼等地，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或采集有汉代画像石[2]；在李相公庄、独山、王庄和市建材实验厂等地发掘的三国魏、晋墓葬中也出有汉代画像石。

南阳县石桥、英庄、军帐营、王寨、杨官寺等地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在蒲山乡的周圪垱，汉冢乡的汉冢村，溧河乡的十里铺等地，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建国前在南阳县草店

村等地也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3]。



图一　河南汉代画像石出土地点分布图

唐河县针织厂、电厂、湖阳镇、新店、石灰窑村等地，发掘有汉代画像墓；在县电业局和东关外，湖阳镇的翟庄，上屯乡的冢章，昝岗乡的二宅，马振抚乡的冢子坡等地，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

邓州市的长冢店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市东北白牛乡的白西村和孔湾村等地，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

新野县的前高庙村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在前高庙乡的前张楼、樊集等地，均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

方城县城关镇和东关外，以及县西南赵河乡的党庄等地，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

镇平县柳泉铺乡的青山村，遮山乡的王庄等地，发现有汉画像石墓。

内乡县赵店乡的郦城村、曹清营、双营村和大谢岗村，赤眉乡的赤眉和郜家冷地，均采

集有汉画像石。

南召县的云阳镇，以及社旗县、西峡县、桐柏县等地，也采集有少量汉画像石。

叶县坟台乡的杨村，夏李乡三皇冢和刘庵，水寨乡蒋庄和桃奉宋，城关乡胡村，遵化乡黄柏山，辛店乡朱沟等地，分别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或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襄县茨沟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湛北乡的七里店、姜店、老马洞和后聂，孙祠堂乡的张道、谢庄、尖山、张村、潘庄、陈庄、黄柳和大庙李，以及颖桥镇的新杨庄等地，均采集有汉代画像石[4]。

郏县南关，王集乡的四里营，白庙乡的榆园，渣园乡的小卢寨、郝庙和十里铺，安良乡的后王和任庄等地，发现有汉代画像墓或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鲁山县董周乡的朱郎庄，舞阳县侯集乡大岗，保和乡的马岗，文峰乡的王常岗，马村乡的前姚庄，辛安乡的潘园等地，均采集有汉代画像石[5]。此外，舞钢市杨庄乡的王老庄，遂平县的槐树乡霍庄村和楼村，驻马店市的香山乡，确山县的任店乡巩庄和汉代朗陵故城一带，以及京广线以东的平舆县老王乡等地，也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上述诸多发现中，包括一批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的画像石墓，其中有一些颇具典型性。

1.西汉中期画像石墓

南阳赵寨汉墓　位于南阳市东郊潍儿河西岸砖瓦厂内，1976 年 2 月发掘。为砖石混筑结构，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墓道、前室、二主室和南北侧室。二主室前有两道门并列，主室之间无隔墙。墓门为并排四门，由三根石中柱、二根石侧柱和八扇门扉组合，墓内的 13 幅画像都集中在这些门柱和门扉上。门柱上均镌刻三重檐门阙和菱形图案，门扉上刻三重檐楼阁图案，楼顶有朱雀，楼正门柱间有铺首衔环，楼基下为四方连续菱形连环图案。其表现手法为横竖纹衬地的凹面阴线刻。这是目前南阳地区所发现最早的汉代画像石墓之一[6]。

唐河石灰窑汉墓　位于唐河县南 26 公里黑龙镇的石灰窑村，1980 年 5 月发掘。为石砌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有墓道和两主室。两道墓门并列，东门较规则，西门仅用两块石板封堵。两主室间有一道石墙相隔，顶部用石板平盖。墓内 6 幅画像，均刻于东侧墓门，门楣上刻菱形套环图案，门柱正面刻三角形图案，侧面刻执棨门吏，门扉上部刻厅堂建筑，下部刻铺首衔环（图二）。镌刻技法亦为凹面阴线刻[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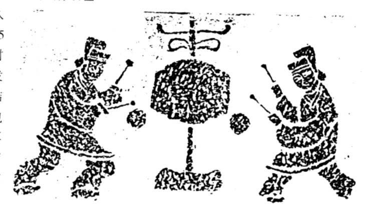


图二　唐河石灰窑汉墓厅堂建筑铺首衔环图

此外，唐河湖阳镇的画像石墓，平面近似长方形，并列有三个主室。画像均在门楣、门柱和门扉上，内容非常简单。门楣上刻连弧纹，门柱和门扉为菱形纹。用斜纹衬底浅浮雕和不同方向的剔纹的镌刻手法，亦属西汉中期[8]。

2.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画像石墓

唐河新店冯孺久墓　位于唐河县南35公里湖阳镇的新店村西，1978年3月发掘。为砖石混作结构，平面为回字形，包括墓道、甬道、南北耳室、前室、两主室、南北侧室和后室。侧室和后室可通，组成回廊。从墓内门楣或门柱的题记看，把耳室称之为“车库”，侧室和后室称为“藏阁”，前室大门称为“中大门”。墓内画像35幅，刻在墓门上、主室和侧室门上及壁间。内容有二龙交尾、二龙穿璧、白虎铺首衔环、朱雀铺首衔环、羽人、执盾门吏、执笏门吏、执戟对拜、戏虎骑象、人面虎、兽斗、应龙、游鱼、鼓舞（图三）、蹶张、百戏、门阙厅堂。画像大多为素地浅浮雕，还有少量阴线刻。二主室中柱上刻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桼日癸巳葬千岁不发”27字题铭。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为新莽年号，这是有确切纪年和墓主人身份名字的一座画像石墓，对南阳汉画像石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标尺[9]。



图三　唐河冯孺久墓鼓舞图

唐河针织厂1号墓　位于唐河县南关外针织厂院内，1972年6月发掘。为纯石结构，平面呈回字形，包括墓道、前室、两主室、南北侧室和后室。其侧室和后室相连，组成回廊。全墓的墓底、墓壁、门扉、墓顶以及封门和顶门柱共用石料130块。画像计74幅，刻在门楣、门扉、门柱、部分墓壁和墓顶石上。内容有神话传说，如伏羲女娲、河伯、四灵等；历史



图四　唐河针织厂1号汉墓范雎受袍图

故事如二桃杀三士、聂政自屠、范睢受袍(图四)、晏子见齐景公、荆柯刺秦王等;人物生活如车骑出行、门吏、田猎、舞乐、六博、楼阁门阙等;瑞禽神兽如羽人、龙虎、铺首衔环、月中蟾蜍,以及星象和各种几何图案等。表现手法多为素地浅浮雕[10]。

同时类似的平面为回字形的画像石墓还有南阳杨官寺汉墓和唐河电厂汉墓[11]。

3.东汉早期画像石墓

南阳英庄汉墓　位于南阳市东北新店乡英庄村,这里发掘出一批汉代画像石墓。其中 1982 年发掘的一座为砖石混筑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包括墓道、前室和两主室。画像共有 53 幅,镌刻在门扉、门楣、门柱、室内立柱和横梁上。内容有二桃杀三士等历史故事,伏羲女娲、羲和捧日、常羲捧月、升仙等神话传说,还有铺首衔环、应龙、侍女、武士、武库、渔猎、庖厨、斗鸡、牵牛以及天象图等。表现手法为平面浅浮雕[12]。

石桥汉墓　位于南阳县北石桥镇南 0.5 公里处的台地上,1972 年 3 月发掘。为砖石混作结构,平面为 T 字形。包括墓道、前室、南北耳室、两主室。画像均刻在门楣、门扉和门柱上。内容有执戟门吏、执棒门吏、执笏门吏、执钺门吏、拥彗门吏、捧奁侍女、鼓舞、蹶张、逐疫辟邪(图五)、青龙追麒麟、飞廉逐苍龙、应龙、白虎铺首衔环、菱形图案等。镌刻技法为剔地浅浮雕[13]。



图五　南阳石桥汉墓逐疫辟邪图

同期的画像石墓还有平面近似"回"字形的唐河针织厂 2 号墓、南阳七里园汉墓,平面为"T"字形的南阳军帐营汉墓、王寨汉墓、英庄北地汉墓,平面近长方形的方城城关镇汉墓等[14]。

4.东汉中期画像石墓

邓州长冢店汉墓　位于邓州市西文渠乡长冢店村北,1973 年 5 月发掘。该墓为砖石混合结构,平面为"品"字形。有墓道、前室、南北四侧室、二主室。73 幅画像集中在门扉、



图六　邓州长冢店汉墓舞乐百戏图

门楣、门柱、立柱和横梁上。内容有白虎铺首衔环、朱雀铺首衔环、执笏门吏、拥彗门吏、羁马拜谒、执扇奴仆、捧案奴仆、捧烛侍女、捧奁侍女、骑射田猎、舞乐百戏(图六)、逐疫辟邪、龙人和重明鸟、伏羲和女娲、熊斗二兕、二兕角牴等。表现技法为凿地浅浮雕[15]。

方城东关汉墓　位于方城县东关,1977年10月发掘。砖石混筑墓室,平面为"回"字形。有墓道、二前室、二主室、二侧室和二后室。二侧室与后室相通,组成回廊,墓前有并列两道墓门。13幅画像集中于门楣、门扉、门柱和室内横梁上。内容有阙楼建筑、朱雀铺首衔环、执戟门吏、建鼓舞、踏鞠戏(图七)、朱雀、神豹、白虎、龙虎斗、二龙穿璧等。镌刻技法为减地浅浮雕,画像细部施阴线,较工整细腻[16]。



图七　方城东关汉墓踏鞠戏图

5.东汉晚期画像石墓

襄城县茨沟汉墓　位于襄城县东9公里茨沟村的东北地,1963年发掘。为砖石混作多室墓,以砖砌为主,门楣、门柱用石料。有墓道、甬道、三前室、中室、耳室、二后室。共有5幅画像,前中室门楣刻二龙交璧,左前室门楣刻有龙、虎和熊,中室门楣正面刻二龙相交其下有一鱼,背面刻人、龙、象、鹿、虎,后室藻井盖石上刻蟾蜍。镌刻技法为剔地浅浮雕。墓内中室北壁有朱书"永建七年正月十四日造砖工张伯和□石工褚置"20字的纪年铭。永建七年为公元132年,属东汉晚期无疑。铭中还提到砖工石工等工匠的姓名,这在汉墓内也是罕见的[17]。

南阳中原机械学校汉墓　位于南阳市北关中原机械学校院内,石砌多室墓,仅以小砖铺地。包括墓道、甬道、前室、南北耳室、中室、南二侧室、后室,其上为条石叠涩封顶。共有10幅画像。墓门立柱刻执彗门吏、执盾门吏(图八),前室盖顶石刻鼓舞,中室门楣刻菱形穿环图案,二侧室过梁刻逐疫辟邪和乐舞百戏。镌刻技法为横纹浅浮雕[18]。

新野前高庙村汉墓　位于新野县东15公里前高庙村,1983年5月发掘。为砖石混作多室墓,平面呈十字形。包括墓道、前室、中室、东侧室、西侧室、后室。画像少而简单,仅在墓门门扉刻有白虎铺首衔环,墓门和墓室门的门楣上刻二龙穿璧、二龙交尾等画像。表现手法为剔地浅浮雕[19]。

方城党庄汉墓　位于方城县西南赵河乡党庄村西地,1984年4月发掘。为砖石混筑结构,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墓道、甬道、前室和两主室。墓门已无石门扉,由封门砖代替。画像集中在墓门和二主室的门楣、门柱、主室隔墙的立柱和横梁上。内容仅有二方连续菱形穿环图案(图九)。雕刻技法为剔地浅浮雕。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看,属于东汉末期墓葬,为目前南阳地区所发现汉代画像石墓中最晚的一座[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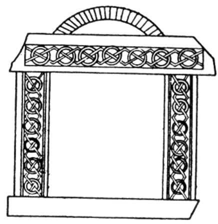
此外,南阳李相公庄发掘一座三国时期墓葬,墓顶利用了3块汉代画像石,一为铺首

衔环，一为执笏门吏，还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志石上刻舞乐百戏和136字的墓志铭文，其中有“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的纪年[21]。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亦属东汉晚期。这不但为汉代画像石断代又找到依据，而且也是我国最早的墓志铭之一。是继山东峄县出土东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杜临为父通作封记”，河南洛阳出土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22]等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




图八 南阳中原机械学校汉墓执彗门吏、执盾门吏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豫南地区汉代画像石的大致轮廓。西汉中期的画像石墓平面为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画像镌刻技法以凹面阴线刻为主，内容多为门阙楼阁建筑、铺首衔环、以及菱形纹、连弧纹等几何图案。图像简单，线条粗犷。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汉代画像石墓从长方形增加侧室和后室变成正方的回字形，大量使用石料或纯石结构。画像镌刻手法多为素地浅浮雕，也有少量凹面阴线刻。画像部位从墓门扩展到墓室的壁间，内容大量增加，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人物、乐舞、珍禽瑞兽等。东汉早期除长方形、回字形墓葬外，又增加平面为“T”字形的墓葬。画像镌刻技法有平面浅浮雕和剔地浅浮雕。画像题材除少量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之外，更多的是仙禽神兽、祥瑞辟邪、羽化升仙、舞乐百戏、各种门吏、奴婢及铺首衔环等。画像雕刻精美，形象生动传神，为本地区画像石上乘佳作。东汉中期又出现品字形墓，画像技法以减地浅浮雕为主，画像内容与东汉早期近似，只是数量有所减少。东汉晚期出现十字形墓，减地浅浮雕成为唯一技法，画像数量急剧减少，内容简单，变得更加格式化，已进入没落时期。从一些三国魏晋时期墓葬内往往有拆除汉墓中的画像石重新



图九 方城党庄汉墓二方连续菱形穿环图案

加以利用的情况看[23]，说明在东汉末年之后已经不再新建画像石墓了。

总之，豫南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分布范围较广。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年，延续时间很长，题材繁多，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疏朗明快，但求神似，不拘细微，深沉雄大，古朴浑厚，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在河南，而且在全国也是一个重要的、独立类型的汉画像石区。

二

豫中地区汉画像石分布范围，包括郑州市所辖的密县、新郑县、登封县，巩县和中牟县，许昌市所辖的许昌县、禹州市、鄢陵县，开封市的尉氏县，还有周口地区的扶沟县、淮阳县，以及洛阳市郊、偃师县和焦作市的孟县一带。其南界与豫南汉画像石区相连，在这个区域内主要发现有：

密县打虎亭和后士郭发掘一批汉代画像石墓。在密县城关、刘寨、来集等地，采集有汉画像石。

新郑县城关乡的金须和村，新村乡的小刘庄等地，登封县的告成镇和大金店乡的游方头村等地，中牟县白沙乡的后潘庄，均采集有汉画像石。

巩县西南芝田乡的稍柴村，出土有汉代画像石，刻有人物、车马、朱雀、门阙、乐舞等[24]，属东汉中期的作品。

尉氏县的大马乡大马村，庄头乡鸡王村，岗李乡刘庄等地，发现有镌刻铺首衔环、青龙、白虎或朱雀的汉代石墓门。

许昌市郊区七里店乡的七里店村和庞庄，半截河乡的尚冢村，高桥营乡的俎庄等地，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许昌县东五女店乡的五女店村，陈曹乡的齐女村，尚集乡的岗王，榆林乡的石庄，蒋李集乡的刘庄，长村张乡的凹孙和营孙，椹涧乡的沟张等地，均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禹州市梁北乡的东十里村，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古城乡古城村和徐庄，城关东郊的崔庄和老连庄，神垕镇的野猫洞村等地，均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

鄢陵县北 12 公里彭店乡的新庄，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

扶沟县北 16 公里白潭乡的东尹家村，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

淮阳县也曾收集到 2 块刻有画像的汉代石门楣，为浅浮雕兼施阴线，其一刻有二虎，其二刻有一虎一麒麟和一人[25]。

洛阳市郊烧沟发掘出刻有铺首衔环石墓门的西汉晚期墓，涧河西岸发掘出东汉早期汉代画像石墓。

偃师城关后杜楼，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孟县城东南庄乡的下口村，城西槐树乡的孙村等地，均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上述发现中，时代各异，有一些具有代表性：

1. 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画像石墓

洛阳烧沟58号墓 位于洛阳市西北1.5公里烧沟村西,1952年11月发掘。为砖石混作构结,有墓道、主室和耳室,仅墓门为石料。墓门的门扉上刻有铺首衔环,镌刻技法为平面阴线刻,与南阳画像石技法相近。属于烧沟汉墓分期的第三期(前期),即西汉晚期[26]。

2.东汉早期画像石墓

洛阳30·14号墓 位于洛阳市西郊涧河西岸,1953年5月发掘。为砖石混作结构的多室墓。画像集中在墓内的两重石门上。第一道石门门额刻一龙一鱼,门扉上刻朱雀铺首衔环;第二道石门门额正面刻三鱼,背面刻交尾龙,门扉正面刻朱雀、白虎铺首衔环,背面刻有门吏。雕刻技法为凿地浅浮雕,笔画粗疏,与南阳汉画像石风格相同[27]。



图一〇 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庖厨图

3.东汉晚期画像石墓

密县打虎亭汉墓 位于密县城西约6公里的牛店乡打虎亭村,1960年2月~1961年11月发掘了两座。东西并列,间距30米,为砖石混筑的大型多室墓,形制和结构基本相同。1号墓南北长26.46米,东西宽20.68米,券顶高6.32米。2号墓规模稍小。两墓均有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耳室、东耳室和北耳室。1号墓有画像近60幅,门额上刻有鹿,门扉上有铺首衔环,其周围饰以龙、飞廉、朱雀、神龟、大螺、蟾蜍、玉兔、麒麟等瑞禽神兽和变形云纹,墓顶藻井刻有莲花、云气和菱形图案,甬道和前室壁上有属吏拜谒、迎客送宾,南耳室是车马牛羊和收租图,东耳室是庖厨图(图一〇),北耳室刻宴饮、家居图。2号墓门额、门扉和墓顶上镌刻的35幅画像与1号墓同部位的画像内容相同,甬道和墓室内却绘以精美的彩色壁画。镌刻技法少量用高浮雕和浅浮雕,更多是减地阴线刻,线条纤细,组成大幅画面,别具一格[28]。

密县后士郭汉墓 位于密县城西北3.5公里的后士郭村西地,1963年7月~1964年2月发掘有两座。亦为砖石混作的大型多室墓,形制大小相同。包括墓道、甬道、中室、后室以及西、南、东、北四耳室。两墓除少量壁画外,均有17块画像石。多为一面刻画,也有

一些在两面或三面刻有画像，集中在门楣、门额、门扉以及墓室中柱和柱顶的栌斗。门楣上有浮雕的鹿，门扉上为浮雕的铺首衔环，其余为瑞禽神兽、四灵、神人及大量云气，犹如飘渺的仙境，给人以梦幻般的神秘感。镌刻技法为减地阴线刻，线如发丝（图一一）[29]。

禹州市东十里村汉墓　位于禹州市东南梁北乡东十里村东地，1984年3月发掘。砖石混合结构，平面呈近似长方的刀柄形。有甬道、前室、后室，甬道窄于墓室。墓门的门楣和门额上刻有2幅画像，其风格与密县汉画像石墓迥然不同。门楣画像中间为长青树，左侧有一鹿一龙，右侧有一鹿一虎，皆昂首翘尾，作内向行走状，其上刻垂幛作天，其下刻山形作地，门额画像中间为相向的两虎，两边又同向横刻较小的一龙一虎。上下边部装饰与门楣同。表现手法均属减地浅浮雕，与南阳汉画像石作风相近[30]。



图一一　密县后士郭汉墓栌斗画像

总之，在豫中地区从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发现的画像石墓较少，有的只采集到一些零星画像石；到了东汉晚期则发现一批大型多室墓。就画像石本身来说，其技法和题材内容均与南阳画像石相近。但东汉晚期的密县打虎亭汉墓，其画像线条纤细，场面巨大，追求真实，生活气息很浓，这与山东沂南汉墓的画像相似[31]；而密县打虎亭汉墓及后士郭汉墓内一些瑞禽神兽、仙人并间以繁缛绵密云纹的装饰画面，又与陕西绥德一些汉画像石相近[32]。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豫中地区的汉代画像石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一直受到南阳汉画像石的影响，而在东汉晚期又同时吸收了山东、陕北画像石的一些因素，结合本地的条件，发展成为一种地区类型。

三

豫东地区汉代画像石分布范围较小，仅包括商丘地区的永城、夏邑和商丘一带。在这个区域内主要发现有：

永城县陈官庄乡堌上村，太丘乡的太丘村，芒山镇的僖山南麓，酂城乡的酂城集，蒋口乡的堌堆集等地，均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在芒山镇的前窑、陶山和柿园，蒋口乡的后刘岗，新桥乡的新桥和张寨，高庄乡的梁庄，演集乡的汤梁庄，顺河乡的赵柳园，苗桥乡的黄药店，茴村乡的张庄，侯岭乡的十八里村，以及酂阳乡和陈集乡等地，均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或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夏邑县吴庄发掘有汉代画像石椁墓;岐河乡的朱三楼,郭店乡的杨楼村,胡桥乡的蔡楼等地,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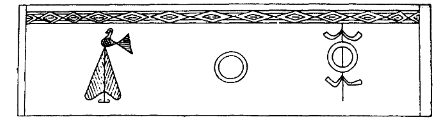
商丘市西郊黑刘庄乡的君台村,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

上述考古发现中,有一些汉代画像石墓是比较重要的:

1.西汉晚期画像石墓

永城堌堆集汉墓　位于永城西北12公里蒋口乡堌堆集村,1981年发现清理。为纯石结构长方形单室墓,无墓道,在长方形土圹内筑成石椁,墓壁砌筑较直,门顶用石条平盖。发现画像3幅,分别刻在两扇门扉和后壁上。门扉刻铺首衔环,后壁刻十字穿环图案。雕刻技法为阴线刻,线条粗壮,石面粗糙,具有汉代画像石的原始形态[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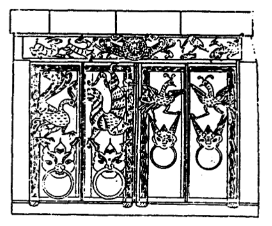
夏邑吴庄汉墓　位于夏邑县东桑堌乡吴庄村东侧,1988年4月发掘,为一处墓群。无墓道,在长方形土圹内筑成石椁,类似永城堌堆集长方形单室墓。仅在墓椁石板上镌刻有鸟、长青树、饰绶带璧(图一二)等简单图案,上部或两侧刻有连续菱形图案装饰[34]。



图一二　夏邑吴庄汉墓璧、鸟、长青树图

2.东汉早期画像石墓

永城堌上村汉墓　位于永城东北陈官庄乡堌上村西地,1961年春发掘。共2座,均为纯石结构墓室,并有砖砌墓道。1号墓有前室和二主室,上为平顶;2号墓有前室和主室,上为盝顶。两墓共有29幅画像,集中在门楣、门扉、门柱和室内横梁与顶盖上。内容有带剑门吏、执笏门吏、伯乐相马、朱雀铺首衔环、白虎铺首衔环(图一三)、三足乌、蟾蜍、玉兔捣药、双凤穿璧、飞廉、苍龙等。部分画像有水波纹或连弧垂幛纹作边饰。表现手法为剔地浅浮雕,刻工较细。平顶的1号墓稍早于盝顶的2号墓,但均属东汉早期偏晚阶段[35]。



图一三　永城堌上村汉墓铺首衔环图

3.东汉中期画像石墓

永城太丘汉墓　位于永城县北的太丘乡中学院内,1979年4月和1987年9月,先后清理了相邻的两座纯石结构多室墓。1号墓有墓道、前室、二中室、二耳室、二后室;2号墓有墓道、前室、中室、南侧室、后室。均盝顶。1号墓有16

幅画像,2号墓有6幅画像,均集中在门楣和墓室过梁上。内容有二龙穿璧、车骑出行、舞乐百戏、狩猎、神兽、龙虎、凤鸟、河伯等,画像上方施连弧垂幛纹和水波纹,镌刻技法采用剔地浅浮雕,属东汉中期偏早阶段[36]。

永城僖山汉墓　位于永城东北33公里芒山镇的僖山南麓,1978年发掘。为纯石结构多室墓,有墓道、前室、耳室、主室、二侧室,上砌盝顶。画像集中在门楣、门扉和室内过梁上。门楣刻二龙穿璧,门扉为朱雀铺首衔环,室内过梁刻车骑出行、狩猎、神兽,过梁画像石上方施连弧垂幛纹和水波纹,下方施连续十字穿环。镌刻技法为剔地浅浮雕。属东汉中期偏早阶段[37]。

4.东汉晚期画像石墓

酂城集汉墓　位于永城西南25公里酂城集,1973年发掘。砖石结构大型多室墓,四墓合茔,长15.32米,宽7米,共有前室、后室、耳室、侧室等二十九个墓室。48幅画像镌刻在墓门、主柱和横梁上。内容比较单纯,有少量的朱雀铺首衔环、瑞禽神兽,大部分为装饰性图案。属东汉晚期偏早阶段[38]。

综上所述,豫东地区汉代画像石,题材内容上比豫南地区和豫中地区简单,以祥瑞辟邪为主,也有少量的阴线刻。既不象南阳汉画像石那样粗放古拙,也不同于密县打虎亭、后士郭汉画像石那样纤细复杂,而具有朴实庄重、构图严谨、形神兼备、生动活泼的特点。其雕刻技法和画像内容虽曾受到南阳汉画像石和山东、苏北汉画像石的影响,但有自己的发展脉胳和地域特征,属一个独立的地方类型。

四

豫北地区汉代画像石分布范围,包括鹤壁市及其所辖的浚县,安阳市所辖的林县、汤阴、滑县以及濮阳市所辖的南乐等地。在这个区域内发现汉代画像石的数量远比上述河南其它三个地区为少。仅在浚县的姚厂和郑厂发掘有汉代画像石墓;在鹤壁市东石林乡的时丰村,浚县王庄乡新寨,林县城关乡桥西村,汤阴宜沟镇的前李朱,滑县留固乡双营村,南乐千口乡武家村等地,发现有汉代画像石墓或采集有汉代画像石。

上述发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浚县姚厂和郑厂汉代画像石墓。位于浚县城北16公里屯子乡的姚厂村和郑厂村,1973年4月发掘。两墓相距不远,均为砖石混合砌筑的多室墓。各有6幅画像,刻在门楣、门扉以及门柱正面、背面和侧面。内容有朱雀铺首衔环、四灵、交龙穿璧、双鲤、鹳鸟衔鱼、奔兔、凤鸟、立羊、麒麟等,有些画像边框也刻有类似永城汉画像石的连弧垂幛纹装饰图案。姚厂汉墓采用剔地浅浮雕,比较粗糙;郑厂汉墓则剔地浅浮雕和平面阴线刻两者兼用。姚厂汉墓立柱上有"惟汉永平兮,延熹三年十二月六日丙申上旬……"的纪年铭文和颂词。延熹三年即公元160年,属东汉晚期。郑厂汉墓亦当与此同时[39]。其他各县采集的汉代画像石也与之相类似。

由此看来,豫北地区的汉代画像石只见有东汉晚期的作品,时间延续不长。画像石题材内容简单,主要是珍禽瑞兽。镌刻技法以剔地浅浮雕为主,形象朴拙,可能受到豫东地

区汉画像石的影响。也有少量阴线刻,显得生动活泼。这里地处豫北,与其它汉代画像石地区相距较远,且还发掘有东汉延熹三年的纪年画像石墓,所以在汉代画像石研究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可以算作河南较小的一个区域类型。

综观河南这四个区域的汉代画像石,可谓各有特点,精彩纷呈。尤以豫南地区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对其它地区影响也最大。全省有4座弥足珍贵的纪年墓,为汉代画像石墓的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河南的汉代画像石,以其丰富的题材,精湛的艺术,向人们展示了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建筑造型、衣冠服饰、车骑田猎、音乐舞蹈、戏曲杂技、社会生活、镌刻和绘画艺术的面面观。

注 释

[1]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2]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散存的汉画像石选汇》,《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3]南阳汉代画像石编委会:《南阳汉代画像石》第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黄留春等:《河南襄县发现汉画像石》,《文物》1988年第5期。
[5]朱帜:《舞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河南文物志选稿》第九辑。
[6]南阳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7]南阳地区文物队:《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第5期。
[8]南阳地区文物队:《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9]南阳市博物馆等:《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久)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10]周到等:《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6期。
[11]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②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12]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年第3期。
[13]南阳博物馆:《河南南阳石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14]①南阳地区文物队等:《唐河县针织厂二号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南阳汉代石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
③南阳博物馆:《河南南阳军帐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④南阳博物馆:《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⑤南阳博物馆:《河南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⑥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方城县城关镇汉画像石墓》,《文物》1984年第3期。
[15]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16]南阳市博物馆等:《河南方城东关汉画像石墓》,《文物》1980年第3期。
[1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18]同[3]27页。
[19]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新野县前高庙村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20]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方城党庄汉画像石墓——兼谈南阳汉画像石墓的衰亡问题》,《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21]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第8期。
[22]徐自强等:《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第1页,中华书局1990年。
[23]①同[21]。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等:《河南南阳东关晋墓》,《考古》1963 年第 1 期。
③王儒林:《河南南阳西关一座古墓中的汉画像石》,《考古》1964 年第 9 期。
④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建材试验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 年第 3 期。
⑤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 年第 3 期。
⑥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独山西坡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 年第 3 期。
[24]傅永魁:《巩县出土的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中原文物》1983 年第 3 期。
[25]骆崇礼等:《(淮阳)汉画像石门楣》,《河南省文物志选稿》第九辑。
[26]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图十五:4、图版拾壹:1,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2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 30·14 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考参资料》1955 年第 10 期。
[28]安金槐等:《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 年第 10 期。
[2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第 2 期。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禹县东十里村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5 年第 3 期。
[31]南京博物院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 年。
[32]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墓》,《文物》1983 年第 5 期。
[33][38]周到:《试论河南永城汉画像石》,《中原文物》1987 年第 2 期。
[34]商丘地区文化局:《河南夏邑吴庄石椁墓》,《中原文物》1990 年第 1 期。
[35]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永城县堌上村汉画像石墓》,《河南文博通讯》1980 年第 1 期。
[36]①李俊山:《永城太丘一号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0 年第 1 期。
②永城县文管会等:《永城太丘二号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0 年第 1 期。
[37]李俊山:《永城僖山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0 年第 1 期。
[39]高同根:《简述浚县东汉画像石的雕像艺术》,《中原文物》1986 年第 1 期。

(原载《华夏考古》1991 年第 3 期)

河南宋墓综述

河南地处中原,北宋的首都和皇室陵墓均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宋代考古取得了很大收获。一是调查发掘了东京城址和一批包括临汝的汝窑、宝丰清凉寺汝官窑、豫北的鹤壁集窑、禹县的钧台窑、登封曲河窑以及鹤壁煤矿在内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二是调查发掘了邓县福胜寺塔、郑州开元寺塔、密县法海寺塔、新郑凤台寺塔的塔基地宫和许多宋代墓葬。墓葬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为考古发掘中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本文拟对此进行综合论述,以期展现河南宋代墓葬的面面观。

一、考古发现

宋代墓葬多分布在河南的中部、西部、北部和南部。其中经过发掘的主要有: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和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前者有精美的壁画和石刻,并出有玉谥册和玉哀册;后者出有两方长达一二千言的墓志。巩县稍柴、西村也发现有宋代雕砖彩绘壁画墓和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石棺墓。郑州南关外发现有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雕砖墓和长方竖穴土坑墓;郑州二里岗宋墓为圆角方形仿木建筑砖室墓,有雕砖和彩绘人物壁画。荥阳出土的宋墓有六角攒尖顶墓室和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朱三翁的石棺墓。密县五虎庙村发掘有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枢密副使冯京夫妇合葬墓[2],出有墓志4合和一批瓷器。登封箭沟村发掘一座彩色鲜艳的宋代壁画墓。禹县白沙发掘的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赵大翁墓,墓室壁画丰富多彩,并出有朱书买地砖券。禹县庙坡村宋墓为八角形穹窿顶仿木建筑砖室墓,有各种雕砖和壁画。洛阳涧西发掘的宋墓,墓室平面有圆形的、正方形的、八角形的,均有雕砖,并出有瓷器和钱币,这一地区的宋代土洞墓结构都比较简单。洛阳老城北出土的一座土洞墓,结构比较复杂,所用的28块封门砖,均有刻铭。另外,在洛阳郊区和龙门还发现有带壁龛的六角形仿木建筑砖室墓,不仅绘有彩色壁画,墓内还有精细的雕砖。洛阳七里河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石棺墓,其结构之复杂,在我省也是罕见的。新安李村发掘一批宋墓,其中有宣和八年(应为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宋四郎墓,墓室为八角形,墓内有雕砖和壁画,墓门额上的砖刻题记,记有墓主人的名字和埋葬年月、方位、以及砌墓工匠和墓内壁画作者的名字等,颇为难得。另外,新安高家湾村发现有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河中军节度使杨承信墓;在孟津张盘村发现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石棺墓;在伊川窑底村发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彰德军节度使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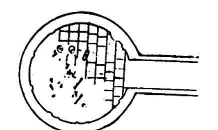
拱辰墓,并出土有墓志[3]。在偃师酒流沟宋墓中,出土有3块杂剧雕砖和3块侍女、庖厨、洗染雕砖。豫西一带的宜阳冯庄、嵩县北元村、三门峡市郊和陕县硖石驿都发现有宋代的砖室墓。新乡丁固城发掘的一批宋墓中,有六角形、圆角正方形、长方弧顶形砖券墓,以及长方竖穴土坑墓。温县前东南王村发掘的一座宋墓平面八角形,墓内雕砖精细,内容丰富,其中有杂剧人物图、散乐图、庖厨图[4]。安阳天僖镇发现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彩色壁画墓内有散乐图和墓主人生活图。林县杨家庄、董家村发现的仿木建筑宋墓内均有彩色壁画。并出有墓志和瓷盘。滑县万集村发现一大批宋代漏泽园墓葬。郏县茨芭村发掘有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承议郎眉山苏适(仲南)夫妇墓,为两门双室砖券室,出有2合墓志和铜印、瓷碗等[5]。上蔡西南郊发掘一座宋墓,为八角形仿木建筑结构,墓内有人物雕砖,并出有大观通宝和澄泥砚,砚底部刻"李伴叔"三字,约为墓主人的名字[6]。除此之外,在上蔡、遂平、南阳、南召均有宋墓发现。方城朱庄发掘一座圆角正方形仿木建筑砖室墓,出有墨书买地券、青瓷壶和红陶俑。方城盐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范公夫人强氏墓、方城金汤寨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范府君墓、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范致祥墓等,为北宋尚书左丞范致虚的家族墓地[7],均长方形砖券墓,出有罕见的石俑,以及墓志石刻铭或砖刻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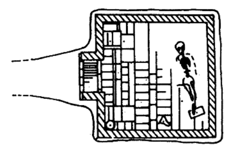
上述宋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以其大小不同的规模,精湛的仿木建筑结构,丰富多彩的壁画,栩栩如生的雕砖,各种各样的随葬品……,为研究宋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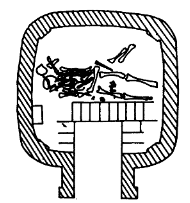
二、墓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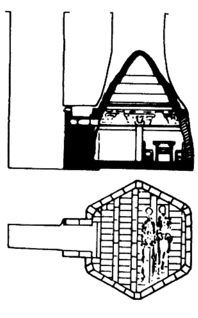
综合上述考古发现,河南宋墓可分为砖室墓、石室墓和土坑墓三类、砖室墓又分为仿木结构砖室墓和砖券墓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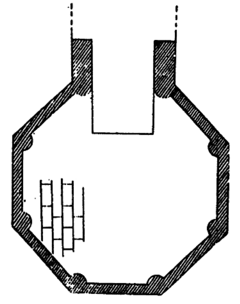
仿木结构砖室墓是河南宋墓的特点。墓室结构为单室墓。一般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有圆形的(图一),如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宋魏王赵頵夫妇合葬墓[8]、稍柴宋墓,以及洛阳涧西拖拉机厂宋墓、汤阴北关宋墓均如此。只是李后陵和赵頵墓室高大,而其余的形制比较小而已。墓室平面为直角正方形的(图二),如安阳天禧镇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宋墓、洛阳老城北关邙麓街宋墓、洛阳涧西耐火材料厂宋墓等。平面为圆角正方形的(图三),如上蔡小陈庄宋墓、郑州南关外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宋墓、二里岗宋墓、新乡丁固城宋墓、林县城关宋墓、方城朱庄宋墓等。平面为六角形的(图四),如洛阳郊区宋墓、龙门宋墓、偃师酒流沟宋墓、新乡丁固城宋墓、林县杨家庄宋墓、禹县白沙二、三号墓、荥阳司村宋墓、南召云阳宋墓、鸭河口宋墓等。其中林县杨家庄宋墓在墓室的东北壁、西北壁、东南壁还各有较大的方形耳室;洛阳郊区宋墓每面壁上均砌有4个方形壁龛。平面为八角形的(图五),如上蔡西南郊宋墓、温县东南王村宋墓、禹县白沙四号墓、庙坡宋墓、新乡丁固城宋墓、洛阳轴承厂宋墓等。还有少量多室墓。如林县董家村宋墓分前后室,均为正方形,中有过道相通;禹县白沙一号墓即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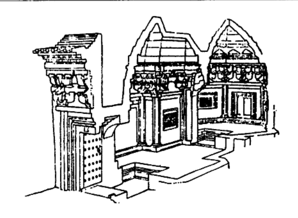

图一 圆形宋墓平面图


图二 方形宋墓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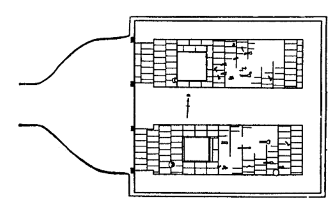

图三 圆角方形宋墓平面图


图四 六角形宋墓平、剖面图


图五 八角形宋墓平面图



图六　禹县白沙一号宋墓前后室透视图



图七　郏县苏适双门双室砖券墓平面图



图八　宋墓杂剧雕砖(摹本)　1.艳段　2.正杂剧　3.杂扮

翁墓,前室为方形,后室为六角形(图六)。

砖券墓数量较少。如方城盐店和金汤寨的范氏墓、新乡丁固城宋墓等,均为长方形弧顶砖券墓。郏县茨芭村苏仲南墓为两门双室砖券墓,两室之间的隔墙上有小券洞相通(图七)。

石室墓在我省发现更少,仅有伊川窑底村王拱辰墓和密县五虎庙冯京墓,均为石砌长方形夫妇多室合葬墓。

土坑墓有土洞墓和土坑墓两种不同的形制。安阳东南郊宋墓、洛阳老城北宋墓、涧河宋墓、巩县西村宋墓等,均为竖穴道横列土洞墓室。有的墓道在正中,呈"T"字形,有的墓道在墓室一侧,呈靴子形。而郑州南关外五中宋墓、滑县万集宋墓群、南阳东郊宋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前者为儿童墓,后二者属于北宋晚期漏泽园墓葬。

三、宋墓的建筑艺术和雕砖壁画

仿木结构的砖室宋墓最有特色,从唐末到五代时期的仿木结构砖室墓都比较简单。入宋以后其平

面由圆形或方形发展为六角形或八角形;从单室发展到前后室;从板门直棂窗发展为雕花格扇门窗;从象征性的角柱仅承托栌斗或一斗三升托替木,发展为单抄单昂五铺作重拱计心造;从简单的叠涩顶发展为宝盖式盝顶藻井。在有限的空间内,巧妙地设计,充分显示了宋代工匠师建造墓室的艺术水平。

砖室墓内多装饰雕砖或壁画是宋墓的又一特点。雕砖内容多为门、窗、桌、椅、柜、衣架、盆架、梳妆台、镜台、灯檠、屏风、剪刀、尺、熨斗。桌上有日常生活用品,如注子、杯、碗、盒、果品等,桌下有酒罐等与生活有关的各种器物。后壁多为妇人掩门。此外还有庖厨、捣练、洗帛等生活画面和一些杂剧雕砖。彩绘壁画的内容多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梳妆图、散乐图,以及各种孝子故事。禹县白沙赵大翁墓,可作为仿木构砖室壁画墓的典型代表[9]。该墓有阶梯式墓道,门楼式的墓门,墓门上有门脊、瓦垅、柱头、斗拱、门额、门簪、倚柱等。穿过甬道为正方形前室,四角有四方抹角倚柱,下有覆盆柱础,上砌阑额、普柏枋,枋上有转角五铺作斗拱。前室顶部为宝盖式盝顶藻井,后室平面为六角形,每角有倚柱,柱上有转角铺作斗拱。后壁砌假门,门饰俱全。后室上部有山花帐头和宝盖式截头六瓣攒尖顶。甬道两壁绘有贡纳财物图;前室南壁侧绘有守卫者。东壁有散乐图,女乐分别击腰鼓、吹横笛、吹觱篥、吹笙、吹排箫、弹琵琶,画面正中一女子欠身扬袖起舞。西壁是绘画和砖砌相结合的男女墓主人宴饮图。过道东壁绘黑色粮罐和白色粮袋,过道西壁绘 2 件带座的黑色高瓷瓶。后室绘有手持钱串、银铤进奉图和对镜梳妆图。镜台中间系一圆镜,与郑州南关外宋墓、洛阳涧西宋墓以及上蔡西南郊宋墓雕砖活动支架镜台基本相似。在宋墓的壁画中,也有较特殊者。巩县李后陵内就不是什么宴饮图,而绘有烟云缭绕的楼阁和布满穹顶的银河星空。以显示墓主人的高贵和威严,宋墓内的建筑结构,室内布局,壁画的内容,家具陈设为研究宋代建筑,社会生活习俗,都提供了十分形象的重要资料。

宋代是我国戏剧发展的重要时期,杂剧表演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如前所述,在宋墓的雕砖和壁画中就有不少杂剧、散乐的内容。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的杂剧雕砖(图八),构成一组完整的表演程序[10]。第一块叫"艳段"或"引首",即杂剧的开场;第二块叫"正杂剧";第三块叫"杂扮",即杂剧的结尾,画面上刻两个小丑,一个头戴软巾,穿长衫,袒胸露腹,系腰带,脚迈丁字步,左手托一鸟笼,右手前指,另一人脚迈丁字步。按照同一节拍与另一人同时扭动,作出引人发笑的滑稽表演动作。正象《梦粱录·卷二十·伎乐条》所记载的:"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纽)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其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禹县白沙宋墓中出有一组 4 人杂剧雕砖和一组 7 人散乐雕砖。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出有 6 人散乐雕砖,演奏拍板、方响、筝等乐器。还有 5 人杂剧雕砖,分别代表末尼、装孤、引戏、副净、副末五种杂剧角色。洛宁介村宋墓出土 14 块杂剧雕砖,包括杂剧、散乐、伎乐 32 人,其中也有少量的女演员。宜阳冯庄宋墓出有题铭为"八仕女奏乐"的散乐雕砖,分别演奏琵琶、鼓、拍板、笙、箫、笛、钹等乐器;安阳天禧镇宋墓的散乐图壁画,一组 5 人演奏拍板、觱篥、笛和腰鼓。其生动形象可与禹县白沙赵大翁墓内散乐图壁画媲美。

1987 年,在三门峡发现一座宋墓,在墓道和墓室间有一长方形天井,在墓道北端和天井北面的土壁上,自上而下各自浮雕有门窗、菱形几何图案、团团簇起的牡丹花,有强烈的

立体感,堪称古代民间艺术佳作。这种土壁浮雕图在全国实属罕见[11]。

四、葬具及随葬品和墓志

在宋代砖室墓中,往往按照墓室平面形制的不同,而筑砌有半圆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的各种棺床,这是墓主人安葬之处。根据多年来发掘的宋墓看,有一些墓葬没有用葬具[12],有的可能只用麻袋包裹人葬[13],但多数用木棺作葬具,但也腐巧无存,有的只留下有几枚棺钉。有一些宋代晚期墓葬采用石棺作为葬具,如荥阳槐西村出土的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朱三翁墓石棺,周围有精细的线刻画,前档有悬山顶门楼,正中为妇人掩门,棺左侧为出殡图,右侧为墓主人夫妇宴饮和观看杂剧图,形象十分生动[14]。孟津张盘村出土的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张君墓,石棺两侧后部和后档刻有二十四孝图,皆有榜题[15]。洛阳七里河出土的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孙王十三秀才寿棺,棺侧和后档刻有十五孝子图,也有榜题[16]。巩县西村出土的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王二翁墓之石棺,呈紫红色,前档刻妇人掩门图,左右侧刻二十四孝图,并刻有榜题[17]。其他一些宋墓壁画中虽然也有孝行图,但各自内容也不尽相同。如:元觉行孝、闵子骞行孝、田真行孝、鲍山行孝(行佣供母)、曾参行孝(采樵)、王祥行孝(卧冰求鲤)、孟宗行孝(哭竹生笋)、丁栏行孝(刻木事亲)、郭巨行孝(埋儿)、鲁义姑行孝、刘殷行孝(祝堇获粟)、陆绩行孝(怀桔遗亲)、王武行孝、姜诗行孝(涌泉跃鲤)、郯子行孝(鹿乳奉亲)、韩伯榆行孝、舜子行孝、董永行孝(典身葬父)、杨香行孝(搤虎救女)、王庭坚行孝(涤亲溺器)、蔡顺行孝(拾椹供亲)、曹娥行孝(哭江寻尸)、邓攸行孝(舍子)、王裒行孝(泣墓)、姜肱行孝(兄弟互救)、赵孝宗行孝、包中行孝、刘明达行孝……等,近三十孝之多。具体到每座墓内,则为数孝、十五孝、十九孝,最多二十四孝。

此外,宋墓中也有用陶罐作为葬具的。洛阳老城北关邙麓街宋墓,发现6个陶罐内皆有骨灰,南阳东郊两座宋代竖穴土坑墓,各置一个较大的陶罐,罐内立放人骨,罐上盖有大方砖,分别刻有砖铭,内容相近,其一为"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一月十一日,第二都保正胡玉送到一副,本地分沿(沿)古城下见,丙寅德字号葬"。这是属于漏泽园的罐葬墓。

宋墓中的随葬品多为瓷碗、盘、罐、壶、瓶、豆、碟等,瓷枕数量较少,如安阳东南郊宋墓的山水人物画彩色瓷枕,郏县东关宋墓四彩卧童瓷枕,宝丰石灰窑村宋墓四彩人物瓷枕,郑州面粉厂宋墓三彩狮子瓷枕,林县郎垒村宋墓白釉"春"字瓷枕,遂平北关宋墓卧童瓷枕等,造型优美,釉色艳丽,为瓷中上品。

宋墓中还出有陶罐、杯、澄泥砚,以及铜钱、镜、印、带扣,银耳环、钗和其它银饰,铁钱、剪刀、锁等。巩县李后陵虽经多次盗掘,但还出土36简片玉谥册和41简片玉哀册,80多件各类瓷器。其中越窑龙纹盘器形硕大,刻纹精湛。洛阳北郊宋墓,随葬有一批漆盒、盘、碗、碟、勺等,还出有铜饰、银饰、鎏金饰、玳瑁饰,十分精美。方城盐店、金汤寨宋墓随葬出有一大批石雕男俑、女俑,以及石雕桌、椅、屏风、方柜、长方案、轿、龙、兽、牛、马、鸡、鼠等。过去在河南宋墓中还很少发现石俑,这是仅见的二例。这些石俑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虽然

没有巩县宋陵石刻雕象那样雄伟的气势,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北宋小型圆雕中的瑰宝。

一些宋墓中还出土有墓志,如巩县孝义元祐九年(公元1090年)宋魏王赵頵墓志,密县五虎庙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枢密副使冯京墓志,伊川窑底村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彰德军节度使王拱辰墓志,新安高家湾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河中军节使杨承信墓志,以及郏县三苏坟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承议郎眉山苏仲南墓志等。篇幅均较长,内容丰富,涉及到宋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面史实,可印证、补充、订正《宋史》等文献。方城盐店、金汤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强氏墓,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范府君墓,崇宁二年(公元1102年)南安军判官范致祥墓,均出有刻铭砖和刻铭石,字数较少,只记墓主人的姓名、官职和卒年,也类似简单的墓志。北宋墓内安放墓志,这是官员们的专利,一般老百姓甚至像禹县白沙赵大翁那样富有的地主兼商人也没有墓志,只有一方买地券而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河南宋墓种类繁多,有土坑墓、砖室墓、石室室。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仿木结构砖室墓。北宋早期还比较简单,只是象征性地用砖砌出倚柱和栌斗的外形。北宋中期,逐渐有了一些规范,演变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宋代晚期,进一步仿效木建筑中的小木作,使其更加臻于完美。墓室的平面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由一斗三升演变为五铺作重拱。板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窗,由单室墓发展为分前后室的多室墓,显示了炉火纯青的建筑艺术。墓内多用雕砖或壁画作装饰,其内容表现墓主人宴饮、庖厨、梳妆、散乐和杂剧及孝子故事等,越到晚期内容越丰富。

宋墓内的随葬品一般数量很少,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墓内的雕砖壁画已经把各种器具什物表现出来而代替了实物,因此就无需在搞厚葬了。

孝行壁画在宋墓内比较常见。孝子故事大约源于战国,汉代石刻和北魏石棺就有孝子图,到宋代更加流行,至少在北宋晚期就形成了二十四孝。但与后世所传二十四孝不尽相同,说明这在民间流传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宋代墓葬中还有随葬买地券的习俗。买地券又称"墓别"、"地券",系由买地契约演变而来。此种习俗从东汉时开始出现,最初多刻于长条形铅板上,魏晋时起,多刻于砖上,也有用石板和梓木的。其内容也多有迷信成份。买地券的使用,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土地买卖的流行,同时也是压胜避邪之物。当墓主确立起对冢地的所有权之后,想借买地券使其不受鬼神的侵犯。

河南的宋墓,其形制和内容影响到北方和南方地区。也为中原地区金代后期的墓葬所继承。甚至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鉴于河南北宋时期的一些纪年墓多属晚期,而早中期发现绝少,因此有关墓葬分期等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注 释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3]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北宋王拱辰墓及墓志》,《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4]张思青等:《温县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5]李绍连:《宋苏适墓志及其他》,《文物》1973年第7期。
[6]杨育彬:《上蔡宋墓》,《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4期。
[7]①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村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②刘玉生:《河南省方城县出土宋代石俑》,《文物》1983年第8期。
③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方城金汤寨宋范致祥墓》,《文物》1988年第11期。
[8]周到:《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
[9][12]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10]董祥:《偃师酒流沟水库宋墓》,《文物》1959年第9期。
[11]金仪:《三门峡发现土壁浮雕宋墓》,《文物报》1987年8月21日。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5年11月侯马)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第43页。张政烺先生发言中提到:"昨天参观金墓,看见尸体摆在床上无棺材,我想大概是用麻布作麻袋包装尸体。北宋记载:司马光主持丧事,用麻布作包,把尸体放进去,有人开玩笑,加了标签,'公文已交……'。用麻布作包把尸体装进去,意思原出娘胎有包,死了,也有包,司马光家乡一带有这个风尚。以后做(考古)工作应该注意这种现象。"
[14]吕品:《河南荥阳北宋石棺线画考》,《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15]黄明兰等:《洛阳北宋张君墓画像石棺》,《文物》1984年第7期。
[16]黄明兰:《洛阳出土北宋画像石棺》,《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17]巩县文物保管所等:《巩县西村宋代石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原载《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河南古代陶瓷综论

河南位于黄河的中下游，自古中天下而立，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群山起伏，大河纵横，平原辽阔，气候温和，交通便利。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方神奇的热土上，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夏、商、东周、东汉、魏晋、北魏、唐、五代至北宋诸多王朝，河南一直是都城所在地，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漫长的历史岁月过去了，留下丰富的遗迹和遗物，构成了一座万紫千红的文物百花园，古代陶瓷就是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

远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河南已经烧制出多种器形和纹饰的陶器；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烧制了精美的彩陶，已经开始选用瓷土作为绘制各种图案的白色涂料；在距今4000余年的夏文化初期，人们更用瓷土作胎，烧制出与众不同的白陶器皿；从商文化开始，又在瓷土作胎的器表涂上釉色，烧制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原始青瓷器。这种原始青瓷器火候高，质地硬，吸水性强，敲之近似金属之声。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有尊、罍、罐。胎多为灰白色或黄白色，个别也有灰绿色和浅褐色，多施有青绿釉，少数为褐色或黄绿色，釉下饰有方格纹、弦纹等几何图案，显得莹润华贵，成为王室贵族享用的专利品。到了周代，原始青瓷继续烧造并得到改进。洛阳西周墓出土的瓷豆、簋、罍、罐、瓮、瓿，造型优美，在绿色玻璃质釉下，有弦纹、波浪纹、方格纹、乳钉纹、云雷纹等装饰，展示出原始青瓷器的新水平。东汉以降，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制作出真正的青瓷，成为陶瓷工艺发展的里程碑。至迟到了北朝时期，北方已经出现了白瓷，从青瓷到白瓷，这又是陶瓷工艺中的一个飞跃。白瓷是后来青花等各种彩瓷产生的基础，白瓷的出现，为我国的制瓷工艺开拓了更广阔的发展道路。隋唐时代，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河南陶瓷业达到了新的境界。一批重要瓷窑相继出现，并形成了不同的窑口。如安阳相州窑，是北方青瓷的重要产地。巩义窑、新密窑以烧造白瓷为主，在新密窑还烧制珍珠地划花瓷，异常名贵。此时的窑具中已经使用匣钵，这是陶瓷工艺中又一大进步，对宋及其以后各代产生了较大影响。巩义三彩窑是重要的考古发现。唐三彩一方面保持了秦汉以来彩塑的写实传统，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运用低温铅釉的绚丽斑斓，烘托出富有生气的浪漫色彩。花瓷是唐代的又一创造，在深色釉上饰以浅色彩斑，显得格外醒目，郏县黄道窑、鲁山段店窑出土的花瓷，凝重豪放，气韵天成。宋代河南瓷窑林立，临汝窑、宝丰窑、钧台窑、登封窑、邓州窑、鹤壁集窑等著名瓷窑，代表了北方各个窑系。宋瓷某些工艺特征来自唐代，但宋瓷的进步与发展，已大大超过唐瓷的水平。那别具一格的工艺，端庄秀美的造型令人叫绝，尤其是那些釉色青绿莹润如堆脂的汝瓷，那些釉色窑变灿如晚霞的钧瓷，那些为百姓喜闻乐见的白地黑花瓷，更使人们为之倾倒。宋代的瓷业正是

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金元时期，河南陶瓷由颠峰逐渐跌落，适应时代和市场的需要，以烧制钧瓷和白地黑花器为大宗。入明以后，瓷业重心南移，河南陶瓷业的民间窑场，仍在继续发展。这一切表明，河南古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浙江、江西等名瓷区相比，各有千秋，毫不逊色。值此河南古陶瓷在港展出之际，我们约略介绍几处窑址，以飨读者。

一、相州窑与北朝青瓷

据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记载："洛京窑，亦元魏烧造，即今河南洛阳县也。初都云中，后迁都此，古也曰洛京，所烧即供御物。"洛京窑迄今尚未发现，但在洛阳邙山的北魏贵族墓中，曾出土有不少青瓷器。这些瓷器具有粗壮挺拔、朴素浑厚的特点，其制作技法与南方青瓷有明显区别，可以确定为本地所生产。

安阳古称相州，地近东魏和北齐的都城—邺城。相州瓷窑址位于安阳市北郊安阳桥附近，北临洹河，窑址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60米。1974年进行的考古试掘表明，该窑址发现有与河北磁县贾壁村窑产品相近的瓷器和窑具，其上限可以上溯到北齐时期。安阳北齐范粹墓和濮阳北齐李云墓都随葬有一定数量的青瓷器，很可能是相州窑早期的产品。而下限则晚到隋唐，尤以隋代生产规模最大，产品种类较多。像著名的隋卜仁墓、张盛墓和宋循墓，都出土有与之相同的青瓷器，而且这些隋墓与相州窑近在咫尺，其产品绝不会舍近求远。考古发现证明，相州窑代表了同时期北方瓷窑的烧造水平[1]。1995年在配合107国道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者在距相州窑10余公里的安阳县辛店乡灵芝村，又发现一处属于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2]。与相州窑产品基本相同，这里烧制的瓷器有碗、罐、瓶和钵形器等。器壁一般较厚，胎质较为细腻，胎色灰白。器物里外均施釉，外表一般只施半釉，有垂釉现象，釉呈青中显黄色，光泽较强，透过釉层可以窥见胎面。该窑址出土有支烧、垫饼和器托等窑具，没有使用匣钵。因此，钵、碗等器物均系叠烧，器内往往留有支烧痕迹。

由于安阳相州窑的发现，可知中原地区制瓷手工业继承了汉晋青瓷器的技术，从北齐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开始形成新的流派，与南方青瓷齐头并进，共同开放着艺术之花。到了隋代，制瓷工艺又有了显著提高，为唐代各地窑口的相继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唐代白瓷、花瓷及三彩

白瓷约创烧于北齐，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曾出土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白瓷产品[3]。这批早期白瓷胎料比较精细，没有挂化妆土，釉呈乳白色，仍然微微泛青，显示出脱胎于青瓷但还不够成熟的原始特征。唐代的白瓷胎体变薄，多数是在胎外挂有一层白色化妆土，以增加烧成后的洁白度，釉面莹润，光洁纯净，最

后完成了从青瓷到白瓷的历史跨越。唐代烧制白瓷窑址有巩义白河窑[4]、新密西关窑[5]、登封曲河窑[6]、鹤壁集窑[7]和荥阳翟沟窑[8]等。其中以巩义白河窑的产品最为出色,有碗、盘、壶、瓶、盂、杯、钵、罐、盒等器形。碗、盘类器物数量多,均浅腹、平底或璧形底,器内满釉,外壁施半釉。胎质细腻,施釉薄而匀称,釉色纯白或微闪青色。有的盒、杯等器物,造型精巧,薄如蛋壳,通身施白釉,釉面光滑如玉,烧制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条记述:"开元贡白瓷器、绫、赋、绢、绵。管县二十六……巩,……密,……告成……。"《新唐书·地理志》也有:"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开元元年为府,土贡……埏埴盎缶。……县二十,……巩,……阳城,……密。"巩义白河窑的产品,与上述史料中唐开元时期河南贡白瓷的情况相吻合。

"花瓷"俗称"唐钧"它是唐代陶瓷工艺的又一大成就。烧制"花瓷"的窑址,目前仅在河南的鲁山段店窑[9]、郏县黄道窑、内乡大窑店窑[10]和禹州下白峪窑发现。从采集的标本看,所谓"花瓷"是指一种在黑釉上施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的瓷 。器形主要有罐、双系壶、花口壶、三足盘和腰鼓等。"花瓷"器造型质朴庄重,釉色变化多样,犹如黑色闪缎上的彩色装饰,颇受当时人民的喜爱。唐人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捻小碧上掌下须用明肯之声。……且鼗用石末花瓷,因是腰鼓"的记载,表明鲁山产的"花瓷"腰鼓在当时很有名气。在鲁山段店窑址中发现的黑釉斑点纹腰鼓残件,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分有大小不同的型号,从而印证了《羯鼓录》的有关记载。此外,在禹州下白峪窑址也发现有花釉腰鼓器,说明当时烧制这类腰鼓的窑场绝非一处。唐代"花瓷"开启了北宋钧瓷窑变的先河,为钧瓷窑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唐三彩是唐代陶瓷生产中精妙无双的瑰宝,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的珍品,它用白色黏土作胎,先经过 1100℃的高温素烧,然后用铜、铁、铝、锰等元素加入铅釉中作催化剂,施在已素烧过的胎体上,再经过 900℃的低温烧制而成。由于铅的易熔性和在烧制过程中的流动性,器物表面便形成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赭、褐等多种色调,斑斓绚丽,光彩夺目。

唐三彩大致分作生活用具、俑和模型明器等三大类。俑和模型明器主要用作墓葬中的随葬品。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述:"王公百官,竟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由此可见,唐三彩的出现与发展又是与唐代盛行厚葬制度分不开的。在河南洛阳、三门峡、郑州、安阳、焦作等地的唐墓中,曾出土有大量的三彩马、骆驼、文官、武士、男侍、女侍、天王、贵妇、胡俑和镇墓兽等,形态传神,生动逼真,充分显示出了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与创造才能。从有纪年的唐墓考察,三彩器的制作约始烧于唐高宗时期。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三彩器的生产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不仅产量大、质量高,而且色彩绚丽,造型多样。中晚唐以后,三彩器的数量逐渐减少,并被其他瓷器所代替。

在河南巩义市黄冶村发现了专门烧制唐三彩的窑址。1976 年曾对该窑进行了试掘,出土的标本丰富多彩,有单彩或三彩的三足炉、双系钵、宝相花盘、瓶、碗、罐、枕等生活器皿和骑马俑、抱瓶俑、女坐俑等俑类,以及三角支烧、骆驼头范、菩萨范、团花范等窑具和模具[11]。据此可以推知洛阳及其附近唐墓出土的三彩器,均是由巩义黄冶窑场生产的。唐

三彩不仅作为当时的生活用具和随葬之用，而且还大量远销国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根据目前已知资料，唐三彩在日本、朝鲜、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埃及和东南亚国家均有出土。在中国唐三彩的影响下，古代朝鲜的新罗王朝还烧制出“新罗三彩”，日本的奈良王朝也仿烧成功“奈良三彩”。

三、汝窑和民用青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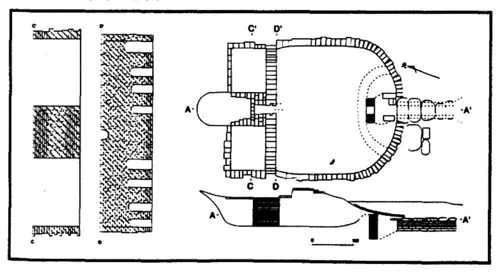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结束了晚唐以来形成的封建割据局面。继五代的梁、唐、晋、汉、周政权之后，北宋王朝也建都东京开封，河南的制瓷业由此进入了鼎盛阶段。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河南府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贡密、蜡各一百斤，瓷器二百事”[12]。据近年来的文物普查资料，河南先后在24个县市发现了300余处古陶瓷遗址，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北宋时期，烧制区域几乎遍布盛产瓷土的豫西伏牛山区和豫北太行山区。就各窑口烧造的品种来说，以汝窑和钧窑的产品最为著名，汝州严和店窑、内乡大窑店窑、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关窑等生产的民用青瓷为独树一帜，颇有地方特色。

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官、定、钧、哥窑齐名于世。由于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的时间较短，故传世瓷器不多，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据统计，全世界目前现存汝窑传世品仅70余件，主要收藏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等处，是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瓷窑。

汝窑窑址位于宝丰县清凉寺村，宝丰县在北宋时隶属汝州，故称汝窑。1987～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该窑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作坊、房基、窑炉、水井和澄泥池等与制瓷相关的遗迹。出土各类瓷器和窑具数千件，其中有御用汝瓷20余件，经过初步整理，已将全部发掘资料划分为五期，即北宋早、中、晚期和金、元时期[13]。发掘结果表明，该窑址创烧于北宋早期，北宋晚期达到顶峰，并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御用瓷器分鹅颈鼓腹瓶、盘口折肩瓶、小口细颈瓶、浅腹盘、平底洗、圈足洗、盏托、器盖和小碗等器类，造型雅致端庄，制作规整精细。瓷胎呈香灰色，胎体较薄，细腻致密。釉色以天青为主，犹如湖水反衬出的蓝色天空，蓝而不艳，青而不翠，给人以恬静柔和的美感。盘、碗、洗和平底瓶等均施满釉，采用支钉工具支烧。因此，器里、器外、口端及足际均不露胎，仅在器物底部遗留有3或5个细小支烧痕。另外，在鹅颈瓶上还刻有折枝莲花，盏托表面刻以覆莲，为传世品所不见，从而丰富了人们对汝窑的认识。

在宝丰清凉寺窑址中，与御用汝瓷同出的还有大量民用青瓷和三彩器。民用青瓷在釉色上以豆青和豆绿釉为主，器类有碗、盘、瓶、钵、盏、罐等。均使用垫饼正烧，器物通体满釉，在圈足著地面处露胎，并往往黏连有砂粒痕。该类瓷器以花纹装饰取胜，在器物表面模印或刻划有海水游鱼、缠枝牡丹、折枝菊花和盘龙等图案，纹饰清晰生动，具有美观大方的艺术效果。三彩器除大件的枕、盘、炉、灯外，还有小马、羊头等玩具雕塑，器表先涂以黄、绿、橙三彩，再施一层透明釉，色彩淡雅清新。与唐三彩明显不同的是，宋三彩还往往在枕面、盘底和炉壁上刻划或贴塑有线条流畅的花卉图案，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色。

汝州严和店窑生产规模较大,产品丰富,注重装饰。在1985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窑炉4座[14]。其中三号窑炉保存完整,平面呈马蹄形,由通风道、火门、火膛、窑室、吸烟孔、烟囱、望火孔等部分组成。窑室长2米,横宽3.1米,在后壁上设有八个吸烟孔,以与后端的两个长方形烟囱相通(图一)。这种窑炉属于北方典型的半倒焰式馒头窑,火焰进入窑室后,先上升至窑顶,热量遇阻而向下燎烧窑底,烟气则从吸烟孔经烟囱排出窑外。这里出土的印花青瓷绝大部分是凸起的阳纹,叶脉也多以点线表现。纹饰题材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有的器物底部还印有"焦"、"吴"、"同"等窑工姓氏,反映了当时各窑口自创牌号、相互竞争的情景。



图一　严和店窑址宋代窑炉平、剖面图

内乡在宋代属邓州,内乡大窑店窑址就是史料中提到的邓州窑[15]。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就记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可知邓州窑是宋代烧制青瓷器的窑口之一。这里的青瓷以印花装饰居多,纹饰凸起较高,用手触摸凸凹明显,在采集的一件青瓷器表面,发现刻有"窑司"字样的铭文,应是主管窑务的窑司对邓州窑进行监烧的实物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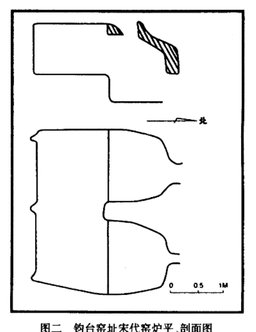
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关窑均是宋元时期制瓷工艺水平较高的窑口,产品以青釉为主,也兼烧白釉、黑釉、宋三彩和白地黑花瓷。新安城关窑的青瓷,胎质细腻致密,施釉薄而匀净,花纹布局严谨,注重装饰效果[16]。宜阳西关窑的青瓷施釉稍厚,以构图优美的花卉装饰最具特色[17]。另外,宜阳窑生产的白瓷碗底部印有"酒"字,黑瓷瓶的腹部刻有"京西转运判官、贡奉酒□□□"铭款,均与酒字有关,前者专用作饮酒器,后者则用于盛放贡酒。

四、宋元的钧窑与磁州窑系

钧窑为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窑址位于今禹州市区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因靠近钧台而

得名。1974 年至 1975 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对该窑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窑炉、作坊等制瓷遗迹,出土上千件瓷器标本[18]。钧窑窑炉为横长方形的窑室,前有一个东西并列的乳状火膛,其中东火膛仅留一个圆形气孔,西火膛留有窑门,上边还有方形烟囱(图二)。在窑室后壁中间和两角处,还设有三个相连的扇形烟道,将烟灰统一排出室外。这种窑炉构造尚不见于其他窑口,可能有助于钧瓷的还原焰烧成,从而产生特殊的窑变现象。钧窑的产品包括各类花盆、盆托、出戟尊、鼓钉洗、炉、盘、钵、碗等,种类繁多,造型复杂。钧窑的釉色主要有天蓝、月白、紫红、天青、碧蓝诸色,器表釉面上常留有蚯蚓起泥纹或开片,在花盆类器物的底部还刻有一个数字。经过对比确知,这些数字是按照器物的大小顺序从一到十编排的。从窑址中发现的一件用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范来看,钧瓷最迟始烧于北宋末年。

由于纪年墓葬和窑址发掘较少,给钧窑的断代与分期带来一定的困难。金代钧瓷目前能够确认的为数不多,因此这次参展的钧瓷印花盘和钧瓷盂就显得非常珍贵。钧瓷印花盘出土于禹州市西关的一座瓷器窖藏,与碗、盂、盘等 12 件钧瓷合装在一个黑瓷缸内,埋于地下约深 3 米处。钧瓷向以釉色取胜,该盘内底上模印有清晰的缠枝菊花,是目前所知仅有一件带有印花装饰的钧瓷器[19]。钧瓷盂发现于禹州市营里钧窑遗址,器体较大,造型工整,施釉匀净,色调幽雅,也是钧瓷中少见的精品。元代的钧窑系以禹州为中心,除在河南境内遍地开花外,影响远波及全国,如在河北省磁县、山西省浑源,内蒙古包头和浙江省金华等地,均发现了烧制钧瓷的窑址。元代的钧瓷制品较之宋钧已大有逊色,胎质明显粗松,器表仅施半截釉。釉层变厚,并出现棕眼,器表的光泽度较差。釉色有天蓝和月白两种,多以紫红斑作为装饰。产品以碗、盘、罐、瓶等日常生活用品为大宗,少见花盆、盆托、洗、尊之类的陈设用具。



图二　钧台窑址宋代窑炉平、剖面图

河南地区属于磁州窑系的窑址,主要有禹州扒村窑、新密窑沟窑、鹤壁集窑和修武当阳峪窑等。磁州窑系的瓷器装饰以黑白色彩对比为主要特点,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技法以图案形式绘制在瓷器上,开创了瓷器彩绘装饰的新途经。目前所知,白地黑花瓷器约兴于北宋晚期,至金元时期非常盛行。扒村窑的白地黑花瓷色调鲜明,瓷器普遍使用化妆土,釉面白如雪,黑似漆,其装饰以折枝花草纹为主,也有人物和鸟兽等纹样,构图细密,笔画流畅,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和较高的艺术水平[20]。新密窑沟窑的白地黑花装饰,以对称布局的花卉和蕙草为最常见,枕面上的主题花纹也有"童子扑蝴蝶"等内容,画面生

动活泼,富有生活情趣[21]。鹤壁集窑兴于晚唐,盛于北宋,金元时期烧制钧窑和磁州窑系瓷器。产品种类繁多,白釉刻花瓷器笔画流畅,黑釉瓷器釉面漆黑发亮,白地黑花瓷器线条简练,充分显示出该窑先进的制瓷工艺和高超的绘画技法[22]。该窑属于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窑场,代表了我国制瓷工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在一些瓷器上刻划或者墨绘有"杨"、"赵"、"褚"、"张"、"刘"、"李"、"宋"等窑主或工匠姓氏,以及,"刘家瓷器"、"赵一盘"等商品标记,说明了当时瓷业生产中还存在着商品竞争。当阳峪窑的产品工艺精湛,以绞胎瓷和剔花装饰著称于世[23]。绞胎瓷器系用白、褐两色泥料相间揉和在一起,成形后再施釉烧成。这里的绞胎瓷纹理对称整齐,犹如禽鸟羽毛,独具艺术魅力。剔花瓷器往往是在白色胎体上施一层黑釉,先刻出花纹图案,然后剔出花纹以外的黑釉部分,显露出白色的衬地。这样制出的瓷器花纹突出,色泽明快,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当阳峪窑址上现存有北宋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碑,碑文不仅记录了当地瓷业兴盛、产品精巧的历史,而且涉及到该窑与耀州窑的关系,对研究中国陶瓷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注　释

[1]河南省博物馆、安阳地区文化局:《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2期。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资料,待刊。
[3]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4]冯先铭:《河南巩县古窑址调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3期。
[5][6]冯先铭:《河南密县、登封古窑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3期。
[7][2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鹤壁集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8期。
[8]张松林:《荥阳翟沟窑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9]李辉柄、李知宴:《河南鲁山段店窑》,《文物》1980年第5期。
[10][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内乡大窑店瓷窑遗址的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郭建邦、刘建洲:《巩县黄冶"唐三彩"窑址的试掘》,《河南文博通讯》1977年第1期。
[12](宋)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卷一"西京"条,中华书局1984年。
[13]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第11期。
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窑址的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临汝严和店汝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安县文化馆:《河南新安古窑址的新发现》,《中国古窑址调查发掘发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资料,待刊。
[18]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文管会:《介绍几件陶瓷精品》,《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20]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1964年第8期。
[2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密县、登封唐宋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64年第2期。
[23]陈万里:《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原载《河南出土陶瓷》,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出版1997年。与孙新民先生合写)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1927年7月,冯玉祥先生主政河南期间,开始筹建河南博物馆。今年适逢其周甲生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值得我们纪念和庆贺。

河南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茫茫古今,沧桑巨变,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物荟萃。河南省博物馆成立之初,曾收集数千件文物,举办展览陈列。60年后的今天,已发展成为馆藏文物达10万余件(不包括货币)的大馆。这里集中了丰富的文化宝藏,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每年约有40万人参观,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朋友。河南博物馆的藏品,曾多次到日本和欧美展出,赢得全世界的喝彩。

过去的60年跨越了两个时代,经历了风雨和阳光。1936年创刊的《河南博物馆馆刊》(以下简称《馆刊》)和1977年出版的《中原文物》(初名为《河南文博通讯》,1981年改为现名),作为两个标志,记录了许多人在河南省博物馆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大家的缅怀和尊敬。

一

1936年7月1日,《馆刊》第一集问世。当时的河南博物馆王幼侨馆长在《发刊词》中写到:"……适新郑古器,轩然呈露,乃暂设古物保存所,藏列于开封第一学生图书馆。……阅数载而河南博物馆成立,此稀世之瑰珍,移置其中。益以安阳小屯村、汲县山彪镇、洛阳、广武、浚县等地之甲骨、金、石、陶、玉、牙、角明器等事物,都凡数千品,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次之如动植物标本,采集制造,略见规模。而奇石名画,服饰影片,以及其他杂件,经各地或个人赠送者亦复繁多。说者谓'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自价值论,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度非溢誉也。……不得已于寥寥无几之额款,极力撙节,月出馆刊一册,淬砺同人,取沧海之一勺,集零锦而成裳,期宝山之过勿空,幸廉泉之饮自得,尽心焉而已,以云问世,则又何敢。"记述了《馆刊》创刊的宗旨和经过。《馆刊》先后出过十五集,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

从《馆刊》中可以了解到当年河南博物馆的许多情况。如第一集发表的《本馆之沿革》,记述从1927年7月到1936年7月这九年间馆领导的变换、展览的筹备和科研的开展。1928年10月正式开馆展出,"民众参观者途为之塞,每日多至三四万人。"可见盛况空前。第一集还有《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所列博物馆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第二集《河南博物馆办事细则》,记述除

博物馆设有理事会之外，还有主管行政和后勤的事务部；主管藏品保管和陈列的保管部；主管藏品征集、鉴定的研究部。从第四集又可以看出，河南博物馆还成立有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分为人文部专门委员会，包括考古组和民俗组；自然部专门委员会，包括动物组、植物组和矿物组。每个组又分设各项专门委员以从事科学研究，如考古组就设有甲骨文字、陶器、石器、铜器、石刻、明器、玉器、杂品器物等项专门委员；民俗组就设有种族、礼俗、宗教、工艺等项专门委员。几乎每一集都刊有布置和总结工作的馆务会议记录，刊有馆藏文物的登记目录和整理情况，还刊有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年六月河南博物馆大事记。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馆刊》发表了一批有关考古学基础的论述和考古调查报告。如关百益撰写的《考古学大意》在一、二集刊出，讲述了考古学定义、范围、方法。其中考古学方法中分调查、收买(古物)、发掘、保存、陈列、研究、编辑和传播等项，每一项又有若干种内容。50年前有此水平颇为难得。王幼侨编写的《地下考古与地面考古》，连续在五到十一集上发表。内容包括考古学的目的、范围、技术、分类、步骤等，洋洋洒洒两万余言，是很有价值的考古学论述。第二集刊有孙文青的《宝山访古记》，介绍了与徐旭生先生一起去安阳西部的善应集、小南海、灵泉寺、水冶镇等地调查遗址、墓葬、石窟、寺院和碑刻的收获。是一篇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的考古调查。第六集开始刊登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编写的《河南安阳发现之古物》，连续七次登完，介绍了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第九集至十五集转载《新郑古器发见记》，记述了新郑彝器发现经过，运往开封保管陈列情况，以及器名之诠订和文字之考释等，很有资料价值。第十一集刊有郭豫才的《仰韶器物小记》，记述了到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调查，采集石器、骨器和彩陶片的经过。这是中国考古学者较早的一次仰韶村遗址调查。第七、八集合刊发表李鉴昭写的简讯《偃师古灰嘴遗址发见石斧》，介绍了一件偃师灰嘴村出土的石斧。灰嘴遗址是解放后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1963年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殊不知早在半个世纪前，已有考古工作者在那里采集到文物。第五集刊有《襄县发现大批古钱》，说是“襄县城北六里之范庄村，村民丁金兰者，于二十五年八月三日，在村南掘井，至四尺许，发现钱窖，愈挖愈多，尽一夜之力，运至村内，事为县政府所闻，将钱运至县府呈报省政府，奉指令奖洋五百元。扫数解送河南博物馆保存，计共重三千六百五十斤，为数约在四十万枚以上。现经本馆加工整理，其文字上有秦之半两，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宋之宋元，金之正隆。明清二代之钱，尚无所见云。”看来这是我省很早发现的一座大型金代钱币窖藏，当时的政府能把古钱如数运到河南博物馆保存，并奖给发现者五百元，也算办了一件好事。

《馆刊》还发表了许多文物考古研究文章。如孙文青撰写的《跋魏故雍州刺史南平王元暐墓志》(第一集)、《魏元怀墓志跋》(第九集)，关百益《河南博物馆所藏特别石刻三种考(魏石棺、隋邴法敬造像、女真进士题名碑)》(第四集)，许同莘《跋崔用昶墓志》(第五集)，李鉴昭《洛阳石瑶门魏造像记》(第十三集)，许平石《晋太学盛德隆熙颂碑跋》(第四集)、《东汉谷堰石方题字考证》、《唐故太原府参军事苗君墓志跋》(第五集)、《魏修太公吕望祠碑跋》(第六集)、《魏刘根造像记跋》(第九集)、《唐泉男生墓志跋》(第十集)、《唐扶余隆墓志跋》(第十一集)、《唐张览墓志跋》(第十三集)、《齐刘碑造像铭跋》(第十四集)、《唐

崔锝墓志跋》、《宋军首副总秦永泰墓砖》(第十五集)。上述文章介绍了有一定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石刻和墓志。又如关百益写有《伊阙古迹图序》(第五集),从石窟、古寺、造像和题记来研究龙门石窟;孙文青《南阳草店汉画像集自序》(第五集),把汉画像石分为六类,即天象图、地域图、历史故事图、礼乐图、游戏图和祥瑞图,是我国较早研究南阳汉画像石的成果;李鉴昭《少林古迹考》,介绍了少林寺的历史、碑刻、建筑、武术,以及50年前少林寺的情况,颇有参考价值;许敬参《契文卜王释例》(第四、五集),是商代甲骨文研究的一个收获。

《馆刊》中还刊有一些短文,如高亨《说丰》(第四集)、《说铺》(第五集),郭豫才《说贝》(第六集)、《说兵器》(第七、八集)、《说毕》(第九集)、《说甑》(第十集),许敬参《题凑翰松说》(第六集)、《说削》(第七、八集)、《编钟编磬说》(第九集)、《说玉器》(第十集)、《说辖》、《说匏形尊》(第十一集)、《说豆》(第十三集)、《广武残瑗记》(第十四集)。上述文章介绍和考释了多种古代器物,其中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如"丰",因其象蜂之形而得名,此器首似蜂首,身似蜂身,四足似蜂足,四柱似蜂须,足下两蛇,为其装饰,乃承觯承尊之器;又如"铺",其形似豆,但不是豆,无盖,浅盘,用以盛较干的食物;再如"毕",其形似勺,有柄,勺底有许多三角形镂孔,实乃古之漏器,犹如今之罩篱。这使读者增长了许多知识。

此外,《馆刊》还刊登一些关于植物和鸟类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文章。

《馆刊》也反映了河南博物馆文物陈列的一些情况。如孙文青《馆藏石刻整理经过及其序说》(第六集),就记述了民国二十四年修建"碑林"的经过。当时的代馆长杜光远曾撰书立碑《创建碑林记》:"河南为中华民族祖居之区,先民遗迹甲于各地。尤以列代石刻如南阳汉画、龙门造像、邙洛墓志等,非他省所及。河南博物馆旧藏石刻八百余方,强半来自河洛间。散置院宇。莫之厘整,余每睹而感焉。本年冬,远以菲材,承乏馆务,披阅前卷,原有议建碑林之计,殆以费绌莫举。因与同人商,暂移本馆研究费约千余金,以速成之。于馆之东辟石刻院,南北两庑,厘凝灰砖基五十有二,分置墓志四百四十有六,志盖二百八十有八,碣题十八,石经、禅牒各一。东亭内外置雕像五,造像十五;西亭置石棺一,石幢四,石函、石碑各二;南北两廊置堰石三十。另置石缸于院东北,石陛于首门内。都凡八百一十有五,均所以便观览焉。……经始于十一月十六,落成于十二月三十。计时不逾两月,而石之叠者析,仆者树,凌乱倒错者,莫不各得其所。工事既毕,爰名之曰碑林。"碑中保留了不少珍贵资料。又如《河南博物馆最近工作要项》(第十五集)指出:"本馆除重要物品分别迁移宛汉二处保管外,所有未迁移者,一部分照例陈列,藉供社会人士之参观……"当时日寇已大举侵略中国,馆藏重要文物迁移到南阳和武汉,以所余之文物仍坚持日常陈列。

《馆刊》还刊登一些有趣的记载。如《保护石刻》(第二集)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四次委员会议,委员黄文弼提议:陵墓附近,皆有石刻,关系史迹,极可珍贵,惟散处各地,摧毁堪虞。拟请各地陵墓附近及有关史迹之石刻,能移动者,集中保存,不能移动者,在石刻之附近,酌免一亩或二亩地粮,责成地户负责照料,以资保护一案,佥以陵墓及有关史迹之石刻,关系历史文化,自应妥筹保管,结果原案修正通过。经呈内政部转呈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转饬各区行政督察专员遵照办理云"。该决议执行与否姑且不论,至少反映

了老一辈考古学家保护文物的愿望。又如第七、八集刊有《致河南通志馆函》："查贵馆所印金石图录，取材多系敝馆，印费出自公款，至今版权仍存私人手中，学术团体屡有责问究应归至何处，未便过问，惟底片关系敝馆出书，即祈查照交存为荷。"看来当时河南博物馆与河南通志馆之间，曾因资料问题发生过一些矛盾。

《馆刊》中还记载了河南博物馆与国内外进行刊物交换的信息。第五集刊有《燕京大学图书馆致本馆请交换出版书籍函》："久仰贵馆出版之左列书籍，材料丰富，义例谨严，洵为学海之津梁，足备士林之考镜。敝馆敢恳惠赠一份，以光签架，而广见闻。兹奉上敝馆出版品目录一纸，请就中择其需要而价值相当者，俾便照检，以资交换。计开贵馆出版书籍，《河南博物馆刊》第一、二集。"同集还刊有《本馆复燕京大学图书馆交换出版书籍函》："接准贵馆大函，附图书出版目录一纸，并承嘱交换馆刊第一、二集。查本馆第一集馆刊业已告罄，余第二、三、四集拟请交换贵馆出版之《燕京学报》，以资参考。如蒙采纳，嗣后可源源而寄。"第六集刊有《美国驻汉领事官卓思麟先生复本馆函》："接准贵馆本年三月十一日大函，并馆刊三本，甚为感谢。该项刊物已转寄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矣！如承贵馆将出版任何刊物，随时惠寄一份，转交该馆，则不胜盼祷。"第七、八集刊有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索要《馆刊》的记载；第十一集《河南博物馆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招待牯岭美国学校美人黎金盘参观，并订购本馆馆刊自第十集起全份。"上述表明，《馆刊》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

还要一书的是，第十二集是"抗战专号"。该集出版于 1937 年 10 月，即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不久，全国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当时的河南博物馆馆长在《卷头语》中说："禁不住万斛热血的澎湃，我们暂时将考古的工作，自然学科的研究，停搁一下，毅然决然地出这本抗战专号。本来一个国家，一个整个民族，无缘无故地受那穷凶极恶不讲公理不讲国际公法的残暴小丑，一而再、再而三，至死不休地侵略蹂躏。但凡有一点血性和气节的人，都应该竭其心力，执戈以保国权，奋笔以伸公理，这是正当的自卫，义不容辞的职责。况且日本的残暴军阀，破坏和平，蔑弃公理，撕碎了国际条约，撞倒了国联议坛。最近赤裸裸地炮击北美合众国的国旗，弹戕大不列颠的驻华公使；冥顽不灵，半污辱半嘲笑的一纸通牒，命令式地强迫各国外交官吏及侨民等离开南京。这种目空一切毫无人性的倭奴，实是世界上的公敌，人类的蟊贼。不特我中华同胞，凡属世界上有血性有气节的人，都应该联合战线，扑灭此种害虫，使世界人类永享和平的幸福。我们这本抗战专号，因同人学识谫陋，内容和文笔难臻完美，但一字一句都是从爱国家、爱种族、主张公理、拥护和平的热诚结晶而来，并且所注意的问题，都是力求结合时势的需要，当前的急务。希望引起全国和世界的同情，以完成我们敌忾同仇共生共存的志愿。我大中华民国的同胞们，死里求生方能生，贪生怕死终于死！我全世界的友邦人士们，星星之火可燎原，涓涓不塞将陆沉！其速起！奋斗！奋斗！杀贼！杀贼！"抗战之心，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在"抗战专号"上还刊有《本馆抗日后援工作报告——劝募记》，介绍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 1937 年 9 月 15 日至 18 日，每天下午沿街宣传，并进行募捐以资助抗战。

《馆刊》从 1936 年 7 月创刊，到 1938 年 3 月终因日寇侵略中国而停刊。前后共出版了十五集。这十五集馆刊，记录了河南博物馆走过的一段道路。永远载入河南博物馆的史

册！永远载入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史册！

二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到来了，河南省博物馆也随之获得了新生，1977年7月，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河南文博通讯》创刊，郭沫若同志题了刊名。最初是作为内部刊物出版的，1980年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赵朴初同志为封面题了字。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四十期，还出版了增刊和特刊。《中原文物》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河南博物馆科研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实际上也是在新时代新条件下《河南博物馆馆刊》的继续。其内容丰富多采，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面观。

《中原文物》发表了大量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概括了十年来河南的重要考古发现。

1979年2期发表的《南召县发现猿人牙齿》，介绍了南召云阳杏花山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和一批动物化石，其年代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相当。1982年1期刊有《南召县小空山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记述了小空山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出土有用火的灰烬堆积和百余件各种类型的旧石器。这里和杏花山近在咫尺，应是南召猿人的居住地之一。1980年3期发表有《洛河岸边首次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记述了1978年在洛阳市凯旋路东端搞基建施工时，离地表10米深处发现距今5万年左右的古象化石和一些旧石器。

裴李岗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建国以来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中原文物》发表了多篇关于裴李岗文化的考古报道，如1979年3期《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983年1期《舞阳贾湖遗址调查简报》，分别介绍了十分重要的两处裴李岗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处于我国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981年1期发表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介绍了一件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画面最大，内容最丰富，技法也最精湛的一幅彩陶画。1982年4期《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和1987年1期《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分别介绍了这两处闻名中外的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遗址遍布全省，《中原文物》发表了许多资料。如1977年1期《汤阴白营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1982年2期《河南登封程窑遗址试掘简报》、1982年3期《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1983年4期《郑州阎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1984年4期《登封告成北沟遗址发掘简报》等，反映我省各地龙山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河南也有发现。1981年3期《郸城段寨遗址试掘》、1986年1期《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反映了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屈家岭文化是一种分布在湖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77年2期《河南省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1979年3期《上蔡发现五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介绍了河南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反映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融合。这充分表明我国

统一的民族文化正在形成。

从考古学角度去探索和研究夏文化，是建国后提出的新课题之一。1977年2期《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告成遗址的调查发掘》、1978年2期《一九七七年下半年登封告成遗址的调查发掘》、1978年3期《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登封告成遗址的发掘》等，介绍了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其年代在夏朝初期，其地望在"禹居阳城"、"禹都阳城"和"夏都阳城"的范围之内。城址虽小，城墙基槽夯土的建筑方法也很原始，但这种现象正符合中国古代城垣由小到大，从原始趋向成熟的发展规律。这对探索夏王朝中心区域的文化，也算是一次突破。

闻名中外的郑州商代城址，也是解放后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不但以一座周长近7公里的城垣、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和墓葬等重要遗迹现象称著于世，也因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而引人注目。1981年2期《近几年来在郑州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1984年1期《近年来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收获》等，介绍了郑州商城内外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一些青铜器墓葬，为商代青铜器的分期断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资料。1980年1期《项城县毛冢出土商代青铜器》和《新郑望京楼出土一批商代铜器和玉器》、1980年3期《武陟县商代墓葬清理简报》、1980年4期《中牟出土商代铜器》、1983年2期《临汝县李楼出土商代青铜器介绍》等，介绍了河南各地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1981年4期《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介绍了罗山后李发掘的一批商代墓。出土有一批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和木漆器。从器物特征看，与安阳殷墟相同或相似。有的青铜器上铸有"息"字铭文。殷墟有一块骨臼刻辞："戊申妇息示二屯永"(《续》六、九、四)。"妇息"即息族之女嫁给商王者。二者对照，可知这里是商代息国贵族的墓地。息国是商王朝偏南的方国之一，而且还与商王室通婚，说明双方关系密切。这里介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代表了商文化的一种地域类型。

1977年5月，在登封县告成镇东北，发现了东周著名的阳城。1980年1期《东周阳城地下输水管道和贮水池的初步发掘》、1982年2期《登封战国阳城贮水输水设施的发掘》等，介绍了阳城内的贮水输水设施。其中包括近千米长的套接陶水管道，还有许多三通管、四通管，以及"阀门坑"和贮水池。是古代水利史的实物例证。解放后，在洛阳地区发现一大批东周货币，包括平首布、空首布和圜钱三种。1981年3期《洛阳附近出土的两批东周货币》、1982年2期《河南临汝出土一批空首布》等对此作了详细介绍。说明地处中原的东周王都洛阳地区，远在春秋早、中期已流通金属货币，显示了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

短暂的秦王朝在河南留下的遗迹和遗物较少。《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上村岭秦墓和汉墓》，介绍了1979年在三门峡市西郊发掘的75座秦代墓葬。墓道大于墓室，形制较特殊。出土遗物也很有特色，和陕西秦墓相同。

汉代是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河南更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洛阳为繁华帝都，南阳是皇室故里，遗留下来文物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中原文物》较集中地发表了汉画像石墓的发掘资料。1982年1期有《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邓县长冢店汉画像石墓》等，1985年3期有《新野县前高庙村汉画像石墓》、《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唐河县针织厂二号汉画像石

墓》、《南阳市建材试验厂汉画像石墓》、《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南阳市独山西坡汉画像石墓》等。介绍这些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收获，反映了南阳汉画像石"深沉雄大"的艺术成就。还发表了一些资料，介绍出土的汉代珍贵文物。如 1979 年 3 期《介绍一面西汉透光镜》和 1982 年 2 期《雏鸡图镜》，分别介绍了河南省博物馆藏"见日之光，相忘长象"的八曲连弧纹汉代铜镜，其光亮镜面在承受日光或聚光灯照射时，可反映出背面的铭文和图像；还有新乡博物馆藏汉代雏鸡纹镜，给人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感。1981 年 2 期《南乐宋耿洛一号汉墓发掘简报》，介绍该墓出土的金银镶嵌铜带钩和延熹三年（公元 160 年）高浮雕盘龙石砚；1981 年 3 期《罕见的汉代戏车画像砖》，介绍新野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画面为两车相联，在飞车中伎人走斜索，橦顶横木倒挂伎人手托双伎的表演，令人拍案叫绝！1983 年 1 期《淮阳于庄汉墓发掘简报》，介绍墓内随葬的一座陶庄园模型。其右侧为三进院落由高楼组成的庭院，左侧为水井、沟畦、田垄构成的田园，形象逼真。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中原文物》发表的资料较多。1981 年 2 期《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的发掘》、1983 年 2 期《1981 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分别介绍了发掘含嘉仓城德猷门（北城门）和宫城东墙与外郭城西墙之间夹城的考古发现。1982 年 3 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介绍了西域"昭武九姓"国之一的原安国大首领、唐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合葬墓的考古发现。除墓志和精美的三彩器之外，还出有一枚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金铸币，为古代丝绸之路珍贵文物。1981 年 3 期《巩县唐三彩窑址调查》，介绍在巩县黄冶河两岸的唐三彩窑址。那里出土的各种范模和三彩器、单轴器为其他地方所少见。1981 年 2 期《新发现的一面唐代透光镜》和 1985 年 2 期《遂平又发现一件唐代透光镜》，介绍了遂平出土的两面形制相近的宝相花镜，和汉代透光镜一样，将铜镜对准阳光，能把背面花纹清晰地映在墙上。

《中原文物》也发表了一些宋金元明的资料。1980 年 3 期《巩县宋陵》，介绍了巩县宋陵。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型陵区之一，它的布局、地面建筑和石刻造像，对研究北宋的历史有重要的价值。1978 年 4 期《内乡县大窑店瓷窑址的调查》，介绍了内乡邓州窑的考古发现。该窑始烧于唐末，停烧于明代，前后延续达六百年之久。1983 年 1 期《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介绍塔基地宫的建筑结构、棺床和石棺。石棺两侧有"释迦牟尼涅槃十弟子送葬图"，是绝妙的宋代雕刻艺术品。1984 年 1 期《荥阳楚村元代铸造遗址的试掘与研究》，介绍了一批铸造农具的铜模，不易生锈，是一种优于铁模的永久性模型，至今仍可使用。1978 年 3 期《新乡明潞简王墓调查简报》，介绍明神宗朱翊钧的弟弟潞简王朱翊镠和次妃赵氏墓葬的情况，这是除北京十三陵和南京明孝陵之外，全国现存大型的明墓之一。其墓前石刻、建筑和地下宫殿，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82 年 2 期《宁陵县华岗出土的明代木船》，介绍在宁陵县前华岗村东黄河故道（张弓河）西岸发现的一艘明代沉船，这在河南是难得的考古发现。

《中原文物》的内容十分广泛，还开辟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馆藏文物"、"文博简讯"等专栏。介绍了全省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介绍了许多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和革命文物，介绍了许多馆藏的陶器、瓷器、铜器、玉器、雕塑、古建模型、石刻、以及书法、绘画等文物珍品，介绍了全省各地其他的考古发现、古建维修、博物馆展出、

学术会议等信息。

《中原文物》发表了大批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其中包括夏鼐、苏秉琦、胡厚宣、陈直、安金槐、邹衡、杨伯达、李学勤等名家的文章，为刊物增添了光彩。论文中有不少是探索夏文化的，如1978年1期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邹衡《关于探索夏代文化的途径》、黄石林《关于探索夏代文化问题》，1978年2期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1978年3期赵芝荃《二里头考古队探索夏文化的回顾与展望》，1978年4期郑杰祥《二里头文化商榷》，1979年1期方酉生《论商都西亳——兼论探索夏文化的问题》，1979年2期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1979年3期许顺湛《夏代文化的再探索》，1980年4期杨育彬《谈谈夏代文化的问题》等，从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论述了夏文化的问题，使人们对夏代的认识为之耳目一新。

论文中有一些是涉及科技考古的。如1977年1期杨焕成《浅谈地震与考古》，1978年1期安金槐《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郑州市博物馆《谈谈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的天文图象》，1979年2期李京华《河南汉魏时期球墨铸铁的重大发现》，1980年2期孙传贤《浅谈古代透光镜》，1983年2期汤文兴《我国古代几种货币的铸造技术》，1983年3期唐嘉弘《古籍防蠹初考》，1983年4期潘贤家等《中国古代陶器穆斯堡尔谱的初步研究》，1984年1期李湘生《试析仰韶文化彩陶的泥料、制作工艺、轮绘技术和艺术》，1985年1期赵晋保等《青铜病的防治》，1985年4期叶万松等《东周时期我国的青铜铸型工艺试探》等，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

所刊论文中也有关于各个时代文物考古的论述。有综合性研究的，如1979年3期杨育彬《河南文物考古三十年》、1983年4期吴戈等《九朝故都考古论略》；有关原始社会的，如1980年1期许顺湛《论裴李岗文化》、1980年4期李仰松《试谈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双连杯'和'三耳杯'及其有关问题》、1981年4期苏秉琦《七十年代初信阳地区考古勘察回忆录》、1981年3期李昌韬《秦王寨遗址与秦王寨类型》、1984年4期廖永民《大河村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等；有关于商代的，如1985年3期黄石林《关于偃师商城的几个问题》、1985年2期陈旭《郑州商城宫殿基址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1981年3期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岗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1986年1期胡厚宣《记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馆所藏一片牛胛骨卜辞》、1981年4期李伯谦等《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等；有论述秦汉的，如1980年2期郑杰祥等《陈胜墓地考略》、1980年3期汤文兴等《河南汉画像砖的艺术风格与分期》、1982年2期周到等《南阳汉画像石简论》、1983年3期任常中《关于汉马丞、徒丞、空丞印的问题》、1986年1期张错生《汉代粮仓初探》等；有关唐和以后的，如1981年2期张之《修定寺方塔始建年代考》、1980年3期杨伯达《古代艺术的瑰宝——巩县宋陵雕刻》、1983年1期张家泰《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1983年2期、4期杨焕成《试论河南明清建筑斗拱的地方特征》等，反映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

论文中还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博物馆学研究的专题。如韩绍诗写的《借鉴国外经验逐步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1982年1期）、《浅议博物馆的发展史、定义及其与展览馆的区别》（1984年2期）、《河南省部分博物馆情况的调查研究》（1986年2期）、袁克敏《有关陈列、展览艺术设计问题的探讨》（1983年2期）、董应周《发展博物馆事业，振兴中华》

(1984年1期)、孙克成《谈谈地市级博物馆发展的道路》(1984年3期)、刘新《论优先发展科学技术类博物馆》(1985年1期)、王波清《岳飞纪念馆的特点与作用》(1985年2期)、《浅谈如何处理陈列中的学术争论问题》(1986年3期)、张家训《浅谈陈列艺术设计》(1986年3期)等。从不同侧面研究了博物馆学的许多问题。

刊登论文最多的,还是《中原文物》的几期特刊。其中有1981年10月出版的《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第一次年会),1983年1月出版的《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第二次年会),1985年6月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年9月出版的《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纪念文集》,1986年12月出版的《论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7年4月出版的《洛阳古墓博物馆专辑》等,共发表论文226篇。内容包括原始社会、夏商、两汉、唐宋等考古学,汉画等艺术,楚文化,古代建筑和石刻,古墓及壁画和墓志,佛教史和佛教艺术,陶瓷、冶金铸造、地震、水文等科技考古,博物馆学研究等。精华荟萃,琳琅满目,显示了文博战线的丰富成果。

还要提及的是,1987年4月出版的《中原文物》另一本特刊——《河南考古文献叙录》,汇集了1913~1985年间全国的主要古籍、报刊(包括地方报刊、内部资料和少量明清时期的志书)中有关河南文博考古方面的文章和数十种专著,收录3000余条,并附有内容提要,概括、扼要地提炼出文章的精华,共计80万字。为文物和史学工作者查阅河南的文博、考古文献资料提供方便。1983年还出了一期《中原文物》增刊——《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专集》,刊登了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考古发掘部门、文物收藏保管陈列部门、城市建设部门、金属冶炼部门、物资回收部门、大专院校等单位所写的文章,从各自不同的岗位,宣传贯彻文物保护法。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用丰富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去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除此之外,《中原文物》的重要收获是锻炼了干部队伍,推动了全省文博事业的发展。到1987年3月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原文物》(包括特刊和增刊)已发表各类文章近1300篇,约800余万字。我省广大文博工作者,把考古发掘、文物陈列、科学研究的成果,发表在《中原文物》上,使老一辈专家们,学力更加深厚;使步入中年的业务骨干,日益有所进步;使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成了名符其实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学术职称,他们的工作成就,可以说与《中原文物》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原文物》是我省培养专业人才的一所学校。

《中原文物》不但在国内发行,每期还向国外发行500多册。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其影响已飘扬过海,到达大洋彼岸。

如前所述,这是省内外广大文物工作者劳动的成绩,也是《中原文物》编辑部全体同志努力的结果。《中原文物》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宣传了伟大祖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力量。在祖国的"四化"大业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让人们看到了河南省博物馆60年走过的历程。使我们更加相信,我省的博物馆事业一定更加兴旺发达。在即将开始的第二个60年里,必将登上新的高峰。

(原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2期)

十年耕耘　十年收获

——纪念《华夏考古》创刊十周年

1987年，经有关部门批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华夏考古》问世了。这使得号称文物大省的河南，又增加了一个文物考古专业性、学术性、资料性的刊物。十年间从幼苗长成大树，生机勃勃，在学术界留下了铿锵的声音和坚实的足迹。

十年来，《华夏考古》一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发表了许多考古发掘报告、简报，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经济建设，并传递了重大考古发现的信息，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同时还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反映了国内的学术水平。这些都为弘扬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为我国文物保护和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华夏考古》已出版了38期，所发表的大量田野考古调査和发掘资料，概括了中原大地和国内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产生之后用勤劳的双手同大自然搏斗的时代，是一个包括几十万年以至几百万年缓慢发展而又惊心动魄的时代。《1987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介绍了南召小空山上洞和下洞发现的一批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石核、石片等石器，以及牛、鹿、野猪、最后鬣狗、犀牛、方氏鼢鼠、棕熊、普氏野马等动物化石。这是河南近年来发现的一处重要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记述了这里的地貌与地层，介绍了出土的石核、石片、石锤、石钻和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石器。根据石器打制技术和特点，以及与邻近地区（陕西大荔、河南三门峡、山西匼河和丁村）旧石器文化比较，证明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的遗址，早于著名的丁村遗址。《湖南澧县张家滩、仙公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湘北澧阳平原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湖南澧县皇山岗旧石器遗址调查》等，集中报道了湘北澧县一带发现的为数众多的旧石器地点。在这些旧石器地点采集到大量各种类型的用砾石制作的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球、网坠、石核、石片等，显示了我国南北旧石器时代工艺的某些特征，表明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古人类在这里的平原地区生活。这些考古发现对长江中游旧石器考古有着重要意义，使湘北成为研究新、旧石器时代的更替和原始农业起源最理想的地区之一。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建国以来的重大考古发现。《华夏考古》发表了几篇关于裴李岗文化的考古报告。《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长达10余万字，着力介绍了长葛石固裴李岗文化的分期和丰富内涵，并从地层叠压和器物演变论述了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传承关系。《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首次把这处著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公

诸于世。其中一些典型的红陶器,墓内随葬龟壳中放置的各色小石子,以及造型别致的骨器,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登封双庙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调查与试掘》介绍了颍河流域发现的又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下层堆积可能属裴李岗文化的范畴。

仰韶文化处于我国原始社会重要的发展阶段,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解体甚至迈人父系氏族社会门槛的漫长历史岁月。《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介绍了豫东北这处因发现三组用蚌壳摆塑的大型龙、虎图案而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为研究原始宗教信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郑州后庄王遗址的发掘》介绍的是一处50年代发掘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文化堆积丰厚,延续时间很长,房基、窖穴等遗迹甚多,成人墓和幼儿瓮棺葬很有特色。《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报道了一处新发现的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精美的彩陶,其上层还有龙山文化遗存。《山西省侯马市上北平望遗址调查简报》介绍了晋南地区仰韶文化的面貌,并为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登封八方、双庙仰韶文化遗址的试掘》记述了豫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历程。《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调查与试掘》第一次披露了八里岗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址的资料。其后又在这里发掘出保存较好的连间长排房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龙山文化是原始社会末叶到阶级社会产生之间的重要历史时期,其分布遍及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其影响达到北方内蒙古一带和南方长江流域。《郑州市站马屯遗址发掘报告》揭示了这处涵盖龙山文化早中晚期遗存的面貌。《河南灵宝涧口遗址发掘报告》为豫西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期,以及这一地区由仰韶文化晚期经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为当地的龙山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河南乳香台遗址的发掘》介绍了苏鲁豫皖交界地区龙山文化的内涵。临汝煤山遗址是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著名遗址,对探索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介绍了这方面的新资料和研究成果。《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全面介绍了郝家台龙山文化遗址的分期与丰富内涵,特别是龙山文化古城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重大价值。

除了上述新石器时代诸文化考古发掘报告、简报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新石器时代的和综合性的资料,也令人注目。《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属于苏鲁豫皖考古课题的发掘成果,栾台遗址内涵丰富,包括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东周文化,连绵两千多年而无间断,为这一地区考古学编年奠定了基础。《山西陵川县大泉头发现细石器》的作者认为,大泉头细石器应属新石器时代,与下川文化关系较为密切,这填补了太行山东南端细石器遗存的空白。《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反映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关系。淅川黄楝树是重要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同时也有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遗存。该遗址不仅有屈家岭文化的布局略呈庭院式的25座房基,而且还出有精美的彩陶壶、塔式高柄黑陶杯、丰富多彩的陶纺轮,以及稻粒、粟粒等。《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记录了该遗址的上述重要考古发现。《1991年河南罗山考古主要收获》,概述了罗山草袋厂、王台子、梨园堆、方湾、董堆、龙井、钓鱼台、李上湾、擂台子等遗址的考古调查成果,找到了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龙山文化早中晚期,以及商周文化的丰富内涵,为探讨淮河流域古代文化面貌及与周邻文化的相互作用这一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山东章丘龙山三村窑厂遗址调查简

报》概述了三村窑厂遗址既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遗存，还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迹和遗物。《河北磁县境内牤牛河两岸考古调查》介绍了一批属于冀南、豫北一带“涧沟型”龙山文化遗址，还有一些所谓“先商”的遗迹。其中袁家坟遗址又叫“共工台”，按其方位、名称及文化内涵，作者引用邹衡先生的论点，认为这里可能与共工氏有关。《山东省邹平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概述了西南村、古王台、里六田、佛生、芦泉、台头、古城、夫村、东阿陀、东台、郭庄等遗址的情况，这些遗址涵盖了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文化的丰富遗存。《山东章丘市小荆山遗址调查发掘报告》报道了一批房基、灰坑和墓葬及十分丰富的出土遗物，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李文化的遗址。

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的文化范畴，这些年来，确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介绍了郑窑遗址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对夏商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郑州洛达庙遗址是一处比偃师二里头发现还早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文化层堆积很厚，早中晚期一脉相承，曾被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对此进行了介绍。《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详述了巩县稍柴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地点之一。《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和《河南杞县牛角岗遗址试掘报告》介绍了杞县两处二里头文化遗址，这里是二里头文化遗址西渐的重要地点，对探索夷、夏、商三族文化相互关系十分重要。《河北省永年县何庄遗址发掘报告》揭示了这处位于冀南的早商文化遗址。

属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文化和商代后期的殷墟文化，也有不少考古发现。《许昌县大路陈村发现商代墓》、《郑州市石佛乡发现商代青铜器》、《焦作南朱村发现商代墓》分别介绍了以上三地商代墓出土的青铜器。《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报道了发掘的铸铜遗迹和墓葬等，尤以出土的40多件卜骨，格外引人注目。《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揭示了郑州商城手工作坊制陶工艺的全过程。《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详述了这处距郑州商城20公里的商代王室祭祀遗址，该遗址发现有夯土台基、青铜建筑构件、牛头牛角祭祀坑、朱书陶文和冶铜遗物。小双桥与郑州商城近在咫尺，且时代与郑州商城晚段相同，二者当有密切关系。《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安阳市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介绍了近年在殷墟发掘的一大批殷代墓葬，其中有“异穴并葬”墓，也有带壁龛的墓，有些还出土带铭青铜器，有相当学术价值。《江西鹰潭角山窑址试掘简报》记述了角山发现的商代窑址和数量众多的陶器及原始瓷器，还在陶器或制陶工具上，发现有不少刻划符号和陶文，对研究商代南部方国的面貌、制陶瓷工艺和商代文字有重要价值。《湖南涔澹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比较重要，这是迄今为止湖南发现的第一座商代铜器墓，出有铜觚和铜爵，其形制与安阳殷墟文化早期所出同类器相同。

两周时期尤其是东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也为数甚多，平顶山应国墓地的发掘是近些年西周考古的重要收获。《平顶山市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首次披露了北滍村应国墓地考古发掘资料，墓内出有五鼎六簋等青铜礼器，还有玉器和车马器，当是应国贵族的墓葬。《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的发掘》报道了一座西周中晚期墓葬，该墓随葬器物400多件，其中许多青铜礼器上有铭文，也当是地位较高的应国贵族墓葬。《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报道的是一处内容特殊的西周晚期遗址，发现有当时养鱼的长方形坑

池，出土有鱼罩、鱼篓、竹筐等捕鱼工具，还有进行渔业生产用的桨、橹等木漆器，以及原始瓷器和陶器，甚至还出有草鞋，反映了豫南地区在西周晚期已成为鱼米之乡。三门峡虢国墓地在50年代就有重要考古发现，90年代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介绍了M2001的重大考古发现，该墓随葬器物3200余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还有玉礼器、装饰玉器，以及金饰、象牙器、棺饰等。最珍贵的是一批带"虢季"铭文的青铜礼器、玉茎铜芯铁剑、金腰带饰、缀玉面罩和玉佩饰等。这应是虢国国君之墓。《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发掘简报》、《三门峡市机械厂车马坑的发掘》介绍的都是与虢国有关的重要遗存。新郑郑韩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郑韩故城制骨遗址的发掘》、《郑韩故城内战国时期地下冷藏室遗迹发掘》、《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制陶作坊遗迹发掘报告》、《河南新郑新发现的战国钱范》等4篇发掘报告，反映了这些年来在郑韩故城手工作坊和宫殿地下建筑等方面的重要考古收获。《宁夏固原于家庄墓地发掘简报》记述了该地大批墓内除随葬铜器、陶器外，还普遍以牛、马、羊的头、蹄骨随葬，这应是属于东周时期从事畜牧畋猎的古代戎族的墓地。

楚文化源于河南，繁荣于中原和长江中游，是两周时期最为辉煌的文化之一。《河南正阳苏庄楚墓发掘报告》、《河南省叶县旧县一号墓的清理》、《上蔡砖瓦厂四号战国楚墓清理简报》、《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的发掘》、《河南淅川大石头山楚墓发掘报告》和《河南淅川吉岗楚墓发掘简报》等6篇发掘报告，介绍了豫南广大地区楚墓的考古发现。其中尤以淅川和尚岭两座春秋楚墓最为重要，出土了一大批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乐器，还有一批精美的玉器。在1号墓的乐器上有铭文，铜鼎上有"克黄"等铭文，作者推断墓主可能是文献记载的楚箴尹克黄。

短暂的秦王朝在河南也留下了遗迹和遗物。《河南泌阳县发掘一座秦墓》介绍了泌阳县发现的一座秦代双棺夫妇合葬墓，该墓出有一批包括蒜头壶在内的青铜器，还有一些玉器，木棺底部留有少量水银。《三门峡市司法局、刚玉砂厂秦人墓发掘简报》、《三门峡市秦人墓发掘简报》、《三门峡市火电厂秦人墓发掘简报》等3篇考古报告，介绍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秦人墓的形制，墓中出土有一批带秦人风格的铜器和陶器，有些陶器上还印有"陕亭"等戳记，这些与西安、大荔的秦墓所出遗物相同或相近。此外，《洛阳钢厂秦墓发掘简报》介绍了那里发掘秦人遗迹遗物的收获。

汉代是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河南更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在东汉，洛阳为繁华帝都，南阳是皇室故里，遗留的文物之丰富是不言而喻的。《华夏考古》发表了不少汉墓的发掘资料，其中不乏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主要有《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密县后士郭三号汉墓调查记》、《焦作白庄41号汉墓发掘简报》、《郑州市南仓西街两座汉墓的发掘》、《河南南阳县蒲山汉墓的发掘》、《河南新郑河赵一号墓的发掘》、《河南长葛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河南密县新商场汉墓和陶窑的发掘》、《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安阳梯家口村汉墓的发掘》、《三门峡市华余包装公司16号汉墓发掘简报》、《三门峡市立交桥西汉墓发掘简报》、《三门峡市刘家渠汉墓的发掘》、《洛阳孟津汉墓发掘简报》、《河南省泌阳县新客站汉墓发掘简报》、《洛阳30号墓出土的三角缘画像镜》、《河南淅川汉

画像砖墓发掘报告》、《南阳第二胶片厂汉墓发掘报告》、《宁夏固原汉墓发掘简报》、《密县周岗汉画像砖墓》、《山东寿光县三元孙汉墓》、《荥阳康寨汉代空心砖墓》、《济源赵庄汉墓》、《巩义市五铢钱纹空心砖》、《1995年新乡火电厂汉墓发掘简报》等。除了涉及宁夏、山东少量汉墓之外，多为河南的汉墓发掘资料，包括画像石墓、画像砖墓、砖室墓、凿山为藏的崖洞墓。其中密县后士郭三座汉墓为砖石混筑结构多室墓，墓内西室和后室均有"祭台"，墓壁有细线刻画像石和彩绘壁画，出土的陶仓楼上绘有"收租图"，这些反映了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社会生活。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包括著名的梁孝王墓以及分布在各个山头上的其他梁王、王后墓，皆为规模宏大的石室墓，出有金镂玉衣、青铜器、陪葬俑，还发现以龙、虎、朱雀、云气为内容的大型壁画。这些陵墓集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于一体，对研究西汉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建筑、石刻、绘画、文字、礼制和葬俗等都有重要意义。

除了墓葬发掘之外，还有其他汉代遗迹遗物的资料报道。冶铁是汉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河南省新安县上孤灯汉代铸铁遗址调查报告》、《信阳钢厂毛集古矿冶遗址调查报告》、《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河南省五县古代铁矿冶遗址调查》等，介绍了河南境内汉代冶铁的考古发掘资料。其中《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长达10多万字，内容包括西汉熔炉、锻炉、炒铁炉、烘范窑、水井、水池等遗迹，以及耐火砖、鼓风管、各种铸范、各种铁器等遗物，向人们展现汉代大型冶铁作坊的面面观。《福建崇安汉城出土的青铜器及有关问题》介绍了著名的福建崇安城村汉代城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其中包括为数甚多的铜镞和弩机，弩机上刻纤细铭文，均系西汉河内郡设于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的工官所制，还有铎、钟、蟠螭纹镜、鎏金车马饰等来自中原的青铜器，以及被称为"越式"鼎等有地方特点的青铜器。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封闽越王无诸于崇安汉城，闽越立国92年，后因东越王余善叛汉，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被镇压，徙民于江淮间，城被焚为废墟。考古发掘印证了这段历史。

魏晋以降，历经战乱。隋唐时代，我国封建社会达到全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至宋金元明，国势由盛到衰，这些也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反映。

介绍魏晋墓葬的发掘资料有《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报告》、《洛阳孟津三十里铺西晋墓发掘报告》、《河南省南阳住宅修缮公司晋墓发掘简报》、《西晋王氏砖志》；反映唐代墓葬的发掘资料有《陕县唐代姚懿墓发掘报告》、《三门峡市两座唐墓发掘简报》、《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发掘报告》、《三门峡市水工厂唐墓的发掘》、《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洛阳北郊唐代墓葬的发掘》；有关宋金元明墓葬的发掘资料包括《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河南新安县古村北宋壁画墓》、《三门峡北宋墓发掘简报》、《河南省陕县化纤厂宋墓发掘简报》、《三门峡市峭山西路发现三座古墓》、《河南宝丰县李坪村古墓》、《河南温县西关宋墓》、《河南荥阳城关发现两座金墓》、《义马市金代砖雕墓发掘简报》、《河南鹿邑涡河船闸金墓发掘简报》、《洛阳孟津县麻屯金墓发掘简报》、《辽宁朝阳县联合乡金墓》、《河南孟县宁玉墓的调查》、《沁阳市出土的朱载堉残碑》、《南阳市出土两方明武略将军墓志》等。上述墓葬中，陕县唐姚懿墓出有墓志，墓前还有墓碑，记述不少史料。姚懿在隋末任硖石县令，唐初任嶲州都督，其子姚崇，历任中宗、武后、睿宗、玄宗四朝宰相，甚有影响。元德李后陵是宋太宗赵光义永熙陵的祔葬后陵之一，墓前有鹊台、乳台、神道和一批石刻，

墓四周有宫城，尚存门狮和角阙，墓上为覆斗形陵台。地宫为砖砌单室墓，由斜坡台阶墓道、砖券拱形甬道和圆形穹窿顶墓室组成。石质墓门上有线刻武士像，墓室内有砖雕和壁画，砖砌斗拱上有彩绘。出土有玉谥册和玉哀册，还有越窑青瓷龙纹大盘、定窑白瓷碗、龙纹方砖及其他珍贵文物，这对研究北宋历史、皇陵葬制、建筑、石雕艺术、瓷器烧造等有重大价值。孟县宁玉墓为元大德六年所葬，宁玉曾任元镇国上将军、浙西道都元帅。其墓志介绍了他的生平，还涉及元代的军事和航海方面的史料，考虑到元代墓葬历来发现较少，其学术价值就更重要了。朱载堉为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辞爵让国，一生潜心从事科学研究，是闻名世界的自然科学家和音律学家，其墓碑虽残，但资料却弥足珍贵。

唐宋时代是我国瓷业发展的兴盛时期。《河南鲁山段店窑的新发现》介绍了出土的唐代花瓷，包括腰鼓、注子、缸、罐、瓶、盆、碗、盘、钵、炉、枕、盒等，还有从唐到元的黑釉瓷，唐宋的青釉瓷、白釉瓷、黄釉瓷、白地黑花器、珍珠地刻花瓷器、三彩器，宋金酱色瓷器，宋代天目瓷、钧瓷等，种类繁多，展示了一处从唐到元历经数百年大型民间瓷窑址的风貌。《河南宝丰发现窖藏汝瓷珍品》记述了在宝丰清凉寺北蛮子营村发现的 47 件窖藏瓷器，包括盘、碗、钵、盂、瓶、洗等，作为宫廷贡瓷的次品也很精美，当是清凉寺窑的产品。《宝丰清凉寺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介绍了这处汝官窑址的重大发现，发掘出作坊、房基、水井、澄泥池、灰坑等遗迹，出有一大批各种釉色、各种造型的瓷器，其中以天青釉汝瓷器最为名贵，器形有碗、盘、器盖等，在宋瓷中占有突出地位。《许昌市南关宋代商业遗址的发现》披露了一处以瓷器交易为主的商业遗址，该遗址出土一批宋代铜钱和为数众多的汝瓷、白瓷、影青瓷、酱釉瓷、黑釉天目瓷及宋三彩等，属于多个窑口的产品。

此外，《华夏考古》还刊登有金代和明代古矿冶的考古资料。《河南省灵宝秦岭古金矿遗址调查》记述了 60 年代在这里勘察出的古金矿洞 800 多个，这是明清开采金矿的遗存。在金洞岔的双梯子沟的洞口上，还刻有“景泰二年（公元 1451 年）开洞三百余眼”的题记，说明远在明代前叶甚至更早这里已经大规模开采金矿。有的洞口还有“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 年）的题记，可以看出延续时间很长。矿洞内出有铁灯、瓷碗、瓷瓶、瓷片、水桶、铁镢、铁钎，洞外的山间小道旁，有粉碎金矿用的石碾盘、石滚、石槽等工具。这些反映了古代开采金矿的工艺技术。《河南栾川红洞沟银铅锌共生矿冶遗址调查》介绍了 30 余处古矿洞，洞壁有铁钎凿痕，洞内有巷道，出有铁锤、铁钎、瓷碗、瓷罐和品位很高的矿粉等。洞外两溪汇流的三角地带，发现有冶炼遗址，出有红烧土块、炼渣块、素面和条纹瓦片、黑釉瓷罐片等。经专家考证，这里是金代和明代的银铅锌共生矿冶遗址。

《华夏考古》十年来发表的大批有相当水平的学术研究论文中，包括苏秉琦、胡厚宣、安金槐、邹衡、蒋若是、王仲殊、黄盛璋、张忠培、黄景略、严文明、吴汝祚、李伯谦等名家的文章，为刊物增添光彩；还有杜金鹏、陈雍、陈星灿、曹兵武等后起之秀的文章，特别是发表了一批很有建树的考古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为刊物注入了活力。

1992 年是《华夏考古》主办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这年第 2 期《华夏考古》刊登了苏秉琦先生于当年 5 月 25 日为此而写的一段题词：“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的中国考古学有很大发展，近十多年成果最为显著，近几年变化尤大，是一大转折。

在此之前，重点是资料积累，基础理论建设；现在则已转到重建中国古史。这是涵盖古今，涉及中国在这个世界村中，当代中国人在当代进步人类中占一个什么样位置的问题，对此我提出如下两点：第一，区系观点是个纲，纲举目张；第二，文明起源（起步、开始）是把'金钥匙'。现在，重要的突破发现一个接一个，我们对它们的深入认识（研究）刚刚起步，这正是我们在前沿阵地实地工作者发挥创造才智的良机，还应清醒地认识它是当代改革大潮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愿与同行朋友们共勉。"这对全国文物考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文物考古工作者也是很大的鼓舞与鞭策！

《华夏考古》发表的诸多论文中，时代早的是关于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甚至上溯到曾轰动一时的西峡远古恐龙蛋化石的研究。《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群出土地——西峡盆地地貌初步研究》科学分析了西峡盆地的地貌基本特征，主要地貌类型及其分区，地貌演化规律和形成机制等学术问题。《南召小空山上洞与房县樟脑洞——汉水流域两个晚期旧石器洞穴遗址的比较》和《试论小空山下洞旧石器遗址的年代》，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汉水流域晚期旧石器文化的特征，以及我国南北方晚期旧石器的相互关系。《山东旧石器文化概论》研究分析了山东沂源、沂水、日照、新太、莒南、郯城、蓬莱、长岛、海阳等地发现的几十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并认为这是后来光辉灿烂东夷文化的基础。《中国的旧石器地点群》论述了旧石器地点群是一种遗存形态，它由集中分布在一定区域、具有相同文化特征和属于同一时代的多个石器地点组成。

近十年来，对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原始社会聚落考古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在中原和周边地区有较大影响。《关于裴李岗·磁山文化的定名及其年代问题的探讨》、《关于裴李岗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裴李岗文化墓地初探》、《河南裴李岗文化的分布和地域类型》、《裴李岗·磁山文化长条形石铲辨——试论其文化的农业阶段及经济状况》、《关于裴李岗文化一支西迁的几个问题》、《裴李岗墓地新探》等文章，对100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分布和地理环境、墓地的布局和基本特征、地域类型和年代分期、文化渊源与发展、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论述和研究。

研究仰韶文化的文章就更多，主要有《关于郑州大河村遗址若干房基相对年代探讨》、《鄂西北仰韶文化及同时期文化分析》、《仰韶文化的美术考古简述》、《关于濮阳西水坡发掘简报及其有关的两篇文章中若干问题的商榷》、《北首岭新石器时代遗存再探讨》、《秦王寨文化研究》、《陕晋豫地区仰韶晚期遗存的若干问题》、《关于濮阳西水坡蚌壳龙虎陪葬墓及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兼答言明提出的几个问题》、《半坡文化研究》、《半坡文化彩陶鱼纹的分类系统》、《仰韶文化陶鼓辨析》、《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以龙岗寺、元君庙和姜寨三处墓地为分析对象》、《姜寨一期墓地再探》、《姜寨聚落再检讨》等。上述文章有的用聚落考古的研究方法，对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北首岭遗址等的分期与年代、分布与类型、渊源与流向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的文章探讨了秦王寨文化的分期、分群、分区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有的文章以古朴生动的原始绘画、精湛的原始雕塑艺术，分析仰韶文化的美术考古资料，并认为这是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观察客观事物并且从事艺术创作活动的成果。有的文章分析探讨了龙岗寺聚落年平均人口约55人，平均寿命

33.03 岁;元君庙聚落年平均人口 55～62 人,平均寿命 27.9～29 岁;姜寨聚落年平均人口 181～202 人,平均寿命 36.8 岁。尽管会有误差,但这种研究成果还是很引人注目的。还要指出的是,1991 年 4 期和 1992 年 1 期连续发表的《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的早期研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对瑞典学者安特生给予公正的评价,阐述了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和现代田野考古学中的杰出贡献。尤其是 1921 年仰韶遗址的发掘,他肯定了仰韶文化是中国的史前文化,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并在考古断代分期和类型学方面也做出成绩。

还有一批关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文章。涉及到龙山文化的研究文章有《尚庄遗存与后岗类型》、《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的分期及其源流》、《试论豫东西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等。关系到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文章有《大汶口文化探源——纪念大汶口遗址发掘三十年》、《论大汶口的合葬墓》等。研究北方红山文化的文章有《丰产巫术与祖先崇拜——红山文化出土女性塑像试探》等,涉及到屈家岭等文化的文章有《试论屈家岭文化的社会性质》等。有关大溪文化的文章有《试论大溪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等。涉及良渚文化的文章有《试析浙江余杭反山、瑶山两良渚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各个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外,还有一批颇有特点的研究新石器时代的文章。如《试论江苏常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及其有关问题》、《试析寨茨岗遗址的文化性质》、《史前居室葬俗的研究》、《近十年河南原始社会考古的重要发现与研究》、《黄河流域史前合葬墓反映的社会制度的变迁》、《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渔猎经济的考察》、《初探中原和渭河流域的史前农业及其有关问题》、《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谱系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成就》、《中国史前玉器概述》、《中国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木器的应用》、《从民族学有关资料看中国早期新石器遗址的经济文化类型》、《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陶鼎研究》、《河南辉县及其附近地区环境考古研究》、《鹿台岗遗址自然崇拜遗迹的初步研究》、《鲁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认识》、《对黄河下游青莲岗时期诸类文化遗存的认识》、《简论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与研究》、《试析史前遗存中的家畜埋葬》、《略论长江、黄河两流域史前时期的太阳崇拜》、《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等。这些文章有的是全面综合论述,有的是针对特定地域或特定文化内涵,有的是研讨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文化序列,可谓内容丰富,引人入胜。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受到了《华夏考古》的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与中国文明》、《试论中原地区国家的起源》、《从龙山文化谈起——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几个有关问题》、《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等文章,均对这个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作了深层次高水平的探讨。

探索夏文化也是建国后重要的考古课题之一。《华夏考古》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关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及其意义》、《保北地区夏代两种青铜文化之探讨》、《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兼论夏代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与先商文化异同看其性质归属》、《论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

《夏文化内涵特征疑问》、《与肖冰先生商谈夏文化的内涵问题》等。还有一些文章是把夏商放在一起论述的，如《河南夏商考古综述》、《试论燕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兼谈燕南地区所谓"夏家店下层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十年来河南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试论曲梁、岔河夏商文化遗址的分期》等。这些研究成果与发表的有关夏代的考古资料一样，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对于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积极意义。

商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历来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头戏。《华夏考古》发表的有关商代前期的文章有《商都西亳略论》、《对于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分期的再认识》、《试论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的渊源——兼论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关系》、《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研究》、《关于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性质的探讨》、《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略论藁城台西商文化遗存》、《台西遗址漆器的渊源及遗址文化性质的探讨》等。有关商代后期的论文有《安阳小屯 F36 坑与贞人衎的卜辞》、《关于殷墟初期王陵问题》、《安阳小屯非盘庚始都辨》、《论安阳苗圃北地殷墟一期墓葬文化》、《试析殷墟墓地"异穴并葬"墓的性质——附论殷代社会婚姻形态》、《司㚸母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之七》、《"干支"记事刻辞及其相关问题》、《辉县商代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商代的巫医交合和医疗习俗》等。有关商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有《殷代的"竹"与"孤竹"——从殷墟"妇好"墓石磬铭文论及辽宁喀左北洞铜器》、《甲骨文、金文"戈"与殷商方国》、《角山刻符初步探讨》、《商代玉石文字》、《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青铜立人像试释》、《川西平原的蜀文化与商文化入川路线》、《说"来见"》、《"亚丑"推论》、《释"奴娟"并兼论相关问题》、《卜辞语辞丛释》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商代综合研究的文章，如《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河北商文化综述》、《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商代玉器》、《水系·古文化·古族·古国论——渭水流域商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分析》、《京、津、冀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分期及文化因素分析》等。这些商文化的研究论文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说，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显示了近些年商代考古领域内学术研究的一定水平。

西周时期，奴隶社会由发展逐渐走向衰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则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其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有些文章是商周连在一起研究的，如《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殷人与周人的体质类型比较》、《邹县、兖州商周时期墓葬人骨的研究报告》；也有文章是探讨周族起源的，如《从唐叔虞之封论周族的起源》等；还有文章涉及到两周的，如《山东诸小国铜器研究——〈两周金文大系续编〉分国考释之一章》、《近十年来河南两周考古的新收获》；有关西周的研究论文有《关于"西周夔纹铜禁"问题》、《论西周金文的六师、八师》、《西周漆器概述》、《西周洛邑城址考》、《䣄国与䣄国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九号墓年代、墓主及相关问题》、《邓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等；又有一些属于研究两周之际的文章，如《从虢国墓地考古新发现谈虢国历史概况》、《浅论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从虢国墓地缀玉面罩看古之"琀玉"》等；关于东周的考古论文也发表不少，如《徐王子旃钟与徐君世系》、《战国时期地下冷藏遗迹初探》、《山东地区东周考古学文化序列》、《山东出土莒之铜器及相关问题综考》、《耸肩尖足空首布考辨》；在有关东

周的文章中楚文化研究更引人注目，诸如《河南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楚系文字略论》、《从信阳楚墓出土的木制品看战国早期的细木工榫接合工艺》、《鄀国历史地理探疑——兼论包山楚墓的年代和史实》、《楚国乐舞研究》、《浅谈楚舞蹈艺术》等。

秦汉以降，有关各个朝代的研究文章也不少。有关秦代的文章有《泰山顶无字碑为秦封志石辨》、《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论先秦半两钱》，还有综合研究秦汉的文章，如《十年来河南秦汉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等；关于汉代考古研究的文章有"河南汉代画像石的分布与区域类型》、《东汉墓碑溯源》、《密县打虎亭汉墓墓道填土中残石刻画像探讨》、《汉墓壁画的布局、内容和风格》、《山东汉代墓葬形制初论》、《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及相关问题》等；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文章有《近十年来河南魏晋南北朝考古的主要收获》、《陵墓有翼神兽石刻的发展及其艺术源流》、《响堂山石窟的凿建年代及分期》；有关隋唐考古研究的文章有《中州唐志跋尾六则》、《十年来河南隋唐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唐代的畋猎弋射与丝绸之路》、《孟津唐岑氏夫人墓墓志及伎乐俑的研究》、《"大唐故荆府长史孙府君之碑"考略》、《南响堂山石窟唐代小龛初探》、《巩县黄冶窑唐三彩的造型与装饰》、《唐代玉器》等；有关宋代考古研究的文章有《十年来河南宋元考古概述》、《近十年来河南陶瓷考古的新收获》、《河南影青瓷的起源与发展》、《关于钧窑与汝窑的若干问题》、《汝窑中的御用汝瓷及相关问题》、《宋元德李后陵的玉册及册匣考》、《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等。上述文章涉及面较广，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还要指出的是，《华夏考古》也发表一些中国学者研究国外考古的文章。其中有《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的交往》、《谈谈日本九州早期铁器来源问题》、《认知考古学在欧洲的兴起》、《泰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等。这类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也足以开拓人们的视野。还发表了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的文章，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撰写的《殷墟五号墓和殷墟考古学中关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问题》、《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宗教与王权》以及《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阐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宗教、龙山文化与宗教祭祀、中国青铜器时代与中华文明的繁荣等学术问题。《考古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运用新思路来研究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问题。《韩国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动向》介绍了目前韩国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情况。《卑弥呼的铜镜百枚》记述了曹魏时期中国向倭国女王赠送一批铜镜，并研究了在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学术争论问题。《东南亚的社会组织与长房》阐述了多居室住房在大陆地区与父系氏族社会相一致，在印尼则与母系氏族社会相依存的问题。《古代九州的冶铁生产》介绍了日本九州在弥生时代冶铁生产的情况。《作为人类生态学的考古学》论述了古代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朝鲜半岛初期铁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地域性为中心》介绍了中国自战国到东汉时期对朝鲜半岛铁器的传播和影响。

《华夏考古》的十年，是耕耘的十年，也是收获的十年，从创刊之日起，一直坚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版式设计严谨，封面设计不断改进，力求新颖，并能体现刊物的特色。每期除刊登田野考古报告和考古文物研究文章之外，还设置有考古技术和文物保护、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古文学研究、译文园地、讨论与争鸣、文物鉴赏、书评等栏目，图文并茂，琳琅满目。

本刊能够严格遵守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及出版印刷等有关规定，在选稿、内审、外审、编辑、校对、发行等每一个环节上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用字规范，从不滥用繁体字和非正规的简化字。同时，用好纸精印，装帧大方，按期出版。虽然《华夏考古》创刊较晚，但仍然得以在社会文化阵地上有牢固的立足之地，并且逐步得到发展。

为了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华夏考古》自 1992 年第 1 期起，为刊用的考古报告、论文配发英文提要。此举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好评，为外国学者了解古代中国文明、了解华夏大地的考古成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同时，还积极扩大发行量。目前《华夏考古》每期国内发行 2000 余本，国外发行 200 余本。不仅在国内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真可谓立足河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由于上级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学界人士的支持与厚爱，《华夏考古》多次受到表彰和肯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为便于海外读者订阅，特从全国 6000 多种报刊中精选 1500 余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 年 10 月 5 日第 8 版上推荐给海外读者，《华夏考古》赫然也在其中。1994 年，《华夏考古》荣获河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期刊，河南省文化厅为此下发文件进行表彰。1995 年，又荣获河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期刊和河南省一级期刊。1996 年，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提名奖。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

在上述荣誉背后，还包含了我们仅有五人组成的《华夏考古》编辑部同仁的劳动与汗水。大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作为主编，我不能不向坚持在《华夏考古》实际工作的其他四位同志表示敬意和感谢！他们是方燕明、胡永庆、辛革和王胜利。

《华夏考古》已走过了十年，正如笔者的大学同窗好友——中央美术学院汤池教授为祝贺《华夏考古》创刊十周年题词所写的：

物华天宝数中原，
三代考古着先鞭；
办刊何惧人憔悴，
严谨学风众口传。

在即将开始的第二个十年里，《华夏考古》必将再创辉煌。

(原载《华夏考古》1997 年第 1 期)

书序篇

《郑州商城初探》前言

郑州地处中原，是河南省的省会。地势西高东低，北临黄河，西南傍依嵩山余脉，东边毗连豫东大平原；西部有汜水、京水、索水流经境内，金水河、贾鲁河和熊耳河则穿过市区向东流去。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物质丰富，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早在新石器时代，郑州地区已经聚集着一些氏族和部落。在大河或小溪旁边，分布着许多原始社会的村落，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在这块沃土上劳动、生息、繁衍。人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盖起了茅屋，以遮风雨；刀耕火种，收割庄稼；修筑围栏，饲家养畜；用弓箭和弹丸射杀野兽，用鱼叉和鱼网捕捉鱼虾；顽强地和大自然搏斗，以求生存。日月交替，寒暑更迭，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过去了，经过沧海桑田的变化，历史给这里留下了大河村、秦王寨、青台、点军台、林山寨等仰韶文化遗址，马庄、旭旮王、后庄王、牛砦等龙山文化遗址，在这里还留下了夏末商初丰富的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址，以及南关外期文化遗存。到了商代前期，在郑州筑起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垣。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是灿烂的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上升的历史时期。据《竹书纪年》、《史纪·殷本纪》等古代文献记载，从商汤建国，到殷纣灭亡，共经历十七世三十王。相当于公元前 16 世纪到公元前 11 世纪，大约有五六百年的时间。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安阳“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 273 年商代后期的都城。但对于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文化面貌，却几乎是一所无知。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段历史的部分空白，使人们对商代文化的认识为之耳目一新。

郑州商城，是一座比安阳殷墟更古老的商代王都。建筑宏伟，气势磅礴，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

在郑州商城内，发现有巨大的宫殿建筑；在城外，发掘出多座铸铜、制陶、制骨的手工作坊遗址；还发现有不少墓葬、房基、水井、壕沟。在这些遗址内，出土大量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蚌器和刁刻字骨，其中很多是稀世的瑰宝。郑州商城和全国其它重要历史文物一样，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

本书通过近 10 万言的文字、117 张照片和 22 幅插图，全面展示了郑州商城的历史面貌。分十五章论述了郑州商城的发现，又从四面城墙的地层叠压关系，论证了郑州商城的考古年代，据碳 14 测定距今约 3500 年左右。同时介绍了郑州商城的营建，以及宫殿区、

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的分布。从考古发现看,郑州商城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还有相当发达的铸铜、烧陶、制骨、制玉、黄金冶炼、木漆器、纺织、编织、酿酒等多种手工业,还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和交通。书中论述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这是郑州商城重要的考古成果。与之相对的是简陋的平民与奴隶的住所。通过郑州商城出的青铜器、玉器、陶塑和乐器、卜骨及文字等,介绍了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郑州商城的性质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专家认为是仲丁的隞都,有专家认为是汤之亳都。本书以四章的篇幅论证分析了"汤都亳说"和"仲丁都隞",后者理由似乎更充足些,但目前还得不出一个共识的答案。

郑州商城的探索与研究,都是以考古发掘的遗迹和遗物为基础的。郑州商城的这些遗迹和遗物,闪耀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力量的光辉,是揭露奴隶主贵族的奢华与凶残的铁证,也反映了奴隶们悲惨生活的图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郑州商城进行系统研究,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感情,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重大意义。

我们认为,方志的编修将促进对各方面专题的研究,而种种专题研究,将为方志的编修提供比较系统、翔实的资料,对某些问题作出比较科学的论证。本着这种见解,我们在编修方志的同时,准备组织力量陆续编些专题研究的文章和书籍,《郑州商城初探》就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们希望从选题到撰写,能够得到多方面的合作和支持,共同为史志学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微薄的贡献。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专家和广大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原载《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河南考古》序言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河南地区则是摇篮里的一颗明珠。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日月交替,沧桑更迭,漫长的历史岁月过去了,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被掩埋在地下,散落于荒烟野蔓之间。从天安门前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起,到现在整整三十五年了。河南文物考古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事业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一块荒芜的土地,变成了万紫千红的花园。今天的文物考古工作,再不会象解放前那样,徘徊于古代文化废墟之中,望着断碑残碣兴叹;再不用个人匹马孤征,仆仆于黄沙大漠之间,去摩挲残垒。发掘出来的大量遗迹和遗物,已经为人民所享有和应用,教育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成为提高民族自信心、振兴中华不可缺少的精神和物质力量。

解放后,河南建立了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全省的文物工作。并先后成立了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中原石刻艺术馆、河南省文物商店和各地(市)、县(市)的一批文物机构。通过各个大学的考古专业,以及国家、省、地(市)各级举办的文物考古训练班,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积极开展文物保护、普查、征集、陈列、保管、钻探和考古发掘工作。1961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 处,其中包括河南的渑池仰韶村遗址,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汉魏故城,登封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嵩岳寺塔、观星台,郑州商代遗址,新郑郑韩故城,开封祐国寺塔(铁塔),安阳殷墟等 13 处;1963 年 6 月河南省发布了《河南省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公布了第一批全省文物保护单位 253 处;1982 年 2 月,国务院又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2 处,其中包括河南巩县宋陵、石窟寺,安阳修定寺塔等 3 处;同时,国务院公布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24 处,其中包括河南洛阳和开封两处;1982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3 年 11 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河南省"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试行)》。这些文物政策法令,使河南的重要文物,基本上得到妥善保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十五年来,配合国家工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在河南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为解决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也作了一些主动发掘,并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发现。如南召猿人等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的发掘;相当数量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夏代文化的探索和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发现;偃师早商城址和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城址和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新郑郑韩故城的调查和发掘;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信

阳长台关楚墓、淅川下寺楚墓的发掘；温县盟书的清理；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和温县西招贤村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洛阳、郑州、济源、南阳、密县、陕县、灵宝、南乐等地汉墓的发掘；巩县石窟的调查；邓县学庄南朝彩色画象砖墓的清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现；三门峡漕运遗迹的调查；白沙宋墓的发掘；以及商周青铜器、唐三彩、唐宋瓷器的发现；《息庵禅师碑》、《照公禅师塔铭》的发现等等。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上述资料以及其他考古发现的资料，一般都发表在全国和省内的多种专业刊物上，总数至少在近千万字以上。由于比较分散，查阅不便，致使一些史学工作者、其他学科的工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难以利用这些考古材料。为此，本书把河南地区建国以来调查、清理和发掘的考古新材料，进行综合汇集整理，并进一步作了一些学术研究，以期为了解和研究河南考古，提供线索和方便。

《河南考古》按照物质文化的发掘和时代的先后顺序，分为八章。即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

为便于了解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些主要情况，还编了一份数量较多的《河南省古代遗址、城址、窑址、墓葬统计表》，一份《建国以来河南考古记事》，附于篇末，以供读者查阅。

仅以此书，作为一件菲薄的礼物，献给伟大的祖国母亲，献给亲爱的河南人民。

（原载《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殷墟考古史》序言

安阳殷墟是闻名中外的商代后期王都，也是目前有文献记载和甲骨文印证并经考古发掘证实的可以确定年代的我国最早的都城。3000多年来，若隐若现地记录在古代文献里和流传于人们的口碑之中。1899年发现了殷墟甲骨文，揭开了认识殷墟的帷幕；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打开了地下博物馆的大门；建国后进行的多次大规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殷墟考古学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研究的学科。

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余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殷墟发掘60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言中曾指出：

首先，殷墟科学发掘工作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完成的，改变了以往一些考古工作要受外国人控制的局面。发掘出来的资料，也是由中国学者研究并发表的。在六十年前能作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尊严。

其次，殷墟发掘作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有其重要的开创之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发掘方法，奠定了田野考古的基础，使中国现代考古学成为一门新兴科学，并为之培养了大批人才。

第三，殷墟发掘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为文物考古研究，为历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发掘出宫殿、王陵，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玉器、陶器和石器。尤其是一大批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殷墟发掘的成就，为研究商文化的前期阶段，为探索夏文化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如果把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比作开花，那么，现在就结出了丰硕之果。仅以河南为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就发掘了武官村大墓、后岗圆形坑、王陵区的人祭坑、殷墟西区的平民墓、小屯西北的妇好墓、小屯南地的甲骨文；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也发掘了一些遗址和墓葬。此外，在郑州发现了二里岗遗址和商代城址，在偃师发现了尸乡沟商城，在罗山后李发现了商代息国贵族墓群，在河南各地还有数百处商代遗址和墓葬被发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其它遗物。

放眼全国，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有大型的商代奴隶殉葬墓，辽宁喀左一带出土了商代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发掘了商代青铜器墓，山西石楼等县及与其隔黄河相望的陕西绥德地区发现了商代青铜器，晋南垣曲发掘出商代古城，陕南城固出土有商代铜器群，安徽阜南出土有商代龙虎尊和其它青铜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有商代城址，湖南宁乡发现了商代青铜器，江西清江吴城和新干县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四川彭县、广汉三星堆发现了商代铜器群。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反映出殷商文化的分布和影响，已北到陕北、北京和辽

河流域，东至苏北，西到成都平原，南抵长江以南的赣水流域。这为其后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文化统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在夏威夷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商代文明讨论会，1984年在安阳举行了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1987年在安阳举行了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1988年在安阳和北京分别举行了纪念殷墟发掘60周年学术座谈会，1989年在安阳举行了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讨论会。在这些学术讨论会上，不少学者宣读论文，包括90年来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60年来殷墟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建国40周年来，一部部有关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的专著和专辑的出版，一篇篇发掘报告、简报和学术论文的发表，把殷墟考古推向了新的高峰。

1955年胡厚宣先生著有《殷墟发掘》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1928～1937年这十年间所进行的15次发掘的经过和收获，特别回顾了海峡两岸学者当年携手共事的难忘岁月。35年后的今天，段振美同志又写了一部《殷墟考古史》，可以说是《殷墟发掘》一书的补充和姊妹篇。书中不但概述了建国前的15次考古发掘，还介绍了历代有关殷墟文化的记载，近代甲骨学与殷商文化，以及建国后的殷墟考古。不仅材料丰富，概括性强，而且深入浅出，还反映了殷墟考古的最新成果。这部书对文物考古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广大人民群众也不失为一本好教材，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迪。段振美同志是河南文博队伍中相当年轻而又勤奋的一位，作为安阳文物工作队的负责人，年复一年地配合基本建设，田野考古任务十分繁重，他利用业余时间，克服种种困难，编写出此书，无疑为文物考古事业增砖添瓦。作为最早的一个读者，我乐于向大家推荐。

（原载《殷墟考古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序言

郑州位于黄河流域的怀抱，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经聚集着一些氏族和部落，夏末商初之时，留下了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址和南关外期文化遗存。到了商代前期，在郑州筑起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垣。1955年郑州商城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领域第一次找到了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前期文化的历史空白，并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开拓了视野，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在郑州商城发现有大型的宫殿建筑，发掘出多座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作坊遗址，还发现有墓葬、窖藏坑、房基、祭祀坑、窖穴、水井和壕沟。在这些遗址和墓葬内，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蚌器和刁刻字骨，其中不少都是稀世珍宝。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

商代属于青铜器时代，是以生产和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容器为其标志的。在郑州商城，冶铸青铜器是一种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当时各类手工业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郑州商城两处铸铜作坊遗址和两处铜器窖藏坑的发掘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复杂的青铜铸造工艺，能制出大型的重器和精美的中、小型铜器。中国的青铜器源远流长，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独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向全世界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

郑州商城出土最多的遗物是陶器，它们不仅是考古断代的重要标志，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从陶质上看，有泥质的和夹砂的；从陶色上看，有灰陶、红陶、黑陶和白陶；从制法上看，有轮制的、模制的、轮模合制的和手制的；从器形上看，有平底器、圜底器、三足器、圈足器和器盖等；从纹饰上看则有绳纹、弦纹、篮纹、方格纹、圆圈纹、附加堆纹、人字形纹和仿铜器的云雷纹、饕餮纹、乳钉纹等。最能够代表郑州商城陶瓷工艺最高水平的是原始青瓷，用高岭土制成，火候高，质地硬，吸水性弱，敲起来近似金属声，器形多为尊，也有少量的罍和罐，胎为灰白色或黄白色，个别为灰绿色和浅褐色，多施青绿釉，少数为褐色釉或黄绿色釉。这样，就把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提早到3500年前。中国被世界誉为"瓷的祖国"是当之无愧的。

陶了上述铸铜、制陶之外，在郑州商城至少还有制骨、制玉、黄金冶炼、漆木器、纺织、编织、酿酒等多种手工业。在郑州商城北郊的制骨手工作坊遗址内，出土有上千件骨器的成品、半成品及带有锯痕的骨料和废料，还有一批磨制骨器用的砺石和加工骨器的小型铜刀。郑州商代墓内还有骨簪、骨梳、象牙觚和蚌串饰等。玉器有玉簪、玉璜、玉玑、玉饰、玉铲、玉戈、玉璋和玛瑙环，五颜六色，光亮晶莹，反映了相当高的制玉工艺。郑州商城东北角内侧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内，出土了极薄的夔龙纹金叶片，很可能是镶嵌在某种漆木器上的装饰，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1953年4月，在郑州商城东南郊的二里岗，发现1片带字的牛肋骨，上面刻有“又土羊乙丑贞从受十月”10个字；同年9月，在二里岗又发现1块牛肱骨的残片，上面刻有一个“㞢”字。这些虽都属于习刻字骨，但也是在安阳殷墟之外难得发现的2片甲骨文。此外，在郑州商城东北隅的白家庄商墓内，出土有颈部铸3个龟形装饰图案的铜罍，可能是族徽文字，唐兰先生曾考释为“黾”字，若确，这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了。在郑州商城中部偏西处（今商城路西段南侧）的1座商代窖穴内，出土刻有“目”字（或释为“臣”字）陶文的大口尊残片。上述商代文字遗物的发现，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70年代在郑州商城东北部发掘的3座宫殿基址，都坐落在较高的夯土台上，这是我国高台建筑的雏形。位于东里路东段北侧（今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院内）的第10号宫殿，南北长约34米，东西宽约10.2～10.6米；位于东里路西段南侧（今黄委会水利科学研究院的南院内）的第15号宫殿，东西长65米以上，南北宽13.6米；位于城北路中段南侧（今省中医研究所楼前大院内）的第16号宫殿，南北长38.4米，东西宽31.2米。这些高台宫殿建筑，还保留有成排的石柱础或柱础槽。宜于防潮、防水、通风，对后世宫殿建筑也有一定影响。

上述的考古发现，勾画出这座商代王都的轮廓。几乎与此同步的是围绕郑州商城年代早晚和性质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仲丁都隞”所在地；也有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汤始居亳”的所在地。笔者认为，尽管仲丁都隞说的理由更多一些，但还是不够充分和圆满的，需要继续做工作。

近些年来，郑州商城又有了许多考古新发现。对进一步深入研究郑州商城的布局、范围、年代和性质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资料。

在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内，又先后发掘出10多座大型宫殿基址。包括宫殿区东部的郑州医疗器械厂宿舍区内的3座和河南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内的3座，宫殿区中部的郑州回民中学内的3座，宫殿区北部的黄委会宿舍区及食堂附近的4座。这些宫殿基址范围较大，如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内的1座，东西残长26米，南北宽13米。这些宫殿基址的上面，还保存有排列有序的石柱础或柱础槽。宫殿基址下面，有的就坐落在古代河道或其它早期水面的淤土层上。如郑州回民中学校内的殿基和省中医学校家属院内的殿基就是如此。为处理好地基，前者的夯土台基下铺设有厚达1米多的石块堆积，后者把夯土台基加厚到5米左右。这大大增加了牢固强度，表明宫殿建筑的地基处理已达到较高水平。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在郑州商城的中部偏东南处（今郑州电力学校院内），也发掘出1座大型夯土台基，东西残长34米，南北宽20米。由于地面被破坏，未见柱础痕迹，但无疑是1座大型宫殿基址。上述发现，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商代宫殿的建筑结构，并表明宫殿布局已不限于郑州商城的东北部而又向中部扩展。在宫殿区的东部（今黄河中心医院），发掘出一处商代石板砌筑的蓄水设施。平面为长方形，呈西北/东南方向，长约100米左右，宽约20米。断面呈斗形，深约2米左右。底部和两斜坡壁面先用料礓土夯实，然后再分别砌筑石板或卵石，显然是1座大型水池。在郑州电力学校和省中医学院家属院内的宫殿基址旁边，发现有多座商代水井。有的井四壁设木构井框，框下有木制井盘，井框四周和井盘外侧有青膏泥层围护，井底沙土层上铺设较厚的陶片层以滤井水；有的井上部为大的夯土井

坑以避免土壁塌方,下部为较小的井口,有相当深度,可能开凿在水面之下以保证水源的充足。这些发现对研究商代宫殿区内供水乃至整个商城的供水和水利设施的布设等,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外900多米处和西城墙南段约700多米处,发现一大段外城墙。其东端可与50年代在二里岗北部发现的夯土墙相连接。其中1992年在布厂街的花园新村,发现并清理出郑州商城外城墙的西南城角一段保存较好。该段夯土墙长约100余米,均埋在地面之下。夯土顶部距地表1.1米,残高1.95米,宽20.4米,城墙下挖有基槽,分段夯筑而成。夯层厚8~15厘米,夯层面上布满密集的圆形圜底夯窝痕。从其建筑结构和出土遗物看,与郑州商城城墙相同。内外城墙之间,有较多的遗址、墓葬,外城之外,则很少发现商代遗迹。郑州商城外城墙的发现,大大拓宽了郑州商城的范围,建筑规模的恢宏,绝非能在夏末商初频仍的战乱之后立即修筑的,其时代要比位于河南西部规模较小的偃师尸乡沟商城晚。这就又为郑州商城系仲丁的隞都增添一条佐证。

1990年,在郑州商城西北远郊的小双桥村,发现一处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商代遗址。发现有商代二里岗期上层时期的夯筑基址和石柱础,出土一批陶器及原始青瓷尊片。还有能反映商代礼乐制度的大石磬和长方形石圭。遗物中最重要的是2件形制相同的青铜建筑构件。整体近方形,平面为"凹"字形,高18.5厘米,正面宽18.8厘米,侧面宽16.5厘米,两侧面各有一个6×4.2厘米的长方孔,壁厚0.6厘米,重6公斤。构件正面饰单线阴纹饕餮面,侧面在长方孔的四周为一组龙虎斗象图,龙虎形象生动,象为艺术变形。这应是装在宫殿正门两侧枕木前端的装饰性构件,由其形体推测该建筑规模很大,自非商王莫属。从遗迹和遗物推测,这里可能是商代王室祭祀的场所,也可能是一处离宫别馆。与郑州商城当有密切联系,其意义非同寻常。

这些新的发现,反映了近年来的考古收获,也预示着郑州商城未来新发现和科学研究的光辉前景。值"郑州商城与殷商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之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推出《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一书,显示阶段性的丰硕成果。仅以此献给郑州人民,献给参加"郑州商城与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的各位代表。在气势磅礴的改革大潮中,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但是一个经济腾飞的现代化郑州,而且还有一个灿烂辉煌的商代郑州。是为序。

(原载《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序《河南考古四十年》

一位彪炳千秋的历史巨人曾经这样说过:“什么都可以藐视,唯独黄河不能藐视,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哪!”河南就位于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日月交替,沧桑更迭,源流有宗,衍变有绪,漫长的历史岁月过去了,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展示了我们祖先的光辉创造,描绘出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建国后,人民当家作主,文物考古事业也像日上中天,万紫千红。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工程,在河南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为解决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也作了少量的主动发掘。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

在河南西部、西南部以及北部、中部和南部,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尤其是南召杏花山猿人化石的出土,更显示河南也是猿人生活的沃壤,扩大了我国旧石器分布的地域。上百处属于新石器时代偏早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裴李岗、莪沟、石固、贾湖等遗址的发掘,出土物中有龟甲、骨器和石器上的契刻符号和至今仍可吹奏的七孔骨笛,令人惊叹!仰韶文化遗址像繁星一样布满中原大地,大河村遗址的房基和天文图象的彩陶,阎村遗址的鹳鸟石斧图陶缸,西水坡遗址蚌壳摆砌的龙、虎图案,都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龙山文化经历了父系氏族社会从发展到解体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即将产生或刚刚产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遗址数量之多,可谓空前。夯筑地坪,土坯砌墙,木构水井,意义非常。源于湖北的屈家岭文化分布在豫西南和豫南,源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出现在豫东,它们在河南中部交汇,反映了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和影响。

原始社会崩溃之后,夏王朝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奴隶制国家。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都发现在夏早期积年范围内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有些地方还发现同时期的冶铜遗存和文字遗迹,说明当时已进入了文明社会。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找到了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之间的一种古代文化,可分为一、二、三、四期。其中一、二期属夏代晚期,三、四期为商代早期。使探索夏文化取得新的突破。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郑州商城的发现,尸乡沟商城的发掘,使人们对商代前期和早期文化的认识为之耳目一新,安阳殷墟早已闻名遐尔,惨绝人寰的祭祀坑和无与伦比的妇好墓以及小屯南地的甲骨文,真是苍茫沉郁,惊心动魄!

两周延续八百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洛阳西周铸铜作坊,一批保存尚好的东周列国都城,还有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固始侯古堆大墓、淅川下寺楚墓、信阳长台关楚墓、光山宝相寺黄国墓、淮阳马鞍冢大墓,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手工工艺和经济发展水平。

汉代是经济文化辉煌的时代，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温县西招贤的大型冶铁遗址，代表了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生产技术；汉魏洛阳故城保存完好，城墙、城门、宫殿、永宁寺塔基、灵台、明堂、辟雍、太学、刑徒墓地等历历在目，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各地发掘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彩陶壶、盘龙砚、透光镜、陶风车、桃都树、六博俑、金缕玉衣、带字瓦件等，凝聚着汉代文明的博大精深。

唐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影响深远。隋唐东都城、开封北宋东京城、偃师唐孝敬陵、巩县宋陵，雄浑豪放，名传千古；唐代安阳相州窑、密县西关窑、巩县黄冶窑，宋代汝州汝窑、宝丰汝官窑、禹州钧台窑、登封曲河窑、内乡邓州窑、鹤壁集窑等，五彩纷呈，仍为今人所倾倒。

祖国历史的长河，是如此悠久而又这样丰富多彩，这不仅体现在那些光耀夺目的文物上，而且也体现在今天人们继往开来的气魄中。我们的祖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创造出震憾世界的奇迹来，那就更加激励亿万炎黄子孙去实现梦寐以求的四化大业。

上述考古发现，记录了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的足迹，也包含着中央和外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汗水。1985年，曾出版拙著《河南考古》，对不少考古发现重重地写上了一笔，当然仅是抛砖之作。今天终于引来了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河南考古四十年》问世，资料更新，特别增加了专题研究，内容更加丰富。这是作为庆祝建所四十年的一项成果，也是一部综合研究河南考古的专著。既有老一辈考古专家的心血，也有中青年业务骨干的努力。使人们在看到一个经济腾飞现代化河南的同时，通过本书又看到一个灿烂辉煌的古代河南。

在纷纷下海淘金的今天，我们不羡慕那些腰缠万贯的“大款”。以自己的良知，更加牢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保护文物出成果出人才是我们的理想和座右铭。每出一本书，我们的内心就感到更充实，精神上就感到更富有。

（原载《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河南史前彩陶》序

河南地处中原，北依太行山，西靠伏牛山，南有桐柏山、大别山环抱，东部面向宽广的华北大平原，黄河自陕晋边境折向东流，横贯全省北半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十分适宜于人类生存。

从1921年至今，河南已调查出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展示了中原地区原始社会的繁荣景象。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已经发现有少量的彩陶；而被人称道的正宗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则是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

建国以来，河南省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约800余处，分布地域遍及全省，尤以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最为集中。其中600处遗址均有彩陶出土，有的遗址彩陶异常丰富，如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就绘有30多种图案，除在动物、植物、几何图案外，还有太阳、月亮、星座、旋风等天象和自然现象的纹饰，有的图案虽然寥寥数笔，但形象生动，十分传神。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汝州洪山庙遗址的一座仰韶墓葬中发掘出136件瓮棺葬具(其中大多数为成人瓮棺)，在这些瓮棺上多数都绘有大幅彩陶图案，其中保存好的达50余幅，图案内容十分丰富，有故事性的、宗教性的。该墓的发现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宗教、葬俗、艺术史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在彩陶研究方面，兄弟省取得的成绩令人注目，近年来相继出版了《甘肃彩陶》、《青海彩陶》、《江苏彩陶》以及《中国彩陶图谱》等专著。作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地区的河南省今天终于出版了一本彩陶研究方面的专著——《河南史前彩陶》，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内容相当丰富。论述了河南史前彩陶的起源，早期受细石器文化影响，到裴李岗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经仰韶文化时期飞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期而逐渐消失，涵盖了产生、发展、繁荣、衰落等四个阶段。还研究了生活用具彩陶图案分为动物、植物、天象、几何等四类，并通过多元组合而千变万化。又分析了葬具彩陶图案内涵为故事图案、巫术信仰图案和一般性图案。特别指出鸟纹、蛙纹、蜥蜴三类图案为氏族图腾崇拜，并研究了日月星辰等天文图象的科学价值。最后论述了彩陶的装饰艺术。篇后的3张附表，即汝州洪山庙遗址彩陶颜料分析、渑池班村遗址彩陶分析、河南主要彩陶遗址碳十四年代测定，这既是研究河南彩陶的重要手段，又是河南彩陶研究的重要成果。特别突出的是，书中以21幅插图、81幅线图、27张彩色照片和38张黑白照片，形象地再现了河南史前彩陶的艺术魅力。

本书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本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书中收集河南50处遗址的调查发掘资料，其中也采用

了最新发现的彩陶资料。有些材料是第一次面世,诸如在彩陶起源部分利用舞阳大岗近年才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彩陶资料,仰韶文化部分重点突出了汝州洪山庙、郑州西山的彩陶材料,仰韶晚期使用了辉县孟庄遗址的彩陶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研究河南彩陶资料的工具书。

第二,在研究方面,本书有了新的开拓。首先,本书第一次对河南省彩陶图案从其功用方面进行了分类,将彩陶分为生活用具类和葬具类。这种分类是近年来彩陶研究的重要进步,这一分类为今后深入研究原始社会彩陶图案与人们生产、生活、宗教信仰、审美等方面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本书在彩陶分类以及区、系、类型等关系方面都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对仰韶文化彩陶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河南史前彩陶》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仰韶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又一可喜成果,这也是我们对原始社会某一专题深入研究的一次尝试。

河南彩陶在整个仰韶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原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原地区商周时期辉煌的青铜艺术打下了坚实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传统艺术正是深深根植于这一肥沃的土壤之中。

袁广阔同志,是我所青年业务骨干之一,一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在辉县孟庄、汝州洪山庙等遗址的发掘中取得重要收获,并对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收集和研究做了一定工作。本书将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参考和方便。这又是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为全省文物考古工作做出的一点贡献。

(原载《河南史前彩陶》,河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

《河南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文献举要》序

河南位居中原，其北、西、南三面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环抱，东部为大平原。黄河自陕晋边境折向东流，横贯河南北部，在中条山和崤山之间穿过三门峡，出峡后至孟津以东流入华北平原。淮河发源于桐柏山，流经河南南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十分适宜于人类生存。

河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河南调查、发掘的几百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展示了河南地区在原始社会晚期的繁荣景象。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是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全省发现此类文化遗址已有120处之多，其中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长葛石固、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等遗址都经过发掘，有着重要的收获。从地层叠压关系和一些器物比较来看，仰韶文化溯源于裴李岗文化；从出土的细石器看，尽管还有某些缺环，裴李岗文化可能来源于灵井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它大大丰富了对我国原始文化的认识，为研究我国农业、陶器、纺织、建筑等的起源和发展，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距今7000年～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仰韶文化的研究是我国考古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这个文化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发展和当时不同族属文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解体甚至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门槛的时期。河南境内有许多仰韶文化遗址，如渑池仰韶村，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洛阳王湾，汝州大张和阎村，安阳后冈和大司空村，郑州大河村，荥阳秦王寨、青台和点军台，淅川下王岗，濮阳西水坡等，都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些遗存，主体面貌相同，但又有时间先后和地域差异，考古学者把它们大致划分为豫西的庙底沟类型，豫中的大河村类型或秦王寨类型，豫北的后冈类型和大司空类型，豫西南的下王岗类型。

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5000年～4000年左右，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及其解体阶段，也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即将产生或刚刚产生的历史大变革时期。龙山文化遗址遍布全省。在安阳后冈，汤阴白营，濮阳马庄，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灵宝城东寨，洛阳王湾，偃师灰嘴，汝州煤山，禹州瓦店，荥阳河王，郑州旭旮王、牛砦和二里岗，永城王油坊等许多地方，都发掘过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地域辽阔，内涵有差别。主要可以划分为豫西伊洛地区的王湾类型，豫北的后冈类型，豫东的王油坊类型。

屈家岭文化是主要分布在湖北境内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河南的淅川、内乡、邓县、镇平、新野、南阳、南召、社旗、方城、正阳、光山、息县、遂平、上蔡、平顶山、禹州等地，也发现一批屈家岭文化的遗存。这表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可扩大到豫西南、豫南、豫

中地区,也反映了黄河流域和江汉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影响。

大汶口文化是主要分布在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豫东商丘和周口地区,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畴;甚至在许昌、郑州、洛阳、平顶山、驻马店和信阳等地、市的个别地方,也发现过此类文化遗存。这反映了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发生了更多的文化交流。

自河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至今的 70 多年间,已发表的考古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简报等已有数百篇,但这些资料大都散见于各时期的诸种期刊、报纸中,给查找和使用者带来许多不便。《河南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文献举要》(1923 ~ 1996)一书的出版,为大家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资料书。

本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这本书由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概述、田野考古资料举要、田野考古资料索引等三部分构成。这种既有资料,兼有研究,又顾及资料检索的形式尚不多见,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二,该书从已发表的 300 多份田野考古资料中,精选出 200 多份作为田野考古资料举要加以介绍,同时在每份资料后面还加有编者记,以表达编著者对资料的认识和思考以及一些必要的说明。此举显得有新意。

第三,在田野考古资料的编排和检索上,本书也有特色。如在田野考古资料举要中,将资料按所在市、地、县的划分作介绍,并且将某一遗址的数篇资料排在一起,以方便读者阅读。另外,在田野考古资料索引中却依资料发表的年代排序,成为检索资料的另一种方式。

《河南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文献举要》(1923 ~ 1996)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研究成果,也是将学术性与资料性融为一书的一次探索。

方燕明同志,多年从事考古工作,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担任《华夏考古》杂志编辑部主任以后,他的编稿重点也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本书正是他从事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成果,这也是我所为河南文物考古工作做出的又一成绩。

(原载《河南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文献举要》,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导论

中国考古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既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又吸收了欧洲田野考古的营养。通过调查和发掘，寻找古代先民们遗留下来的诸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各种装饰品等遗物，房基、窖穴、濠沟、水井、作坊、聚落址、城址、墓葬等遗迹，以及农作物、家畜、渔猎等许多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通过科学的测定与研究，来探寻华夏古老文明的源头，复原和重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图景，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给人们以启迪和力量，为今天的生活和工作服务，为更美的未来增加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考古学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成绩最为突出、对人类历史贡献最大、从而也最为引人注目的人文学科之一。

20世纪，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1年，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唤起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们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划时代的里程碑。恰恰也在这一年，受聘于中国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确定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使这里成为仰韶文化的命名地。中国考古学也随之发端、成长，并取得重大成果。作为文物大省河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缩影。

建国之前的河南考古发掘，如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安阳殷墟的发掘，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发掘，浚县大赉店的发掘，永城造律台的发掘等，都有很多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开中国近考古学之先河。而安阳殷墟的发掘，使商代晚期的王都重见天日，发掘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宫殿、作坊、王陵大墓，出土了无与伦比的青铜器、玉器和甲骨文，从而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为探索夏文化和早商文化，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时至今日，单单殷墟的发现和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举世公认的"殷墟考古学"、"甲骨学"。

建国以后，河南的考古发现更是令人瞩目。南召猿人化石和南阳、三门峡、洛阳、安阳、许昌等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扩大和补充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区域和空白点，表明在豫西的秦晋豫交接地带和豫西南的鄂豫陕相邻地区，可能是古人类活动分布的重要地区。这在河南又构成了旧石器时代文化早中晚期的完整发展序列。

新石器时代诸遗址的发掘，基本上搞清了河南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和区、系类型。其中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首次在河南找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这也是仰韶文化产生的渊源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千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聚落址的繁荣，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承袭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成就。在河南东部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或遗存，在河南西南部发现的屈

家岭文化遗址或遗存,二者并在河南中部地区交汇,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前者反映了中原地区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交流,后者则反映了黄河中游和南方江汉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融合。这些交流与融合,大大促进了中原地区向更高的文化层次发展,迎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新曙光。

通过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通过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和辉县孟庄等多座龙山文化晚期古城址的发掘,在研究夏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的发现和安阳殷墟的继续发掘,使人们对商代早中晚期文化全貌的认识为之耳目一新。三门峡虢国墓地铜柄铁剑的出土,把我国铸铁生产的年代提早到西周晚期。平顶山应国墓地的发掘,复原了一个小国的历史。在先秦古国中,楚国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统一了大江南北数十个大小邦国,揭开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新篇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促进了华夏文化的发展。豫南地区属于楚国的北疆,信阳长台关、固始侯古堆、淅川下寺、淮阳马鞍冢和平粮台楚墓的发掘,为我国古代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用信阳长台关楚墓铜编钟演奏的《东方红》乐曲,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巩义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温县招贤村等地发掘的大型汉代冶铁遗址,其冶炼规模和铸造技术,都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汉魏洛阳城保存之完好是十分罕见的,其里坊制度对隋唐时代都城和地方州县的布局有重大影响,甚至还影响到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和日本的许多城邑。隋唐洛阳城和开封宋城的发掘,反映了这些封建盛世王都宫城壮丽,市肆繁华,令人心驰神往。唐宋是我国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密县西关窑、巩县三彩窑、登封曲河窑、临汝严和店窑、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禹州钧台窑、内乡邓州窑、豫北鹤壁集窑等烧制的青瓷、白瓷、杂花瓷、三彩器,釉色晶莹,纹饰繁缛,千变万化,使人们惊叹不已。

20世纪的河南考古,不仅以其重大发现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考古发掘实践中创造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也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在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后岗发掘时,不是像当时许多人按深度划分地层,而是采用了科学的方法以土色区分地层。在整理时,清除晚期地层中混入的早期遗物,恢复了各时期遗存的原来面貌。这样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早晚地层叠压关系,即著名的“三叠层”,这应是考古地层学在我国确立的标志。其后,在历次发掘中,对考古地层学的认识和运用,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诸如半坡、盘龙城、大河村、西山等大型遗址中,仔细分辨不同层位的成群遗迹,使我国田野考古水平不断提高。

50年代在洛阳中州路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则是在考古类型学实践中的一个重大进展。苏秉琦先生把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按其陶器的组合,分为鬲、盆、罐组,鼎、豆、罐组,鼎、豆、壶组,鼎、盒、壶组四大类;再按各式的不同式别,细分为七期;又按照墓葬的形别分为大中小三型。按照与陶器的共存关系,还把不易看出演变规律的和已订其年代的玉器、铜剑、铜镞、铜带钩和铁刀等互相参照,推断其年代,分出相应的期别。再通过各期之间变化的比较,发现三、四期之间,亦即春秋、战国之间,是发生重大变革的阶段。这样把年代学考察,上升到分析社会关系变化的高度,成为考古类型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并对其后各遗址、墓葬的发掘和整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完善和提高,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提高了考古学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从其内涵讲,除一般传统的考古学之外,又按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出现美术考古、宗教考古、古钱币学、古文字学、古铭刻学、古代陶瓷、古代冶金、环境考古、聚落考古……,继而按不同的技术手段,又有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考古年代学上采用了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树木年轮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铀系法断代等方法,为第四纪以来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年代依据,特别是为建立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原始社会考古学的年代体系奠定了基础。

如上所述,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比如对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大量石器,以及其它各个时代的许多石制品,其中包括各种玉石、宝石类等非金属矿物,都可以用地质学上的岩石切片法,用显微镜加以鉴定。这不仅能够确认岩石和矿物的性质,而且还可以推定它们的产地。又如对古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木质品、纺织品、谷物、种子和果核的鉴定,可以了解各种木器的材质,进而推定它们的制法和作用;可以了解纺织品的质料,进而探讨农业和纺织业的概貌;还可以了解农作物的种类,并探讨农业的生产水平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在自然界的各种植物中的孢子花粉,具有个体小、重量轻、质地坚、数量大、易于飞扬等特点,所以普遍存在于各类遗址的地层中。近年来考古发掘和整理中,较广泛采用孢子花粉分析,可以推断当时植物的种类和植被的面貌,进而探索当时的地理和气候等自然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植物都是不断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进行发展。因此,从不同地层中发现不同种类和不同组合的孢子花粉,也有助于对考古地层层位的划分和核对。通过对遗址出土兽骨的研究和分析,可以了解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环境和条件,可以了解新石器时代家畜饲养和渔猎及农业生产的情况,甚至可以了解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墓葬内死者的性别、年龄的鉴定,可以探讨当时丧葬习俗、婚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态的一些情况。对于一些骨病的研究,可了解古代有关环境和疾病的情况。至于考古学为其他学科提供的重要资料,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20世纪河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足以令人骄傲的成就,使人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从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解放出来,发生了几乎是根本性的转变。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面对21世纪,我们就要进一步加强考古层位学、类型学的应用和研究,以求更多、更好地解决考古学上的问题。要更广泛地采用自然科学手段来整理和研究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并利用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优势参与考古发掘和研究。除此之外,还要立足河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亦即要求在考古队伍中培养一批精通外语的人才,以期在完成中国考古任务的同时,还要对外国考古学有一定的了解,加强中外考古的学术交流。具体到河南来说,21世纪的考古还要加强重点课题的研究,至少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加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在河南曾经发现了许昌灵井细石器遗址,这是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还发现了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偏晚阶段。但是缺少两者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偏早阶段的遗存,这也是整个河南地区文化谱

系框架中的一个缺环,亦即是距今10000~12000年左右的遗存。在豫西灵宝境内已经发现了一点线索,希望能在今后的文物调查和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中,能够补上这一缺环,这将对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的研究,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要加强对粟(小米)、稷(黄米)一类旱地农作物起源的研究,鉴于舞阳贾湖等地发现裴李岗文化的水稻(大米),也要加强水稻方面的研究。

二是加强有关夏文化探索和文明起源的研究。这是两个相得益彰的课题,也是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考古发掘证实,二里头文化早期可能属于夏文化的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可能属于夏文化的早期。与此同时,龙山文化晚期已经有了许多城址,创造了文字和出现了青铜器,这些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当然,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我们期望随着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对夏文化探索和文明起源课题的研究会取得新的突破。

三是加强古代城市起源及发展规律的研究。河南地区已发现仰韶文化的城址、龙山文化的城址和原始聚落遗址以及夏商周等各朝各代的城址。这些古代城址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其城市的功能布局及发展变化是颇具特色和影响的。这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要充分利用航测遥感技术,分析研究历代古城址内外建筑设施和墓地情况。

四是加强古代陵墓制度和一般墓葬习俗的研究。河南发现有从新石器时代到宋金的大量墓葬,其中包括商代、周代、汉代、魏晋、唐宋的王陵、皇陵和诸侯国的陵墓,以及各个等级、阶层人物的墓葬,资料极为丰富。要特别注意陵园和墓地布局的探索。

五是加强商代方国和周代封国的研究。河南为商周时期的近畿地区,其经济发展居于当时全国的前列。在一些地方分布着商代的方国和周代的封国。对商代方国和周代封国的研究,是河南的一大优势和重要课题。要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深入研究已有的考古资料,包括古城址的调查及青铜铭文和其他出土文物的研究,使这个研究课题取得新进展。

六是加强楚文化的研究。这是与湖南、湖北、安徽联手攻关的课题。河南南部是楚国的疆域,据记载楚国早期的都城丹阳,很可能在西峡、淅川一带,其后南迁到湖北。而楚国晚期的都城在淮阳,信阳长台关一带的楚王城也可能作过短暂的临时楚都。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诸地市,曾发现和发掘出一大批与楚有关的墓葬,出土了不少带铭文的青铜器,还有玉器、陶器、漆木器,为研究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要加强在河南南部的调查和发掘,尤其是在西峡、淅川一带古城址的调查,以期找到丹阳故都,在楚文化研究上也来个突破。

七是加强古冶金、古陶瓷的研究。商周至两汉冶金考古的发现,是河南多年来重要的科研收获。除青铜器之外,冶铁的发现与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前面提到的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西周晚期铜柄铁剑,把我国冶铁产生的时间大大提前。战国到南北朝的冶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今后要加强对西平、舞阳一带战国早期冶铁遗址群、桐柏唐宋银矿、灵宝明代金矿洞群的调查和研究。商周以来原始青瓷的发现,尤其是唐宋瓷窑址的发现与研究同样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今后要加强对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鲁山段店唐代花瓷的研究;在鹤壁、巩县发现有唐代青花瓷线索,这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此外,寻

找文献记载中郑州一带的五代柴窑、开封一带的北宋官窑等,也是很重要的。

八是加强交叉学科课题研究,过去已经做过有古代漆木器脱水定型、石窟裂缝灌浆加固、青铜器有害锈处理和铁器防锈等方面的工作。今后要作8000年来河南地区考古地层考察及植物孢子花粉分析与气候、水文序列的研究。从裴李岗文化地层开始,一直做到汉代地层为止,采集各个时期的地层标本,提取孢子花粉进行分析,研究各地层所处的气候阶段,以及不同气候对植物的影响,不同植物在不同气候下的生存情况。探讨水、旱、风调雨顺的周期规律,对今后的气候变化做出预测。同样对8000年来河南地区人类的人种学、体质学、骨质病学及骨质反映的遗传学进行研究。也是从裴李岗文化开始,一直延续到汉代为止,对各个文化时期的人类骨骼,进行上述各种学科的测量和取样分析研究。研究在不同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及生态环境下,对人类体质有什么影响;研究骨骼病发生的各种原因及骨质演变情况;研究历代骨质所反映的遗传变化、特点和原因,探讨遗传的规律。此外,要搞河南地区低火候陶器、泥质文物的加固和复原研究。要解决考古发掘过程中遇到的低火候陶器及泥质文物的加固和起取,以及在整理后如何对这些文物进行复原和长期保存等实际问题。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其进入古代文明社会之时起,连续不断5000年的光辉历史进程,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国的古文化、古文明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宝库,对其相邻地区甚至全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千差万别,经济文化类型非常丰富,从遥远的古代起,形成了采集、渔猎、畜牧、游牧、农业等各种各样的经济生活,先民们居住在平原、山地、草原、水边、海滨……,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内涵。这对研究人类的历史文化来说,其多样性在世界各地是罕见的,由此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中国近代考古学起步晚于两河流域、埃及和欧洲,甚至晚于日本,也正因为如此,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潜力是巨大的,有充分扩大新领域和增加新内容的余地,这无疑在全世界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有外国学者称,未来的世界考古学要看中国。

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考古工作者就是实现这个主题的使者。在河南的考古工作者,也正是为实现这个主题而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着。通过他们的努力,将使人们在看到一个经济腾飞、欣欣向荣的现代化河南的同时,也看到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河南。让每个炎黄子孙为生长在今天的中国而感到幸福,也为有一个古代的中国而感到骄傲。

(原载《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郑州商代铜器窖藏》序

郑州商城是一座比安阳殷墟更为古老的商代王都，建筑宏伟，气势磅礴。在城内发现有宫殿基址和输水设施，在城外发掘出多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作坊遗址，还发现不少墓葬、房基、水井、壕沟等遗迹，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蚌器和刁刻字骨等遗物，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从70年代到90年代末，在郑州商城西墙北段外侧（张寨南街）、西墙南段外侧（南顺城街）、东南城角外侧（向阳回族食品厂）先后发现了三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集中出土了三批青铜器，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随着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郑州商城在历史时空框架中的定位，对商前期年代学研究专题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郑州商城外侧三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的发掘，向人们提供了有关郑州商城使用的下限年代，商代王室的祭祀礼制，青铜重器的铸造工艺和装饰艺术等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笔者在考古生涯中，有幸参加了郑州商城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和宫殿区的发掘，尤其是参加了张寨南街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和向阳回族食品厂商代青铜器窖藏坑的发掘，并参与这两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考古发掘简报的编写，还曾到南顺城街商代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现场去考察，所以对这三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较为熟悉，印象颇深。

这三座商代青铜器窖藏坑是郑州商城40多年的发掘中最重要的考古收获之一。其青铜器种类繁多，有大方鼎、大圆鼎、扁足鼎、尊、罍、斝、鬲、提梁卣、簋、觚、爵、盂、盘等青铜容器，有钺、戈等青铜兵器，大方鼎成双成对，大圆鼎形制巨大，都是商王室所用的青铜重器。这些有科学记录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有可能从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从窖藏坑的放置、器物组合、年代分期、铸造工艺、造型和装饰艺术、合金成分鉴定等诸多方面，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努力获取最大的信息量，以纳入郑州商城系统研究的大范围之中。

从对窖藏坑内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进行研究，并参照地层叠压关系及坑内所出的陶片，可以推断这三座窖藏坑的时代都属于二里岗上层晚期的范畴。严格来说还可以排一个相对的顺序，即张寨南街窖藏坑为二里岗上层晚期偏早一些，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属二里岗上层晚期偏晚一些，南顺城街窖藏坑则是二里岗上层晚期最晚段，甚至还要再晚一些。因为它们都是商王室所用的重器，证明在这些时候，郑州商城仍有商王室存在。这样，郑州商城就和与之相距20公里的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有相当长的一段并存时间，直到小双桥遗址废弃之后，郑州商城还有商王室活动。如果再联系到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上层晚期一些手工作坊还在继续使用，特别是近些年在郑州商城宫殿区内，多次有二里岗上

层晚期绳纹板瓦的发现,这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板瓦,它应是宫殿建筑草瓦混合屋顶的构件,这显示当时还会有宫殿存在,就更表明郑州商城衰落的时间比人们原来推断的要长得多。

我们注意到在张寨南街的窖藏坑中,两件大型铜方鼎东西并列,口沿平齐,端端正正放置在一起,鼎足皆立于经过平整的生土面上。由于 1 号鼎较高,2 号鼎较低,为了使两鼎的口沿平齐,就把 1 号鼎下的生土地面又挖低了一些,说明两鼎是特意放置的。在 2 号鼎内还有一件青铜鬲。这可能是举行某种祭祀活动后,有意埋藏在坑内的。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内的 13 件青铜礼器,口对口并列或套装放置在一起,正好容纳在这座面积不大的窖藏坑内,显然是有意埋藏的。其旁边的两个同期灰坑内,均发现有残缺的牛骨架,这些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南顺城街窖藏坑内青铜器底部的地面很平整,有木板痕迹。青铜器上部也有木板痕和一层朱砂。这很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这三座青铜器窖藏坑放置井然有序,十分从容,且有一些反映祭祀活动的遗迹存在,看不出是什么重大政治动乱中仓惶逃跑所为。

这三座窖藏坑均位于城墙外侧附近,都属于二里岗上层晚期,窖藏坑内器物的组合除了都有大方鼎外,其他基本没有相同的器形。可以看出大方鼎在祭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顺城街窖藏坑出土的 4 件大方鼎,大小依次递减,具有列鼎性质。而祭祀的器类如前所述不仅有大方鼎、大圆鼎、扁足鼎、鬲、簋等食器,更有斝、爵、觚、尊、罍、卣等酒器和水器,还有钺、戈等兵器,尤以酒器类最多,反映了它们在商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本书作者在结语中指出:"窖藏坑出土铜器个体大,造型精致,器类齐全,纹饰讲究,均属商王朝王室重器已成定论。从窖藏坑位置特点相近,时代相同,器类相互补缺,各坑基本无重复器型分析,这三个坑形成的青铜器组合,很可能是商王朝在宗庙进行祭祀活动时使用的法器,铜器的主人很可能是商王,这些铜器应来源于商王朝都城内的宗庙,这些器物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商王朝的祭祀礼制。"这段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这也正为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属于郑州商城大范围的一部分的结论作了注释。

这三座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均为上品。大方鼎口沿长宽比例相近,沿面上立两个对称的圆拱形竖耳,下为深斗方腹,鼎腹上部饰一周八组饕餮纹,鼎腹中部为素面,鼎腹两侧和下部饰乳钉纹,腹下四空心柱足,足部饰饕餮纹或弦纹或素面。大圆鼎为方唇折沿,口沿立对称两圆拱形耳,深腹微敛,圜底下附三空心足,上腹饰一周三组双目突起的带状饕餮纹。其形制之大,造型之美,前所未见。扁足鼎敞口折沿方唇,腹微鼓下收为圜底,三扁足。上腹饰带状云雷纹,上下界以联珠纹,足饰夔纹。这对商代晚期同类器的造型和装饰有一定影响。牛首尊为大敞口,敛颈宽肩,鼓腹圜底,下附圈足。颈饰弦纹,肩饰三个突出的牛首,牛首间饰带状夔纹和联珠纹,腹部饰三组饕餮纹,上下界以联珠纹,圈足饰弦纹并有三个十字镂孔。羊首罍口微敛,长颈折肩,深腹壁较直,圜底圈足。颈饰弦纹,肩饰三个突起的羊首,间以带状饕餮纹,腹饰斜角目云纹和双目突出的饕餮纹,圈足饰弦纹并有三个方形镂孔。卣上有钮盖,肩有提梁,小口深鼓腹,下为圜底圈足。盖顶饰夔纹,提梁饰多组菱形纹,与郑州小双桥遗址所出的商代青铜建筑构件的菱形纹同出一辙。颈饰夔纹组成的饕餮纹,上下界以云雷纹,腹饰竖向夔纹组成的两组饕餮纹,圈足饰云雷纹和联珠纹,

并有四个镂孔。整个器被装饰得富贵华美,精妙无双。

从上述可以看出,二里岗上层晚期的青铜器,已在中国早期青铜时代中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青铜礼器占据了主导地位,各种饕餮纹已成为青铜纹饰中的核心主题,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呈现出一种别致变形兽面纹的风采,并以联珠纹、云雷纹、弦纹作为陪衬装饰,有些甚至还出现了较强的立体感。它们的纹饰可以说是左右对称,上下协调,显得庄严而又威武,凶恶而又神秘,写实而又抽象,如诗如画,亦真亦幻,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而又回味无穷的美感,从而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这又体现了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成就,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进步。它们作为中国艺术传统的精华而不朽,数千年之下,还令人惊叹和倾倒。

这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手进行考古发掘,加大研究力度,并以线图和图版融为一体的形式,编写出这部《郑州商代铜器窖藏》学术专著,必将为商代考古和历史研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新资料。本书的几位作者宋国定、曾晓敏、王文华等同志,都是文物考古工作中年轻的业务骨干,他们长年工作在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并已发表一批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和研究论文,用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社会承认。这次《郑州商代铜器窖藏》一书的出版,更是他们在业务上的新努力,在科研上的新贡献,为河南文物考古事业添砖增瓦。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书中感受到我们祖国历史之悠久,我们祖先创造之伟大。真可谓源流有宗,衍变有绪,苍茫沉郁,惊心动魄! 作为最早的一位读者,我乐于向大家推荐本书。

(原载《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郑州大河村》序

郑州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北郊柳林镇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漫坡土岗上，遗址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600余米，面积约为40多万平方米。1964年调查发现，1972年10月开始进行发掘。先后断续发掘21次，直到1987年11月结束，历时15年。

郑州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考古发掘，当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重要的工作。《郑州大河村》大型考古报告又经历近15年的整理，终于编成出版，这又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重要的科研成果。其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郑州大河村遗址内涵极为丰富，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几近无缺地延续发展下来，时间长达3300多年。可以说郑州大河村遗址就像一部完整的无字地书，记载了仰韶文化到商代前期漫长的历史岁月，这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又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息息相通。这是国内 其他同类古代遗址少有能及的。

二是郑州大河村遗址以仰韶文化为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仰韶文化完整发展的实例。在深达12.5米的堆积中，大部分为仰韶文化层，可分为7期，涵盖了仰韶文化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前后达2400年之久。仰韶文化的每一期，都有单独的地层和各具特征的文化面貌，每期之间又有明显的传承发展演变轨迹。仰韶文化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和当时不同族属文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解体甚至迈入父系氏族社会门槛的历史长河，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郑州大河村遗址无论从考古地层学或考古类型学上，都为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树立了一个典型的分期标尺，这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

三是郑州大河村遗址为研究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及江汉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联结点。多年考古发掘证明，源于山东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遗存内，发现有白地上饰花瓣纹、圆点勾叶纹的彩陶盆和彩陶钵，还有八角星纹的彩陶盆等，这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盆、钵相似；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随葬陶器的组合为鼎、钵、釜 ，中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为鼎、豆、罐（或壶），其形制变化序列与豫西仰韶文化同类器物形制变化序列相似。这表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曾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并吸收了仰韶文化的某些因素，充实了自身的发展。但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则逐渐向西扩展，反过来影响了仰韶文化。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有细泥灰陶尊、背壶、宽肩罐、敛口盉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器物。与此同时，还出有瓦足盆形鼎、罐形鼎、簋、釜、双腹碗、浅盘粗柄镂孔豆、高圈足杯等来自

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风格的器物。这些反映了河南仰韶文化早期时以向其周围扩大影响为主；到仰韶文化晚期时，利用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吸收融合周边各地区文化的精华，当然也包括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内，不断丰富和充实自身的文化内涵，使之得到不断发展。这再次证明了苏秉琦先生的著名论断，"在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显然是东边对中原的影响要多一些"。"类似的情形，还有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邻境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也表现为自南而北的影响要多于自北而南的影响。"（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四是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非常突出。大量的房基保存较为完好，其"木骨整塑"的建筑工序和施工方法，为中国古代建筑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彩陶本是仰韶文化一大特征，而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采陶最为丰富，陶器外壁涂有一层白色的或红色的陶衣，色彩鲜艳夺目，真可谓雪白血红。彩绘内容，匠心独具，有多种几何图案，有多样植物装饰，有各类动物造型，还有许多天文图象，总计有30多种。有的繁缛细腻，有的寥寥数笔，但大都形象生动，十分传神。尤其是那些描绘大自然的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星座纹、彗星纹为全国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仅见，特别富有想象力。表现出郑州大河村遗址的先民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观察和认识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和变化规律，并用简朴的图形绘制在陶器上。揭开了我国天文学史上最初的一页，其重要科学价值当然不可低估。

有以上四点，就足以说明历时15年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重要工作；又经历近15年整理出版的《郑州大河村》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一部意义重大的考古发掘报告。

说及郑州大河村遗址的发掘，还想起一个小小的插曲。1973年10月，郑州大河村遗址正在进行第3次发掘，美国考古代表团访华，成员中既有考古专家，也有精通汉语的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在郑州就参观了河南省博物馆和大河村考古发掘工地，笔者有幸参予接待。那是十年动乱后期闭关锁国的年代，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历史的巨人们以惊人的胆略打开了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为了方便美国人参观大河村遗址，还专门修了一长段简易的黄土路以利汽车通行。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考古同行看到大河村遗址发掘的遗迹和出土文物时那种惊奇的目光，简直和大河村的孩子们见到美国外宾时的目光一模一样。28年过去了，如今的郑州大河村遗址早已修建了遗址博物馆，漂亮的柏油公路可直通那里，接待了难以计数的国内外人士参观。郑州大河遗址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也是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标志。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唤起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们的觉醒，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划时代的里程碑。恰恰也在这一年，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为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经中国政府批准后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田野考古 掘，第一次确立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样，河南就成为仰韶文化的故乡。中国考古学也随之发端，而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科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考古工作者就是实现这个主题的

使者。中国的、河南的、郑州的考古工作者，一直为实现这个主题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今天，在我们纪念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的时候，《郑州大河村》考古报告出版，意义非常。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献的最好礼物，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中一个光耀夺目的亮点。

（原载《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